



中国的内战

—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 [美] 胡素珊 著
 ◆ 王海良 金燕
 ◆ 胡礼忠 许立冰
 ◆ 金光耀 校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美)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11

ISBN 7-5006-2519-7

I. 中… II. ①胡… ②王… III. 政治斗争-研究-中国-1945~1949 IV. K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745 号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译出

感谢作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提供中文版版权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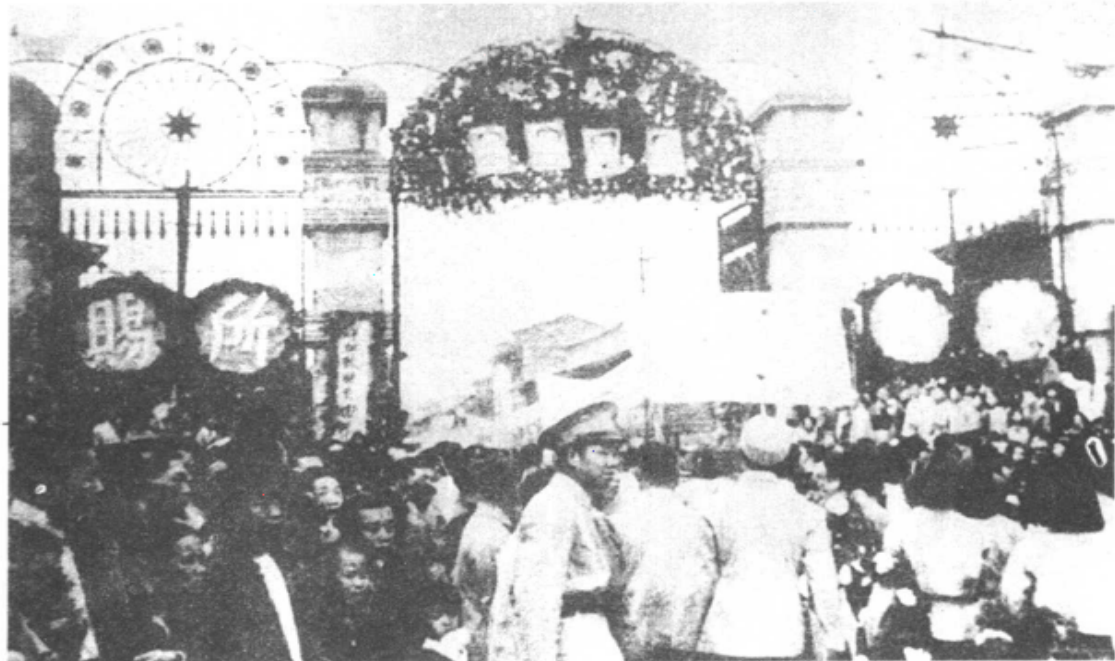
*

850×1168 1/32 17.75 印张 8 插页 410 千字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24.00 元(平) 28.00 元(精)

国民党军队由美国军舰运送到
各日占大城市进行接收工作。



昆明师生悼念一二一烈士。

北平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游行路过天安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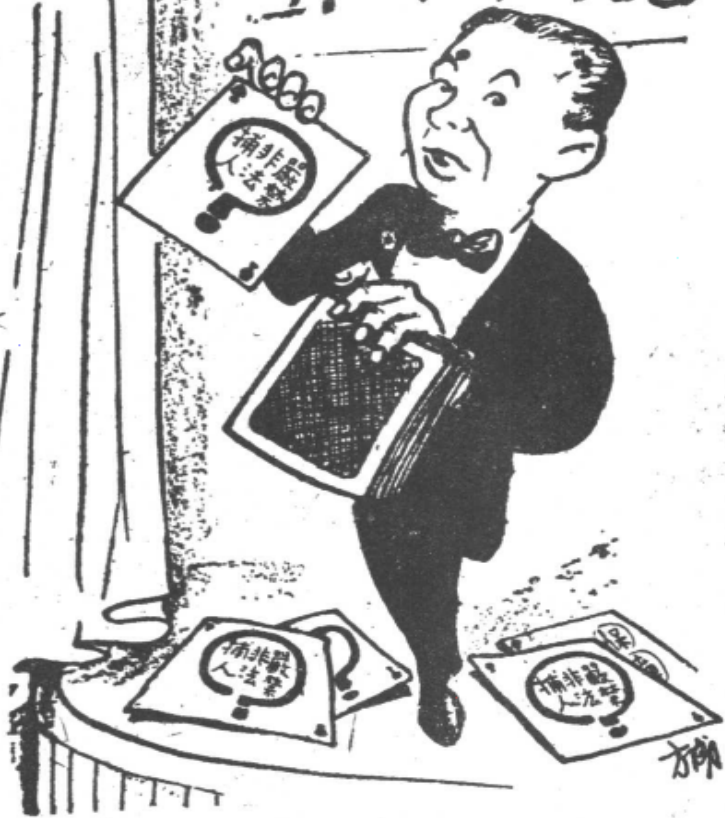
民盟与中共站在一起反对召开“国大”。左起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李维汉、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勱、王炳南。

觀察 漫面



作琦王 (刻木) 流洪

魔術



又一張!



巧
婦
難
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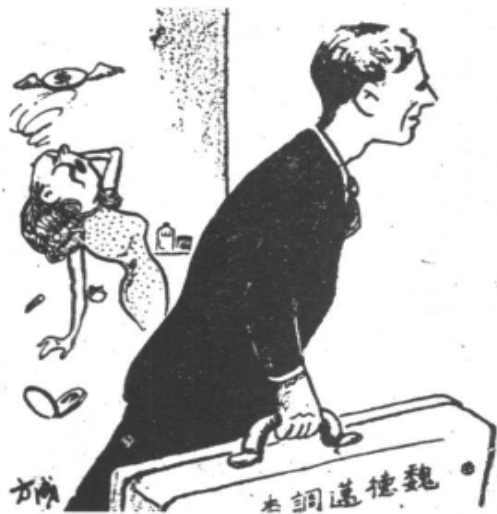
盡蠟殘更



觀察 漫面



後支撐



去了！都去了！



袍道上換



翻身农民支援解放军前线作战。

中國土地法大綱

一、农村封建性及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变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二、农村一切土地，除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以外，均归农民所有。

三、农村一切土地，除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以外，均归农民所有。

四、农村一切土地，除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以外，均归农民所有。

五、农村一切土地，除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以外，均归农民所有。

六、农村一切土地，除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以外，均归农民所有。



农民拥护《土地法大纲》。



晋察冀农民拥护中共的土地改革。



农民分到了土地。



金圆券政策失败后，中国
银行上海分行的柜台
前挤兑的人潮。



在上海火车站前等候撤走
的国民党军官，他们携带
着大量私人物品。

0235
17

中文本译序

我以浓厚的兴趣读完胡素珊教授(Suzanne Pepper)的专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上的问题,能够做到这个份儿上,实在不容易。因为对外国学者说来,做这件工作困难太多,难度太大。不但材料找起来非常费劲,而且对能够找到的材料如何从原本上的意思上去把握也是相当不简单的事。它既要克服字义上的误解,还要摆脱思维方式差异上的困扰,以便准确弄清材料进行分析。我十分佩服胡素珊教授执著的研究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本领,能够搜集那么多材料,能够做出那么多细致的比较贴近实际的分析,从而提出那么多对进一步研究这方面问题很有益的结论。

本书中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使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作者考虑这个问题的思路,并没有局限于军事斗争上,而是希图从别的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中去探查。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本书“尝试拓展 1945-1949 年的历史记录,使之包含政治内容,而它使军事斗争对直接相关者而言产生了意义”。但本书“并非展示一部关于政治人物、事件、思想或组织的连贯记录,而是仅限于两大政权争夺者的政策与实践的层面。具体而言它比较、分析了两大对手及其与渴望加以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种思路是对头的。因为国共两大党斗争的结局,是多种社会因素决定的。诚然,共产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毛泽东

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从来没有忽视别的因素，特别是在政治上人心向背因素的消长的影响。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断言“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正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在这篇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毛泽东言道：蒋介石政府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使自己处于和全国人民为敌的地位，并使全国各阶层人民面临饥饿和死亡，“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这样，蒋介石政府就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其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

胡素珊教授按照自己的思路，依据大量材料，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逐步展开分析，用以说明国民党政府是怎样把曾寄希望于自己的群众抛开的，共产党又是怎样把广大工农和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周围的，论证充分而有说服力。书中不乏有力的材料和精彩的分析，如《反战学潮》一章，说到学生反政府行为受共产党幕后操纵的问题时，作者援引了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多则评论材料，从而指出“共产党干部不应对学生抗议运动负责”。同时，书中还列出有关的民意测验材料。这些材料提示，在学生中只有2.7%至3.7%的人赞成共产党统治全国。作者以此为据，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学生反政府主要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而并非共产党插手的结果。又如在书中的第一部第二章中，作者以大量具体材料展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官员贪污腐化行为和治理混乱情况，然后下结论说：“日本投降后出现的那种本可消除的暂时混乱和管理不善，逐渐成为标志着民众对国民党统治普遍拥护已告终结的开端。”这个判断确有一定道理。从沦陷区大多数人民来说，在八年抗日过程中一直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对此，我虽然在当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却深有体会。我的父亲及

他的同事都是普通的职员，虽有强烈的爱国心却又没有勇气直接参加反日斗争，只是希望自己的政府有朝一日能打回来。这类人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该说很有代表性。我记得，几乎每天晚上，我的父亲都要用黑色布把窗户遮上，用相当原始的收音机听重庆广播。每听到一个好消息，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也包括开始懂事的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到抗日胜利，把国民党政府盼回来了。结果，当人们看到接收大员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于是，相当多的人开始不满。在当时，不少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国民党与抗战前大不相同了。其实，研究一下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就会弄明白发生变化的原因。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原本是个很有革命性的现代化政党。它领导民众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功劳确实不小。中华民国建立后，这个党开始消沉，开始退步。鉴于这种情况，孙中山联合刚刚诞生不久的共产党，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重新振作起来，并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武装斗争中不断壮大，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不幸的是孙中山过早逝世，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在政治上另有所图，在北伐战争胜利前夕排挤同盟者，独吞胜利果实。蒋介石建立起全国政权之后，成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新军阀。但是，此时的国民党尽管其领导人实施的政策日益为建立和完善法西斯统治服务，而下面的一些党员还是能够保持廉洁的。也就是说，在国民党中由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恢复起来的上进精神仍有一定的影响，并没有完全丧失掉。随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先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继而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下才宣布抗战，并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应该说在初期，国民党政府抗战还是积极的努力的。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这个党无法经住长期抗战的考验，在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开始腐化，到抗战后期达到高峰。这就不难说明，为什么那

些真心盼望国民党的人们再见国民党时会大吃一惊，突出地感受到这个党的变化。事实上，国民党既不想也不能“消除暂时混乱和管理不善”，一条道走到黑，把群众都丢光，自己也就“寿终正寝”了。看来，一个政党自身腐败是个不得了的事。再如书中对共产党赢得群众拥护的问题，是通过土改、城市管理、知识分子认识转变等多方面综合论证的。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作者点明：中共“将自己的利益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一致起来，从而创造了一个能够满足它自己对粮食和人力的需求并且拥护反蒋斗争的群众基础”。类似的例子，书中还很多，留给读者去品味。

值得注意的是，胡素珊教授在本书的最后提出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很好地适应自己的环境”，而中共却能力排一切困难而取得胜利呢？书中明确认定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这说明胡素珊教授的认识是很有深度的。特别是在说到整风运动时，作者正确指出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强调“使马列主义适应中国环境以及在党的各级工作中实施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上。可惜，作者没有就此展开论述，也许这不属于本书的任务。其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者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政党用一种学说、理论做指导，都要与实际结合，否则就会产生错误，这是个常理。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如果脱离了各个国家无产阶级从事的事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一样的无法起正确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在实际斗争中努力探索结合的途径。后来，毛泽东提出了这一科学的命题，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由于实际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长期历史任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正是这种结合进一步深化的体现。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往往忽视这一点,甚至并不以为然,结果就很难把事情弄明白。能够摆脱西方学者容易犯的毛病,正是胡素珊教授的长处。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十全十美的专著,这样的著作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书中有些观点、议论,我以为仍值得商榷。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报告、文章,在理解上还有不少误差。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前边所指出的,对外国学者说是太难了,恐怕也不能要求过高。胡素珊教授很谦虚,在《中文版自序序》中表示自己的书“系抛砖引玉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并希望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我以为,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书写得很好,翻译也是很有水平的,所以我愿意把它介绍给读者,特别是我的同行们。

张静如

1997.5 于北京师大

中文版自序

历史就其本义而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处于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就有了历史学给人们的第一个启示,也就是说,历史往往揭示它所涉及的主题,同样也显示作者本人;它往往被过去或者与它涉及的时期形成对照的作者写作的时期所设定,同样也被现在所设定。由于《中国的内战》跨越了这么多不同的政治时区,身处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的读者因此可能会想了解有关这本书写作的背景以及引发这本书的一些问题。

这一研究作为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开始于 1969 年,当时我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政治系的研究生。博士论文完成于三年后,为交付出版社刊行,又在 1973 年至 1975 年间修改了两年。因此指引我研究的理念、动机和设想都直接源于那些年美国的政治环境。当时 50 年代冷战时期的强硬反共观点已不再风行,而和解的新态度要被认同还须经过斗争。本书正是那个转型时期的产物。

那些年是美国的多事之秋,而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校园更动荡不安。在校园里,美国在越南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是学生起来行动和发表异见的主要原因。因此,与共产主义相关的问题、它所象征的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挑战以及美国如何回应这一挑战,要比任何其他问题更具争议,也被更激烈地讨论着。而没有

任何一个事件比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更能象征那
些年在转变中的政治潮流。尼克松在美国政坛以“典型”的冷战
斗士著称。1945年至1949年间共产主义在世界上节节胜利，并
最终从东欧跨越欧亚大陆延伸至中国，从而导致了美国国内反
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勃兴，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就开始
于此。因而，尼克松戏剧性地主动寻求与他的共产主义老对手达
成一种处于遏制和共处两极间的新的平衡，具有多大的讽刺意
味！

然而，尼克松以戏剧性的访华开始他的主动还是挺合适的，
因为中国在他以及美国的冷战意识中是一个庞然大物。尽管美
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日本，但它此后对华政策所追求
的两个主要目标却都未获得成功。最初，美国试图在中国共产党
与国民党领导人之间进行调停，但徒劳无功，没能在1945年日
本投降后阻止国共之间的矛盾发展成全面内战。然而美国既不
愿平等地对待这两个对手，也不愿承认共产党实际上会赢得胜
利。它的第二个目标即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因此也就注定是要
失败的。

后来，美国的批评家就以不忠诚来指控与失败的对华政策
有关联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对这样的结局发出过警告的外交
官，以及那些拒绝全面承诺为援救南京政权提供必要的人员和
物资的决策者。于是，对那些“丢失”了中国的美国人的指控或者
为他们的辩护就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能量。围绕着谁该承担这一
责任的争论成了美国政治中最激烈和最持久的争论，在此过程
中许多人身败名裂。然而，保守主义在50年代对犯了“把中国丢
失给共产党”罪的那些人的竭力清洗，到了60年代就被自由主
义“中国不是我们能丢失的”回答所压倒。

由此，并且也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对欧洲和苏联的关注转向

了亚洲，中国最终在美国国内围绕共产主义挑战所展开的争论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跟随着这一转变，同时对学理答案和政治结论的探讨也在深化。研究主题从50年代以美国的失败和苏联的干预这样的外部因素占主导地位，演变为集中于中国内部的原因和规律。

当我决定将我的研究集中于40年代末的内战时期后，草拟研究提纲的艰难任务出现了。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除了在几门介绍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课程上学得的一些基本知识外，我几乎不具备构建提纲的能力。幸运的是，在1969年的柏克莱，我有三个可以获取灵感和思想的源泉。每一个源泉都在某些方面代表着当时主要的政治和思想潮流。

我的导师查尔默斯·约翰逊刚出版了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加州1962）。在60年代初，这是一本被认为超越典型的50年代冷战观点来考察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政治上“自由主义的”著作。然而，60年代的政治变化是如此急剧，以致到了60年代末，这本书已被看作是“保守主义的”作品。那时，柏克莱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我们所有人都向“左”靠，而约翰逊却不愿对他的批评截然相反地向“右”转，去支持美国在越南的反共战争。我们因此断定，他的论著必定在某些方面是错的，我们还推论，他的错误肯定在于不断地强调外部因素，即把日本入侵华北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一争论从反面提供了一种灵感和动力，激励我从中国社会本身更深地探索共产党胜利的根本原因。

我灵感的第二个源泉是当时也在柏克莱校园的谢伟思。谢伟思出生于中国，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的儿子，40年代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

访问过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当时有一批美国外交官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弱点,并对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向国务院作了肯定的汇报,后来却因此毁了自己的外交生涯,谢伟思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是他不屈不挠奋斗多年,要洗刷强加于他的颠覆和不忠诚的罪名。他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并且重返外交界,然而却被贬至一个低级职位,毫无升迁的前景。

谢伟思在50岁后提前退休,并决心顺应美国“成人”教育的潮流重返校园,在加州大学注册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他排得满满的课程表和全“优”的成绩使我们感到汗颜。但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些,他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是与我们这一代美国人试图从中发现新意的充满争议的过去之间的活纽带。他仍然毫不动摇地坚信自己在40年代关于共产党强和国民党弱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在自己的著作《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谢伟思二战期间电文集》(纽约兰登书屋,1974年)中将它们公诸于世。与他同时代的熟悉延安和重庆的少数外国观察家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们习惯用来表述延安和重庆两地差异的一句短句使人们对他们的观点记忆犹新:“能起作用的原始的东西要胜过不起作用的现代的东西。”

一本1963年初版到1968年已第三次印刷的畅销书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外国观察家的回忆对人们的影响。这本书的作者鲍大可可是谢伟思的同时代人,而且与他一样出生于一个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家庭。40年代末,鲍大可是一名年轻的记者,他奔波于中国各地,主要报道国民党统治区城市的情况。他的书《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纽约1963年)重印了他当年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是未经掩饰的民众离心离德的实录。他报道了“普遍蔓延的愤世嫉俗和绝望的心情”,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几乎完全”丧失的民心。他还记下了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不满

情绪。40年代末，知识分子在抛弃了国民党政府后，不断地向左转。学生也同样丢掉了幻想，他们中大多数人转向了同一方向。

我灵感的第三个来源实际上是一个群体，是一些居住在柏克莱能回忆有关事情的中国人。其中的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研究生，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他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父亲关于过去历史教训的那些故事。那些与40年代末有特别关联的教训都是关于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而当政权衰败时，权贵们却不肯为自己或下属的行为承担责任。他父亲不厌其烦地讲述是希望这些教训能被人记取以免重蹈覆辙。

居住在柏克莱的另一位中国人是一位老人，他本人在40年代末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中级军官。他有相似的回忆。他的回忆也不停留在军事失败上，而是集中在这些失败的政治根源上，即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士气颓丧。不过，他还回忆了另一件事，这对我的研究而言是十分幸运的。他回忆道，他和他的同僚以及其他许多人当时都阅读上海出版的一本叫作《观察》的杂志，并且实际上将它看作了解政局发展和战争进程的唯一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建议我也这样做。后来这成了对我最有用的忠告，因为它使我越出美国国内争论和外国观察家报告的范围，接触到我最需要的信息，即当时的中国人对40年代中国所发生一切的看法。

但是，读者会注意到本书的某些不协调。作为作者这引起我的关注，并在最初把它归之于缺少足够的研究资料。事实上，完整齐全的《观察》确实难以找到，多年来我只能凭借不完整的搜集进行研究。《观察》上的观点和讨论的议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的高度关注。但是同样也是这些作者，将农村的土地改革看作是共产党力量增长和国民党衰弱的主要原因，尽管没有详尽地说明农村的状况。在延安的外国观察家和查尔

默斯·约翰逊使用过的日本军方的资料也强调了农村根据地是共产党力量增长的根基，并且同样没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为作出这样的解释，我转而查阅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文件。斯坦福大学有这方面的文件，但同样是不完整的。

然而，最后我终于认识到，问题其实并不在于缺少研究资料。我的论著不够协调和连贯的更根本的原因存在于20世纪中国革命本身的性质（无论是共产党执政前还是执政后的时期）。中国的力量和权利的两个主要源泉——作为头脑的城市知识分子和作为根基的农村农民——似乎并没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使得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重建也是不完整的。

人们学习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并希望能为未来筹划出方向。不过，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从《中国的内战》中吸取很多很多的历史教训，因为这本书并不准备承担如此的重任。相反，我希望读者能按它的本来面貌阅读它，也就是说，这是一本由外国作者根据不完整的资料撰写的抛砖引玉之作，但作者力图保持坦率的态度，认真权衡写作时所能掌握的所有中英文资料。就此而言，本书有可能提供一些教训。但是，在这一可能性实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更多地了解过去。因此，应该说这一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端：它为进一步研究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内战时期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主题；也提供了引导这一研究的概念和设想；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探寻的资料。

胡素珊

1996年8月于香港

目 录

第一部： 国民党统治末期

第一章	引言	(5)
第二章	结局的起点:接受日本投降	(10)
第三章	反战学潮	(51)
第四章	经济弊政的政治代价.....	(112)
第五章	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评判 ..	(157)

第二部： 共产党取而代之

第六章	知识阶层对中共的评判.....	(237)
第七章	重新上改.....	(275)
第八章	重返城市.....	(394)
第九章	新的开端:共产党取代国民党	(458)
第十章	内战的政治.....	(502)
附录一	文献注释.....	(518)
附录二	参考文献举要.....	(524)
译校者后记	(550)

致 谢

我特别应该感谢三个人,他们为本书做出了各不相同的贡献。在多年的争论和辩论中,查尔默斯·约翰逊教授始终不渝地给我以支持,使这样一项研究得以坚持下来。谢伟思一直提供着无价的信息和信心。最初把这位初入学术圈的中国问题专家吸引到这一领域的是有关美国在亚洲所起作用的一些问题,命运的幸运安排使他先在伯克利成为校友,继而成为本书的编辑。不过,若不是已故安德森·程济时(音译)对本书抱有兴趣,它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他在本研究最初亦即最艰难的阶段所给予的指教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故全部手稿杀青之际不能再从他的批评中获得教益,令我深感遗憾。

我要感谢陈志让、C. Y. 宋、马风华(音译)、西尔维亚·钱、戈登·贝奈特、马克·布莱切尔和鲍博·马克斯,他们对不同章节作了批评性评论。如果说有时我以与他们的意思相去甚远的方式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写作的话,责任不在他们。本书还应归功于沃伦·伊尔切曼教授开设的发展行政学研讨课,其思想启迪实非其表面所及。

给予过我帮助的人很多,远非我在此所能列举,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无法胜任搜集和翻译资料的工作。在伯克利的中国研究中心,C. P. 陈和纪文顺当仁不让,有求必应,而我的请求仿佛无穷无尽。在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罗逸飞、郝万仪以及全体职员

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一如杰拉尔德·伯克利、莱斯利·钱、约翰·道尔芬、劳伦·弗斯勒、盖伊·瑟尔斯、珍妮特·斯威斯洛和拉瑞·魏斯所做的那样。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和报刊阅览室、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以及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和亚洲研究中心，图书管理员和工作人员无不对我的研究工作伸出援助之手。许多让我分享其回忆录的友人与相识同样如此。

加利福尼亚大学及其中国研究中心慷慨解囊，为本研究课题提供了多年资助。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同仁的帮助。《中国季刊》(第48期)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查尔默斯·约翰逊编《现代中国思想与政治》)已节选刊载了第三、五、六章，我在此感谢其慨允将此件重新发表。

第一部

国民党统治末期



第一章 引言

在外部世界看来,1945—1949年标志着亚洲最大的国家从一个国际力量阵营转向了另一个国际力量阵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政治舌战浪潮,并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激起了一个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新决心,且直接导致了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

在反思这些事件时,西方学者首先把焦点放到了中共和国国民党之间冲突的军事进程上,其次放在美国旨在影响和遏制这一进程的种种努力上。面对西方读者,史学家们每每诉诸读者兴趣与关切之所在。1949年以来,美国关于中国的著作出得最多,国民党的溃败被径直解释为一场政治失败,并将共产主义的胜利视为非法篡夺政权。“中国的陷落”也看作是美国的一次失利,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最关注的一点是应当确定还是推卸责任。学术研究、正式出版物以及党派政治辩论无不受到这一关注的激发。对说英语的读者而言,1945—1949年这一阶段^[1]的中国内战史基本上成了一部战事输赢的记录、提供和拒绝美援的记录以及对援助品分配者动机调查的记录。

不论这是否全然出自政治利益和思想偏见——为麦卡锡时代的

可怕影响所加剧——我们无须拘泥于此。美国新闻记者及其他人所著多部亲历实录确实采取了一种较为开阔的眼光,而本书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2]即尝试拓展1945—1949年的历史记录,使之包含政治内容,而它使军事斗争对直接相关者而言产生了意义。

本书在许多方面还是初步的和不尽全面的,原始资料并不十分丰富,充其量只是介绍了各种多尚未被探究过的问题和疑点。文献空白也颇多,有的可能永远无法填补。本书也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它并非展示一部关于政治人物、事件、思想或组织的连贯记录,而是仅限于两大政权争夺者的政策与实践的层面。具体而言它比较、分析了两大对手及其与渴望加以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内战乃是一场争夺国家政权的军事斗争。战争既是通过另一种手段进行的政治,因而政治角斗场上必有种种线索,表明这场冲突的性质和结果。这场斗争的政治内涵非但规定了争夺者的身份,而且规定了其作战的目的、信念的性质以及可供其支配的资源。从这一研究目的出发,政治被界定为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作用和交换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它是这样一种交换,一方是社会权位的占据者,另一方是该权力施行于其身的全体人民中的个人、群体及阶层。政治资源提供了交换手段,并且在这些社会成份和政权之间被交易,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虽然由全体人民划分成的不同集团能够保持一种脱离政权的存在形式,但反之却不然。政权要靠它们的维持,不能离开它们而孤立存在。不同政权在其与不同集团的交换关系上性质有别。这一界定的假设却是,参加政治角逐的个人和党派,不投入这一交易便既不能夺取权力,也无法保持权力。当订立同盟、确定政策和贯彻计划时,交易就发生了。

在争夺者对权力的企望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政权夺取

资源。假如后者有弱点可以利用,则做到这一点明显是轻而易举之事。现政权与各阶层的关系愈是松散,则争夺者愈有机会消除他们的抵触,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这一关系还可以若干方式得到加强,如执行的政策,作出的许诺,参与的人物,等等。“拥护”如同“反对”一样,具有多种形式,既有形,亦无形。政治资源量多类繁,其中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相互斗争中藉以维持其军队的小米和人力。中国民众与这两个对立的政党进行此种及其他资源交换的种种情况,便构成了我们探究的课题。

政治之被界定为相互作用和交换过程这样一个概念,已在社会科学家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3]但未必在其他领域流行。因此,确认这一概念,对于以处于革命性变化中的陌生的政治体系为主题的研究而言,可能颇有用处。在我们较为谙熟的文化环境中,例如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无需向任何人提示这些基本政治原理。美国新闻记者或政治分析家绝不会在试图估价一次总统选举结果之时,不先考虑可能影响南方、农业地位、黑人、劳工、白领工人等票数的种种问题。全民中的这些群体和华府当局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关系,十分明显,无需赘言。

然而,碰到与我们不同的政治形式和风格时,就不必采用这些同样的假设了。当政治对抗者之一是积极用暴力推翻现政权的共产党时,这一点尤为正确。确实,尝试对任何一个社会的这样一段历史插曲进行政治分析,都无异于将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视政治正统为既定的组织和程序模式及公认的政治行为规范的衍生物,并非特别奏效,而那些模式和规范不但受到质疑,而且受到挑战,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更重要的问题无疑是这一挑战本身的性质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条件必定植根于过去。但在今日,它们必定也衍生于个人在组织和程序形式上对它们的应用,而这些人既占有这些条件,又在这些条件下活动。

把这一挑战当成主要产生于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和控制方式也是不全面的,这是贯穿于西方对共产党领导下革命运动所作评判中的另一常见主题。这一假定产生的分析上的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可见于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的一项权威性研究^[4],此书开篇即描述吴庭艳政权如何在1954—1963年期间给南越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巨大苦难,直至“吴氏政权的衰败”以其本人被推翻而告结束。作者以年代为序,逐一列举各阶层的逐渐疏远,结语说道:“人们感到正在亲眼目睹整个社会结构分崩离析。”^[5]然而,该书其余部分基本忽略了论及吴氏所处环境那一章的内涵,仅限于描述那一时期诞生的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方法。作者提出,只有遭受过真正苦难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并接着写道:“确切地说,民族解放阵线情况恰恰相反。它一举诞生,勃然兴起,既而发展壮大。苦难则几乎被演化或加工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添加物了。”^[6]

这些允许各种矛盾溜出人们视线的假设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这些相同的假定既已引起人们全力关注美国未能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进而要求对美国在越南的冒险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无疑会激发人们去尝试解释美国在那里的失败。不过,军事干预的政治局限性现已完全明晰。激励人们探究全部政治组织与政治问题之间关系以及政权争夺者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因素也显而易见。

在详述马基雅维里就夺权与保权技巧给有抱负的统治者所提出的建议时,一位学者写道:

首先,新君主须更有把握为国家带来安全,此乃其本人新近登基之事实昭示此重大必要性。他须采取较其所替代之政府更为有力和有效之措施,以期从此以后予人民以更大安全感。然而,此等进展几无不因以往之权威欠缺而出现……效忠之迁在

此情形之下盖可随时发生。旧日忠君之统遂化为乌有……人民乃指望新政府赐予安全、和平及法制之更佳期许。〔7〕

本研究力求断定当政的国民党在其掌权末年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真正存在一种“权威欠缺”。与此相反，第二个目标是弄清中共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赢得了效忠，而效忠总与公众对占据政治权位者的认可结伴而至。中国共产党真正赢得了合法统治权吗？抑或说他们在本质上是国民党所铸大错和日本人所犯暴行的受益者吗？

注 释

〔1〕 中国史学家把1945—1949年这一时期称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分别为1924—1927年和1927—1937年。

〔2〕 最著名的有：史沫特莱著《中国》、接管前夕的中国；杰克·贝尔登著《中国震撼世界》、德克·博德著《日记：1948—1949，革命的一年》；韩丁著《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以及F. 梅尔比著《受命于天：中国内战录，1945—1949》。有关出版物详情，见参考书目选要。

〔3〕 事例见法伦·F. 伊尔切曼和诺曼·克普豪夫著《变化的政治经济》及其所引之资料。

〔4〕 道格拉斯·派克著《越共：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方法》（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

〔5〕 同上，第73页。

〔6〕 同上，第76页。

〔7〕 查尔斯·W. 亨德尔：《权威本质之探究》，见卡尔·J. 弗里德里克编《权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1页。

第二章 结局的起点：接受日本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在华冒险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两大争权者的政治命运。最初，日本的进攻触发了一场民族主义反应，使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共同开展统一的抗日运动。这一运动把这位委员长置于领袖地位，因为只有他在全中国独具足够高的地位，来领导全民抗战。^[1]蒋氏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遂被朋友和敌人共同视为全中国决意抵抗侵略的象征。

为了维护这个名存实亡的象征，蒋氏及其国民政府在不断推进的日军前面，被迫从华北和沿海地区撤往西南。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伪政府，接管了退却的国民党空出的权位。与此同时，来自延安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则得以利用日本人对华北的进犯。共产党人之所以特别具备如此行事的条件，是因为1927年他们在城市的据点遭毁后，一直被迫开展着游击战和农民革命。凭此经验，他们立即开始在敌军进攻线后方的农村组织抵抗运动。结果，他们成为中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来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到了1945年4月，中共宣称已掌握了约有9550万人口的地区。

相比之下，在利用日本入侵给它带来的同样机会方面，国民党政府却无所作为。该政府可能赢得了全国和国际上对其作为

自由中国代表的承认,但就国内政治力量或民众拥护而言,截止1945年,它所获无几。政府的确也在日占区发动了游击战和秘密战,但从未扩展成一场广泛的抵抗运动。偏安重庆的岁月未有建树,而其政治制度的内在弱点却相应地加剧了。1944年年中,一位美国外交机构的官员写道,“国民党比前十年的任何时期都虚弱,委员长正在失去全中国的拥护。依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中国在对日战争头两年里找到了一种新生力量。如今内在弱点却日益加剧,统一的进程在发生逆转。”^[2]普遍不满、政治对立、弊政以及军政机关的空前腐败,成了国民党败落的确切标志。

然而,1945年8月,日本的战败为国民党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也可以说舆论如此认为。突然间,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重树权威的地位,这一权威覆盖的地域,加上自由中国各省,容纳了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大公报》称之为千载难逢之良机,吁请政府利用日本投降更新其政治统治权,并重振民众的政治士气。该报告诫道:“吾辈万万不可枉费光复地区民众之信心。”^[3]

30年后的今天,每逢那一代中国人回忆内战岁月或当其子女重温父母对彼时的记忆时,他们几乎一致把焦点放到1945年秋冬接收日占区之举上,视之为民众对国民党统治普遍绝望的开端。中文“接收”一语是中性的,其涵义丝毫不超过接受或收到。但随着民众不断经受国民党的接收,表示洗劫和明夺暗抢的同音异义词(汉字各不相同)就替代“接收”而流行起来。^[4]

信心普遍低落在城市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最深切地感受到了恢复时期的种种影响。奉派接收敌伪政治和行政单位及敌有资产的政府官员蜂拥而至,驾临各城市。正是在这些城市,这班贪官遇上了最有油水的机会,而他们贯彻的复兴方针,给经济生产带来的只能是浩劫。正是在这些城市,公众对这些情

况最为了解,不仅因为这里有臭名昭著和肆无忌惮的行径,而且由于这里是不全受控的舆论界的大本营。

这几个月的决定性进展,使政府的公开形象发生了变化。政府本身并未因重返沿海而改变。认识到国民党缺陷的人预见并告诫说,它重返沦陷区时可能会出问题。^[5]但那些缺陷的严重程度,直到接踵而至的战后时期才家喻户晓。公众的幻灭感加重了,原因是腐败无能竟出自八年来一直充当民族振兴意志象征的政府。人们猛然发现,国民党的战时声誉不能衡量它在战后的表现。

假如政府在随后数月采取行动,纠正恢复时期的错误,公众的记忆无疑会与这一事件的政治含义一起烟消云散。对国民党来说,不幸的是接收期间导致广泛批评、抗议的问题大多未得到圆满解决。因此,作为城市舆论疏远国民党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些批评抗议在内战时期的政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接收阶段还标志着政府在回应日本侵略挑战方面已彻底失败。

公众批评和争论围绕着四大问题而展开。第一是解除日军武装迟缓,以及政府明显不愿惩处汉奸。第二个也是最臭名远扬的问题,是奉派前来接收日伪资产及机关的重庆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第三个普遍问题是此时采取了不恰当的经济和金融措施。最后,更微妙但并非次要的是,重返故地的官员对平民百姓采取了恩赐态度,他们认为,这些百姓未随国民党内迁,而留下来在日本统治下苟且偷生。

胜者与败者

不管道义之争内容如何,客观上存在着广泛的社会要求,即

国民政府应在战胜日本后立即解除勾结日伪政权者的军政要职,并予以应有的惩处。政府在这方面行动迟缓,主要原因是它需要日本人及其中国“傀儡”——人们对汉奸的称呼——维持日本投降后的“法制和秩序”。政府的心腹之患与其说是百姓的混乱,毋宁说是中共造成的明显威胁。由于缺乏足够的运输设备,大量国民党部队、保安机构及行政人员无法立即重返广大的日占区。可是,政府发现自己早已投入了一场与共产党的竞赛,目标是接收长江以北的日占区。以西南为后方的政府显然处于劣势,因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

不过,人们还纷纷指责政府对日本可能的投降毫无准备,未预先制订受降计划。还有谣传说,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活动和蒋介石对非嫡系将领的不信任,使他未能在日本投降后的关键几周内部署他的部队,未能最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优势。无论怎样,此时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摧毁一切潜在对手在地方上的势力堡垒,来重树和加强自己的权威。除了共产党人,他的对手还包括云南省的龙云和东北的张氏家族。所以蒋氏愿意联合任何愿意帮他完成这一大计的人,只要他们的势力不对他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即可。例如在东北,政府不得不联合前傀儡,因为这实为唯一可以指望的一批人,他们既不支持共产党人,也不拥护旧军阀张作霖的几位公子。〔6〕

国民党与日本人的公开“联合”开始于8月23日,标志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向日本驻华军队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下达的那道训令。训令要求日军部队就地担当有效的防卫,保持交通线的畅通,等候国民党军队抵达。日本人还要负责收复近期被“非正规武装”即共产党人占据的地盘。随后,日伪部队即按此训令进行了攻势作战。

虽然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命令共产党军队原地待命,

但共产党人坚持自己有权接受敌军部队投降。根据8月10日和11日延安下达的命令,共产党军队向日军控制的重要据点和主要交通线发起了全线反攻,以迫其投降。何将军在8月23日向冈村下达训令时,共产党人正全力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张家口市。从8月下旬到9月底,共军与日伪军之间有报道的冲突即超过100起。日伪武装成功地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了约20个城镇,它们分布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及绥远。〔7〕按何应钦将军的说法,11月底晋察冀三省仍有约10万有武装的日军部队。〔8〕

假如政府更敏锐地认识到尽早在光复地区重树其权威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以这种方式利用敌军部队引起的争议就会少些。但相反,政府却不必要地授权给声名狼藉的卖国政府,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地位。其结果是延长了日伪行使职权的时间,而这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明确批准。对此,《大公报》归咎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并且不乏审慎地称之为“先签投降书,后接收政府”原则。〔9〕

共产党报纸对此专门提出质问,为何在光复地区以日伪官员而非国民政府的权限发布公告和政令,国民党为何对汉奸高官委以同等官职。《新华日报》质问道,为何像伪上海市长周佛海和南京伪军总司令这样的人获准自行发布本该出自重庆的公告?〔10〕

首批到达汪精卫政府首都南京的新闻记者惊奇地发现,除了街头的零星中国士兵和偶尔飞抵的美国运输机外,“南京没有丝毫光复的迹象……冈村依旧在外交部大楼里高高在上。日本宪兵仍盘踞着司法院过去的房屋。日军哨兵四处遍布,奉命维持治安和保护他们的同胞……”〔11〕一周后,另一位记者作了情形相同的报道。他写道,直到9月4日,南京各报仍受到日本特工

的审查。城里随处可见伪政府的告示和标语，其中“和平救国”一语最醒目。^[12]类似情况其他城市也有报道。

此外，重庆各报很快就开始报道，前伪政府官员摇身一变，又回到了国民党的队伍中。据说这一过程轻而易举，只需在办公室外面挂上块新招牌即可。人们要求给予敌伪人员以某种形式的惩罚或道义制裁，并禁止其担任公职，对此政府在正式言论中给予支持，但在实际行动上却经常忽略。有报道说，一些大汉奸正在获准逃往日本，而很多次要的敌伪官员则忙于联络南京的国军先遣司令部人员，后者是国民政府首批还都正式代表。9月9日的《大公报》写道：“在中国，无论发生何事，总有同一批职业官僚。他们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报人中机灵者已相继改换门庭，故汉奸报纸眼下正同其重庆弟兄一唱一和，虽则它们的编者于日本投降前还在大力倡导‘大东亚’和‘和平救国’方针。”

招致最犀利批评的实例中，有战争结束时的上海市长周佛海一案。周曾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是1944年汪氏死后伪政权中最有权力的人物。日本一投降，周立即宣布组成一个行动总队，并许诺以此确保上海的社会秩序，以显示他对党国的忠诚。一位记者就此事评论道：“目睹这帮往日常常欺压他们的人依旧官运亨通，大权在握，老百姓只能发出怒吼。”^[13]

到9月底，这个问题已达到严重程度。舆论一致要求惩处汉奸。舆论声言，民族统一危在旦夕。批评者质问道，若此等人不受一定追究，再遇民族危亡之际，人们何以保持忠贞？^[14]在舆论一片喧嚣之中，作为明显的反应，行政院草拟了一套惩处汉奸条例，经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修改后，由国民参政会批准。一些人急忙出来称赞这些条例和9月下旬进行的一些缉捕，称其

已将政府延迟惩处汉奸卖国贼所造成的疑云“一扫无余”。^[15]

其他人则对这些条例审视入微，大挑毛病。最有争议的问题出现在第四条里。该条款规定，凡曾为抗战服务或任职期间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伪职人员，均可请求宽大处理。不出一周，那些最初欢迎条例的人也承认，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汉奸已突然变成了爱国者，而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日本人的爪牙。这些汉奸声称，他们那样做是为了以“地下活动”方式帮助抗日，而这种自诩倒可以经常被证实是巧妙的谋财打算。随着曲线救国之说的蔓延，社会上的冷言冷语有增无已。

条例中还有一个引起争议的漏洞，它允许特殊对待 1945 年 8 月 10 日前投降的人员。批评者称，谁会等到那一天才明白日本将战败。最后，人们批评条例太重职位。忽视了对低级伪官员进行道义制裁，而这些人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对人民犯下了各种罪行。尽管此时逮捕了包括周佛海在内的数名汪伪政权重要成员，但并未做出全面的努力，把所有这些要求和指控交付一个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16]

11 月下旬有一篇报道指出，虽然若干最臭名昭著的汉奸在沪、京、穗被捕，但在北方竟无一人被拘押。^[17]尽管那边抓了几个人，但更多以正式身份为日本效劳的人却被国民政府委以同等要职。被控于福建省主席（1934—1941 年）任内勾结日本人的陈仪竟被委任为台湾省主席。^[18]日本投降整整两年后，沈阳一家非共产党报纸仍表示不解，政府何以至今未采取步骤惩处前伪满洲政府官员，反而让他们填补东北国民党控制区的政治和行政职位。^[19]

或许最可憎的要数政府任用汉奸高级军官一事，这些人干过直接帮日本人打自己同胞的勾当。^[20]其中有伪蒙疆自治政府军政部长李守信。一家非共产党报纸认为，李是首批叛卖祖

国,在日本人手下带兵的将领之一,时间早于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正式开始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21]战后,国民政府委任他为第十路军司令官。另一名汉奸将领门致中,则被任命为国军第九路军司令官,还有一位是李先良,身为日本投降前青岛地区皇协军军官,其后不久即受命出任该市市长。

赵保元,是1937年以前满洲国军队的一名指挥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将他调往山东,据说他在那里参与了日军对共产党游击队及其农民支持者的扫荡行动。1944年,日本人委任他为胶东半岛反共军司令。日本投降后,他逃至青岛,不久即被重新任命为国军师长,然后重返战场。1946年6月,他在青岛附近与共产党进行的一次交锋中或其后毙命。另一个据说曾参加过大扫荡的人是王继美,1946年1月重受国民党委任,6月被共产党捕获,作为战犯受到审判并被处决。

姜鹏飞在大连和沈阳与日本人共过事,在冀东组建过伪军,还奉派去日本深造军事理论。战后,他受命指挥国民党新27军,地点也是冀东。1946年3月,他和他的部队被空运到东北长春,接替撤走的苏军。他受命改编满洲国部队并在东北共产党占领区组织暴动。1946年9月10日,他和李明信、崔大刚一起在哈尔滨被处决,罪名是密谋在该地举行武装暴乱,从中共手中夺回该城。据说李明信曾在战争期间当过日本特务,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敌后战区工作委员会军事专员。崔大刚据说在其职业生涯中多次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双方之间摇摆不定,在哈尔滨策划不走运的阴谋时,是国民党第六路军的一名军官。在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市,刘建勋因策划类似的阴谋终被处决。据说刘曾在天津为日本人率领一支特务分队,日本投降后不久,即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收编。^[22]

何应钦将军在1945年11月底称,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

宁次正全力投入“联络工作”。^[23]在他于1947年2月返回日本之际，南京一家报纸强调指出，政府显然毫不关切此人对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丧生应负之罪责。该报社论总结道，“吾辈不知是否将为之举行盛大告别宴会以誌此日。”^[24]

不过，显然并非单单国民党利用了敌人的力量。在受审时，周佛海称，他曾拒绝共产党提出的让他领导一支部队的建议。此说难以证实。郝鹏举一案更具实质性。他先在伪军里当指挥官。1945年后，他转向共产党，被任命为苏鲁民主联军司令员。临近1946年末，正值该地区发生政府军大举进攻之际，他再次改变主意，率部投靠政府一边，严重破坏了共产党在苏北的地位。然而，有关战后共产党联合日伪的种种说法，数量上远远不及已被证实的国民政府方面的事例。结果，在这个问题所引起的社会不满中，政府首当其冲。

这样，无论政府认为日伪的帮助在同共产党的冲突中如何必不可少，那种帮助及那种看似无关的求助方式，并非未付出高昂代价。北平（直到1949年9月共产党重新改为北京前，该市正式用此名称）一家报纸在一篇典型的评论中声称“无法隐藏我们在如此严重问题上的蔑视和愤慨”。它断言，几千条伪军的步枪无法决定能否打败中共；但使用这些枪却是对民族风尚和道德的严重打击。^[25]重庆一家报纸以类似的措辞总结了这一问题：

更令民众大失所望者乃是卖国贼问题。已有一批卖国贼被捕，然平津地区之全部汉奸几未被触及。伪军中之汉奸多已被改编与复员，正在官复原职，安然无恙。在京沪两地，许多卖国贼已经改头换面；正竭力谋取各政府机关之新职。这班奸贼乃众矢之的，令人痛恨。胜利既已到来，仍未速惩此辈。正义感焉存人间？^[26]

贪污腐化

政府既未采取权威性步骤，合理解决勾结日本人问题，也同

样未能找到公平有序的方法来处理敌产。来自重庆的皮包客成了接收时期的象征。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关注五项当务之急：金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面子。^[27]多半是针对官员腐化问题，《大公报》于9月27日写道：“仅在短短20余天之内，我们已在京沪两地失去人心。”

简而言之，接收是指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接管中国沦陷区内伪政府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及日伪所拥有之公私资产的过程。在诸如工厂、办事处、仓储设施及住宅之类的财产方面，接收过程涉及查封清点有关财产项目。经调查后，财产若系日本人非法占有，则归还原主，否则按官方既定程序移交新主。在以此方式处理期间，受查封的工厂应当停产。当局禁止被封仓库进出货。被封住宅的租户和住户应当搬出。

在这种时候作这种努力，成败主要取决于这些实施人员的诚实与否，因为制度上的保障几乎是零。通往腐败之门打开着，只要大体确定何物由何人接管，任何通盘计划或协调一致的方针都会畅通无阻。所不同的是，八九月间不同的军政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步调不一的训令和政令。

表面文章：官方政令与行政机构

8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伪政权登记注册的土地契约均属无效。^[28]不过，过了近一个月之后，当局方才开始公布关于清理敌有土地和财产的专门条例。与此同时，代表重庆方面不同军政机构的各色人物一一驾到。这些大员始而云集京沪，继则一哄而散，纷纷南下北上前去重占其他城市。所谓敌产，谁先提要求，便落入谁手。落款为9月7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上海发生此类事情的经过。日伪部队仍被用来维持该市及其四郊的治安秩序。可是，只要有一两杆枪，谁都可以佩带上海军管会的臂章。这种人总是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

由, 抢占房屋, 强行抓人, 征用汽车, 接管工厂。[29]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 9 月 24 日发布训令, 力图使此事有序地进行。训令禁止转移或毁坏属于日军的家具、设备、机械、文件或档案。一切原属中国人或盟国侨民而被日军占有的财产, 均应移交国军当局。所有日本商社、工厂及银行均应编制文册, 向国军呈交详陈企业资产、负债及方位的资料。[30]

9 月 19 日, 民间资产的接收在上海“正式”开始。按照陆军总司令的命令, 经济部开始在该市接收日本人的棉纺厂。[31] 到 9 月 20 日, 财政部已拟就一套清理民间金融和商务机构的基本条例。一切经伪政府登记注册的商务和金融企业均须清理, 其股东均应负担无限责任。京沪地区金融机构的清理应由财政部特派员监督进行。该特派员立即宣布, 五大日本金融机构转交中国银行家控制。[32]

其后 4 个月中, 中共和地方官员制订了一系列专门措施, 但这些措施考虑不同, 实施起来更是漏洞百出。9 月 2 日第三集团军(负责上海地区防务)司令部召集了一次由地方军政官员和国民党党务官员参加的会议。会议的一项决定称, “未经以下合法程序, 任何个人或机关不得捕人或查封财产。为保护合法权利计, 违反本命令者, 一经发现情况属实, 盖由本司令部严办。”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由地方军政及党务当局共同组成的小组, 协调它们的接收行动。据此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33] 9 月最后一周期间, 在上海被该委员会接收的机构和财产包括 83 所医院、93 家医药公司、药房及乳品厂; 18 家文化事业单位; 44 家机动车公司, 7 家广播电台; 95 家化学公司; 上海公交公司; 中央华盐公司及其仓库; 所得税处及其下属机构; 赋税司及其下属机构; 以及隶属黄浦港务局的码头。[34]

然而, 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并未继续负责上海的全

部接收活动。在10月10日的国庆节庆典上,上海市长宣布另组两个机构,处理由非法抢占财产案中向原物主返还缴获敌产引起的民间纠纷。这两个机构分别为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同在10月10日,《中央日报》报道说,此前几天里,已在经济部战时生产局京沪地区特派员名义下接管了500余家生产单位。该局已委派1000余人执行这项任务。到11月,上海敌产已在至少10个不同机构名义下被接收。这些机构包括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驻沪办事处、经济部驻沪特派员办事处、粮食部特派员驻沪办事处、上海市政府和交通部。[35]

作为一个旨在协调全国行动的姿态,行政院临时办公厅于10月12日颁布训令,责成所有中央党政军部门和地方党政单位,就10月12日前已接收的一切敌伪机关、工厂、仓库、住宅、地产、汽车、卡车、船只及其他物资,于10月15日上午6时前呈交详细报告。[36]其后,10月20日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宣告成立。其负责人为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博士。该委员会汇集了财政、交通、农业各部指定的官员和从地方金融界和实业界挑选的专家。[37]

在上海地区,10月下旬成立了另外两个监督接收工作的机构。这就是隶属于翁博士的全国委员会的敌伪资产监督委员会和敌伪资产处理局。[38]同时,战时海关总署驻沪办事处奉命调查、接收和保护所有在沪敌有仓储物资。这意味着战时海关总署人员常常得夺回这些仓库,因为它们大多已被代表不同军事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官员接收。11月中旬,海关总署已有200余人投入这项工作。截止1946年1月的第一周,他们已控制的仓库约为500座。[39]

除上述一切外,还在上海设立了监察院驻江苏省特派员办

事处,主要负责对发现的贪污案件进行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该办事处提出惩办建议,并向中央政府递交调查结果报告。〔40〕其后,12月10日,中央政府驻西南地区两名特派员抵沪,调查接收工作引起的普遍不满。〔41〕最后,约12月底,几个城市设立了“委员长信箱”,以便蒋介石能亲自了解欲匿名告发腐化官员者所作的指控。〔42〕

真情实况

上述尤与上海地区相关的正式行政机构的混乱情形,仅仅是接收行动特有的“行为不当”之一斑而已。〔43〕10月26日,蒋介石致电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电文谕称:

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军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的沪、平情状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有何相关见闻?于光复地区腐化至此等程度而无丝毫自重,在当地民众而言,无异耻辱,亦是对我捐躯疆场英烈之不敬。余闻此情,为之痛心疾首,亦感愧赅……汝悉电即可着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盖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护罪犯情况发生。〔44〕

然而,无论中央政府抑或地方当局,均未采取一致行动去实现蒋氏的心愿。无论如何,到11月初,当这些愿望公诸于世时,大部分损失已成事实。《新民报》特别提及公众对总裁警告政府官员之举所怀感激之情;但该报进而推测:假若几句公平话便能激起此等感恩戴德,则若委员长之言付诸实行,其在光复地区将会获得人民何等忠心拥护。作者的结论是:“不幸,他的部下使他的努力大打折扣。国事不能全靠一位贤明的委员长和善良的百

姓。”^[45]

京沪地区

虽对腐化行为已三令五申，欲予遏制，但负责执行的地方官员本身大多参与了这些规定要加以控制的种种行为。例如，许多接收官员随身携有大量法币，当时中央政府无法立刻向光复地区投放必需数量的法币，故他们得以大加投机，同时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伪币在战胜日本后骤然贬值，但继续作为合法货币流通了好几个月。同时，接收官员的商业活动对物价的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人因发现自己被伪币贬值拖入资金困境，不得不卖掉房子、地皮及其他财产。买主常常是这些腰缠大笔法币从内地回来的军政要员。对这种行径，最温和的估计认为，定有一批奸商“混入”了接收官员中间。^[46]

9月下旬，这种批评已在报界沸沸扬扬后，中央政府才向重庆各政府部门下达命令，严禁接收大员在返回光复地区时携带大笔货币。另有命令禁止京沪地区接收人员参与商业活动及任意定价买进黄金，或以政府机构名义购置房产。

然而，情况并未改善。截止10月底，“重庆客”一词已成为上海家喻户晓的讽刺语。在那里，接收大员一到达，便不失时机，纷纷把从日伪手中收缴的财产占为己有。代表国防部的官员为一座面粉厂的事而与经济部的对手激烈争吵——而不是将它归还给被日本人夺去之前的中国厂主。^[47]另一著名事例出自中央宪兵大队23团，该部显然是清一色高中和大专院校毕业生组成的精锐部队。该部于1945年8月下旬抵沪，是进驻上海的首批武装部队之一。该团人员参与了借口搜捕汉奸而非法捕抓平民、接管私有住宅和车辆及抢掠大量必需品的活动。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警告后，该部未予重视，团长遂于10月12日被拘押，并接受官方公开宣布的调查。^[48]

对 23 团的惩戒虽是正确之举,却不足以收恢复全局之功。最不幸的后果之一就是经济造成的破坏。工厂设备被拆除,库存物资也未幸免,或被卖掉,或被用来囤积居奇。对经济的破坏,《大公报》的评论首先归罪于那些最早在上海接收很多工厂和仓库的武装部队。军方通常拒不将接收物移交“合法当局”。工厂无法恢复生产,因为军人拒绝开放工厂仓库里封存的原料,或拒不归还运输工具。民用电讯工人开始设法恢复通讯时,发现大量电话和其他设备已被迁装到了军官办公处。同样,铁路工人发现,由于大量材料和设备被军人拆走,他们无法进行必要的修复。[49]

到上海海关 11 月开始工作时,官方才大量“发现”这些越轨行为。监察院驻江苏省特派员发表的一份报告披露了海关的部分发现。他承认,海关人员在调查工作中屡碰钉子。例如,在向海关人员移交仓库时,一些政府部门略而不报偏僻地段仓库的名称。海关开展调查后几日内,有两座仓库遭神秘焚毁。一些已接管仓库的官员和政府机构,断然拒绝将其移交海关调查员,甚至不准检查。例如,有一次调查员们正在核查一座仓库,突然开来几辆牌照不明的卡车,在众目睽睽之下装上库存物资,扬长而去。[50]

一些报纸试图把该报告提及的案件详情公诸于众。上海《大晚报》报道说,11 月 7 日夜,一座仓库的 30 桶油不翼而飞。11 月 11 日夜,有人看见一群武装人员闯入另一座仓库。可是,当局不愿进一步透露这些案件及其他案件的详情。那两座神秘遭焚的仓库分别是位于北站的第二仓库和九龙路上的阪田仓库,出事时间分别为 11 月 20 日和 11 月 26 日。据信纵火的目的是要销毁已引起怀疑的盗窃证据,但事后地方当局均未作任何调查。[51]

敌伪资产监督委员会成立后第一个月,即 10 月 29 日至 11

月底,就根据公众提供的信息,在上海地区查办了 500 余起藏匿敌产案,涉及资产计有 4000 吨铜和铁、500 余件机械、80 卷新闻纸、5 座工厂以及大量布匹、大米、面粉和酒。

此时暴露出的其他案件还有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一案,此人伙同其他警察从一封存仓库盗走 50 袋白糖。另一案涉及前日本海军军械局经管的培林上海冷冻厂(音译)。该厂存有大量鱼和肉,日本战败后不久即被中国海军当局接收。11 月下旬,有人发现军官们动用了部分库存,供属下士兵和战俘食用。但是,他们把剩余库存和通顺码头仓库的存货一起卖掉,得法币逾 5600 万元。[52]

至于敌伪资产处理局,上海一家报纸在其成立两个月后承认,该局已委托海关当局执行稽查和接收被缴仓库的任务,存在公开出售咸鱼和棉布的情况;另外,行政院长宋子文一直在询问该局的工作。但关于该局或海关调查员的工作,其余情况不得而知。该报评论说,事到如今,它们早该递交报告,陈述已接收的 500 座仓库中存货的确切性质。鉴于维持民众生计和城市工业生产所必需物资的短缺,此点就更为重要。几个月后,公众真的获悉了部分商品的下落。上海市政府官员被指控非法销售了价值 40 亿元法币的敌有货物。有关这桩买卖的消息,系市政府一名前雇员提供,当时一起较小的案件已被曝光,该案涉及市政官员非法销售 130 辆汽车一事。[53]

在苏州,据说商行须向新当局缴纳 1000 万元伪币方准重新开业。很多小城镇被勒令按月将大笔钱款捐给在附近区域作战的非正规政府部队。[54]邻近农村地区的官吏竟随便以各种借口搜查民宅,并且大量非法占据。当地商人常常被迫以人为的低价向官吏出售商品。[55]

在徐州,从 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3 月,前后有四批接收大

员踏遍全城，然而接收敌产活动仍未告结束。首批大员以第十战区先遣司令部人员身份抵达，第二批则随返任的国民党市党部到达，第三批是国防部人员；第四批则是粮食部和经济部要员。这些大员攫取了大量商品，包括大米、面粉、香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在很多情况下，工厂无法恢复生产——原因是原料无影无踪，机器七零八落。[56]

湖南汽车案

既然京沪地区是中央政府官员收复的第一个地区，人们可能会以为，其他地方不会重现那里发生的越轨行为。实情并非如此。1946年4月中旬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湖南公路局负责官员公布了该省在接收敌人车辆中出现的严重腐化堕落。这些车辆大多先由受交通部管辖的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事处接收。大约3500辆车被该局接收，其中1000辆后来移交给了公路局。

据公路局的报告，其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从1945年11月3日到12月初。其间该局从陆军供应站第四勤务处接收50辆卡车。这些车辆缺少约百分之二十的部件。在12月中旬至1946年1月的第二阶段，该局从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事处接收了250部车辆。公路局指控说，这批车辆在交接时已缺少约半数部件。最后，从2月底到4月中旬，该局又从战时运输管理局接收了700部车辆，但这些车经过彻底筛选，“早已失去了汽车的模样”。公路局接收的1000辆日伪汽车无一能用。拆散的车逐渐作为配件重新出现在湖南的汽车修理铺和五金店。与此同时，湖南公路局仅有六七十辆车，用来维持全省公务运输。

事件曝光后翌日，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事处意识到自己声誉受损，便举行了它自己的记者招待会。其代表宣布，在该局

接收的 3438 部车辆中,包括移交公路局的 1000 辆在内,早在管理局最初接管时即无一完好无损。^[57]这一时期,政府一直面临着严重的交通运输困难。原料和其他商品的短缺,以及军队后勤问题,总是归咎于这些困难。显然,这些困难并非全如通常声称的那样系“军事形势”所致。

东北地区

鉴于政府在满洲的军事地位正迅速下降和该地区所处的战略地位,接收人员在那里造成的局面就更为严重了。1946 年初,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引述东北资深政治人物宁梦岩的话说,接收大员置当地人民的情感和要求于不顾,是政府在满洲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58]日本投降近两年后,沈阳一国民党报纸在评论大众对中央政府丧失信心的原因时,不无遗憾地表示,奉派来到满洲的接收大员“表现竟如此罕见”。它要求立即解除所有仍掌权的贪官的职务。^[59]

尽管苏联人拆走了一大部分东北工业设备,但仍有大量设备保留了下来。据《大公报》称,抚顺煤矿百分之八十的机械未遭破坏,而鞍山昭和铁厂留下的设备能每月制造 3 辆火车车头和 100 节火车车厢。炼钢设备原封未动保存下来;锦西各工业区的设施仍完好无损;辽阳各棉纺厂的设备也有些尚可使用。水力发电设备也保存完好,虽然大多数火力发电设备已被运走。因此,苏联人撤走后,满洲的工业能力仍很可观。^[60]可是,苏军刚刚撤走,国民党要员便接踵而至,要求瓜分战利品。^[61]《和平日报》沈阳版在报道东北处置敌产问题时承认:“更有甚者,得手的竞争者非但不曾尝试使这些工厂开工,而且已将其拆卸一空,把拆散的机器当废铁卖掉。”^[62]

在满洲,和别处一样,日本人和伪满洲国政府的资产被大员们征用,他们先下手为强,或拿来私用,或藉以谋利。在 1946 年

3月23日的一篇报道中，重庆一家报纸的记者描述了他在沈阳的见闻：

接收情况十分混乱……一则有争抢工业设备的情形，二则抢占公共建筑和房产，眼下政府人员正在争夺家具。过去几个月来一直空无一人的楼房现已被某大员派人把守起来。某军官已接收了数千栋房屋。国民党的一个事业单位——中国文化署(China Cultural Service)——已派员到此，正忙于接收日本印刷所和书店。某政府部门代表方才抵达，但大失所望，只因可接收之物已所剩无几。然而一些部门索性将其他政府部门的封条撕掉，代之以自己的封条。此事令当地人民不胜惊讶，“中央政府的人”比其他人“没啥好的”。〔63〕

还有一篇纪实报道，对沈阳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后果，概括评论说：“本人担心，我们不仅将失掉东北，还会失去民众的亲善。”〔64〕

这些报道登出一年多后，方闻《中央日报》沈阳版承认，当地接收工作仅一小部分完成得令人满意。它列举沈阳一个区的情况为例。那里的全部建筑物几乎都属于日本人，中国政府可依法接收。可是，这些楼房并未归政府看管，等待处置，而是很快变成了少数人的私产。到1947年9月，该区一些住宅甚至已被租给平民百姓，租金归新“房东”。〔65〕

拍苍蝇

1946年3月29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激烈批评了政府拒不采取行动约束接收人员，并指责政府故意设法保护他们。委员们一一起来抨击本省状况。广东委员韩汉藩称，海南岛的接收工作乱七八糟。空军大员接收了很多农庄，海军则至少控制了国营招商局。一批大员接管了所有汽油库，另一批则抢走了全部汽车。结果是“有油者无车，有车者无油”。在另一篇关于广东省的

报告里,张良修列举四个事例,证明他的指控,即广东已变成“敲诈勒索者的天下”:(1)广东省主席和新一军军长同意从接收的日本人楼房中划拨几栋供省参政会使用;可是不等该会进驻使用,军队早已将家具悉数搬走。(2)陆军后勤部船运监理会将所有状况良好的船只占归己用。(3)中山大学的全部水电设施连同其他设备都被军人拆除并运走。(4)原日占区国民党地下特工,现在不断接受汉奸的贿赂,并替其掩盖战时丑行。

王立哉报告说,山东的接收人员篡改敌伪资产清册,很多这类官员都靠出售这种财产发了财。刘叔模揭露了数十名奉派到汉口市的政府大员侵吞一切经手之物的经过。会议建议中央政府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再次调查这些涉及接收和处理敌产的事件。〔66〕

这项建议的结果是,中央政府组成了若干个接收行动清查团,并于夏季开始工作。清查团有权调查关于官员违法乱纪的传闻,确定专案中的责任并提出惩处建议。其工作结果仅仅是掀起最后一股对政府不利的舆论浪潮而已。负责冀察热绥、湘鄂赣,当然还有上海地区的清查团,都另外挖出了许多违法乱纪案件。虽说公众已对这类曝光感到厌倦,有些案件触目惊心仍足以引起小小的轰动。其中之一牵涉到海军北平特派员刘乃沂。他的三位姨太太被发现握有100余盎司黄金,1万美元现钞,15斤珍珠和150件昂贵皮衣。此时被揭出的还有另一个千盎司黄金贿赂案,据说受贿者是经济部驻沪特派员张兹闳。作为回报,张未追究某些姓名不详的政府要员在接收一家纺织厂时的不轨行为。〔67〕

清查人员还获悉,日本人不仅在所有缴给中国官员的资产上附有详细清单,而且还留有副本。大多数接收大员拒不交出原始清单以方便调查,日本当局遂向蒋介石移交了五大箱此类副

本,帮助进行调查。〔68〕

不过,无论证据如何确凿,政府依然未能采取决定性行动。清查团无权使其建议付诸实行。清查完成后,案子往往简单地移交给地方当局审理。有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甚至阻挠报界发表清查团所发现的证据。大多数罪犯仅受到社会舆论这一非正式法庭所宣判的道义制裁。人们公开流露出对清查本身的冷嘲热讽。上海一家新创办的刊物《观察》的记者写道,一个腐化堕落的组织很难净化自身。他警告说,假如清查人员仅满足于拍拍苍蝇,那么以后政府听到的只能是更尖锐刺耳的话。〔69〕

左翼的《文汇报》所作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其结论是,如果坚持进行真正彻底的清查,坦陈一切,政府仍可能重获人民的信任。〔70〕但三周后政府宣布清查团将很快解散,于是《大公报》的评论暗示说,它们的工作对恢复公众信任未起作用。“从接收行动及清查工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官僚统治的国度,防止腐化谈何容易,”编者写道,“假如我们仍渴望正直的政府,我们就应当培植人民的力量……以便他们可以在政治上行使他们的权力。”〔71〕

接收时期这一对政府最有害的插曲就这样结束了。

经 济

使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受到动摇的第三个问题,是政府未能实施恢复时期最初数月所必需的有效的经济和财政措施。正如众多作者所指出,这些措施包括平抑物价,遏止投机以及缓解经济向和平时期过渡所引起的混乱。接收大员的行为令人严重怀疑政府的诚实和对公益的实际关切——与其宣称的恰恰相反。

在经济领域,政府的记录同样令人怀疑其政治智慧和经济管理上的竞争能力。况且,诚实和能力二者密切相关。政府未能尽力减少战争结束所造成的经济混乱,而这在很多方面起因于对接收大员行动的失控。

西南的问题

人们原以为,政府会用接收的日伪企业来补偿那些因不得不转让现有内地非赢利的战时工业的蒙受损失的工厂主和商人。这样,日占区的工业基地将吸收来自内地萧条地区的管理和生产资源。其次,政府也可适当地奖赏随其前往西南的工商界支持者。相反,由于放任官员、投机商及官僚资本家接收光复地区的工业财富,政府实际上抛弃了这些支持者。

引起争议的关键人物,是那些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及其他地方后弃厂内迁的中小实业家。在后方,他们以最低限度的仅有资源发展起了一个工业基地,这一基地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务于政府控制地区。他们的企业因原料和资金匮乏、设备和技术落后、产量小和运输困难而障碍重重。既然为履行公认的爱国义务很多人都蒙受了财产损失,这些企业家自然期望——而且确也得到许诺——一俟战争结束,为自己的忠贞获得某种报偿。

日本投降后,很快便猜疑纷起,说政府对欠他们的政治债和经济债将置之不理。重庆开始谣传,说某些高层官员对战时沦陷区工业界的艰难困苦表现出出乎意料的关切。战时首都工业界的首领察觉出了问题,遂公开发表谈话,呼吁将所有日伪占据的工厂移交给随政府来西南的工业家。他们还建议政府邀请他们参与规划,参加对这些工厂的直接接收。〔72〕

对其中很多人而言,这个问题很快就成了经济生存问题。到9月中旬,西南的工业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各种迹象无可争辩地显示:需求下降,价格骤跌,流动资金短缺,工厂关闭,破产事

例增加,还有失业上升。战胜日本后一个月內,重庆黄金价从每盎司 200,000 元法币降到 48,000 元,棉花从每担 110,000 元降至 30,000 元,桐油从每担 70,000 元降至 17,000 元。其他物品如出一辙。^[73]不论是投机家,还是合法企业家,都未能逃脱商品价格暴跌带来的沉重打击,因为投资于黄金和商品已成为对付战时通胀的最常见的套头交易。

然而,尽管价格萎缩,购物者却寥寥无几。西南的很多工厂是为满足战时需要建立的,根据战时生产局的命令,几乎一律保留了下来。8月中旬订单减少或压缩后,这些工厂被迫中断生产。战时西南一钢铁生产大户已在9月中旬关闭了大多数设施。国营重庆钢铁厂实际已在当月底中断生产。与此同时,还有报道说,四川各棉纺厂很快将因缺棉而被迫停产。虽然湖北和陕西棉花大丰收,但交通不便造成原棉无法入川。估计有 10 万担敌有棉被查封,并被冻结在光复地区的仓库里。这样,即使调运内地是可行之事,这种棉花也无法利用。^[74]重庆的小型烟厂也大多被迫关闭,许多商行同样如此。

根据 1945 年 11 月中华工业联合会云南分会汇编的统计资料,昆明市 77 家工业企业中,已关闭 33 家。其余的则在缩小规模运行。到 1946 年 2 月,估计昆明工业的停产率已达 90%。^[75]

针对政府未承认拥护它的资本家所做的“爱国贡献”,为了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共产党人发表了一篇讲话,支持重庆工业家的呼吁,并要求救济失业工人。^[76]政府确也拨出 50 亿元工业救济贷款,但这个数目甚至不够满足重庆附近工矿企业之所需。

一个仓促组成的四川复兴协会向中央政府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请求立即对该省农工商矿及金融企业提供实质性救助。^[77]不过,人们普遍承认,即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仍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因为政府不能继续无限期扶持西南地区无竞争力的企

业。必须寻求更具实质性的解决办法。

带着这个想法,西南各工业协会加强了它们的要求,即一切自敌方接收而未正式留作国营的工矿,均应立即置于战时内迁企业控制之下。9月19日,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吴蕴初先生由渝抵沪,“协助政府当局恢复曾被日伪夺去的本市工厂”^[78]。

虽已作了这些努力,但内地原厂主的要求以及工业家要求优先权的呼声仍往往被置若罔闻。在这件事上,政府同样言行不一——因为它继续宣称,这两部分人的要求将享有优先权。按照官方的政策声明,敌有资产的处置将遵循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工业复兴大纲》所确立的原则。大纲规定大型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划归国家企业,较小型轻工业将由私人企业家所有和经营。曾被敌占的私有企业,一俟产权澄清并获经济部特派员批准,即应归还原业主。对私有日伪企业的处理,接受者按以下正式优先顺序排名:(1)战时内迁并对抗战有真正贡献的工厂或工业家;(2)不曾内迁但也不愿敌占而拒绝与敌合作的工厂或工业家;(3)有必需资金和经验的新工厂或工业家。^[79]

这一正式声明发表五天后,重庆商会报纸报道说,上海的40余家工厂已被经济部特派员张兹闾接收。接收之后,这些工厂被关闭,并奉命暂停生产,等待该部下达新指示。特派员公署根本不曾要求来自西南地区企业的技术或管理人员予以“合作”。^[80]

在全国工业协会10月25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该会执委会主任委员详细陈述了上海地区接收敌厂的情况。他报告说,其中一些厂仍在以前的汉奸手中。^[81]11月下旬,全国工业协会和迁川工厂联合会向行政院递交了“最后”请愿书,要求将敌产分配给抗战有功人员。两会也向经济部和负责上海地区的敌伪资产监督委员会的有关官员发出了呼吁。促成这些呼吁的一则消

息说,48个新近收缴的敌有企业将被拍卖——显然不顾及正式优先顺序。〔82〕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一个名为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的团体只好递交一份书面抗议,再次概述西南工业家的困境,并将其归咎于政府。该联合会指责说,政府曾要求关闭西南的中小型工厂,却未提供任何临时援助,帮其度过必然出现的混乱难关。此外,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垄断轻工业的经营,而这有悖其曾经申明的政策。最后,政府正在允许采购美国和巴西的鞋、棉及纺织设备,这将迫使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内厂家走向破产。〔83〕

仅存的援助希望也在4月份最终破灭了。该月,政府宣布,除政府机构直接经营的工厂外,所有其他日伪工厂都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据说买主大多是留在沦陷区的人或靠投机发了财的人。尽管售价较低,但重返沿海地区的工业家能买得起这些工厂的寥寥无几。〔84〕

光复地区

前日占区轻微的物质破坏,本有利于工业生产不间断地继续进行,从而有助于抵销内地不景气的不利影响。但恰恰相反,光复地区的经济停滞却与内地的不景气形影相随,长达数月,这正是前述接收行动的一个严重后果。

经济停滞

1945年9月下旬,官方的《中央日报》报道说,光复地区的经济紊乱与抗战胜利和政府人员的返回毫不相干。确切地说,它“完全归咎”于日本统治的可恶残余。该报接着写道:“他们(工人

们)正受着煎熬,不免引起一些头脑简单者怀疑胜利给了他们什么。”^[85]一位于11月初访问华北和华东后返渝的苏联人称,上海90%的工厂关了门。^[86]天津一家地方报纸报道说,该市已停产的工厂约为90%。^[87]

社会部社会救济司制订了救济、补助失业和低收入工人的计划。但问题过于严重,失业者不可能全都得到救济。到9月底,仅上海一地失业人数估计就有20万到50万不等。接收一事一举生出了一块劳工骚动的滋生之地。经过战时及战前多年的压抑之后,劳工的力量猛然挣脱了政府控制这一枷锁。由于失业工人要求救济和发放足够的解雇费,以度过无限期失业难关,争端和抗议成倍地增加。在业者则为增加工资而骚动不安,原因是支付给他们的伪币正在急剧贬值。

9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从即日起,一切煽动罢工和劳务争端者,一律严加惩处。工人则被告知,争取救济应遵循合法程序。^[88]不过,罢工和抗议一仍其旧。最后,11月中旬,上海实行了军事管制和罢工禁令。当时上海六大百货公司、上海电车公司、法国电车公司、邮政局及上海电力公司雇员都在为争取较高工资罢工。

一年后经济部宣布,从日伪手中接收的约2411家工厂中,仅有852家业已恢复生产。^[89]官方消息来源不再将其归咎于日本统治的可恶残余,而是抱怨军事形势造成的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由进口廉价外国商品引起的国内产品需求下降。

其他消息灵通人士则以不同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指出,日伪资产的新主人往往不愿为生产而投资。很多于1946年4月前在上海拍卖工厂时买进五六十家工厂的买主,都把机器拆卸并卖掉了。^[90]如其所示,这种情况外地也有发生,并加剧了接收人员造成的破坏。投机商也在乘机囤积所能弄到手的商品。

1945年9月和10月，掀起了这类商品的狂买狂卖风潮。罪魁祸首据信是囤积居奇、竭力抬价的当地商人，也不乏接收人员中的捷足先登者。

然而，工业生产的停滞不前不能归罪于投机家和奸商。他们与其说是因，毋宁说是果。光复地区的市场很快就恶化到了卖机器比用机器更赚钱的程度。截止1946年年中，其原因已不一而足，这将在第四章里讨论。然而在战后之初，光复地区经济停滞的首要原因还在于政府的接收方针本身，它关闭了所有的敌有工业企业，严禁调用敌有仓库所存原料、食品及其他商品。战后最初一段萧条期过后，随着由此产生的产量锐减而来的是物价飞涨和黑市活动剧增。从9月9日到10月19日，商品价格增幅达100%至200%。^[91]

兑换率

对于前沦陷区不同货币区内法币与伪币间的官方兑换率问题，政府也久拖不定。^[92]政府确定兑换率一事在华中地区延迟了6周，在华北推迟了3个月，在满洲推迟了几个月。《大公报》报道说，投机家们携带法币冲向光复地区混乱不堪的金融市场，那里的兑换率即便是在同一货币区也因地而异。例如9月14日，法币与伪币的比率在汉口为1:40，在上海为1:150，在南京为1:200。^[93]到9月26日，上海的比率已升至1:250。商业资产和私人存款的价值相应缩小了。南京和上海的商人将其完全归咎于“内地资本侵入”，于是报之以提高物价，期望通过即时收益来弥补伪币贬值使之蒙受的损失。

一些人则以投机性投资相报。11月初有报道说，“大部分”官僚和商业资本正被投入这种活动。当时，中美货币间的兑换率在天津是700:1，在上海却高达1,500:1。据说投机家在两市之间频频穿梭，在天津买进美元，在上海卖出。^[94]

江浙地区法币与伪币(中央储备银行)间的官方兑换率终于在9月27日公诸于世。由于把兑换率定为1:200被认为是人为的低水平,政府受到了普遍批评。在北方,法币与联合储备银行兑换券之间的正式兑换率直到11月21日才公诸于众。这个1:5的兑换率本身与黑市比率无异,因而反映了联合储备银行兑换券的实际价值。[95]

另一方面,在上海地区迅速形成了危机局面。《大公报》着重指出,兑换率扶摇直上直接造成人们倾家荡产,并且雪上加霜毁掉了江浙的中产阶级。该报暗示,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和做法,在不足3个月内已把国内最富庶地区置于经济崩溃的边缘。[96]

零售商们乘10月10日国庆之机,宣布全面涨价和缩短营业时间。同日,上海市长颁布两项公告:一项禁止各种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另一项勒令当地工厂恢复生产。公告见效寥寥。有些商店宁可完全暂时停业,也不愿按原定价格销货。10月17日,上海各大百货商店都缩短了营业时间,正午开门,午后两点打烊。上海商会向市府提出正式请求,准予全面提价,以对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官方牌价与实际价值之差给商人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虽有人提出质疑,物价是否已涨至足以补偿的水平,但这一请求在10月19日得到了批准。[97]价格复归上升趋势,而人民的生活却“日益恶化”。[98]唯一的受益者似乎是接收人员和为数较少的一批有政坛关系的工业家。接收进程和与日俱增的直接经济干预使二者都能从中得利。[99]

“新 贵”

天津一家报纸称,接收大员和其他从西南返回的“新贵”兴趣只在金子、衣服料子、房子和车子的价格上,而对所有留在日占区的人不屑一顾。该报社论强调指出,起初天津平民自感卑微,着实后悔未随政府撤往内地。但在目睹返任官员带来的混乱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following text is heavily obscured by horizontal black bars and is largely illegible.]

能为其提供那种正常教育；不应与其他孩子有何不同，使之逐渐重返正常生活。”不过，他在文尾恳求“严厉斥责勾结敌伪的教育界人士”，以使政府避免在教育界像在其他行业那样明显不愿惩办真正的汉奸。〔105〕

不清楚这次会议是否在思想上坚持了这种原则，但教育部负责贯彻复兴方针的官员确实不曾如此。10月，该部宣布在光复地区主要城市建立临时再教育中心。大学学生的必修课程旨在使学生重新了解“民族复兴”的种种需要和国民政府的思想。这种再教育课程包括学习孙中山的学说、蒋介石的演说、中国历史和地理、时事形势及军事训练。一些学生在这种训练中心入了学，各城市都称之为临时（或暂时）大学。其他学生则参加由大专院校遵照教育部训令所开设的三民主义、时事形势等课程。

中学和小学也须开设类似的课程。学生修毕再教育课程时，教育部要进行专门考试。只有取得及格分数者方能获准继续学业。占领时期的大专和中等院校毕业生须通过有关三民主义的笔试，其文凭才能被承认。教师也须参加考试，以证明其对国民党的认识、效忠及其学术能力。

引起争议的与其说是再教育计划本身，毋宁说是官方强加给应考人的耻辱。因为教育部在公布该计划时等于宣称，所有曾在伪政府控制区就学的学生都被视为已被敌方宣传所毒化。这些学生只有受到适当的再教育，洗净头脑时，才被视为适合进一步受教育。

政府官员重申教育部的方针，把那些正被帮助“洗刷思想烙印”的青年称作“伪学生”。〔106〕有这样一件事，一个“伪院校毕业生”代表团拜见委员长北平行辕秘书长，就强制性考试提出抗议，这位官员竟回答说他们犯了双重错误。其一，日占时期他们留在了北平；其二，他们生于穷苦家庭，家中无力供其就读于北

平三所私立大学之一[107]。因为沦陷区的私立学校比国立学校保持了更多一点的独立性,受政府干预少,故对此种院校学生进行再教育的计划就不是那么严格。

愤懑和抵触立刻在学生中间迸发。家长、教育家及市民精英也表示愤慨。其中就有美国教会教育家、时任燕京大学校长(不久即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他公开说,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学生就读于伪学校的结果,是变得更具反日倾向。他还暗示说,政府的态度正在使青年人日益疏远,结果很多人转向了共产党。[108]

京沪平津及其他地方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以示反对。首批示威者中即有前面提到的北平伪院校毕业生。他们隶属北大和北师大毕业生联合会,该会发表声明,要求“合理对待”光复地区的学生。该组织成员将要求交给官方,并发起了近几届高校毕业生集会。北平当局终于同意修改一系列条例,将笔试改成学习三民主义心得报告和2,000字以上的论文,论题以每位学生专修课程为限。北平高校学生接受了经过修改的条例;但毕业生则不然,声称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势仍在使其蒙受耻辱。他们组织了联合会,并开始出版期刊。将其冤情公诸于众。[109]

对再教育计划的抗议行动,因12月下旬青岛一学校教员被杀而急转直下。警察向一批曾受伪政府注册的中小学校师生开火时,酿成了这一事件。当时这批人正在张贴公开声明,阐释他们对政府强制师生考试的反对意见。枪杀事件激起了全市学生罢课。这一行动受到青岛和其他城市群众的大力支持。[110]

在天津,12月3日,数千名中学生在市教育局门前举行了两小时示威,抗议对他们的政治面貌进行甄别。学生最后赢得六点让步,包括天津师生无须参加政府考试。[111]同样,在上海,学生、教师的反抗与日俱增,促使教育当局请求教育部准许从宽执

行再教育计划。一家地方性报纸建议说,至少应摒弃“甄审”一词。清除该术语将大大降低整个光复地区学校里的愤懑程度。

然而,翌年夏季,中央政府仍不断下令各省政府对前伪中学毕业生进行登记,以便测验和“正式确认”他们的学业水准。不过,此时在许多地方这种考试本身已成了一种官样文章。例如,河北省中学毕业生考试仅包括一篇关于三民主义的书面报告,外加该生毕业证书和一张近期照片。报告和证件过关者即被授予正式文凭,其他人则须接受再教育,拒不参加考试者按自动放弃中学毕业生资格论处。〔112〕

青岛枪击事件后不久,《青年日报》天津版总结了这些做法引起的公愤。随着胜利的到来,光复地区人民已开始感到自己与撤往内地的人有所不同。最早返回的接收大员的所作所为,更加剧了这种感觉。他们看似有一种优越感,但在其行为上,这些有权势的人物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比当地群众有何高尚之处。可是,恰恰是这些人将要对当地师生操起裁定大权,在他们的档案里添上污点,让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都洗刷不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发出抗议之声,几乎无可指责。社论总结道:“鉴于青岛惨案的教训,我们希望政府不单要测验师生们。就光复区人民的心情而言,政府最好也考察一下它的公务人员以及其他事项。”〔113〕

或许不纯属巧合,形成未来四年中反对中央政府及其内战方针的学潮锋芒之地并不是北方,尽管那里的主要教育机构曾随政府内迁。反政府学潮最汹涌之地是京沪地区,那里的学生大多因政府的复兴方针而蒙受了耻辱。

1946年到来时,中央政府的政绩就是如此。在全国各大都会,复兴时期给各阶层都带来了一定的不满,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政府的政策和政府官员的行为。唯一得益的可能是接收大

员、投机家、奸商及有政治关系的实业家。成千上万的工人发觉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救济，无法度过光复地区工厂暂时停产和内地经济萧条带来的数月失业期。物价上涨减少了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在江浙地区，官方确定的伪币与法币兑换率决定了伪币的贬值，结果使中小工厂主和商人受到巨大损失。预期的补偿没有兑现，内地的企业家被逼入破产境地。政府的振兴教育方针引起了大学生的对抗。最突出的，还是接收大员的贪污行为给经济和政府形象造成的破坏。

“腐败无能”已经成了一些小圈子里形容国民政府全部弊端的浓缩语。在复兴时期，华东、华北和东北前日占城市市民的亲身经历，无不给这些特指政府表现的字眼下了定义。政府设立的接收机关结构混乱，无力履行职责。由于缺乏充分的制约机制，这些机关中的人未能富贵不淫便无可指责了。接收政策本身不是构思有误，便是执行不当。

到头来，那些纠错的笨拙尝试以及要求改良操行的呼声，只是在官方公布的规范和官员的实际行动之间造成了更大的反差。不过，这种尝试确也达到了一个目的，即它帮助最高当局和蒋介石本人推卸了责任。群众似乎难以相信委员长本人会企望全然不利国家之事。于是，该受责难的总是“部下”和低层官员。虽然政府在复兴时期的表现令人大为失望，但却未导致对国民党统治权提出挑战。其原因之一可能即在于此。政府以严重的声誉损失为这一时期的弊政付出了代价，可是却没有什么人要求更换政府。

共产党的出版物对政府的表现加以责难，对各种受苦的人则抱以同情。不过，此时共产党的宣传攻势在城市地区还比较弱。似乎没有什么人认为，共产党对政府构成了真正的挑战或可能取而代之。人们无疑有些无奈之感，这是对政府克服困难的能

力日益缺乏信心所致。一位作者质问道：“我们该对谁诉说？我们没有—一个机构可对之陈述民意。”^[114]

不过，最普遍的呼声还是要求改革。下列所引民主同盟报纸的评论较能代表这种普遍态度：

国民政府在民众中声誉明显下降，令人悲叹。何至如此？回答下列问题便可使之迎刃而解：缘何扰乱民生之政府官员……未受惩办？何以物价扶摇直上而无任何平抑举措？为何公民自由屡遭践踏？怒吾辈坦直言之，毁政府之社会威望者乃政府之官员也。故解铃还需系铃人。^[115]

对政府而言，不幸的是系铃人没有解铃。接收时期招致如此广泛批评的问题，大多从未得到圆满解决。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投降后出现的那种本可消除的暂时混乱和管理不善，逐渐成为标志着民众对国民党统治普遍拥护已告终结的开端。

注 释

[1] 这一点在詹姆斯·M·伯特伦的《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一书中有所展开。

[2] 谢伟思语，见《中国白皮书》，第567页。

[3] 1945年9月27日重庆《大公报》。《大公报》是当时一家与国民党政学系有关系的自由派报纸，在全国最有声望。参见参考书目注释。

[4] 这些词语经常出现在印刷品上。例如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载1948年2月19日《青岛时报》（1948年3月27日重刊于《观察》，第16页）；另见专讯《重庆政闻》，1946年12月21日《观察》第16页。

[5] 例如，由受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倾向国民党的经济学家、西南联大教授伍启元所写的长篇评论，载1945年8月18日重庆《世界日报》；另见1945年8月17日重庆《大公报》所刊一篇同类文章。

[6] 关于蒋氏在云南玩弄权术的情况,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东北政局则放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叙述。

[7] 1945年9月17日、20日、10月5日、6日和22日重庆《新华日报》。

[8] 1945年11月30日重庆《时事新报》。1947年1月,东北仍有8万日军被用来打共产党(梅尔比,《受命于天》第183页)。日军应阎锡山的请求,为同一目的在山西滞留到1949年。1949年4月,太原落入共产党之手时,这支留晋日军由一位名叫今村保作的将军指挥,他选择了自戕而未投降(唐纳德·G·吉林著《军阀:阎锡山在山西省,1911—1949》,第286—88页;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通敌内幕:1937—1945》,第329—331页)。

[9] 1945年9月9日重庆《大公报》。

[10] 1945年8月25日、10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

[11] 1945年9月9日重庆《大公报》所刊日期为8月30日的报道。

[12] 1945年9月9日重庆《世界日报》。

[13] 1945年9月12日重庆《大公晚报》。

月 21 日北平《新生报》；1947 年 1 月 29 日北平《世界日报》；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 3 卷第 77 页；博耶尔：《通敌内幕》，第 332—333 页。

[17] 1945 年 11 月 28 日上海《大公报》；另见 1946 年 4 月 24 日北平《世界日报》。

[18] 对陈仪(勿与名字读音相同的共产党将军混淆)的指控引自博耶尔：《通敌内幕》，第 334 页。关于 1945 年 12 月死于北平监狱的王克敏一案，见第 333 页。

[19] 1947 年 9 月 20 日沈阳《东北前锋日报》。

[20] 1946 年 4 月 24 日北平《世界日报》。

[21] 1946 年 9 月 21 日北平《益世报》。

[22] 1945 年 9 月 17 日、27 日、10 月 3 日、25 日及 11 月 7 日重庆《新华日报》；1946 年 6 月 14 日、20 日、9 月 15 日及 28 日延安新华通讯社讯。

[23] 1945 年 11 月 30 日重庆《时事新报》。

[24] 1947 年 2 月 21 日南京《新民报》。

[25] 1947 年 1 月 29 日北平《世界日报》。

[26] 1945 年 11 月 5 日重庆《新民报》。

[27]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册，第 544 页。“子”字系双关语，“子”一意为儿子，但此处是普通名词的结尾。这一时期，这五项当务之急被通称为五子登科，这个说法原意是“五个儿子通过了考试”。这样，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便有了保证——如同恢复时期的官员一样。这一时期的文学描述，见张恨水的小说《五子登科》。

[28] 1945 年 9 月 22 日上海《青年日报》。

[29] 1945 年 9 月 12 日重庆《大公晚报》。

[30] 1945 年 9 月 17 日上海《青年日报》。

[31] 1945 年 9 月 20 日上海《前线日报》。

[32] 1945 年 9 月 21 日上海《前线日报》和《光华日报》。台湾银行由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横滨正金银行由中国银行接管；住友银行由交通银行接管；三井银行和三菱银行由中央信托局接管。

[33] 1945 年 9 月 22 日上海《中美日报》；1945 年 10 月 4 日上海《中

央日报》。

[34] 1945年10月3日上海《真言报》。

[35] 1945年10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1945年11月14日上海《真言报》。

[36] 1945年10月13日上海《中央日报》。

[37] 1945年10月20日上海《中央日报》。

[38] 1945年10月30日上海《联合日报》。

[39] 1945年11月14日上海《真言报》；1945年11月27日上海《前线日报》；1946年1月7日上海《新闻报》。

[40] 1945年11月29日、12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1945年12月5日上海《前线日报》。

[41] 1945年12月13日上海《新闻报》；1945年12月27日上海《中美日报》。

[42] 1945年12月22日上海《真言报》。

[43] 用英语对这些不当行为所作的详尽描述可能要数乔治·H·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一书对台湾接收情况的叙述，尤其该书第五章和第六章。

[44] 1945年11月2日重庆《新民报》。

[45] 1945年11月7日重庆《新民报》。

[46] 1945年9月23日重庆《青年日报》。

[47] 1945年11月26日上海《大公报》。

[48] 1945年10月2日上海《大晚报》；1945年10月14日上海《联合日报》、《前线日报》和《立报》。此时，由于京沪地区大批非正规军制造混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将军下令将其改编成一支特别警卫部队。开支和军饷由官方提供，其以往征用民物的做法被正式禁止。

[49] 1945年11月26日上海《大公报》。

[50] 1945年11月29日上海《神州日报》；1945年12月4日上海《大公报》。

[51] 1945年12月5日上海《大晚报》。

[52] 1945年12月3日、4日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9日上

海《立报》。

[53] 1946年1月7日上海《新闻报》；1946年9月3日上海《文汇报》。

[54] 1945年11月1日重庆《大公报》。

[55] 1945年12月13日上海《新闻报》。

[56] 1946年3月18日上海《文汇报》。

[57] 1946年4月29日上海《新闻报》。

[58] 1946年2月17日重庆《民主报》。

[59] 1947年7月31日、8月23日沈阳《东北前锋日报》。

[60] 1946年5月3日上海《大公报》。有关苏联人从满洲拆走设备的情况，见《中国白皮书》第596—604页。

[61] 高超，观察沈阳通信《泪眼看东北》，1948年2月28日《观察》，第17页。

[62] 1947年9月4日沈阳《和平公报》。

[63] 1946年3月25日重庆《国民公报》。

[64] 1946年4月4日上海《新闻报》，另见1946年5月27日上海《大公报》。

[65] 1947年9月13日沈阳《中央日报》。

[66] 1946年3月30日重庆《国民日报》。

[67] 此类及其他揭露情况在1946年8月下旬至9月底被上海报界广为报道。例如，8月28日《和平日报》；8月30日《申报》；9月4日《大公报》；9月28日《文汇报》。

[68] 1946年9月18日上海《申报》。

[69] 天津通讯员，《贪污太多，团员太少；大海捞针，无从捉摸》，1946年9月28日《观察》，第20页。提到拍苍蝇，这位作者可能想到了旧式马鬃蝇掸，对苍蝇无丝毫损伤，只能赶它们走开。

[70] 1946年9月4日上海《文汇报》。

[71] 1946年9月25日上海《大公报》。

[72] 1945年8月8日重庆《商务日报》。

[73] 1945年9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

- [74] 1945年9月22日重庆《新民报》。
- [75] 1946年2月16日《中国每周评论》，第201—202页。
- [76] 1945年9月11日、13日、14日重庆《新华日报》。
- [77] 1945年9月18日重庆《新民报》。
- [78] 1945年9月20日上海《光华日报》。
- [79] 1945年10月9日重庆《中央日报》。
- [80] 1945年10月14日重庆《商务日报》。
- [81] 1945年10月25日重庆《大公报》。
- [82] 1945年11月30日上海《大公报》。
- [83] 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
- [84] 1946年4月22日上海《文汇报》。
- [85] 1945年9月27日上海《中央日报》。
- [86] 1945年11月9日重庆《新民报》。
- [87] 1945年11月18日天津《民国日报》。
- [88] 1945年9月28日上海《青年日报》。
- [89] 1946年11月13日上海《和平日报》。
- [90] 1946年4月22日上海《文汇报》。
- [91] 1945年10月19日上海《前线日报》。

[92] 战争期间日本扶植的中国伪政权下属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货币。“满洲国”货币于1931年后开始流通，内蒙古则在1937年发行了独立的货币。联合储备银行(FRB)兑换券于1938年3月开始在华北流通；另一种货币则于1940年为华南发行，中央储备银行(CRB)兑换券于1941年开始在京沪地区流通。(阿瑟·杨：《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胀，1937—1945》，第165页。)

[93] 1945年9月14日重庆《大公报》。

[94] 1945年11月9日重庆《新民报》。

[95] 1945年11月22日天津《民国日报》；1945年12月21日天津《大公报》；1946年1月7日北平《华北日报》。

[96] 1945年10月24日重庆《大公报》。

[97] 1945年10月20日上海《立报》。

[98] 1945年12月27日上海《中美日报》。

[99] 从30年代初起,行政院全国资源委员会一直经营某些重工业。在恢复时期,经济部也开始直接干预生产。此举影响了轻工业,并引起私人工业家对公平竞争的不满,事例之一前已引述。此外,政府为管理不同工业部门而设立的特别督导委员会正在实地指导很多工厂的经营,其中包括一些生产和加工棉花、羊毛、丝、麻、化学品、纸和食品的工厂。尚不清楚这是一项蓄意炮制而未公开宣布的方针,抑或仅是接收行动的意外结果。见1946年11月13日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1月21日、24日上海《文汇报》。有关官僚资本的更多情况,见第四章。

[100] 1945年12月26日天津《益世报》。

[101] 这给台湾人带来的战后难题在聂邵(音译)的一篇文章中已有预见,参见《台湾人的忠贞和地方主义》,载1945年8月1日《台湾之声》半月刊。

[102] 台湾起义在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一书里随处都有详细的叙述。台湾人对首批抵台的大陆人的嘲讽,见第73—74页,104—105页。

[103] 1947年7月29日沈阳《东北前锋日报》。

[104] 下面是其中较强烈表达情绪的呼声之一:“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改造在敌占区尤其台湾和东北被灌输‘奴隶思想’之青年……曾帮助日本人执行奴化教育方针之光复地区学校教员应与卖国贼同等对待和惩处,青年则应获得重受教育之机会。”1945年9月12日重庆《时事新报》。亦见1945年9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和9月11日重庆《大公报》。

[105] 1945年9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

[106] 1945年11月20日上海《中美日报》。

[107] 1946年1月29日《北平纪事》第2页。

[108] 1945年11月24日《中国每周评论》第83页。

[109] 1946年1月29日《北平纪事》第2页;1946年2月16日北平《新闻评论周刊》。

[110] 1946年1月3日上海《大公报》。

[111] 1946年1月12日《中国每周评论》。

- [112] 1946年6月27日北平《世界日报》。
- [113] 1945年12月28日天津《青年日报》。
- [114] 1946年1月19日上海《时事新报》。
- [115] 1946年4月2日重庆《民主报》。

第三章 反战学潮

学生的抗议成了 1945 -1949 年期间最令国民党政府恼怒的事情之一。学生的行动基本上是反战运动,它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国共冲突上,因而它本身就成为了内战政治中的一个问题。学生卷入了几十起单独的抗议、罢课及政治事件。其中有些由政治问题引起,其余的则由学术和校务引发。除这些多少互不关联的抗议之外,四次大示威或曰学潮,引起了全国关注和反响。昆明“一二一运动”(1945 年)是其中最小的一次。接着是一年后的 1946 年 12 月底至 1947 年初“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的示威。1947 年 5 月和 6 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席卷了政府控制地区多数大城市的大学和中学。最后一次大潮是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它在 1948 年 4·6 月间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融为一体。

虽然地方问题和地方人物必然在如此广泛的示威中起了作用,但学生抗议运动关注的基本问题在各地都是相同的。学生的首要要求是立即结束内战,美国停止支持政府内战,把公共开支从军备转向民用。

政府拒不接受对其内战政策的公开反对,并把学生的抗议斥为共产党作祟。随着政府与共产党的冲突逐步升级为全面战

争，政府当局在镇压学生方面便越发残酷无情了。此外，政府还试图将运动引入歧途。但正如25年后一位前国民党青年工作者所言，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政府已十分不受学生欢迎了。

有报道谈及集团压力、厌恶政治的学生，以及虽同情国民党却顺应潮流不愿遭受同学非难的学生。有的学校校园并未被反政府的示威学生控制，仍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一统天下，不过，这些不是最大几个城市里拥有全国最优秀学生的一流学府。随波逐流者不能产生很大影响。这类学生落得逍遥，却以嘲笑的口吻对国民党青年干部发出挑战，要他们党“为革新办点实事，我们也好支持你们”！如此众多的人对政府及其内战方针如此深感不满，他们的运动自然无法被引离正轨。^[1]

政府不对学生妥协的根源，在于学生愿意承认中共为联合政府内的一个合法实体。学生要求立即结束没有军事胜败的内战本身即包含了这一意愿。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含蓄的前提条件，学生公开表达了对联合政府的希冀。他们这样做实在是要排除那唯一的其他选择，即某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志在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的国民党领导人认为，任何要让中共参加联合政府的意愿，都是蓄意冒犯之举。共产党方面就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问题，对自己政府目标所作的说明更是火上浇油。

至于学生，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制它的权力——或许是重新界定其权限。如我们以下将要看到的，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由中共统治全国的想法。然而，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麻木不仁和腐化堕落不满。他们推论道，为维持这样一个政权的执政地位而打一场内战，代价太高了。

然而，学生与政府的对立并未随着国家走向内战而一发不可收。相反，这种对立是循着示威本身和政府回应的轨迹发展

的。中外众多观察者都评论说,政府的严厉举措正在使学生进一步疏远,甚至将许多人赶向共产党营垒。于是,学潮的全部政治含义,只在示威学生和当局之间的互相作用过程中显现出来。本来基本上是以一种意在公布学生要求的策略而开始的运动,在无意和有意之间发展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权威挑战的运动。或许,直到1947年5月毛泽东才把学生运动当作内战的第二战线的原因为此:它至此才初具雏形。〔2〕

示威活动并非如计划周密、企图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市民反抗运动。在一些情况下,学生的确是追求一种确乎有限的目标,例如对官方暴行受害者给予补偿或撤销一项地方法令。但以其掌握的微薄政治资源,学生无力实现其首要要求所必需的基本变革。看来学生自己并非总能认识到这一点。相反,他们以为如果能充分唤起公众舆论,政府势必被迫接受他们的要求。

为了这个目标,学生们全力投入了宣传工作和抗议示威。学生在记者招待会和大街上将他们的要求公诸于众。他们散发传单和小报,张贴告示、漫画、标语及墙报,举办讲座、戏剧演出和展览。抗议的方式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和罢课。学生一旦违抗政府禁令,采取这些行动就演成了蓄意对抗举动。间或有学生故意舍身被捕,诱发警方作激烈反应,以使政府或其地方代理人在公众面前名誉扫地。但是,除个别罕见的例外,学生从无武装,也不曾投入破坏活动。

一二一运动〔3〕

1945年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主席一职——尽管迁延多日后才正式接掌代主席李宗黄的职权。卢汉被委以此职,乃

是中央政府的一个计谋，意在使这个西南省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这也是政府更大策略的一部分，那就是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努力清除所有半自治地区的权力中心，以巩固政府的地位。

云南的长期自治传统在国民党时期由龙云继承了下来，他从20年代末起一直统治该省。不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央政府结盟，他的亲信卢汉指挥的滇军与国军并肩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央政府马上派遣卢汉率部前往印度支那接受日本投降。与此同时，在后方昆明，杜聿明将军指挥的政府第5军于10月3日和4日包围了这个省会，要求龙主席投降。龙稍示拒绝之后，还是接受了要求，云南遂归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该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李宗黄被委任为代主席，直至卢汉履新。

同在1945年10月，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了43天后，毛泽东返回了延安总部。基本原则业已商定，但细节有待安排。双方代表深知，人们普遍厌恶内战，故继续进行谈判。但双方军队仍继续对峙。在此危急局势下，反战情绪开始高涨。11月中旬，重庆成立了一个反内战联合会，它号召工人、学生、商人及政府雇员罢工、罢课、罢市，以示对战云密布的不满。

事件肇始

其实，反战学潮起于1945年11月25日夜晚。昆明一些学校的学生举行集会，抗议政府与共产党武装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这种集会在该市已不是第一次。重庆谈判还在进行时，学生就曾举行过一次讨论胜利与和平问题的集会，表达了反对内战的立场。11月25日的集会在西南联大校园举行。该校学生理应率先投入行动，抗议和平希望和正常生活受到新的威胁，因为他们大多是日占区来的逃难者，在西南度过了战争岁月。师生们对所遭受的苦难仍记忆犹新，他们想回北方，归心似箭。^[4]民主同盟（民盟）是一个由小反对党组成的联

盟,参与了反内战联合会的组建,在昆明逃亡学者和知识分子中间也有很多得力的支持者。[5]

和谈虽然仍在继续,但重庆官方消息来源却抨击这新生的反战努力是共产党煽动家、政治野心家和盲目轻信的理想主义者一手制造的。[6]与此步调相一致,昆明——龙云调离后已完全被控制——国民党市党部和军事当局试图阻止学生举行另一次集会。这次集会计划于11月25日在云南大学校园举行,并被

封锁。翌日，昆明各报刊登了官方中央通讯社的电讯，称头天夜晚郊外发生了匪警。

行动与反应：学生与当局

读了官方的新闻报道之后，联大和云大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开会，决定举行为期3天的罢课，抗议当局的“法西斯行径”。其他学校立即作出反应，派代表出席新成立的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会议。当晚，委员会决定印一份罢课通告，遂有几批学生离校，进城散发通告。他们干了大半夜，尽力把通告放到每家门前，让市民知道事件真相和学生被迫罢课的原因。

11月27日，昆明约30所大中学校共3万多名学生全都罢了课。翌日，罢课委员会再次开会。会议一致认为，“一一二五事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整个政局的反映，因此会议草拟了四项要求，并决定为实现这些要求而举行无限期罢课。这些要求是：(1)结束内战；(2)实现有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3)成立联合政府；(4)外国不得插手内战。

与此同时，省政府当局正在设法对付罢课。他们要求各院校建立反罢课委员会。省教育厅长召集中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开会。据报道云南大学校长在会上发言说，如若士兵不曾向学生会场开枪，事情本来会好些。新到昆明的第5军军长邱清泉将军反驳说：“你的学生有言论自由，我的士兵有开枪的自由。”此语不脛而走，广为流传。李宗黄终于还是应允发表声明，支持公民自由。

11月30日，学生分成小组走出学校，到昆明街头宣传他们的四项新要求。他们处处受到便衣和警察的阻挠。在一个紧急会议上，学生断定局势过于危险，第二天不应冒险出校。可是，12月1日10点刚过，大批陌生人便冲进了云南大学校门，有的身穿军装，其余人则扮成苦力和平民。学生迅速聚集，用阵雨般的石块迎接闯入者，使他们抱头鼠窜。这批人随即转向西南联大，

路上在该大学附中砸门破窗。一群人前去袭击宿舍，另一帮人则强行进入了联大师范学院。该院学生刚开始吃午饭，这批人突然冲进了饭堂。接着就是一-场混战，附近的昆华工校学生闻讯跑来助阵。挑衅者终被赶出了大门。这次，他们从墙外扔过来一颗手榴弹，以示报复。手榴弹击中了一名学生，其余人便往后撤。这群人再次强行进入大门，又掷出一颗手榴弹，炸伤了许多学生。一位姑娘冲过去救护，却被乱刀砍伤。

在宿舍，学生得到了将受到袭击的警报，并已尽力做好了准备。但一位中学音乐教师刚从大学理发店出来，一颗手榴弹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他的脚前。他把它拣了起来，显然打算将它扔回去。手榴弹在他的手中爆炸了。在联大工学院，设备遭到破坏，一位教授挨了打。云南大学医学院学生前来救助伤员，但闯入者却封锁了回医院的路，并袭击了一名躺在担架上的学生。挑衅者直到下午5点方才离去。3名学生，包括那位姑娘，还有那位音乐教师被炸身亡。一名男生在手榴弹袭击中失去一条腿，还有至少10人受了重伤。

几周以后，昆明的大学区才恢复平静。其间，死者获得了烈士称号。他们的同学把大学图书馆全部腾空，把装殓的棺木放在那里，四周陈放着挽联和香柱。棺木在图书馆陈放了3个半月，学生们力争获准在全市进行抬棺游行。那几个月期间，昆明有一半人前来吊唁，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则出于好奇。

事件发生后几天之内，昆明市当局便公开宣布，两名复员军人已被逮捕，经审讯后已经定罪。这两个人被从速处决了。重庆和昆明的官员接着声称，这两个人被共产党买通，专门在学生中间制造事端，而且昆明的反战学潮亦系中共煽动所致。^[9]与重庆国防部有关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断言，共产党“用金钱和高位收买了黑帮，他们身藏武器溜进圣洁的学府，屠杀手无寸铁的青

年，酿成了如此惨剧”。^[10]

学生对秘密审判和处决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在掩盖真相。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那两个人是从一座地方监狱随便拉来的。学生普遍认为，国民党省党部主席李宗黄和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应对暴行负个人责任。^[11]由于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学生对李氏尤为敌视。作为国民党官员，据说他应对昆明教育改革运动中一名叫梁元斌的学生之死负责。

12月5日，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决定提出11项要求，作为复课条件。这11项要求归结于三个基本目标之下。这三个基本目标是：立即停止内战；彻底调查一二一事件；惩处罪犯，包括罢免和审判策划惨案的涉嫌人员，如李、关二人。列在这三个主题下面的详细要求有：组织联合政府，保障公民自由，防止随便抓人，收回中央通讯社污蔑联大和称教授和学生为共产党的言论，以及抚恤伤亡者。^[12]

12月8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敦促学生结束罢课。在联大，学生直到12月26日才重返课堂，但仍坚称要求尚未得到满足。与此同时，随着案情逐渐公开，全国掀起了一股声援浪潮。到1946年3月学生获准举行送葬游行时，全国城镇均已为那位音乐教师和三位学生举行了追悼会。^[13]

结 局

如果11月25日的集会确系延安授意，旨在挑起事端，给国民党政府脸上抹黑，那么这个计划获得了圆满成功。学生中的亲共分子似乎可能企图以组织集会的方式，强化他们反对迫在眉睫的战争的立场。当时，延安十分直截了当地表示支持政府控制地区日益发展的反战运动。亲共的学生似乎也可能试图利用地方当局的顽固立场和11月25日集会乍开即乱所造成的局面。^[14]但是，称一二一凶手受雇于共产党，使对共产党人的指控不攻自破了。

谁也不相信这一指控,更无人要坚持说共产党人应对 11 月 25 日开枪事件负责。再者,有一个事实压倒了事件发生后大量出笼的谣言和指控:在昆明的逃亡学生和学者中间,反战情绪是真切而广泛的,无须费力即可召集其中的数千人参加 11 月 25 日集会。

共产党人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辩,自然博得了众多亲共人士的赞同。他们写道:“我们不相信,区区几个政治阴谋家就能煽起万余学生和教授采取一致行动。倘若他们能如此轻易受骗上当,那么普遍的反战呼声何以未被安插在各校的特务们压倒?”^[15]学生和教授支持抗议斗争,是希望在政府和共产党仍在进行谈判时,为加大要求和平的社会压力出把力。学生的抗议是否真正起到了这种作用,当然尚属疑问。但由谈判产生的 1946 年 1 月 13 日停火,想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国共冲突的反感。

至于学生的次要要求,仅部分达到了目的。政府为抚恤 12 月 1 日的受害者做出一些姿态,但学生坚持认为,对暴行负有责任的人仍逍遥法外。李主席和关司令不久即双双离开昆明。因负责维持昆明的社会治安,关司令公开承担了该事件的全部责任。然而,密谋的细节,包括策划者和实施者的身份,一直密而不宣。对批评政府打内战的人而言,李、关二人的离去并未使昆明变得更加安全。闻一多和李公朴这两位民盟的积极拥护者,即在该市的大街上遭到“身份不明者”的暗杀。

不过,作为第一个重要的学生反内战宣言,昆明学生的反内战抗议确实得到了全国的认同,因而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学生未曾料想,他们的努力会引起地方当局的如此反应。但那种反应直接扩大了运动,并赋予了它更大的政治意义。

中央政府刚以牺牲地方军阀的利益为代价建立了对云南的控制,一二一事件便成了内战期间中央政府被迫为之承担最高责任

的第一个同类事件。未身处其中的历史学家可能会禁不住提出：在1945年12月，中央尚无力控制的以其名义治理云南的人。但在当时这并不是普遍的观点。更常见的看法是，国民党在当地的特务和支持者终于获准放开手脚，按他们的习惯去行事。^[16]随着同类事件接连在全国各地发生，越发显而易见，中央政府简直不能，甚或不愿控制其地方代理人的所作所为。政府最后明确授权他们采用这些办法对付批评政府的学生。

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17]

到1946年年底，中央政府已还都南京，投入了对共产党的首次大举进攻。^[18]日本投降后，美军留在了中国，以便协助政府在华北和东北重占要地。美军还帮助遣返日本在华军队和人员，并作为马歇尔使团调停活动的一部分，帮助监督1946年1月13日国军和共军之间的停火。到1946年底，停火已经毫无意义，但留在中国的美军仍达12,000人。^[19]

美国人的举动在整个1946年频频成为新闻评论的主题。政治立场迥异的报纸，如《和平日报》和左翼的《文汇报》报道了大量的美军开车横冲直撞、打劫抢掠、酗酒强奸甚至枪杀事例。美军当局受理了控诉，下令进行调查，也经常公开处罚。可是，事件仍层出不穷。

1946年秋，中央政府公开宣称，共产党操纵了不满分子。随着国民党对共产党区域发动进攻和马歇尔使命未果，延安开始对美国人进行日益愤怒的抨击，并且要求撤走滞留的美军。国民政府宁可低调处理美军行为问题，而不愿彻底予以解决——或许不愿冒险疏远其主要援助来源。美国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的这

种关系,是所有反内战者讨厌美国人留在中国的主要潜在原因。美国并不像 1946 年马歇尔使华那样,只是在扮演不偏不倚的调停者角色。美国人实际在用若干实实在在的办法援助冲突中的两党之一。

美国人已经靠空运及其他方式运输了近 50 万政府军,帮助政府同共产党争抢前日占区的战略要地。约 5 万海军陆战队为政府占领了北平、天津、青岛及其邻近地区。到 1945 年底,美国人已向国民政府移交了可供装备 39 个陆军师的物资。美国人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计划捐助了 5 亿美元,其中大半投向了国统区。1946 年 6 月,美国人签署了一项租借贷款协定,向中国提供贷款,用以购买民用设备和物资。1946 年 8 月,国民党开始在华中进攻解放区后,美国人又签订了一个协定,授权向国民政府出售价值 9 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而美国实收款项 1.75 亿美元。这批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材料、空军补给品和装备以及通讯器材。〔20〕

在所有反内战人士看来,美国是在帮助把内战永远打下去。他们赞成——当然出于自身的原因——共产党的论点,即这种援助只会有助于加强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美军的军纪问题只能是火上浇油。

工商界的忧怨也加重了此时日益加剧的反美气氛。1946 年 11 月 4 日,美中两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非官方报纸一致批评该条约,坚称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给予美国这样强大可畏的伙伴以如此广泛的商业特权,无疑是一个愚蠢举动。〔21〕早在签订该条约之前,全国各地的商人已经不断在抱怨美国产品的不公平竞争了。自然,国内原因足以造成工商业的混乱。然而,美国商品的直接得益却是显而易见的,并在临近 1946 年岁末时,激起中国商人发动了经官方许可的“购买国货

运动”。

发轫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于1946年圣诞夜，在北平强暴了一名中国姑娘。过路人听到了她的呼叫声，且显然目击了至少一部分行径。警方当场拘捕了其中一人，并将那位名叫沈崇的姑娘带到警署。她在那里诉说她遭到了强奸。翌日，北平一些报纸刊登了亚光通讯社报道这一事件的短讯。当天稍晚，警方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它看来与1946年发生的大多数事件没有差异，唯一不同之处是，沈崇不是那种常卷入此类与美国水兵有关事件的姑娘；她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至少五家北平报纸在12月26日刊登了这篇通讯。

官方和学生的反应

12月27日，一向热衷于掩盖此类事端的中央通讯社发稿说，接近该姑娘的学生所述事情经过系蓄意歪曲。该报道称她“似乎”出身良家，年方二十，曾就读于北平一中学。她在10点30分单独外出，在街上受到美国人威胁。此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美国领事馆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着重指出，独自去看“夜场电影”不是“有教养的”中国姑娘的习惯。发生强暴时，沈崇正离开一家电影院。

学生们坚持说，她确有良好的教养。北大学生岂能是另一种模样。她祖父曾任某省总督，其父为南京交通部官员。她19岁，而不20岁，当年1月到北平，报名就读北京大学预科（先修班）。她先看了一部电影，约8点30分离开电影院时，非但受到了威胁，而且遭到了强奸。在北大，民主墙上愤怒评论的数量开始增加。民主墙类似中央布告栏，是校园中一个指定场所，可以在此自由发布各种消息、立场和观点。

北大刚从昆明战时校址返迁完毕，学生组织的各种选举尚

未举行。有些人说，这应归因于该校“反动”训导长陈雪屏的故意阻挠，他与国民党右翼 CC 派的关系广为人知。尽管没有一批领头组织此类事件发生后各种活动的学生团体骨干，北大照样行动起来。12月27日下午，历史学会在该校召集了一个各系及各学会代表会议。到晚上11点散会时，终于作出多项决议。这次会议产生了随后在北平不断扩大的抗议运动的领导核心。12月30日被定为抗议罢课日，并组成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委员会。学生的基本要求是：(1)应由中美联合法庭审判涉案人员；(2)美军当局应公开道歉，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3)所有美国军事人员应立即从中国撤走。

当局用尽拙劣伎俩，试图化解这一难题。北大训导长发表讲话，对沈崇的北大学籍提出疑议。一时谣言四起，有的说她实为共产党特务，有的说她是八路军，被指派来引诱海军陆战队员，以便制造事端云云。还有传言说，她是个娼妇，先前与那两名男子相识，强暴发生前她已陪了他们整整3小时云云。

北大校长胡适采取的调子比较温和：这个问题是法院的事，不应变成反美游行和罢课的事由。北平市长何思源就像当时一些对学生抗议活动有所同情的官员一样，左支右绌。起先，他致函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抗议那两个水兵狼狈为奸，强奸妇女。然后又造访美国领事馆，就日益高涨的公众抗议表示歉意。最后，他宣布医学检查已经证实，沈小姐是否真遭奸污尚无定论。学生将此举视为官方又一混淆视听的企图。

与此同时，北平其他学校的学生正开始像北大学生那样作出反应。12月26日，清华大学饭堂墙上出现一张抗议书。翌日傍晚，一个社会学讲座结束后，讨论阶段的议题转向了当前的问题。学生决定发出倡议，要求学生自治联合会采取某种行动。到28日中午，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在倡议书上签了名。当晚，会议

投票决定支持北大学生的要求,并于30日罢课。其实,全体教员都支持学生的行动。

在美国出资开办的学府燕京大学,声援来得较迟缓。但29日举行的学生自治委员会会议决定,支持北大学生的主要要求。一些清华学生到燕京出席了这次会议。经过力劝,会议同意燕京也参加将于翌日举行的联合示威游行。北平八所高校的约5,000名大学生在12月30日举行了游行。^[22]他们沿着城里几条街道行进,但示威活动主要限于呼喊反美口号,这次游行终于没出大事,尽管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围墙上架起了机关枪。

运动的扩大

不同于“一二·九运动”,反美示威没有一直局限于一个城市。在天津,1月1日和3日,数千学生举行游行,向市政府请愿。在上海,1月1日举行了大规模抗议示威。上海市长吴国桢事前曾召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到市府去“谈话”,校长不为所动,重申对学生反美示威的支持。此前,他曾宣布,他将亲自参加1月1日的游行,这实为大学校长前所未有之举。

上海法学院院长也支持学生,称他们的示威代表了全中国的社会舆论。浙江大学学生非但抗议美军的行为,而且呼吁停止内战——意思是说,若非因内战之故,美国人便没有理由继续留在中国。在南京,大学生举行了三天罢课。美国大使接见了一个学生代表团,对事件表示遗憾。到1月底,已有20多个城市的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集会和罢课。其中有的城市远离这一突发事件的发生地,如广州、昆明和台北。

同样,与“一二·九运动”不同,当局避免动武压制学生的活动。或许官方克制的唯一原因是,人们广泛赞同这场反美示威的基调。上海的11个市民团体,包括商人和妇女联合会,于12月30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国军队从中国撤走。中华妇女联谊

会南京分会致电北大，表示支持该地学生的抗议活动。

在重庆，商会的一次会议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愤慨，提议工商界声援学生要求美军从中国全部撤走的立场。会议认为，如能实现撤军，则可加速结束内战，而美国人不走只能起到延长内战的作用。再者，它将把进入中国市场的美货至少减少三分之一。到1月17日，审判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之一的法庭开庭日，连官方和国民党报也谨慎地要求惩处罪犯了。

公众的抗议几周内即平息了下来，但全国性学生团体仍在做努力。12月31日，上海17所学校组建了上海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类似的全市性联合会很快即出现在北平和天津，并于1月28日合并成一个总会。它的要求内容远比北大学生12月27日会议最初提出的广泛，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立即结束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平津、南京、杭州各抗议联合会的代表于2月前往上海，筹划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它于3月8日在该地成立。

结 果

就其基本目标而言，这场反美运动成效不大。没有进行中美联合法庭审判。海军陆战队员之一、下士威廉·G·皮尔逊经军事法庭审讯，被定罪并判处10年徒刑。不过，五个月后，此案经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当局复审，定罪被推翻，理由是无法证实对他提出的强奸指控。复审还指出，原裁决宣布时，正值中国全国学生举行要求定罪的抗议示威，造成了一种使被告无法受到公平审判的气氛。

至于更宽泛的目标，即撤走全部在华美军和停止内战，这些——如同“一二·九运动”更有抱负的目标一样——并非学生行动力量之所及。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它已决定放弃充当国共之间调停者的角色。参加该使命的美国人员将尽速撤

离。然而，早在1946年12月18日，美国已宣布了一项继续减少在华美军的计划。^[23]因此，很成问题的是，学生会多大程度上相信马歇尔使命将加紧正式结束。其次，美国依旧在华保持军事存在：在青岛驻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分遣队和美国海军训练团，以及在南京的军事顾问团。^[24]

然而，从其较大的影响来说，这场运动确实提供了一个公开地在全国范围表达反美、反政府情绪的机会，这种情绪已在民众中酝酿数月之久。起初因小事件而在北平爆发的学生抗议，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宣泄普遍情绪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反美示威把广大民众发动了起来，这个强有力的基础足以支撑全国性学生运动的稚嫩组织。

如前所示，协调一致的学生活动先是在个别城市的学校中间发展，后扩大到跨城市规模，最后则作全国性组织的尝试。这是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朝独立于政府和国民党的全国性有组织的学生运动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它发展成为数月后在第二轮学生示威期间建立的全国学联。于是，北平强奸案为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而运动以一种明白无误和庄重正式的方式，宣布了国民党对学生阶层的控制寿终正寝。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25]

在2月和3月，学生的活动一度停息，但四五月份重新恢复，焦点直接落在了生计艰难和内战问题上。这次没有什么诱发事件。实际上，这场运动有着若干力量源泉，包括在前不久反美示威期间积蓄起来的力量。

1947年上半年，在许多方面都是转折的标志。美国在1月

份正式撤出调处活动,意味着以谈促和的全部希望终告破灭。国共两军现已公开投入全面战争,这意味着二战后的经济复兴之梦也已告破碎。2月,政府公布了一项紧急经济改良计划,冻结生活费用指数,所有工资原来都以它为基准。基本商品的价格均作了最高限价,然而,价格仍攀升不止。从2月到4月底,各类价格指数上升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从5月5日到10日,5天内商品价格总指数上升百分之十五。米市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上海米价在5月4日到8日之间上涨百分之二十。由于运输困难、政府征收军粮及紧急经济改良计划所引起的错乱,无法把足量的大米从产区运抵城市。改良措施实行最得力之地,缺粮情况最严重——在中央政府权威最强的长江流域的城市即是如此。在很多城市,米店关门,米骚动爆发。工人对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促其解冻生活费用指数。[26]

学界不能不受到经济失调的影响。一些学生因无力负担读书费用而被迫弃学;其余学生则缺衣少食。关于缺乏营养的报道,有关靠小米白菜糊口的报道,以及关于学生没有足够的体力参加体育活动的报道为数不少。通货膨胀使教授薪水大大贬值,抵不上二战前的价值量。有几名教授甚至寻了短见,据说是由于无力承受贫困的重压。失业是中学和大学毕业生的一大难题。“毕业即失业”之说已变成了学生圈子里的流行语。在此情况下,学生和教师都把内战看成国家和个人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他们——还有其他人——大声疾呼,抗议国家预算对教育的拨款份额太少,约为4%,相比之下,军费比例却压倒一切。[27]

与八年抗战时的态度相反,知识界对内战强加给他们的个人牺牲已不再逆来顺受。这就是1947年5月学生示威爆发时的氛围。示威缘起于京沪地区的国立学校[28],要求是:“消除教育

危机”，在平津，主要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

最初阶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说是国民党右翼 CC 派挑起了此次学潮。美国大使馆的报告援引“权威观察家”和中国政府官员的话作为这一情报的出处，虽说细节说法不一，但提供情报的人一致认为，学生的活动和抗议很快便得到了可观的“社会支持”，这样 CC 派就丧失了“控制”，主动权转向了左派一边。CC 派首领兼前教育部长陈立夫确实依旧对教育事务有举足轻重的操纵力，但他与其继任者朱家骅关系不和。教育部做出的若干影响国立学校的决定激起了学生的敌意，这本来是可以料想到的。除这些世人皆知的情况外，遗憾的是外交报告对 CC 派扮演角色的确切性质，及对共产党插手的传言同样稀里糊涂。不过，各消息来源一致的一点是，公众支持与“左派”目标的趋同。这一组合，使这场“动乱”改变成了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学生反战运动。这场抗议运动的进程大致如下：

4 月 26 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向教育部请愿，要求将教育拨款从国家预算的 4.5% 增加到 15%。此外，他们还请求：(1) 增加教职人员的基本薪金；(2) 薪水应与生活费指数挂钩；(3) 政府给学校分配外汇，使之得以从海外自购急需书籍和设备；(4) 国民党发起的活动和组织，如三民主义青年团^[29]的开支，不应纳入国家教育经费预算。几天后，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开封的河南大学和沈阳的东北大学，教授们均举行罢课，抗议教育经费不足，要求调整薪金。

教授们没得到具体答复，学生们遂开始提出这个问题。5 月 13 日，中央大学学生举行各系代表会议，决定不仅要支持教授们的要求，还要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要求增加每月的食品补贴。在国立学校向学生发放食品补贴的做法始于二次大战期间，

当时流亡西南的学生背井离乡，生计无着。中央大学学生要求将每月津贴增至每人 10 万元(新法币)，他们指出，既然 1946 年 12 月到 1947 年 5 月南京物价上涨了 4 倍，其食品补贴也应为 12 月所发 24,000 元新法币的 4 倍。实际上，他们每月领到的是 6 万新法币，或者更少。医科学生拟出一项详细报告，显示在南京目前的物价情况下，以每月 6 万新法币的食品补贴，每天只能吃到 1,859 大卡热量的食物，而不是必需的 2,584 大卡热量。然而，学生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教育部提出，他们应保持平静，返回课堂。

与此同时，其他问题带来的压力正在与日俱增。例如，教育部发布一道立即生效的新命令，规定全国所有应届中学毕业生们均须参加统一终考。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发动了一场抗议运动，立即得到了其他城市的支持。

上海法学院学生在 5 月 4 日因在公共场所张贴告示和标语，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随后的搏斗中，两名学生和一名警察受了伤，于是全体学生走出校门，举行罢课。吴国桢市长同意承担受伤学生的医疗费用，但不愿在作调查之前采取措施制裁警方。出于不满，法学院学生动员上海 34 所高校和中学支持他们，并于 5 月 9 日再次把他们的要求送到市长官邸。

这一阶段发生了两件最具戏剧性的事，杭州英士大学和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强占火车，试图乘车前往南京，向政府请愿。交通大学是一所在内战时期始终处于学运前沿的工科大学，那里的问题涉及教育部一道撤销航海与船舶工程系的命令。学生认为这是南京反动派旨在毁掉他们学校的一个阴谋。

教育部驳回了要求收回成命的请愿书，在首都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带回消息说，还会作更进一步的裁减。交大学生计划全体出动前往南京，发誓说学校威胁不除，决不返回上海。5 月

13日上午,2,800名学生,实际就是交大全校学生,背着铺盖和20天的口粮汇集到了上海北站。铁路官员不准其使用客车,但一些四年级学生搜索了铁路车场,发现了一辆旧机车,便把它发动了起来。他们挂上了几节货车车箱,学生们爬上火车,火车便向南京开去。与此同时,在铁路线前方两站处,有人拆掉了路轨,以阻止列车前进。不屈不挠的学生们干了个通宵,修复了路轨。全副武装的士兵就站在旁边,但未加干预。最后,约在早晨7时30分,吴市长通过高音喇叭宣布,教育部长朱家骅已连夜从南京飞抵,同意接受学生的要求。这是学生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彻底胜利之一。

政府的举动和学生的反应

随后的一周,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由很多大专院校举行的罢课和示威,起因各不相同,有些是普遍问题,其余则限于各校自身的内部问题。在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发起一次为时三天的罢课,从5月17日开始,抗议内战和政府漠视师生生活状况。北大迅速跟上,其他许多学校也发动了自己的罢课。学生走上街头,阐释抗议罢课的原因。5月18日,几队在市中心做宣传工作的学生遭到了青年军第208师士兵的袭击和殴打。^[30]8名学生受了伤。在当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11所学校的学生汇聚一堂,酝酿针对这一事件发起新一轮抗议活动。会议决定于5月20日举行大游行,这是为计划在同一天不同城市举行的众多游行之一。此外,天津和唐山的学生代表约于5月18日在北平碰头,组建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

政府的反应是要阻止定于5月20日举行的示威。5月18日,行政院在南京开会,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这些措施禁止10人以上的罢课、游行及请愿;地方执法部门有权使用一切必要的执法手段。翌日,7,000名手持破饭碗的学生游行

通过上海的街道。当晚,该市警备司令从南京返回,对报界宣称,只要《临时办法》仍然有效,就不会再发生示威。他说,这是蒋介石本人发出的指令。根据美国使馆的情报,蒋告诉一批有关的学者说,他已下令禁止示威,并希望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加以实施。他还告诉这批人,共产党在领导着学生的抗议活动。这意味着最初于1945年11月和12月由其在昆明的地方代表采取的那种策略,现在被中央政府正式认可。

北平当局起初避免使用武力压制学生的活动。5月18日青年军的攻击与其说是惯例,毋宁说是例外。它表明,在如何对待学生这个问题上,北平当局内部,北平和中央政府之间存有歧异。北平对颁布《临时办法》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该文件颁布翌日,北大校长胡适在一次答问中说,《临时办法》的用意显然是对付京沪请愿学生的强硬做法的。他接着又说,当然政府不会把北平学生的小小宣传活动当成心腹之患。天津《大公报》提出:“蒋总统发布之公告以其内容与现实不符而置地方当局于困境……。”蒋介石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将军,召集了一百多位教授和大学负责人开会讨论时局。会议一致同情学生。

李将军决定对5月20日游行采取不干涉方针。当天上街的全部士兵和警察均无武装。他们服从了退后的命令,允许学生领袖指挥数千学生行进,但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袭击了学生,在一个地点从楼顶向他们投了石块。在另一处,一名学生遭到毒打,到当天夜晚,有好几名学生被报“失踪”。

然而,李将军仍对学生持宽厚态度。5月21日,一批代表来到他的官邸,主要要求惩处近日暴行的罪魁祸首。据报道称,李将军对学生的全部要求作了肯定的答复,其中包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假定按许多学生当时的想法,李宗仁所作所为出于诚意,那么看来他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名义上属他管辖的各

军警单位。^[31]在随后的一周里,虽有他的担保,事件仍接踵发生,局势趋于恶化。最后,北平行辕于5月27日宣布,将在北平全面贯彻《临时办法》,并将按此对付计划于6月2日举行的总罢课。

在学术界,随着当局立场的强硬化,对学生的支持有增无减。5月28日,由平津高校585名教授和职员签署的支持学生抗议运动的正式声明公开发表。这项声明还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组成联合政府。不过学生和教授都认为,既然学生在街上不再有安全保障,就不应再举行公开示威。6月2日,在北大校园召开的会议上,胡适校长称赞了学生的克制态度,并表示不相信学生们如同中央政府所斥责的那样受到了共产党的操纵。可是,在校园外面,带刺铁丝网已经拉上,士兵在站岗,刺刀上了枪。

同时,在委员长眼皮底下的南京,执法当局绝不可能放宽对《临时办法》的执行。《临时办法》公布后,那里的学生拒绝取消游行,并继续制订计划,准备与京沪苏杭国立学校解决教育危机联合会请愿团一道游行。他们的要求,基本上与中央大学的教授们于4月份提出的要求相同。

当游行单位准备于5月20日上午出发时,发现道路已被士兵和警察封锁。只有三所大学的学生离开了校园,开始按计划行进。当他们沿主要行进路线转入珠江路时,发现这条路也已被大约400名警察封锁。游行指挥者要求获准通过。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决定设法冲破警察的封锁线,“以保证人民请愿和游行的合法自由。”警察接到命令驱散游行队伍,于是挥舞警棍、皮鞭,并用消防水龙头冲学生。50多人受了伤,一些人被逮捕。但在混乱中很多人冲破了警戒线。正午时分,他们到达国府路,那里早已戒备森严,既有机枪手,又有骑警。学生终于在这里停下,与军警对峙了6个小时,其间一段时间是冒着骤雨度过的。

学生领袖暂时放弃了他们原先的请求,转而提出与刚发生的事件相关的新要求。作为解散的条件,学生要求释放刚被抓走的人,警备司令部应承担伤员的全部医疗费,并且撤走骑警。这些要求最后被接受了,学生遂凯旋返校。

学潮再次席卷了全国高校和中学。但这一次,《临时办法》决定了学潮与警方的行动高峰相互撞击,从而加剧了抗议的激烈性。罢课、游行和宣传队都是针对内战、迫害和警察暴行的。

在南京,5月23日和27日,人们向政府递交了正式请愿书,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取消《临时办法》,并恢复三家因反政府立场而于5月24日遭禁的报纸。湖南大学学生于5月22日举行了反内战游行。两天后,浙江大学学生上街抗议南京事件的发生;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学生发动了三天罢课;昆明全市学生开始进行五天罢课。在上海,37所学校组成了“五二〇惨案”后援委员会,并发起了罢课。70余所学校响应了这一号召。除了释放在南京被抓的学生外,政府对学生的主要要求置若罔闻。与此同时,学生宣布6月2日为反内战日,酝酿进行一系列全国性示威,当局方面则着手加以防范。

5月20日后的两周内,报纸连篇累牍刊登“事件”报道,包括殴打、强行逮捕和绑架学生。这些均系形形色色的执法机构所为,其中有警方、青年军、卫戍部队和便衣人员。一些城市实行了军事管制,包括沈阳、天津、开封、福州及重庆。除上海三家报纸遭禁之外,天津还临时实行了新闻检查。^[32]学生领袖,尤其是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成了政府反扑的主要目标。许多人遭到便衣的绑架,销声匿迹。学生领袖、积极分子及有“共党分子”嫌疑者都上了黑名单。这些学生不是在校外被抓走,便是在夜间校舍遭袭击时被带走。军警包围和封锁某一所学校时,学生告密者或安插在校内的特务会带领搜查队搜遍寝室和床铺。

此类事件最著名的一宗发生在学生抗议活动不甚活跃的武汉大学。6月1日早晨,几小时内数名学生和至少5位教授被叫起来,然后被带往等候的警车。在此过程中,整个校园被唤醒了,大批学生围住一辆警车,不放它走。几阵枪弹朝人群头顶飞来;恰巧一座宿舍处在射击线上。三名学生中弹身亡,其中两人正站在宿舍台阶上,另一人在朝窗外张望。还有五人受了重伤。验伤和尸检表明,创伤系达姆弹所致,而这种子弹为国际法所禁用。面对这一事件引起的公愤,蒋介石被迫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他宣告该案中被杀学生不是共党分子。武汉卫戍司令部警探队队长最后承担了下属“疏忽大意”之责。他被解职后,其尸体很快在长江边被人发现,据说系自杀。

重庆发生的类似事件也在6月1日上午,当时有近200名学生、记者及报纸编辑被当成共产党嫌疑犯抓了起来。两名学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枪杀。在福州,30多名学生在5月31日夜间被抓走。中山大学数名教授和学生同样受到拘禁。在上海,上海法学院、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及交通大学宿舍遭到袭击。大同大学学生组织负责人在校园被捕,便衣先打断他们的会议,然后殴打了其中多人。

此外,宣传队员,包括若干中学生遭到了逮捕。宣传队员实际上是引火烧身,因为他们常在校外开展活动,故意违反《临时办法》。一次金大学生得到消息说,他们的一支宣传队被抓了,他们便向同一地点派出另一支队伍,去继续第一支队伍已经开始的工作。学生们推论说,这将再制造一个机会,“让更多市民亲眼目睹统治者的残暴”。不出所料,警察也抓走了第二队人马。宣传队员们不屈不挠,在警察所里仍继续努力宣传。^[33]

镇压达到了直接目的。6月2日反内战日当天,街头没有出现什么活动。但是,大量抓人以及与之俱来的凶暴,远远不能吓

倒学生们,反而加深了他们的敌愆。他们傲然拒斥政府的法令和地方当局的命令,表明学生和政府之间已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正是这一局面促使毛泽东于5月30日写道,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已出现了第二条战线。

余 波

1947年夏季,5月事件余波不断。北平和上海的学生领袖不失时机地利用学生中已经积蓄起的力量,目标是把各个临时性的抗议联合会改组为一个更长久的组织。在平津地区,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于6月初改组为华北学生联合会。6月14日,代表们抵达上海,与其他学生领袖一道筹建全国学联。据报道,成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决定是在6月15日的会议上作出的。成立日期后来披露为6月19日。^[34]同日,南京的社会部和教育部下令责成它自行解散,理由是它未经正规登记注册。学生领袖对命令不予理睬,并于7月份宣布联合会正式成立。政府随即宣布它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于是,联合会转入地下,一直到1949年3月在共产党保护下重新在北平建立起来。^[35]

上海被捕学生家长同盟于7月份成立。5月份被捕的约50名上海学生仍身陷囹圄,但却未对他们提出正式起诉。家长们呈请上海高等法院下达人身保护令。警备司令指责家长们提出无理要求,因为学生的被拘禁有戒严令为据。1945年11月颁布的戒严法旨在对付复兴时期的劳工骚动,一直没有正式撤销。既然许多学生被捕于校园内,或被绑架于街头,就不能根据《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起诉他们,因为《临时办法》只适用于公开示威。

家长们重申了他们的要求,愤怒地反驳了警备司令,对其戒严令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学生们逐一获得释放,到8月中旬,除

五人以外,都交给了家长。虽未作正式指控,但家长不得不签字画押,承认子女犯有扰乱治安之过,并担保以后不再犯同类思想和行为错误。

在昆明,到11月底,家长联合会仍在进行谈判,希望释放被捕学生和教师,宽大处理已列入黑名单但尚未被捕的人。昆明仅有约30名青年因抗议活动被关进监狱。但省主席卢汉公布了很多据说仍藏匿于学校的“亲共分子”的姓名。

与此同时,惩罚学生的行动有所加强。整个夏天,一面不断释放5月被捕的学生,一面继续开列黑名单,因为当局企图逮捕据说深藏的学生抗议活动中的“真正的”共产党特务。这就难上加难了。学生聚集起来,互相保护,有时帮助上了黑名单的学生逃跑,或者全体一起与搜查队对峙,以阻止其搜查。一天夜晚,交大学生就是以这种方式对付警察的。当时,警察带着列有16个名字的黑名单把宿舍团团围住,宿舍里的每个人都被学校的紧急铃声惊醒,这是各校紧急集合的习惯做法。约两千名学生冲出宿舍,站在一起,相互紧挽胳膊,与警察对峙,同时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首根据《共和战歌》曲调填词、传唱最广的中国学生歌曲。那16个人被保住了,至少是暂时保住了。

另一种情况是,上海许多学生收到信件,告知他们市政府的指令。所有已被捕或已列入黑名单但仍未屈服的在校学生都不准留在校区。7月中旬,大同大学80多名学生和附中31名学生遭到开除。包括交通、暨南和复旦大学在内的其他学校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到夏季结束时,仅上海一地便有近500名学生被开除。南京、广州、昆明和北平的高校和中学也传来了除名的消息。愤怒的家长再次起来保护他们的子女。当事学生中大多为高材生,又是学校学生会的积极分子。

对教职员工也采取了惩罚行动。如前所示,他们中间有很多

人支持学生的反战示威。7月初,教育部就重聘教职人员事宜向高校校长下达指示,国立学校教职人员按年聘用。因此,暨南大学约30位教授及助教的聘期遂告结束。一份正式文告称,他们未能与该校“紧密配合”。约30名复旦大学教职人员和20名交通大学教职人员也遭了解聘。这种做法被广为采纳。有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学术能力问题,但人们普遍认为,解聘的主要原因是消除“一切妨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中山大学校长在回答关于该校终止几位教职人员聘期的问题时所提供的原因。

招生是政府藉以控制学生的又一手段。国立学校招进新生人数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一些学校半数以上的名额留给了刚复员的青年军。为使他们做好准备,重返平民生活,政府把他们送到夏令营,那里的培训课程包括测验近期的“五月学潮”,以及返校后的工作法简介。政府的用意在于让他们抗衡学潮中占主导地位的反政府路线。据一则报道说,此举受新组成的国民党青年部和政府的学生运动领导委员会的联合督导。〔36〕

最后,在8月下旬,教育部开始制订计划,削弱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力量和自治地位。计划正式公布于12月8日,当天该部颁布了修订后的管理学生会的规定。新规定把学生会置于各高校校长或训导长指导之下;禁止任何因违反校规而受到处罚或留校察看的人在学生会任职;并且严格限定了活动范围。这一修订的规定又引起了学生和地方当局之间一系列长期争端。〔37〕

结 局

当然,停止内战的要求仅仅是要求而已。7月,政府颁布全国总动员令。教授工资于8月上调;但加上以前的同类调整,工资并不能与生活费用的上涨持平。北京大学教授9月1日致函胡适校长,请求发放补助金。他们写道,“近期的调薪实乃一场愚弄。”至于学生津贴,全国经济委员会颁布一项新规定,彻底取消

了国立学校学生津贴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数目有限的政府奖学金。奖学金领取者数目限定为约新生的十分之一。除这一打击之外，一些私立学校增加了学费，致使很多学生无法在秋季开学时重返学校。

然而，如同前两次运动一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意义重大，其原因并不直接与达到公开宣布的目标相关。相反，其重要性体现在，它对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学界进一步疏远国民党政府做出了贡献。全国学联的建立，完成了几个月前反美示威期间即已开始的进程。学生与政府的疏远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们一再拒绝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最典型的就是学生故意不理睬《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

1945年“一二一”运动期间，罗伯特·佩恩动情地描述了学生蔑视地方当局禁令，为死亡学生举行公开追悼游行的坚定决心。他形容为视死如归，一种要随同窗殉道的个人欲念。没有人会用这种眼光来诠释1947年5月学生发出的挑战。学生们故意刺激警察，使其在南京街头动武；还在上海自投监牢，以使更多的人“亲眼目睹统治者的残暴”。或许存在某种殉道欲念，但它现在已由自觉的政治动机所支撑。学生抗议运动已演化成了一种使国民党政府名声扫地的方式。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成功。^[38]

根据学运内部所作的一项自我评价，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在全国范围促成了学生组织的建立和统一。其结果是，学生的活动克服了临时性、分散性和地方局限性。这次抗议还把教授日渐增多地吸引到了他们的学生一边，因为它头一次把内战同直接关系到大多数百姓的问题联系起来。其作用就是扩大了支持反内战运动的基础，进而扩大了对政府不满的基础。该报告总结说，这场运动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向国民党政府要和平是徒劳无

用的。[39]

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和抗议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40]

共产党胜利前的最后一轮学生示威发生在1948年4月、5月和6月。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本质上是前一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继续。示威抗议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担心这一政策会通过美国或日本的直接干涉而延长中国的内战。

在过去的一年中，校园里远非宁静无事，但抗议和示威一般被限制在各校内部。有些问题确也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但不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学生活动规模上，都比较有限。例如，促发抗议的事件有1947年10月下旬传闻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在狱中自尽；九龙城居民与警方在香港发生冲突；上海同济大学7名学生因违反该校有关学生选举的规定而于1948年1月被开除。

反迫害及反饥饿抗议示威

学生和教师继续就生计艰难和战争进行抗议。1948年2月，估计有1万人加入新的上海学生自卫者联合会，以促进要求增加教师薪金，增加教育经费，维护上学的权利，因为很多学生因生计艰难而被迫中途辍学。

学生领袖继续受到严厉的对待。2月初，6名北平大学生被捕，罪名是他们系共产党地下人员。学生、教授及大学职员纷纷为之申辩。被捕学生中4人被控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据称这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另一学生的境况最令人同情，他叫邓特，是青年军208师退役士兵，正在北大就读。他被控在华北学生联合会指导下为中共工作。他的具体罪状是出版了一种墙报。尽

管他已按校规向训导长办公室登记,但政治当局发现该报对政府非议过甚。北大校长胡适和训导长贺麟都替学生,尤其是邓特说了好话,终于使他获得了保释。这个年轻人在病床上描述了他挨打和被警察灌水和坐老虎凳的经过。这是当时最常见的两种刑罚。〔41〕

“反迫害、反饥饿”作为新标语出现了。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的学生试图组织一个联合自卫运动。4月初,北平研究院的讲师、助教和全体职员举行了罢课。这一举动直接引发了平津7所主要大学学生的一次联合反迫害反饥饿罢课,这些大学是北大、清华、燕京、师大、中法、南开和北洋大学。

4月间,抗议有所升级。学生抵制了课堂教学,发起了全国各城市的抗议示威。除前已提及的4座城市外,还有杭州、武汉、重庆、南昌、兰州、沈阳、广州、长沙和福州。随着“多事之月”——五月的到来,一场新学潮发展起来了,这次以反迫害反饥饿运动著称。不过,它很快就让位给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反美示威。

美国、日本与冷战

政府迫害、生计艰难及内战是1948年知识界全力关注的主要问题。与之相关的则是日本的复兴问题。美国恢复日本经济和防务能力的计划一公开,人们的关切马上加甚起来。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1947年5月披露了重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意向。这一严重背离战后初期占领政策的做法,缘自日益扩大的冷战和美国要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坚固的反共前哨阵地的打算。苏联正在巩固其对东欧的控制,美国则报之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以及用于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战后世界已分裂成两个阵营。在中国,双方已经开战,而美国的盟友没能打赢。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1947年去日本旅行两周后,成为最早敲响警钟的人之一。他在那里得知,日本海、空军基地正在修

复,而不是在拆除;美国正在训练日本飞行员;军工和重工业正在恢复之中。他指出,所有这一切的理由是防备共产主义和苏联。此举对中国的意味一清二楚,在美国支持下的中国反共势力中已有日本部队。^[42]他写道,假如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任何事件,“美国军舰就会运送日本‘关东军’再次登陆我东北之地,一面对俄国作战,一面以中国的名义直接承担‘防范共产主义’和‘遏制中共’的任务。”^[43]反对美国对日新方针的人们都有这种不安。

仇日情绪强烈之至,结果抗议之声引起整个政坛的共鸣,远远超出了学生阶层。因而,当美国于1948年1月向远东委员会和中国外交部递交关于它的对日计划备忘录时,中方的反应一致置疑。只有官方的《中央日报》似乎愿意认可该计划。《大公报》在1月26日和28日的两篇社论中,对该计划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国民党政学系的其他刊物也是如此。^[44]3月9日的《新闻报》提出,采取防范苏联的措施是一回事,为此目的而扶植日本则全然是另一回事。同日,《立报》提出,“……尽管我们应当感谢美国的对华援助,然除去真诚感激她外,我们务必不要忘记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现行方针。”这篇社评充溢着三大忧虑:第一,一旦日本恢复军事能力,就会再度出现侵略之危险;第二,工业化的日本大有在经济上称霸东亚之威势;第三,一旦苏美开战,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基地,中国则将沦为战场。

这些社评大可与1948年上半年杜鲁门政府、美国陆军部以及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占领军司令部所发动的舆论攻势相匹敌。麦克阿瑟司令部制订的计划估计,在4年内使日本经济恢复到自给自足的程度需耗资10亿美元。该计划请求国会首次批准提供1.8亿美元,作为1948年7月1日开始的该财政年度的经济复兴资金。陆军部则公开建议,只应肢解日本的“重要”军事工

业,最早计划作为赔偿迁往亚洲邻国的“次要”国防工业,应当完好无损地留在日本,改作和平用途。

3月20日,以纽约银行家珀西·约翰逊在陆军部副部长威廉·德雷珀为首的委员会抵达东京,这是他们赴日、韩执行紧急“调查”使命的第一站。这一行人马于4月17日回到美国,马上宣布了他们的结论,并在4月份期间加以重申。他们的调查证明,麦克阿瑟和陆军部的观点是正确的。恢复日本经济必须成为美国占领的首要目标,而这需要大规模经济援助。美国政府于5月19日发表了该委员会的报告,翌日,杜鲁门总统把用于恢复日本经济的1亿美元纳入了1948—49年度财政预算。

美国对日占领方针的改变,成了中国报界广泛评论的题目。5月份在中国的校园里,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几乎全让位给了抗议美国对日政策的新口号。美国大使馆觉得这场新风暴令人“莫名其妙”,于是得出结论:这场抗议实为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高尚的”攻击。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华法案》,授权于1948—49财政年度给予中国政府3.3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1.25亿美元的特别拨款。此时,美国人方才认识到,所有反对内战的人都谴责这种援助是一种企图,一种旨在支持怙恶不悛的蒋介石并延续其与共产党的争斗的企图。

但是,如果说学生们尚不完全明白是什么诱发了这种企图的话,那么到1948年,老一代知识分子却已全然明了。美国人支持蒋,并将继续支持下去,无论其统治有何缺点,原因就在于蒋是反共的。然而,单单经济援助尚不足以使其战胜主要敌手:唯有美国积极干预才能做这一点。国民党的坚定分子对此一清二楚,中国知识界亦复如此,人们无不在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人们是把美国的对日政策——美国人已十分有效地加以广泛宣传——放在日益发展的冷战环境中加以认识的,而冷战

对中国的最终和平而言,是比单纯扩大对国民党经援更大的威胁。事后回顾,认为一旦美国与共产主义势力之间开战,日本将成美国的基地,中国将成为战场这一基本忧虑,未出两年就接近成为事实——只不过中国士兵是在朝鲜而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作战而已。

学生的行动与官方的反应

新闻界和学术界讨论了这些问题,学生对此做出了反应,常见的活动应有尽有,讲座、讨论会、街头宣传、墙报,等等。5月4日,120所上海大中学校的代表在交通大学校园集会,建立了上海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其他城市的学生很快即加入这一抗议活动,一个类似的华北抗议组织于5月30日在北平成立。

学术界的情绪,反映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学术研究部于5月18、19日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940位学生和教职员作了回答。绝大多数人一致认为,日本法西斯业已复活,势必导致日本再次侵华。至于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此局面能有何作为,多数人的反应是,赞成动员全中国的社会舆论,反对美国的对日政策,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有力行动。

由复旦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一次类似民意测验,共调查了31,613人,结果相近。尤其令学生愤慨的是,一些报道称,海南岛的铁矿石正在出口日本,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已被委任为开发广东和海南岛经济资源顾问。

在北平,清华大学学生确定5月23日开始的一周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周。6月1日,上海高校的338名校长和教授联名致电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国务卿,抗议美国的对日政策。两天后,官方《中央日报》一篇比较温和的社论,要求公众区分由“身为共产党军事特务的职业学生”煽起的反美运动,与工商界、教育界

一些人对美国对日政策所持的真正置疑态度。它要求后一批人，让专家们去过问诸如何种工业发展水平将使日本军力恢复，以及维持日本民众生计需要何种发展水平的问题。该报告诚说，无论如何，反美运动必须结束。

与此同时，在华美国人也开始发言，其方式未能缓和紧张气氛。5月25、26和27日，美国人所办《上海大美晚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圣约翰大学的反美活动。该报提醒学生，他们的大学是在美国基金会资助下开办的，若非美国努力对日作战，他们现在不会在上海享有自由。美国驻沪总领事约翰·M·卡博特在5月30日阵亡将士追思仪式上，针对圣约翰的活动说，“（美国的）很多人会严厉驳斥说，通过为知识和理解而出力的美国人的慈善之心而受到教育的学生，靠美国农民的劳作和美国纳税人的慷慨为生的学生，不应该广为散布对美国的中伤之词。”

美国大使的一项声明同样招致了中国报界的一连串激烈反驳。6月4日，司徒雷登大使警告学生们说，当此美国正准备一项大力援助中国政府的新计划之际，反美运动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关于引发抗议的问题，他声言：“我倒要看一看，谁能拿出点滴证据证明日本军事力量的任何组成部分正在恢复之中，证明美国方面除了确保它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之外还有任何别的意图。”

考虑到学生在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一事上的情绪，这一威胁多少有些不恰当。有些人试图提出这样一种解释，即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司徒雷登大使是被迫发表这一讲话的。他们相信，假如他仍是燕京大学校长——他在1946年被任命为美国大使前一直担任此职达25年之久——司徒雷登博士绝不会发表如此不合时宜的议论。作为答复，北平高校的437位教授致函他们过去的同行司徒雷登博士，提出证据证明，美国确实正在恢复日

本的军事能力和重建日本而根本不顾及历史教训。历史告诫人们，中国将沦为牺牲品。〔45〕

起初，教育部次长表示了政府与司徒雷登大使声明一致的态度。但立法院长孙科颇有微词，指出以威胁的口吻教训中国人民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只会“敌对而非冰释”。广泛的舆论批评有增无已。最后连《中央日报》也在6月18日的一篇社论中表示，希望美国能认真审视其扶植日本的方针。

在这场反美运动中，过去学生示威特有的大游行比较少。学生们代之以重点进行教育活动，如街头宣传队、记者招待会，散发抗议书，配合以校园集会、罢课、漫画展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计划于6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大游行被严密的安全措施阻挠破坏了。那些成功绕过学校四周警察封锁线的学生发现，他们在外滩公园附近受到了上千警察、骑警及装甲车的阻拦，而游行队伍原计划从该处出发。6月9日，北平警察向游行学生开了枪，还用警棍和石头袭击他们。在昆明，6月17日游行期间发生的逮捕事件，引发了学生抗议，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

余 波

政府在日本复兴问题上对社会舆论的明显依顺，并没有减轻它对学生的不信任。8月18日，上海各中文报纸几乎都刊登了一篇中央社新闻稿，题为《共党特务煽动无辜学生制造学生动乱之无可辩驳的证据》。该文声称，此前的每一件“学生事端”都系共党特务所组织和领导。政府为通过振兴经济以恢复公众信心而作的最后一搏——紧急经济改革计划——于翌日开始。也是在8月19日，政府宣布特别刑事法庭将受理所谓的政治犯。该法庭立即开始发布逮捕令，捉拿被怀疑煽起最近示威浪潮的学生。著名周刊《观察》的编辑储安平，指责此举选在这一时机乃是旨在图谋争取社会的认可，以对付学生，其手段是在经济改革

措施之下实施之，同时打击不法商人和投机家，取悦于民。

最初传说将被捕和被传讯的学生名单含上海 300 余人，南京 300 人，北平 248 人，另外几个城市各几十人，包括武汉、广州、杭州、重庆、成都及青岛。共产党出版物后来称，1948 年秋季，单从上海一地逃往解放区的学生就数以百计。此说的精确性无法核实，但实际被捕或被传讯的学生要比起初报道所预料的少得多。^[46]到 9 月底，被捕学生人数上海为 80 至 90，南京大致 180，北平 100，昆明 80。其他城市的数字则不够确切。

调查审讯期限延长了。最初在上海抓人过了两个月后，没有对任何学生作正式指控。10 月 16 日，被捕学生家长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采取行动尽快结案。两天后，因缺乏证据释放了 40 名学生。另外 26 人被正式起诉。关于这些人，各不相同的报道说，大约 10 人被从轻判处两年或两年以下监禁，其余的人则被发现清白无辜，没有足够证据说明这些学生是共产党特务。此外，约 20 名学生无法被正式起诉，因为调查者发现他们的违法行为“不够严重”。然而，当局认为这些学生应在教养院蹲一段时间。不幸的是，上海没有这样的机构，只好把学生关进监狱。1949 年 1 月，司法部下令撤销了特别法庭，并释放了尚未判决的全部政治犯。

结 局

学生的抗议示威，显然对美国恢复日本经济的计划没起任何作用，但这场运动确实把中国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日本复兴的问题上。尽管没有做实质性努力，去抚平溢于言表的忧虑，但中央政府确也最终依从了公众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其表现就是 6 月 18 日的社论以及诸如此类的言论，以及前行政院长张群于夏末对东京所作的大为张扬的访问。返国途中，张群公布了他的发现：美国已解除了日本的武装，军国主义正在被清

除,等等。但批评者仍不信服。

另外,前一年所作的要不惜一切手段压倒学运的决定仍在执行中,政府的名声继续受到损害。由于政府指控说,所有的学生示威均由共产党特务组织和领导,其才智便遇到了报界的犀利挑战。这时对政府的共同批评是,其策略只会进一步疏远学生,并逼迫很多人转向共产党,而他们本来是不会这样做的。

学生运动与内战政治

人们在追溯学生运动的发展时,一向把焦点放在学生自身以及他们的目标、组织、活动和成果上。这些特征在与国民党当局的一系列冲突中融合了起来。其作用不仅是使学生阶层更坚决地反对政府,也使政府在其他社会阶层心目中丧失了信誉。尚需探讨的是,学生与内战双方的另一半——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为此,以下考察3个问题:一、共产党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看法;二、共产党对该运动的影响;三、比较学生对两大对抗政党所作的取向。

共产党对国统区学运的看法

较之政府的不妥协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对学运的立场可谓求实而灵活的范例。共产党人对学生示威者实际上持保留态度。毛泽东1939年的一次讲话在内战期间常被引用,它集中代表了党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一般态度: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这便是毛对他们的描绘。但他也承认他们能够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47]因此,共产党公开和秘密地鼓励学生运动,把它看作动员舆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手段。

虽然双方都继续依靠武力,把它当作确保各自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但只有共产党人似乎认识到,通过支持普遍的反战情绪可以获取政治资本。毛在“一二一运动”时指出共产党将采取的路线是:“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48]毛没有试图掩饰他支持和平运动的讲话中包含的政治动机。然而,这一支持方针代表了民主和集中这一对孪生原则的内涵,而它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是十分重要的。结果是以符合广泛和平要求的而不是嘲讽的措辞阐述了一项方针。

不过,该党对知识分子的保留态度仍未改变,尽管它鼓励学生的抗议运动。在一篇称赞昆明和其他地方学生反战斗争的文章中,《解放日报》的一位撰稿人就学生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几条建议。由于担心他们低估工农的重要性,他强调了工农对抗日战争所作贡献的重大意义。他指出,他们曾构成抗战和创建根据地斗争中最重要力量,并表示希望“你们将能与当地工农兵结合,彻底祛除你们胜过他们的想法”。^[49]

一年后,在评论北大学生遭强奸而引发的全国反美示威时,《解放日报》更直截了当地称赞了学生的努力,但仍不乏告诫之言:“你们应当珍视这段经历,加强你们的团结,更加坚信和平、独立和未来的民主斗争,并发扬你们的英勇精神。”^[50]

简而言之,内战期间共产党的政治信条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51]无论其弱点如何,毛把学生运动视为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先锋。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通讯社撰写的社论中,他阐述说:“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学生运动的高涨,不

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共产党人尽力处处利用政府的不幸,方法就是表示支持学生和其他阶层的抗议,并试图左右这些活动的方向。[52]

共产党人和其他方面对学运的影响

然而,应该如何对待国民党的具体指控,即在学生中间活动的地下共产党“特务”和“间谍”制造了学生抗议运动? [53]共产党当时的态度自然不明朗,但后来也公开称,党及其地下干部领导和组织了1945—49年期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4]可是有关这种领导的具体细节仍然罕见。

一位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多年后回忆说,共产党取得北平后不久,该校约50名地下工作者便公开了身份。一位妇女回忆说,和她一起担任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工作的好几名学生,解放后都亮出了共产党干部身份。一位男子后来声称,他在上海读大学期间已是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个事例,两名浙江大学学地理的新毕业生于1948年参加了福建省一所中学的教工队伍。其后不久,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一个民间舞蹈小组和一个歌唱小组。至少较年轻的学生中很多人甚至不明白,当时学唱的一些歌曲有亲共导向。[55]

1951年6月29日《解放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概括了交通大学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历史。该支部建立于20年代,1933年遭到破坏,1937年重新建立。1945年8月,它仅有12名成员,但它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起来。这个基层组织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尾声中,于1947年8月改组成总支部。[56]文章称,这个支部不仅在这所大学内组织了社会、学术及福利活动,而且实际指挥了交大学生在内战期间投入的所有示威活动。

文章还暗示,该支部控制了交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尤其是学

生组织负责人李俊良于 1948 年抗议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中加入了该党。1949 年初,北平和天津向共产党投降后,交大党组织为迎接上海的解放进行了大扩充。到 1949 年 4 月,已有 400 名交大学生被共产党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吸收。国民党在上海采取的最后行动之一,就是处决穆汉祥和史霄雯,前者是交大党总支委员,后者是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就在共产党军队进城前一个月的 4 月 26 日夜间,他们在校园遭到突击搜查时和大约 40 名同学一起被逮捕。[57]

最后,如果说 1947 年 6 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学联当时与共产党没有密切联系的话,那么不久后它就取得了这种联系。该联合会成立后不久即被迫转入地下,但据说总部一直在上海。这个总部于 1948 年底转移到了解放区,其负责人于 12 月中旬抵达石家庄。转移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筹备定于 3 月在北平召开的第 14 次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和正式重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与此同时,在上海保留了一个“办事处”,以便“推进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8]上海解放后不到 24 小时,上海学联就出来在城北和市心地区活动了。联合会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大公报》记者,上海的 300 所大学和中学中,约有 80 所曾与该联合会保持“经常的联系”——他没说明时间有多长——但其余学校仍然“比较落后”。该联合会的任务就是尽快与它们都建立联系。[59]

尽管有些粗略和自夸,这些回忆和谈话表明,国统区学生中间有地下党组织。随着共产党获胜的可能日趋明显,其成员人数必然剧增不已。但因缺乏更具实质性的资料,不可能对此类干部的总人数作任何估计。他们的任务颇为艰难危险。如我们所见,政府在学校自有学生眼线。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情报,多数大城市接连不断地发生逮捕学生积极分子的事情。被捕或遭绑架的学

生常常杳无音讯。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他们真共产党特务的身份,必以处决来惩罚。拷打是逼口供和线索的惯用手段。据一位提供情况者说,地下工作十分危险,投身其中的人须把重点放在收集情报、社交活动和散发煽动性传单上,其他学生则执行比较抛头露面的实际领导任务。因此,人们倾向于怀疑,在内战的多数时间,学生中间的共产党干部比较少,他们在活动中保持谨慎,恰到好处。

这使我们面临着更主要的问题:共产党人对抗议运动本身产生了什么影响?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学生,可能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样,北大史学会和清华的共产党员,可能影响了强奸事件引起的北平反美示威运动的发展。这两个较晚的抗议运动波及很广,影响甚大,很难确定共产党干部可能在哪方面实际“领导和组织了”运动。不过,共产党人可能在组建全国性学生组织的努力中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即便是在最初两次抗议中,一般学生的反应是直接和自发的,使“共产党煽动”这一责难几乎丧失了意义。这种责难的言下之意是,没有共产党地下煽动者存在,学生示威便不可能发展到那种实际程度。但是,鉴于运动中也有大量的非共产党学生领袖,以及四次大示威各自依托的广泛支持,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指控还暗示,其余学生是受到误导而去反对政府和内战的。但是,学生十分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并且承认他们不在乎共产党人正在倡导许多同样的事物。[60]

针对政府指责共产党在幕后操纵了最近的一系列内乱一事,美国大使在1948年2月5日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评论道,共产党插手这个问题主要是空谈。共产党人肯定对利用混乱感兴趣,但从每一事例来看,混乱归因于民众对政府不满,这种不满出自政府治理无方,以及它未能有效地设法消灾平怨。[61]

中国非官方消息灵通人士在谈论共产党插手学运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做出了与司徒雷登大使相似的结论，他们的评论使人们可以洞见政府的信誉扫地，也多少暗示了广大知识界对学运的态度。以下所述全部出自1948年4月至9月的报刊。

比较保守的论点之一出现在5月27日出版的《立报》上。回顾过去，既然政府中对付目前学生骚动的人自己以前曾参加学运，他们不以同情的眼光看待学生的活动便令人惊奇了。绝大部分学生是“纯洁和热情”的，只是出于对时局不满才参加反政府活动的。该报社论指出，学校里无疑有些共产党特务，接着也责备政府扶植自己的“职业学生”。它建议说，何不将其统统清除，然后增加政府的教育拨款，采纳进步的教育方针，摒弃官僚和政客管教育的体制。

4月15日的上海《大公报》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更倾向于把学生问题看成更大政局的反映。既然政府已决心粉碎共产党的起事，它本来很可以不让中共在学校开展活动的。但在对付学生骚动时，政府应当首先努力搞清它的性质，而不是错把一切归咎于共产党人。7月16日该报发表的一篇措辞更加强硬的社论称：“对青年动武的人，一概不懂他们的心理，亦不知教育为何物。视一切青年学生为（共）匪无异于逼其投向敌营。”

独立的北平刊物《新路》和上海期刊《中建评论》也表达了后一种观点。前者提出，既然年轻人有热情过度的倾向，若使用武力迫其改变他们遵循的路线，他们只会坚持下去。政府官员腐化堕落时，青年知识分子自然要抗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量的学生在为中共工作。^[62]《中建评论》宣称，政府当前对学生采取的强硬姿态，实际正中共产党人的下怀，因为它为他们创造了壮大队伍的最佳时机。^[63]

最后，赵超构在《观察》上撰文表示，战时敌对双方通常互派

秘密人员打入敌营,因而共产党特务完全有可能利用时局加剧学生骚动。不过,将单独制造和操纵政府如此惧怕的“学生闹事”的荣誉给这些人是不合情理的。假如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话,他们是在追随学生,而不是领导学生。8月18日中央通讯社电讯称,第一次学生骚动均系共产党特务所领导。针对此说,赵强调指出,人们要问,在困难条件下工作的敌特人员,何以会对学生产生如此之大的引导作用,而政府和教育当局却一直无以如法炮制。〔64〕

这些观点产生的共识是,共产党干部不应对学生抗议运动负责。现有的几件相关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政府终于释放了大多数在1947年5月和1948年夏末,在上海以共产党特务嫌疑犯罪名逮捕的学生积极分子。假如有任何证据,政府肯定会起诉他们,或确定其罪名成立。人们只能假定,在学生运动处于高潮阶段,要么上海的学校里没有什么共产党特务,要么这些特务大多成功地深藏在大批学生积极分子中间了。

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对学运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说应当在一个不同层面上寻觅他们的主要影响。不幸的是,同样仅有相关而不重要的证据。对3名男青年的审判为这种证据提供了一个事例,他们的罪名是在共产党人指导下在浙江大学密谋制造学生骚动。1947年10月25日夜,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于子三和一位同班同学及两位刚毕业于该校的朋友一起被逮捕。对他们提出的正式指控是,策划通过开垦营利性桃园,资助共产党闹事,以及密谋控制学生自治联合会,以便在该校煽动学生示威。当有传闻说,于已在狱中刑讯之下自尽身亡时,此案引起了轰动。〔65〕另3人被确定罪名成立,判处7年徒刑。被定罪之后,这些青年被官方说成是负罪“共匪”。

被控帮助共产党的学生几乎没有受到公开审判,但此案举

行了公审,而且把法庭审判的详细记录汇编登报。在指控被告的最重要的证据中,有那位死亡学生的供词,按有手印,但无签名,还有一个类似的声明,承认加给被告之一的罪名。法庭被告知,他曾拒绝签字认可这份文件。在法庭陈述时,3名被告否定了他们一直在中共指导下进行活动的指控。

按照他们的陈述和辩护人的发言,这些青年都是新潮社的成员,它与同名的共产党团体无任何关系。这个组织于1945年在浙江大学创立,1947年11月共有社员17名,都是农学院的农学专业学生。17人中有13人刚毕业,当时住在7个不同城市及台湾。该社每位社员都发誓献出月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管理桃园的基金。学生们是在展试身手,培育一些新栽种的、但三四年内不会结果的树种。该社还出版了一种墙报,只刊登论农业的文章,并已在该校注册。

这些学生与中共之间的唯一实质性联系,是他们被捕时搜出的一些书籍和小册子。他们承认小册子在社员中间传阅,要求社员就选读材料写出读书报告。其中有些系共产党出版,学生拥有的阅读材料中有些即是如此。被告坚称,所有材料都来自政府确认为合法的书店,有些书购自重庆。有指控说,他们在倡导共产党的学习方法,即读毕选读材料撰写报告。被告辩称,谁也没看过那些报告,社里的学习规划实际以一篇题为《哲学研究问题》的文章为基础。该文章发表在与共产党无关的一本学术刊物上。[66]

假定我们相信学生提供的事实,那么本案可能展示了比裁决的含义更合乎实际的画面,说明共产党对学生影响的性质。看来年轻人受到惩处可能是由于他们更喜欢读共产党的读物,而不是由于他们实际在共产党指导下搞了密谋活动。据该校一位以前的学生说,30年代浙江大学确有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也

可以推测这个组织 1947 年依然存在。同样，地下共产党员确实试图在学生中散发读物。然而，于子三案中展示的证据，无一表明被告真是共产党秘密特务。强行判决也不能使之成立。鉴于正式指控的严厉性，这些青年本有可能被判死刑——且无公审细节。当局显然为杀一儆百而公开了此案。但从表面上看，它不像一个旨在铲除浙江大学农学系与中共的秘密联系的举动。

不过，证据确实表明，学生对共产党的一套十分感兴趣，因此对其进行研究，虽然当时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被发现会有什么后果。国民党的领袖们，不相信学生运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立论是错误的。学生的抗议与延安广播或共产党报纸采取的路线常有相似之处，这无疑应归于共产党在声援学生反政府、反内战活动上所显示的政治敏锐，而不应归因于共产党对这些活动的影响。此外，内战本身在学生阶层内部产生了好奇心，他们想知道冲突的进展和反对派共产党的性质，而信息的匮乏只能加重这种好奇心。但正是在这些较明显的相互作用层面上——其表现方式是共同关切普遍承认的问题，以及对共产党的一套感到好奇——中共或许对此时的学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由于国民党领袖们坚称——并且明显坚信——一小批按战略需要而安插的共产党干部对学生示威负有责任，他们从不认真设法解释为何有如此众多的学生参加示威。假如政府这样做了的话，它本应千方百计弄清楚，为何自己的青年工作者未能争取大批的人支持战争和国民党。学生不满的加深和抗议的加剧似乎有若干原因。

学生阶层的高度政治化特性根植于中国学生前不久的经历，以及知识分子不仅以学术而且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角色。学生显然相信，他们能够动员社会舆论，以此迫使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的信念完全符合 1919 年“五四运动”及其以前形成的

20 世纪学生行动主义传统。

另外,较近的抗战经历,使学生适应了作为反战示威者的新角色。当北大、清华、南开及其他大学的学生向西南跋涉时,他们行进在抗日爱国战争的先锋队中。^[67]他们舍弃了家庭,以及中国一些顶尖高等学府的安逸生活。经历过这种背井离乡和颠沛不定的流亡生活——包括缺乏食品、住处、教育设施和每况愈下的教育标准——他们深切认识到漫长战争的艰难困苦。在评论抗战经历对学生的锤炼时,北平《京师日报》编辑余才友写道:“昨天的学生主张‘民主’,主张‘科学’,反‘帝’,反‘封建’,这理想到今天还没有改变……。不过,今天的学生的理想是通过了社会的磨炼的,他们的热情是通过了社会的冷压的。所以,今天的学生的言行是更结实,更坚定了。”^[68]

然而,内战期间学运最激进的利刃不是平津地区,那里的主要学府随政府迁到了西南,而是上海和南京,那里的大批学校和学生没有迁走。日本的占领给这些学生带来的是另一番经历:国民党在学校的影响土崩瓦解;国民政府还都带来的是混乱和觉醒;政府复兴教育的方针有失公允。尽管有学生行动主义传统,但反战和敌视国民党政府这两个补充主题,一定支撑了内战岁月里的学生示威。

到 1947 年,这两大主题已经聚合了内战造成的具体生计艰难问题和政府针对抗议运动采取的措施。国立教育体制和相应的政府干预学术生活,更加重了这种措施的施展。由于它们直接触及学生的生活,这些问题促使青年人采纳和遵循前辈知识分子的论点,因为后者估价了国民党统治的性质和全民族为维持它而必须付出的代价。^[69]

1947 年春,由于政府那倒霉的改革措施,京沪地区的经济灾难极为严重。^[70]不过,学生的生计艰难不仅包括通货膨胀和

经济失策造成的直接损失,还包括日趋有限的毕业后就业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大学培养最多的合格文科学生,尚能期盼相当安稳的教师或官吏职业。到战争结束,进而到1947年时,此类职业的薪金已降到了维持生存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在扶摇直上的工资费用和更多地区落入中共之手的双重影响下,工作岗位的数量本身正在减少。

1947年7月,估计北平应届高校毕业生中,三分之二无法找到工作,虽然工科学生仍略比文科或法科学生好些。一年后,交通大学的800名工程技术类毕业生中,没有几人抱有丝毫就业希望。以前,全国资源委员会吸收了许多交大毕业生。由于共产党人控制了东北和华北大部,该委员会到1948年夏已无空缺。^[71]由战争直接造成的生计艰难便成了个人问题,它使贯穿整个学生反战运动的“反饥饿”主题具备了现实性。战争产生的经济动荡,必定对学生的反战示威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72]

然而,同等重要的是,政府为控制学生而使用的方法。我们已经考察了最终造成学生不断疏远的过程。关于共产党操纵学生的假想,加上由此产生的方针,显然都产生了副作用,给政府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难题。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倒不是那些为逃避逮捕而逃到共区的人,因为他们人数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学生积极分子一律当成共产党嫌疑犯,因而产生更普遍的不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未必会造成一般学生的亲共,但它确实加剧了他们对政府的抵制。

学生一般无法辨别他们中间的真共产党特务,因为后者不敢表现出与一般学生积极分子截然不同。不过,他们同样因采取反映学生阶层普遍情绪的行动而受到威胁、殴打和逮捕。学生嘲笑政府的过度虚张声势,并且一再携手帮助列入黑名单的学生领袖逃跑,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

因此,政府对待学生时所犯关键错误之一,就是相信只要消灭他们中间的共产党煽动者,他们的抗议运动就会平息。〔73〕

政府“平定”学生的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主动承认有关抗议运动的确凿事实:它是自发性运动;刺激性问题是内战本身和政府的镇压策略;运动中最活跃的学生不同于国民党的青年工作者,是行动和思想意义上的真正学生领袖,他们代表了对战争的普遍厌恶和对国民党的普遍不满。

学生的政治态度

尽管学生和政府之间隔阂在加大,但除表面现象外,看不出学生究竟喜好何种政治抉择。例如,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学生运动中的言论无甚表露。缺少这个禁题的文献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试图估计共产党人在学生中实际获得多大支持,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把政治信仰转向共产党的意愿,那么这个问题便举足轻重了。毕竟,1947年5月示威过去数月后,毛的确认为,中共业已“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74〕这是合理准确的估价,或是毛在玩弄措辞?相互矛盾的各种报道表明,这个问题即便在当时也是外国观察家难以回答的。〔75〕

然而,1948年进行的两次学生民意测验,呈现了惊人相似的结论。其中一次于12月13日在上海大学进行,参加者约1,000人,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有。没有材料表明如何挑选受测者或测验者是什么人。测验结果发表在国民党报纸《东南日报》上。针对国共冲突这个问题,15.9%的人赞成把反共运动进行到底;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8.4%的人回答说中国应当分治;3.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76〕

对在美中国留学生进行的一项更系统的民意测验,结果与此相似。测验由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发起,于1948年三、四月

间举行,向当时在美国各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发出了约2,300份问卷。714名学生寄回了答卷,其中48%的人是1947年秋或其后到美国的,33%的人于1944年至1947年到美。他们对问卷上8个问题中的5个回答如下:[77]

问题一:您以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应作何改变(回答者的百分比,%)

无答案	2.4
耕者有其田	33.0
组织合作农庄	46.5
组织集体农庄	9.8
无须改变	6.6
其他	2.1

问题二:何为中国实现工业之最佳途径? (同上)

无答案	1.4
轻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国有化	6.8
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国有化	51.5
私营轻重工业和公用事业	4.9
公私合营轻重工业和公用事业	10.8
公私合营重工业和公用事业	14.2
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和合作制和国有化	0.9
合作制	9.5

问题三:我以为中国寻求和平的办法须是 (同上)

无答案	1.8
国民政府应消灭共产党	18.0
组建含中共、民盟、其他政党及无党派人士在内的联合政府	51.1
采用联邦制	17.9
将全国划分为独立的区域	3.2

由中共统治全国	2.7
让联合国裁决	1.1
其他	4.2
问题四:中国自由派现时应有何作为?	(同上)
无答案	3.9
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政府	15.3
以个人身份同共产党合作	3.0
组建新党并同政府合作	19.5
组建新党并同共产党合作	4.4
组建新党并采取独立的政治路线	39.7
不采取任何政治行动	9.9
其他	4.5
问题五:您以为中国近来举行的选举和颁布的宪法表明国家真正朝民主政府方向迈进了吗?	(同上)
无答案	1.7
是的	18.9
不是	49.0
未必	31.0

虽然这两次民意测验进行时条件有别,但结果却明显相近。赞成中国有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学生百分比,在上海的测验中是3.7,在美国的测验中为2.7。在政治天平的另一端,赞成政府消灭共产党的人分别为15.9%和18%。上海测验中赞成联合政府的为72%,比美国测验中的51%要高一些,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即后一测验为那些与两党都无义务关系的人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这些发现符合整个内战期间学运的首要主题。反战在人们

希冀国共共组联合政府的愿望中采取了肯定的形式。学生显然愿意按照他们的理解,接受这样一种政治后果,即他们提出的不在战场上见分晓的停战要求。故而当毛申明共产党人业已在政府控制的城市赢得了群众拥护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至少对学生阶层而言是如此。然而那种拥护是以一种有限信赖的形式出现的。不到五分之一的人赞成消灭中共;但赞成中共单独统治全国的人更少。共产党人对学生的潜在保留态度,似乎被学生的有限投入证明了其合理性。

另一方面,政府领导人既看不出,也不能接受这些微妙之处。他们也许已经十分正确地推测到,一般学生在思想上仍不接受共产主义原则。他们的失败更直接地源于其拒不承认普遍希望和平和政治改革的现实。不能把这一失败归咎于热情过度或目光短浅的下属。南京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无疑对官方处理学生示威的反应方式和性质负有责任。

再者,政府对学潮持不妥协态度表明了其更大的政治战略,这一战略似乎非要把国民党的群众基础缩小到最低点,而此时用毛的话来说,共产党正努力建立“由绝大多数人口组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政府孤注一掷,拒绝这仅剩的拥护,而这是学生及其他人愿意给予联合政府中潜在一方国民党的。另一方面,共产党不要求彻底效忠,因而得以利用人们对他们的一份善意。国民党在挥霍它的群众资本,共产党则因统一战线方针而获益匪浅。

注 释

[1] 除了当局在活动最激烈的学校安插眼线和特务外,同情政府的学生(尤其是三青团员)要组织和带领学生活动,参加学生选举,以及诸如

此类的活动。在多数学校,兴趣主要集中在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定期选举上,全体学生都参加这些组织。另一位提供资料者回忆起他在福建就读的中学亲政府的学生所处的困境。最聪明能干的学生领袖都批评政府和内战,并且总是在选举时得到多数学生的拥护。右派很少能控制学生会。(选自1969年春夏期间的采访录)关于三青团,见后注[29]。

[2]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毛选》第4卷,第135页。

[3] 关于“一二一运动”的这个概要叙述参考了以下著作:胡林(音):《一二一的回忆》,第1—70页;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第64—73页;《青年生活》第1卷,1948年12月第1期全文;杨叶编《中国学生运动的故事》,第23—33页;阿哲:《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简史》第108—123页;罗伯特·佩恩:《苏醒的中国》,第200—260页;1945年11月、12月和1946年1月的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2月和1946年1月的重庆《中国新闻评论》。

[4] 西南联大是3所北方大学——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战时的联合体,是为躲避日本人的占领而迁至西南的。这一名称一般简化为联大。

[5] 民主同盟始建于1941年(此时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译注),重组于1944年,二战结束时其成份如下:中国青年党、第三党、国家社会党(1946年改组为民主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以及许多非党派人士。这样一些各不相同的团体都批评国民党,渴望改良,虽说是温和的不革命的改良。民盟要求组织联合政府和结束内战,惹怒了政府,终于1947年10月遭禁,理由是据称与中共有关系。见钱端升:《中国的政府和政治》,第350—362页;范力沛:《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171—181页。

[6] 1945年11月21日重庆《和平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7] 在集会上讲话的教授为钱端升,他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受业于哈佛的政治学教授(有传闻说他是国民党员,其他人则认为他只在政府里担任了低级别职位),但他经常批评政府;当时与国家社会党有关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及潘大逵。第四位教授的身份不清楚。胡林所著书(第4

页)认为他是心直口快的左翼人士吴晗。但佩恩(《苏醒的中国》第203页)确认这第四位教授是比较保守的经济学家伍启元,他像钱教授一样,虽与国民党有关系,却经常批评之(见第二章注释5)。1945年11月29日,《新华日报》在一篇关于这次集会的长篇报道里也确认第四位演讲人为伍启元,该文系11月26日从昆明航寄的。据报道,他演讲的题目是《财经形势与内战之关系》,认为中国无力承受一场内战,因为国家的财政和经济结构将遭破坏,国家将丧失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机会。

[8] 实际存在两个特务组织,二者虽以各自的前身为基础,但都正式组建于1938年。至于神秘莫测的王先生的所属组织,材料不详。一个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另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后者常简称中统局。两个组织都在全国竞相操纵庞大的情报网,但最后都对蒋介石负责。它们各自的活动范围没有精确的划分,且时有重叠。至少在理论上,前者侧重于军事,后者侧重于民事,即国民党内外的经济、劳工、教育和文化事务。

主宰军统局的是黄埔系,更确切地说就是世人皆知的戴笠将军,他从1938年到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而丧生一直大权独揽。由右翼的陈氏兄弟(立夫和果夫)的CC派控制的国民党组织部则把持了另一个局。如同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这两个局的任务并不局限在搜集情报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二者都在日占区开展了特务活动。在国民党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时常把整个特工体系称作“蒋氏的盖世太保”。这反映了这两个局因之而最出名、最可畏的任务,即刺探、盯梢、恐吓及尽可能不让共产党嫌疑分子和国内的国民党政权批评者说话。戴笠死后,军统局进行了一番改组。但关于合并两个特务组织的命令却从未被执行,显然是主宰一切的派系怨恨起了作用。陈少校在其《金陵参剿记:黑网录》第5卷里大量详述了整个特务网。亦见后注31。有关国民党派系的更多情况,见参考书目关于《大公报》的历史的注释。

[9] 1945年12月6日重庆《中央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10] 1945年12月5日重庆《和平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11] 佩恩《苏醒的中国》,第221—222页;梁漱溟和周新民亦表示,李和关此时掌管该省政务;《李闻案件调查报告书》,第8页。

[12] 据1945年12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所刊12月6日由昆明航寄的通讯(12月10日《中国新闻评论》)。

[13] 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全文。

在重庆，所有反对党的代表都参加了悼念仪式，包括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民盟的代表梁漱溟、第三党的章伯钧和救国会的沈钧儒。其他参加者有郭沫若、罗隆基、柳亚子、张东荪、章乃器和李公朴(他本人于后一年夏天在昆明被暗杀)。

一二一事件也引发了报界的纷纷议论。1945年12月7日和12日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0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以及下述重庆报纸：12月4日《新民报》和《时事新报》，12月6日《商务日报》和12月7日《大公报》(见同期重庆《中国新闻评论》)。这些评论都同情学生，谴责地方军政当局的暴行，唯一的例外是《益世报》(1945年12月4日重庆)，它批评学生“在阴谋家挑唆下”选错了路。

[14] 关司令在会见罗伯特·佩恩时坚称，联大有这种人，但拿不出具体材料(《苏醒的中国》第214页)。一年后刊于《观察》上的一篇文章也坚持说，联大有共产党员，但未提供数目或身份详情。《西南联大任务完成化整为零》，载于1946年10月5日《观察》第17页。1973年，香港的一名左翼的知情者力称，联大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中有亲共学生。关于延安的声援，见1945年11月24、29、30日的《解放日报》，均为头版；1945年12月12日第4版。

[15] 1945年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16] 例如梁漱溟和周新民在他们的《李闻案件调查报告》里评论道，在龙云手下，不曾允许“各类秘密特工”像中央接管以后所做的那样任意行事，龙主席不太喜欢中央政府，故倾向于放纵批评中央政府的人(见前文注释11)。关于李闻案，亦见第5章注释27。

[17] 本节的叙述参考了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12—32页；《1948年手册》甲，第57—58页；胡恩泽：《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16—19页；瑟斯顿·格里格斯：《在华美国人：中国人的一些看法》，第7—14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第1—6页；延安《解放日报》，延安电台

广播(收入《参考消息》);以及一般中文报刊(收入国统区各大城市的《中国新闻评论》)。

[18] 见大事年表,1946年7月条。

[19] 《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94页。这一数字由1945年底的约113,000人的顶峰降了下来。

[20] 同上,第1卷,第225—229,311—312,354页;亦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远东中国卷,第527—721页。

[21] 事例见1946年10月5日上海《文汇报》和《新闻报》及1946年11月6日上海《大公报》(同日《中国新闻评论》);11月5日南京《新民报》和11月6日南京《中国日报》(同日《中国新闻评论》)。

[22] 一些综合数字显示了积极参加此次及以后示威的学生比例。在1947—1948年期间,北平有153,472名学生,其中18,332人读大专院校,39,524人读中专。国立北京大学拥有学生3,537名;1948年1月12日上海《申报》(《中国新闻评论》)。全国最大的学校之一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46年底有学生4,500名。教育部1946年底的全国统计数字显示,所有182所高校在校生共80,646人,教师18,094人。中学共有3,745所,学生1,163,116人,教师90,635人;1946年11月13日上海《申报》(《中国新闻评论》)。

[23] “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94页。

[24]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44页;O. 埃德蒙·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29页。

[25] 此处的叙述参考了:陈雷:《向炮口要饭吃》,第1—134页;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前引书,第33—89页;《1948年手册》甲58—61页;胡恩泽:前引书,第21—41页;王念昆:前引书,第82—86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131—190页。关于这一时期,亦见:上海《观察》;香港的《时代批评》;以及《中国新闻评论》各类报道所覆盖国统区城市的报刊。

[26] 1947年4月29日、30日上海《文汇报》(《中国新闻评论》);1947年4月29日、5月14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关于紧急

经济改良计划,见以下第4章。

[27] 例如,1947年度国家预算公布后不久《大公报》发表的一篇社论,见1946年12月24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28] 中国高等院校约有三分之二为国立学校。根据1947年的一篇报道,共有122所国立高等学府(中央办的有72所,省办的有50所);私立高等学校有58所。1947年7月10日天津《大公报》(7月11日《中国新闻评论》)。

[29] 三民主义青年团,通常简称三青团,作为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建立于1938年。初衷是要吸收青年加入国民党,故领导权操在老一代手中。该青年团的使命是专门在学校里推行国民党的方针,力图控制学生组织,结果使全国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站到了它的对立面。它在1947年9月不再作为一个正式的自主团体存在,当时它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余波中并入了国民党。见钱端升:《政府与政治》,第126—128页;并见后文注36。

[30] 组建青年军的计划公布于1944年,它由9个精锐师组成,人员均是大专院校和中学学生及毕业生志愿者。该军于二次大战末期组建成。中国学生无服役义务,故有必要使之成为一支志愿部队。

[31] 多年后,李宗仁称这是事实,他在北平只起傀儡作用。当李于1945年秋接任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一职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对重庆飞来的接收人员行使监督权。他对戴笠的秘密特务组织尤为恼火,认为它对许多非法拘捕和残杀多名师范院校学生负有责任。按照李的说法,戴只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戴的秘密警察在北平的头目马汉三在戴的亲自指挥下开展工作。李宗仁:《李宗仁将军回忆录》,第43章,第1—5页,18—23页。

[32] 对学生活动和政府的压制措施,报界给予了密切关注。最不懈怠的就是《大公报》天津版,它不同于上海的姐妹版,公开支持1947年5月的学生示威。实行新闻检查之前,该报已发表至少14篇支持学生的社论、3篇专稿以及关于外地学运发展和北方全面情势的快讯。主持上海版的该报主编王芸生此时正在北方旅行。5月15、16和17日,他在北京、清华和燕京大学作了演讲。他在天津作了至少6次演讲(还与天津大公报编辑部同仁开了两次内部会议)。在南开大学,他勉励学生们把运动扩大到工商界去。一位持同情态度的观察者认为,该报的正直立场和王芸生的态度,

对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平津地区 1947 年 5 月的学生示威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见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1947 年 6 月 21 日《观察》,第 20 页。

不过,人们察觉了王芸生不在上海这一情况。他的朋友,《观察》的编者储安平教授严厉指责《大公报》未对学生持较明确的支持态度。他认为,如若王不曾离城外出,撰写社论之事不落入较为保守的人之手,则该报不会犯下这样的过错。见其《论文汇、新民、联合晚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1947 年 5 月 31 日《观察》,第 5—7 页。

[33] 陈雷,前引书,第 25—26 页。

[34] 北平美国领事馆,1949 年 2 月 3 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35] 尽管政府责成其立即解散的命令,联合会确曾试图公开活动。当年夏季一些城市展开的声援学生的运动即是以联合会的名义进行的。此外,北平声援运动的名誉顾问是北京、清华和燕京大学校长。虽然市政府官员宣布它为非法活动,但却未能做出一致努力,遏止声援运动。北平募集了约 5 亿新法币,分发给约 1500 位困难学生。华北学联未曾遭禁,不过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的学生不断受到了警方的骚扰。

[36] 1947 年 9 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改组并与国民党合并时,国民党设立青年部来协调青年工作。这显然是试图使国民党的青年工作更加有效,并使之在 1947 年 5 月的示威和当时对三青团的批评加剧之后稍微收敛锋芒。张长村:《开除、解聘、保送》,1947 年 10 月 16 日《时代批评》,第 31 页。

[37] 关于政府试图控制学生运动的叙述依据 1947 年下半年的新闻报道;张长村的《开除……》,1947 年 10 月 16 日的《时代批评》,第 31 页;文琪:《张长村讲“南行见闻”》,1947 年 9 月 16 日《时代批评》,第 23—24 页;郝稼:《中大学生自治运动的新阶段》,1948 年 5 月 1 日《观察》,第 16—17 页。

[38] 在 3 篇犀利的社论中,《观察》的编辑储安平对学生表示声援,对他们遭到暴力表示哀痛,对政府引发这场示威加以指责:1947 年 5 月 24 日《观察》第 3—4 页;5 月 31 日《观察》第 3—4 页,5—7 页。

[39] 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前引书,第 69—74 页。这个

饶有趣味的评价报告发表于1948年,虽然多少有点松散,但却包含了对北方运动缺点的长篇批评——同时也指出很多缺点已得到克服。会议过多,冗长乏味。领导脱离普通学生,以至很多人对正在发生的事颇不理解。例如,很多人不懂得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与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之间的区别。北平5月18日的街头宣传活动准备得不充分。因此,当一支宣传队遭到青年军攻击时,其他宣传队没得到消息,故未能避开该地。还有,北平学生对士兵和警察的态度是错误的,与南京学生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宣传“书生气”十足,侈谈战争如何将百姓口粮变成了军粮。这激怒了士兵和警察,引发了不必要的暴力。报告告诫说,恰当的态度应当是,学生不与应征入伍和须以此为生的人争执;真正的斗争对象是统治者。

[40] 这场反美示威和前面的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概述取材于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201—208页;胡恩泽:前引书,第41—56页;《1949年手册》下,第112—118页;阿哲(音):前引书第158—173页;《中国白皮书》,第一卷,第276—277页,387—390页和第二卷第869—871页,901—919页;同时期《观察》;以及覆盖主要国统区城市报纸的《中国新闻评论》。

[41] 观察特约记者:《北平学生又被捕》,1948年2月28日《观察》,第19、18页。水刑中有硬把水管推进犯人的喉咙里的做法。肚子胀起后,会有人踩上去,直到水被从嘴或肛门挤出来为止。在用老虎凳审讯时,受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双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然后会把重物放到双膝上,直到关节向反面弯曲为止。据说中国警察是从日本人那里学到这些办法的(根据提供资料者的说法)。

[42] 见第2章,注释8。

[43] 王芸生:《麦克阿瑟手中的石头》,《国讯》周刊(由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出版)第433号,1947年10月16日上海《大公报》重刊(10月24日《中国新闻评论》)。

[44] 有关该集团及其与《大公报》关系的详情,见书目注释。

[45] 1948年6月13日上海《新民晚报》(6月14日《中国新闻评论》)。

[46] 在内战岁月里,始终有大量关于好心朋友和教授帮助上黑名

单的学生逃脱警方魔爪的报道。这些学生中确有若干人逃到了共产党那边。事实上,每个人似乎都知道某人逃往共区,不愿甘冒被国民党警察逮捕的风险。传教士教育家拉尔夫·莱珀伍德讲述了一个典型的故事,他于1948年夏重返燕京大学。当警方在8月加强对学生的监视时,走漏的消息说,有38名燕京学生上了黑名单。由于该大学代理校长阻止警察进入宿舍,这38人才得以逃走。据讲述者本人所知,他的朋友刘适(音)身为列入黑名单的学生领袖和基督徒,在校园藏身3天后逃到了附近的共区。(拉尔夫和南茜·莱珀伍德:《中国革命历经记》,第37—38页。)

[47]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选》第2卷,第322页。

[48] 毛泽东:《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选》第4卷,第78页。共产党人用“民主运动”这一术语指国统区发生的所有群众抗议活动。这包括学生和其他阶层举行的反战示威以及针对国民党统治的其他各色各样的抗议。例如,1945年下半年重庆、成都和昆明发生的几个事件,包括学生抗议政府和学校当局的学术方针,延安把它概括为“国民党压制下的学生民主运动”。1945年11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第3页。

[49] 1945年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第4页。

[50] 1947年1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第1页。

[51]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选》第4卷,第170页。

[52] 有关该党对学生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讨论,见第6章和第9章。

[53] 这是台湾仍在正式和非正式提出的一项指控。见猝发性侦破调查处编:《共匪学运工作的剖析》全文;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册,第552—558页。

[54] 王念昆:前引书;胡恩泽:前引书。

[55] 直到两年后,约20名学生在国立台湾大学因唱其中一首名为《歌唱春之至》的歌而遭到逮捕,一位学生才明白。春天来临的概念长期被用来象征一个新社会 and 新中国。但在这首歌里,它也被共产党人用来象征他们的胜利(这些回忆出自1969年春夏期间进行的采访)。

[56] 根据1945年的中共章程,总支可以建在拥有50名或更多党员的村上,建在拥有100名或更多党员的工厂、机关或学校。不过,这并不一

定表示当时交大有 100 名中共党员，因为该章程中规定的组织规则可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加以变通。见 1945 年中共章程第 50 条和 54 条。该章程的英文译本见彼得·S·H·唐：《今天的共产党中国：年表和文献补遗》（纽约：普莱吉尔公司，1958 年）。

[57] 出自华东人民出版社编《战斗成立壮大》中一篇重印文章，第 86—100 页。据报道，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间，共产党活动的套路相近。例如，一位作家能在 1948 年威斯康星大学的 150 名中国学生中点出两名共产党员的名字（罗伯特·洛口述，汉弗莱·伊文斯整理，《逃离红色中国》，第 35 页）。

[58] 北平美国领事馆，1949 年 2 月 3 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讯。

[59] 1949 年 5 月 28 日上海《大公报》；1949 年 5 月 29 日北平普通话广播（5 月 31 日《每日报道》）。

[60] 佩恩：《苏醒的中国》，第 222 页。

[61] 《中国白皮书》第 2 册，第 842 页。

[62] 1948 年 8 月 28 日北平《新路》（9 月 17 日上海《中国新闻评论》）。

[63] 1948 年 9 月 25 日上海《中建评论》（9 月 17 日上海《中国新闻评论》）。

[64] 1948 年 9 月 4 日《观察》第 3 页。张志让教授在 1948 年 9 月 18 日《观察》第 3 页上发表了相似的观点。

[65] 有关此案这一情况的背景，在萧扬的《浙大学生被捕惨死案》中有所描述，1947 年 11 月 8 日《观察》，第 16 页。

[66] 于子三案广为报界所报道。此处的叙述参考了：1947 年 11 月 2 日上海《大公报》（11 月 3 日《中国新闻评论》）；11 月 21 日上海《中央日报》（《中国新闻评论》）；11 月 20 日上海《新闻报》（11 月 21 日《中国新闻评论》）；1948 年 1 月 8 日上海《新闻报》（《中国新闻评论》）。

[67] 关于这一时期，见约翰·伊斯雷尔：《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7》，第 5 章和第 6 章。

[68] 余才友：《谈今天的学生》，1948 年 4 月 24 日《观察》第 17 页。

[69] 这些论点出现在整个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报刊上。老一代人

对国民党统治,包括政府干涉学术事务的评价,将在以下第5章中作概要叙述。

[70] 即使它们可能确实影响了所述时期学生运动的发展,日本占领和1947年春季期间的经济混乱也不足以解释上海青年比较强烈的激进主义。既然1949年后这一现象也出现在党内知识分子中间,那么原因一定深植于上海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中。它们可能与上海作为全国主要工业中心的地位相关,但真正的答案还有待于更加细致的分析。

[71] 1947年7月19日上海《申报》(《中国新闻评论》)和1948年6月5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72] 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敏感的答案,见费孝通:《没有安排好的道路》,1947年5月3日《观察》,第6—7页;又见1947年7月10日天津《大公报》(7月11日《中国新闻评论》)。

[73] 鲍大可对国民党组织部和有势力的CC派首领陈立夫的采访表明了导致逮捕学生的那种推论。显然,政府领导人授权逮捕,不只是一要吓唬学生,也是真地相信,如果“真”共产党员能被抓到,运动就能被控制住(《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50页)。

[74]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选》第4卷,第170页。

[75] 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在1948年3月告诉鲍大可,北大学生中至少50%同情中共,认为它比国民党“好”。不过此前不久,司徒雷登大使告诉鲍大可说,90%到95%的学生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尽管他承认说,有同样比例的学生反对政府(《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46—47页)。蒂尔曼·杜尔丁在1948年年中估计,北平大学生中70%的人“支持”中共,但一年前只有约半数的人这样做(1948年6月20日《纽约时报》)。

[76] 1948年12月24日上海《东南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77] 这项民意测验的结果刊载于1948年7月17日《观察》第8—9页。

第四章 经济弊政的政治代价

在内战的岁月，通货膨胀是城市生活的最突出特征。由于其作用十分严重而深刻，其表现方式又使每个市民有切肤之感，因而通货膨胀动摇公众对国民党统治能力所抱的信念，远比其他任何问题厉害。

通货膨胀始于抗战期间，当时政府赖以生存的来自沿海城市的主要财源被切断了。国民岁入不足以维持战事所需，政府转而依靠印钞厂作为弥补赤字的主要手段。

诸如田赋征实，以低于市场价征购、征借粮食之类的措施，均不足以弥补收支亏空。1942年至1944年，不包括银行信贷，政府收入达到政府总支出的五分之二至二分之一。而支出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1945年，这种收入仅占总支出的二分之一。

局失去了城市中等工薪阶层,这个阶层承受了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主要负担。尽管研究中国通胀的经济学家们一不剖析深刻的政治含义,二不细道他们的结论,却提出一种看法,即由通胀造成的该阶层的贫困化进一步削弱了对国民党的支持,加速了它的最终垮台。〔2〕

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构成城市中的少数,他们是教授和教师、军官及政府公务员。但除了知识界以外,这些阶层最不可能以具有政治意味的方式表达对国民党的幻灭。至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确是国统区反内战运动的首要根源,而且经济问题引发了该运动的主题之一。然而,正如第五章将要指明的,知识分子疏远政府及对政府反共战争的抵制,事出有因,考虑良多,通胀造成的贫困只是其中之一。再者,直到国民党在战场上败局已定时,知识界才实际上不再拥护它。而且也无任何迹象表明,一般军官、公务员有何不同。因此,很难孤立地探究在这些中等收入阶层中,通货膨胀与政府丧失拥护之间有何直接关联。

不过,当人们以不太模棱两可的辞语界定“拥护”时,就损失而言,政府付出了比较明显的多方面代价:公职人员越发腐败无能、政府遭到市民其他阶层的冷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工人、厂方及全社会拒不服从政府法令,不配合其改革措施,一再藐视政府的权威。尽管政府把这些措施归纳为反共战争的必备特点,人们依然故我。层出不穷的事例表明,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生的群众对政府应付经济恶化能力失去信任,是政府未能使人心归顺的根本原因。

工人运动的重振

工人骚动与通胀压力之间的直接关联不难确定。不管可能有什么其他相关变量,似乎可以保险地下个结论,政府在二战后未能如战前一样控制住劳工,通货膨胀至少是原因之一。当然,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促使工人频频“不顺从”,并且直接形成了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可以发动一场不受政府制约的运动。

背 景

国民党在1927年上台当政之时,曾开展过一场有系统的运动,以取得对工人运动的控制。20年代期间共产党身处组织工运的前沿,那些年月工运发展迅速。^[3]至1927年,中国工业中心已有大约300万有组织的工人。出于对共产党力量的恐惧,蒋介石中断了国共合作,并着手清除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1927年春,国民党首次采取强硬手段镇压工会,^[4]其后又通过官方倡办和监督一切工会活动,以巩固其胜利。接管工会的头目们,与其说忠于工人,毋宁说效忠国民党。工会实际成了“官办”组织。1929年10月,一部《工会法》把工会一切活动悉数置于政府监督之下。^[5]在各工会和工厂内部,国民党的工人组织者——常常与管理部门一道工作——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均以分裂和驭驾工人力量为目的。在工人中间,因地区或职业不同,同厂或同行业里可以组织多个团体。同一企业中的体力工人和非体力工人不准加入同一工会。有时工人被按工资水平等硬性划分。这些团体之间利益冲突加剧,坐山观虎斗更其容易。

破坏罢工是另一有用的策略。用看似失业的工人帮伙破坏罢工,办法就是提供工人取代罢工工人干活。由上海黑社会头子

杜月笙及其门生陆京士组织的那些帮会就是其例。各种办法失灵时,也使用武装力量。〔6〕

借助于 30 年代的经济萧条,国民党政府成功地牢牢掌握住有组织的工人,用的就是这些办法。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遭到禁止并转入地下,一直存在到 1931 年。这一年共产党放弃了努力,不再维持国民党统治区城市的独立工会组织。〔7〕不过,1927 年,仍有零星罢工的工潮发生,致使一位观察家预言道:“一有时机,中国工人将立刻表明,他们没有丧失有效地组织自己的能力。”〔8〕

1937—1938 年日本对中国主要工业中心的占领,打断了政府与工人的“特殊”关系。身处重庆战时大本营的政府仍然能与沦陷区的工人组织保持一定的秘密联系,全靠特务头子戴笠、杜月笙等人的努力。但国民党控制工人的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此外,这场战争给了共产党一个机会,使之得以在日占区若干重要企业重建和加强其地下交通线。这种情况发生在上海,其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在邻近的苏南、苏北和浙东发展扩大。北方和香港也发生了这种情况。〔9〕

与此同时,在内地的政府一边动员工人抗战,一边竭力保持对工人的控制。中国劳动协会与其说是工会联合会,毋宁说是个服务组织,它始建于 1935 年,日本入侵后随政府迁往西南。1940 年,该组织及所有劳工事务均纳入了社会部管辖范围。1943 年的一部新《国家工会法》,重申了社会部对所有工会的主宰。中国劳动协会到 1946 年为止,一直是正式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并被国际劳工组织承认为中国工人的代表。估计会员有 60 万到 100 万人的解放区所有工会名义上也隶属中国劳动协会,这是抗战岁月国共统一战线的反映。

恢复时期：强硬路线办法失灵

日本投降后，政府重新占领沿海城市，着手重建自己的工人组织。然而，国民党工运干部得以完成其任务之前，工人已开始对第二章中叙述的国民党接收所造成的局面作出反应，1945年末1946年初，成千上万的工人投入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支付足够的解雇费或者调整工资。这些罢工和怠工大都违反了官方确定的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工人在诉诸罢工行动前，须先行告知其要求，并请求调解或仲裁。^[10]

这场工潮的直接原因有两个方面。如前所示，失业队伍在1945年8月后迅速壮大。这个难题很快因物价暴涨而趋于复杂了。日本投降不久，内地和沿海物价同时暴跌。在重庆，批发价指数从8月份的179,500(1937年为100)下降到10月份的118,417。在上海，按法币与伪币的官方兑换率以法币计算，指数由8月份的43,200下降至9月份的34,508，但到11月份，物价已开始再度攀升，在上海扶摇直上，在内地则稍许比较平缓。12月份，上海批发价指数为88,544。^[11]趋势上扬，终止无望，因此工人作出了相应的反应。1936年，就在日本入侵前夕，全国罢工和工潮记录为278次。1946年，仅上海一地，罢工和工潮就达1,716次。^[12]

起初，政府采取了强硬路线，因此公私产业都普遍抵制了工人的调资要求。上海市长宣布，工人的要求如若超过资方的能力，则应予以拒绝。他还威胁，假如工人违反“合法程序”举行罢工的话，将使用武力。与此同时，当局也采用了破坏罢工的策略，办法与20年代和30年代(且不久也将用于对付示威学生)用来对付工人的手法如出一辙。流氓帮伙与当地警察及其他执法人员协同行动，对工人进行袭击。官员们指控说，工人骚动是共产党人煽动的结果，是这些人唆使工人提出了无理要求。

1946年1月的上海电力公司罢工,典型地标志着当时工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的挑战性。1月23日,来自该公司三大分公司的约3000雇员举行罢工,抗议解雇一批工人代表,这些人一直积极发起提出工人的要求。罢工持续了9天,波及上海最大的工厂和百货公司。1月31日,便衣人员和保安队围住了杨树浦发电厂各个大门。该厂在罢工伊始已被工人占据。一群妇女开始在大门外吵嚷,要她们的丈夫回家过年。当大门打开让妇女们进厂时,警察冲将进去,殴打工人,并把其余的人赶离了厂区。由于工人被勒令将其要求付诸调解,他们便中断了供电。工人代表与调解者在市府社会局举行的谈判不得不在烛光下进行。

其他工人没有被吓倒,他们组织了一次抗议示威,声援电力公司罢工。2月4日,以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和其他五个公用事业公司为首的40个上海工会,约100名代表举行集会,对上海电力公司工人表示同情。翌日,在上海总工会办公室举行了一次类似的会议。上海总工会是由政府倡办的市工会联合会。与会者超过200人,代表着70多个不同企业和行业的工会组织。会议表示完全支持上海电力公司工人。上海总工会主席周学湘宣称,电力公司工人用自己的斗争为全体工人树立了榜样。他希望该市的其他工会予以声援,使罢工工人的要求得到满足。[13]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破产

1946年初,政府的强硬方针显然不足以控制工人骚动,特别是当时政府创办的工会,干部们的言谈开始更像工人的真正代表,而不太像理应为之效劳的政府的代表。1946年4月产生了新方针,它将代表内战余下时期政府对工人的态度。不同于对学生的不妥协态度,政府现在对工人摆出一种较为灵活的姿态,一方面继续努力削弱和压制工人运动,一方面试图通过承认工人主要要求的合法性而安抚工人。新指标规定,工人的月工资以

其战前(1936年)工资为基数,乘以现时生活费用指数。另外,基础工资水平的确定,意在通过与二战前待遇作比较而改善一般工人的境遇。非熟练工人的基本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1936年的工资,后者的基本工资则有了相应的增长。

同时,为了置工人于社会部严格控制之下,还制订了新规定。4月24日,行政院颁布政令,要求将一切劳资纠纷交付政府主办的仲裁机构。仲裁之前,工人不得罢工,资方不得关厂。仲裁委员会将由9至15位委员组成,多数应为政府代表。政府声称,为了防止共产党人利用合法经济利益煽动工人闹事,这些步骤是必要的。这种论点在亲政府报纸上公诸于众,社会部长到上海访问,都是为大力倡行对工人的新方针而开展的活动。^[14]新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宣布,他的政府将采取行动,尽快平息纠纷,但罢工工人及其领袖将受到惩处。

中国劳动协会的消亡

在政府重新控制工人的计划中,一个重要成功是打破了中国劳动协会不断增长的独立性。对付中国劳动协会的步骤是逐步地、一以贯之地采取的,其最终目标并非立刻一目了然。行动方式与学生反战运动期间所采取的大致一样:起初,由地方官员采取行动,明显与中央政府的方针有矛盾。不过,随着中央正式采取地方当局一开始即采取的立场,这一矛盾便及时化解了。

1946年8月6日,大约有200名武装警察和重庆总工会人员占据了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办事处及其3个隶属机构——工人俱乐部、工人医院和工人文化宫。该联合会20余名工作人员被抓进了监狱。

翌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重庆总工会发言人指责中国劳动协会官员腐化堕落、管理不善;煽动工人罢工;卷入政治活动。发言人一面拒绝出示有关这些指控的证据,一面继续声称,重庆总工

会是重庆 30 万工人的合法组织,因此有资格接管中国劳动协会会的办事处和机构。他们声称得到了重庆市政府的批准,并扬言重庆总工会打算呼吁全社会都来清除各地的中国劳动协会办事处。〔15〕当月晚些时候,河南省政府勒令中国劳动协会开封办事处停止一切活动,将办事处和工人医院、工人食堂一起移交给当地总工会。

随后,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和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在牯岭避暑别墅受到蒋介石召见。朱在 9 月 12 日返回上海时宣布,事情已经解决,蒋主席下令恢复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办事处及其机构,被押工作人员将获保释。翌日,其中 19 人获释,但其余 3 人仍被拘禁。不过,9 月末,南京社会部向各省政府社会厅下达了以下命令:

中国劳动协会、中国劳工促进会、中国福利会、劳工问题研究会以及其他团体均为工人组织,其宗旨或在促进工人福利,或在研究劳工问题。然据报近期彼等团体一直从事违反政府命令和规定之活动,组织工人,煽动罢工。本部要求,任何业已向有关地方当局登记之工人团体……均应严格遵守政府法令,不得从事组织工人之活动,不得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有关当局应严密监视此等组织之举动,以防阻碍各地工会之发展。〔16〕

事情显然没有解决。中央政府已经公布重庆和开封地方当局的行为为合法行动。朱和中国劳动协会秘书长不久即被迫递交了辞呈,采用的办法是“改组”该会。11 月 10 日,朱取道香港飞往巴黎,参加世界工会联盟执委会会议。在港逗留期间,他受了重伤:一辆汽车撞上了他乘坐的人力车。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这一“车祸”是在英国殖民地的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企图。朱从欧洲返回时,未前往上海,而是去了解放区。与此同时,政府于 1947 年 3 月宣布,省级和全国总工会正在筹建中。此后,全国总工会将取代中国劳

动协会,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工人。〔17〕时至夏末,政府公布,江苏、浙江、广东和湖北省级工会已经成立。〔18〕

中国劳动协会事件仍然颇为神秘莫测,据说引起了各界的“巨大震惊”,因为朱学范是国民党党员,长期拥护政府的劳工政策。〔19〕作为青帮的一员和杜月笙的门生,朱学范于20年代在上海从一名邮政职员开始自己的生涯。参加邮政事业后不久,他即开始和他的朋友陆京士一起活动,成为上海邮政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加入杜月笙门庭后,朱迅速擢升,于1928年被委任为国民党创立的上海总工会主席。

事实上,早自1944年春起,朱与国民党政府的裂隙就一直在扩大。当时,在重庆组建了中国工人福利委员会。朱学范未能跻身最早名列这个新组织的理事会的政府官员、社会活动家及工人领袖行列。1945年5月1日,福利会召开首次会议,约2,000名工人举行了抗议。朱被召到社会部,受到警告说中国劳动协会必须服从该部的指示。随后被责令签署一份《悔过书》,但他拒不签字。〔20〕

突然出现两个不同的工人组织,都由政府创立,负有相同使命,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朱及其组织的独立性与日俱增而必然产生的。这一演变背后的细节从未公开。但考虑到后来出现的情况,朱学范代表的利益似乎是他最初想帮助加以限制的利益。当他倾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呼声时,他发现自己总是在代表工人游说政府,而不是相反。一位同时代的观察家认为,国内外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都是朱转变立场的缘由。一方面令他恼怒的是国际上批评中国劳动协会为政府控制的组织不代表中国工人。〔21〕另一方面,尽管可能出于他个人的权欲,他却渴望充当一位真正的工人领袖,1943年以后国统区经济的每下愈况使这一角色更加恰如其分了。〔22〕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朱很快即开始公开站在自由主义立场

上谈论一些问题,抨击政府的做法。1945年8月初,他给《大美晚报》重庆版写去一封同情信,该版当时因批评国民党而遭到临时查封。在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23]中国劳动协会拒绝附和国民党右翼分子纠集的约170个团体,未请愿抵制审议中的自由派议案之一。不过,当中国劳动协会的名字被列入反对团体时,该会干部向重庆各报发出了公开信,否认自己与请愿有牵连。

最后,政协闭会时,中国劳动协会发表了它的全部要求,包括实现基本人权;组成联合政府;铲除内战根源;耕者有其田;取消限制工人权利的规定,并修改《工会法》;罢工和劳资谈判权;根据生活费用指数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确保工人生计。^[24]

由于这个赞成工人要求的公开声明,中国劳动协会终于毫不含糊地铸就了自己作为工人代言人的角色。国民党最持久的拥护者之一发生这种转变,清楚地预示战后工运将开始一个新历程。朱学范叛变的内幕可能依旧无法弄清,^[25]但就整个工运而言,随着战后经济状况的转变,政府的控制努力屡遭挫折,政府再也无法保持它在日本入侵前10年间对工人队伍的控制了。

控制工人的其他尝试

以总工会取代中国劳动协会只是这一时期多种举动之一。政府控制工人队伍的努力摊子越大,败得越惨。

上海市社会局于1947年修改规定,允许拥有10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组建厂工会。规定鼓励这种小工会加入行业工会。由一个区内不同行业的多个小工会组成的区工会拟改组成厂工会和行业工会,其目标是打破区工会中工人的坚强团结。在区工会管辖下,一厂的工潮常常迅速扩散,波及邻近的工人。^[26]1947年10月,上海市社会局召集的一次工会官员会议决定,应在年终前加快厂工会的建立,完成区工会的改组。^[27]

截止到8月底,已有约50万上海工人加入453个工会(293个产业工会和160个行业工会),另有25个工会正在组建之中。产业工会工人达到293,600人,其中近半数加入了该市的74个纺织工会。在行业工会中,交通运输工人达86,200人,规模最大;修理工和建筑工达43,125人。^[28]所有这些工会均从属于上海总工会。天津的情况相似,6万人会工人全部加入了受政府监管的市工人联合会。

除官方建立的工会外,政府一如战前之所为,运用其他的组织控制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在青工中间建立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支部;设法尽可能多吸引工人,尤其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让其进入国民党操纵的各类团体和协会。在上海,陆京士的旧工人组织现在直接受陈立夫和吴开先领导,构成了工人福利委员会这一最重要组织形式的基础。工人救助会的抱负则不那么大,它是政府官员在工人中间组织起来的,领导人为齐园圃(音)和吴光远(音)。此外,1948年8月实行第二次紧急经济改革计划时,在工人中间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务团,以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志愿调查大队实施该计划。

在上海,工人福利会投入了范围广泛的活动。其他城市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虽然实施的广度不得而知。在上海,会员被派到各区和各厂去招兵买马,主要功夫花在工人队伍上层人物身上,如工头、办事人员、工会负责人以及较年轻的积极分子。周学湘恢复了他在烟草工人中的势力范围。他就此振兴和扩展了他的战前组织——励社,并利用它创建了烟草工人福利会。他以这种方式组织了200多人,清一色为该市烟厂工会负责人。这些人又开展了更广泛的组织工作,目的是吸收工人进入国民党和护工队。护工队在上海广为组建,通常由工人福利会干部负责。

按南京中央干训学院的方式,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社会工作

人员培训班。进入这个培训班的工人须先行加入国民党。一俟训练结束,全部被委任为工人福利会的一、二、三级干部。在较为重要的工厂——即那些工人最活跃的工厂,该会派其“书记”进入工会,观察工会领袖和工人的活动。在许多工厂,该会还安插暗探和调查组,负责搜集有关工人中左翼人物的情报,开列黑名单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

最后,还有若干其他工人组织,均与政府有不同的关系。这些包括三青团组织的晓风社、军方操控的协一社、南京“某些权威”操纵的兴盛社和兴中学会。其中有的是小而严密的团体,其余则更具互助会性质,会员来路很广。国民党在组织上花了如此大的功夫,以致在工人特别活跃的企业——大隆机器厂,据说有10个左右各不相同的亲政府团体和会社。〔29〕

然而,它们的数量未必能说明它们在工人中间获得的支持。根据解放后的一个资料,国民党的护工队人选按预先列出的名单敲定,而名单上的工人不能发表意见。反对者会被指控为亲共分子。工人有时也受骗加入这种团体。这种情况发生在多名纺织女工身上,她们以为自己参加的是个社团,交上会费却没有用心看看收据上的抬头。后来得知自己参加了三青团,她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有些工人有意识地参加了这些组织,希望藉此保住自己的工作。其他人被告知,如果他们参加组织,将不被征兵入伍,或者如果他们所在工厂举行罢工,他们不会被捕,或者他们将成为厂里的重要人物,可以获准携带武器。在编入护工队的1,500名上海工人中,最多只有几百人可以算作“骨干分子”。同一资料归纳认为,尽管此时花了这些功夫,国民党却“永远无法在上海工人中间扎根,也不能牢牢把握住他们”。〔30〕

政府的努力屡屡受挫

无论这一特定估价含有何种偏见,它与当时的许多其他估

价并无天壤之别。^[31]政府控制的成功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代表熟练工人的工会一般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代表非熟练和文盲工人的工会独立性则略少。最强有力的工会是邮电、交通和公用事业工会。这些工会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表现出独立性，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而且总是置身工潮的前沿。这种独立性的一个事例表现在1947年2月，当时上海市社会局规定，从那时起，邮政业雇员应相互担保行为举止，举报工友的“可疑”举动。雇员一致拒绝服从规定。^[32]另一事例是，上海电信工人要求与邮政工人拿同样的工资。这一要求于1947年5月遭到拒绝，他们便罢工了。广东、广西、杭州、西安、北平及天津的电信工人分别采取行动，以不同方式声援上海同行。^[33]

政府的控制方式因工会而异，在上海总体上不如在外地那样成功，而工会的普遍趋势是进行独立的工会活动，公开批评政府的劳工政策，无视政府法令，领导层支持群众的要求。这样，在天津，地方当局组织的市工会联合会首次会议通过了若干决议，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反对政府。会议代表产生于工会的选举，监督选举的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市社会局以及该工人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34]会议决定，警方和司法部门不应干预工潮，应由主管当局予以解决，还决定呼吁中央政府严格限制对日贸易（这种贸易已经行政院原则同意）；会议对天津市社会局表示不满，因为它对多家旅馆和饭店因解雇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而引起的劳资纠纷久拖不决。会议还要求当局采取行动，对付那些解雇组织守法工会工人的雇主。^[35]

官方统计数字确实表明，1946年5月以后，罢工次数陡降，3月份曾高达60次，至6月份只有9次。这一低水平一直维持到11月份，主要是由于作出了按生活费用增长水平限定工资的决定。但是，尽管罢工次数有所减少，工潮次数却基本保持在原

来的水平上,月平均数超过100次。

大多数消息来源倾向于接受政府的说法,即工人整体上情况比抗战前要好,战前中国工人在亚洲位于收入最低之列。不过,虽则政府自诩工资水平上调了,但有几位评论者同意工人代言人的说法,工人的生活标准未必已有提高。工资从来不能跟上物价的涨幅,因为实际生活费用通常高于官方编制的生活费用指数所表示的水平。

1946年5月2日《大公报》一篇文章的作者指出,上海工人仍面临五大难题。他专写那些工资与生活费用指数挂钩的人们,即上海主要行业 and 企业的工人们。(一)住房严重短缺。(二)医疗费高于一般工人的支付能力。(三)教育设施不足,收费过高,使多数人沦为文盲。(四)缺少幼儿日托,对做母亲的女工不利。(五)工人无力对付大幅度通胀,因为拿到当月工资时,他们买不起全部必需品,也担不起把钱放着,任其贬值的后果。

衰退、失业及工潮

正如许多评论者也认识到的那样,决定按生活费用增长水平限定工资,是治标不治本。不对货币贬值这一基本问题下手,机械地调整工资,只会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进而使物价上涨,造成形势的恶化。批评者警告说,在此过程中,部分企业将被迫停产歇业,工人将丢掉饭碗。[36]

其实,这就是发生的一切。恶性通胀和失业增加不幸交织一起,向城市经济生活袭来,为持续不断的工人骚动提供了一片沃土。工人已不再像1946年夏秋时那样公开违禁,举行罢工,而是采用其他办法,使人们感受到他们的要求。他们投入了消极怠工。电车司机让乘客免费乘车。酒吧侍者免费为顾客服务。这些行动的目标不是要增加工资,而是要求资方减少工作时间、减少解雇和支付解雇费。[37]

这类要求反映了1946年下半年的商业颓势。由于本国产品受到洋货低价销售的冲击,单单上海就有数以百计的厂家和商家宣告破产倒闭。变通办法就是以减产裁员来降低成本。据一项估计,1946年年底该市的失业人数共计25万,[38]全市人口为390万。[39]

这一衰退—失业循环也不限于上海一地。全国各地都处于衰退之中。据报道,广州1946年底失业者为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在1,152,408居民中有228,038人失业。[40]经营失败司空见惯。结果,广州市社会局不得不应付有增无已的工潮。[41]在天津,据说仅一周之内便有20家商店宣告破产,纷纷加入1946年最后几周倒闭的其他250家商店的行列。北平社会局报告说,1946年1月至10月,停业的商店有1600家。同样,在汉口,据称1946年中已知关门的商店、商行数以千计,近10万人丢掉了工作。在南京,当年年底失业人数估计为20万,约为65万居民的十分之三。[42]

12月份,上海的罢工次数再度增加——高于日本投降以来任何一个月,政府无力阻止。导火索似乎是上海市社会局针对工人骚动作出的一项规定,骚动的原因则是传统的年终奖。该局宣布,除上一年度未赢利的企业外,雇主应发放这种奖金。雇主们自然钻了这个空子,工人则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但是,1946年底,工人骚动达到了高潮,还只是1947年事件迭起的前奏。照上海市社会局的说法,该年度罢工和工潮次数达2,538起,是上海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43]

紧急改革和工人骚动

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因奖金和年终工资而引起的大量纠纷,因政府在2月16日宣布了一项紧急经济改革计划而暂告中止。全部工资都冻结在1月份的水平上,基本商品限定最

高价格——这些商品是大米、面粉、棉纱和棉布、燃料、盐、糖及食油。政府还计划向工厂配给商品，以便工厂按固定价格向雇员分发。另外，南京和上海的政府雇员及国立学校教员将得到商品供给。如若成功，此举将扩大到其他城市。这项计划严禁私人买卖和储藏黄金及外汇。政府还宣布采取措施，制止越来越多的资本从中国各大城市抽逃香港。

鉴于通胀率迅速攀升及其基本原因，这一控制部分价格体制的崩溃是可预期的，尤其因为它只在大城市实行。同一般物价一样，生产成本继续增加，而只有基本商品的市价仍固定不变。产地的米价很快就高过了大米上市城市的价位。原棉价格的上涨使纺织厂变得无利可图。煤矿和食油厂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大米短缺在4月下旬进一步加剧，部分原因在于运输困难和政府征用军粮。但短缺最严重的地方恰恰是紧急措施实行最力的城市，即京沪地区。暴民冲抢了米店，骚动还殃及油店和棉纱店。发生骚动的城市有无锡、芜湖、成都、绍兴、上海、杭州、宣城、合肥、滁县、南京和苏州。

紧急措施只全面实施了约1个月时间。到3月中旬，事情已经明了，难以实行在全国范围向公教人员发放供给品的计划。4月初，美元黑市出现，其后不久大多数基本商品也在黑市出现。政府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工厂分配计划向工人拨发基本必需品，便决定按本应配给商品的价值向每位工人支付一笔补助金。工人抱怨说，他们生计无着，因为工资补贴只够购买有限的必需品，而其他各种开销都在不断增加。5月，上海的批发价指数上升54%，相比之下，实行改革措施前的月增幅为19%。^[44]

工人只好再次示威，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屈从工人的要求。近4月底，罢工、怠工和抗议次数与日倍增——同时，1947年春学潮又起。工人的具体要求因企业而异，

有些要求调整工资,其他的则要求补贴全部食品支出,等等。不过,基本目标是不要冻结工资,再次要求工资与生活费用指数挂钩。上海工人的抗议在“五一”节达到高潮。数千劳动者参加了政府主办的集会,当市长和上海总工会及社会局负责人试图另作阐释时,他们大声疾呼,要求放开生活费用指数。〔45〕随后几天连续发生一系列工人示威游行,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也在扩大势头。

最后,在工人骚动和米市崩溃的双重压力之下,政府正式放弃了全部紧急改革措施。因无力兑现工资补偿计划,政府宣布以后将按生活费用指数的月升降率付给工人工资。大多数企业家反对这种自动调资,并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态度日甚一日。同时,政府得到的只有耻辱——它公布了一项改革计划,非但一事无成,状况依旧,而且雪上加霜,把局面搞得较原先还乱。

临近1947年年终,由于实际购买力普遍下降,生产成本有增无已和需求减少同时造成了工业大幅度减产。这一自1946年开始的趋势的明显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据南京发表的全国统计数字,1947年上半年内,七大工业中心的工潮中,约45%是由解雇工人引发的。〔46〕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界继续迫切要求工资谈判权。由于普遍失业和贫困农村人口不断涌入,使雇主得益。稳定增加的劳动力储备抑制了多种职业的工资,抵消着有组织的工人力争改善待遇的骚动。〔47〕但就其潜在破坏性而言,后者的力量如此之大,政府已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先满足雇主和企业家的要求了。

1947年7月,在中央政府宣布全面动员进行战争的情况下,罢工再次遭到禁止。但禁令又一次未能丝毫减轻工人要求造成的压力。一位分析家以当时的个人见闻写道,工人阶级的经济负担越发沉重难当,以致市政府警告说,再次改变自动调资制度

“在政治上不可行”。^[48]当局代之以玩弄生活费用指数这样的权宜之计。工人的反应是,要求公布每月计算数字的方法。1948

远,因为共产党刚在苏北发起决定性的淮海战役。

3. 大隆机器厂 这里的党支部建于1944年,据报道,它曾在1945年8月工厂关闭时领导斗争,要求日本人支付解雇费,还在接收时期生产停滞的数月中领导争取救济金的斗争。至1946年2月该厂开始恢复生产时,该党支部已经成为中坚力量,开展了一场运动,把沪西地区全体工人纳入统一的工人组织。该厂有多名党员在内战岁月里被捕。据说一名国民党劳工负责人曾说,如能降服大隆机器厂,就可能控制住整个沪西的工人骚动。该厂一名工会领导人、党员顾亮在共产党胜利后成为上海市劳动局第一办公室主任。[52]

4. 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 这个工会是上海最富进取性的工会之一。党支部在日本占领时期始终存在。1945年,可以说该支部拥有约200名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在其他方面,他们渗透了公司内部国民党撑腰的各个团体。这些积极分子中最“英勇”者之一是一位不到30岁,名叫朱俊欣的青年。他终于受到国民党警察的监视,被迫逃往了解放区。解放后,他回到了上海,重新作为工人积极分子在那里工作。[53]

5. 申新九厂 据说党支部在该厂1948年1月的罢工中起了主要作用。政府诉诸武力镇压罢工并归罪于共产党人时,这场罢工成了上海头号新闻。[54]全厂7000工人都卷入了罢工,他们要求厂方向全体雇员定量供应煤和米,当时其他一些企业是这样做的。党员的作用不是煽起罢工,而是在它扩大时加以引导。厂方曾拒绝工人的最初要求,而工会领导人未表现出进一步施压求成的意向。这时党支部勉励雇员继续罢工。党员还组成了一支宣传队、几支巡查队,以监督设备和原料的保护。

2月2日是罢工的第四天,清早3000军警便包围了这座已被工人设障自卫的工厂。警察一攻击,工人即起而自卫,从房顶扔下石头、

桌椅、油桶及铁棍，还在一处用工厂的卡车堵住了一辆装甲车的路。人们认出，当天勇斗警察的头领是4个党员。〔55〕

6. 上海电力公司 自1925年起，党的基层组织一直存在，据说领导了前述上海电力公司工人1946年1月的罢工。那次罢工的结果是党支部增加了15名成员。政府企图在1947年9月的富通事件中搞垮电力工人工会。警方于9月19日晚袭击了富通印刷所，公开借口是该所为中共在上海的宣传机关。15名店员遭到逮捕，同时被抓的还有上海电力公司工会的6名成员，他们正在校对该工会文化组即将出版的一期工人刊物。〔56〕

四天后，该公司三大分公司的2,000名工人多数都涌到了社会局，并在那里滞留8小时，同时工人代表则为解救他们的同志而进行谈判。社会局随后勒令该工会暂停一切活动，等候改组。此外，该局命令电力公司开除其他29名雇员，他们被警备司令部怀疑为共产党特务。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后又下令逮捕了这29人，“以一劳永逸地根除祸患”。〔57〕针对这一事态，法商电车公司工人举行罢工，不久英商电车公司、多家纱厂和机器厂的工人纷纷效仿。209名工会干部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抗议罢工。抗议罢工持续了数天，反映了全市对被捕工人的普遍同情。

富通印刷所确系上海的一个“中共地下印刷所”。〔58〕这一事件导致许多工运积极分子逃离上海，前往解放区。另外，电力公司工会干部兼上海电力工人工会主席王孝和遭到逮捕，被上海特别刑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被处决。〔59〕后有披露说，王孝和是一名党员。〔60〕

7. 上海的最大百货公司 其中之一的永安公司，早在1937年就成立了党支部。日本投降后，这个基层组织和其他商店的支部一起，共同组建了三区百货业工会，这些商店有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及中国国货公司。这个工会的活动有增加医疗

和应急借款以及会员子女的教育借款。该工会还设立了6个小图书馆、一个戏班子、两支乐队、一支有300名歌手的合唱队，还经常举办讲座和讨论会。(1947年)“二九”事件是这一时期工人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的另一起著名冲突，当时该工会在100多家商店共有会员4,500人。事件发生时，有一大帮身份不明的人手持木棒、铁棍，冲散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委会成立大会。该委员会由中国国货公司发起，是该公司创立14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并由三区百货业工会主办。

购买国货运动原先由中央政府发动，1946年11月宣布对进口货实行暂时限制，以图促进收支平衡。政府还增加了对新工业生产的信贷，宣布了旨在鼓励出口的措施。按照这一方针，全国总商会发动了一场购买国货运动，各省商会纷纷响应。在上海，市参议会发表公开声明，号召群众购买国货，不买洋货。^[61]

碰巧，12月底和1947年1月抗议所谓美国水兵强奸北大女生的学生示威与国货运动汇合，使之更具反美基调。这使政府在对美关系上感到尴尬，而一些美国商人已经就进口限制提出了抗议。于是，一家亲政府的报纸报道称，“怀抱野心的政客”正企图变合法推销国货运动为一场反美抵制活动。^[62]再者，爱抵会筹委会成立大会本当听取郭沫若和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言，二人均是直言批评国民党政权的著名左翼人士。

2月9日星期六上午，聚集一堂出席会议的数百名工会会员中，10人受了重伤，包括永安公司鞋品部雇员梁仁达，他因肋骨受伤而丧命。一般推测，这次攻击系特务和秘密警察雇人所为。^[63]不出所料，它的后果只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就是一股新的抗议浪潮。这次，资方站到了雇员一边。上海一些最大商行的代表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购买国货运动，支持雇员享有集会权。^[64]或许是由于梁仁达之死引起的公愤，当局等待数月之

后才对百货业工会采取最后步骤。尔后,9月30日,至少9名会员和工会干部被捕,包括理事长陈施君。社会局同时勒令该工会暂停一切活动,等候改组,理由是“该工会相当数量之负责官员已通匪党,且频繁图谋在本市制造混乱。。”[65]

据后来披露,年龄30多岁的青年陈施君曾任职中国国货公司广告部,那时已是党员。该工会里的其他能干的党员有永安公司陶器部员工丁盛雅和韩武成。[66]

有了这一具体确凿的证据,这时国民党当局所作的其他一些指控就比较可信了。其中有朱松茂的“悔过”,据说他是领导京沪地区工运的地下党领导人之一。他于1948年6月7日在无锡火车站被捕。根据一家政府控制的报纸刊登的供词,在该地区执行各类任务的地下共产党特务约有800人。[67]

另一项指控涉及天津地区的共产党地下活动。从1947年12月3日到1948年2月18日,该地有83名嫌疑分子被捕。其中40人因证据不足获释,但43人被移交给了天津警备司令部。天津共产党地下工人组织的许多领导成员据说是在这时被捕的,其中有李万川和张毓川。被怀疑为该市地下活动负责人的余达生于12月某日逃往解放区,但其妻子留了下来,加入了被捕者行列。据对他们的指控,被捕者曾参与向共区运送给养,在天津制造工人骚动和扩大共产党的宣传。[68]

如同学运一样,共产党地下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无法控制工人骚动,其程度难以估量。共产党的鼓动很可能在一些罢工和工潮中起了决定作用。但随着罢工和工潮增多至成千上万起,并得到大批工人支持,这一证据就难保结论的正确无误,即劳工战线上的所有骚动都归功于共产党人。当然,如同学生一样,工人经常受到十分直截了当的告诫,说他们正在被政府的死敌所利用。和学生一样,工人既不相信,也不在乎,全力倾注于迫

切实现自己的要求。此外，政府对工人的经济要求有妥协的倾向，这表明国民党领袖们也承认，这些要求不是蓄谋的结果，而是工人骚动的基本原因。

这样，40年代末的上海工人运动似乎可以典型地说明一种情形，即共产党人的作用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现象。难题和困苦无需制造：它们业已产生，客观存在，任何人只要有意，都可随时加以利用，这些难题和便于利用的氛围都源自以下因素的合力作用：（一）日本的占领，它有效地切断了国民党对工人的控制；（二）二战结束时工人有一种明显的预期，即胜利会带来好日子；（三）战后因失控的通胀和工商业紧缩而造成经济混乱的现实。最终结果是，劳动大军越发具有独立性，多次以不同方式拒绝响应政府的号召，不配合与支持政府对共产党的斗争。

经济弊政与公众信心的丧失

政治上同等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破坏了公众对国民党统治能力所抱的信心。这又阻碍了政府为减轻通胀压力而作的努力。它导致了政治性紧缩的急转直下和改革的流产，与工资和物价的上升趋势适成反比。只要政府把印钞厂当作主要岁入来源，那么落实工资——物价冻结、货币改革以及诸如此类的努力就只能起短期治标的作用，充其量只是把通胀的最大危害减到最低程度。可是，这样的措施多半构想不当，实行起来三心二意，且受到置疑公众的冷遇。在此情况下，它们全然变成了不利条件——不仅不能达到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使形势恶化，而不是如愿改善。新闻记者和作家们在撰文猜疑政府“试验加错误”的经济方针，不同阶层的公众则以更具体的方

式表明他们的信心不足。

急剧下降

1946年,受物价上涨为害最深的行业是依赖外国市场和必须与倾销到国内市场的洋货竞争的行业。首先受外国竞争危害的行业有制药、造纸、水泥和烟草业,甚赖海外市场的缫丝业和丝织业亦是如此。

1946年岁末将至,政府调整了汇率,还采取其他措施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但面对通胀造成的种种难题,这些措施一事无成。生产商面对的是:实际购买力普遍下降导致需求减少;高工资;利率提高;燃料、水电及运输费用有增无已;购销税和生产税不断增加。^[69]诚如所见,时至1947年末,这些情况终于造成工业普遍减产,同时城市大部分居民实际购买力急剧下降。首先感到这种普遍减缩的是丝织、橡胶制品、水泥及烟草业;其次是内衣、化妆品、火柴及毛纺业;最后是棉纺业本身。^[70]

政府的不幸在于,它必须切实为所有这些难题和其他许多问题承担主要责任。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基本的通胀财政政策;其次因为未充分努力使混乱局面恢复一定的秩序。例如,货币政策一直在扩大与暂停信贷之间徘徊不定。不现实的官方利率促使地下货币市场扩大,因而增加了可供投机者利用的资金供应量。政府1946年给上海米商的一笔贷款,显然通过与官方串通被米商们用于投机倒把,结果导致米价进一步上涨。^[71]

政府在努力增加岁入的过程中,允许不合理的税制继续存在,它对商品、商业经营等课以繁多的、常常是过高的税金,但却丝毫不曾触及投机者和奸商的个人收入。此外,政府的外贸政策造成了贸易逆差,损害了本国生产商,这种情况只是因1946年11月的改革稍有改善而已。^[72]

人们还容易指责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尝试中,只鼓励官

僚资本主义的成长,也就是由高级政府官员——在任的或刚卸任的——及其社会关系所控制的企业。这些人利用他们与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关系获取外汇,进口商品,得到普通企业家得不到的其他优惠。〔73〕

经验告诉人们,撤回支持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一旦如此,则难以指望公众会支持政府的改革努力。从企业家变成的投机家,到宁可花钱买金戒指也不存银行的店员,公众只对经济生活的现实作出反应。这样,当政府在1947年上半年出售债券时,资本家不愿意购买。被问及即将在昆明出售的新债券时,工商界和金融界中人无不退避三舍。他们说,过去吃过这种债券的亏,不“细心盘算”就再次冒险认购是不明智之举。〔74〕

到1947年,已有迹象表明,公众越发不愿把钱存进银行。更安全的办法包括购买金银和汇往香港。人们公开藐视私人银行利率不得高于中央银行批准利率的规定,反映了内战大多时间里官方和黑市利率间很大的差距。除很有限的时期外,政府未能成功地遏制银行自身或其他机构的黑市交易。

当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比用于生产更有利可图时,人们便这样去投资。把资本用于投机并非新现象:抗战时它已成为一个问题。随着内战时期通胀后果加重,这类活动的刺激因素有增无已——一方面增加着生产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扩大着投机的机会。后者包括:买进、卖出和囤积商品;在证券市场投机倒把;投资于黄金和外汇;以黑市利率放债。

确实,机会似乎是无限的。例如,1946年年底,政府向生产企业放贷,帮助它们应付工人索要新年奖金的要求。不过,一些观察家坚持认为,贷款立即引起股市行情上涨。罪恶的根源不是缺少金钱。数以亿计的钱闲置不用,或者被汇往香港。人们知道,一些商人拥有大笔资金,却不愿投之于自己的企业,这些企业的

利润不如投机倒把获利丰厚。〔75〕

以下代表了出现在报端(包括国民党报纸)的观点,描述了商业界的活动:

商人无法推卸对糟糕的经济形势负有的一份责任。首先,他们未能改变对经营的态度和方针……他们继续以高利率借用大笔款子,用以买进商品、金条、美钞、政府债券、股票,希冀着通胀会转瞬即逝,使他们得以抛售存货,支付利息,仍可收获巨额利润。很多人赚取了颇多利润,其他人则在市场背向时纷纷破产;加剧了银行和商业的失败。〔76〕

生意不佳未必对生意人不好。因缺少足够的资料,不能下结论认为,无论个人还是团体,商人和工业家从通胀中获益实不亚于较常规的经营。但通胀提供了广阔的范围和大量的刺激,只要愿意,任何人都能把最少的资本投向投机,许多人宁愿这样,而不理会官方和其他方面要他们“改变其经营方针”的请求。这些请求后面并无收税员和警方检查官接踵而至——这一不幸的疏漏表明了最终该由何人承担责任。

1948年8月:最后一搏

政府内战期间的所有政策和计划中,1947年2月和1948年8月公布的紧急经济改革措施是最具抱负和广为宣传的两项,目的是稳定经济。正因如此,一旦失败,它们也对政府最具破坏性。1947年改革的主要弱点前已略述,不必重复。第二次失败代价更高,不仅因为1948年所致力目标更加全面,而且正如国民党领袖自己承认的,也是由于这是最后的机会。政府无法诉诸其他手段,以稳定经济并恢复公众的信心。〔77〕然而,从一开始,1948年改革计划就明显不能成功,因为它包含了导致1947年尝试失败的同样缺陷。因而,这个新方案无法激发公众的信心与合作,而这两者是成功所必需的。

紧急财经措施公布于8月19日。一种新货币登台亮相。新金圆券与旧币的比率定为1:3,000,000,新币的总发行量限定为20亿金圆券。罢工和抗议示威再度遭禁。8月19日后,未经政府事先批准,严禁增加工资和提高物价。金银和外汇——作为抵御通胀的屏障,全都成了投资的对象——将通过兑换金圆券而转入政府手中。

其他措施包括增加商品税,提高官方外汇兑换率,控制信贷,降低利率及限制囤积。政府任命了3名高级官员,在华北、华中及华南督导紧急改革措施的执行。他们是在华北的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在华中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南方的广东省省长宋子文。^[78]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受命全权负责落实上海一地的紧急措施。

对改革计划的怀疑几乎转瞬之间就见诸报端,且执行情况一明了,怀疑便更加坚定了。第一个引火烧身的措施是冻结工资。批评者指出,工资和物价各地不一,8月19日的数字未必能代表各种情况下的最合理水平。尽管对授权增加有规定,但对这一规定的刻板诠释将重新导致1947年冻结工资、物价造成的混乱。^[79]

招致谴责的第二点是任何人都须将金银和外汇兑换成金圆券,而在海外拥有3000美元资财以上的人仅需作资产登记。在国外拥有资产不到此数的人甚至无须申报。^[80]自由派周刊《时与文》刊登的一篇文章尤为直言不讳。文章评论道,紧急改革背后的基本原则是以“换汤不换药”的传统方式维持现状。没有采取措施纠正财富分配不公。薪金和工资被冻结,抽逃国外的资本却安然无恙。黄金和外汇(多为富人持有)官价之高,等甚或高于黑市行价,但白银(由贫困阶层持有)价却大大低于黑市价。此外,增加的商品税只会损害合法工商业,并不可避免地波及消费

者——给低收入群体加上另一重负。与此同时，富人的收入和财产仍不纳税。〔81〕

最后，早期的批评家们指出，改革计划中没有什么能有力扭转政府的基本财政局面。唯一能对付继续通胀的真正保证是某种平衡预算。假定继续保持军费及其他开支的水平，而不增加政府岁入和全面增产，便无从实现较为平衡的预算。不拔除通胀的根源，很难指望以更换货币的办法稳定经济。〔82〕

事情很快清楚了，不论改革计划有何缺陷，最急迫的问题只能在于实施计划的性质本身，因为紧急措施只在上海市内严格地实行。蒋经国的热情奔走全力以赴，反映了政府的认识，这是最后的机会，如能力克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全国各地大约会迎刃而解。

围绕着蒋经国在上海的活动，宣传达到了顶点。他被刻画成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走遍全市稠密居民区，捕捉并惩罚最有势力的投机者和奸商。一时间，蒋氏的“打虎”在上海人民中间得到了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自己是从小通胀中渔利的贪婪商人的牺牲品。3000多这样的人，包括一些沪上头面人物，被关进了监狱。政府竭力要最终证明自己言行一致，执行紧急措施没有例外的人。不过，随着改革计划开始显露缺陷，不到一个月，对蒋经国浮夸做法的热情已开始变为讥讽。

截止到8月28日，中央银行已向社会发行3000万金圆券，以兑换金银和外汇。但没有出台任何措施，吸引——或者强迫——所有这些闲置资本流入生产或者至少是非贬值渠道。〔83〕这在任何情况下均非易事，因为公众对新币已无足够信心，已无从开展一场运动，告诉人们储蓄合算。〔84〕

更严重的是威胁上海的外部压力，原因在于未能在全国范围成功地统一执行计划。在上海施行强力确实很快产生了一些

结果。物价稳住了,并且稳定了约6周时间。然而,无需精通经济便可懂得,如果全国各地情况不改进,上海不可能长时间不受其影响。^[85]不过,这一不测显然已被南京的经济规划者忽略。由于各地未坚决实行冻结,物价继续居高不下。

到9月底,上海已开始成为一个经济孤岛。商人预感到物价控制终将打破,不是收紧预定输往该市的供货,便是把货物运往他处。调运的大米在城外遭到愿出高价的商人阻劫,他们出价高于上海市场通行价。在囤积已被视为犯法的情况下,粮食库存已经减少,原料的补充更加困难。一些面粉厂减了产。上海电力公司向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当时该公司月需煤量的一半以上已经没有了着落。

一些依靠进口原料的企业发现,由于进口成本增加,成品的最高限价低于生产成本。例如,有一种等级的棉纱,最高限价定为每包707金圆券。但由于原棉不能以限价的底价购进,棉纱厂商每生产一包棉纱就要亏损70金圆券。^[86]政府未作任何规定,以处理上海市的持续补给、必需商品配给或维持生产成本与商品的价格之间的可行比率。^[87]

雪上加霜的是,10月1日有消息披露,政府为掩盖预算赤字,已另外发行2.2亿金圆券。钞票发行量已达到8月宣布的最高限额20亿金圆的50%。世人无不领会这则消息的意味。公众的信心受到每下愈况的东北和山东战局的进一步动摇。政府军于9月下旬丢掉了山东省省会济南。

较为棘手的难题,最后打破上海表面平静的事件似乎微不足道。10月1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包括烟酒在内的7种商品的税率。上海各烟店无不关门停业,请求获准提高售价,以抵增税造成的支出,政府准予提价,于是,10月3日烟店重新开门营业,标价翻了一倍,^[88]这似乎证实了人们对政府冻结物价能力

的怀疑，马上刮起了抢购风。人们想方设法把现钞变成商品，以防意料中的新币贬值。众人争先恐后，乘价格尚在底线时大购其物。店主担心无力补充库存，便开始缩短营业时间，或把商品撤下柜台。完全拒绝营业的店家不乏其例。黑市卷土重来，据说“行商”正在将大批商品转移出城。^[89]一般人的资本在变成商品，较富裕、更精明的人则把资金抽逃往诸如台湾、广州、四川和香港这样的安全港。^[90]

蒋经国试图力挽狂澜，但完全徒劳。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招募了数千名工人，于9月中旬建队，协助落实改革措施，并组建了30至40个“巡逻队”。这些新队伍每天巡视全城，调查黑市活动，接受当地居民举报违反紧急措施的行为。上海各电影公司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命令，电影不得有讥讽新币的内容，违者将以动摇公众对金圆券信心罪论处。^[91]

蒋经国的权力被扩大到了整个苏浙皖三省。评论家们说，想法不错，但为时太晚。报上开始出现批评蒋氏工作的言论。正如一封信的作者所云：“蒋氏在上海甚为孤单。除去因其捉老虎而压抑情绪稍减的普通群众外，蒋氏至今未能取得上海任何真正实力集团的合作与支持。其理想和工作尚未在此地立足。”更其特别的是，蒋氏的这一失败是由于他对工商业运作方式的一无所知。无论其政治声誉多么令人难忘，他来沪执行经济使命时却无准备：他未能调查城市生产之所需；面对10月初工业家呈交他的统计资料，他未采取任何行动，而统计资料关乎工业家们的生产困难。^[92]到10月底，诸如大米、食油和燃料这样的基本商品已严重短缺。当地市场已完全脱销的物品有药品、奶粉、棺材、手纸和棉花。^[93]

10月31日的行政院特别会议为经济改革计划制订了“补充措施”，实际放弃了最高限价制度。^[94]11月1日，南京特别法

庭庭长宣布,因违反8月19日措施而被拘留的商人将不予起诉,已被逮捕、审讯和定罪者将予保释。

至11月6日,上海物价已高跳到8月份水平的10多倍。^[95]11月8日,猪肉价格从清晨每斤6金圆券升到11点钟的12金圆券。一天之内,餐馆的价格竟翻了一两倍。买米人结伙冲击米店,一无所获,而上海周围农村的农民收成颇丰,却紧锁米囤——不愿用它交换恐将一钱不值的钞票。到11月底,政府已印制34亿金圆券,全然放弃了原先宣布的20亿金圆券限额,不再极力掩饰。

人们能想到的经济改革唯一的成就是,它使政府从人民手里收缴了价值1.7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96]不过,即便如此,疑问依旧,例如究竟社会存款中多大份额被以这种方式实际收缴。估计截止到1948年9月底,收缴金银和外汇量仅相当于社会实际资产的20—30%。^[97]

上海最明显的愤怒群体不是久受煎熬的“中产阶级”,而是商人和工业家。上海商会和上海市工业会于11月1日召开了当地工商团体负责人会议。发言者纷纷起而谴责政府给工商业带来了浩劫,众多企业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侮辱。一位发言者谈到“庸医之辈”,他们把上海400万市民当“试验品”医治。其他人则要求财政部长辞职,惩罚对改革计划负有责任的人。^[98]在其他场合,评论者倒多少比较平心静气。一位评论者以预言的笔调写道,“此次货币改革给政治系的学生上了一课。它也许是南京政府开设的最后一门课程。”^[99]

通货膨胀财政的负担

如上所述,很难析离和追溯通货膨胀与政府失去中等收入

工薪阶层大多数人支持之间的联系。但相对而言，工薪雇员无疑成为通胀的主要负担者。同样，无疑是他们吞下了严重经济困难的苦果。虽然绝对可以说，被剥夺殆尽、一贫如洗者显然大有人在，如低收入工人和失业者。

工薪阶层主要是教授和教师、军官及政府公务员。他们的贫困化开始于二战期间，那时的通胀把他们的收入降到了战前薪金的6—12%，这一平均数在同一职业和部门内部不同，也因职业和部门不同而有异，因为在为雇员提供住房、大米、燃料及其他基本必需品方面做法各不相同。到1945年，领薪工人已变成“一个新底层阶级”，且整个内战期间一直如此。^[100]

政府至少能规定，工人将因生活费用增加而得到补偿，但政府却难替其雇员出这份力。这些人包括大多数高校教授，其薪金水平一般同公务员薪水相当。^[101]1946年5月，一位《大公报》记者考察了上海主要产业的平均月工资情况，发现不论工人的忧怨有多大，他们的收入水平却远高于公教人员的收入。当时上海主要产业的平均月工资为10万法币，虽然产业之间各有差异，针织业女工为5万，木工高达18万，机械工则为20万。^[102]但1946年2月底，上海大专院校教授的平均月薪从52,000到78,000元不等。^[103]理发师、裁缝和银行职员收入比较高。国有银行男职员1946年上半年月收入约为11万元。上海的三轮车夫一天能赚到2万元。^[104]

1946年12月，昆明公立学校的中小学教师提出加薪要求。当时小学教师月薪为8万元，据说在该市还不够养活一个两口或三口之家。^[105]可能并非夸大其词，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不禁自怜，公开陈说，“一名教授的薪水甚至不及牧场扫粪工之收入，或电车售票员或国有银行雇员之收入。”^[106]

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在内战大多数时间内平均每3个月上

调一次。但这种调整从来不能跟上生活费用实际增加的节拍，故无以减轻公教人员的贫困状况，其实际收入大多仍不足以维持生计。^[107]1947年4月，天津一名低级雇员每月挣20万元，仅够个人糊口和杂项支出，却不够付房租。^[108]10位北大、清华教授在一份联合声明里力称，公办教师和公职人员甚至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饥寒交迫已成为他们及其家庭日常生活的现实。教授们警告说，这种低微而不公正的薪金正在产生三种祸害：工作效率下降、腐败猖行、道德沦丧。^[109]

根据上海市政府1948年初进行的一次调查，被调查的1942个公职人员家庭中，约69%或债台高筑，或“人不敷出。”^[110]1948年3月，这样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投书《大公报》，倾诉自己的困难。作为一名“某政府机构的低级职员”，他的月薪是310万元。这不够他本人和双亲购买日常必需品和所住棚屋3斗米的月租金。三口之家靠吃大米、蔬菜和每周一磅猪肉，勉强可以收支持平。不过，一月底政府已把此人这一级雇员的大米配给由每月8斗减至3斗。他写道，眼下连买玉米面支撑一个月的钱也不够了，“过去的10天，我们一直以稀粥充饥。一天在案头坐8小时，我感觉饥饿至极，简直头晕眼花。”^[111]

关于经济困境对工人政治态度的影响，当时普遍认为，他们起码已不再害怕社会主义。由于工资、薪水及存款已被通胀吞噬，他们已经沦为“无产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这种观点稍有夸张——因为例如学者中间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奉，似乎根植于更广泛的知识分子式的考虑（正如随后一章力求展示的那样）。

然而，学界的贫困化的确激发出学生反战运动的主题之一，且在教授们中间拥有广泛支持。正如我们所见，教授们显然促成了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当时，除其他东西外，他们还

要求削减军费,增加教育拨款,其中包括为他们自己增加工资。这样,政府开动印钞机,为打仗输血而刮尽民脂,便给了宣传反战者一个重要理由,并明显进一步动摇了知识界的支持。但与直接因通胀造成的经济混乱而发展的工人运动不同,知识分子拒不支持政府的内战方针,乃是基于对政府和全国为之作出牺牲的更复杂的估价。知识分子自己近期的贫困化只是这一估价中明显的考虑之一。

至于公职人员,这一时期他们没有参加最低限度的反政府抗议。他们未以任何有政治意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只是投书报纸编辑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订阅《观察》杂志。^[112]同知识界一样,直到战局敲响了国民党的丧钟,他们才真正抛弃国民党。因此很难确定在腐败明显加甚和效率下降之外,他们的贫困化究竟还使国民党付出了什么代价。就政府在其国民面前形象受损而言,这可能十分严重。但就公职人员而言,他们对国民党和内战的态度或许与知识分子的态度没有天壤之别。

张嘉璈似乎对时局作了最准确的概括,他提出公教人员的新底层地位“因其左翼知识分子倾向而增加了政治危险性”。^[113]其言论的含义是,这一群体的政治——思想倾向早已确定,只是因内战年月的严峻经济现实而加强了。假如实情确乎如此,通胀使政府付出的主要政治代价或许表现在其他领域,而不在因通胀给城市中等工薪阶层带来艰难困苦而产生的丧失拥护。

那么,从总的评估来看,政府为自己搞糟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决定依靠印钞机生钱只是其中最显著的事例而已。在该决定的全部后果中,对政府最危险的或许是,它引导决策者误入歧途,以为财政难题会有一种无痛疗法。利用印钞机,加上对同样削弱自身能力却源源不断的外援依赖,政府确实渡过了抗战难关。^[114]不过,其间通胀力量开始涌动,政府运作方式不作大幅

度的深刻修正,便无法阻止其势头。于是,在毫无贯彻这种改变所必需的情况下,政府毫不奇怪地作出选择,以同样的方式花钱打共产党。最终结果是,除了眼看着每下愈况的经济状况,政府已既无心也无力有何作为了。

尤为突出的是,通货膨胀给工人力量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宣泄口,这股力量受到八年日本统治及这以前国民党的十年钳制,在二战结束时猛然挣脱出来。在通胀肆虐的环境下,政府无法重复其战前对工人的控制。日本投降后头半年里,政府已完全认识到工人力量的潜在破坏力,这股力量泰然自若,不理睬官方确定的解决劳资纠纷程序。政府别无选择,唯有接受工人的要求,按生活费用的增加而自动调整工资。

这一决定非但加快了工资——物价的盘旋上升,而且损害了政府与工商业界的永久联盟。这种联盟曾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这样,政府不得不以企业家的不满换取劳工方面的太平无事,企业家们则辩称,对工人让步正在使生产成本加剧上升。支付高工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但要对问题的其余部分负责,政府便显得无能为力,或是由于通胀本身,或是由于减轻压力的尝试不够。这里既有因购买力普遍下降而减少的需求,也有不合理的商业税和生产税,及至在1948年8月的灾难性改革中达到顶点。这终于迫使上海商会和上海市工业会起来公开谴责政府的政策。

与此同时,工商界和广大公众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以更具体的方式显示缺乏信心。政府主动发售债券时,商业界和金融界拒不理睬。广大公众表现出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把存款投向他处而不是银行。私营信贷机构,对禁止利率超过中央银行批准水平的规定不予理会。1947年和1948年紧急改革计划期间,商人抽回对限价城市的供货,因此对计划的失败起了作用。当比正常

经营和生产活动更有利可图时，企业家便全力以赴，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就导致了生产缩减，商店停业，失业增加。

总括而言，政府对经济处理失当；促成了独立于政府控制的工人运动的复兴；造成萧条——失业循环，并在1947年变得明显；损害了政府与工商业的关系；助长了公职人员的道德沦丧和知识界对内战的强烈反感；还动摇了公众对国民党统治能力的信心，它导致并加速了政府减轻通胀压力的大多数措施的失败。结果，政府未能利用法令和改革措施诱导人们依从，即使这些被标榜为政府反共斗争的必要特点。这种权威下跌，发生在政府为其生存而需要每个人最大限度的经济合作和作出牺牲的时刻。

注 释

[1] 阿瑟·N·杨：《中国战时财政和通胀，1937—1945》，第20—21、29—30、33、64、162、299页。根据一项估计，军费约占1941—194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60%（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第155页）。关于1945年以前的国防开支情况，见杨著《战时财政》第16页；以及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第70页。

[2] 张著《恶性通胀》第66页。周舜莘说，“这种负担分摊不均的情况造成公职人员贪污腐化盛行，而这无疑是国民党政府垮台的重要因素。”（《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58页）甚至更模棱两可的是，阿瑟·杨称：“通货膨胀为共产主义而削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战时财政》第323页）。

[3] 简·切斯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全文。

[4] 关于1927年事变，见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全文；以及切斯诺：《中国工人运动》第14章。

[5] 这部法律的译文见方福安（音）：《中国劳工：中国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的经济与统计概览》，第161—170页。

[6] 上海劳动出版社:《大革命以来上海工人阶级为团结统一而斗争》(以下称《大革命以来……》)第15—18页。破坏罢工只是杜月笙对国民党当局效劳之一。作为秘密帮会青帮首领,他在1927年帮助蒋介石取得了对上海的控制。杜氏与国民党政府的密切关系保持了多年,他成为上海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借助其新地位,杜氏力求树立更加可敬的形象。因此,他创立了恒社,其门徒纷纷加入,成为他的学生。见Y·C·王:《杜月笙(1888—1951):政治传略》,载《亚洲研究专刊》第26卷,第3期(1967年5月):440号。

[7] 埃莉诺·H·拉铁摩尔:《远东的工会》,第16页;以及尼姆·韦尔斯(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工人运动》,第178页。

[8] 韦尔斯:《工人运动》第67页。

[9] 随着城市共产党地下组织与农村游击队建立联系,形成了一种双向交通。上海工人和新四军及苏南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同样,据报道来自香港和北平的工人在附近地区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见下文“共产党地下组织”一节,又见《大革命以来……》第31—32页;以及韦尔斯《工人运动》第86—89页。

[10] 1946年1月26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1946年1月27日上海《中美日报》和《申报》(均载1月28日《中国新闻评论》)。

[11] 张著《恶性膨胀》第69页。

[12] 1947年1月31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第13页;以及1947年2月26日上海《大公报》(3月5日《中国新闻评论》)。上海工人队伍是最难驾驭的,它的独立性似乎直接因其规模而变化不一。1948年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和社会部的统计显示,上海拥有7,738家工厂,即全国总数的55%。天津有1,211家工厂(8.6%),台湾有985家工厂(7%),南京有888家(6.3%)。这项调查显示,上海有367,433名产业工人,而全国工人总数为682,399人。(1948年4月27日南京《中央日报》;5月5日《中国新闻评论》)。

[13] 钟洛:《在斗争里壮大:记25年来的中共上海电力公司支部》,载1951年1月30日《解放日报》(收入刘长胜编《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第30—34页);1946年2月5日、6日上海《文汇报》(同日《中国新闻

评论》)。

[14] 事例见1946年5月31日上海《侨声报》(《中国新闻评论》)和1946年6月1日上海《申报》(《中国新闻评论》)。

[15] 1946年8月7日重庆中央通讯社(8月8日上海《中国新闻评论》)。

[16] 1946年9月18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17] 1947年3月17日上海《东南日报》。以前只在县、市一级设立工会。

[18] 1947年9月27日上海《立报》(《中国新闻评论》)。

[19] 例如1946年8月10日上海《时代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20] 1946年9月5日上海《新民晚报》(9月7日《中国新闻评论》)。

[21] 一些美国工会以这理由拒绝在二战期间通过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给予中国劳动协会资助(拉铁摩尔,《工会》第20页)。

[22]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华民国劳工问题散记》,第97—99页。

[23]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见第五章。

[24] 《中华工人联合会关于中国政治局势和工人运动的紧急呼吁和最低要求》,见爱泼斯坦,《劳工问题散记》,第104—106页。

[25] 朱的师傅杜月笙约于同一时间也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但到1946年底,杜的势力已经衰落,部分原因可能是他未能控制住上海工人。但是,虽不乏某种推测,却无证据证明,他们二人命运转蹇有直接关系。杜氏不久后返回了上海。见《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2月28日,第3页;以及王·Y·G,《杜月笙》第449—450页。

[26] 1947年3月18日上海《大公报》(3月19日《中国新闻评论》);以及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4册,1792—93页。

[27] 1947年10月26日上海《大公报》(10月28日《中国新闻评论》)。

[28] 1947年10月25日上海《大公报》(10月28日《中国新闻评论》)。总人数中男女比例为3:2。又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第4册,1792页。

[29] 陈庆楣：《英勇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上海大隆机器厂支部》，载1951年6月27日《工人日报》（收入刘长胜编著，第77页）。

[30] 《大革命以来……》第25页。

[31] 一位上海制造商在1948年表示，政府对他的工厂的工会无影响可言。一位报纸编辑在作更宽泛的评论时坚决认为，没有谁真正控制着上海工会（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页）。这种观点也出现在1947年1月31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刊登的一篇劳工问题特别报道中，第12—16页。

[32] 1947年2月28日上海《文汇报》和1947年2月27日上海《新民晚报》（均载2月28日《中国新闻评论》）。

[33] 1947年5月14日南京《新民报》（《中国新闻评论》）以及1947年5月13日天津《益世报》（5月14日《中国新闻评论》）。

[34] 1947年5月12日天津《工商日报》（5月13日《中国新闻评论》）。

[35] 1947年8月30日天津《大公报》（9月2日《中国新闻评论》）。

[36] 当时人对这些危险所作的分析，见1946年4月15日上海《真言报》（《中国新闻评论》）。

[37] 1947年2月26日上海《大公报》（3月5日《中国新闻评论》）。

[38] 1946年11月8日上海《大公报》（11月15日《中国新闻评论》）；另见1947年1月31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第5—6页。失业在二战结束不久达到高峰，1946年上半年有所下降，然后再度上升。见季崇威：《上海劳工漫记》，载1946年5月2日上海《大公报》（5月23日《中国新闻评论》）；以及1948年2月20日上海《大公报》（2月21日《中国新闻评论》）。

[39] 1947年2月20日南京《新民报》（《中国新闻评论》）。

[40] 1947年2月12日广州《华南日报》（《中国新闻评论》）。1946年11月的统计数字来自广州市警察局。

[41] 1946年11月16日广州《前锋日报》（《中国新闻评论》）；1947年3月11日广州《和平日报》（《中国新闻评论》）；1947年7月10日广州《西南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42] 必须强调的是，无法证实这些数字，只能把它们看作大约数。它们出现在1946年11月8日上海《大公报》（11月15日《中国新闻评论》）和1947年1月31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第5—6页。

[43] 1948年1月7日上海《立报》（1月12日《中国新闻评论》）。

[44] 关于1947年2月的改革，见张著《恶性通胀》第72—73、350—352页。有关米骚动的大量报道载1947年4月和5月的上海《中国新闻评论》。

[45] 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194—196页。

[46] 1947年8月30日南京《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同一资料提供了有关1947年1至6月间这七大城市工潮的正式数字：上海788起，重庆53起，天津39起，汉口31起，青岛27起，南京19起，广州8起。

[47] 关于得到自动调资的工人的比例，没有确切资料。《中国周报》于1947年1月报道称，“大量”企业未按生活费用的增加付酬给雇员——它们多为老字号商家、食品、药品、金属、羊毛加工厂及制毡业。这些厂商只不过为工人提供了栖身之地而已。在中小企业，工资常常由家族或私人关系决定，并不统一。其次，在建筑业这样的行业，承包商和包工头常常付给工人最低工资——尽管谈判合同时确定的工资标准通常远远高于官方的生活费用指数。见1947年1月31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第15页。

[48] 张嘉璈著《恶性通货膨胀》第354页。张君勱（民主社会党创始人）之弟、银行家、经济学家及政学系成员张嘉璈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多种职务。二战前他是铁道部长，战时任交通部长，1945年至1947年初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并于1947年3月1日被委任为中国中央银行总裁。他担任此职为时约1年，后于1949年5月离开中国。

[49] 1947年1月31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第12页。

[50] 葛翔，《中共上海国棉十二厂支部的光荣斗争史》，载1951年6月28日《解放日报》（收入刘长胜编著第41—49页。）

[51] 陈尚，《记中共上海海关支部十五年英勇斗争的几个片断》，载1951年7月2日《解放日报》（收入刘长胜编著第50—63页）。

[52] 陈庆楣书第74—80页（见注释29）。

[53] 《1950：人民年鉴》戊第9页；《大革命以来……》第36页。

[54] 1948年2月3日上海《和平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55] 工人与警察的搏斗持续了数小时。很多工人受了伤,250余人被抓走——大多不久又被释放。社会舆论似乎站在工人一边,于是厂方最终同意向雇员配给米和煤(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在斗争里壮大》第33—40页)。

[56] 1947年9月24日上海《中央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57] 1947年9月26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58] 缪雨:《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记中共法商水电公司支部的斗争史迹》,载1951年6月27日《解放日报》(收入刘长胜编书第20页)。

[59]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1948年10月24日陕北新华电台电讯。

[60] 钟洛文第24—40页(见注释13);柯蓝和赵自:《不死的王孝和》。

[61] 1947年2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中国新闻评论》)。购买国货运动受到中国制造商和商人支持,但似乎在消费者中间未得到理解。在上海,据报道最大的销售国货的百货公司日销售金额为1000万元法币;出售洋货的永安公司销售额为前者的4倍;1946年12月28日广州《西南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62] 1947年2月10日上海《和平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63] 上海解放后不久,3个人被指控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永安一纺厂员工毛德康;该厂人事科科长魏荣来;国棉十四厂工人管云康。1949年10月20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64] 1947年2月11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65] 1947年10月1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66] 庄晴勋:《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中共永安公司支部解放前的斗争》,载1951年7月1日《解放日报》(收入刘长胜编书第64—73页)。

[67] 1948年6月15日上海《申报》。除在学运和工运中工作以外,据说共产党地下组织还采购并运送解放区十分需要的物资,如汽油和煤油。与解放区的联络借助于设在国统区的秘密无线电台。这一资料出自1969年和1973年的采访录。另见1947年10月30日上海《新闻报》;1947

年11月3日上海《中央日报》；1947年11月7日和1948年1月14日上海《申报》(均载同日《中国新闻评论》)。

[68] 1948年2月18日天津《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69] 季崇威：《上海工业危机透析》，1946年6月25、26、27日上海《大公报》(7月13日《中国新闻评论》)。

[70] 张著《恶性通货膨胀》第353页。

[71] 大米贷款丑闻受到了上海报界的广泛关注。例如1946年6月12日《新闻报》；6月14日《时事新报》；6月19日《大公报》和7月9日《文汇报》(均载同日《中国新闻评论》)。

[72] 见张著《恶性通货膨胀》和周著《中国的通货膨胀》，书中全面讨论了这些政策和其他政策，包括有些比较成功的政策。后者中有1946年3月8日至1947年2月17日实行的政府出售黄金计划；以及在几个城市配给必需品的尝试。它首先于1947年7月在上海开始，规模有限。后来，政府在上海、南京、天津及广州实行配给米和面粉。不过，这些项目规模有限，对整个局势影响不大。关于税制的缺陷，见周著第64—67页。

[73] “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一般不用来指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或全国资源委员会所属众多大型国有企业。它专指利用公共机构和关系来改善私营企业并从中赢利。

[74] 1947年4月9日昆明《云南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75] 1947年1月31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第6页。

[76] 1946年12月31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第8页。

[77] 司徒雷登：《在华50年》第194页。

[78] 1948年8月20日上海《和平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79] 1948年8月21日上海《大公报》和1948年8月23日上海《新闻报》(8月21—23日《中国新闻评论》)。政府的最初两次冻结工资和物价试验分别在1938年和1942年，均与1947年2月的第三次尝试同样不成功。

[80] 1948年8月23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81] 1948年8月27日上海《时与文》(9月18日—20日《中国新闻评论》)。

[82] 前揭文;1948年9月14日上海《前线日报》(9月15日《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9月20日上海《新路》(9月30日《中国新闻评论》)。

[83] 1948年8月28日上海《金融日报》(8月31日《中国新闻评论》)。

[84] 1948年9月9日上海《新闻报》(《中国新闻评论》)。

[85] 1948年9月15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86] 1948年10月16日上海《新闻天地》(与国民党有关系)第50号(10月20日《中国新闻评论》)。

[87] 刘涤源:《论物价的局部管制》,载1948年10月2日《观察》,第4—7页。

[88] 1948年10月7日上海《前线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89] 1948年10月6日上海《大公报》、《商报》(《中国新闻评论》);以及1948年10月7日上海《大公报》。

[90] 1948年10月15日上海《商报》(《中国新闻评论》)。

[91] 1948年10月16日上海《新民晚报》(10月19日《中国新闻评论》)。

[92] 1948年10月16日上海《新闻天地》第50号(10月20日《中国新闻评论》)。

[93] 1948年10月28日上海《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94] 1948年11月1日上海《大公报》(10月30日—11月1日《中国新闻评论》)。

[95] 张著《恶性通货膨胀》第359页。

[96] 前揭书,第80页。

[97] 1948年10月6日上海《东南日报》(《中国新闻评论》)。

[98] 1948年11月2日上海《大公报》和《中华时报》(《中国新闻评论》)。

[99] 《金圆券下的牺牲者》,载1948年11月15日《时代批评》,第2页。

[100] 张著《恶性通货膨胀》第63—65页;周著《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44页。至1946年中,昆明一位教授估计,其同事的实际收入比1937年

减少了98%。1946年8月30日上海《大公报》(8月31日《中国新闻评论》)。

[101] 见第三章注释28。此时,中国约有180所高等学府。其中122所为国立学校,计有1万教职员。还有数量可观的公立(省级)中学。1947年7月10日天津《大公报》(7月11日《中国新闻评论》);以及1946年2月28日上海《中美日报》(3月1日《中国新闻评论》)。

[102] 季崇威(见注释38)。

[103] 1946年2月28日上海《中美日报》(3月1日《中国新闻评论》)。

[104] 1946年5月28日上海《和平日报》(《中国新闻评论》)和1946年4月2日天津《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

[105] 1946年12月25日昆明《中央日报》(12月27日《中国新闻评论》)。

[106] 1946年4月10日上海《大公报》。1947年,鲍大可发现,上海高校教授的收入约与生意兴隆的人力车夫收入相当,一些机构付给专业雇员的薪水与体力工人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同”(《共产党接受前夕的中国》第19页)。

[107] 1946年6月10日上海《申报》(6月11日《中国新闻评论》);1947年10月7日天津《大公报》(《中国新闻评论》);1947年8月2日天津《新星》(独立报纸)(《中国新闻评论》)。

[108] 1947年4月6日天津《商务日报》(4月9日《中国新闻评论》)。

[109] 王遵明等:《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载1947年10月18日《观察》,第3页。

[110] 1948年3月16日上海《申报》(3月23日《中国新闻评论》)。

[111] 1948年3月13日上海《大公报》(3月23日《中国新闻评论》)。进一步的分析,见伍启元:《公教人员的待遇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载1946年10月19日《观察》,第8—9页。

[112] 关于该杂志此时的声望,见第五章和书目注释。

[113] 张著《恶性通货膨胀》第65页。

[114] 此处要害不是批评国民党政府接受外援,而是强调政府似乎不愿意正视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现实。政府依靠印钞机和依赖外援都是这一弱点的表现。凡二者最终都置它于尴尬地位,除了随着经济危机加剧而继续求助于华盛顿,其他无计可施。这一弱点为社论作者提供了好素材。例如,《时代批评》(1948年1月15日,第3页)把政府比作一个破落家族,它须借债糊口,还得为堕落的子孙购买鸦片。这一弱点还与共产党特有的勤俭节约、自力更生形成鲜明对比。关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贷款、售贷等详情,见《中国白皮书》第1册,第360-409页,第2册,第939—980、1042—1053页。关于美援计划的分析,见周著《中国的通货膨胀》第173—184页。

第五章 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评判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1]

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停失败后，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他的告别演讲中说，中国的形势只有在自由派势力在政府中取得一席之地后才有救。不论他的出发点有多好，这个建议在政治上是不通的，因为自由派人士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首先作为知识分子，充其量其次才作为政治家，这些人缺乏在内

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环境中生存的各种资源。可是很少有人会怀疑，自由主义是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中间最主流的政治观点，而这使得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几乎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具有同样的摧毁力。〔2〕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西方传教士的教育，以及许多教授、教师在欧美接受过高等教育，使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3〕无论原因何在，到40年代末，一种现代自由主义的气氛正在知识分子中间——不包括政治领袖——稳固地形成了。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学生的反战运动才能以我们前文描述的方式进行。学生们自发走上街头，以行动反对国民党政府，而他们的师长则承担起具体阐述知识分子思想观点的任务。师长们写下了大量的社论与短评，很明显，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与他们的学生同样的事。

40年代末，知识分子在报纸和杂志上大量发表他们的观点。这些报刊杂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欢迎，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和秘密警察的注意。尽管骚扰不断，内战期间拥有读者最多的两份报刊还是生存了下来，并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其一是《大公报》，一份同时在上海、天津和香港出版的日报；〔4〕另一份是《观察》，在上海出版的周刊。一般都认为《大公报》能不受政治干扰不仅是因为它在全国报纸中的领袖地位，也因为它与国民党的“政学系”有密切关系。〔5〕

相比之下，《观察》的成功则是一个谜。尽管不时地受到来自左右两边的攻击，《观察》成功地保持了它作为一份不受任何党派控制，自由发表政治言论的独立性刊物的形象。它是40年代末同类刊物中最受欢迎的一份。由于这个原因，同时因为这份以发表政治言论为主的刊物其主要撰稿人都是大学教授的缘故，《观察》被本书当作内战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政治观点的主要资料

来源。〔6〕

《观察》的创办者和主编是储安平，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曾留学英国。该刊始创于1946年9月1日，每周一期，直到1948年12月24日被中央政府以“亲共”罪名关闭。在这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该刊的影响持续扩大。到1948年底的时候，该刊发行量已达到6万份，而实际上的读者数，按保守估计也要两倍于此。《观察》在全国发行，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个大城市仅占总订数的约20%左右。据一位老北京说，这份杂志非常流行，就连一些在他们家门口胡同里停车待客的人力车夫也经常阅读。当然，识字的人力车夫当时大概也只在北平才有。据《观察》自己的统计，它的读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界，学生和教师；政府雇员，包括中下级职员和军官；工商业和金融界人士。〔7〕

储教授曾得意地提到这样一件事，以证明杂志的成功：1948年夏天，清华、南开和北大的入学考试中，有一道时事政治题目，让考生写一篇关于他们经常阅读的报纸或杂志的评论，当时绝大部分考生写的都是《观察》。〔8〕到1948年，《观察》的军事报道——据说是国防部内部透露的消息——已经作为公众获知战争进程唯一准确的消息来源而闻名宇内。这家杂志被查封后，一些评论家为此专门写了悼文。其中有一位写道，《观察》十万多的忠实读者将因此而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国民党已没有前途可言。他说，“‘储安平教授时代’已不得继续存在，可以说这份杂志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一刻仿佛是现存秩序的最后五分钟，再多的言论已显得毫无必要。”〔9〕

但是，在1946年的9月，言论远不是毫无必要的。《观察》第一期刊登了一篇表明其创刊宗旨的宣言。在谈到公众的民主化意识时，编者回顾了仅仅数年前，这个国家还能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而团结一致。而如今，人们似乎只关心追逐个人利欲而对国家

祸福很少过问。因此，他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民众“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0]

在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文章以及学生示威游行之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信念，即相信只要呼声足够强大，政府将不得不对民众关于和平、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普遍要求作出反应。这种状况大体上维持到1948年年中。到此时人们才醒悟是政府不愿作出反应，而且，实际上政府几将丧失反应的能力。在此之前，学生们积极地进行游行、请愿及其他各类宣传活动，想以此引导公众舆论；年长一代的知识分子们则强调“公众反应与严肃探讨”。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观察》致力于发表对政府、国民党及各反对党进行评判的文章，同时也提出社会改良的积极建议。这些言论都基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认为只有实现民主、自由、进步和理性才能获得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

这个观点所包含的理想与期望，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共同点。关于“民主”，储安平写道：

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关于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法律之前一律平等。

关于进步：

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

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

关于理性：

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藉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11〕

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评判

自由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中得到最有力的表达。自由主义者最初是指责国民党背叛了赋予其统治合法性的政治信条。尽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并不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作政治信仰，也并不十分看重孙先生的治国方略；但在实际上，民族、民主和民生这三面主义，尽管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

国民党统治的形式

政府不仅仅是民享,而且是民有和民治的。这一观点被一再强调。证明国民党二十年训政合理性的唯一理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即为最终建立一个立宪政府作准备。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国民党在这一点上彻底失败了。储安平在评论1946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上海摊贩骚动时,曾不无嘲讽地写道:

大商店的被打,跳舞场、电影院的被打,过路汽车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种贫者仇视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现象,未尝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就后者论,贫富阶级的悬殊本不合理,贫民阶级开始了解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以行动表示其意志,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已有进步。就前者论,我们一向认为20年来国民党的“训政”,无甚成绩可言,而现在一般民众居然敢公开抗议“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饭”,国民党当局亦大可引以为骄,因为“训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行使政权……我们竟因此不得不承认国民党训政20年,非一无成绩可言者。〔12〕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吴世昌则要直率得多:

国民党之一党专政,无疑的是模仿苏联的。不过国民党政纲规定训政以后有宪政,不像苏联的长期一党专政,是仍以民主政体为目的,训政不过是一段过程。但不幸这段过程太长,甜头太多,竟使它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便腐化起来。〔13〕

立宪政府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相当怀疑的眼光,看待以代议政府的名义建立起来的一套组织和程序,这始于1946年1月11日——31日为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而召开的多党“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有38名代表参加,国民党八名,共产党七名,青年党五名,民盟两名,民主社会党两名,救国会两名,中华职业教育社一名,乡村建设会一名,第三党一名,以及无党派人士九名。会议在

国共争端的五个主要方面达成一致,因此,至少是在理论上为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打下了基础。这些方面包括:改组国民政府;拟定结束国民党训政,建立宪政的政治纲领;修订1936年宪法草案;根据修订后的宪法审定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重新编制政府军队及共产党军队,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

自由派人士对这些决议最感满意,但政协却无力使决议付诸实施。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国民党右派反对这些决议,并在3月份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成功地改变了党的立场。两项最重要的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权和继续实行总统制,反对政协通过的内阁制。

经过国民党右派的这次打击,^[14]会议达成的决议不断被违背。几乎同时,作为决议基础的一月停火也被打破。除了国民党单方面违约之外,1946年,国共双方分歧的主要方面还包括:将共产党军队整编入国军;国民党拒绝给予共产党和民盟在40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中的联合否决权。国民政府委员会在实行宪政之后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两党因此宣布,国民党违背了政协协议最初的规定和精神,他们也因而不再受此协议的约束或参与它的执行。国民党政府于是单方面采取行动,于1946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对1936年宪法的修正案。1947年1月1日又公布了新宪法。11月选出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大于1948年4月开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15]

在留美中国学生中的一项民意测验(参见第三章)表明,这些做法产生的是反面效果。有一道题目是这样的,“你是否认为最近在中国举行的选举和通过的宪法表明这个国家是在走向真正的民主政府”,近百分之八十的回答是“不”或者“不一定”。

《观察》和其它一些杂志的读者来信栏,也都反映出了类似

的消极态度。一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律师失望地写道,宪法的颁布本应该是一件让从事司法工作的人感到高兴的事,但实

而未能取得当选证书的代表们，把棺材抬到国大会场去，硬闹着要参加了。——说起来，这真是一个笑话。〔17〕

第一次国大会议本身也招致了同样的嘲讽。一位来自会议召开地南京的《观察》读者，将当时的情况描述成一幅混乱的场景，“三民主义”仅仅是一种口号罢了。他认为，政府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推行民主方面没有任何进展，这正是共产党人起而反对，而各方人民拥护共产党的原因所在。“假如今日的政府，再不顾到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今日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再如此自私，那么这些人将来狼狈下台，也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了。”〔18〕

关于这次国大，储安平写道：“混乱至此，除了笑，我无以对之。”但他并不将之归咎于代表本身。相反，他认为该受到谴责的是国民党 20 年来的训政。训政的目的本来是要教会人民如何选举，但谁都知道这次国大代表的选举是一出闹剧，被选出的代表素质普遍很低。而且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所有地方，不论是国民党内还是党外，都没有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领袖人物能与蒋介石竞选总统职位。所有这些弊病，储都认为乃国民党所直接造成。“我们很坦白地说，”他作了这样的结论，“从这次国大选举和国大开会情形来论，国民党 20 年的训政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但即便在这个时候，1948 年的 4 月，他似乎还对国民党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抱有希望。因此他呼吁国民党“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19〕

民权自由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更重要的可能并不是代议制政府名义下的种种拙劣表现，而是官方对民权自由的侵犯。民权自由受到宪法及诸多政府文件与宣言的保证。而实际上，这种保证经常被违反。地方政府根本无视这些自由，在军管或是各种紧急状态下，更是由官方正式中止这些自由。这类措施专门用以压制那些

对政府、政策和内战的批评。由于国统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总是最鲜明又最顽强的批评者，他们自然就成为首当其冲的政府压制目标。数百人受到监视、跟踪、恐吓、骚扰，甚至逮捕，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谈到学生问题时所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失踪”，而拘捕、暗杀、折磨成了政治生活中的常见景象。

抗战时实行的官方新闻检查制度在内战时期没有正式宣布实行。但是对新闻界的干预仍以各种形式存在，包括：临时检查制度，地方性的检查制度，勒令个别刊物在一段时间内停刊，情节严重的实行永久性查封，直接骚扰印刷厂和编辑部门，逮捕和关押记者、编辑，甚至殴打报童及报贩。然而，从政府角度考虑，这些措施都适得其反。尽管它们确实使公众能读到的新闻和政论的数量、质量有所下降，但由于批评政府的出版物始终没有被全面禁止，未被查封的刊物其批评就更加激烈了。

这样，学生运动中的“反迫害”，在年长一代知识分子中，就成了对政府破坏正常的法律秩序、干预出版和集会自由、干预请愿示威权利，公开而持久的抗议和谴责。再有事件发生，批评也就愈烈——我们知道，这样的事件大多与政府对学生示威运动的处置有关。另一次类似事件就是北平进行的一次所谓的人口普查中有 200 多人遭到逮捕。这些逮捕大多发生在 1947 年 2 月 15 日至 17 日。被捕者中包括教授、老师、医生、出版商、店员，还有部分学生。

第一批站出来抗议的人是 13 名教授，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要求保障人权。声明责问政府为什么出尔反尔，一月份刚刚通过保障民权的宪法并从北平监狱里释放了一千多人，而在仅仅六个星期后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搜捕。^[20]警察局发表了一份声明作为答复。声明称逮捕这些人是保障公共安全之必须。警方坚持说这些逮捕是合法的，因为当地的保甲长在事先提供了

他们辖区内嫌疑分子“违法”的证据。警方最后还说,大多数被抓走者都在 24 小时之内被保释,余下的 40 人犯有窝藏枪支和阴谋暴乱罪。

事态远没有平息,3 月 1 日,北大、清华、中法、燕京、北师大等大学的 192 名教师联合发表了一份《人权宣言》。教授们谴责“北平政府当局的违法行为”,称这次逮捕是对新颁布的宪法及政府历次对人权自由所作保证的背叛。〔21〕

1947 年 5 月,华北记者协会的 130 名记者聚会北平,大会的口号是“新闻自由”、“人权保障”。就连会议的官方协调人——政府中央通讯社的一名主管——也被大会情绪所感染。在发言中,他慨叹经常发生的报社遭袭击事件,以及诸如 3 月 1 日记者张今吾遭逮捕的事件。“我们应当集中力量,”他说,“为自由和人权保障而斗争。《华北日报》的张先生被捕是非法的,全国报界都应就此提出抗议。”〔22〕

记者们的抗议使张先生得以获释,但却并不能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不出一个月,上海的三家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因为被指控刊登扰乱公共秩序、阴谋颠覆政府的文章而被勒令停刊;〔23〕另有一家报纸被临时停刊;天津开始实行新闻检查制度,〔24〕重庆和成都约有 60 名记者被捕。报界和其它公众团体不断抗议请愿。官员们的回答都千篇一律地说要坚持新闻自由和保障记者的安全。像张今吾一样,大多数被抓的记者很快被释放。但骚扰与恐吓依旧不断。南京《新民报》编辑周绶章的评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打杀了学生还不算,还要把红帽子满天飞,遍地都变成“奸匪”,到处抓人,到处打人。对于一向侈谈的新闻自由,尤其摧残无遗。一下子封闭三家报馆,到处抓记者,还要逼着承认是共产党;天津甚至于还要恢复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冷静地想一想:究

竟是谁没有理性？究竟是谁无法无天？用“理性”、“法律”作幌子，而大做其反理性违宪法的事情，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25]

《大公报》的一篇社论这样诘问：“难道这些人都是中共的阴谋分子吗？用此手段是绝对必要吗？捕记者、杀学生，造成恐怖状态，这是聪明办法吗？”^[26]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葛思恩教授提到美国新闻自由的一些基础原则——无论他人的观点是什么，我们都应当誓死捍卫他们表达这些观点的权利。他警告说，一个压制公众舆论和破坏出版自由的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政府为压制批评性言论而公然采取行动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暗杀昆明西南联大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闻一多。闻和当时他的很多同事一样，公开呼吁进行改革。1946年7月15日，他参加完民盟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在回家的路上，于教师宿舍门口被枪杀。而四天前，另一位著名的民盟成员李公朴遭暗杀。李是在与妻子看戏后回家时，被射杀于其在昆明住宅附近的街道上。

两起暗杀事件在昆明的学者中制造了又一轮恐怖气氛。大约有十多名教授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事态越闹越大，最后中央政府不得不让这些教授安全离开昆明。梁漱溟和周新民代表民盟对此做了一番艰苦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这两起谋杀均由云南警备司令部、或是事先经其同意的情况下策划和执行的。他们认为具体执行者是中下级军官，包括事前周密的布置及事后的掩饰，而他们的上级则是幕后操纵者。^[27]

学者们再也不会忘记昆明的两起谋杀。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引述这两次事件来证明国民党统治下的压抑、恐怖气氛。事隔将近两年，在1948年4月，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向“三名教授”发出了公开警告，指责他们被共产党利用煽动学生闹事。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三名教授”指的是一个月前在北大学生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的许德珩、樊弘、袁翰青。90名来自北大、清

华、燕京和北师大的教师立刻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向这位吴主任提出抗议。信中写道：

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中？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28〕

这件事也引发了储安平富有特色的评论：

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它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它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它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它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总之，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它都没有兴趣……人民没有饭吃，它管吗？它不管。人民没有衣穿，它管吗？它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它管吗？它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

他最后警告说，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如果北平政府胆敢制造第二个闻一多事件，那么立刻就会出现社会混乱。〔29〕

闻一多事件和对三名北平教授的威胁仅仅是一些例子，表明国民党有用政治干预教育的习惯。与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不同的是，宪法并不保证教育免于政治干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至少有一次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但这个决议从来没有被实行。党和政府都要经常性地打破自由主义所谓政府对教育系统的干预应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以及不允许党派政治活动等信条。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学生自发的独立的政治活动，而且给予支持和鼓励。他们反对的是国民党培养自己的活动分子，让他们在学生中活动，并招募学生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政府对教育内容的干预；以及政府恐吓、压制学术界批评的企图。

政府对教育的干预与教育系统对政府支持的严重依赖是分不开的。^[30]教育部对教育界的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规定,从学生团体的规章到国立学校的学术与行政任免。这一点使得教育部与学校在学术问题上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31]由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教育部的干预也必然地使学术与政治冲突紧密地缠绕在一起。^[32]这些冲突在抗战期间因CC系的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变得更加激化。到40年代末期,这种“干预”包括官方认可的中国历史的基础统编教材,以及讲授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公民课本。

作为6个孩子的父亲,《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承认,他太忙,从来没有时间去看孩子们的课本。但在1947年他第一次这样做了以后,发现自由派学者们的批评简直太正确了。他不无惊讶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他写道,当父亲正批判秦始皇的统治时,孩子们却在被教导去赞美这位暴君;父亲在写作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前奏时,孩子们却在被教导着蔑视这场叛乱;当父亲在呼吁要求党派退出学校、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传统时,孩子们却在读着除了国民党教条和对旧秩序的赞美之外再无他物的课本。^[33]

政府对这些批评所作的反应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46年底针对几所学校对学生们被强迫参加国民党活动的抱怨,教育部所发表的一个声明。声明说如经调查,证明校方的抱怨是正确的,那么教育部将“采取措施谴责之”。但是,教育部并不想干预国民党在学校内的活动,因为这是由党自己决定的事。^[34]如此就把事情搁置了。实际上,到1948年,政府和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干预以压制学生运动,尽管这种努力并不见效。这种做法招致了自由派更加严厉的批评。《时代批评》的一篇评论就是一个例子:

最近,各党派都意识到了学校是一个力量的源泉,因此都希望控制思想、控制学校。他们都想利用学生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学校因此成为各党派的训练基地……我们因此呼吁:党派退出学校;给学校教育的自由;给教授们讲课的自由;给学生们学习的自由;给中国开始新生的自由! [35]

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与行动

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第二个方面的批评比第一方面在言辞上更为激烈。自由派人士认定,政府不仅是民有、民治的,并且应该是民享的。而在 40 年代末,几乎没人再会相信政府会关心大众的利益和幸福,更不用说采取措施去推进它了。对政府政策与行为的批评,通常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腐败、内战及无能。

腐 败

很难确切地说这三者之中哪一方面最主要。除了接管最初几个月中政府官员的受贿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外,由腐败所引起的批评似乎要比其他两方面少一些。然而人们经常发现,很难区分何处是某件事之终、何处是某件事之始,在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所有的事情,其起因和结果,都如此紧密地混杂在一起。政论家很少会不注意到腐败问题,同样,他也很少会在一篇文章中单只论及这一个问题。一位作者这样描述当时普遍的态度:“我们已听得太熟了,熟到感觉麻木,麻木到忽略其为一切无办法之源。”[36]

储安平在文章中表述了他的感受。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最大的问题是“不道德”。

统治下,那些不讲道德、不守法纪的人如鱼得水。其后果则是投机风气盛行,人人自危,毫无责任感。〔37〕

透过所有的报道和评论,人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腐败已在整个官僚体制内泛滥——从中央政府官员直到最基层的保甲长,为了他们自身及其亲属们的私利,肆意滥用一切法律及规章。〔38〕关键在于,金钱与利益是保证国民党政治体制运行的润滑剂,但同时却降低了体制的运行效率。由于这样昂贵的代价,政府的腐败使自由派人士日渐疏远。大多数人不能,或是不愿加入到腐败的行列以谋取好处,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合法利益为他人所得,怨愤由此而生。这一切使整个官僚体制毫无生气,并降低了其行政效能。同时也使体制内成员士气低落。相反,共产党人正努力保持其良好的声誉,原为国民党所有的政治资本逐渐由共产党所得,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论述。〔39〕

腐败:其后果 出于他们人道主义的关心,自由派作者们倾向于集中关注官僚渎职的后果及深受其害者。在这方面令人震惊的事例几乎都来自农村地区。在这里,官僚腐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会发生:农村的贫困,国民党农村政策的缺陷,以及由于内战而造成的各种艰难状况。

例如,《观察》杂志江西南昌特约通讯员的一篇报道,集中描述了20世纪以来该省遭受的各种灾难的后果,包括20年代的北伐战争,30年代国民党的“剿共”运动,水灾,旱灾,以及日本侵略。他估计1947年的人口比本世纪初减少了40%。在一些地区,耕地总面积仅为二战前耕地面积的70%。而政府征收的土地税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却丝毫没有减少,根本不考虑劳动力及耕地面积的减少。无论江西的情况有多严重,政府从不对那里极端贫困的现状作出解释。作者非常明确地将责任归咎于那些腐化了的官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地的“吸血鬼”。〔40〕

类似的描述,不断地从那些对农村状况作深入调查的自由派作者笔端流出。农民的贫穷,交织着由腐败与内战造成的各种危机,显然是引起关注的首要问题,而土地占有问题则没有招来作者们同样的批评。这样的轻重选择充分显示了他们本人的思想倾向,以及对农村现状直接政治性的关注。但不管怎样,“吸血鬼”一词成了通用的称谓,被广泛地用以指那些乡、镇、保、甲的官员,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行政当局最基层的部分。

这些人直接掌管征税以及上级政府或军队索要的各种赋捐的征收,包括人、钱、粮及其他各种实物。众多的苛捐杂税,一些是属于中央政府的税收体系,一些是由于附近的卫戍部队的需要。一些是当地县政府征收的。还有一些是给村一级的民兵所用——这些是最普通的方面。使赋税的征收近乎横征暴敛的重要原因,是那些直接征税的人每次实际征收的数额往往超过所要求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的实际付出与国家政府的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41〕

没有法院可以让那些没有保护、没有文化的农民有一个鸣冤申诉的地方。当赋税难以承受的时候,农民们只有三条路可走。首先,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县或省一级政府机关申请减免。但经验告诉他们,这种方式并不有效。而且是危险的。官官相护,被告的下级官员往往会对闹事的农民进行报复。第二条路,农民可以拒绝耕种,但这种方式不仅对官方,对农民本身也没有好处。只有当赋税苛严到农民必须举债才能缴纳的时候,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最后一条路就是叛乱。这时,农民们将他们所有的愤怒倾泻在当地官员身上,他最多只能幸免于死。但只要农民的愤怒发泄了,这种叛乱的平息就像它的爆发一样快。因为农民缺乏有效的方式团结并坚持他们的力量,被赶走的官员很快就回来了,并开始报复。

自由派作者们记下了,所有这些发生在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各种不同的选择。他们将其归咎于中央政府的冷酷麻木与目光短浅,未能制止那些乱打政府旗号,以农民的贫困难为代价肥自己腰包的官员。

例如,在陕西南部地区,当地官员为赌徒和妓女开设“客房”提供保护。这些官员购买武器,雇用保镖,像暴徒一样用威胁甚至殴打的方式向民众征税。但有一点与街头的暴徒不同,中央政府授权他们以它的名义征收赋税。他们这种利用手中的权力剥削民众以肥私囊的行径为当地民众所深恶痛绝。在一些地区,地方官员通过种种借口,在一个月內二十次甚至三十次地要求各家各户作贡献。那里的人们都说,被收刮去的钱大部分到了官员私人的口袋里。〔42〕

1945年9月,中央政府宣布对前日占地区免除一年的地租及其他各项赋税。而紧跟着这一通告的,却是规定农民必须交纳地方政府所要求的各项赋税以及必须出售军粮。这意味着农民不得不将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政府。

有时农民所实际获得的补贴要少于政府许诺给他们的数额。由国家粮食部官定的粮价是每担法币5,500元,而安徽省政府马上降到每担4,500元。考虑到补贴资金从省政府到县政府,再到村、镇的保甲长们的“漫长的行程”,一位记者怀疑,最终到达农民手中的还剩多少?他提到安徽北部的某些地区,农民因得到的补贴极其低微而愤愤不平,他认为这种现象是由省级行政机关在执行国家粮食政策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所导致。〔43〕安徽省南部的芜湖县,在1946年春天,许多耕地被抛荒。该县县长自己也承认,农村危机的加深是由于向农民索要太多“不合理的义务捐献”以及“贪婪的地主乡绅”对农民的敲榨勒索。〔44〕

山西南部的行政组织与其他地方有些不同。最基层的组织

是“邻”和“间”，而不是通常采用的“甲”和“保”。五户为一“邻”，五“邻”即二十五户为一“间”，几个间合起来构成“居村”，再往上是“治村”，又称“编村”。这一级的行政长官包括编村长及其四个协助，一个秘书，一个书记，一个政卫团长，一个精建特派员，一个村连长，十几个村警，连差役等约 30 人。作者称这些人都是“如狼似虎”，“鞭打绳拴，样样精通”，欺压百姓。

1946 年一年中，据称村里的官员们征收了三次地租、谷物、棉花、棉布各一次，并以“借贷”名义征收了三次钱。村民还不得不提供官员们私人所需要的，或者是官员们认为可以榨取的任何钱物。在近期，这种勒索包括：鞋子、袜子、衣服、柴火、干草、大米、面粉、油、盐、酱、醋。更有甚者，村民们还必须给官员交纳“服务费”，通常情况下，当其他的苛捐杂税不太过分的时候，村民们表面上还能忍受这种做法。但是，1946 年不然。

在记者所在的村庄，最近已有八个人当过“编村长”。起初他们都很穷，而在卸任时，按当地水平衡量，都已相当富裕。记者的父亲这样劝告他的儿子，“你也不必出去谋生了，只要在村里谋到一个送信的差使就可以了。”^[45]

该记者还记述了虞乡县的一件事，那里的自耕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联合起来，反抗苛捐杂税。他们决定把土地交给县政府。但这没能实现，当地官员认为这是一场叛乱，并扣押了农民们推举出来与政府交涉的几名代表。

湖北中部也是一个灾害频仍的贫困地区，但当地官僚依旧能从农民身上榨出油水。农民们在日本人走后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但他们没钱修建房屋或购买牲畜、农具以及稻种。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湖北的办事处许诺给农民的资助，到春耕时还没有兑现。县和村的官员们垄断了中国农民银行汉口分行的农业贷款资金。农民们估计他们的收入将不足以承担地方各种苛捐

杂税及高利贷者的利息,结果 1946 年的春天,耕地抛荒,无人耕种。〔46〕

各地农民处境相似。年成好的时候,米商们垄断市场、压低粮价。而在歉收的年头,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们被迫向当地的放债者借贷。〔47〕中国的农民向来如此,这并非 20 世纪的特殊现象。国民党政府的错误在于,它没能够缓解这种状况。政府没有推行任何方案以改革粮食市场体系,也从没有实行其反高利贷法令,政府所做的最多只是在情况特别严重时拨发救济款和紧急贷款。然而这些贷款很难发到真正需要者的手中,至少看见的是如此。这些救灾方式经常被实际执行的官员擅自改变,众所周知的 1946 年湖南饥荒事件就反映了这样的现象。

1946 年,湖南各地传来饥荒的报道,中部和南部情况最严重。这些地区在上一年遭受了旱灾,但这仅仅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另外的包括:1944 年和 1945 年日本人的强行征粮;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又征收一次;由于战后食物短缺,粮价暴涨,许多湖北人到湖南购买粮食;交售 1,600,000 担军粮;以及战后政府机构的扩张必须由地方财政负担。但是人们的抱怨还不止这些。据称,军队征收军粮却不按规定的价格支付给农民粮款。军队遍及全省各地收购粮食,不是为满足部队本身的需要,而是在收购之后到异地出售。由此造成了湖南的粮食短缺,并阻断了重要的交通干线,而这在第二章描述的湖南汽车接收丑闻发生时已遭破坏,结果,在日本投降后,湖南的粮食紧缺,极为明显,然而却被前来接收的国民党官员们忽视了,他们正忙于各种各样的接收活动。〔48〕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中央政府取消了另外 2,000,000 担粮食的征收任务,同时警方出面禁止军队非法倒运粮食,民愤由此而略有平息。然而这些措施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很快就被暴露出

来的救济项目中的腐败现象所打消。救济工作包括从江西紧急调运粮食，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贷款，免费分发来自美国的面粉和衣物。但负责分发面粉的官员却常常将这些东西出售。在祁阳县，他们把面粉卖给饭店及粮店；在醴陵县，一个救济工作人员在市场上卖出了70袋；在衡山，保甲长们侵吞了绝大部分救济物资；在永安地区，他们以每斤50元的价格出售；还有一些地方的官员甚至以国产面粉替换进口的救济面粉，而将后者以高价出售。

至于紧急贷款，负责管理这个项目的官员使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们占尽了好处。尽管规定不允许，官员们还是给普通百姓的贷款附加了极高的利率。在衡阳，地方政府获得了3,000万元建设贷款，只有1000万到了各建设项目的承包者手中，另有2,000万不知去向。救灾物资根本发不到需要者手中，而是被有钱有势的人、乡长、保长们所侵占。〔49〕

《观察》在甘肃兰州的通讯员，报道了1946年在当地同样存在的、如上述及其他种种形式的偷梁换柱的事件。该省许多地区在前一年遭受旱灾，官员们将此当作发财的好机会。他们向国家申请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救济款，而后又把这些资金以高利率贷给农民。陇西县和渭源县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另一事件是在一次修建公共设施时对劳工们的剥削。为了修复一段公路，从附近的乡里招募劳力，每三天换一班，并许诺每人将获得3,000元报酬。到发工资那天，县里的一位官员对工人们说，他们每人可得3,000元，而当地的国民党人员以及县政府各机构的长官们却一分钱也拿不到。因此他要求每人交回1,000元给党政官员，而工人们真的就这么做了。

在通渭县，县长拿出1,000万元作为向百姓投放的贷款，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段时间，谁都知道对此负有责任的官员

躲在兰州,但是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调查。偶尔也有一些村民集合起来到镇上要找罪魁祸首算账,但毫无疑问,立即就会成立某个特别委员会并保护那些官员。当地的人们深深体会到了一句老话的正确性——官官相护,而所谓“人民的意志”则无足轻重。人们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许多人不遗余力地去争当县长,尽管这个职位的薪金微薄。

然而,至少有一次,甘肃的农民让人们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尽管最终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他们的反抗发生在1945年。起初被当作“匪乱”,不久政府不得不承认是一次“民变”。它在临洮、康乐和洮沙三县发起,随即扩散到榆中、定西、渭源和会宁。混乱的情况极其严重,以致波及到了兰州。反叛者的行为和所用的标语口号(其中之一是“反抗饥饿的自由”)都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杀了保、甲长及乡级长官,然后又转向杀县级官员和到该地开采资源的外地人。叛乱最终还是被镇压了,紧接着是通常的处置与惩罚。除了换一些新的官员之外,一切如故,没有丝毫的好转。一些官员甚至想从混乱中渔利。当地人则害怕被纠缠,当他们确信不再有指控以后,钱又开始满天乱飞了。[50]

类似的农民暴动也曾发生在1946年上半年的浙江北部。抗战期间,这里是共产党及非共产党游击队活跃的地区。当人们第一次起来反抗与日本人勾结的乡、保、甲长们时,叛乱的农民所采用的方式,确实与共产党在某些地方所推行的相似。尽管如此,暴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叛乱的特点,人们依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地起而反抗。[51]潜在的问题是,该年农村贫困的日益加剧,许多村庄几乎出现了饥荒,而国民党的接收政府则向当地民众强行征收大米、食物、钱以及劳力以支持政府的运转。农民们抱怨,无论是现在中国政府统治还是当年日本人占

领时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的负担几乎没有改变。[52]

开始时候,男女老少几千人来到省会杭州,要求政府减免。这些人都来自附近地区(包括崇德、桐乡、桐庐、富阳、诸暨、绍兴、萧山),省政府对此无动于衷。突然之间,在1946年1月,暴动在崇德、桐乡、德清和吴兴四县发生,席卷了20个乡镇。3月份,嘉兴与新登两县也发生了同样的叛乱。4月份,叛乱更是连片发展。尽管在每一处,叛乱一经发生即遭镇压,但是乡、保、甲长们已经深深地意识到了农民们的愤怒。

这些官员是叛乱中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不仅仅因为他们曾充当汉奸或是因为他们应对苛捐杂税的征收负责,还由于他们“残酷与腐化”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即便在当地人对那些“冷酷无情的”动物们的描述中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多数事实是可信的。据一个故事说,保长宁愿看着一个赤贫的农民去自杀——实际上他真的这么做了——也不愿去减轻一点压在他肩上的沉重赋税。官僚们榨取了一大笔资金,有时用枪口逼着农民交纳,但从来不入账。农民们看到,以政府名义征收的每一斗米,乡、保长们都可以从中捞一把。

那些敢于反抗的人因其大胆而受到迫害。县官们总是卫护乡、保长。去杭州请愿的队伍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决非偶然。男人们不敢让她们留在家,以防乡、保长们的报复。当他们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或地点,到底要达到多少数量才足以使其成为一个独立变量。既存的怀疑将抵不住这样的事实:腐化的人原本就是社会上的最富有者。^[54]我们将会看到,共产党人会嘲笑对国民党的这个问题作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因为共产党所控制地区的贫穷已为人所熟知,而它的干部们的廉洁也为世人所乐道。尽管自由派作者公开声称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但他们似乎还不能将腐败问题作为一种体制的必然产物来分析,在这种体制内,个人的安全完全取决于他所拥有的金钱和财富——无论是在国民党中国,还是在帝制时代。

事实上,自由派作者并不倾向于从历史层面来分析这些问题。因为如果将国民党看作一种官僚体制的继承者,而不是胡作非为的罪人,而这种官僚体制本身又在其结构与运行方式中具有其固有的弱点,那么就会转移国民党为其错误所要承担的责任。这些现象是如此地古老,而这些传统问题与国民党体制内所出现的又是如此地相似,这就足以证明上面的结论。20世纪40年代,就像在19世纪时一样。地方官吏的薪俸微薄得几近不合情理。同样,在11世纪,最多的指向中国官吏的社会不满是由官吏们的贪污腐化所导致——尤其是下层官吏——而这种现象“主要由官吏的低薪收入所造成”。^[55]

除了“不够温饱的工资”,萧公权教授指出了另外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为19世纪中国官僚体制所固有,它们为官吏的腐化制造了条件。这些因素包括,向上级送礼的风气、买卖官职以及县级官吏缺乏起码的职业培训。这最后一个因素以及当官职任期的限制,使得他必须依靠“那些横行霸道的手下”,而这种人充斥着整个地方政府机构。^[56]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在40年代依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尽管两个时代中这些因素存在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官吏们的反应则是一致的。

这些做法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并且只要他们不是太“过分”,社会也能接受与容忍。“过分”一词的涵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说来,在内乱发生或王朝衰败的时候这些问题才会被注意到。王朝衰落的标志通常是:国库匮乏、行政失效以及军事软弱。在20世纪40年代,这些情况都存在,并且由于官吏的腐败促使危机进一步深化。

在国民党中国,人们依旧能在“一定限度内”容忍这些状况。^[57]因而将腐败只当作程度问题而非本质问题的这一传统本身很少受到指责,即便是自由派的批评者也是如此。尽管他们承认,人的本性使腐败一经产生便很难被清除,而习惯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地不受人控制。例如40年代有两位社会学家认识到在农村地区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且被现状进一步强化,那就是“当官就能发财”,然而他们将问题主要归因于封闭的乡村经济。因此他们呼吁发展农村工业,以为那些寻求地位与财富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提供“其他发展途径”。^[58]

在内战期间日益紧张的气氛下,种种呼吁逐渐变成谴责。批评者们很少花时间去分析如何进行合理化改革,而是坚持国民党对这种情况负有直接的责任,是它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在所有的谴责中,一个最有创见的观点是用经济理论去分析官僚体制的膨胀。作者将40年代末的情况与30年代初期作比较,他指出,在早些年,人们并不会将腐败与无能必然地与国民党联在一起,“不仅在1931年到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没有发生一件腐败案子”,他写道,“而且谁会想过称它为一个腐败的政府?……谁会否认它的施政与成就?”政府依旧,掌权的人也依旧,但他们处理国家事务的方式却与十年前截然不同,而人们对待政府的态度也完全改变了。

作者首先提到,由抗战及随后的内战造成的经济贫困,战争

带来的通货膨胀使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比战前明显下降。他们失去了财富,而收入又难以维持生计,便很自然地转向贪污和腐化,就像传染病一样,很少有人能幸免。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些情况正是腐化现象得以长期生存的土壤。

其次,作者指出机构官僚化现象,政绩越少,官僚越无能,他们就越倾向于牢牢把持住他们的职位。高级官员并非徒长年齿,他们已经成了官僚。他们允许从中央直到省、县各级地方政府机构的膨胀。各地的政府机构及官僚人数都比二战前多。机构臃肿、权力分散,政府雇员们也就越来越不负责任。不仅仅是机构数量的增加,而且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扩大,比如新的考试体系、人事、会计、审计、统计以及国家财政体系等等,都是新建立的。每当一个新的体系建立,就会颁布一系列新的法令规章,而原先的则要被修改。毫无疑问,一般人无法弄清楚各种更迭变换,因此衙门对他们的威胁就更大了。而人们所感到的威胁越严重,官吏们则更容易乘机谋取私利。

最后,这是一个循环的怪圈,机构的膨胀意味着人员的增加。考虑到国家的财政状况,人员越增加,收入就越低,这又促使了腐败现象的泛滥。对于这些政治危机的主要方面,作者认为,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59]

内 战

注重腐败产生的经济因素的倾向是一把双刃剑。它从来不以比较善意的语调提到政府,而只是一再地强调政府所应负的责任。通货膨胀政策并非必然要受到集中攻击。通货膨胀也许是民众贫困的最直接原因,但即便如此,它也只是导致反战情绪的多种因素之一。或多或少有这样一种共识:一旦与共产党打起来,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采用这样的财政政策。而这种政策,不管政府如何小心翼翼地推行,其负面效应是无法避免的。因而,内

战成了每个人关注的中心,它也是每个人所遭不幸的最根本原因。1947年春天学生游行示威过程中,北平、天津地区585名教授联合发出的声明,代表了当时民众对于和平的吁求。宣言写道:

最近几星期以来,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都发生了骚乱,有抢米风潮,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我们——以下签名的人——致力于文化与教育工作,从没有政治野心,然而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由内战而引起的怒潮和经济凋敝。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情况也没有比这更严重。

我们清楚地知道,今天所有未解决的问题都由经济危机而生,而经济危机又由无休无止的内战而起,所有的罢课罢工都是这种现状必然的后果。我们通过研究深信,中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还是文化。

……如果国民党、政府以及军事当局希望挽救他们自己以及广大民众,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立即停止内战,诚意地与共产党谈判以谋求和平并建立联合政府。〔60〕

一年以后,储安平在评论1948年5月组成的翁文灏内阁时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值低落,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的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到全盘的改革……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61〕

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内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要为保住国民党政府的执政地位而进行一场内战，代价实在太大了，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直到1948年中，人们普遍认为内战将无限期延续，因为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很难取胜。有一种说法称，国民党自1927年就试图消灭共产党，从来没有成功过，现在也看不出会有什么转机。国民党军队在苏北、鲁南取得了胜利，在1947年初甚至占领了延安。但是共产党并没有真正被摧垮。他们依靠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游击战略，使得对方很难消灭他们。并且，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预示着经济状况危在旦夕。

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不能轻易地打败国民党。原因有多方面：共产党并没有获得比国民党更多的民众支持，而且共产党的经济也十分脆弱。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被认为力量相对比较强大，尽管有腐败及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最后一个认为共产党无法打败国民党的理由是，苏联给予中共的援助无法与美国给予中央政府的相比。^[62]

关于战争的代价，一方面是通货膨胀使城市经济全面崩溃，另一方面是农村的日益贫困。印钞机也许是政府主要的岁入来源；但同时，正如上述所提到的，政府还依靠征收地租，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公粮，甚至以暂借的名义征集粮食，如此种种，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滥征壮丁，军纪涣散且津贴极少的当地驻军的胡作非为，使许多地区的农民不堪负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上述的各种腐败现象方能显示出其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战时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为官吏们的贪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通货膨胀则刺激了这样的动机。一些批评者写道，战争的实际后果违背了政府的初衷，因为它使得社会状况更有利于共产党势力的增长。最后，日益穷兵黩武的政府，人民对政治的日

益疏远,都被作为战争的后果而受到抨击。

由于有这些理由,而政府仍坚持要打这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同时又不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以使民众认为政府的决定是值得的,这就为自由主义者的谴责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是一个“民享”的政府,相反为了追逐自身的私利,它宁愿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且它甚至无法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

战争:经济后果 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贫困也波及到了城市中的中等工薪阶层,这并非城市知识分子们通常谴责的唯一的战争后果,尽管他们自身也属于工薪阶层的一员。^[63]他们经常把注意力放在农村,描述由于内战而施加给农民的难以承受的重负。很难确定,战争给他们本人带来的经济损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只有一点可以确信,他们的状况也不好。如果他们的文章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那么战争给农村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悲观估计。通货膨胀给城市经济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带来的灾难,对他们也有相同的影响。

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强调实际上只有部分是出于他们人道主义的考虑。他们对农村问题的描述,在两方面作出了比较客观的估价:农村与政治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场在尚有80%农村人口的非工业化国家进行的战争。在这些估价中,经济学家杨培新提供了一份最明确的报告。1946年6月,中央政府决定在从10月份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对国内的大部分省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五大城市重新征收地租、征购粮食及征借粮食。征购及征借粮食的总数中,60%归中央,15%归省,还有25%留在县里。除此之外,还有地方征收的“公粮”。1946年财政年度征得的粮食,包括公粮,达69,971,411担,都是大米和小麦,其中约3000万担归中央政府。

然而,1946年的粮食财政还是彻底失败了。3000万担远远不能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据最保守的估计,差额也将在1500万担左右。杨指出,这是由于南京政府低估了战争的严重性及其对手力量的结果。到1947年3月,政府有400万军队,按规定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是25盎司(约合十四市两),后勤人员估计有200万,他们的需要再加上公务员,使得政府1946年财政年度的粮食总需求达4,500万担。

最终,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征粮,同时用外汇从国外进口粮食。更深远的后果是导致了粮价暴涨,而在1947年政府仓促推出紧急经济政策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军队多集中在北方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征粮更为厉害。地方政府被责成按中央政府的惯例,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购买粮食。例如,河北省粮食部门以每斤1,300元的价格从一个粮食贸易公司购粮,而当时的市场价格为每斤3,000元。商人们很自然地抬高价格。在榆林,200家粮店7月初全部关门,因为政府的征购挖空了他们的储备。在四川,中央政府在5月初派出官员征购大米,粮价几乎一夜之间由每担12万元跳涨至每担40万元。

然而,军队依然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供应,农民自己也不能维持温饱。据估计,当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征购,平均占到农民所生产出来的30%左右。7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为下一个财政年度制定粮食政策,尽管一些省主席反对,谷物税和征购总额还是由1946—1947年度的7,000万担提高到1947—1948年度的8,700万担。持不同意见的官员认为,不能再增加农民的负担了,因为早已到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农民们只能靠草根、树皮来充饥。杨估计约有3,000万农民为政府错误的粮食征购所害。然而,他最后下了这样的结论:“这并非粮食政策本身的错误;而是内战……导致了政府粮食政策的灾难

性后果。”[64]

为了让读者们了解,这些战争所带来的负担对一个普通村庄意味着什么,《观察》刊登了一封来自上海附近江苏省南汇县陈桥乡的居民来信。该乡有居民 15,000 人,耕地面积 32,000 亩。信中列举了十四种不同的赋税,包括支付 16 名正规部队士兵兵饷的 192 担大米,制服 10 担,军火 15 担,还有 126 担是作为乡对南汇县自卫队的赋税,此外尚有 12 担用以维持乡政府官

市所徵 以此县每年的田亩土山

不易恢复元气的损失。”^[67]

战争：征兵 另一个反对政府和战争的标记是“征兵闹剧”。《观察》甘肃通讯员的一篇评论，概括了当时所有的自由派报刊上有关征兵过程的描述。当谈到省里的官吏们在1946年接到招募24,000名新兵的命令时，他写道，“……消息一到，人们都大为发慌，但乡保甲长们却高兴得跳跃，因为他们的鸿运又到了，又可以大大的捞一票。”^[68]

作者们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征兵的过程，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征兵体制原先建立时，是为了将兵役负担基本上比较公平地分派，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正相反。原因是由于一般人都不愿意当兵的传统。有钱人可以用钱买通路子——考虑到官员们的腐败风气，这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穷人们也竭尽所能使自己免于当兵。

理论上，征兵应按照下列程序进行，这里以浙江省为例加以说明。首先，由保长列出他管辖区内所有20到35岁身体良好的壮丁名单。名单张榜公布，人们可以有两周时间想办法，将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拿掉。两星期结束时，召集保的代表会议（通常包括保、甲长、小学校长、区秘书以及各“乡绅”），决定在所有要求豁免的申请中哪些可以接受。然后列出修改后的候选人名单，并加以编号，正式书写在竹牌上。名单由保送至县政府。县城里召集一个会议，例如乡长、镇长等重要人物从竹牌中抽取。

抽取的方式视从该县招募的人数及该县保的数量而定。比如，该县须招700名士兵而该县有700个保，那么每一保送两名候选人：一名应征，一名替补。一种方式是，如果抽出的第一张是73号，那么所有保的73号都成为应征新兵。而第二次抽取的是49号，那么所有保的49号都成为替补者。通过这种方式，700人很快就被选出，并由县政府送往附近的新兵征集站。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表面程式化形式的背后,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非法交易。各地的壮丁费不同。在浙江某县,是300万到500万元。如果愿意付这样一笔钱,分给地方官吏和那个替补者,他就能让替补者代替他服兵役。经常这样征集来的“职业壮丁”不久就失踪了。征兵站就报告他们死了或逃跑了。如果是后者,则由官方出动在全省搜找。如果找不到,他的名字就从部队名册上划掉,而他所在的保就得另出一名以顶他的位子。在失踪和名字被划掉期间,还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如遇到上级官员突然来检查,他们就花50元钱找当地农民代替点名。〔69〕

关于北平征兵的报道,揭露了更多的舞弊行为。1946年,法定的程序全部被放弃。征兵的命令在8月30日发生,第一次征兵在9月11日进行。按规定,应该先列出基本名单,然后从中随机抽取。然而,由于缺乏经费、人力及周密的计划,征兵根本不能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当地官员就直接从各城区及郊区去抓一批人充数。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造成民众的慌乱。而当地方官吏到各地去征召的时候,贫富之间的差别就显示出来了。尽管军方三令五申要求地方官吏杜绝舞弊行为,但是那些能够付得起100万到200万元的人还是可以买通路子。

这激起了强烈的民愤,于是,市政府与当地的国民党党部联合对某些指控进行调查。但大部分最终宣称“查无实据”并被指为在民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公众的批评依然在继续。市政府官员不得不承认,1946年9、10月间的事件对加强国民党在北平的声望没有好处,因而他们表示要从中吸取教训。〔70〕

但是,法定程序还是不断被打破,就像在二战期间发生的那样,1948年上半年,《观察》登载了一系列有关征丁的来信。成都、青岛、南昌、苏州、咸阳、上海,各地来信都描述了类似的情况。军队通常自行征兵,以填补军队中的空缺。当地的保长知道

每一户符合应征年龄的人数，于是就由保长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夜里挨家挨户地抓壮丁。路上行人也经常被抓为壮丁，有时还包括学生，而国家有规定学生是可以免于服兵役的。当在青岛被抓者的家属向当地军官申诉时，军方回答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一封来信说，军队可以这样胡作非为，我们还谈什么宪法保障和人权？

各地都有报道描述壮丁交易是多么有利可图；只要有足够的钱，地方官吏会变得多么“好说话”；他们如何能从村民身上榨取实际上给予应征者家属补贴的三倍的粮食。

一封成都来信提到，尽管地方官吏声称壮丁的待遇有所改善，但因为没人愿意当兵，所以壮丁多半是被抓去的。穷人躲避兵役的方法是逃走，直到征丁的人离开再回来。据说在成都，近郊农民们为逃避兵役而让他们的地荒着；一些人则武力抗丁，还有人甚至出卖劳力给地主以寻求保护。

在沈阳，同样也没有人愿意当兵。1947年5月，抽签过程根本无法进行，因为按规定应征的4,000人在点名时只到了82人。最后，其中的39人通过了体验，未经抽签而直接入伍了。〔71〕

人们不愿意当兵，并不代表他们反对这场与共产党的战争——尽管表面上人们也没有对它表示多少热情。一位记者在访问了安徽中部的一些村民后提到，人们也并不是怕打仗，他们的热情完全是被征兵抽签中的舞弊现象所挫伤。征兵的过程以及一般士兵都声名狼藉。在中国的美国人，包括中国人自己在二战期间都对此作出过批评。〔72〕而在内战期间，没有任何改进的迹象。1945年6月，西安的一份报纸，针对国民党中国臭名昭著的征丁指出三个主要问题；（1）征丁过程本身的不合理，金钱在其中起着决定的作用；（2）士兵的待遇极差；（3）对士兵家属的漠不关心。

1945年7月中旬,第八十军的5名军官因杀害了105名应征壮丁而受到惩处。这时,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指控征丁的官员要求壮丁们自付口粮;官员们将分配给壮丁们的粮、煤拿去卖掉,而壮丁们却只好忍饥挨饿;富人、知识分子、年轻的商人均能得以幸免,而穷人只得被抓去作壮丁;乡、镇、保、甲的官吏以及军官们都从征丁交易中获得好处;新兵在冬天得到夏天的制服,而在夏天却领到冬天的制服;残酷的非人待遇;许多壮丁因极恶劣的待遇而死去,当局则悄悄地将尸体埋掉以掩盖事实;受伤的士兵被活埋;新闻检查制度使得关于征丁的各种批评不得见报。兵役部长对这些谴责作了公开的答复,但是要求对整个征兵行政机制进行“根本改革”的呼吁却被忽视了。[73]

对于残酷地惩罚士兵以及士兵们得不到充足的食物、衣服供应和医疗保障的指责,在内战期间依然继续。军官们将理应发给士兵的粮食出售,私吞了所有好处。运送途中,壮丁们被用绳子绑在一起,并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以防他们逃跑。许多报道提到军队对伤员的忽视,医疗设施很少甚至没有。[74]一则来自安徽的报道讲述了一名壮丁逃跑的故事。他最终回到他的村庄时已极其虚弱。他说他和其他很多人被锁在一间小屋子里,天气非常热,不允许洗澡,每天的食物仅仅是几碗稀粥。晚上,他们就被捆在一起以防逃跑。[75]

在浙江,当地官员召集一部分民众代表、国民党党务人员及县的行政长官们开会以讨论当地的军事问题。据一位当时在场的记者报道,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调查者提出的问题表示赞同,只有一位老者发言痛陈壮丁们所受到的严重摧残。他讲了他们如何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衣服,当官的如何殴打士兵,士兵们在行军途中若是病了,当官的根本不关心,听凭他们死去。这位老者后来受到当地军官的严厉喝斥,并被威胁如果日后再这么不知趣

地乱说话就要小心些。〔76〕

战争：军纪 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涣散与士兵们所受的非人待遇同样受到了公众的关注；这是国民党军队丧失士气的两个方面。一个被枪口逼着去当兵的农民，当他发现事实已无法挽回的时候，是否会用他曾遭受的方式去对待与他一样的贫苦农民，这一问题这里无法做更详细地探讨。或许士兵中间也有差别，比如被抓的壮丁与志愿从军者之间；壮丁与职业或雇佣军之间；或者在家乡作战的士兵与远离家乡几百里的士兵。但尚没有这样精确的同时代的研究。

“如果普通老百姓爱惜他们的生命，”《观察》在保定的通讯员这么写道，“他们就得出钱。士兵和土匪没什么两样，过去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军队一来，城市就大乱。他们抢米、布、牛、马，以及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包括人们的衣服和鞋子。那些胆敢不把东西给他们的人就会被当成共产党嫌疑分子。当人们试图告诉士兵遵守军纪时，他们回答他们是在拼命，他们的饷金并不充足。并且，他们知道上级不会处罚他们，因为中央政府需要他们去打共产党。纪律严明可能导致开小差。〔77〕

一位记者讲述了他在1947年，回到他离开了18年的家乡——一个位于东北四平街附近的村庄时的情形。他发现家的屋子几乎要倒塌了。他哥哥告诉他，如果修好了，附近的士兵就会住进来。他母亲说得更明白，“日本人在的时候，我们都盼望蒋主席回来，但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是这个样子。日本人至少不会冲进屋子抢东西，现在还不如那会儿。他们想住就住，想拿就拿，这屋子简直不是我们自己的。他们还骂共产党，说他们要将每个人的东西共产，但他们自己每天不也这样做吗？”这位记者回乡探亲，却在十天后被逼离开，因为某天晚上一队士兵闯到他家要把他当壮丁抓走。他的母亲试图从中周旋，但为了他的安全，还

是在第二天逼他离开家。

那时，他也曾与那些每天到他家里“借”东西的士兵交谈过。他告诉他们，“我在战场上打了好几年日本人，那时候尽管我们的纪律也并不好，但也不像你们现在这样糟糕。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回答说，在打日本人的时候，谁逃到敌人那边就会被当作叛徒。而现在，谁也不敢对他们太严厉，因为怕他们掉转枪口为对方作战，并且许多人因为他们这样做而把他们当作进步分子。〔78〕

战争：政治后果 关于战争的政治后果，一般认为有这么几方面，民众的政治热情降低，正如上文提到的士兵们的抱怨一样；政府的日益穷兵黩武。前者在1947年夏天的一个事件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据说国民党士兵曾问过中国北方一些农村的农民。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哪个好？而农民的回答是：“你们都好，就我们老百姓不好。”〔79〕这个故事在1947年夏天被不断提到，并在知识分子圈内被看得非常严重。一位社论作者痛心地说道，多么辛辣的讽刺！但谁又能否认农民们所说的事实呢？战争双方在剥削民众方面不相上下。〔80〕

同样，《观察》在长春的通讯员，报道了他在周围农村所做的关于民众政治态度的非正式调查情况。他声称，他没碰到一个人承认对共产党是否占领其村庄这样的问题表示关心。“八路来了也不会怎么样，”一些人说。还有的说，“我们看了七个月的中央，两个月的八路，半年多的大鼻子（苏联人），谁来都一样，我们怕什么！”“要我们再像日本降伏后，盼爹娘似的盼好日子，是不可能了。”作者写道，真正的悲剧是，一部分民众在对比了国民党之后开始回忆起日本人的某些好处，而你根本无法与他争论。〔81〕

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看来，同样可悲的是军队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和行政事务，尤其在省一级，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他们将

之归咎于长时间的战争状态,并指出美国人魏德迈将军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表示不赞同。^[82]他们认为,政府中的军人代表了民主政治的反对力量。一个关于梁华盛将军在吉林的政治“作风”的描述,代表了这样的观点。

这位将军在1946年被任命为省长。人们称他为一个“小眼睛”的广东人,一个喜欢自我炫耀的家伙。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自己在公众面前表现为一个阅历丰富、性格坚强、能控制局面的人。不久,他就宣称吉林省没有任何财政上的问题,这结论显然值得怀疑,因为省内还有不少贫困现象。将军本人当然不会有什么财政问题,因为他很快就买了一辆汽车,而且据说他为自己修造了一个温水游泳池,而不顾当地燃料煤的紧缺。

他将所有以前日本人的工厂和企业收归政府控制。小商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做法带来的影响,省政府垄断了当地市场上许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驱除业已控制该省许多县的共产党人。最后,作者无奈地写道:“如果中国尚不能进步到民主选举省主席的地步,那么我们至少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再让一个军人来担任省长的职务。”^[83]

钱端升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军界对国民党影响的历史发展,并追溯到孙中山最初与北洋军阀的结盟。这在当初仅仅为了军事上的某些便利而进行的联合,不久之后,军阀力量就开始向党内渗透,而成为党内一种难以消除的影响。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试图斩断与北洋军阀的联系,但同时更注重训练自己的军队并创建了黄埔军校。党也允许部分军阀加入到革命军队队伍中。北伐之后,军事时期应该结束了。事实上,训政时期根本无法开始:国民党已无法摆脱它赖以实现其革命目的的军队。这样,蒋介石,一个军界的主要人物,就成了政治领袖。

1929年召开编遣会议进行裁军,但军队的高层人物包括蒋

介石,都不愿意裁减自己的部队。蒋开始反共,因而军事控制依然显得很重要。正是这种军事控制最终导致了内战。共产党成功地控制越来越多的地区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权力日益扩张是有密切关联的。黄埔军校中对蒋极为忠诚的人,构成了国民党内军队系统的核心。因为他们与蒋的关系以及他们掌握着政府军,他们成了国民党内最重要的人物,因而能在各个方面对政治施加影响。

一旦一个军事派别成为政治中的主要力量,钱端升认为,它的反对党也必将诉诸武力。而公民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除非也依靠武力。一切民政事务成为军事的附属物。更有甚者,中国的军队无视任何法律并且没有任何为公众利益负责的概念。钱教授表达了许多人的看法,他说如果不将军事影响从各个政治层面驱除,将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文治政府的管理之下,中国的老百姓将永没有得救希望。〔84〕

战争:责任 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共同承担战争的责任,尽管他们也并非毫无责任。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战争负有同样的责任,他们也不比国民党更希望和平。还有一些严厉的批评指责,两党都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而以整个国家为代价。〔85〕尽管如此,反战运动的主要矛头却总是直接地指向国民党政府。有几方面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

例如,吴世昌提到反战的学生总是向国民党政府而不是共产党请愿,因为他们并没有倾向共产党一边。他们依然将国民党政府视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认为它有能力制造战争同时也有能力带来和平。吴教授指出,请愿者实际上是支持政府而不是反对党。

再者,有一种倾向认为,共产党在1946年1月的政协会议上是有诚意的,他们与国民党的代表达成了一系列决议,旨在解

决双方的分歧以避免内战。然而仅仅在两周以后，国民党就单方面撕毁了政协决议（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为），因而大大地损坏了它的威信。对国民党政府诚意的怀疑，由于另外两件事而加深。一是扰乱 1946 年 2 月 10 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召开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一是几天以后冲击共产党在重庆的报社。两起事件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内右翼势力雇用的流氓所为。〔86〕

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更重要原因，也许是人们认为，共产党力量的增长是由于国民党的弱点和弊病。自由派批评者坚持认为，国民党在执政的几年中没有消除这些弊端是极严重的失职，因此它应对共产党力量的壮大负主要的责任，因而也对内战负有主要的责任。这是钱端升在论及国民党的穷兵黩武与共产党的武装反抗之关系时的主要观点。经济学家伍启元的观点更为激烈，他比他的同行们更强烈地谴责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内战的本质，”他写道，“我们必须来看过去的九年中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接着他写道：

结果经过了九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战前的中层阶级在通货膨胀和压低待遇双重压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沦为赤贫。占人口 85% 以上的农民，则在兵祸、匪祸、征粮、出丁、水旱天灾等重重压迫之下，已在饥饿线上作重危挣扎。在这极大多数同胞无法生活的时候，通货膨胀等政策却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无论有没有共产党，那能不发生内部的战乱？共产党力量所以膨胀，可以说是受这种经济政策之赐。

任何人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都会利用经济上贫富对立

和政府偏袒富裕阶级的弱点，利用极大多数的贫穷的人，起而与政府抗争。〔87〕

储安平在斥责 1947 年访华的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蒲立特建议美国给国民党政府以更多的援助：

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势力？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直率地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88〕

无 能

连篇累牍的文章揭露并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包括政治上、经济上、行政上及军事上。激起连续不断批评的问题包括：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处理；经济上的失误；对待数万从交战区或共产党地区逃出来的难民的态度；以及政府在满洲的彻底失败。

在第三章，我们已讨论过关于政府镇压学生的合理性问题。最基本的观点是，政府的镇压手段实际上加深了学生们的对立，并把他们驱入了共产党阵营，结果正与政府的初衷相悖。

政府在经济上的失误也已在第四章中作了充分的讨论，这里毋庸赘述。〔89〕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指责并非针对通货膨胀经济政策本身，而是针对国民党在使这样的政策不可避免的路上一意孤行。同时批评还指向政府在推行政策时的无能，包括没有有效的措施以减少最坏的影响。

政治无能：难民 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民众害怕共产党或者打仗而逃离家乡，也常常受撤退的政府军队的鼓动和帮助，前者占大多数。一位作者提到，在1947年中，许多人从松花江北共产党控制地区迁移到江南国民党控制的东北城市中，因为他们对共产党的严格的统治感到不自在。难民中包括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他们不喜欢中共的教育体制，而希望能以他们以前所接受的方式继续他们的学业。〔90〕

此外，小商人们也从那些地区逃出来。另有报道描述了在长春的难民中包括那些被清算的地主和商人的孩子，以及害怕被中共军队招去当兵的年轻人。〔91〕地主和小地主构成了难民中常见的另一类人。许多地主听说共产党一旦控制一个地方就对像他们这样的地主进行镇压的“血泪故事”后，顾不得调查传闻是否属实就仓皇逃走了。这些人构成了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的基本力量，一个精明的政府很可以好好地利用它。一些迹象显示了利用这些难民反共情绪的企图。其中之一是发生在1946年6月的一件事。一些据称是来自苏北的难民，在南京火车站殴打了一个和平请愿团。〔92〕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难民，政府根本不予关心。许多人很快陷入贫困。因为几乎没有工作，他们带着的钱物很快就因通货膨胀而消耗殆尽。据统计，到1947年11月，有10万这样的人聚集在沈阳。那些在长春的难民不久就沦为食不裹腹的饥民。许多到这些城市寻求“学习自由”的学生，则因交不起学费或学校里容纳不下而无法继续上学。他们与家里失去了联系，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成了“自由城市里的自由流浪者”，结果据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国民党政权“失望”了。〔93〕

与此相似，德克·博德描述了1948年6月大约2000名中学生难民从太原被空运到北平的情形。这些大多只有十二三岁

的学生一到北平就不得不开始自己谋生，除了社会救济局每天散发一次玉米面饼，学校当局根本不关心他们。博德教授指出，这些学生只能住在公园、寺庙或是城里的空房子里，他们变得日益沮丧。他们没有书，没有足够的衣服，没有卫生设施，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勇气去偷东西或是杀一条过路的狗来充饥。〔94〕

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估计，到1948年9月，北平约有两到三万学生难民，南京两万，汉口一万。〔95〕要求政府对这些年轻难民负责的呼声到那年的夏天达到了愤怒的高潮，愤怒的缘起是7月5日发生在北平的事件。一支军队向游行的学生开枪，至少打死14名、打伤100多名学生。游行者是受政府鼓动，并由政府出资从东北飞到北平和天津的5,000名学生的一部分。运学生到北平是政府的一项计划，目的是缓解东北各城市的食品及其他储备的压力，同时也为分散人口，以尽可能地防止他们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到1948年，共产党已控制了除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以外的满洲的大部分地区）。

这5,000名学生每人获得三个月的资助，但随后就没有着落了。那些在北平的人很快就成了街头流浪者，只能住在公园或寺庙里。与山西的学生不同，来自东北的学生开始不满。官方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建议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生们于是组织游行以示反抗，他们冲开北平市参议会的大门，并闯进了议长的宅院。于是，游行的学生被全副武装的军车包围了，并被机枪扫射挡住了去路。此事激起了社会极严厉的谴责。〔96〕

对此事的反应，与那些为从苏北逃至南京—上海地区的自耕农们的悲惨状况鸣不平的评论相比，只有程度的差异。《观察》的一封来信，描述了住在南京栖霞山附近山洞里的三户难民的遭遇。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砍柴，但经常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因为村民们将山看作村里的财产。一次，三个难民由于砍柴

而遭到村民们的毒打。难民们没钱自己裁决这件事，于是案子提交到法院。但县里的官吏不愿管这件事，因为他们没钱支付诉讼费。

在这些交涉进行的时候，受伤难民的家属们请求允许他们关在监牢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村里的一个大学生出钱为受伤者支付医药费。最后，县官答应饶过他们，但警告他们对当地人客气点。他还许诺如果他们离开本地，案子就算取消。三户难民不久回到了共产党控制的家乡。来信指出，“原来难民到南方来，是希望得到保护，但相反却遭到遗弃和损害。现在两党相争，一方面是争取人民，一方面却遗弃人民。”^[97]

满洲：溃败 国民党在满洲的作为同样显示出其政治无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后很快就掌握了该地区。批评者承认，国民党控制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军事形势的结果。然而，政府还是受到各种批评，指责它在从军事到教育的所有方面的无能与不负责任。^[98]

一些批评者倾向于将矛头指向几个地方的高层官员。而同时，人们也清楚，如此深重的灾难并非一两个人所能造成。因此大多数自由派作者致力于谴责整个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这几乎与接收同时开始。中央政府对日本人占领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的接收较其他地区稍晚，这是由于俄国部队的存在和政府本身不能将军队以更快的速度开进这一地区。当地居民并不欢迎军纪涣散的俄国解放者，他们指责中央政府让他们呆的时间太长。俄国人最终于1946年春天撤走，随即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便开了进来。正如第二章所述，他们在东北的表现与他们在接收其他地区时没什么区别。

然而，大部分批评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对满洲地区的不信任。中央政府采取了他们曾在云南实行的方式，对该地

区加强军事控制,目的是为了以防以“老帅”张作霖家族为核心的半独立势力重新抬头。接管这一地区的军队中,百分之九十的士兵来自其他省份。政府没有恢复该地区日占前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而是将原来东北三省划为九个行政辖区,并指派外来者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99〕在地方上,新来的国民党官员与当地地主及汉奸们联合,只有这些人可称是从来没有倒向共产党或依然受人欢迎的“少帅”张学良。

在云南,政府的努力至少还收到了暂时的效果。而在东北,加强政府控制的战略则显得非常不力,并且由于活跃的共产党与复兴的地方主义势力合作,使政府的努力一再受挫。30年代,国民党政府默许了日本对这一地区的侵占,从而加深了当地人对国民党的反感情绪,西安事变使这一情绪更为引人注目。日本投降后对蒋介石政府的最初拥护看来是真诚的,但国民党的接收政策及其官员的所做所为使得地方主义再次抬头。像俄国人一样,“南方人”在当地受到的欢迎很快就消失了。官吏们的傲慢与贪婪,国民党士兵——都是外地人——的胡作非为,使当地民众感到他们又一次沦为受压迫、受奴役的人。“沈阳只看重金钱和权势,”一位记者写道,“当兵的更是威力无比。而对于普通百姓,一方面他们感到天底下的一切都属于南边来的人,另一方面,他们今天的生活甚至不如满洲国的时候。”〔100〕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谴责中,前文提到的周鲸文在7月5日北平难民学生事件中所做的批评最为激烈:

政府也许不喜欢地方势力,但不能因此而轻视地方人民。二十年来的历史告诉我,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憎恨东北的地方势力,不惜用外国人来消灭它,毫不珍惜这块土地,并把这里的人民当作了敌人。今天依然如此,东北的力量正在被南京政府破坏。爱国的张学良将军已被囚禁11年,而今,这曾被南京政府牺

牲给日本人的满洲主权,又被交给了苏联……

对于政府委派外省人担任当地行政长官的做法,一位作者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不是“东北问题”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他写道:“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好人终究是好人,不管他来自哪里。”^[101]

通过张学良这一人物,我们可以看出东北问题的渊源与连续性。少帅是1936年12月在西安扣留蒋介石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因为当时蒋拒绝抗日。蒋依从了少帅及其部队的要求,但事后立即将他软禁起来。尽管战后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呼声极为普遍,张还是于1947年初被转移到台湾,并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管制。^[102]张的继续被禁激起东北的民愤,这一事实也并非没有政治意义。1948年3月的一则报道称,中央政府领导人在战后的东北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们忽视了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在满洲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极高声望;第二,他们低估了共产党在该地区14年的地下工作所积聚起来的力量。^[103]

关于前者,政府坚持它是出于国家统一的利益考虑,绝对不允许地方有独立倾向的势力存在,不管这种势力是否与共产党有关。批评者驳斥道,只有张学良才能领导东北的力量以对抗共产党,单靠中央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军依然军纪涣散,供给不足,与当地民众互相敌视,无力对抗受地方势力支持并正在迅速壮大的共产党军队。^[104]

关于第二点,政府受到的指责是,他们极肯定地认为,日本人及满洲国傀儡政府已经把当地的共产党势力消灭了。在日占时期,这些力量确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人们相信还有几千人坚持了下来,并且完整地保存了他们的组织。苏联军队在满洲时,占领了满洲的主要城市并控制了交通干线,但没有人占领农

村地区，共产党利用了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极好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甚至当杜聿明和中国军队接管东北时，他们依然错误地认为该地区共产党的根基已经被清除。

除了上述两大错误之外，也许还有第三点：政府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基于此，政府没有采取通常的拉拢一方而打击另一方的策略，而是同时面对地方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敌对势力，从而迫使他们结成了联盟。于是，东北成了共产党获胜的战略中极重要的一环。它清楚地显示了，政府由于长期以来忽视民众要求而导致的行政无能。

这仍然只是国民党的自由派批评者所描述的满洲失败的一个方面。他们还指责军方的错误计划和情报匮乏，批评军队将力量分散在各个防御重点，包括那些当时已不再具备战略意义的地方。“国民党为什么不集中力量进行反攻？为什么不派更多的军队来东北？为什么不武装群众以让他们成为防御力量？”这些是人们在1947年和1948年质问政府的问题。东北的司令官杜聿明被指责为愚蠢无能，并有传闻说他与监督行政机关的蒋介石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不能相处，无法共事。作为这种分歧的反映，据说军队与政府官员之间矛盾重重，根本不合作。

1947年8月，这两位将军都被撤换了。陈诚将军被委派到东北担任该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总指挥。但是他也没能挽回政府军在这一地区的颓势。他专制的工作作风及由此而带来的属下们的消极行为，成了广为人们指责并造成政府在东北的垂危地位的又一因素。他没能激发起当地人民的合作和信任。尽管他自身保持了廉正，但腐败依然在他的属下中间流行。

据一些报道，到1948年初，政府在东北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其他地方高得多。战争导致的物资紧缺，使得这一地区物价轮番上涨。共产党阻断铁路、电缆；控制或破坏煤矿、庄稼；并且到

1948年已控制了满洲的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但这还不是全部。

为防止日本投降后政府财政政策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影响到东北，政府在该地区单独发行货币，同时推出一系列措施，以保证这一货币政策的成功。据估计，1948年初，政府每月在东北的军政开支达2,000亿当地货币。实际的支出可能还不止这个数，众所周知，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以资助“流亡”到沈阳的东北七省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所任职的那些新建省份已被共产党占领，有的甚至从1945年起就这样了。[105]

由于东北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这样巨额的开支，政府又开始印钱——完全背离了单独发行货币的初衷。更糟的是，关于满洲货币与法币之间兑换关系的规定引起了投机现象。1948年3月，两种货币间兑换率被固定在1:10之前，这一兑换率实际上在1:11.50和1:6之间浮动。这一浮动，加上法币可以在东北地区流通而东北货币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的规定，使得投机行为极为有利可图，而让那些有机会这么做的人无法坐视，这些人包括那些有钱又有闲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上一些富有的人。满洲与其他省份之间巨大的黄金和货币流动量，甚至影响到了法币本身的价值。政府将金价上升的原因，归之于共产党在东北投机性的收购黄金。然而如果共产党在进行这种经济战，他们并非是孤立的。批评者指出，只要政府官员们从中渔利的行为得不到制止，共产党就不是政府在东北所要对付的唯一对手。

政府为了杜绝投机，将东北货币与法币之间的兑换率固定在1:10，但经济不稳定状态依然如故。黑市兑换率是1:7；金银价格翻倍；消费物价指数也有同样的反应。3月1日到19日之间，大豆、高粱、大米、面粉的价格都超过了原先的两倍。在这样严重的危机中，政府还“火上添油”，沈阳中央银行宣布推出前所未有的大面额东北货币1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一位作者

写道，“中央政府口口声声说要在东北保护我们，但我们很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决心和有诚意这么做。”^[106]

自由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

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基于两个目的：首先，表明他们对政府的态度；其次，站在自由主义的角度，揭示国民党统治的本质。随后，知识分子就他们所希望的在内战纷乱中会出现的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展开讨论，并由此表达他们的政治信念。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论点站不住脚，主要主张中的缺陷暴露无遗——他们成了所面临的困境的受害者。对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愿接受这一困境，可也无法摆脱。

当然，他们更多注重于批评国民党，而不是提出自己积极的主张。这与他们的一个基本认识相关，他们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使战争结束，而政府则可以接受劝说进行自身的改革。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似乎不愿意相信政府可以无视他们的批评——那样好心好意且又不证自明的观点。并且，由于与战地隔绝，缺乏足够的消息，以及他们自身的主观倾向，他们对军事形势的发展状况并不很了解。无论如何，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可以看出他们主张的苍白无力。而当他们谈到如何将他们的方案付诸实施时，他们充满睿智的批评最终蜕变为幼稚的概念化结论。

目标：总的原则

他们所持的基本观点很明确，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社会主义与民主是自由派的两大理想，而除此之外，则意见纷呈。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这至少是导致对在

国如何理解并实施这些主张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

关于社会主义,储安平称:“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107]傅斯年则强调通常的改革方案是取消“豪门家族”的特权,通过累进所得税制以平等税收负担,并且断然声称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实现的话,他将“百分之百地赞成”。^[108]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郑林庄教授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观点: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虽有经济的自由,却无经济的正义;而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则正因为有了经济正义,才能让社会安定。所谓经济正义,实在含有两点内容:其一是工作权(即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的保证,其二是生存权(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权利)的保证。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有一个生产不断扩充而分配相当合理的社会机构。这些条件只有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才能具备。至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除非把自由企业的原则进行变更,否则是不易实现的……我们相信,经济正义和社会安全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潮。同时我们更相信,凡是赶不上潮流的,终必被时代所淘汰。^[109]

社会主义不仅被看作实现经济正义的手段,而且也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合理模式。因而,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丁骥尽管谴责苏联在领土和组织上的扩张,担心中国成为它的下一个目标,但还是认为中国应采取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他声称,这种体制可以为中国的经济提供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10]

众多的意见、主张色彩纷呈,因此要将40年代中国自由派的观点综合成明确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是不可能的。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其实支持它的每个人,头脑中都有一个按照自己方式理解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在下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最基本的共同点和分歧点,这足以证明我们的观点。

然而,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份基于自由派人普遍赞同的观点、融合最大多数意见的改革方案,那可能就是在1948年春国民大会前夕公开发表的、由南京的99名教授联合提出的方案。他们指责国民党没有执行三民主义应对内战负责,指责共产党的武力夺取政权。他们谴责共产党信奉世界革命而损害了民族的利益,抨击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提出了下列的改革方案:

政治改革

- 1、承认政治经济平等原则。
- 2、尊重言论自由;
- 3、专家参与政府管理。
- 4、遵守法律;
- 5、裁减机构,建立良好的公务员制度。
- 6、惩治官员腐败;
- 7、分散权力与加强地方自治。

经济改革

- 1、没收官僚资本;征用民营银行海外存款;
- 2、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平均地权;
- 3、银行国有化;
- 4、公共设施国有化;
- 5、改革货币及控制通货膨胀;
- 6、修改税制,开征资本和遗产税;
- 7、提高公务员和军事人员的待遇。〔111〕

当这些建议被充分展开而超出了一致认同的原则时,争论变得非常激烈,在讨论如何在中国将这些方案最有效地付诸实施时尤其如此。《观察》在1947年末到1948年初登载的一系列文章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些文章的作者主要有施复亮、严仁赓、张东荪和樊弘。

施复亮的观点似乎总能得到回响，也许因为他曾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坚称他20年来一直相信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取得成功，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及其所赖以生存的贫富不均。简言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基本观念是不相符合的。

然而，施还指出，因为中国尚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它不可能由正在瓦解中的封建时代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期间必须有一个过渡期，他称之为“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是一项由一个他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推行的经济计划，这一政府将在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后建立，并由劳动人民担任领导。这项经济计划要做到：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推行耕者有其田；没收所有官僚资本，扩大国有化范围，包括银行、重工业，主要交通事业以及部分轻工业；保护民族工商业、扶助小生产者；推行先进的劳动法以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经济、财政及社会政策应抑制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而鼓励生产性企业的再投资。〔112〕

也许有人认为，这一主张在很多方面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表述的观点相似，而受到像施一样的激进派人士欢迎。但是不然。例如，浙江大学教授严仁赓在一篇文章中对施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又在第二篇文章里驳回了施力图缩小他们之间分歧的观点。严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他反对施允许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关系的存在，无论这种关系如何被说成是为了发展生产而经过调整。第二，他反对施将经济制度的转变寄希望于一个未来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严怀疑，工人、农民、富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这些人能否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奋斗——尤其是是否允许富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恢复元气。他断言，他们今天可以是被剥削者，但他们骨子里本身都是剥削者。因而，他主张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

“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时解决生产和分配问题”。^[113]

施复亮与张东荪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在这点上,他有充分的理由声称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强调的重点和解释方式的不同。但是差异依然存在。张与施一样,强调中国必须首先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同时张也认为,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因为社会改革不可能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取得成功。他还相信——但在这点上与施不同——自由主义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无论怎样改良,也不能保证在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发展生产。

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资本主义只能造成新的不合理。西方文化的精华输入中国,只能加重人民的灾难,因为在中国,有一群特殊的利益集团可以以此来压迫人民。那些压迫者阻碍着生产的发展。他们包括有特权的官僚资本家,地主,放高利贷者,以及封建社会的遗弃者诸如无业游民、佃农和那些极少从事生产,经常以敲诈、抢劫为生的打短工者。

张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渐进的”计划经济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唯一途径。在计划经济内,任何领域,包括政治和教育都将被纳入计划。这一切的实行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即所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剥削关系必须被消灭,而那些可以促进生产的剥削关系在过渡期内还将被保存。与此相关,有利于生产的社会改革将获得鼓励,而影响生产的措施将不被支持。张认为,在这一基础上,每个国家必须找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方案。他指出了两个看来比较成功地推行了这些原则的例子,一个是苏联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使苏联日后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二战后瑞典的经济政策。^[114]

张东荪与北大经济学家樊弘的分歧似乎比与施复亮的更多。樊教授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方案的描述更加直接而明确:

从经济上说……我们须要明白，现代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恶都是由有产者剥削无产者阶级而来的。然则将奈之何呢？这当然须要涉及政权的更迭了。

从政治上说，我以为，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亦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反动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但叫剥削者阶级自动的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权，或自动地限制他们的剥削，于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的权利，于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115〕

樊教授的希望是能使中国成为“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但他在强调“自由”一词时极为谨慎。因为当时有一种普遍的担心，社会主义中国可能成为苏联的附属品，许多左派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自己在这点上非常易遭攻击，因此竭力否认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这种必然联系。通常的观点是，中国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变革中国的责任完全在中国人自己。〔116〕

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很大的难题是他们同时信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观念。孙宝毅在张君勱 1947 年同意让民主社会党加入国民党政府后，与张断绝了关系，他指责张过于倾向于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张曾经指出，在苏联式的经济体制下，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将不可能从经济民主中诞生。而孙反驳道，张所肯定的由政治民主走向经济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西方民主的政党都由资本家所控制。

然而，孙所真正反对的是张的非此即彼的态度。孙声称，选举和饭碗我们都要，无论是美国式的还是苏联式的都不能使我

们同时得到这两者,那么我们就应该将两种模式中我们所需要的吸收过来,而抛开其余部分。〔117〕大多数自由派人士都毫无疑问地会为这种兼容并蓄的方式拍手称好。但问题是:吸取什么,抛弃什么,并且如何实施。

张东荪是少数几个致力于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人之一,但他在提出他的解决方案时还是闪烁其辞。为了强调计划经济对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他提出平等与自由必须受到限制,只能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在一个计划社会里,所有阻碍生产发展的因素都必须被清除,无须再问自由是否被限制、平等是否被损害,他甚至并不是非常关心这一点。“在制订这样一个计划的时候,自由和平等应该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他写道,“这是计划制订者的事,这里无法细述。”但是有一点是他所不愿放弃的,他称之为文化自由,或者说文化与思想的绝对自由,他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制度的保障。并且,文化自由的种子一旦播下,它的生长将不可遏制,它可以为中国营造一个自由的传统。〔118〕

张东荪与民主相关联的有关制度的观点,与他对自由和平等原则的态度相一致。他认为英美式的宪政政府不可能在中国存在。例如,自由选举就无法推行,因为它会被现存的权力集团操纵为他们自己谋利。他认为共产党、国民党、民盟三者一起代表了个国家的所有利益。因而,“当这些党派在一起协商的时候,表面上看似乎是党派之间的事,但实际上这是真正的民主。”由此,他非常强调两点:协商谅解,分权制约。这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前提。〔119〕

另一位持有类似观点的是梁漱溟,他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论证英美式的政府无法在中国建立。他认为,中国人的风俗及行为习惯不适合于搞竞选,民主的宪法也很难在中国生存。和张一样,梁也并不想完全放弃民主。他寄希望于专家们能设想出

另外一种民主政体,不需要采用普选,不需要采用西方式的宪法,从而更适合中国的国民性。〔120〕

总体上说,这种关于民主原则与制度在中国命运的悲观论调,并不为当时参与讨论这一问题的大多数人所认同。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人倾向于认为障碍不是很难克服的。经济学家谷春帆表达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尽管民主政治作为一个政府体制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多缺陷,但毫无疑问是可以克服的——尽管这一过程是渐进的。〔121〕

另一作者郭叔壬也同意这样的观点。郭明确反对张东荪及梁漱溟的观点,他提醒他们,宪政民主并不仅仅指一种政府形式,而是指一种生活方式,并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他回顾了美国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遇到了种种困难。许多州甚至在联邦宪法正式通过后还与之发生冲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上的不公平,而宪法却无法制止;政治与行政领域经常出现腐败;选举被操纵。但这些现象逐渐被克服了,有时也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基于美国的经验,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把持,便根本怀疑这个制度的本身,而放弃了对推行这个制度的努力……我们必须把这个制度的理想,贯注于我们人民的实际生活,濡染浸淫,使这个制度,能够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纵有错误,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改,时间一长,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122〕

事实上,人们更倾向于学习英国而不是美国。英国工党被许多知识分子视为中国可以模仿的典范。它在1946年成功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例子,更支持了这一观点:西方式的民主与社会主义可以同时推进。储安平就这一问题写道:“假如英国工党执政成功,则使世人明白,实行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线。英国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但同时仍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123〕

方法：联合政府

樊弘似乎有足够的理由不同意那些主张走“第三条路”的“当代教授们”，他们认为那些剥削者、压迫者以及国民党会主动地改革自身而后抛弃那个使他们得益的制度。但即便这些教授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们在知识理论上还是前后一致的。正如储安平所写的，他们也相信可以劝说共产党“修改其政策”并放弃内战。^[124]谁都不愿争辩共产党的最终或长期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然而，正如已指出的，大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现在会这么做。因而，对那些并非战争任何一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军事上的僵局被认为可以促使双方的自愿妥协。由此，它也可以为实行一条中间路线创造理想的机会。

对于自由派的方案能在其中被推行的政府形式，多少有一些共识，自由派人上寄希望于1946年1月政协会议所赞同的联合政府。^[125]王芸生这么描述政协的决议：

其中改组政府一项是要领。政治协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都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订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126]

联合政府这一方案也吸引了那些对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可行性并不乐观的人。张东荪认为联合政府是最适合中国需要的政治形式：

我只见有些人在那里痛骂，有些人在那里祈祷，除此以外，却未见有什么好法子。其实国民党并不怕骂。同时亦决不接受祈祷。它未尝不想改，不过只是在表面上想改头换面，而实质上仍要维持其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主张要想使国民党改变其性质，必须先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境况中四面有监督与压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而这个……唯由联合政府才能实现。可

见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其说是反对它，毋宁说是想救它……无如据我们观察，要革它的命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还没有人能革国民党的命。〔127〕

过程：劝说

吴世昌教授认为，理由可以有很多，但路只有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促使国共两党接受政协的方案并组成联合政府。答案是只有依靠第三党的力量。“第三党”的意思是，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反对战争，即不满国民党也不信任共产党的真正的第三种力量。如果充分调动这一支至今尚未调动起来的大多数人的力量，它将促使国共两党放下武器并接受联合政府。

实际上做起来要比说难得多，大家都认识到：民盟，以及当时成立的各种小党派，无力担当这一任务。这些构成所谓“第三种力量”的小党派软弱、缺乏组织、毫无威力。没有人不同意储安平批评，“我们对民盟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它天生的软弱及不切实际’。”民盟成员大多是“另一代人”，老学者，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由于不同的教育背景、政治观点、社会阅历，他们仅有的共同点是反对国民党。储安平写道，“民盟甚至不能被批评为共产党的尾巴。”〔128〕

最糟的是，这些少数党的成员，无论是否自由派人士，都被嘲笑为机会主义者或是两个大党的爪牙。这些人总是努力证明他们的政治活动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然而在他们批评者的眼中，他们似乎更多的是为了追逐财富、地位及社会影响。

那么该怎么做？怎样才能产生一种强大而独立的第三种力量？它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张东荪认为这一力量应当作为“国共之间的一座桥梁，迫使它们走上正轨，将它们拉到一处，并促成他们之间的合作”。但一位作者怀疑这样的力量从何而来——因为当时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势力既不强大也不独立。〔129〕

事实上,这反映了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不少文章试图解释这一存在于他们的理想与现状之间的矛盾。关于第三种力量从何产生这一问题的最普遍的回答是,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周钟岐教授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

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中间派是什么?它就是知识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他们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三十年的时间,一般人必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现在中国也是如此,要靠知识阶级的努力。[130]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一位作者曾嘲笑“自欺欺人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形势”的所谓自由分子的“天真”。[131]另一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描述是,人们对传闻胡适即将组织一个政党的议论。[132]储安平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了矛盾,他只是总结了双方的分歧之处,一方是大部分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知识分子能“救中国”,另一方是少数人,认为知识分子没有这能力。他的观点在1947年3月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进行了充分的表述: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

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

储认为，部分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固有的，而另有部分原因则由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环境所造成。无论他们目标有多高尚，中国自由主义者——大部分是文人——的固有的弱点是胸襟狭窄和个人主义。政治所要求的是，可以为长远目标奋斗而不计较小事的目光远大者，能将自身融入整个形势，能为政治利益而善于合作的人。政治需要组织与纪律，但由于自由分子更多的是关心权利与理性而不是权力，因此很难在他们中间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政治也需要领导，但由于自由分子的骄傲与轻率，很难在他们中间产生领袖。

除了这些固有的弱点，储还列举了国民党 20 年的统治给自由分子造成的三个影响。首先是政治限制，政府拒绝保障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第二是经济限制，知识分子普遍贫困，他们仅能维持生计，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和资源去进行政治活动。第三是思想限制，源于国民党 20 年来对教育的干涉。这不仅不能从年轻一代中培养出国民党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更重要的，使他们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因而使得他们不会用理性的方式去解决他们的不满，许多青年人反而为种种不满所牵制，盲目地变得极右或极左。

然后，没有提示和解释，储突然转移了论题，几乎接着马歇尔将军的话说了下去：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

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

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虑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这样的矛盾只能是由绝望而带来的。基于他自己的分析，储认为这已不是自由分子是否愿意崛起的问题，而是他们能不能崛起的问题。一年以后，民盟被解散，而民社党则因与国民党合作而声名狼藉，知识分子们无所前进。他们依然为国家的命运而“深深地忧虑”；依然有人进行消极的批评并希望有积极的行动；依然告诫他们自己为了将国家纳入民治的轨道而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是他们的责任。^[133]

批评与劝告在1948年4月国民大会开会期间达到了高潮。3月26日，南京的教授们发表了上文提到的改革方案。在首都，一个“教授国事咨询会”的筹备委员会也在这一期间形成，同时，北方的知识分子则成立了“社会和经济学会和经济研究会”。^[134]但是人们对这些组织所应起的作用并不清楚。它们应该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但“人民的意志”的确切含义却从来

没有人加以解释。

政党政治如此声名狼藉，因而人们甚至不认真考虑组建新的政党。《新民报》有文章称，分散的自由分子想组成一个新党以取代国民党和共产党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这个政党主张与国共两党中任何一党妥协或缓解，那么它将很难保持中立或独立地位。停止内战的真正力量来自于民众。因此解决的方案是：自由分子依人民的意愿行事，与人民站在一起，在人民中寻求支持，并代表人民的意志，这样自由分子就不用担心他们的政治影响了。^[135]根据这个说法，人民的意志是一种有机的力量，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应去体现它。虽然知识分子似乎淹没于群众之中，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则会随着人民意志的潮流而高涨。

也许是中国文人与公共事务之间古老关系的一种表现，这种“解决方案”在1948年的中国政治现实中显得毫无用处。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为中国设计一套自由民主的方案。即便有方案，人们也会怀疑这些知识分子有没有能力去有效地参与其中。《观察》及其他那一时期自由派的出版物，集中反映了内战期间知识分子在批评及道德劝诫上的功绩。然而，正如储安平和他的同行们有时所指出的，无论有多么尖锐的批评和多么有力的道德劝诫都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方案，以及可以推行这些方案的人。

由于他们自身的政治信念及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自由分子将不可避免地无法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施加影响。他们手中根本不掌握任何实力，而这正是斗争的本质和意义，并由此而决定它的后果。从理论与传统上说，知识分子被排除在军队以外。从主观倾向上说，他们更喜欢像北平、上海这样开放的环境，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村地区。无论他们多么同情与关心农民的痛苦，他们只能在纸上表达——用抽象的词汇，仅此而已。对于另外一

些与战争、与农村生活更接近的人来说，他们在知识分子们高谈阔论的问题上更有决定权。确切地说，也许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是思想上而非政治上的：他们没能认识到他们自身脱离现实。

储安平最终在1948年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观察》7月17日那一期的“告别辞”中承认了这种失败。当时到处都在传言，《观察》将与十天前被查禁的《新民报》遭到同样的命运。储写道：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一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后来的结果是，在储教授发表了他的告别辞之后，《观察》又再出了21期，这份杂志最终在12月下旬被查禁了。但在这几个月间，已经很明显，谈论自由政治的时代在中国结束了，在过去的两年中赋予争论以生命力的愤怒与紧迫的语调已经不复存

在。“储安平教授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

在12月《观察》被查封前夕，上海报纸报道，储和他在《大公报》的好友王芸生已离开上海不知去向。1月份，这一谜底被揭开，共产党电台报道，储与王及其他许多人到了解放区，并正在石家庄参加政协会议。年底之前，大多数曾坚持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作了类似的选择，或是像储那样投奔解放区，或是等着欢迎胜利者的到来。

注 释

[1]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2] 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所有受过中学以上或相当于中学以上教育的人，当时所有共产党的言论中都采用这一定义。但除了共产党以外，这个概念的涵义就要狭窄得多了。因此，在本章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词具体指的是那些对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有直接参与感的作家、新闻记者、大学教授、教师等等。

[3] 费正清《美国和中国》，第196—200页。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的《大公报》直到1948年才复刊，政治上比当时的另两个报都偏左。

[5] 见书后《参考书目》。

[6] 另一个重要的参考刊物是《时代批评》，是由张学良将军的前秘书周鲸文在香港出版的。与《观察》不同的是，该刊也发表共产党和民盟发言人的文章和声明。但是，尽管《时代批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外的英国殖民地出版，而且周也是当时著名的左派同情者，该刊的社论与大多数政论的观点和《观察》并没有多大差别。

[7] 见《参考书目》。

[8] 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1948年8月7日，第4页。

[9] 上海《前线日报》，1948年12月28日（CPR，12月31日）。

[10] 储这里所用的“灾难”一词，不大可能是指共产党的胜利，他从

未用这种口气写共产党。另外,当时几乎还没有人相信共产党真的能打败政府军。1946年中时,大家真正担心的灾难是内战本身。当时马歇尔将军的调停工作还在进行,但和平解决已经很明显不可能实现了。因此,在当时和其后至少一年半的时间里,国统区非官方的学者和新闻记者几乎一致认为:由于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对方消灭,因此,内战既劳民伤财又毫无希望,且将延续而无止期。这一观点下文还将详细论述。

[11] 社论《我们的旨趣和态度》,《观察》1946年9月1日,第3-4页。

[12] 储安平《论上海民乱》,《观察》1946年12月14日,第4页。

[13] 吴世昌《论党的职业化》,《观察》1947年3月8日,第10页。

[14] 自由派的舆论认为,这些右派分子还应对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成功的大会上的骚乱负责。那天的许多与会者遭到殴打,据说是右派分子雇用的流氓所为。这一事件从那以后被当作国民党阻挠群众集体要求它与共产党和谈的象征。有关这一事件究竟应当由谁负责的一般观点,可参见约翰·F·梅尔比所著《天国的领地》第88—89页。有关国民党右派的观点,可参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四章,第1585—1587页。

[15] 有关政治协商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决议的破产,可参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玩在中国卷,3—292页;张君勱《中国始

力想去说服那些未经授权而参加竞选并当选的国民党党员们——但他们大多都不愿放弃,争吵直到1948年3月29日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开幕时还没有结束。有关选举,参见民主社会党刊物《再生》周刊,第194期,上海,1947年12月14日。

[18] 署名许少甫的来信,南京,1948年4月3日(《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19页)。

[19] 储安平《国大评论》,《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3页。

[20] 朱自清等《保障人权》,《观察》1947年3月8日,第21页。

[21] 同上;北平特约通讯员《新五四运动之前夕》,《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16—17页。

[22] 北平特约通讯员《从美军下旗到张今吾被释》,《观察》1947年5月24日,第17—18页。张于1947年5月1日被捕,以“共党分子和叛徒”嫌疑罪名被军方关押。记者们向蒋介石在北平的行营主任李宗仁将军发了一封公开信,张因此得以被保释,没有受到过任何具体指控。

[23] 储安平谴责查封三报和对学生示威的镇压(见第三章注释32)。《新民晚报》和其他“新民”报纸一样,由四川的一些工业家拥有。在重庆的董事们同意开除几名记者之后,这份在上海的晚报得以复刊。那几名记者被行政院新闻局指控为撰写“虚假报道”。《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7月30日。

[24] 见第三章注释32。天津当局和新闻检查制度从1947年6月1日开始,到6月10日被取消。检查的目的是为了封锁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学生运动的消息。但北平没有新闻检查,于是每天从北平来的报纸上午10点就运到天津并在大街上大量销售。(《观察》1947年6月28日,第17页)

[25] 周绶章《疯狂了的中国》,《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7页。

[26] 引自葛思恩《新闻自由的低潮》,《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9页。

[27] 梁漱溟与周新民《李闻案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提供了围绕谋杀发生的所有事件的细节,同时也详细描述了调查本身以及调查过程中每一步所受到的昆明当局的阻挠。警备区司令部的两名低级军官因谋杀闻一多而被判死刑;警备区司令霍揆章将军被撤职。李、闻的生平材料

可参见由郭沫若序,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的《人民英杰》。有关当时云南的政治形势,可参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

[28] 此信与90名教授的名单可参见《观察》1948年5月1日,2页。有关袁翰青教授在3月的一次北大学生集会上的讲话,见《知识青年的道路》,《时代批评》,1948年5月15日,第6页。

[29] 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1948年5月1日,第4页。

[30] 有关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见第三章,注释28。

[31] 这类矛盾的一个例子是教育部曾下令让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取消国际法和法学课程。见《大公报》,上海,1947年7月29日。

[32] 国立浙江大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参见S·Y《浙大文学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1948年6月12日,第16—17页。另一例子是第三章中所提到的。1947年春,教育部决定取消交通大学设置的一些系科。

[33] 上海《大公报》,1947年1月28日。

[34] 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20日。

[35] 《短评:略谈党派退出学校》,《时代批评》1948年6月15日,第3页。作者文章中的“党派”,既包括共产党也包括国民党。有关这一问题,可以为证的事例是1948年2月沈阳大中学生的冬令营。当时沈阳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冬令营是由军方主办的,以取消助学金甚至是开除等威胁强迫学生参加。学生们反对这样的强制军训和政治洗脑。冬令营结束后,有100多名学生因反抗而被捕。参见同期《时代批评》第35页春生《沈阳二三事》。又见高超《沈阳冬令营的风波》,《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6页。

[36] 杨人楩《国民党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6页。杨是北大教授。

[37] 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页。

[38] 有关这种现象的最清楚、最不自觉的描述是周永德笔下的关于昆明附近某县六个“乡绅”家族在1943年至1946年间的演变。文中的清廉官员的形象从反面证明了当时腐败风行的严重。当了三十多年官的王主席依旧两袖清风,但他却容忍县、乡和保甲官吏们不顾百姓抱怨而大肆

贪污。赵县长因腐败和无能被解职；但告发他的人也是县里贪污受贿最严重的官员之一。那位刚正不阿的官员——所有乡村干部中唯一一个“敢于不畏权势而为民说话”的人——在县长接受了别人的贿赂后被撤了职。（周永德《活的历史》，见费孝通《中国乡绅：城乡关系文集》P145—187）

[39] 近几年出了一批有关政治腐败的作品，其中有些说公职人员腐败并不一定是坏事。中国的历史经验却与这个假说相悖。有关正反面意见的总结，请参见J·S·奈伊：“腐败与政治发展：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美国政治学评论》（1967年6月）：第417—427页。主要的观点参见阿诺德·J·海登海默编《政治腐败：比较分析读物》（纽约：1970）。

[40] 王克浪《从数字看江西》，《观察》1947年10月18日，第17—18页。

[41]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描述，见与国民党政学系有关的《世纪评论》，南京，1947年11月29日。

[42] 《西京评报》，西安，1945年8月31日。

[43] 钱孟超《强迫征收军粮，安徽百姓最恨》，《申报》，上海，1946年4月30日。

[44] 《大公报》，上海，1946年4月30日。

[45] 晋南特约通讯员《法外天地、人间血泪》，《观察》1947年1月11日，第20—21页。

[46] 《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4月18日。

[47] 《东南日报》和《文汇报》，上海，1946年8月24日。

[48] 《大公报》，上海，1946年2月26日；《大公报》，上海，1946年3月8日。

[49] 意译自《新闻报》评论，上海，1946年4月15日，又见《新闻报》，上海，1946年7月11日（7月12日）。

[50] 兰州特约通讯员，《忧患重重的西北角》，《观察》1946年12月21日，第14—16页。

[51] 关于19世纪中国农民暴动的讨论，尤其是关于抗捐暴动，见萧公权《中国农村：十九世纪的帝制》，第433—453页。萧教授认为：“官方与征税相关的压榨毫无疑问是暴乱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起因。”他指出抗

捐暴动在 19 世纪下半期清王朝衰落时期是最普遍的。

[52] 据吴兴县(该县 1 月发生骚动)一个农民的帐簿记载,他从 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8 月的支出有:购买胜利债券,购买储蓄债券;县政府税收;乡政府税收;当地民团的粮食和服装费;区政府公粮;伤兵粮;县警补充人员粮;民工粮;民团枪支抵押粮;军火费;区行政人员差旅费;过县军队临时接待站费用,等等。《文汇报》,上海,1946 年 8 月 1 日。

[53] 引自唐成中有关浙江农民暴动的长篇调查报告,《时事新报》,上海,1946 年 5 月 1、2、5 日(CPR,5 月 25 日)。

[54] 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傅统先即持此观点的人之一。他认为,问题在于社会风气不好,因此应通过教育来解决:《以教育救中国》,《观察》,1947 年 5 月 17 日。

[55] 小克雷克:《宋朝初年中国的文官制:960—1067》第 196 页。

[56] 萧公权:《中国农村》,P. 414—415。又见张仲礼:《中国乡绅:关于他们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 43—51 页。

[57] 马丁·C·杨回忆中说,在他山东省老家的村里,从来没人抱怨过村里官员获取“回扣”的行为,因为钱额并不算多。谈及村里建设项目的费用时,他写道:“村长和他的助手负责收集本村应交的钱款,从中他们也要得一些回扣。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要在一定限度之内,村民们还能容忍。但当这种盘剥太过分时,他们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马丁·杨《中国的一个村:山东岱头(音)》,第 181 页。

[58] 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P. 277—279,306—313。

[59] 浩然《论政治上的新病态》,《世纪评论》,南京,第 3 卷第 14 期(引自《观察》1948 年 4 月 10 日,P. 18—19)。关于官僚化问题,有许多精简多级地方行政体制和简化征税体制的具体要求。有人建议捐税应越过乡、村、保的官吏而直接上交县政府。见《西京评报》,西安 1945 年 8 月 31 日。河北滦县政府书记员孙逢明(音)也提出同样的建议,认为每亩地每年向县财政直接交 10 斤小米将足够满足一个县所有的税收和支出。但他承认这种改革易说难做,因为地方官吏会因这项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而竭力阻碍它的推行。《大公报》,上海,1947 年 8 月 11 日。

[60] 在这份声明上签字的教员有清华大学 144 名,燕京大学 141 名,北大 105 名,南开 89 名,北洋大学 77 名,中法大学 17 名,美术学院 6 名,师范大学 6 名,《大公报》,上海,1947 年 6 月 1 日(CPR,7 月 2 日)。

[61] 储安平《评翁文灏内阁》,《观察》1948 年 6 月 5 日,第 3 页。

[62] 器重《国共应该携手合作》,《时代批评》,1947 年 8 月 1 日,第 23—25 页,吴世昌《从美苏说到国内》,《观察》1947 年 4 月 5 日,第 4 页,杨人樾《论内战》,《观察》1948 年 3 月 20 日,第 5 页,很多人都同意吴世昌的观点,认为如果共产党的军队真的能在数月内被消灭,大家都应忍受困难支持战争。吴认为,大多数人并不反对战争,如果“明年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元旦,眼见国家统一,重新建设,再没有征兵征粮,苛捐杂税,人民可以有共产党除外的民主自由”。但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吴世昌《论和平问题》,《观察》1947 年 6 月 14 日,第 4 页。

[63] 这个问题在第四章“通货膨胀的负担”一节已有讨论。又见第三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节。

[64] 杨培新《经济总动员下的加紧征粮》,《时代批评》1947 年 9 月 1 日,第 24—26 页。

[65] 署名朱树锦的来信,1948 年 5 月 26 日(《观察》1948 年 6 月 5 日,第 2 页)。另一封类似却不详细的信来自青岛附近即墨县第五区的村民(《观察》1948 年 5 月 8 日,第 2 页)。

[66] 更多的例子可以参见注释 52。一名《大公报》记者列举了冀东滦县百姓在正常税收之外,还须被迫缴纳的税赋:(1)地方武装军官每人每月小米 200 斤,士兵 150 斤;(2)铁路卫兵每天的伙食补贴;(3)建设和维护铁路路基的材料和劳动;(4)军民合作站代表政府军征收的干草、饲料、车辆等;(5)地方武装武器弹药的购置更新,以及防御工事的修建;(6)县警察局所属特别部队所需工资和军火购置费用;(7)以各种形式(大多是实物)支付的乡、保官吏的工资;(8)所有领取固定收入的警察和文职人员每人每日 150—200 斤小米的应付通货膨胀的特别补贴。上海《大公报》1947 年 8 月 11 日(CPR,9 月 3 日)。有关日本投降前的税赋单子,见《非法征收的一些具体事例》,《金风日报》,西安,1945 年 8 月 30 日。这篇文章列举的是西安附近三原县的情况。

[67] 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3页。伍是当时清华大学教授。高超在《泪眼看东北》一文中哀叹战争对东北工业、采矿、粮食生产的破坏。《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

[68] 兰州特约通讯员，第14页（见注释50）。

[69] 杭州特约通讯员《浙江的征丁征税》，《观察》1946年11月16日，第14—15页。

[70] 北平特约通讯员《北平之征兵戏》，《观察》1946年11月9日，第17—19页。

[71] 七封系列来信刊登于《观察》1948年2月28日，3月13日，4月24日，5月8日和22日的读者来信栏中。沈阳报纸关于征兵失败的报道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第144页。1946年到1947年征兵令执行过程中的不正常情况和出现的反抗，在1946年最后3个月和1947年8月的上海的报纸上有广泛的报道。

[72] 有关美国的观点，见塔其曼：《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和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的惊雷》。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一书详细写到了对待伤员的情况，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

[73] 《青年日报》，西安，1945年6月11日；《新民报》和《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7月11日；《时事新报》和《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7月19日；《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7月22日；《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8月24日。活埋的故事有反复的报道。有关罗伯特·潘恩记录的目击者的证词，请参见他的《醒来的中国》第103—104页。

[74] 梁实秋《沈阳观感》，《世纪评论》，南京，第三卷第9期（引自《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9页；何彭《在内战最前线》，《观察》1947年9月27日，第18页。

[75] 特约通讯员《从中国乡村看中国政治》，《观察》1946年10月19日，第18页。

[76] 杭州通讯员，第15页（参见注释69）。

[77] 何彭第19页（见注释74）。

[78] 汗奇：《东北十日（沈阳通讯）》，《时代批评》，1947年8月16日，第25—28页。

[79] 何彭(见注释 74)。

[80] 《时代批评》1947 年 6 月 16 日,第 2 页。

[81] 长春特约通讯员《冰冷的人心》,《观察》1947 年 3 月 1 日,第 18 页。

[82] 《观察》通讯员《魏德迈在中国所了解的,所烦恼的,和可能建议的》,《观察》1947 年 8 月 30 日,第 16 页。

[83] 长春通讯员《梁华盛在吉林的作风》,《观察》1946 年 12 月 7 日,第 16—17 页。其他有关长春军阀主义和民主的评论,见长春通讯员(注释 81)。

[84] 钱端升《军人保护的中国政府》,《时代批评》,1948 年 12 月 15 日,第 21—23 页。

[85] 例如,周绶章(注 25);杨人榷(注 62);傅统先(注 54);吴世昌(注 62);以及《时代批评》1947 年 6 月 16 日社论,第 2—3 页。

[86] 例如常明《泛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对施复亮、平心两先生论争的意见》,《时代批评》1947 年 6 月 16 日,第 33 页。有关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和较场口事件,见注释 14 和 15。有关《新华日报》事件,见第六章“民族主义问题”一节。

[87] 伍启元,第 3—4 页(注 67)。

[88] 储安平,第 5 页(注释 37)。类似的观点还可见靳风(音)《马上得之,马上守之,马上失之》,《时代批评》1948 年 3 月 15 日,第 3—4 页。

[89] 第四章的内容主要基于自由派作家与刊物的报道。

[90] 潘子明《松花江畔的阴阳界》,《观察》1947 年 7 月 26 日,第 19 页。

[91] 长春通讯员(注 81)。

[92] 《时事新报》、《新闻报》、《中央日报》和《时代日报》,上海,1946 年 6 月 24 日;《文汇报》和《大公报》,上海,1946 年 6 月 25 日。

[93] 潘子明(注 90)。一篇沈阳快讯报道,1946 年夏天,该市有 5,000 名流亡学生。其中有 2,000 名左右要求不经考试在秋季入学,促使这一要求越来越强烈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据说招生委员会的人员出售试题。见《民国日报》,天津,1946 年 8 月 16 日,沈阳十万难民的总数出自 1947 年 11 月

26 日美国大使馆的报告(《美国对外关系》1947 年卷,第 378 页)。

[94] 德克·博德:《北京日记》,第 31—33,65—68,74—77,100—103 页。当然,并非所有在北平的难民学生都处于这样的困难境地。博德写道,在 1948 年 11 月,有 2,000 多名学生从保定撤出。被安置在北平周围的寺庙里,他们有教师陪伴,进行教课并保持较好的士气和纪律。

[95] 梅尔比《天国的领地》第 281—282 页。

[96] 最尖锐的批评者是周鲸文。周来自东北,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政府对东北人民长期迫害的又一个例子。周鲸文《为枪杀东北流亡学生控诉南京政府》,《时代批评》1948 年 7 月 15 日,第 1—2 页。

[97] 从栖霞山来信,1948 年 4 月 16 日(《观察》1948 年 4 月 24 日,第 2 页)。

[98] 国民党占领的东北城市中所有的报纸都被政府、国民党或军方控制或监视。因此,随着战争的进行,公众很少有独立的消息来源。但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作者和新闻记者设法调查并报道东北局势的发展。文中所述是比较参考以下文章所得的结果。

《观察》:

(a)1946 年 11 月 9 日,第 16—17 页,沈阳通讯员。

(b)1946 年 12 月 21 日,第 17—18 页,沈阳通讯员。

(c)1947 年 3 月 1 日,第 17—19 页。长春通讯员(见注 81)。

(d)1947 年 7 月 12 日,第 4—5 页,何永估。

(e)1947 年 7 月 26 日,第 19—20 页,潘子明(注 90)。

(f)1948 年 2 月 28 日,第 17—18 页,高超(见注 67)。

(g)1948 年 3 月 6 日,第 19 页,梁实秋(转引自《时代批评》,第 3 卷第 9 期;注 74)。

(h)1948 年 3 月 13 日,第 15 页,《观察》通讯员。

(i)1948 年 3 月 20 日,第 17—18 页,沈阳通讯员。

(j)1948 年 3 月 27 日,第 16 页,钱邦楷(引自《青岛日报》,青岛,1948 年 2 月 19 日;见第二章注 4)。

(k)1948 年 4 月 3 日,第 17 页,高超。

(l)1948 年 4 月 10 日,第 12 页,沈阳通讯员。

《时代批评》

(m)1947年8月16日,第25—29页,韩池(注78)。

(n)1948年6月15日,第35页,春生(注35)。

(o)1948年7月15日,第1页周鲸文(注96)。

[99] 李宗仁曾指出,将东北分成九个省的决定是出自吴鼎昌和其他政学系成员的建议。蒋介石授命他们研究二战结束后政府迁回的准备工作的(《李宗仁将军回忆录》,第46章,第1页)。这个派别的成员占据了当时东北大多数委任的职位。

[100] 见注释98(a),第16页。有关云南的情况,见第三章“一二一运动”一节。

[101] 见注释98(g),第19页。

[102] 有关释放张学良的谈判一事,当时谣言四起,都毫无根据,其中最吸引人的一则是说蒋介石在1946年准备释放张,条件是张答应“利用他的个人声望使东北能倾向于国民党的利益”——但遭到少帅的拒绝。爱泼斯坦:《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第375页。

[103] 见注释98(h),第15页。

[104] 有关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活动,见第六章。如果政府在东北遭受的公开批评能少一点的话,在东北政治力量的天平上,地方主义和那位少帅持久的群众威望就不会有如此重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主义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不会被高估。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在1947年的报告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描述不断增长的当地人的反感,以及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帮助,政府军将不可能抵挡住共产党。但政府依然无视这种帮助的重要性。比如,有一个当地人建立的东北动员委员会,据说有很广泛的支持。它主动要求建立地方武装与共产党作战,但这个建议被拒绝了。曾在老师和少帅手下干过的骑兵军官马占山将军,同意与政府合作,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副长官。但他从来没被指派去做任何事,也没有任何军队供他指挥。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卷第141—142,144—145,152,156—157,210—211,232—235,292—293,307,330,398—399,404,708—709,744页。

[105] 七省是辽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安东、兴安。其余两省

吉林和辽宁的小部分地区在1948年4月仍由中央政府控制。被供养在沈阳无事可做的还有几百名中央政府委派的全东北的监督和行政人员,包括财政、农业、水利、文化、教育和通讯等方面的官员。

[106] 见注释98(k),第17页。有关政府在东北的军事表现,见L·M·查新:《共产党征服中国:内战史,1945—1949》,第57—68,76—81,114—121,131—136,165—167,187—192页,以及柯乐博:《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60—290页。

[107] 储安平,第6页(注1)。

[108] 傅孟真(傅斯年)《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观察》1947年3月1日,第6页,傅拥有很多头衔,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7年2月,他发表了三篇系列文章,批评宋子文和孔祥熙,这在南京政治圈中造成了一个小波动。前两篇发表在《世纪评论》,南京,第1卷7、8期;第三篇发表在上海《大公报》。《观察》在1947年3月1日一期上转载了这三篇文章。

[109] 郑林庄《经济正义与社会安全》,《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9—10页。

[110] 丁骥《苏联即将东顾》,《观察》1948年7月3日,第7页。

[111] 《新民报》,南京,1948年3月27日(CPR,4月1日)。

[112] 施复亮《废除剥削与增加生产》,《观察》1948年3月20日,第7—9页。施于1927年退出中国共产党。

[113] 严仁赓《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乎?》,《观察》1948年7月19日P.5—8。施复亮的回答见《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观察》1948年7月24日,第4页,严的答复见《再和施复亮先生谈“新资本主义”》,《观察》1948年8月7日,15页。

[114] 张东荪是《观察》及其他自由派刊物的经常撰稿人。他也是1947年民盟被解散以前的主要成员,和燕京大学教授。这里概括的他关于经济改革的观点根据他的下列文章。

(a)《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观察》1948年1月31日,第3—4页;(b)《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3—5页;(c)《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1948年

3月6日,第3—5页;(d)《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中建》,第3卷第4期,《观察》1948年8月7日转载,第26—27页。

[115] 樊弘《只有两条路》,《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3—4页。樊教授与张东荪之间的讨论在这一篇文章之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并涉及到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两人之间的争论在下列文章中进一步展开。(a)张东荪《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观察》1947年10月11日,第3—6页;(b)樊弘《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观察》1947年11月29日,第5—8页;(c)张东荪《敬答樊弘先生》,《观察》1947年12月13日,第5—6页;(d)樊弘《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观察》1947年12月27日,第5—6页;(e)张东荪《关于中国出路看法,再答樊弘先生》,《观察》1948年1月31日,第3—4页。

[116] 樊弘《关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观察》1948年6月26日,第7—8页。这是樊对周东郊的批评的回应,周东郊《论“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兼论我们的道路》,《观察》1948年5月22日,第4—6页。

[117] 孙宝毅《吾尤爱真理!》,《时代批评》,1947年12月16日,第10—11页。

[118] 张东荪,第5页(见注114b);及张东荪,第4—6页(见注115a)。

[119] 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1947年4月5日,第6页。

[120] 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观察》1947年9月20日,第5—10页,及9月27日,第8—10页。梁关于西方民主不适于中国的观点在纪文顺的文章《梁漱溟与中国共产主义》中也有介绍,《中国季刊》(1970年1—3月)41期,第64—82页。

[121] 谷春帆《从民主到帝国》,《观察》1947年11月1日,第3—5页。谷是银行高级职员。

[122] 郭叔壬《宪政和中国文化》,《观察》1948年3月13日,第6—8页。作者写这篇文章时客居美国。

[123] 储安平,第6页(见注释1)。

[124] 许多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伍启元写道,共产党“应

该放弃他们的生死斗争以及通过武装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他们应该学会成为宪政政府内的政党,愿意促进民主,并为此而高兴。”对于国民党,他建议它的官员们应当作出让步,“依照全国民众及国民党大多数成员的希望,马上推行民主,迫使富裕阶级作出一些牺牲。”(《观察》1946年9月7日,第4—5页。见注释67)。

[125] 一些人批评政协,因为代表都来自各党派,而没有直接的人民代表。但因为在原则上它是一个真正的多党派会议,并且至少解决了和平建立宪政政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大多数自由派在他们的心目中将政协决议看作政治妥协的基础。(见注释15)

[126] 王芸生《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观察》1946年9月1日,第5页。

[127] 张东荪,第6页(见注释119)。

[128] 储安平,第7页(见注释1)。一个类似而更详细的对民盟的批评,见闻傅(音)《看,中国的民盟》,《周刊》,上海,1946年6月8日。

[129] 常明,第35页(见注释86)。

[130] 周钟岐《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页。周曾是广东岭南大学教授。

[131] 南京通讯员,《何处是归程?》,《观察》1948年6月17日,第11—12页。

[132] 这一传闻在胡1946年从美国回来后的-段时间内流行。这位作者,曾称民社党的张君勱是一位“博学的博士”,但在领导他的政党方面则毫无建树,他指出政治与教育不是一回事——一方面的成功不会必然地导致另一方面的成功。作者认为,胡适或许能提出一些总体的设想,但对他能否在采取具体措施以维持一个政党这一层面上成为一个好的领袖表示怀疑。南京快讯《胡适的态度》,《观察》1946年9月1日,第21页。

[133] 《新民报》,南京,1948年4月1日。

[134] 《新民报》,南京,1948年4月8日和11日。

[135] 见南京《新民报》1948年4月11日和5月7日两篇社论。这份报纸于7月8日根据《新闻出版法》第21条被查禁。该法律条文规定出版物不得破坏公共秩序或损害国家利益。该报纸被指控散布共产党宣传,

破坏政府声誉,以及指责政府在开封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后轰炸该地的行为。

第二部

共产党取而代之

第六章 知识阶层对中共的评判

到了40年代后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未曾亲身经受或亲眼目睹国民党统治负面影响的已经不多了。学生示威、劳工争端、抢米风潮、市民骚动和农民暴动不时发生,知识阶层也在持续不断地批评政府,这一切显然表明了公众的不满。政府及其地方机构的公告与法令遭到了学生、工人、商人、企业主、金融家和农民的公开反对以及自由派舆论界和学术团体的谴责。

国民党原本完全可以自救,但批评家看到的迹象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了国民党既不愿也无法这么做。结果,虽然政府把保存自己,也就是在军事上击败中共视为最重要的目标,但在它这么做的时候,各团体出于自身的原因,各自采用不同的方式,既不支持政府,也不与政府合作。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从国民党处抽回的支持与合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转向了中国共产党?只须看看城市人口中的一个阶层——自由知识阶层,就可以直接解答这个问题了。我们已经看到,学生及其前辈都十分乐意把共产党作为联合政府中国民党的合作伙伴来接受。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公开宣称,这种方式比长期内战更可取。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赞成由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一党执政——如果第三章引用的学生

民意测验结果有什么代表性的话。从表面来看,这两种态度是矛盾的,其中到底包含了人们什么样的想法呢?为何这一显然已对中共的主要敌手不抱任何幻想的团体对中共并无几分热情可言呢?

国统区对言论限制甚多,公开、不懈地研究用共产党代替国民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偶尔发点评论,特别是用批评的方式进行评价,并不是不可能的。下文就是这些有关对中国共产党各种看法的概述。以后各章将详细讨论,共产党是怎样解决那些使国民政府逐渐失去民心的问题的,因此这一概述也是一个引子。

知识阶层对中共的评论,在许多方面都与他们对国民党的批评大相径庭。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自然比较熟悉国民政府的政策与行为,但对中共却不甚了了。其次,由于他们觉得政府应对当前的政局负大部分责任,而且又觉得这个政府仍有能力实行改革,结束内战,因此,他们就集中精力,希望敦促政府改革、停战。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中共处于一个反对党的位置,且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对中共的这一看法既出于自由人士自身的政治偏见,也与对自由派报纸的政治限制有关系。但是,虽然知识分子对中共了解不够,他们对中共的批评却很真诚,也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基本信仰相一致。

自由派人士有关中共的讨论与他们对政府的评论一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中共在解放区或其短时占领过的地区的表现及共产党统治的形式。国民党在这两个方面都极易遭受抨击,共产党在自由派人士的账单上明确的负分只有一分。自由派人士对共产党纲领主要的几个方面反应不一,有的持肯定态度,有的矛盾不一,但他们对共产党统治下政治生活的反应却是一致的否定。

1947年3月，储安平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自由派的观点，由于知道自己从未在任何共产党地区生活过，他承认许多对共产党工作的好评都是那些在解放区生活过的人士所发。他还承认，从经济的准则来说，中共没有什么可怕的，在他看来，可怕的是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他写道：

坦率地说，虽然中共如今大声嚷嚷着它的“民主”，但我们只想知道，就中共的基本精神而言，它是否真的不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因为从他们的统治精神来说，共产党与法西斯并无多大区别，两者都想通过严格的组织来控制民众的意愿。在今日中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共鼓励每一个人都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从中共的真正精神说来，中共倡导的也是“党主”，肯定不是“民主”。〔1〕

政治与表现

从中共的政策及其执行情况来看，那些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得到最为肯定反应的问题，几乎都与战争有着某种联系。正如我们所见，知识阶层拒绝拥护政府作战的原因之一，就是战争使民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一代价包括强加到农民头上的赋税负担，政府对粮食的统购与征用，官员们中饱私囊的机会日渐增多，征兵时滥用权力，战场上军纪涣散，部队的大肆破坏。

在自由派人士眼中，中共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虽然也不是无懈可击，但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已意识到，在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同时，共产党人不同于国民政府，他们在战争的进程中设法在农民中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官员及其在地方上的朋党，仍把这场战争视作他们大肆攫取不义之财的机会，而

共产党人却用它加强自己在农村得到民众拥护的基础。〔2〕自由派作家把共产党的胜利归结为以下三个原因：他们的社会、经济政策；他们推行这些政策时的能力与忠诚；共产党军队的纪律。

在满洲

正如第五章所记载的，二次大战后，国民党在东北统治中的种种弱点已广为人知，公众对此议论纷纷。而共产党人熟练地利用当局所犯的错误作文章也是众所周知的，但这却不能自由谈论。国民党重占满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加强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控制。总而言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局使用了许多手段。它把东三省分成9个行政单位，并在几乎所有的高级职位中安插了关内人。政府对东北军依然心存疑虑，1946年俄国人撤军时，它不允许东北军参与收复东北的行动。政府在地方上的盟友，包括地主及其他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人，只要他们既不忠于共产党，也不忠于依然受人爱戴的少帅张学良。1946年底或1947年初，10年前由于参与西安事变而一直在押的少帅，又被流放到了台湾。

政府的上述措施实行后，民怨蜂起，结果，用对政府进行批评的自由派的话来说，共产党彻底利用了这一机会。中央政府傲慢地对待东北人民，共产党却深深懂得避免如此做法的重要性，他们在政治和军事职位上尽可能多地任用当地的人才和管理人员。张作霖和张学良老东北军幸存下来的旧部中，多数人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样，投奔了共产党。共产党把他们作为盟军来欢迎，编入林彪麾下，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非共产党军队的身份。张学思还担任了辽宁省省长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一满洲共产党统治区最高行政机构的副主席等要职。〔3〕

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中有许多东北人。据说，1946年中，林彪在东北的部队共有30万人，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分为三部。

一部分是由周保中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东北抗日联军。这支共产党军队自1938年开始受到日本人的围剿，损失惨重。1940年，幸存者大多被迫转入地下，一直坚持到1945年；也有几股小部队躲在山中，继续进行小规模游击活动；还有一部分人作为日本人监狱中的阶下囚幸存下来。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的旧部或从地下转为公开，或从监狱中出来，很快与苏联占领军展开合作，更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由于发动当地民众，到1946年中，该部人数已达15万。

人民自治军是林彪满洲部队的第二部分，其前身为大帅和少帅的东北军。这支军队抗战期间在华北，由张学思率领。1938年后，这支部队在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与共产党合作，参加游击活动，于1945年离开华北回到满洲。当时，这支军队只剩下大约3000人，但由于许多东北军旧部参加进来，到1946年中，他们已发展到25,000人。

共产党在东北部队的第三部分为八路军，但实际上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共同组成。这些部队——其中几部由东北籍将领率领——或坐着舢板从山东出发，或步行横跨河北、热河与绥远，于1945年10月和11月开进东北。〔4〕

沈阳和长春两地的记者热衷于报道所有的军队——苏联的、中共的及中央政府的——都一样不受欢迎。〔5〕不过，不同的报道记载了不同的故事，看起来，说政府军和苏军好的一篇也没有，倒是对中共的评价要好一些。例如，前一章曾提及的那位作家，于1947年初在离他家乡四平街120里的一个村庄里待了10天。政府军和苏军给当地人留下的全是坏印象。中共曾暂时占领过这片土地，他们的表现却相当好。他们没有动用农民的私人财产，虽然撤退的时候，他们从日本人修建的拥有150张床位的县医院里运走了许多东西，包括X光设备和输血设备。

当地人说,他们在沦陷期间并未意识到有两支不一样的中国队伍,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不同之处,并对共产党“多少还抱了更大的希望”。这些单纯的人们极易满足,对此,那位作家发了一些冷嘲热讽的评论,但也承认,住在他家的那一群共产党士兵给他母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尊重她的意愿,不骚扰她16岁的孙女儿,开拔时也不曾拿走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东西。〔6〕

还有的报道用类似的肯定语气告诉世人,共产党善待俘虏——无论是军官、士兵还是政府公务员。〔7〕据说这种办法对鼓动士兵投降十分有效。共产党任凭战俘自己挑选,是参加共产党军队还是回家。共产党把香烟和路费发给选择回家的士兵,然后欢送他们回去。

有鉴于此,那位痛感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灾难的记者,在1948年4月承认,如果政府真的相信自己在军事上与东北的共产党一决雌雄之时必能赢得民众支持,那它就是一厢情愿了。他写道,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那里的共军已与人民“打成一片了”。〔8〕尽管成千上百的学生、公务员、商人和其他有产者不愿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逃往松花江南岸国统区城市,但更多的人却投奔了共产党。所以1947年2月台湾起义之后,人们常说,东北之所以没有爆发类似的起义,就是因为那里打算起义的人都投奔共产党一边了。〔9〕下文是一位作家对当时局势的概括:

须知共产党之掘铁道、埋地雷、丢炸弹、并不是他带来的,而是老百姓替他办的。共产党在东北没有兵,是中央不要的兵。共产党没有枪,是中央干不好送他的枪,甚而还有偷卖给他的枪。共产党没有人才,是中央不要的弃才。〔10〕

其他地方

满洲并不是唯一的较共产党而言中央军相形见绌的地方。

几乎在每一处战场上，每一个好奇的记者都要碰上这些耳熟能详的事例。《观察》发表了许多报道，对各地共产党军队的行为表示赞赏，尽管其中某些作者对共产党纲领的其他方面并不赞成。《观察》报道的地方包括苏浙皖地区、长江以北的江苏泰兴县、冀中、陕西、甘肃和晋南。^[11]

报道苏浙皖地区新四军第一师和第六师的记者，对几件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行军时，军官们的妻室并不同行；这支军队不抓老百姓当差；官兵待遇相等。此外，新四军还努力与民众友好相处，当他们去地方市场上购买给养时，出的价往往比市价要高一点。结果，这个地区的商人一谈到新四军，就称他们为“四哥”。但这位记者告诫说，只要等到新四军在某地安全驻扎下来，四哥就会把他的那一套办法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先是登记住户，然后征税，最后征兵。^[12]

评论这一现象的多数作家都发觉，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出色的战略、聪明的计谋和严格的军纪。谁都知道，共产党人控制了大片地区而政府军艰难地掌握着“点与线”，即重要的城镇与交通要道。由于共产党人总是与人民“打成一片”，他们的军队有丰富的粮食和人力。^[13]自由派周刊《事与文》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记叙了天津以南战区的类似的状况；政府军不动用武力就得不到粮食，而共产党却没有这种困难，他们的给养收购员手上的“一小片纸”就足以保证在需要的时候能得到物品。^[14]

“原因很简单”，另一位作者写道：

（国军）限于社会经济组织及诸种特殊条件，没方法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并从而击破对方的战法。共军因为在解放区里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组织，建立了他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征粮征兵及自卫行政都有高度的效率，他所控制的乡村或城市，可以不用过分的兵力戍守，地方团队及人民武装保护一个地区有余，

而且还可以派出小部队来破坏国军的地方组织和交通,使征补训练与作战生活都相衔接,由民兵向乡县自卫队而地方团营,军分区部队以至野战军。初征集的民兵就赋予他作战的任务。教他在水里学习游泳,不是单在课堂上教给他游泳术。所以征起来的兵就是可用的兵,甚至没有征起来就已经使用了。〔15〕

另一位通讯员认为,政府不是没有看到这些现象,它也知道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时,政治比军事更重要。但政府不愿意推翻原有的社会,因此,它的悲剧性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16〕

对共产党推翻旧社会的努力最为肯定的是一位国民党公务员。1946年夏,这位公务员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山东菏泽待了三个月。黄河归故道后,政府派他到那里从事救济工作。由于没有多少事可做,他就讨论政治,试图了解共产党。当他离任时,他目睹的事实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贫富平等,共产党官员艰苦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他们的“工作作风”。他注意到他们在执行任务时的认真与负责,以及事后开会时开诚布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由得惊叹:“他们与我们完全不一样。”他写道,与我们中的某些人不同,他们从不口是心非。当然,他也承认,“基层干部免不了有些浅薄和机械的回答……但他们有这种意识形态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自觉、自信总比我们玩忽职守、自欺欺人要好。”

他惊讶于共产党人清账结算的简洁与处理官方文件的方式。他指出“与我们”充斥着假报告与假账目的“狗屁不通的财会制度”不同的是,他们只就是实收实支实报实销,“一切都是真的,见得人面的,相信别人是有人格的”。由于没人要求他们在无用的文件和记录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共产党的官员和行政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处理自己岗位上的工作。

他还提到,当地的老百姓显然乐于与共产党合作,参与公共

事务计划,帮助搞军事运输等等。他后悔自己没有尽更大努力来弄清共产党到底用了什么法子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不过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共产党人给了老百姓“人”的尊严。他们耐心地向民众进行解释,允许民众反诘。通过这种不同寻常的行动,共产党加强了老百姓的力量。最让他感到惊诧的是,贫穷的男女在批斗会上敢于站到台上,面对那些曾经伤害、欺骗和压迫他们的人,公开发言。他在菏泽好几次亲眼目睹了这种集会,其中还包括了几次针对镇上天主教堂德国神甫和修女的会议。

通过观察,他发现除了多数已跑得无影无踪的地主和富农外,镇上和附近地区唯一不喜欢共产党的人就是商人。共产党人控制了与国统区的贸易往来,许多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这导致对许多非必需品如香烟、化妆品、舶来品等的“进口”禁令。皮鞋生意一落千丈,因为那些先前有地位的常客都倒台了,相反布鞋却日渐流行。饭店老板的生意十分红火,因为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花钱。有些商人与附近的国统区进行黑市交易,因为共产党想对商人礼让三分,他们往往对这种生意“睁一眼闭一眼”。偶尔也有个把商人因此受罚,头戴一顶写有“大坏蛋”字样的绿高帽游街。至于农民,绝大多数都全心全意地拥戴共产党。[17]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常常被视为中共胜利改变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组织的基础。[18]尽管自由派作家对于实行土改的方式有种种疑虑,他们还是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土改为其农村力量源泉的说法。[19]一位教师离开苏北共区来到上海后,立即接受了采访。他说,虽然他从未听共产党亲口说过,但他感觉得到,如果不是内战,共产党肯定不会这么快就从温和的减租迅速转向土改。这位观察者指出,“农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自然就会想到,要想保住这块地,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其实,农民很怕地主的报复手

段,他们很有可能与中共抱在一起。”[20]

《观察》的一名记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共产党土改纲领的基本目标是要发展他们在农村的政治、军事力量。不管如何,结局十分明显:

现民解放区中的土地,在军事与生活双目的下,地上与地下都变革了。这个剧烈的变革,使得具有旧意识的人非常震惊。解放区深厚的军事力量,是从这种变革产生出来的。兵源粮源没有问题,在他的新社会秩序下,可以施行“空心战术”,后方不要任

限制私人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民生原则。〔24〕有关斗争大会、清算、乱打乱杀的绘声绘色的报道数不胜数，广为流传，因此人们已不能把有关失误推到几个过份热情或误入歧途的地方干部头上了事。暴力显然已被算作是共产党推行农村计划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它使得许多人对中共产生畏惧心理。

也有一些人既没有忽视这一代价，也不曾为之坐卧不宁，上文提及的那位参观过菏泽的公务员就是其中一员。他写道：“但对于斗争的方式和有些杀人案，却认为很不妥当。但回头一想，也觉得不能免。”中国的社会组织就是由地方官员和豪绅把持乡村事务，农民低人一等，没有人会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本人在解放区内并未目睹任何乱杀的现象，但在他逗留期内，地方报纸的确报道了这类事件，还有一位干部告诉他，那些打骂、伤害过老百姓的地主有时候会被杀死。

因此，城市知识分子可以把这种暴力行为看作是社会正义的一种形式，但更为普遍的反应是不赞成与恐惧。《观察》的一位读者对共产党在晋南的活动的反应就很有代表性，虽然他的看法比大多数人要极端。他简短地谈到发生在那里的几件事，包括地主被农民打死或打伤致残，然后以此结束全文：“……先生，我要哭了，我不会描述那样生动。这篇消息语，你们也登载一下。我知贵刊不是国，也不是右，为晋南人诉之苦，我也不是□，也不是右，我这样晕头昏脑的听到见到，站在人的立场上，我要叫唤！”〔25〕

几个月后，《观察》发表了一篇文章，具体记叙了此信所写地区发生的一切。作者认为，1947年3月，胡宗南将军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他把晋南部队调去进攻延安，实际上是用晋南30个相对繁荣的县换取了陕西45个穷县。作者接下来记叙了共产党攻占晋南后，如何迅速地在该地区建立秩序，士兵如何立即撤

离,粮食如何分给人们,乞丐又是如何消失的,而生活又是如何变得宁静而和平(与阎锡山统治时期相比)。多数教师逃走了,孩子们上不了学,但共产党让他们下地干活,或安排做别的工作。

士兵撤离后,县、区与村一级都建立起人民政府。干部们进行了人口普查,每村派驻三到五个政工人员。他们找到最穷的农民,询问他们村中每一个人的姓名、职业、财产和家庭背景及其他情况。第二步就是建立起农会,村中的无产者都是其基本成员。接着正式把村中所有家庭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级,每一级中又有上、中、下之分。最后的就是阶级斗争运动,在农民干部的引导之下,农协担当了运动的领导角色。

农会基本上在傍晚开会,虽然有时候一天要开几个会。讨论的话题都是秘密的,会员基本上不愿意透露。但从村中的小道消息来看,干部们会谈论富农有多残暴,他们如何剥削贫农,干部们又该怎样帮助贫农从贫困中解脱出来,打倒剥削他们的人。会上,贫农也发言,议论村中谁有钱,他们过去干了些啥,等等。结果,这些人就会在一次全村大会上被带上来,随后往往就会发生极端暴力行为。

富农是斗争的首要目标,财产被没收,房屋被查封,将来再分给贫农。有时候也有人被错划为富农,据说一些这样的家庭就此陷入贫困。作者说,他所在的村中富农非常少,但有30多户的财产遭没收。而另一个只有100户的村庄中,有40户的财产被没收。在这些所谓的富农中,许多人想逃也逃不了,因为村中的年轻人或妇女就在村外放哨,没有农会的条子,谁也不能进出。在许多地方,被没收的土地、粮食或其他财物闲置了很长时间,没有分配。

农会从富人中找出曾经虐待和剥削农民的人进行公开批斗。这些人将被带到全村大会上接受批斗,往往要遭村民殴打、

惩罚,包括用石头砸,用棍棒打,用拳揍和用刀捅,结果有时候挨斗的人就这样被打死了。使这位作者更为不安的不是具体的暴力行为,而是暴力施用的任意性。村农协领导阶级斗争运动,连村公所人员都不能干涉。他写道,在解放区好像根本没有法,没有律师,也没有法院,个人一点也得不到法的保护,生和死掌握在农会手中,连地方政府也无权过问。[26]

来自苏北的报道同样使人觉得不安。由于苏北离上海、南京较近,再加上数千名苏北难民的到来,这两地的知识阶层就比较容易了解那儿的消息。苏北的状况多次被人提及,这使许多自由派人士对中共心存恐惧。日本投降后不久,苏北的某些地区就已开始进行阶级斗争运动。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被揪到村民前受罚。共产党还鼓励农民与地主、恶霸“清算”。这两种人通过收取高额地租、剥削佃农和农工、损害农民利益等手段,积累了大量土地。

一位自称“原则上”赞成这种清算的观察家却发现,在清算过程有许多方法需要批评。他说,问题就在于中国社会缺乏社会组织,农民“对报复有一种偏爱”,这种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走得太远。因而,尽管中共派遣工作队指导阶级斗争,仍有许多人蒙冤受屈,发生许多“可悲”的事件。[27]

正如中共主要的土改文件——1946年的《五四指示》(下一章将分析)所示,共产党人已充分意识到这么多解放区的难民到达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后所造成的无法掩饰的形象。同时,他们还注意到中央政府对这些难民漠不关心,就想方设法发起了一场宣传攻势,欢迎一切打算返回共产党统治地区的人归来,这样既抵销了那些针对他们的批评,又利用了政府的失败。

上海一家左派杂志刊登长文,分析了难民问题。它先承认由于有成千上万的难民从解放区逃出,很多人把苏北解放区想象

成了某种“地狱”。然后它依据难民逃亡的原因把他们分成六类：一些人害怕被征募到新四军中当兵；一些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出逃是因为听信了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传言，这两类人显然是受了国民党谣言与反共宣传之骗。第三类是不愿减租减息的普通地主。剥削、压迫民众的土豪劣绅是第四类。日本侵略期间的汉奸傀儡是第五类。最后的六类难民，才是那些被没经验的地方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时所犯错误吓走的人，结果使老百姓误解了新四军和民主政府。

这篇文章强调党将会欢迎第一、二和六类的难民归来，甚至连地主也会受到欢迎，只要他们同意减租减息。只有汉奸和坏分子才会受到警告——只要他们回去，就会被逮捕，受到惩罚。^[28]

1946年夏秋两季，被上海的通货膨胀等问题弄得身无分文的数千名中小地主，显然是回到了苏北解放区。当地政府向他们提供救济，并帮助他们找到了住处和谋生的办法。有些人在自己的村里分到了一份和别人一样多的土地。一些人在同意减租减息政策后，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土地。同年更早一些时候，《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北平电讯，报道华北也成功地实施了类似的计划，以鼓励难民回到解放区内自己的家乡。回去的人中还有地主，他们得到保证，只要他们同意遵守减租政策，共产党就会保护他们的利益。^[29]

了解共产党的这些工作（后来在1948年发展为一场重要的反左倾运动），可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为达到自己目的所采取的手段的恐惧，但并无证据显示这种恐惧已消失殆尽。更确切地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共土改纲领的反应所固有的那种矛盾心理，与他们对共产党统治下政治生活的更为基本的保留态度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谈论此问题之前，我们还要讨论另一个使自由知识分子产生爱恨交集

矛盾心理的事物。

民族主义的问题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那些主张中国应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人士,有时会发现有人从民族的角度出发对自己进行批评。许多作者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恐惧,即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在某些方面屈从于苏联。另一些并无此类恐惧的人,对此问题也十分敏感,费了不少心思想证实中苏这种关系并非不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自然也被人以同样理由抨击。民族主义成为中央政府在那一阶段反共宣传中最主要的特征。这场宣传攻势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1945年—1946年间苏军在满洲的存在与表现,以及中共与苏军的关系。

根据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协议》,^[30]1945年8月9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8月14日日本投降之时,苏军刚开始进入满洲。同日,苏联与中国政府宣布缔结两国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谈判期间,据说斯大林向中方代表宋子文保证,苏军将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内撤离满洲。

正如人们所见,从8月中旬到11月中旬,俄国人占领了东北的城市与主要交通线,而乡村却无人控制,共产党正好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空隙。在此期间,中共军队在苏联占领军的默许下——如果不是积极配合的话——进入了满洲。即使苏军想要阻止共产党进入满洲(而且显然他们并未阻止),他们也做不到。此外,他们还在许多地方采用了拖延战术,挫败了美国人尽快把国军运往东北的努力。

如果苏联在1945年11月前从满洲撤军,那就意味着中共将立即占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因此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结果苏联同意延长其在东北的时间,并允许美国人把政府军运到

满洲大城市。新设定的苏联撤军日期为1946年1月3日,但以后又延至2月1日,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赞同下又一次延长,直到1946年5月,苏联才彻底撤离满洲。〔31〕

满洲“危机”发展之时,国民党政府或至少是其中某些人,发动了针对所谓苏联与中共合作的宣传攻势,他们谴责苏联把满洲厂矿中的物资、设备和机器拆掉运往苏联。这是公认的向战败国索取战争赔偿的方法,但这一沦陷区中的一切设施与设备都应归中国所有。这一宣传在1946年2月发展到了顶点。当时,《雅尔塔协议》公布了,又发生了政府派往满洲接收抚顺煤矿的张莘夫被杀一案。张和他的随行人员,在苏军驻扎的地区被人从火车里拖出来杀害了。〔32〕

批评苏联的并不局限于国民党官方。当时舆论大哗,对《雅尔塔协议》的条文感到极度震惊,因为它又恢复了年轻的苏维埃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即宣布放弃的特权。除了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左翼的上海《文汇报》以及苏联支持的上海《时代日报》之外,中国舆论界怒火迸发,对美英两国屈服于苏联要求,违反中国领土完整感到愤怒至极。

在重庆,14所大中学校的学生罢课,要求维护中国主权。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于2月18日开会,草拟了一份对英美的抗议书。2月19日,南京中央临时大学3000名学生发表声明,敦促苏军从东北撤兵,并表示反对《雅尔塔协议》。在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全体学生举行罢课以示抗议。〔33〕2月22日,上海学联举行会议,出席的有200多名学生,代表了交大、震旦、圣约翰、东吴大学、之江文理学院等校。会上成立了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34〕

但是当人们得知重庆《新华日报》办事处被一群示威“学生”袭击之后,这显然是受国民党右翼分子怂恿,学术界的反苏运动在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了。〔35〕2月26日,上海临时大学的学生

组织决定取消一项预定的静坐抗议活动，因为它“完全是被一些企图把学生作为工具的教唆者挑起的”。在此之前，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已采取类似措施，取消了一切罢课和示威。〔36〕

不过，学术团体最初反应的自发性，已反映了人们在中国国家主权受侵犯之后被激发出来的感情能有多么强烈。中共也无法逃脱公众的谴责。《大公报》的一篇反苏社论言辞犀利，锋芒直指中共。社论说，鉴于政府军进入东北之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层层限制，我们就要问一声，中共的军队为何能长驱直入？〔37〕自由派的《新民报》也坚持认为，政府与中共间在中共要求保留其各地方政府自治权问题上的争执是一个内部问题，外国势力不应插手。就像政府不应借满洲问题为藉口而忽视政协会议提出的民主协议一样，中国共产党也应让大众知道它对苏联持何态度。这家报纸最后说道，政治信念上的志同道合，不应成为践踏民族利益的原因。〔38〕

中共显然不欲批评苏联，但出于防范，它详尽地分析说，要区分爱国主义与“排外主义”，他们把反苏运动比作由反动分子挑起受政府操纵的排外拳乱。重庆的共产党报纸说，这种运动的目的并不是捍卫中国，而是盲目排外。〔39〕

当沈阳记者询问林彪的参谋长伍修权有关苏军运走满洲工厂设备之事时，伍的回答与所有共产党发言人在这种场合下的回答一样：他对此事一无所知。〔40〕中国共产党人还提醒批评他们的人说，在日本占领的14年间，与满洲人民并肩抗日的是中共，而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敌人从未放过一枪一弹。一篇社论还尖锐地指出，当国民党最后到来之时，他们把一切够得着的东西全拿走了。〔41〕

《大公报》驻沈阳记者证实了共产党所言不虚，但他还报道了中共因与苏联结盟之故，声望受到了损害。他写道：“帮外国人

把东西从东北搬走的人给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42]但不管印象有多坏,这一问题激起的怒潮,尤其是针对中共的,在苏军撤离后并没有持续多久。

但从人们时常暗示中共与某外国势力联系太紧这一点来说,暗中的批评一直未曾中断。一名国大代表所发评论很有代表性,他说国民党和中共都说要执行三民主义,但国民党只执行了这一主义的上半部,而中共只执行了下半部。因此不管在何方,人民都只有“民半主义”。中共忘了民族主义,国民党则不顾民生,两党都只做到了他们所言民主的一半。^[43]

但也许是由于国民党在反共宣传攻势中过于强调民族主义问题,而且有时也会用这个问题来对付自由派,因此自由派的作家们往往避开这一热点。与暗中的批评相对峙的似乎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不管怎么样,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因此不可能损害民族利益。有鉴于此,在苏联从满洲撤军后,自由派人士每逢评论中国共产党之际,与中共做法一样,往往总是向内看,视线集中在更为直接的国内问题上。

共产党统治的形式

无论自由派人士如何看待中共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几乎从概念上就反对与共产党统治有关的政治实践与制度。如果说他们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独裁作风,那么共产党得到的评价也不会更高。许多作者批评这两个党都违背了民主原则,醉心于一党专制。的确,这就是自由派何以如此急于把两党组合成一个联合政府的原因,迫切程度也许仅次于他们对立即停止内战的渴望。他们把联合政府视为使两党互相牵制,谁也不能走得太远的

手段,使得两党从特殊的“革命型”组织转变为普通的更符合自由主义理想的政党。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才愿意让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同时又显然对中共独家组阁缺乏热情。

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没有多少直接经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国民党对后者的批评相比,并无任何独到之处。但这显然并未减少他们反对中共的程度。他们反对中共在解放区独揽人权,也反对限制个人自由,尤其是反对限制发表政治异见。

上文提及的那位国民党公务员的看法,是最不含批评色彩的观点之一。他写道:“我觉得国民党的民主形式的民主,而共产党的民主是党控制下的民主。”他觉得由于没有官僚、恶霸,由于每个人都能在公共集会上畅所欲言,也由于实现了平等,解放区的确存在着某种民主。但就多数人而言,自由派对中共所实行的民主是相当不满的。

张东荪愿意放弃许多自由及自由派民主的许多内容,但他却说:“至于中共,我们觉得它的组织太强大,不适于一个民主国家。”^[44]周钟歧教授承认,中共的宣传口径与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一致,都说要先实行三民主义,并坚持说只有在实行工业化之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但周教授质问道:可是我们只需要三民主义,把它托付给中共不是有点儿过头了吗?^[45]

另一位作者试图解释,为何自由派人士对中共有这许多疑虑,他写道:“有人说,在反封建这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任务相同,目标一致。的确,在破坏旧的中国这一方面,今天的学生与共产党可以说是同志。但同情并不就是拥护。因为在建设新的中国这一方面,他们和共产党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他总结说,基于此理,共产党的民主作风与国民党的一样,令人怀疑。^[46]

《时代批评》上的一篇社论说得更明了。编者谴责右派侵犯民权之后，又转而批评左派：“如果他们看到有人用言词或行动咒骂国民党政府，就会鼓掌。但不管中共说什么或做什么，他们都说好，谁不同意就是反动分子、帮凶、走狗、国民党特务等，就要‘清算’，要批斗，并被看作中共的批评者而划入另册。”^[47]

但还有许多批评并不这么中肯，一种常见的看法就是如果国民党在这个方面坏，中共就更糟。杨人梗教授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写道，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由于党的纪律和干部的“左派幼稚病”，人民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他声称，中共根本上是否定自由的，它的干预比国民党更为严厉。^[48]

另一个作者认为，他们的民主概念与我们的是两码事。在解放区虽然没有正式的新闻审查，但共产党其实比中央政府对新闻控制得还要严。^[49]南京《新民报》编辑周绶章抱怨，中共领导人用铁的纪律统率全党。更糟的是，毛这位政治领袖业已成为文学、艺术的主宰者，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已成为作家和艺术家的最高创作原则。周回忆起他听到过的有关延安几位作家的报道，他们对政治领导有不同看法，但被要求使自己的工作继续与政治上正确的原则保持一致。^[50]

储安平在谈论这点时，与讨论别的问题一样直言无忌。他说，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民主，那么中共如何在这一点上为自己辩护？我们自由主义者深受英美传统的影响，但我们照旧批评英国与美国。“可我们有没有听到中共批评斯大林或苏联？我们有没有看到左翼报纸批评毛和延安？你们是不是想说斯大林与毛是圣徒中两位无可挑剔的圣人？延安与莫斯科则是天堂里的天国……？”他总结说，在国民党统治下，不管限制有多大，我们至少还可以为自由而斗争，这份自由只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但如果中共执政，就会变为一个“有和无”的问题。^[51]

1949年的自由派—共产党联盟

那么,当像储安平和王芸生这样的人在1948年末和1949年终于决定投奔解放区时,或是像张东荪那样留在大学职位上致词欢迎胜利者时,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对中共的疑虑根深蒂固,对此他们毫不隐瞒。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拥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不赞成一个由中共主持的政府。事实上,他们一直真心诚意地与中共争辩,直至推行自由主义折中方案的一切希望均告破灭,才转而投奔中共。

既然如此,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希望如何去适应这个新政权呢?他们预计自己必须达成何种妥协?自然,他们不会明说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从他们文章中的两个不同主题,归纳出一些可能的答案。这两个主题中的一个,与他们对毛有关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以及党据此拟定的对知识界政策的反应有关;第二个与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的要想推翻旧社会就必须妥协这一点有关。

新民主主义

内战期间,毛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一文中所概述的思想,为共产党制定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表态提供了基础。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十分熟悉毛的这些思想,这得归功于这些思想初次见诸于文字时抗日统一战线内较为宽容的精神。这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共产党对他们根本性的保留,在程度上与他们对共产党的顾虑是相等的。

理 论

毛1939年有关知识分子的言论,在随后的十年中作为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被频繁引用,一再重印。在这篇讲话中,毛

根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把他们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他警告说,由于知识分子固有的个人主义,不切实际和动摇,有的人会脱离革命,采取消极态度,甚至会变成革命的敌人。他又进一步说,他们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但他同时也指出知识分子富于政治感觉,对现实不满,常常生活在失业的威胁中。因此,他们在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把群众与革命主力军相联结的桥梁作用。为了证实这一点,毛提到了学生与知识分子自 20 世纪初以来发展起来的积极参政的传统。〔52〕

对知识阶层的这一看法包含在毛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之中。他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推翻旧的封建社会,代之以一个三民主义的新社会之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过渡时期新社会的“基本力量”。这个社会将由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联盟来统治,这个新社会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成分就是混合经济以及在农村地区实行的“耕者有其田”。这种新制度就叫做新民主主义。〔53〕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时全党正与全国人民一起翘首期待即将到来的日本投降。在为大会撰写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再一次概述了作为共产党纲领与将来工作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原则。他写道:“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他还指出,某些人仍在怀疑和害怕中共一旦得势之后,就会抛弃自己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见解,向苏联学习。为了平息这种恐惧,毛宣布说:“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

构的制度。”新民主主义的阶级制度是与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发展相适应的，有别于苏联的制度，将会持续“一个长时期”。〔54〕

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战后路线是团结、民主、和平，在一个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建设一个新中国。毛号召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用一个联合政府——一个包含“所有一切抗日政党和无党派分子的代表”在内的统一战线民主联盟来取而代之，并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55〕

实 践

到底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实践中的新民主主义——尤其是实施于自己头上的部分——有多少了解，我们至今仍不清楚。下文所载为1945—1949年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大要，极具系统性，而这一点只看自由派人士写作的东西是做不到的。

1948年1月，毛发出警告，共产党必须继续有限度地对知识分子采取保留态度，不能对知识分子采取“冒险政策”，他特别指出，真正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只占极少数，共产党应对知识分子持“慎重态度”，并“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56〕这一迹象也许可以说明，为何内战期间既有大量报道记述教师与学生逃离解放区，也有至少相同数量的报道记叙了一个相反方向的流动。〔57〕从《观察》一位记者发自苏南的报道来看，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最大失败，就是未能妥善地对待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他们“纷纷逃离新四军的统治”。〔58〕吴世昌

也列举类似事实作为自己反共的一个主要论点——中共将自己与小资产阶级隔离,结果党内的知识水平就“不幸地受到了局限”。^[59]

但是那些从国统区逃往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却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无论共产党接纳了多少难民,他们与中央政府不一样,决不会让这件事情使自己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共产党通过报纸的社论、广播(无疑也通过其他更为隐蔽的方式)来欢迎逃亡的知识分子。而且,在欢迎和支持方面行动更甚于言词。来自国统区的学生在解放区学校得到了免费的住宿和教育,有时还有免费的衣物、毛毯等日用必需品。^[60]

1946年5月,延安广播电台报道,华中与华北的大中学校虽然仍不是学习的理想之地,但已成为数以千计来自上海、北平和天津等国统区城市学生的庇护所。据说,来自北平和天津的300多名学生已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大注册,日本投降后来自上海的学生亦在苏北开始上课。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由于国民党对所谓“汉奸学生”(沦陷区大中学校的学生)的歧视而感到幻灭。^[61]至1946年8月,晋察冀边区已成立了14所大学和技术学校,注册学生共有6225名,其中有许多人来自国统区。^[62]来自国统区的教授和讲师在解放区的学校里得到行政和学术的职位,并受到积极鼓励,开展工作。

在1947年底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地克服“左倾错误”之前,解放区团结知识分子并对其实行再教育的工作尚未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为了克服土改运动以及不成熟的城市政策中的某些问题,当时发起的反左运动,传达了毛1948年1月对知识分子问题上冒险政策的警告。^[63]

任弼时有关土改问题的报告被广为引用,其中有篇讲话谈到了知识分子,时间也是1948年1月。他的看法与毛基本相同,

不过任还特别提到了地主和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后代。他说，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要破坏封建主义就抛弃所有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学生，包括地主和富农家庭的子女都同情革命，不反对土改，他们逐渐意识到土改是他们所要的民主的一个基本成分。他还说，此外，三至五年内，革命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我们将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农艺师、会计、各种专家、教师以及民用铁路技术人员。训练这样的人需要许多年，而且解放区这方面的人才并不多。任强调了使用现有人才的紧迫性，但与此同时，他也说要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培养他们为人民服务。〔64〕

在第一批反映1948年强调安抚新精神的地方指示中，有一份是共产党东北局在1月15日颁布的。与其他文件一样，这一指示开篇就强调知识分子固然有其内在的弱点，但他们能为中国革命作贡献。但在东北，在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方面，没有采取措施改造那些在沦陷期间掌管机关、厂矿、铁路的人，他们在共产党的管理下仍官居原职；另一方面，部分干部采取了“贫雇农路线”。他们不但把它错误地运用于乡村的土改运动，还把它机械地照搬到学校和机关。在这过程中，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仅仅由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就被打入另册。〔65〕

为了纠正此类错误，东北局下发了一个七点指示。所有的单位和组织都应该继续调查阶级出身、思想、态度及工作作风，以便把地主富农思想、腐败和官僚主义连根拔出。不过，不能简单地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就把他们开除。应对地主、富农受过教育的子女亲戚进行调查和改造，只要他们的工作是好的，不反对土改，就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而且，只要地主、富农的亲戚接受了进步思想并愿意接受再教育，就应允许他们进入干部学校。

普通中学的学生应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但不能一概拒绝让地主富农的子女入学,在已由党组织掌握的学校尤应如此。不能只根据家庭出身就开除教师,除非他们反对土改,参加反革命活动。同样,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等人,除了极个别反革命分子以外,只要他们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都应允许他们继续工作。

最后,除了区、村一级的政府机关和农会之外(这些单位暂时还不能让知识分子进入),应允许知识分子参加县级及县级以上所有公共机关与政府单位的工作。〔66〕

在安东“五四”青年大会上,夏征农同志试图解释为何暂时不能把知识分子派到区、村一级的岗位,他的语气近乎道歉。他指出,我们此刻正处于土改运动的最高潮,而许多知识分子的家庭曾经是或如今正是斗争的对象,如果我们派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工作,土改将得不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但他又告诉与会的青年人,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你们。只要你们明白,你们个人的家庭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全国人民却能得救了,只要你们坚定地拥护土改,不反对土改,党和民主政府就仍会需要你们。〔67〕

到了1948年秋,安抚的调子变得越来越坚定,因为共产党发现,要想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军事、管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部门基层工作干部的需要,已变得越来越难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军队出人意料的迅猛前进。1948年9月29日,共产党华中局颁布的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指示就反映了这一点。该指示开头说,知识分子是我们的重要财富,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对我们心存疑虑。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但也因为共产党自己曾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作掉以轻心,党的政策也有错误之处。为了消除知识分子的疑虑,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共产党拟定了一份教育和思想改造的特别计划。

各级党政机关要运用报纸、政策声明、通知、手册、漫画以及各种会议和文艺活动,来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帮助他们消除恐惧。此外,要为教师和学生开设各种短期学校和训练班。每个班持续三或四个月,集中讨论时事、中国革命问题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为了开展这一工作,地方干部要特别注意以下四点:首先,在各种训练班和干部学校中要避免无组织纪律和无政府的态度,也不能搞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第二,新到解放区或共产党新接收地区的知识分子,在食物、衣物和学习资料上应享有一些特权,但是那些负责训练工作的干部应该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影响知识分子。

第三,采用自由民主的工作作风,使知识分子彻底公开和坦言自己的顾虑和保留态度。第四,短期学校要依靠讨论会、辩论、墙报和各种群众运动,把它们作为解决一切思想问题的手段。在新解放区与非党知识分子打交道时,要特别避免三查、整风、干部调查等方法。〔68〕

指示总结说,这些学生和教师在国民党控制下生活了这么久,要想其中不混进一些反革命分子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普通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他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学籍才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并非坚决反对革命,对待他们应与非国民党员和非三青团员一视同仁。应当允许他们学习,一旦他们获得有关中共的基本知识,疑虑被消除或至少减轻一些后,就应把他们分配到各种最需要他们的组织中去。〔69〕

知识分子的反应

虽然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心存疑虑,他们仍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给后者留了一席之地。但我们不能希望本文所分析的文章的作者中,多数能对意料中将要经历的“改造和再教育”会过分热情,虽然这种改造在开始时可能十分初级、粗浅,而且他们

对共产党能否长期执行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也不抱什么幻想。许多人甚至批评这是一场骗局，因为它只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对以后的社会阶段故意含糊其词。一位作者评论道：“中共并没有放弃马列主义，也没有放弃任何东西，这只是一种计策。因此，不管中共提倡什么民主，它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党派。”^[70]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看法——无论共产党的当前计划是什么，它的长远目标总归是要把中国变为共产主义国家。但在一些人看来，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时间与“客观条件”就是其中的一个。

因此，当张东荪为把中共引入联合政府而争辩时，他承认中共从不隐瞒它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必要性的信仰。但他写道，我本人和他们谈过，他们说只有他们的儿子或孙子才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因此，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不是现在而是将来的问题，而且谁能预言五六十年内革命的客观条件就能成熟呢？他继续写道，也许在此之前，人们就有了足够的食物，生活标准有了提高，每家都能自给自足。他总结说，中共目前正处于一个贯彻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由于他们言出必行，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没有必要害怕中共的“将来革命论”的招牌。^[71]

施复亮也持相同观点，在他看来，中共并不想在这一阶段实行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因为条件并未成熟。目前他们最想实现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他以中共对联合政府的实际支持为例写道：

有人说，这只是一个诡计，一旦时机合适，中共就会推行苏维埃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不敢说他们不会，也不敢说这不可能。但“一旦时机合适”是一个客观的问题。……也许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我们将会从新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他总结说,无论如何,今日的民主人士或民主党派都不必害怕共产主义的威胁。〔72〕

我们无从知晓这一看法有多少普遍性,也许张和施只代表他们自己,但也许不是。而且,当时还有一种考虑可能也使得人们愿意接受中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虽然对其已在共产党地区执行的方式有些担心。这种考虑就是人们意识到,为了奠定一个新的进步社会的基础,可能必需暂时作出妥协,放弃某些自由原则。

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思想出现在一些自由派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民主的建议中。它还毫不奇怪地出现在那些对共产党行为留有深刻印象的人中。这些像那位国民党公务员一样的人感到,暴力也许无可避免,同时又觉得共产党人已实现了一定的民主,因为他们消灭了恶霸,给了农民“站到台上说话”的权利。

最后,这一思想还出现在一位学生对杨人梗教授的指责中。杨教授在文章中强调自由人士与中共之间的差距。那位学生写道,的确,中产阶级的自由人士难以接受中共的暴力方式,他们对个人的自由发展评价甚高。但是自由人士也有社会良心和被中国社会固有的不平等所激起的社会正义感。这至少为暂时调解自由人士的自由与共产党人的平等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共产党人多半本身就来自中产阶级,因此可能会接受自由人士的善意批评。

他继续说道,从自由派的观点来看,必须要有这一妥协,因为无论他们可能在文化上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的无能。他们推翻不了旧社会,因为他们太执著于个人的自由,而忽视了大部分人的福利。他们没有在人民中扎根,也不理解土改与农民的觉醒是摧毁控制中国社会的特权势力的必要条件。他称,因

而自由派须与共产党联手,以打倒他们共同的敌人,完成这一关键任务后,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新开始彼此反对的旧关系。〔73〕

用杰克·贝尔登的话来说,这就是人口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少数人终于接受共产党纲领的过程。〔74〕内战期间在知识阶层生活中占了显著地位的政治论战,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对自由主义的献身精神,但这种精神却可能由于自由主义信奉者在政治上的弱点而被低估了。接受共产党纲领所承担的压力,在他们政论所持有的愤怒与无奈中表露无遗。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影响不了国民党的行为。同时,他们又意识到,将要代替国民党的新政治精英很可能与国民党一样,对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不会作任何让步。这更加强了他们的两难处境。

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其实替中国自由派人士减轻了这种困境。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进行选择。他们发现前者的政治原则与表现实际上一无是处,而后者的政治原则则被认为是对自由阶层所深深执著的一些信仰的否定。他们对国民党仅剩的一点忠诚只是靠着一个遥远的可能性来维持——他们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斗争可能会在某一天胜利。如果他们投奔共产党——后者的表现受到了广泛的赞扬,无疑他们必须付出放弃这一可能性的代价。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这种两难处境的压力减轻了,因为这一抉择已演变成是选择一个立即就要执行而且永无归期的放逐,还是接受一个尚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政府。

即使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共,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的。虽然大多数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接受了中共,但仍有一些人作了另外的选择。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对国民党的不满从未达到他的许多同事所表达出来的激烈程度。但是他在内战期间还

是站在自由派一边议论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学生运动。据报道,胡在1949年1月飞出被包围的北平后,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次长叶公超说,对国民党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告诉叶,“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分子之所以还依旧彻底追随你们这种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至少还能享受沉默的自由。”^[75]

显然,大多数自由派人士并未把保持沉默的个人自由放到如此高的位置上。^[76]或者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不要使用这一权利。例如,费孝通在与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费尔德的谈话中提到,他觉得虽然自己是共产党“忠实的反对派”中的一员,但在中共政府下他可以有效地工作。虽然他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抨击(就像多数知名自由派人士一样),费仍然在1948年底道出心中希望:为中国的工农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还要批评共产党——在他觉得有必要批评的时候。^[77]

不管这些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不应被视作政治投机分子——这是1949年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革命事业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确是后来者,但他们在通往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上,为了自己的理想也曾鞠躬尽瘁,直到实现理想的可能性消失殆尽。只有在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成为确凿的事实后,知识阶层对共产党的态度才从有保留的不赞成转向真正的接受。

尽管自由派人士决定理智地接受共产党的统治,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明确拥护新政权,或作出了根本性的、永久的妥协。他们的信仰可以容纳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甚至可以超越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地步,但决不会同意一党或一个阶级的专政。就像中共从未试图向中国社会隐瞒自己的长远目标一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没有隐瞒自己对此的反对意见。

共产党人对中国知识阶层的保留与后者对共产党的疑虑一样,都是根深蒂固的。与知识分子联盟在党内产生的压力清楚地

反映在党的告诫中，党提醒党员要避免对知识分子采取冒险政策，要联合他们，并把他们争取过来。1949年中共与知识阶层的联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两者之间深深的差异，但这一差异仍能清楚地解释此后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

注 释

[1]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6页。有关中共的消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观察》等自由出版物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共地区的文章，这些都是根据对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士的采访，或在共区或共区附近地区待过一段时间的前线记者的报道采写的，在中央政府有关中共活动的说法之外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说法。

[2] 杨人榘：《论内战》，《观察》，1948年3月20日，第5页。

[3] 参见《观察》以下文章：(a)1947年7月12日，4-5页，何永佶（参见下文注9）；(b)1948年3月13日，15-16页，《北望满洲》；(c)1948年3月27日，第16页，钱邦楷（参见第二章注4）；(d)1948年4月3日，第17页，高超（参见下文注8）。

[4] 洪苏（音）：《长春烽火》，上海《文汇报》，1946年6月11日（《中国新闻评论》6月18日和19日）。也可见吕德润《春天里的秋天》，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20日（《中国新闻评论》，4月26日）。

说到第一部，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些残部（包括周保中本人）曾逃过边界，进入苏联境内，并在1945年8月与苏军一起回到满洲。至于第二、三部分，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8月11日命令四位将军带领部队进入东北，与进攻的苏军相配合。这四位将军是非共产党的张学思，领有河北和察哈尔的军队；三位共产党将领，冀热辽边区的李运昌、山东河北的万毅、晋绥的吕正操、吕万两位将军是满洲辽宁人，曾是大帅和少帅的旧部。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401-402页。

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于1946年1月1日，分为4个军区。这些军区的司

令员和政委分别为：(1)热河—辽宁(西满)，吕正操，李富春；(2)吉林—辽宁(东满)，周保中，林枫；(3)吉林—黑龙江(北满)，高岗，陈云；(4)辽东(南满)，程世才，肖华。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政委。参见周而复《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群众》，上海，1946年7月7日，第21页。

[5] 可参见《观察》以下报道：(a)沈阳记者，《沈阳晚寒》，1946年12月21日，第17—18页；(b)长春记者，1947年3月1日，第18页(参见第五章注81)；(c)高超，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参见第五章注67)。

[6] 汗奇：《东北十日(沈阳通讯)》，《时代批评》，1947年8月16日，25—28页。

[7] 观察特约记者(发自沈阳)：《哈尔滨归来》，《观察》，1947年9月13日，第21—22页。署名为远云岚的来信，沈阳，1948年2月17日，《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2页。

[8] 高超：《法币局关于流通券币值所激起的波浪》，《观察》，1948年4月3日，第17页。

[9] 何永估《从印度分歧说到中国前途》，《观察》，1947年7月12日，第4、5页。有关东北难民问题，参见第五章《政治上的无能：难民》。

[10] 钱邦楷，16和14页(参见本章注3)。

[11] 参见《观察》下列文章：(a)1946年10月5日，第8页，朱东润：《我从泰兴来》。朱是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b)1946年11月9日，第19—20页，特派记者：《这也是边区》；(c)1946年12月28日，15—16页，江南记者：《苏南情形》；(d)1947年9月27日，18—19页，何彭：《在内战最前线》；(e)1948年3月6日，第15页，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形势》；(f)1948年6月19日，第16页，西安记者：《陇东之战以后》；(g)1948年7月12日，第15页，兰州记者：《西北最近局势报告》。

[12] 参见本章注11(b)。

[13] 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14日(《同日中国新闻评论》)。

[14] 《事与文》，上海，第二卷，12号，1947年11月28日(《中国新闻评论》，12月4日)。

[15] 观察专稿(特别通讯员)：《空心战与穿心战》，《观察》，1948年5月8日，第13页。

[16] 参见本章注 11(g)。有关专门评述豫西的评论,参见野军《揭开豫西的内幕》,《观察》,1947 年 11 月 15 日,第 17 页。

[17] 江沙:《在菏泽解放区所见》,《观察》,1948 年 3 月 6 日,13—16 页、18 页,以及 3 月 13 日,12—13 页。

[18] 例如,浦熙修:《国民党三中全会鸟瞰》,《观察》,1947 年 3 月 22 日,第 15 页;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 年 9 月 7 日,第 4 页;吴世昌:《从美苏说到国内》,《观察》,1947 年 4 月 5 日,第 4 页。

[19] 参见第七章。

[20] 程月仲(音)《苏北土改三阶段》,《经济周报》,上海,第 3 卷,18 号,1946 年 10 月 31 日。

[21] 《观察》记者《土地改革·地道战》,《观察》,1948 年 4 月 3 日,第 14 页。

[22] 《观察》记者《从战局看政局》,《观察》,1948 年 2 月 28 日,第 16 页。

[23] 吴世昌,第 5 页(参见注 18)。朱东润(见注 11,(a))也持批评态度,他对“分店”——把店主的财产和股份给雇员——这一江苏泰兴农村中正在进行的运动评价不高。

[24] 上海《大公报》,1946 年 8 月 1 日(CPR)。

[25] 来信署名张强立,西安,1947 年 10 月 30 日(《观察》,1947 年 11 月 8 日,第 2 页,第 18 页。)

[26] 李子静,第 15 页(参见本章注 11,(e))。

[27] 参见注 20。

[28] 范长江:《让我们从苏北难民说起》,《文萃杂志》,上海,第 36 号,1946 年 6 月 27 日(《中国新闻评论》,7 月 6 日)。

[29] 上海《大公报》,1946 年 3 月 23 日。

[30] 罗斯福、斯大林和邱吉尔不经与中国商议,就同意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包括把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满洲的权利归还苏联:出租旅顺港为俄海军基地;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参与控制中长铁路。蒋介石在六月被告知有关《雅尔塔协议》的事情。并以一系列的协议及 1945

年 8 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形式认可了《雅尔塔协议》。协议本身一直到 1946 年 2 月才公开。参见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215—222 页。

[31] 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324—340 页。

[32] 暗杀案的动机和凶手仍然不详。中国共产党称此为“反动派勾结日伪残余的全国性阴谋”，《新华日报》，重庆，1946 年 2 月 27 日。包括左

[48] 杨人梗：《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5月10日，第5页。杨教授还在《论内战》一文中发表了自己对中共的看法，《观察》，1948年3月20日，以及《关于中共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11月1日。吴世昌教授在《论和平问题》一文中有几乎相同的见解。《观察》，1947年7月14日，第4、6页。

[49] 陈彦：《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追索》，《观察》，1947年8月9日，第15页。

[50] 周绶章：《论神话政治》，《观察》，1947年1月18日，第6页。

[51] 储安平，前引文，第6页（参见注1）。

[52]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第2卷，320—322页。

[5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选》，第2卷，329—384页。

[5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选》，第3卷，282—285页。

[55] 同上，304—305页。

[56]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选》第4卷，第184页。

[57] 有关学生逃离共产党的记叙可参见第五章《政治上的无能：难民》一节。要从数量上对逃离共产党地区和国统区的学生及知识分子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报道显示了好像离开共产党地区的人更多，报道时往往用“成千上万”来形容，而投奔共区的，据共产党报道只有成百上千。本文将引用这些报道中的一部分。至于其他有关学生进入解放区的消息来源，可参见第三章，特别是注46、62和63。由于国统区的难民大多集中在几个城市的中心，而解放区中的难民却极为分散，因此每一个数据都有可能误导读者。同样，如本书第五章所示，国民党城市中大量的难民身份的学生往往不是自愿的——尤其是在战争的后期。许多这样的学生都是乘坐指定的交通工具，被要求离开受到共产党威胁的地区的。

[58] 参见注11(b)。

[59] 吴世昌：《中国需要重建权威》，《观察》，1946年10月19日，第7页。

[60] 新华社电讯，延安，1946年1月29日。

[61] 新华社电讯,延安,1946年5月28日。

[62] 新华社电讯,延安,1946年8月9日。据说这一边区有134个教育机构,包括中学和职业中学,共有注册学生2万6千人。

[63] 参见七、八两章。

[64] 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载于《知识分子与教育问题》,第15—16页伊莎贝尔和大卫·柯鲁克《十里坪:一个中国乡村中的革命》一书的143—149页,可以看到任弼时所发警告的事例。一个乡村教师被吊起来,挂上一块写有“头号阶级斗争对象”的木牌,因为他出身富农,虽然他本人没有从事任何反对社会的活动。

[65] 参见夏征农《知识分子出身问题》,《安东日报》,1948年5月8日。重印于《新华日报》资料室编《论知识分子:学习丛书》,36页。知识分子被开除出机关的不少,工厂在雇用知识分子但任管理人员和职员时,要工会的介绍,也有不允许教师执教的事例。夏的文章是在安东举行的“五四”青年大会上的总结发言(1948年5月初),一年半后重印,使全国的知识分子都能看到。

[66] 中共东北局:《关于东北知识分子的决定》,1948年1月15日,载于晨报出版社编《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1—2页。

[67] 参见注65。

[68] “三查”指查阶级出身、查思想、查工作作风。有关此阶段干部与非干部教育的不同之处,参阅第九章中《胜利者与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一节。

[69] 中共华中局《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见华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问题的几个文献》,37—39页。有关这一文件及类似文件在新解放区的执行情况见第九章。

[70] 董秋水《论新民主主义及其争论》,《时代批评》1948年1月15日,第20页。

[71] 张东荪,前引书,第7页(参见第五章注119)。

[72] 施复亮《论〈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代批评》,1947年10月1日,第16页。

[73] 李孝友:《读〈关于中国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观察》，1948年1月3日，第7—9页。李为国立中央大学学生。

[74]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398页。

[75] 引用于《新闻天地》（亲国民党）刊物，上海，68号，1949年4月28日，（《中国新闻评论》，5月3日）。

[76] 巴金的一位朋友提出了这一论点，但无法取得这位小说家的赞同。虽然他的无政府主义哲学使他不亲近共产党，巴金在1949年还是留在了大陆。见奥尔加·朗：《巴金及其作品》，第217页。

[77] 参见罗伯特·雷德费尔德为费孝通《中国绅士：有关城乡关系文集》所作的序言，第2—3页。

第七章 重新土改

当然,在1945和1946年间,中共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争取自由知识阶层,因为这一目标只有和从农村回到城市这一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战略上第二个重要的改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自己于抗战期间在农村赢得的根据地。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中共放弃了自己在抗战中采取的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再次进行土地改革。

我们已知道,自由知识阶层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之一即它在农村的失败。他们指出,农村经济已经自身难保,更不用说负担中央政府及其在战场上军队的支出了。也许是出于知识阶层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他们着重抨击政府腐败和忽视农村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以及战争给业已陷于赤贫的农民所增加的负担。自由派人士普遍支持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但在解放战争期间,地主和佃户关系问题却并未得到他们相应的关注。

“农村问题”这一提法指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以及农民的贫困。自20年代以来,它一直只是学者和政客们进行调查和辩论的对象。他们所做的诊断和开出的处方可分成两类:一种强调整体上城市——农村关系以及局部中农村本身社会经济体制的剥

削本质；另一种则集中论述农业生产中比较技术化的几个方面。总的来说，左派坚持前一观点，右派执著于后一种意见，而自由派人士则居于两者中间，倾向于折中两种观点^[1]。

1946年10月，中国农业协会第八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这两种观点对峙激烈。中国农协是一个无党派民间组织，成员约4,000人，致力于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民主和国家现代化的程度。1946年的这次会议之所以受人瞩目，原因就在于参加会议的各政治党派的代表都对各自的土地政策作了解释。

来自社会部、上海市社会局、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几位代表阐述了政府的观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的发言，颇能说明愚民主义者何以把毫无意义的事物说成是最开明的国家政策的心理。这位先生慷慨陈词，声称中国的农村中并无冲突。他说，农村人和那些连隔壁邻居姓名都不知道的城市人不一样，他们友善可亲，连地主和雇农之间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还提出，城市知识阶层永远无法肯定自己对农村形势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确，只有教育农民，让他们得以自行判断自身的情形。国民党的主题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就能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谈到共产党时，这些发言人言词激烈，谴责他们一方面试图以暴力解决农村问题，一方面又利用这一问题来谋取一己政治私利^[2]。

这些发言与其说阐述了国民党的官方政策，倒不如说表明了对推行这些政策的普遍看法。国共分裂前的1926年，减租已成为国民党党纲中的一个重要政策。共产党把这一减租25%的方案作为自己抗战期间政策的范本。国民党原先规定主要作物的最高租额是收获的50%，在此基础上减租25%后，最多可征收收成的37.5%，其他次要作物则不受此限制。虽然这些条款已于1930年写进国家《土地法》，但却从未得到广泛的执行。

1937年,为了进一步减租,以逐步达到孙中山提倡的“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修订了《土地法》。1937年修订后的土地法规定,田租不得超过土地价值的8%。但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来保证贯彻这一政策,日本人的入侵就成为其最直接的借口。二战结束后,政协会议于1946年1月通过了国家重建计划,其中就有关于减租减息和耕者有其田的内容。同样的内容也写进了政府1946年的《土地法》及同年通过的宪法。

为了提高中国农业水平,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建议应改革租佃制度。^[3]但政府却不顾美方的敦促,使这一租佃改革始终只局限在试验性阶段,直到他们退到台湾后才予以变革,但为时已晚。

与国民党人相反,这次农协会议上共产党的代表华岗提出农业改革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而生产关系的改革是农业改革的基础,要想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耕作技术,首先就得改变“封建的生产体系”。这一体系使得拥有土地的少数人不从事生产却能控制种田人的生计。地主、放债人、商人、官员以高租高息控制物价以及不公平的赋税负担剥夺了农民的盈余,使他们生活贫困,生产技术落后。

华进一步列举了共产党在广大的边区为推行农业改革已经和正在采取的一系列实际步骤。抗战期间,共产党人为了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抵抗侵略者,放弃了土改。但即使在战争期间,共产党仍执行了二五减租政策,征收单一累进税,提供低息农业贷款,鼓励富农发展生产,通过开荒增加产量,增加棉花种植面积,通过组织变工队协调劳力的使用,推进农村地区的文教活动。

华继续说明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放弃减租政策,开始推行更为先进的一举废除租佃制、分田到户的路线。其方法有以下几种:没收被清政府、日本人和汉奸等侵占的土地,一切被巧取豪夺的土地,“黑田”即为逃税而未登记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分给农

民；要求地主向饱受种种封建剥削之苦的农民进行赔偿；那些抵押后因无法赎回而失去的土地须物归原主。此外，部分地主自愿将土地分给自己的佃户；而延安当局则正在酝酿一个赔偿地主损失的政府计划。^[4]

毫无疑问，共产党真的在实施如他们的代表所说的土地改革，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地主家庭云集华北和东北的国统区城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些发言再清楚不过地归纳了两大政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差异。的确，国民党代表们是谨慎的言论就是谴责共产党人利用

对任何风暴时都岿然不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农民曾三次要求耕者有其田，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第四次提出了这一要求。中共中央同意了他们的合理要求，同时又保证地主过上体面的生活。正是有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才加强了人民解放军……。如果共产党不同意农民的这一要求，而蒋又从美国得到了外援，中国人民要求独立、和平和民主的运动就很可能像二七年大革命那样再次失败。^[5]

2. 1948年春，共产党已在战争中占了上风，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向南挺进到租佃制比华北更为盛行的地区。如果土改真的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重要，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于此时突然在新解放区停止土改呢？

3. 最后，毛本人曾说过教会中国人革命，推动他们起来斗争的是日本的侵略。^[6]但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抗战期间却是最温和的。他的这番话与只有土改才能保证群众支持反蒋斗争的主张之间如果有联系的话，这是什么样的联系呢？特别是，如果租佃制不是华北的主要问题，那么抗战期间减租政策在动员农民这件事中又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

笔者将试图在本章中解答这三个问题，以更为确切地确定中共对中国农民阶层究竟有何吸引力。

中共胜利的社会经济根源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土地占有的一般形式是广为人知的。租佃的比例在华北很低，但在东北和南方却很高，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我们很难得到精确的统计数字，现存的多数统计资料只能作为近似的统计数字看待。况且我们还得这样假设——这些数

据可能还反映了编纂者在政治上的偏见。尽管这些数据不无缺陷,人们还是基本同意了其中有关租佃的数据资料。人们广泛引用的数据源于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农业调查局出版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表明 30 年代约有 30% 的中国农民家庭是租种别人土地的佃农,另有 24% 的家庭拥有一部分自己耕种的土地,46% 的家庭至少拥有足以养家的土地。因此,70% 的中国农民拥有一些土地,但超过 50% 的农民须全部或部分租种别人的土地。〔7〕

华北的土地使用状况

上述全国范围的统计数据掩盖了地区间极大的差异。比如说,西南的四川省约有 56% 的农户为佃农家庭,但北方河北和山东的佃农比例为全国最低,平均只有 12%。共产党在 1937 到 1948 年间在华北和华东进行了减租和土改,这些省份在 1931 至 1936 年 6 年间土地占有的一般状况可见表 1。〔8〕

表一 1931—1937 年间的土地占有状况
(农民家庭总数的百分比)

省份	佃农	地主	半佃农半地主
察哈尔	35	38	27
绥远	26	56	18
宁夏	27	63	11
甘肃	22	59	19
陕西	23	55	22
山西	17	62	21
河北	12	68	20
山东	12	71	17
河南	22	57	22
江苏	33	41	26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土地委员会出版的统计资料则显示,河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省份中地主的百分比还要略高一些。那些把自己全部或大部分土地出租的地主约占农村人口的3%,而约70%(这两省的多数)的农民属于自耕农。这些数据表明,另有10%的农民只拥有一部分自己耕种的土地,约5%的农民是完全的佃农,河北有4%的农民为雇农,山东则有2%的雇农。〔9〕

由政府的农业实验所、日本人、约翰·罗新·布克〔10〕以及西德尼·甘博〔11〕等出版的种种统计资料与以上两种资料都大致相同。共产党编辑的资料与此大同小异,但他们所用的分类标准和定义与其他调查者不太一样,因而给比较带来了困难。但我们仍可引用一些农村调查报告。

在共产党控制的山东和河北地区,地方干部进行了农村调查,但当时的条件使精确的数据最多也只能反映出个模棱两可的结论。他们调查了一些经过挑选的村庄,为了把公布土地占有关系作为开展土改运动的一项准备工作,又向党员和干部传达了调查的结果。但所有的地方调查都表明,在调查过的村庄中,半佃农或佃农都只占了一小部分,两者相加也只是所有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在我们引用这些结果之前,我们必须解释共产党划分阶级的标准。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文件表明,地方干部在划分阶级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们只能这样做,并且因此被弄得晕头转向。因而,我们只能简单地假设存在着允许犯错的余地。尽管基本分类及分类标准几经修改,在时间和地域上也存在着差异,但从1933年来基本未变。人们为了纠正错误或把错误减到最小,不断对其进行解释,加以阐明,这就更增强了它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假定下文就是一个大致反映了农村社会经济状

况的分类法：

1. 地主家庭指的是家庭成员不从事或基本不从事劳动，把剥削他人作为自己主要收入的来源。它依靠剥削别人劳动为生，收取地租是它的基本手段，虽然它也可能投资工商业、从事放债业。

2. 富农家庭的成员的确从事劳动，但一般来说这种家庭很大一部分，有时是主要的固定收入来自剥削。富农可能会出租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或投资工商业，进行放债，但主要的剥削方式是雇用长工。富农也可能租种他人土地，甚至可能全部耕地都租自他人，但这种富农很少。

3. 中农家庭可能拥有自己的耕地，也可能没有。但总的来说它既不剥削别人，也不被别人剥削。这种家庭的生活完全或至少基本上依靠自己家庭成员的劳动，他们可能同时拥有土地和必要的农具。

4. 贫农家庭没有土地，即使有，也只有一小块；没有农具，即使有，也只有一点点。总的来说，贫农家庭受人剥削，因为贫农只能租种土地，向别人借钱，或去当雇农，以此谋生（注意，贫农这一分类虽不一定但基本上与非共产党调查者所用的佃农概念相同）。

5. 雇工，包括雇农，完全或至少基本上依靠向别人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

在上文所有的类型中，“劳动”一词并非只指生产性的农业活动，它还包括主要的副业和手艺活，例如砍柴、运输、纺织、行医等活动。它不包括非主要或附带的劳动，如除草、照看牲畜、帮助种菜等。从事手工劳动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严格来讲并非农户，划分起来是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这样的家庭是划分为富农、中农，还是贫农，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候也把他们

单独划入一个不同的类型。按照正式的分类,那些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以及可能还有一小笔资本的人,会被划为贫民。这些人主要包括小生产者、小贩和不雇帮工的小店主。〔12〕

地方上传达了很多命令和指示,详尽阐述了上述总的标准,帮助所有调查干部确定何为家庭劳动,区分大、中、小和恶霸地主,把中农进一步分成上、中、下三等,搞清并不是所有从事手工生产的家庭都可划为贫农。〔13〕我们无法知道地方干部搜集这些数据时是如何运用这些具体标准的,但以上粗略提及的总的分类是山东五个村各自进行调查的基础。调查结果附于黎玉 1945 年 9 月在省群众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黎玉为 1945 年 8 月 13 日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主持的山东省政府的主席。〔14〕

最详尽的一次调查,也是唯一一次把农户与非农户区分开来的调查,显示了位于现今莒南县大店附近的 12 个村庄在 1937 年时的租佃率。调查发现有 473 户(总数 2491 户的 19%)向别人租地。一共有 931 户被划为贫农,占被调查村庄中农户的 37%,佃农通常归入此类。由于这些家庭中只有 232 户租种土地,因而贫农中最多只有 1/4,或者说这些村中所有农户的 9%是百分之百的佃农。也许还有别的佃农家庭,但即使有也属于富农或中农。〔15〕

另一组 12 个村庄(B 组村庄,表二)也和第一组一样位于滨海。总共 2,265 户拥 30,028 亩地,其中的 251 户向 540 户佃农出租了 3,000 亩地。半数以上的家庭被划为贫农,但其中只有 326 户贫农向别人租地。这个被调查的村庄中的纯佃农的比例约占 14%。〔16〕

滨海的第三组 12 个小村庄(C 组村庄,表二)位于现在的临沭县。调查中发现 1,909 户共有 38,461 亩地,其中 197 户向 627 户佃农出租大约 5,300 亩地。佃农家庭中有 446 户被划为

贫农,占贫农总数的一半,使这些村的租佃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比例,即23%。^[17]

尽管这些结论不无偏颇,也不乏错误之处,它们仍说明了租佃制只影响到一小部分农民,它增强了山东的一般状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即租佃制本身对农村大众而言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地方调查也确实说明了贫农家庭在所调查的村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贫富之间十分不平等。

“贫 农”

实际上,贫农这一分类标准使现实中的租佃关系变得难以捉摸。作为一种农村的分类法,贫农这一概念显然起源于俄国农村。但在俄国,租佃制本身并无法反映农民的生活状况,这是由于租佃是一种更为富裕而非贫困的条件。^[18]而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但如果租佃状况真的是像几个调查所显示的那种中农和贫农的区分,又如果它只影响了一小部分农民,那么租佃在中国也不是不可或缺地或至少是不能充分地反映农民生活条件的事物。因而苏俄和中共都选用了“贫农”这一实用的分类。它集中地强调了财富分配不均这一现象,刻划了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和众多问题的真实状况。在实践中,它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人把农村人口中的哪一部分视作自己的力量基础。

例如,在山东和河北,至少有50%的农户拥有10到50亩地,另外40%的农民每户拥有的土地还不到10亩。^[19]在这个地区,一个五口之家所必需的土地数因村而异,但在大部分地区,这个数字都在10亩以上^[20]。因此,如果河北和山东有40%的农户拥有10亩或不到10亩的地,那么至少这些家庭拥有的土地不足以养家糊口,需通过其它方式来增加收入。为了保证收支相抵,他们只好经常借债。全国土地委员会的数据表明在河北有40%,在山东有25%的家庭每年入不敷出。这个委员会的数

据还显示了 1936 年在河北有 43%，在山东有 28% 的农户债务缠身。[21]

表二 山东的土地占有状况

分类	家庭	拥有土地数(亩)	户均有地(亩)	出租户	出租总数	租地户	租地数
A 组村庄 1937 年							
地主	169	34,404	204	162	32,238		
富农	173	6,084	35	18	329	44	3,425
中农	717	11,158	16	24	312	167	5,564
贫农	931	5,555	6	25	164	232	2,162
雇农	157	176	1	1	4	16	112
手工艺人	124	333	3	2	28	8	40
自由职业	9	51	6	1	13		
游民	48	85	2	5	34	1	3
外出户		153		13	147		
总计	2,491	58,387		261	33,332	473	11,333
B 组村庄							
地主	67	3,838	57	50	1,595	3	23
富农	178	6,671	37	56	527	6	85
中农	708	11,756	17	77	534	197	892
贫农	1,245	7,424	6	65	335	326	1,709
其他	67	339	5	3	50	8	21
总计	2,265	30,028		251	3,041	540	2,730
C 组村庄							
分类	家庭	拥有土地数(亩)	户均有地(亩)	出租户	出租总数(亩)	租地户	租地数

C组村庄 1937年

地主	66	6,677	101	58	4,015	1	16
富农	108	4,708	44	40	428	7	121
中农	775	17,267	22	72	729	146	1,103
贫农	898	9,548	11	24	158	446	3,662
雇农	57	248	4	2	11	25	155
其他	5	13	3	1	1	2	12
总计	1,909	38,461		197	5,342	627	5,069

数据来源：参见[15]。

如果这些来自非共产党方面的数据和估算(有关农户占有土地多少、养家必需地数目及债务状况)比较精确,那么就说明这两个省份中相当一部分的农户没有足够的土地,如果不借债、租地、当雇工或进行副业生产,他们就无法糊口。而共产党人的分类表上,“贫农”大致也是这个比例。根据上文提到的三个农村调查中的第一次调查,有37%的农户属于贫农,如把雇农家庭也计算在内,这一比例就上升到43.6%。而在另两次调查中,贫农家庭的比例分别为54.9%和47%(其中一半为雇农)。

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9县的25个村庄进行的另一次调查得到了可作对比的数据。这次调查虽然在1941年进行,但由于社会经济状况在过渡期中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当1944年1月彭真作党务报告时仍采用了这次调查的结论。^[22]这次覆盖4177户家庭(18,401人)的调查情况可见表3。^[23]

表三 晋察冀北岳区土地牲畜所有情况

	人口百分比	土地百分比	人均拥有土地	牲畜百分比
地主	3.11	9.00	7.62	2.80
富农	7.42	17.48	6.22	15.60

中农	50.12	50.94	2.68	58.00
贫农	35.32	20.58	1.54	22.00
雇农	1.65	0.99	1.40	0.46
雇工	1.04	0.31	0.78	0.45
其他	1.26	0.79	?	0.33

彭真在报告中承认,这些数据并不说明地主—富农阶层具有压倒优势,但他指出了经济力量分配不均的其他迹象。比如说,地主和富农拥有最肥沃的土地和最好的牲畜。更为重要的是,只有他们才有多余的粮食和现金,这就使他们得以控制粮食市场和农村经济。他还特别提到在冀中7个县进行的另一次调查,发现总人口的46.8%为贫农,38.6%为中农,6.3%为富农。

我们还应谈到另外两个村庄的情况。在晋东南的路城县,韩丁在调查中发现,解放之前的比例为贫农46.8%,雇农6%,中农40%。这个约250户的村中只有一户为纯佃农。^[24]河南北部汲县原渠(音)村共有979户,其中600户在土改前是中农或新中农,300户划为贫农。这个村庄于1946年开始土改时已解放好几年了,至少经历了两次减租运动及别的斗争,新中农就是这些运动的产物。^[25]

东 北

1945年后,共产党人在东北开展了土改运动,但这一地区的统计资料较之中国其它地区更难得到。1927年曾进行过一次起因现已不甚明了的统计,把总数为2,549,699户的农民划分为以下几类:28.6%为佃农,27.6%为半佃农,43.9%为土地拥有者或自耕农。^[26]1931年9月后,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他们估计30%的中国农民为佃农,20%为拥有自己土地的半佃农。至于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日本方面的材料表明:“满洲大多数佃农只能靠租种地主的小块土地勉强糊口”,而那些拥有自己土地的

半佃农的状况与此相比也无多少差别。〔27〕

有关租佃情况的计算并不包括移民和雇农,而这些人在满洲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据说远较华北为高。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政府曾挑选了30个村庄进行调查,发现1936年时雇农平均约为20%,再加上前文提及的佃农百分比,便与“满洲国”另一次调查所得无地农户约为48%的数据大致相符。〔28〕尽管这些数据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仍能从中得出一个稳妥的结论,即贫农占东北农村人口的一半。

意 义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吸引的并不局限于佃农本身,而是一个更大的贫农和雇农的群体,从定义上来看,这两者一起构成了农村人口中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不靠租田、出卖劳力、借贷付息等受人盘剥的痛苦方式就无以维生的一个阶层。实际上,在所调查的村庄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公认最低的。正是这些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中的群众基础。单单消灭租佃制并不能使中国共产党得到华北群众的拥护,因为租佃不是村中多数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里的多数农民已经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

这些数据进一步表明,贫雇农虽然可能占了满洲农村的多数,但是华北却并非如此。无论在华北的哪一个地区,贫雇农的总数都远远不及中农,或和中农相同。如果说满洲是中共所说的一个土改典型例子,那么华北却不是。另外,据保守的估计,满洲有1670万公顷未开垦可耕地,约合4130万英亩,其中还包括了日本定居者废弃的土地。〔29〕华北并没有这笔未开垦的财富。因此,我们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解释共产党对华北农民号召力的实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共产党人的主张正是在这一点上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这一主张强调中共的土改政策与此政策在

内战期间动员起来的农民拥护之间的关系。

笔者将作进一步论述的观点是，共产党最主要的土改口号（“耕者有其田”）所揭示出的情况与它所掩盖的一样多。因为人们一般认为这一口号主要指的是消灭租佃现象。租佃制确实消灭了，但它只是华北农村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中共在论及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抨击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更为基本的事实，即贫富不均。这一点集中表现在1947年10月的《土地法大纲》中。它规定不仅要消灭租佃制，还要平均分配农村的土地和财产。

内战期间的土改，就其最基本的层面而言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简单平等。毛写道：“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30]

但是土改的政治意义已超越了它在经济上对穷人的正面吸引力。同样重要的是它的否定意义。土改不仅摧毁了地主和富农阶层的经济特权，还破坏了支持地富并为他们所拥护的政权组织。共产党因此得以用一个对其忠心不二的政权组织取而代之，并在贫农的积极拥护下保持这一组织的地位。

因而，在共产党人的实践中，“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的含义，远比也提倡此口号的自由知识阶层心目中的概念广泛得多。无疑，共产党人沿用这一口号正是由于它既有广泛的号召力，又有许多种含义。无论如何，共产党都能说他们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三条“民生”原则的范围内行动，虽然他们的做法与孙生前所料略有不同。孙中山把自己的土地政策总称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31]不管孙本人想以此表达自己的何种意愿，“平均地权”却为中共的土地政策提供了一句虽然不太受欢迎，但却更为准确的口号。

土改：抗日战争的教训

第一个显示中共已从减租减息转向新的土地政策的官方文件，是中共中央 1946 年 5 月 4 日发表的《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虽然作为党的新土地政策之源这一文件被广泛引用，但它只是作为党内文件发行。其内容既不过激也非特别系统，但它宣布要把消灭现存的土地租佃形式、实行分田到户作为奋斗目标。在贯彻这份文件的地区所开展的土改运动中使用了许多手段，其中一些特别过激。

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后，这一看似试验的阶段告一段落。《土地法大纲》制定了一个系统性很强的、以消灭地主阶级和平均地权为目的的土改计划。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土地法制定了一整套没收和再分配的原则和步骤。

1948 年 5 月 25 日，党中央指示，只有在具备以下条件的地区才能进行土改：在军事上得到保障；大多数农民要求分地；干部在数量上确能完成任务，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1947 年夏以后解放的地区，即“新解放区”，并未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因此在这些地区暂时停止实行土改，执行更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

1946 年重新开始土改并不令人奇怪。早在 1940 年，毛就提到了这一政策，说它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毛是这样写的：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32〕

不过，这一转折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因为毛那篇广为人知的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的报告仅发表了一年。一年前，毛表明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仍将执行减租政策：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33]

10月，周恩来在重庆公开重申了这一立场，他说减租减息仍将是共产党土地政策的主要目标，“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化则将留待将来解决。[34]

许多观察家认为，对这一突然转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内战本身。1945年10月时，中共和国民政府正在举行谈判，而到了1946年5月时，战争已迫在眉睫。同年夏天，政府向共产党地区发起大举进攻。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明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

但是，一些敏感的观察家指出，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1946年5月前的一段时间里已开始“向左”转了。早在1945年11月初，一份由毛起草的党内指示就已反映出中共不愿向外部世界承认的好战情绪：

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国人民是有利的。目前我党的方针，仍是

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35〕

其实在共产党区域土地早已被没收,虽然只是被称为“清算”,减租已成为这一过程中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的代称。《五四指示》只不过证实并正式宣布了一个甚至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已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政策。在这方面,新指示既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又表明了几年来在减租的背后发生的一切。

《五四指示》〔36〕

指示开篇就提到一场群众运动正在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华中的共产党地区兴起。为了反奸、减租、清算老债,共产党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一些地方在平均地权方面走得很远,给每人分了三亩地。由于包括党员在内的一部分人开始怀疑这场群众运动,领导层决定重申政策路线。只要条件允许,年底前各个地方党委都应按照指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指示说,地方党委必须理解,这一历史性的任务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有关如何领导这场运动的指示大致如下:

1. 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没收地主土地,分到农民手中。
2. 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务必使其获得利益,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退还或赔偿。
3. 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如在清算、土改过程中无法避免,也不要打击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如对前者打击太重,将会使中农产生动摇,严重影响生产。
4. 区别对待已建立我方政权的中心区和我方尚未完全占领的边沿区。在边沿区开展减租运动。总的来说,为把混乱和损失减到最小,不要发动群众要求土地。
5. 以上原则必须执行,否则农民之间将发生分裂,贫雇农将和我党一起陷于孤立,反动势力将得以加强。为了避免这种情

况,地方党委必须传达这一指示,并在派出干部前往各区开展土改工作之前结合各地情况予以说明。向党外人士说明这一指示虽然影响了地主富农的利益,但却代表了90%的农村人口(雇农、贫农、中农、手工业者及其他穷人)的要求,并解释这些要求与孙中山、政治协商会议所提倡的是一致的。

6. 对于大地主、豪绅恶霸与中小地主也要有所区别。要适当照顾后者,通过仲裁、调解的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间的纠纷。

7. 集中处理汉奸恶霸,彻底孤立他们。没收他们的土地,只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的土地。

8. 除了罪大恶极的汉奸,不要侵犯富农和地主经营的工商业,以免阻碍工商业的发展。我们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处理,在原则上不同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处理。某些地方把清算封建地主的方法用到城市中,清算工商业,此类活动应予制止。

9. 如果人民拥护,可开庭审判处决罪大恶极的汉奸和公敌,但除了这类人,不要再乱抓乱打乱杀。否则群众会感到恐慌,并给反动派以进攻的借口。

10. 对一切可以教育的知识分子、赞成我们民主纲领的开明士绅、城市资本家、党外人士及现在又愿意回来的逃亡地主等,采取争取的做法。

11. 部分地主回乡只是为了扰乱解放区,那就让他们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这样将减少那些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中的敌视者的力量。

12. 解决土地问题,有以下许多方式:

- a. 立即没收和分配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汉奸的土地。
- b. 减租后自愿出售土地,佃农有优先购买权。
- c. 地主自愿把地给佃农。
- d. 出卖土地以清算地主征收的(过高)租息、霸占的财

产(无法赎回的抵押品)、未缴纳的税款及“其他无理的剥削”。

这些方式合法合理,与 30 年代采用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不同的地区可针对各自的斗争对象分别采用。

13. 斗争得来的财产须公平合理地分给贫苦的烈属、抗日战士和干部以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问题解决后,应集中精

应当愿意作出牺牲。

刘提了十点建议。除了减租减息外,还包括:1)没收汉奸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2)逃亡地主的土地应免租分给农民耕种;3)地方上的公地应分配给农民;4)保证佃农拥有其耕种土地的永久租赁权;5)惩罚土豪劣绅,由农民直接选举村级政权、组织武装自卫队;6)禁止高利贷。〔37〕

正如下文所示,这六条建议中的多数在1945年前即以各种方式得到了贯彻执行,但一条也未写进抗战期间最广为宣传的土地政策——1942年1月28日由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38〕1941—1942年间,日本人向共产党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共产党人损失惨重。与刘的提议相比,“决定”的调子十分缓和,这大概是那几年困难的反映以及领导人因而产生的把阶级磨擦缩到最小的渴望。这份决议甚至没有承认要把土地逐步从地主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的合理性。为了避免失去民心,1937年后的借贷利率可根据当地局势自由规定。也没有提到要惩罚那些剥削农民的恶霸。

该“决定”的调子虽然温和,但它强调的仍是不要忽略右倾错误而非左倾过火行为。它指出自1937年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以来,“许多根据地”并没有“广泛、自觉或彻底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在一些根据地,这项政策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地方政府颁布了法令,但并不执行,因此,减租减息只是在名义上得到了执行。而左倾错误“只在一些地方发生”。

但两年后,毛就提到在1941—1942年间党内已发生了“一种极‘左’偏向”。他说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随着日本人加紧进攻根据地,国共统一战线逐渐破裂了,因而“过分打击了地主”。〔39〕

晋察冀边区〔40〕

“过火”行为的确发生了,但可能不仅仅是出于毛所指出的

原因。这种行为也并非 1941 年才出现,虽然党可能此时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在 1941 年 2 月,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共产党官员刘澜涛,为了提高统一战线的士气,告诫地方干部现阶段尚不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他提了不少建议,包括要尊重地主的所有权;暂时停止把在过去 30 年中由于不履行抵借合同而失去的土地归还给原主人的行动;不没收逃亡地主的土地。在谈到对寺庙和墓地的处理时,他警告说某些地方开展的控诉寺庙运动是错误的,强制平坟、砍伐墓地周围树木的行为已引起了许多不满。〔41〕

用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标准来衡量,以上行为均属过火行为。1941 年 2 月以前,此地区显然已发生过这类行为。刘同志还特别提到在一些试行减租的地区,地主采用种种计谋逃避减租。他宣布在那些地主恶毒报复佃农、制造混乱的地区,农民应予以回击,“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

1944 年彭真在边区就党务工作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点明了这些明显的差异。他和别人一样,说抗战既是一场民族战争又是一场农民战争。党只有在政治上、文化上,尤其是在物质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他们才可能有精诚的愿望参加到抗战中来。但地主敌视农民生活条件的任何改善,所以一试行改革就会引起激烈的斗争。这一矛盾十分关键,因为战争需要地主和农民的合作。

下文是彭真概括的边区地主农民关系史。党刚开始执行双减政策时,地主反对。此时,干部左倾,而“基本群众”却往往右倾。到了第二个阶段,即 1937 年 7 月日本侵略华北后的两年内,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也迅猛发展。农民们高声站了起来,满怀怒火批斗恶霸地主。一些地方的农民不愿交租或交息。他们取消了债务,剥夺地主土地不予赔偿,停止了土地买

卖。

农村的斗争加强了,地主的反抗也出现了新形式。他们开始把女儿嫁给佃农和贫农,千方百计同化他们。而同时,地主又开始勾结日军一起对付农民,袭击农民、逮捕村干部。

彭认为,这场斗争是地主与农民关系发展中一个必经阶段。一旦“过火”行为得到纠正,把改革推向深入大概就有助于使地主默认他们曾反对过的政策。卢沟桥事变三周年之际,延安的党中央发出指示开始纠偏,一个月后边区发布一项指示。这些1940年的指示实际上概括了1942年1月党总结统一战线土地政策时所重申的原则,即规定地主和债主应减租减息,佃农和债务人则必须交租还债,并且保证每个人有包括制定和解除合同在内的公民权利。^[42]

彭所描述的这一政策其实早已在边区广泛贯彻执行。1943年10月,“彻底”执行减租政策的只有北岳区中心地带的几个县和位于冀中的第七、九分区的大部及第六、八分区的小部。而在北岳的其他地区及冀中,只是“基本上”实行了减租。在北平以北的平北地区,政策还停留在执行的第一阶段。而在北岳区和冀东根据地的一千多个村庄,前一年连这一阶段尚未达到。最后,另外一些地区也执行了这一政策,但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因战局的转折而付诸东流。

但是,晋察冀地区衡量是否“彻底”贯彻执行的标准要比党正式公布的减租政策包含更多的内容。“彻底”贯彻就是指减租25%,消灭一切过份的经济剥削,彻底动员群众,巩固胜利果实,由“基本群众”夺取政权并成立民兵。“基本”贯彻是指减租25%,打击经济剥削,但都不彻底。在部分村庄及许多家庭中,减租只是个名义,佃户偷偷按老的利率向地主缴租。农民尚未被彻底动员起来,胜利果实很容易丢失。

所有这一切都写进了1943年10月中旬的一份边区指示^[43]。在这之前，党中央于10月1日发出了一份概述抗战“十大纲领”的指示，减租减息只是其中的一条政策。但这一指示特地号召要在秋收后彻底执行减租减息政策。^[44]

边区政府重申了党中央的这一政策，号召立即、彻底、广泛地实行减租。此外，边区的指示还举出了在新开辟或重新收复的地区实行或重新推行减租的三个前提条件，即1)推翻亲日旧政权，改革村级政治组织；2)抗日武装力量有能力保卫周边地区；3)初步建设或重建村党组织、农民协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指示命令凡已满足上述条件的地区开展减租运动，其他地区则应创造条件，而在游击区，一切工作都从属于敌我斗争，服务于维持统一战线。

10月份的这些指示发表后，减租运动得到了发展，这是彭真开始对“左”倾关注的直接原因。彭真在1944年11月的一个报告中指出，一个地区在得到基本巩固，农民已发动到敢于坚决反抗地主的程度之后，“左”倾现象往往就会抬头。过火行为很危险，它将威胁到根据地的长期生存。彭列举了干部中鼓励农民“左”倾过火行为的六种倾向：

1. 干部们十分怀疑地主也能反对日本人。
2. 一部分干部拒绝区别不同类型的地主。每当反共高潮到来，部分地主产生动摇，这些干部就会认为被整个地主阶层出卖了，因此提倡消灭地主阶级。
3. 许多干部感到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温和条文是错误的，因此继续侵犯受政策保护的地主的权益。他们允许农民不遵守租佃和抵押合同上的规定，农民有时就根本不缴税缴息，取消旧债，并在抵押合同不能完成之时依然取回土地。每当发生争执，例如有关永久租佃权、交租付息的利率——最初固定在战前水

平,但此时可以贬值的边币进行清偿等问题时,干部总是站在农民一边。

4. 一些地方党组织就是拒绝接受统一阵线土地政策,继续执行以前没收地主财产,把地分给农民的政策。

5. 存在着对地主和富农不加区别一样对待的趋势,执行政策时,既削弱了地主,也削弱了富农。

6. 还存在着忽视生产,只顾分配,即只改善农民生活,改变地主——佃农关系的倾向。

以上有关晋察冀发展的概述,说明了无论在“彻底”还是“过火”开展土改运动的阶段,这场运动的几个基本环节是和相对温和的减租政策相联系的。但这一联系只在积极实行减租的地区出现,就整个根据地而言,在执行减租政策的多数阶段,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执行不力这一右倾错误,彭真对“左”倾的反对并没纠正这一偏向。这样,我们的概述就开始显示出中共从抗战中所得教训的本质。这一论点的脉络在其他根据地的数据中显得更为清晰。

晋冀鲁豫边区^[45]

在这个边区中,党的文件同样指出,除了减租减息还要“消灭剥削”。党的组织还进一步指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另外几类剥削,并在那些农民因地租和高利贷难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地区,鼓励向这些剥削行为作斗争。为此,边区当局指出了在把中央政策与本地情况相结合,以便更广泛动员群众支持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该地区也未能立即、迅速地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运动的开展更因1942—1944年间的旱灾和随之而来的席卷河南大部及周边地区的饥荒而变得错综复杂。^[46]边区当局努力将赈灾与基本的土改计划结合起来。1943年6月,冀鲁豫分区党委就

消减利率颁布了指示。灾荒使许多农民被迫借贷，而利率也因灾情而上涨了。这项指示规定，秋收后偿付前一年冬或同年春所借款项时，利息不得超过借款的30%，而在临近敌人的地区，这一限制可放宽到50%。这一指示如得到切实执行，那么就能为农民省下一笔可观的开支，因为据说这一阶段同样的贷款利率超过100%。^[47]

与此同时，在京汉铁路贯穿其中的太行分区，开展了一场减灾春耕运动，并采取各种措施，控制粮食的市场价。在武安县的一个村中，赈灾措施包括搜寻和夺取地主、富农囤积的粮食，并免费发放给穷人。^[48]

这一地区同时开始了清算剥削老账的尝试。但除了最初这些毫不掩饰的针对财富而发起的斗争外，其他所有方面取得的成绩都有限。一位名叫罗青(音译)的共产党干部，描述了武安县西南的涉县开展这些工作的经过。他具体谈了原渠村(音译)。罗同志承认，1942年前党在那一地区的工作极其落后，群众并没有被动员起来，没有绅土地主的赞成就什么事也干不成。1942年，人们以“清算老账运动”为起点展开巨大的群众运动，1943年进行了赈灾反奸运动，1944和1945年又开展了两次深入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运动，但仍未能“顺利、深入或广泛地发动群众”。^[49]

发动群众斗争 正如罗同志所说的那样，1943年10月1日党中央发表指示后，边区通过减租减息加强了发动群众，重申“抗战十大政策”只是党为巩固自身力量、反对日军治安战所努力的一部分。1941—1942年间，日军推行焦土战术，并采用臭名昭著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使得共产党人加快了自己的工作。^[50]敌人的治安战使共产党征收赋税的对象减少了一半，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约30万人。^[51]但由于党的整

风运动(1942—1944)加强了党的内部组织^[52],十大政策也日臻成熟,到1943年日本的进攻开始衰退时,党已能有效地推行这些政策。

冀鲁豫分区党委在其11月发表的一份指示上说,要警惕盲目认为党已改善了农民生活的倾向,这会欺骗“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根据党的《十一指示》,它命令地方党委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评估农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在前日占区和尚未完全解放地区。这一结果将用来回答以下问题:有没有彻底执行减租减息?有没有增加雇农工资?有没有展开反腐败反黑地斗争?由此取得的斗争果实有没有分给最穷的人?党的累进税制有没有得到推行?^[53]

第二年春调查结束,随后,该分区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党中央《十一指示》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为了与这一时代精神保持一致,还重新发行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区领导黄敬的报告标志着这场运动的开端。他在报告中问道:“群众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冷淡?”甚至从边区最可靠地区的报告来看,农民一般都很犹豫、被动,干部被孤立,生产上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

黄敬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干部害怕伤害地主,害怕农民会走得太远。党委只是制订了减租政策,然后就开始抓生产,没有去发动农民与地主作斗争。在农民的生活条件尚未得到直接好转以前,生产不应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这一好转应依靠削弱垄断乡村经济剩余产品的地主来实现,否则他们就会顽抗到底,不断地把党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夺回去。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在改善农民生活的斗争过程中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我们必须动员农民,不顾地主反对站稳立场。黄提出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态度,决不能害怕群众犯错误,也决不能限制群众的行动。^[54]

在这场旨在削弱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化运动中，减租减息并不是唯一的目标。例如，在第十二分区，人们就发现反黑地、反腐败和反恶霸的斗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55]

“恶霸”这个词看起来很难定义。根据以往的经验，恶霸指的是在地方上颇有势力。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欺压别人的人。其势力的直接来源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因为在中国乡村中这两点是可以区分的。因而他可能是个纯粹的地主，也可能是某个秘密团体的成员，或政治官员，但与地主或其他有钱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着种种关系，人们没有办法用法律或社会习俗来反对他。他有可能搞到武器（虽然并不都是这样）来实行自己的阴谋。不同地方对恶霸的罪恶行径有不同的理解，但主要是指谋杀、人身攻击、强奸、勒索或非法掠夺财产。各个阶层都可能成为他的受害者，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谴责他的行为。

实际上，发动对恶霸，特别是恶霸地主的斗争，是为了激发农民对整个地主阶级的仇恨，而在没有地主的村庄中，干部把反恶霸的运动作为动员农民支持的起点。因而冀鲁豫区对第十二分区发出警告，批评他们在所有的地区都通过动员农民拥护减租来机械地开展群众工作；建议十二分区的干部们去调查本地的状况，从农民们最迫切的要求着手。

但当群众工作随着反腐败、反黑地、反恶霸斗争兴起后，领导权往往很快被中农垄断。因此，党警告干部，不要忽视贫雇农在此阶段的经济利益，而应努力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他们中培养领导骨干。然后，“民主斗争”一结束，干部们就应转向“民生斗争”，即减租减息，增加收入。只有通过实行这些方法，才能充分动员和有效组织“基本群众”，建立他们在村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他们的优势力量。

另外,所有的地方都采用了清算的方法。清算斗争或清算以往剥削的斗争成了共产党在1943年后以及以后整个土改阶段土地政策的重要工具。这一方法就是,计算地主通过侵占抵押地、占有无偿劳动、对减租运动的蓄意破坏等,欠了农民多少债务。根据农民的控诉,用现金、粮食或其他财产来计算和确定以往受剥削的数目。当被控者无法偿还累积起来的债务时(经常发生这种现象),他就只能变卖一部分土地来平衡账目,收入交给受剥削的一方。分配这种被称为斗争果实的财产的方法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平均主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滥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此法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仍在执行的情况下,因为它使共产党得以避开了彻底没收土地这一责任。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通过迫使农民公开说出自己的要求,把他们直接卷进了这场斗争,并鼓励农民回忆从前的一桩桩苦事,以此教育他们懂得剥削的不同表现方式。1945年前后,在各个分区,各种问题与冤情都出自此类斗争,该边区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清算是一项把财产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的行之有效的手段。穷人不必要等到下一次丰收或下一次借贷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甚至不用当佃农或去借高利贷。清算靠的不是对未来收益的许诺,而是直接为他们提供了眼前的利益。

党指示十二分区的党员干部在反腐败、反恶霸的斗争过程中要清算“老的”冤情,而在揭发黑地、减租、增加工资的斗争中,除了在抗日县政权成立后累积起来的债务外,不再清算老账。此外,黑地的主人可被处以1—5倍于逃税数目的罚款。

至于减息斗争,这一分区的中心地带对此并无多少经验可言。他们只责令恶霸地主把抗战开始前贷出去的高利贷的过高利息部分归还给债务人。除此之外,人们清算的只是战争开始以

后的高利贷。清算此类账目的方式随着借贷双方阶级背景的不同而不同。[56]

实际上,利用反黑地运动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至少可上溯到1943年年初。那年2月,分区党委下指示,无论贫富,所有的人都应自觉申报或揭发未登记过的黑地。“总的说来”,贫下中农即使不愿申报未经登记的财产也不会受罚,但须根据各人的经济状况补交全部或部分拖欠的税款。富农和中小地主就必须交回拖欠的全部税款。拒绝申报的大地主除了补交拖欠税款,还得交罚款。

党推荐的这一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农民阶级觉悟尚不高的村庄。在群众已发动起来的地区,广大干部应多敦促他们自觉申报,少罚款,把由此问题导致的阶级磨擦减到最小程度。而在农民尚未发动起来的地区,正确方式为孤立最反动的地主,动员农民调查他们的土地,以保证农民利益的增长。“从群众运动发展的阶段和村中的阶级政策出发来决定是重罚还是轻罚,是全部还是部分归还拖欠的税款。”[57]

关于过火行为和中农问题 此边区的左倾模式与彭真在晋察冀所述模式颇为相似。过火行为发生在1944年强化减租运动之时,在那些彻底贯彻执行减租政策的地区。滑县(河南)和范县(山东)就是这样的地区,那里发生了如下的事情:

1. 某些干部盲目相信群众,不听从党的政策及政府法令,从而拒绝了党的正确领导。
2. 在没有地主的村庄中,中农受到冲击。这是发生在范县的现象,是“最严重和最危险的”偏差,“严重违反了党的阶级政策”。在这些村庄中,中农受到了斗争,经济上被削弱,胆颤心惊,没有安全感,结果只能消极地对待生产。他们甚至希望国民党军队回来。这种斗争更为深刻的后果,就是打击了贫农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
3. 在其他地区,干部没有区分

富裕和不太富裕的地主,守法地主和恶霸,开明士绅和反动分子,甚至连地主和富农也不加区别,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批斗。一些好的地主的经济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打垮了,连谋生的财产都未留下。4. 1944年,解放区及党在解放区的力量有了极大发展。于是,一些干部就想知道正式恢复更激进的彻底剥夺政策的时机是否已来到了。党告诉他们时机仍未到来,党的土地政策仍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削弱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之。^[58]但从不久以后发生的事来看,这些偏差,尤其是第三和第四种,并不是完全不受欢迎的。况且党的政策在彻底执行和过火行为之间很难划清界线,因为这些政策似乎原本就打算要造成上述结果。这在中农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真实。例如,分区党委1944年下半年的一个指示,鼓励了一系列使削弱中农变得几乎无法避免的行动。这一指示还显示出在减租方案中出现的各种斗争目标的可能来源。

该指示认为,在没有地主和富农的地区,中农把持了村庄。在目前的民主革命中,中农是一支基本力量,但他们有其自身的“弱点”。在与地主的斗争中,他们不如贫雇农那么坚决。控制村庄的中农中混进了恶霸和腐败的官员,因此应该运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对付这种“封建剥削”。当多数农民痛恨并要求斗争他们时,地方干部不能向群众“泼冷水”,或因为害怕疏远中农而禁止他们这么做。虽然在清算这些人政治剥削的债务时,可以要求他们作出适当的经济赔偿,但不应采取经济斗争的方法或进行在经济上削弱中农的斗争。

当中农没有什么剩余财产时,潜在的矛盾就会激化。同样,由于人们所强调的中农的弱点,以及给穷人一些实惠的迫切需要,滥用中农粮食的诱惑也十分巨大。该指示特别指出,在没有地主的村庄里,干部起初先强调进行农业生产,但当他们发现贫

农没有发展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时,就转向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中农了。〔59〕

在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下,这一问题是不可能得以自行解决的。1945年5月,党开始传达另一份指示:“最近……对中农的惩罚使他们惶惶不安,社会秩序失去保障。主要问题是中农的恐惧使得士气低落,使发展生产和巩固工作变得困难起来。”〔60〕

山东根据地

从1937年底,日本人的铁蹄踏进山东那天起,游击战争就开始了。早在1939年,共产党及其地方同盟军所控制的一些相当稳定的地区就已组建了乡一级的行政机关。县、中心县以及地区的组织,不久就在这些虽然孤立却在不断发展中的游击区建立起来。共产党军队逐渐控制了山东的抗战运动,并进一步建立了上文提及的五个军区。〔61〕中共山东分局通过省级代表工作大会(第一届于1940年举行)、省参议会以及省战时管理委员会取得了省内的政治合作。然而,直到1945年,地方上的“政治力量”仍未联合在统一的省政府下,这反映出在抗战的大多数时间内,共产党人在山东的军事和政治基础并不是十分稳固的。

日本人在山东最初的进攻于1939年停止,因为日军要“扫荡自己的后方”,以巩固该地区,保障重点及交通线,占领次要的城市和大的村庄,并基本肃清游击队的抵抗。亲国民党的游击队与共产党为争夺对此阶段抵抗运动的控制权展开了竞争。为了反共,他们有时便与日本人联手“扫荡”共产党。尽管最初遭到了损失,但在1939—1940年间,共产党组织在“扫荡”之后仍能发展自己的根据地。但从1941年冬起,日本人开始实行“三光”政策,并强化了治安战。到1943年底,日军和伪军已控制了亲共产党军队最初立足的鲁中地区的400多处要地。

从一份战时工作总结来看,在1943年仅仅鲁中的共产党区

域就遭到了九次大扫荡和几次规模稍小的进攻,有 137 天,换句话说三天中就有一天在进行战斗。其他一切工作都因此遭受了重重困难。这段时期内,一部分政治组织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生存”,更多的组织遭到破坏。不过,日军的战斗行动 1943 年已达到了最高点,而共产党军队则通过快速运动弥补了损失。鲁中地区于 1943 年 7 月开始了反攻。到 1945 年年中,共产党军队已收复了失地,鲁中区行署声称已控制了比 1942 年成立时更多的领土。〔62〕

减 租 在这样的情形下,减租减息在抗战的多数时候只是个宣传口号。1940—1941 年间,部分地区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但收效甚微。1942 年春召开的省战时工作会议号召执行这一政策,并说别的地区也已开展了这一工作。那一年,各根据地首次一致行动着手在条件许可的地区实行减租。这一运动在山东的第二个标志是增加雇工工资。但在 1944—1945 年以前,除了少数根据地外,并无迹象表明人们试行过减息。

村干部主要靠自己的方式和工作作风展开工作。减租工作基本由工作队展开,他们所完成的必要工作都是暂时性的。地主们由于势力没有严重削弱,工作队一开拔到别的村庄,他们就立刻开始抵制。农民们赢来的收获不久就“烟消云散”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却坦言他们满足于减租运动的表面成绩。

山东分局和别的地方党组织一样,响应党中央 1943 年 10 月 1 日的指示,号召展开调查,更深入地执行减租政策。分局还召开了一次群众工作会议,检讨党在山东没有掌握群运工作原则的问题。1944 年 1 月至 6 月之间,各地都召开了各自的干部工作会议。这次为纠正右倾所做的认真工作,首次下达到党在山东的最基层组织。

有几个县(包括莒南和沂南)确实执行了十月减租指示。但

大多数共产党控制地区,这项工作不是根本没做就是执行得非常草率。部分原因是由于干部们都忙于其他工作;三四月份的征兵工作;“拥政爱民”运动;大生产运动;领导机关的整风运动以及各种防御工作,包括保卫夏粮,防备日本人的下一次扫荡。只有1944年年中的指示把减租减息及与之有关的调查列为7到10月这四个月的主要任务时,它才发展成为“相当广泛的运动”。据一份1945年9月的报告,山东解放区23,417个村庄的17%已进行了彻底的减租调查,36%的村庄尚未开展减租减息,剩下47%的村庄情况则介乎两者之间,被含糊地称为“不彻底”。〔63〕

问题 来自其他工作的压力并非是造成山东减租工作进展缓慢的唯一原因。尽管调查并不彻底,它还是揭露了干部中存在着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人们称其为“特殊论”。山东的干部往往认为减租减息不是重要的革命任务,因为它既不能发动大多数农民,又不能削弱农村“封建主义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山东的土地并不集中,利息也不高。山东农村经济具有被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商人所主宰的特殊性质,一些村庄中根本就没有出租的土地。地主与佃农、债主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多,也不重要。相反,一些干部发现减轻赋税负担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其他人则发现腐败和恶霸是地方上最重要的问题。这些干部对农民要求的评价与城市自由知识阶层对农民的评价相差无几。党的领导人没有忽略这一相似点,批评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第二个问题出现在有地主的地区。某些干部尽管理解减租政策的意义,但仍觉得这会失去地主对抗战的支持,风险太大。其他干部则认为减租政策不对,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经济,因为它牵涉到“发动阶级斗争”。另外,他们还认为它只是“收买穷人的

一种手段”。

干部理解上的第三个主要分歧可能随着其他事件而发生变化,但主要集中在执行政策的方式而非政策本身。这是我们已看到过的在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机械减租论的一般右倾现象。党组织在整体上尚未掌握群众运动的准则,不知该如何教育和组织农民,发动他们进行斗争。

群众斗争十分必要,因为封建势力有许多方法能瓦解为限制他们的势力而作的尝试。由于害怕斗争升级的后果,沿海地区有2,000多名地主、富农在1944—1945年间取道海上逃离山东,另外有些人投奔了日本人或参加国民党秘密组织和武装小分队。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据说他们采取了以下行动:

1. 利用农民认为国民党不久就会卷土重来的心理,散布谣言。

2. 夺回以前卖出或分出的土地。

3. 威胁佃户,说要赶人,有时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软磨硬逼,使佃农同意秘密地按老租率交租。在一组宣布彻底减租的10个村庄中,调查者发现只有40%的佃农家庭真正减了租。在莒南县大店镇附近地区,调查发现少付地租的基本上是富农,而贫农仍在按老租率交租。

4. 利用干部无经验制造纠纷,使新的群众组织名誉扫地。例如,散布谣言,说干部组织妇女识字班是为了“搞破鞋”,即和不正当的女人鬼混,以此来拆散妇女识字班。

5. 混进民兵组织,利用民兵制造混乱。

6. 让自己的儿子参军,得到军属的特权地位。

7. 伪称供应不足,挑拨军属,使干部失去威信。

8. 挑动宗族心理,阻止贫富成员之间的斗争。

9. 与包括贫下中农在内的所有被斗争的孤立分子联盟。

10. 贿赂干部和新的村干部。腐败极具渗透力,源远流长,因此,人们可以料到,在共产党统治的早期,腐败在地方上仍是一个“重要”问题。调查显示了在大店镇地区,地主成功地贿赂了两个村干部、三个农会干部、三个妇联干部、两个互助队干部以及其他村级组织的两个干部。

由于地主的抵制,党必须重申:如果不通过“群众斗争”,就没有办法实行减租减息。山东与其他地区都是这样。只要农民有一点苦水,就不难动员他们。如果不能组织并教育农民识别和抵制反攻,胜利就是暂时的。只有在农民学会运用自己的新权力向旧士绅展开斗争的情形下,传统的士绅势力才会被摧毁。干部在这个方面的失败使党的领导人对此十分关心。

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认为,对待减租减息的错误态度,其根源在于“许多同志”的非无产阶级倾向。他们仍然不理解党的群众路线,从来未从提高农民福利的角度来考虑工作。对于这些同志中的绝大多数来说,除了升官,革命就是抗日,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他们的“独立性”也是由此而来的。所以,他们还没有搞清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组织观念,他们甚至不屑讨论、学习或传达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64〕

措施:干部 在山东,党的领导为这些错误开了一剂灵丹妙药,那就是像 1942—1944 年党的延安整风运动那样的整风和学习。对于整风运动所反对的问题来说,山东的情况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在党尽力重申它的革命一致性时,整风运动为山东所有的党组织提供了榜样。如果不开展整风运动,党的长远理想就面临着被仅把党看成抗战领袖的各种人淡化,甚至被放弃的危险。但仅仅依靠小组学习、自我批评、澄清阶级队伍、劝告遵守组织纪律以及就发动农民的“群众运动的方法”作些演讲等抽象的东西是无法确保革命一致性的。用这些途径宣传的准则必须

在运用中加以掌握。实际上,各种方法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党的革命理想转变为现实。1944至1945年间,减租就成了这些方法中的一个。

当时,党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一特定的目标与山东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相适应。党在有关改变干部态度和倾向的所有谈话中,寻求解决这一最具体问题的具体措施。这一任务就是要发现除减租减息之外,其他有助于得到农民拥护的各种问题。

措施:问题 党对此有双重回答。首先,展开调查,探求山东租佃关系和债务关系的实质,在尽可能大的与偿还租息有关的实践范围内,确定它们的性质。第二,党承认土地所有权是普遍的,并把双减政策重新解释为在农村中削减和消灭政治和经济上“一切罪大恶极的剥削”。

调查干部发现了与租佃制有关的“额外负担”盛行,尤其在沿海、鲁中和鲁南地区,过重的额外负担在过高的地租上

的农民来借。同样，春天借出的现金可在秋天时以粮食或其他农作物偿还，但后者的价值只按市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折算。另一种形式的季节借贷则允许用劳动偿还所借钱粮，劳动力的价值只按短工工资的一半折算。

共产党的调查员发现的另一片可供改革的肥沃之地就是土地所有权的转换。这种转换分两类：合法和不合法的。关于后者，干部们发现某些“落后山区”有势力的人用很多办法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沦陷区的伪官员则凭藉权势强夺土地。干部发现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之一就是归还这些失去的土地，由此发现了与恶霸、汉奸斗争中的一个问题。

其他转换土地所有权方式牵涉到借贷，但和典型的抵押借贷含义不同。一种半卖地契的方法是这样的：卖主可在规定的一段期限内用卖出价将土地买回，这一价钱通常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二，但若不能，这桩买卖就算敲定了，除非买主答应延期。另一类称为“抵当”或抵押买卖，其实是一种商业交易。买主只要付出土地实际卖价的一半就可立即换得地契和耕种权，卖主可在两三年内用同样数目的一笔钱赎回自己的土地。逾期不赎，这桩买卖就算是定了，虽然卖主可用谈判的方式再买回一部分自己的土地。人们保留土地的愿望十分迫切，所以多数农民选择了上述商业交易或是直接土地抵押的方式，将赌注押在自己将来的好运气上。

这一地区中不满的一个基本根源（这种不满介乎于合法和非法之间）却是在近期内发生的。起因是拥有土地的人害怕共产党人，以及他们企图阻挠正在进行中或是预料中的改革行动。为了逃避累进税的负担，拥有土地的人就出卖土地。到抗战后期税率降低时，卖主常常向买主施加压力，要求买回土地。为了阻挠减租，地主逼迫自己的佃户参与虚假的买卖。“佃户”继续付租

金，以资赔偿，并负责上交土地税和征收的公粮。〔65〕

共产党人发现了所有上述及其他的行为，并分类予以公布，视情节予以取缔或纠正，但他们也承认地主和佃农的关系问题在山东只是一个小问题。共产党并没有全面否定“特殊论”，而是设法用合适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总的来说”，土地的所有权并不集中，但在存在着租佃关系的村中，租地的家庭平均要占家庭总数的 1/5 到 1/4。据进一步的估算，5 个行政区内共有 30% 到 90% 的村庄都有出租的土地。渤海区没有多少地主，这一百分比最低。而 1945 年执行土地政策最彻底的地区之一莒南县，则是另一个极端，513 个自然村中共有 430 个有租赁地。因此，总的来说，山东省的佃农家庭为数“并不是很少”。地主——佃农关系是一个可以用来发动山东农民的问题，虽然不是唯一的一个。

黎玉主席解释说：“问题不在于佃农家庭的多少”。不但土地所有权的集中问题，而且政治和经济上的剥削在整体上都要归咎于“封建压迫”。虽然剥削的这两种形式在各个村庄中可能表现得各不相同，但它们在整个体制中却是密不可分的。一些干部觉得反腐败和反恶霸的斗争是动员农民的最佳方式，因而机械地把这些问题与减租分裂开来。出现这种倾向，是由于农民天然地倾向于只回击那些直接辱骂、欺骗和恐吓过自己的人。在此过程中，运动的靶子太多太杂，以致经常丧失运动的主流方向。黎玉警告说，斗争小偷和荡妇等行动并无多大意义，除非这么做就能轻轻松松地把农民动员起来。这样的靶子只有在农民提出要求时才应予以斗争。

腐败的官员和恶霸是另一回事。他们和地主一样，都是“封建势力”的一部分，因而应作为封建势力来批斗。在莒南县，有些恶霸并不是地主，而是富农，甚至是中农。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利

益和地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地方权力结构保护的是他们全体。因而双减斗争是向他们全体经济势力挑战的一个途径，而批判腐败和恶霸的政治斗争则是同一革命任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无论山东农村的现实给理论带来了多大难题，共产党这一注重实效精心制定的土地政策，来源于农村干部的直接经验。各地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最高目标，即革命的第二任务，就是增加生产，向集体化迈进。在此之前，要削弱现存的经济制度，推翻现行的政治统治。共产党认为，只有动员农民参加斗争才能实现这一基本的革命任务，而农民只有在看见由此带来的直接好处后才会这么做。“空话”和抽象的理论对他们来说全无意义。“只要群众的生活改善了，他们的觉悟就会提高，他们就愿意拿出行动。”黎玉的这番话，似乎提前说出了上文所述毛泽东有关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讲话。“革命工作有多种”，为农民提供物质利益的方法也有多种。只要干部理解了党的土地政策是发动农村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他们就可以使用所有的方法。这便是黎玉的“减租减息是其他一切工作之母”一语的言外之义。〔66〕

措施：过程 黎玉还认为，基层应把为群众带来利益的工作放在首位。整顿党支部、建立村级政治机构、发展群众组织等对于发动农民而言都十分重要。但是他提出，提供物质利益是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步。

实际上，这有点言过其实。黎进一步概述了需要遵守的具体步骤。第一步是以党的政策和群众运动方法的精神和意义来教育干部，特别是新干部。第二步是把他们派到广大农村去，让他们在那里从最贫穷、受压迫最深的人们开始调查农民的生活条件。初步调查完成后，干部们要开始教育和组织村民。这意味着为组建农民协会、雇工协会以及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奠定基

基础,也意味着要成立识字班和冬季学校,藉此向农民进行宣传。干部必须解释清楚,每个人的苦难都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表现形式。

在农民有了一些觉悟之后,干部的第三步工作就是要在群众中发现和组织新的积极分子。他们应该是受苦最深、觉悟最高、与乡亲们关系最融洽的人。在村组织、领导人、群众觉悟等基础工作准备好后,第四步工作也就是斗争就可以开始了。要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让农民懂得开展斗争的原因,从中可获得的利益以及他们不能超越的界限。揪出来公审的是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人,公审的方式有文斗和武斗。文斗包括发言、讨论、审判会。而当农民向那些杀害、伤害和压迫过他们的人进行复仇时,斗争就进入了武斗阶段。这时候,罪犯可能得在村里游街,被迫戴上绿帽子,还要挨揍等等。此后,就可以进行减租减息和清算了。

最后,在斗争的收尾阶段要巩固斗争果实。这包括“根据大多数人的要求”分配斗争果实;讨论错误并加以纠正;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整顿党支部;建立基层领导;成立民兵和其他群众组织;警惕地主的反攻倒算;改革村政府;最后是发展生产。〔67〕

在上地所有权不是很集中的地区,这一程序有一个实用的变动,即召开多个村庄参加的斗争大会。在斗争一个极其富有的地主或臭名昭著的恶霸时,方圆上百个村庄的好几千人都可能赶来参加声讨大会。〔68〕

无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是否了解斗争的细节,但当他们指出土改是共产党在农村“扎根”的主要手段时,他们所说的正是这一工作大纲所显示的内容。到1945年,正处于发展中的斗争运动成了共产党在村一级单位最基本工作的基石,即发动群众

破坏现存的经济、政治制度，并创造一个新的制度。

结果据报道，1944 -1945 年间在莒南县出现了 1782 例斗争，在这期间大多数“发动群众的障碍”最终都被扫除了。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恶霸和腐败分子，减租减息在斗争目标中反落到了可怜的第四位。在莱东县，腐败和恶霸也是最常见的斗争对象。这两个县及整个山东地区的斗争事例及斗争对象见表 4。〔69〕

莱东县的斗争果实可分为以下几种：2,763,986 元现金（没有指出是哪种货币）；209,999 斤粮食；10,066 亩土地；1667 亩山地；306 匹骡子；206 头猪以及 1656 间房屋。

不幸的是，对于这些财产的分配方式，我们所知甚少。对这项工作的批评表明这项工作比较粗糙，以及军属家庭是主要的受益者。黎玉在谈及 1945 年征兵运动时，特别提到 1944 年的斗争所取得的直接成果，因此证实了军属确是受益者。他以渤海区广饶县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专门说到该县北部地区“特别落后”。1944 年，当地政府和党委在征兵时作了大量的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县里的定额，即使参了军的，也大多逃跑了。到年底，党和政府发动了减租减息以及斗争恶霸和反对腐败的运动。在随后的征兵运动中，仅该县的几个区中就有 3145 人自愿参军。这一特别的进展促使黎玉写道：“只要群众的生活改善了，他们的觉悟就会提高，他们就会愿意行动起来。”1944 年全省有 11,000 人参军。而在 1945 年春节前后的征兵运动中，据称大约有 4 万名青年自愿参军，民兵则扩充到 50 多万人。

至于在斗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组织工作，到 1945 年，已吸收了大约 400 万民众加入到不断壮大的武装或民间组织的网络中去，这是山东老区总人口的 26%。〔70〕

表四 山东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目标

山东解放区(1945)		莒南县(1945)		莱东县(1946 上半年)	
对象和目标	事例	对象和目标	事例	对象和目标	事例
恶霸	5,201	恶霸	589	腐败	187
减租	4,672	腐败	433	恶霸	180
增加工资	3,369	破坏*	184	清算	154
腐败	3,186	减租减息	180	减租	109
黑地	518	黑地	139	特务	80
间谍	215	迷信	127	破鞋	27
助敌	192	特务	39	减息	6
其他 (包括破鞋、土匪 和小偷等)	1,954	虐待	10	其他	142
	总计 19,307	其他	81		总计 885
		总计	1,782		

来源：见注 69。

* 破坏：此处指企图分化和败坏新建共产党村组织的名誉。

过火问题 山东区分彻底或过火执行减租政策的界限也一样模糊不清。黎玉的评论说明这种含糊是故意的，因为这受到左派的鼓励。他暗示这种过火行为在运动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是必需的。

在1944--1945年的斗争运动中，山东大约有13,000人遭受冲击。一场针对如此多问题的运动势必要打破阶级的界限。在“斗争对象”中，中农极具代表性。这些斗争的阶级背景如下：^[71]

	山东省	莒南
地主	3,589	418
富农	5,028	595

中农	3,379	534
贫农	859	213
其他	519	——

黎发现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运动中混乱的阶级结构。他注意到针对富农和中农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更不用提针对贫农的斗争了。那些当过土匪、流浪汉、地主狗腿子的中农和贫农不仅受到批评,还受到惩罚,被罚款,结果这些人 and 他们的家属在经济上陷入困境。贫农和中农是基本群众的一部分,因此应劝说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他们不应该成为斗争的对象,“除非群众要求”,在那种情况下,“就不算全错了。”^[72]

黎对发生在山东境内的各种数不胜数的过火行为左右为难。这些行为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批斗和乱惩罚;工资涨得太高,削弱了雇工的富农;军属中的地主和富农家庭并没有享受到他们在名义上拥有的优惠待遇。发生在某些边区和游击区的过火行为带来了直接的危害,逼使许多人与日伪等反动势力合作。而这还并不是全部。

黎认为,1944—1945年在“削弱封建主义”口号下开展的减租减息调查,已迅速发展成了彻底捣毁经济剥削的运动。这是在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斗争果实被用来“挖掉穷根子”,或者更确切地说,用以财富的重新分配了。到1945年,清算工作的作用已很明显,偿还的债与欠下的债之间不一定要有什么联系。清算与其说是偿还过去剥削留下的债务,不如说是用来代替彻底没收和重分财富的一种手段。

在胶东区的某些地方,人们把算盘交到了农民手上,由他们随心所欲地清账。而在别的地方,曾经打过一下耳光被定罚款100元。由于增加雇工工资是山东的一项重要改革,随着调查运动的加速,清算过去的无偿劳动就成为相应的惩罚手段,许多村

庄都用了“七折八翻”的方法。从字面意思理解,这指的是农民可以以为自己在过去七年中无偿或地主少付工钱的劳动提出赔偿要求,再将这个赔偿数乘以“8”(日本侵略的年数)。赔偿数目在不断扩大,到1945年已成了一场通货膨胀。在山东南部的苍山县,有人因少付20元工资而被罚8,000元。而在另一个例子中,4元工资的赔偿最后定为1,000元。佃农得到鼓励,用同样的方法来清算财产,虽然“退租”的本来目的只是为了惩罚那些企图破坏减租的地主。〔73〕

在所有的事例中,这场运动“走得都太远了”。但在群众动员起来、斗争加剧后,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黎分析这一现象时,把过火行为分为干部发动的与群众要求的两类。后一类不但可以允许而且十分必要,前一类则应避免。他写道:“如果这是多数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中央的指示是这种群众左倾不但没有害,而且有其好的本质,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达到削弱封建势力的目的。”〔74〕黎引用了毛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过火行为的论述,继续用一种类似的激进调子,〔75〕向任何担心这种高涨的民愤会危及法律和秩序的人挑战:

如果群众缺乏这种意识,他们怎么能够翻身呢?他们怎么能够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呢?群众将把任何企图阻止或改变他们革命行动的人视为斗争目标。如果你害怕群众的左倾,想要控制他们,不敢发动群众或给群众的行动泼冷水,那你就是在向右倾机会主义靠拢。〔76〕

但干部的左倾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么做割裂了干群关系。黎用“群众运动的规律”一语来解释这一问题。在运动的初始阶段,干部易被右倾思想禁锢,但有时左倾也会占上风,从而过早地发动斗争。由于此时群众尚未完全发动,地主就能恐吓农民,反对减租、破坏农会。只有在各种组织基本建立,干部得到培训,积极

分子被发现,农民被宣传鼓动起来以后,运动的第二阶段或斗争阶段才能开始。

在斗争阶段,左倾是不可避免的。干部要“帮助群众斗争地主,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革命统治,建立群众的优势力量”。要坚持抵制地主的反攻,直到他们懂得自己除了默认之外别无选择。这时,第三阶段就到来了。团结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原则。黎声称“和平地联合地主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联合。如果太早寻求联合,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局势就会走向彻底失败。

黎其他关于要小心谨慎的唯一的的话语是,在斗争阶段不加区别地乱斗或与“多数敌人”斗争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太多的不稳定。各个地方只要斗争了“少数最坏的人,甚至只是最坏的人中的小部分”,就足以挖出这一地区反革命势力的根子。至于其他反对势力,教育和群众的优势力量就足以战胜他们。[77]

为了证明自己有关左倾具有实用性的观点,黎谈了莒南县涝坡区开展工资清算运动的成就。这一地区彻底开展了清算运动,当运动发展到“联合”阶段时,有776户(其中63户地主,407户富农,304户中农,2户贫农)交出了537,267元,4197亩地,122,701斤粮食,7头牲畜。这些斗争果实作为赔偿分配给了2182户(506户中农,1489户贫农,187户雇工)。[78]

黎以同样的语调谈了莒南县全县的成就。清算运动结束后,许多村庄中已不再有地主,至少6,000户农民分到了土地。到1945年,左倾过火行为无疑已成为当时土地政策的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特征。这些行为得到鼓励是出于一个特别的动机:把“减租调查”运动转变为土地改革。这一发展在《五四指示》中得到正式确认。1946年5月宣布的土改正是一场如上文所述那样

具有多种形式的斗争运动,它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是“耕者有其田”,而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摧毁现存的农村精英阶层,并发动农民创造一个新的精英阶层。

概述: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

虽然我们缺少这一阶段的文件,上文概述的几个事件仍为解答本章引言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第三个提供了答案,并为解答另两个问题奠定了基础。所谓第三个问题就是抗战期间获得的革命经验的本质,以及减租在动员那个时期的农民时所起的作用。回答这一问题得从澄清党的“温和”的统一战线土地政策似乎矛盾的表面着手。

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即使在1943--1944年之前,执行这项政策的地区也远比共产党愿意公开承认的地区要少得多,而且那些执行该政策的地区往往也只是在名义上执行而已。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1942--1945年间占上风的右倾干部不愿推行这一政策。^[79]左倾过火行为只出现在那些蓬勃开展此运动的地区。

群众运动是共产党贯彻执行政策的一个手段,其中,温和路线是典型的对种种左倾过火行为进行纠正的选择。同样地,右倾错误占上风就说明向激进方向推进的必要性。自1942年起,党就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执行土地政策。前述抗战期间的发展概况,似乎解释了1942年温和减租政策伴随着对右倾错误的关注这一矛盾现象。这一矛盾只用党希望以温和的土地政策来满足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是解释不通的。

如果左倾过火行为如彭真所言在1937-1939年执行减租期间出现在晋察冀边区,那么这只是1942年党的决议中提到过的少数几个县。在这些地区,减租试验显示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那些献身于理想的干部和那些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农民们能

够走多远。在此过程中，这一试验同时显现了减租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潜在的潜在危险，及在华北进行土地革命的潜力。

彭也指出，考虑到这一潜力，1940—1942年间在减租上的温和路线确实是一种后退的纠偏步骤。这即是对所做过火行为的纠正，也是对更大规模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激进倾向的限制。

不过，1942年有关减租的主要决议还号召，要在经济上肃清那些剥削农民的“不思改悔的汉奸”。而且，1942年决议把削减所有的地主剥削和减租减息作为两个单独的目标列出。此外，如果在“彻底”执行1942年减租政策这一点上延安政治局与晋察冀领导人相同的话，那么对其他种类的剥削所进行的斗争，就得到了“温和的”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认可和鼓励。

因此可以说，这一政策是有意识地制定并被正式推行的，以便使“彻底”与“过火行为”之间在实际上区别缩至最小。当1944年这一区别实际上消失后，该政策向激进方向的发展更证实了这一结论。黎玉和毛泽东分别在1945年9月和11月的讲话中，公开认可“广大群众自觉斗争”中的过火行为是这一发展的标志。这就使得对右倾错误的关注在不断发展的群众运动中占据了一席合适之地。党中央和地方局不仅仅广泛地推行减租政策，而且在军事、政治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此政策在本质上作更为激进的阐释。因此党的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实践中所包含的内容，比纯粹的减租减息要广得多。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把对“基本群众”一语的不同理解归结为地域差异而不予考虑是不对的。党中央的讲话中一直把中农列为基本群众的一员，但地方文件有时却并非如此。而执行中央指示来发展群众运动的必要性，说明了在部分地区的某个阶段，中农必须变成斗争对象。原因是租佃本身不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只批斗地主、富农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农的利益一

直受到侵犯,直到华北广大地区基本实行了平均地权为止。只有到了这时候,即1948年初,才开始采取一致的行动纠正这一左倾过火行为,虽然地方党的领导人至少在三年前就已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最后,只依靠现有的并在此加以分析的文件,不可能作出刘少奇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意见不一的结论。他在1937年提出了“左倾”的方案,而党中央直到1940年才制定出一个明确、温和的土地政策。而且党的土地政策在实践中正如刘所建议的那样有了许多发展:在正式场合支持统一战线,禁止彻底没收,同时根据需要,尽可能另觅新路以从富人处取得财富分给穷人。

正如黎玉和彭真所提到的,机械地照搬而不是彻底执行党的减租政策的右倾错误,其原因至少有部分是因为最初关注的是日军以及基本上是为抗日才走到一起来的各种人。但这种错误也反映了生存问题。1942年的政策指出,受到敌人直接威胁的地区可不强调减租,它规定:“游击区或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要根据提高农民的抗日热情、为抗日而团结不同阶级的总目标来决定减租多少,可以是20%,15%,或10%。”

所有的减租指示都有类似的谨慎规定。1943年晋察冀的指示最清楚且直截了当地宣告,在受到敌人威胁时,团结抗日高于其他任何一切。敌人的威胁很大,任何地区想要有效地贯彻执行土地政策,都必须在军事上赶走敌人,粉碎敌人的政治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权力组织的核心。

因此1943年党制订《十大纲领》时,把对敌斗争放在首位,减租减息放在最后,另外八条纲领中六条涉及政治和行政任务,决不是偶然的。^[80]就共产党根据地的全面发展而言,第一条是基础,最后一条则取决于其他几条。它们一起代表了共产党所学会的怎样在中国农村打一场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土地政策及

其产生的阶级矛盾只有在整个地区的军事与政治前提条件得到满足后,才能成为一个村庄“其他一切工作之母”。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而中国共产党则为1943年日本“扫荡”退却后大规模地实现这些前提条件提供了必要的领导。

但仅就减租减息而言,在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最初发展中,该政策所起的作用显然极不重要,因为此阶段没有广泛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但由于统一战线土地政策避免了激烈的没收土地之举,迫使共产党去寻求均贫富的新方法。在那些租佃问题并不突出而贫穷和财富不均现象却十分普遍的地区,这是一件极具重要意义的大事。

结果,共产党人在1945年前扩展了农村土地政策的内容,通过清算老账的策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为华北的“基本群众”带来了各种好处。除了通过分配斗争果实进行物质刺激以外,共产党还采取措施,结束被全体农民视为自己最直接的苦难——农村中的腐败、滥用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问题。共产党利用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有关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无偿占用劳力、债务等问题,找到了摧毁农村经济和政权体系,动员农民支持建立新经济和政权体系的方法。严格来讲,斗争对象并不是地主阶级,而是统治阶级。共产党人发现了在即使村民并不把地主视为问题的地区“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公式。

土改计划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主要革命任务。华北土改的发展以及执行这一政策的方式和条件,都属于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取得的最重要的革命教训。《五四指示》从未公开发表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它太过明确地反映了这些经验。这一指示强调了汉奸、恶霸、劣绅的罪恶与清算活动,指出了胜利的公式。但就其实用性而言,《五四指示》对一个在理论上一以贯之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案的发展并无多少贡献。它与先前及以后

有关阶级斗争和财富分配等问题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81〕

激进的土改：1946—1947

共产党统一阵线土地政策趋向激进的时间，可从1943年10月1日党中央发表减租指示和上文提到的《十大纲领》算起。1944—1947年间，“减租”发展成一场平均地权的群众运动，并正式写入1947年的《土地法》。在最初没收财产阶段所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上文描述的多样化斗争和清算运动。从《五四指示》来看，1946年同时还使用了其他四种方法来分配财产。这些方法包括：1)直接没收属于日伪的财产、黑地以及在土地抵押中失去的土地；2)把地主的财物卖给佃农等人；3)捐地运动；4)村有土地和村有财产的平均再分配。

1946年9月，一位评论家指出，共产党人正式试验这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不同方法，这是制定一个土地法大纲的准备阶段。〔82〕叶剑英将军在1947年2月间向记者谈了同样的事情。他解释说，党中央正向各边区派遣调查人员，以便把不同的经验总结成一套统一的土改措施。〔83〕

但不幸的是，有关党内在这一转折时期必然发生过的争论的记录却十分含糊不清。土地买卖与捐地显然是抗战时期遗留下的方法，在党发起的边区试验阶段之后却并无多少进展。除了日本人的财产，在缺乏群众斗争或清算斗争的基础之时，人们很少采用平均分配和直接没收的措施。在1946—1947年间，最典型的运动顺序是，先进行清算斗争，然后对斗争果实进行日益平均化的再分配。这一过程的高潮是彻底没收地主财产(包括土地、房屋及所有浮财)和不同程度的平分全村土地和生产资

料。〔84〕

直接没收

这个方法在满洲特别重要。共产党首次在东北试行土改时，没收是其基本特征。党1947年4月17日的一份指示规定，立即没收东北被日伪拥有或占有的一切财产和土地，及所有的开拓地和卖脱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85〕。

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报道，林彪分派军队中12,000名干部，作为土改干部领导农民没收此类土地。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广人稀，因此最初未对拥有75英亩以下土地的地主采取行动。而那些拥有更多土地的人，往往被人们自动划为某种程度的亲日分子。〔86〕

这种做法是由满洲土地集中与土地占有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当满人首次向汉人开放满洲时，一小部分人利用了这一良机进行土地投资。1927年的一次研究发现，在北满的11个县中，地主私人拥有的土地从1000英亩到20万英亩不等。当日本侵略满洲时，许多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或者积极与日本人合作，或者默认日本的侵略。那些不这样做的地主往往发现自己的土地不是被没收就是被迫以低价出卖。这类被剥夺的土地称为开拓地或卖脱地，其中一部分给了日本定居者，一部分给朝鲜人耕种，另一部分则租给了中国佃农。因而就有了这一说法——东北的土地都集中在日本人和他们扶持的傀儡手中。

满洲的土地使用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另一特征就是傍亲制，或称依附制。这种制度是早年定居的中国人发现自己拥有超过自己耕种能力的土地后形成的。依附地主的人既非佃农又非雇工，他们与其为之长年工作的拥有土地的家庭住在一起，收获时按一定的百分比获得一份报酬。这叫“内傍亲”。“外傍亲”就是一个无地的人积攒了一小笔钱，买了农具和单独的房子，可能

还有一头牛，然后与地主或富农达成某种协议得到一块地。这位依附别人的农民就这样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不用为自己的地付租，但须每年为原来的地主无偿劳动一段日子，从60天到200天不等。用这种方法得到土地的人有时被称作二地主，因为他们常常把自己的一部分地再出租，拥有自己的佃农。〔88〕

由于傍亲制的流行程度不一，地的来源也各不相同，但这可能确与共产党试图在东北开展减租运动时最初经历的困难有关。因此，直接没收和重新分配对管理者而言可能更为容易一点，虽然这一做法也未得到人们全心全意的拥护。

1946年7月，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举行的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人们就土改问题展开了“生动的讨论”。代表们来自当地的各个阶层，共产党员只占了其中的1/4。一些代表虽然在原则上同意党宣布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但觉得没收的日伪土地应改归市政当局所有，然后再租给那些耕种的农民。而包括农民代表在内的其他代表则赞成党的政策，觉得应把这种没收来的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的穷人。后者的观点最后占了上风。〔89〕次月，经“热烈讨论”，后者的观点为东北民主临时政府采用，作为一条条文写进了整个东北的土地纲领。〔90〕

土地买卖

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及战后都鼓励地主把土地卖给自己的佃户。此阶段的土地买卖是自愿进行的，虽然有减租的压力，并有上文提及的假买假卖之嫌。这一政策在1946年12月陕甘宁边区颁布的《政府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中发展到顶点。叶剑英特别声明，陕甘宁实行的强制购买政策“究其本质只是试验”，它从未超越这一阶段。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一试验象征着党的土地政策在各地发展的方向。强制购买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地主阶级，不再顾及政府规定的善恶之分。

根据《条例草案》，地主家庭可拥有的人均土地是此地区中农家庭平均人均土地的 1.5 倍。超过这一数目的土地都要卖给政府。那些在抗战期间有贡献的地主，可以保留两倍于一般中农人均土地的土地。富农的土地不属于征购的范围。乡政府、乡农会与地主一起商定土地价格，这一价格不得超过该地区两年收获的价值，也不得少于一年收获的价值。

政府以这种方式购买的土地则按半价卖给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后者可在 10 年内付清地价。如果某户农民穷得付不出钱，县政府可向边区政府提出免付款的申请。贫农购买的土地加上他原先拥有的土地，不得超出这一地区的中农平均拥有的土地。贫雇农和贫穷的军属家庭在购买此类土地时拥有优先权。〔91〕

1946 年 12 月 24 日，新华社宣布，在延安以北约 100 英里处的绥德县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的方式首次成功地实行了土改。从 11 月 25 日开始的政府买地再卖给贫穷家庭的行动在 9 天内就结束了，村里 61 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约 8,000 磅的粮食买到了两百多英亩的土地。〔92〕

1948 年，在中国共产党采取更为激进的土地政策后，两位同情共产党的评论家指出，缺少有效征购土地的方法是因为涉及到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大了。在已经面临战争压力的情况下，这将给边区政府带来“金融管理”的严重问题。因为这项计划并未触动小地主和富农，他们并未受到伤害，相反数目还可能增加了。另外，地方资金市场也有可能陷入混乱。无疑地主们并没有把新得到的资金像人们最初设想的那样投资于工业，因为农村地区并没有多少发展工业的潜力。结果，分期购买土地的计划只不过增加了贫农和无地户的债务。〔93〕

有些地方上的党内文件在 1947 年批评了捐地和买卖地主

财产的做法,因为这一方法违反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农民的原则,使地主控制了村庄。〔94〕这么晚仍在进行土地买卖与捐地的原因并不清楚,因为其他许多地区在剥夺地主财产上已先行一步了。这些试验大概是为了配合军事形势而尝试与地主结成统一战线来对抗政府军的进攻。

捐地运动

抗战期间,共产党呼吁拥有土地的人捐献自己多余的土地分给穷人或自己的佃户。战后这样的捐地运动好像起源于1946年夏的苏皖边区。当时,该地区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当地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中拥有土地的代表及党员(其中包括周恩来)带头捐献了自己的财产。这一运动随后发展到晋察冀、陕甘宁、晋察鲁豫边区以及山东和满洲。〔95〕

人们期望这一运动能对土改工作做出重要贡献,至少新华社的英语部表达了这一希望。但却无迹象表明这项运动起过这样的作用。捐地运动看来主要用于征收党员、军人、边区政府官员的多余土地,这一结论可从报道捐赠土地等财产的大人物名单中得出。〔96〕而且,冀鲁豫区党委在1947年初指示土改干部,除了这样的家庭外不要运用捐地的方式,原因就在于捐地排除了斗争,从而妨碍了在政治上打倒地主,也不能在政治和心理上解放农民。〔97〕

平均分配

苏北的一些解放区在日本投降后就立即开展了向汉奸清算老账的运动,不久又扩展到地方首领和恶霸地主。在这些地区,《五四指示》标志着从清算转向程度不等的平均分配财产,而不是从减租减息转向清算。土地按每户人数平均分配。所有靠种地为生的人们(包括以前的地主)都领到一份等量的土地。人均土地的多寡每个地区各不相同,因耕地面积和人口密度而变化。

在某一个地区,人均分得土地 2.5 亩。[98]

苏北并不是在 1946 年间唯一基本上实行平均分配的地区,许多地区都在“填平补齐”的口号下发展了这一行动。遵循的方法就是 30 年代形成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但这些最初的平均分配的结果却并非平等,原因可能是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平等原则。1946 年普遍实行的一项措施是,在自己耕种的条件下,给地主家庭留下比平均分配略多一点的土地。

在晋冀鲁豫边区豫北的武安县,1946 年提出填平的口号时,由于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已基本被剥夺殆尽,连中农的财产也不得不被用来弥补贫农的穷困。位于同一边区晋东南的一个村子彻底进行了这项工作,结果原有的 7 户地主只剩下一户,村中贫农人均有地 5.5 亩,中农人均 6.2 亩,富农 6.9 亩,唯一的一户地主人均 9 亩。[99]而在同一边区的另一个县,贫农人均有地 4.5 亩,地主家庭可保留人均 11 亩的土地自己耕种。[100]

在 1948 年初根据修订的《土地法大纲》制定一个单一的规定之前,对平均分配的工作存在着多种理解。平均分配显然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信念,他们早在 30 年代初期就在江西试行了平均分配。但在 1946—1947 年间,发展这一做法出于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双重考虑。动员华北少地农民与国民党作战的迫切需要决定了这一点。国民党向晋察冀、晋冀鲁豫、陕甘宁及华东(山东和江苏)等地的进攻是这一动员工作的直接原因,因为 1946 年下半年和 1947 年初,国民党军队深入共产党根据地,迫使共产党方面必须招募更多的新兵,动员更多的民兵和老百姓参战。

评价与复查

推动平均化是因为即使在已开展土改的地区,贫穷现象仍然存在,贫雇农的生活仍未改善。在某些地区,地主富农家庭的

生活水平仍比贫农要高，在首次分配斗争果实时受惠的军属家庭也如此。这正是1946—1947年间发动复查与填平运动所要纠正的情况。

冀鲁豫分区党委注意到华北平原上已无地可供分配，因此在1946年下半年指示政治机关和部队，放弃以前分给他们进行生产的土地。汉奸、逃亡地主的土地和公用土地曾被分给部队和行政机关耕种，以配合抗战期间发起的生产自给运动。^[101]但把这种土地分配给贫农，只能勉强解决他们的问题。

潘复生同志及分区党委在1947年1月的一次党务工作会议及随后的一系列指示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102]首先，土地并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民，地主也没有被彻底打倒。一部分地区对待地主仍旧“相当彬彬有礼”，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好房子里，保留最肥沃的田地，藏匿有价值的财物。同时，每次农民起来反抗又总会伤害一些中农的利益。最后，干部们没有适当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将土改和军事工作统一起来的指示。从“爱国自卫战争”起，“群众的士气就一直在下降”。这是由于干部只关心作战，而把土改置之—边。由于农民的生活至此仍没有改善，他们对征兵和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也不会报以多大的热情。

与往常一样，这些问题被归结为是主客观原因的综合反映，即对贫穷和战争的现实缺少“足够的干劲和理解”。分区党委首先作了彻底的自我批评，批评自己对于同时开展土改、游击战和后方服务工作缺乏信心，因此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的直接压力下只注意战争工作。

此外，该地区党员内部还存在着对待土改的错误认识。同志们好像不理解“耕者有其田”就是要解决缺地农民的问题，肃清封建势力，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彻底摧毁地主阶级。许多干部并不恨地主，有些甚至可怜他们，说这个或那个地主并不坏，用武

力夺取土地和粮食是错误的。这些干部还不理解地主在本质上是罪恶的，他们拥有的财产代表了他们对农民的剥削。这些干部好像也没有注意到许多农民仍旧没有土地。结果，一些干部仍在声称土地所有权并不集中，农村也没有阶级冲突，或至少没有严重的剥削。他们说这就是坚持斗争中农的理由，否则他们就满足不了贫农的要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冀鲁豫分区党委作了如下指示：1)尚未开展土改的地区应结合征兵运动和支前工作立即进行；2)游击区在“一手拿枪一手分地”的口号下开展土改；3)已经开展土改运动的地区应进行复查工作，根据“填平补齐”的原则进行纠偏，应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漏过哪怕一个人或是一亩地”。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地主的房屋应分配给穷人，而不该像某些地区那样进行破坏。至于工商业，分区党委与《五四指示》一样，要求区分城市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农村地主的资产。前者根据党关于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处理，而地主在农村的资产应视作“地主封建经济”的一部分，根据重新分配土地和浮财的“填平补齐”原则分给最需要的人。但也不能强迫那些不情愿拥有股份或参与管理这类企业的人这么做。^[103]干部们不要发起平分富农财产的行动，除非群众有这样的要求。旧富农应被允许保留自己耕种的土地，新富农的财产不能被剥夺。“总的来说”，不要触动富农的工商业利益。

另一方面，中农问题仍很棘手。各种指示阐述的基本路线归纳起来又是一句格言：“中间不动两头动”，即不动中农的财产，只平均地主、旧富农和贫雇农的财产。

但矛盾的是，指示在禁止地方干部侵犯中农财产的同时，又使得他们难以做到这一点。作为一条总的规则，中农的财产不能动，只要拿了他们的东西，都该在复查和填平运动中给予补偿。

为平定中农情绪,取得他们的支持,潘复生建议要让中农分享斗争中没收来的现金、粮食等浮财,只把土地和别的生产资料平分给贫农。最后,大的村庄被要求试着调整分配,以便匀出一些土地分给小村庄的贫农,因为那些小村庄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富农或中农,而不是地主。

但是这条总路线也有例外。汉奸中农的财产可以平分。而且,只要农民要求,党的干部可以领导平分那些犯有腐败和欺压等罪行者的财产,虽然在这些事例中更应强调政治清算而非经济清算。最重要的是,在地权并不集中的小村庄,可以从中农那里取“小块土地”。因为干部们身负通过分配土地、粮食、农具、牲畜和房屋来“消灭赤贫户”的任务。显然,最基本的问题并不总是租佃问题,而是财富匮乏的问题——换句话说,穷人太多。

华东局通过1947年7月关于山东土改的指示,对“动两头”的口号作了更切实的阐述。^[104]这一指示也认为贫农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而允许地主和富农保留的土地相对多了一点。这一地区的党委也对属于他们权限范围内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华东局把错误的“富农路线”归咎于自己1946年9月1日的指示,批评这一指示与党中央的土改基本路线“完全相反”。党的路线的目标并不只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而是“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人得到足够的土地,同时使那些自给自足的中农的土地不受侵犯”。

华东局1946年9月的指示可能和中央1947年7月的路线不一致,但似乎与1946年夏的路线相差并不太大。据说9月指示规定,中小地主可拥有比一般中农多一半的土地,地主军属家庭和干部家庭可保留比一般中农家庭多一倍的土地,并且用仲裁的方法来清算富农的封建剥削。9月指示还鼓励捐地,政府征购地主多余土地等和平方式。到了1947年7月,所有这些方式

都被批评为是错误的。

但这些方式中的每一种似乎都源自《五四指示》。中央在这个指示中赞成地主捐地、土地买卖，规定在解决农民和中小地主之间的问题时可用仲裁和大家同意的方式，并建议不触动富农土地，即使无法避免，也不能动得太厉害。

不管“富农路线”最初源于何处，华东局在1947年7月完全改变了方向，号召没收地主的一切生产资料，他们只能保留与所有村庄中的贫雇农一样多的土地。恶霸、反动地主和那些群众痛恨的人则什么都不给，如果村农会同意他们的家属可以允许拥有一小块土地。富农多余的土地、牲畜和农具可以剥夺。中农的土地和财产“绝对不能动”，如果动了，他们应得到赔偿。如果村中缺少公用地或没收地，那么中农将得到另外形式的赔偿。

如果部分佃农在最近的清算斗争中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土地，应劝说他们让出多余的部分或至少用它来换别的东西。干部、军人和烈属不应该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土地。从地主和富农处没收得来的土地首先应根据家庭中的成员数分配给贫雇农。没有实行这些标准的地方应纠正分配财产的方式，以便改正1946年出现的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两种不同的错误。

最后，这一指示把土改的群众参与原则加以制度化，命令政府和党的组织听从村农会。在村一级中，由农会、农会中的贫农小组和土改工作队共同进行土地改革。此外，他们还要参加地方党支部、政权组织以及民兵的改革，这对于彻底、正确贯彻执行土地政策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刘少奇当时负责中央委员会的土改工作，他显然赞成对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批评，并赞成群众参与对干部的批评。山东渤海区党委的一位领导人景晓林引用了刘少奇的话，警告“对中农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害

怕,开始动摇。各地方务必关心中农的态度,注意他们这一方的任何动摇,并务必采用紧密联合中农的政策。只要中农留在贫农这一边,就不会发生严重的冒险主义。……”[105]

景同志还提到了刘少奇给薄一波(晋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的一封信,信上写到应允许群众批评和揭露挪用斗争果实的干部。此外,此信所显示的路线与华东局给渤海区和山东整个地区有关怎样处理地主的指示是一致的。在土改和土改后的调查中,应没收地主的所有土地,平分给贫雇农。只有在地主向农民投降后,农民才应赐予他们的前主人一点财产,且不能超过农民自己的平均数。[106]

土地法大纲

这些指示中明显的均贫富倾向在1947年10月制定的《土地法大纲》中达到了最高点。按照毛的说法,新的土地法重申了《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政策,“而且对于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地改正。”[107]

《土地法大纲》废除了所有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及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其他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法还取消了农村土改前存在的一切债务。这部法律的第六条可能是最重要的,它用明确的语言写出了平均地权这一奋斗目标:

除本法第九条乙款所规定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

只有汉奸和内战战犯不予分配土地,虽然他们的家属在无罪和愿意自己耕种的情况下可以分到土地。地主及地主家庭分

到的土地与村中其他农民一样。除了土地以外的财产,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等都要没收,富农的多余财产也要没收。所有这些物品都要平均分配给农民和其他缺乏这些物品的穷人,地主与富农也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切被没收的物品,连同土地一起,分到谁手中就归谁所有。〔108〕

村中每个人都分得平等的一份财产,这个规定既有温和也有激进的因素。说它温和,因为这一规定避免了30年代使党早期土改工作蒙受损失的左倾错误。在那个时候,地主无计维生,富农只能分到最贫瘠的土地。但由于华北缺乏土地,中农为数众多,如果能让村中每个人都得到差不多的土地,势必要侵犯中农利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共产党在对待中农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矛盾,最终似乎是通过把他们也归入填平行列的含糊要求来解决的。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与1947年10月以前区党委指示的“中间不动两头动”的原则相矛盾。

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火行为?

地主和自由派人士也许在暴力下退缩了,而亲国民党的作家们在冗长的争辩中认为,中国的农村体制并不是真正的“封建”。这一看法多半是正确的。而那些认为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农民个人是毫无意义的看法可能更为正确。这些批评家坚持认为,中国的人口密度和落后的农业使集约化生产和现代化成为乡村应优先考虑的事。〔109〕然而,这些说法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40年代的土改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第一阶段。土改究其实质也是一项共产

党为其夺取政权这一直接利益而服务的政策。这也是共产党人自己的看法。为了探讨这一目的是否已达到,以及是如何达到的,我们必须回到本章引言提出的主要问题上来。

1946年10月,毛泽东总结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头三个月(共产党是以国民党7月发动进攻来进行计算的)的经验。毛评价了土改在共产党防御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写道:

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110〕

不幸的是,毛没有描述他所提及的这一过程。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像他这番话所显示的那样简单和直接。可惜我们手头的文件无法对土改在政治军事上的意义作出确切的分析。这儿,我们只能评价有关土改的主张、地区党委领导人敦促干部相信土改正确性的理由以及1946—1947年间两个不同的地区实行土改的结果。

主 张

潮水般涌自延安的新华社电讯用具体的政治、军事术语描写了这场土改运动的进程,贯穿始终的主题为:穷人和无地的农民团结在共产党一边,努力对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卫自己新赢得的成果。一篇来自河北南部邯郸的报道称,土改后晋冀鲁豫边区有10万农民参加了八路军。在1946年秋政府军向该边区发动进攻之前,大约有1,000万农民分到了土地,占该地区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报道评论说,土改使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国民

党的进攻,保卫自己的家园。[111]

另一篇报道则称哪里把土改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哪里就能取得无数个巨大胜利。在山东沂源县,共产党在刚开始雇用农民支援军事运输时遇到了困难;但土改以后,许许多多的农民自愿支援前线,甚至还有人归还自己所得的报酬。[112]山东高密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坐落在胶济铁路边,离蒋军一箭之遥,土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当国民党开始进攻高密时,村中有个地主威胁说要报复那些分了地地的农民。为了对付这一挑衅,农民们再次开会,深入清算,把土地和粮食分给了村中最穷的32户人家。随后,村民们就组织起来尽一切可能保卫这一地区。他们把老人和儿童送到附近比较安全的地区,并在进村的道路上布置志愿的哨兵进行巡逻。[113]

鲁中农民在对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游击战的同时,又进行了土地改革。鲁北的渤海区有几千青年自愿要求参战。胶东区在重新分地后,自卫队的力量据说翻了一翻。[114]

土改以后,苏北地区有2万名农民参加了地方部队,据报道,每个村中都有自愿的农民在作战。[115]在晋察冀边区,主要的大城市张家口虽于1946年10月陷落,土改仍然加强了地方防卫力量。[116]而在热河西部,土改就在国民党军队来犯的路线上进行,随后就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参了军,还有更多的人加入地方自卫队保卫新分到的土地。[117]一篇来自延安的报道,概述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准备工作(延安于1947年3月落入政府军手中),它宣布征兵训练工作与彻底土改将同步进行。[118]

记者西德尼·瑞顿伯格写下了发生在陕甘宁西部一个名叫孟坝(音)的村子里的事。这个村的160多户佃农向一个恶霸地主发起了清算斗争,地主的多数土地都被分给了他的佃户,他则逃向了边区外国民党一边,扬言要打回来讨还失去的财产——

“等我们打回孟坝，我们要杀光那些佃户，我还要用人肉开一家餐馆。”结果，自愿参加八路军和地方自卫队的人激增。一个为他当了15年佃户的农民组织起一支担架队，另一个农民则在共产党军队开来保卫边区时设了一个食品站。〔119〕

论点与指示

党的文件所谈的与延安电台所谈的大致相同，但有两点例外。文件用更为复杂的语言谈了土改与农民参战的关系。另外，文件中不时穿插着“必须”和“应该”这两个词汇，使人难以分清何处是指令的结束，何处是成果汇报的开始。

任 务 中国共产党的作战作风家喻户晓。1945年后，他们仍依靠广泛的群众拥护的网络进行作战，虽然与抗战阶段相比在1945—1949年间游击战已远远没有那么重要了。实际上，所有有关土改与农民参加“爱国自卫战争”的关系的报道，都来自那些受到政府军进攻威胁的地区。这些地区农民的参与关系到能否动员人民确保维持战争必须的粮食和人力的供应。这样的动员有以下几类：

1. 每个县要组织上万人，最好为2万到2.5万人，参加民兵组织。民兵直接支援前线正规部队，负责放哨，牵制敌人行动，骚扰敌军后方，驻守新占领区，包围被敌人占领的小块地盘，协助战区百姓运送军用物资，搬运伤员，押送战俘，破坏或建设地方设施。民兵还要负责保卫地方党政机关，看守犯人，镇压地方反革命行动，抓特务以及保证通讯线路的畅通。

2. 地方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前线粮食、弹药等军事物资的运输，同时把缴获的军用物资和伤员运送到后方。在战区，以村和区为单位成立自卫队，县政府负责总协调和领导。在每一个村庄中，自卫队负责调查人力、畜力、每户家庭的物力，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军事运输队、担架队、骡、大车、小船等。一旦正规部

队需要,16至55岁之间所有四肢健全的男子都要参加这类运输工作。

3. 妇联负责放哨,盘问村内陌生人。妇女们还要帮助急救、护理,进行手工等支持作战的劳动,并鼓励年轻人自愿参军。

4. 熟练工人负责维修邮电通讯系统和公路。

5. 文工团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宣传工作,帮助人民理解战争,自觉拥护战争。

6. 青联动员自己的成员参加后方服务工作并去参军。

7. 除了上改任务外,村农会还要保证征兵运动的胜利完成,以及及时耕种、收获,尽可能扩大生产。

8. 最后,战区所有的居民须遵守前线部队和地方政府下达的下列命令,如修复防御工事,拆毁障碍墙、战壕和房屋,救护伤员,自觉报告特务的行动,等等。〔120〕

延安电台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土改和农民参加战时工作的关系。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主要是由于物质刺激以及出于对报复的恐惧,也因此才会拥护共产党作战。但无论毛有关穷人在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后会“拥护”共产党的说法有多么正确,穷人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给共产党各种军事上急需的支持。其中的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直接,结果也并非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

虽然延安电台报道的是相反的情况,党内报告和指示还是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四条基本理由:1)农民不情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参战,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并由于以下原因变得更为复杂和顽固;2)1946—1947年间国民党对广大解放区的进攻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3)干部不果断;4)害怕国民党卷土重来,以前遭批斗的人要进行报复。

地方上的不服从:干部与农民

宋任穷是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位军事指挥官和政委,他在

1947年的报告中提到土改后有大批解放了的农民参军,使部队的阶级觉悟得到相当大的提高,但军队干部中还残留着“地主和富农意识”。因而那些干部无法保持普通士兵那样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中的许多人脱离农业生产已有好多年了。

宋用“地主和富农意识”一词特别触及了抗战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大多数军队干部是抗战时参军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家园,或至少为个人捞点好处。这类干部中有许多人出身地主和富农,他们从未想过要摧毁封建主义,更不用说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了。这些干部还想到地主在抗战中帮助了共产党,他们提供情报,供应紧缺商品,隐蔽和看护伤员,等等。结果,老的干部中并无真正的阶级仇恨,相反,许多人还可怜地主,设法保护地主。宋认为,在1945年的冀南,这个问题是动员群众起来斗争时一个巨大的障碍。[121]

同情地主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冀鲁豫地区党的领导人潘复生宣称土改为动员群众响应征兵运动打下了基础。一篇关于1947年4月鲁豫边界处12个县5万名青年自愿参军的报道证实了他的断言。而在此之前,该地区在未实行土改的1946年也开展过一次征兵运动,却未能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22]但是潘同志也提到,干部一听到要征兵就“头疼”,农民一听到“就送自家的青年去走亲戚”。干部们感到头疼的原因有好几条。[123]

首先,干部们反对土改政策中有关补偿的条文,或是那种看起来共产党在用土地换取人们参军的笨办法。黎玉主席在山东也发现这是一个问题,一些干部反对1945年的清算斗争,认为这是一个收买穷人的办法。潘复生也发现,部分干部认为刚把财产分配下去就立即发起征兵运动是错误的,把“让人参军当做了土改的目的”。干部们“往往不理解”,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这场

战争是一场农民反对封建势力的武装斗争,如果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胜利了,那么农民就保不住自己的土地。潘同志的这一番话尚不能使人弄清楚:到底是干部们确实实没能掌握改善农民生活的斗争和与国民党作战之间的联系,还是从一个抽象的意义上来说,干部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促使他们开始怀疑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后一种看法似乎更为可信,因为潘说他理解干部的难处:最初由于农民害怕国民党回来,不愿斗争地主,他们得说服农民;而然后就立即要求农民与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来保卫自己新分到的土地。

与此相关的,干部们还抱怨群众阶级觉悟不高,他们既不要地,也不想拿起武器保卫土地。第三,一些干部抱怨土改后征兵甚至比土改前还难。农民想留在家中享受斗争成果,特别是因为这一成果中还包括了一块土地。^[124]最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那些干部们不能动员起参军热潮的地区,人们用了各种老方法,包括贿赂和强制,来完成规定的征兵数。这一现象1946年在前面提及的鲁豫边界各县中发生过。当1947年初再次发起征兵运动时,干部们担心他们将不得不再次求助于那些不得人心的手段。

为了在征兵政策的缺陷给战争带来不良影响之前就能予以纠正,冀鲁豫分区党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保田参军”运动不应被视作党强加在群众身上的一个负担,参军与土改一样,是农民利益的基本环节。干部们必须把农村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看作是全国范围与蒋军作战的表现形式,作出农民不要土地的结论是错误的。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但是他们害怕蒋军回来后自己要惨遭报复。干部们必须打消这些疑虑,使农民懂得只要他们愿意为土地而战,就能保住自己的土地。

潘同志还重申了在征兵运动中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用强

迫的手段或凭借个别积极分子的热情是不够的，一定要发展成真正的群众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士兵，但他们应当是真正的自愿者，而不是那些一有机会就开小差的不情愿的牺牲品。振奋群众精神的第一步应当是召开县干部大会，随后召开村党支部大会，以确保干部理解这些原则。然后在县或区的群众领导人大会上向群众传达征兵任务，这些农民积极分子回到自己村中后再召开村群众大会。要在这些会上向群众解释征兵运动的意义，承认过去所犯的强制征兵的错误，鼓励群众提问，并耐心解答。

同时还应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打消农民顾虑，使他们确信参军光荣，破除“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偏见。所有的村组织都应为此运动作贡献。农会要讨论谁应该自愿参军，妇女会要考虑怎样送丈夫和儿子去参军，小学老师要写文章，出黑板报，教孩子唱参军歌。

村民的觉悟在总体上有了提高后，就可以发起“革命竞赛运动”，用先进村庄的榜样去影响落后村庄，在村庄中树立模范家庭和模范个人，让别人仿效。在这个阶段，如有必要，党员应带头参军。最后，全村人都要赞颂自愿参军者，并举行光荣的欢送仪式。干部们得到指示，要严肃对待农民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以及不愿离开家园的问题。村和区干部要承担照顾军属家庭的责任，要写下在农民参军期间派人耕种其土地的书面保证。他们还要确保那些许多男子参军的先进村庄，在农忙季节不会面临缺少人手的困难。

但在那些尚未彻底实行土改的村庄中，尤其是那些征兵运动落后的村庄，积极分子从区里开完会回到村中后，应把土改作为中心工作。征兵运动应与分地分浮财运动结合起来。

地方上的不服从：有权有势者

1947年3月，潘复生详尽地阐明了土改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具体指出了该地区的党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欠缺。当时，党员只占该地区人口的1.5%，远远不到计划的3%。许多村庄没有党支部，即使在那些成立了党支部的村中，前来开展工作的地区干部也常常忽视了这些支部的存在。

就像黎玉在山东那样，潘强调党建工作和征兵工作一样，必须围绕着土改这一基本任务来展开。他重申了基本公式：分地、分财、分粮以后，农民有饭吃有衣穿，觉悟就提高了。不进行土改就无法胜利开展其他工作。潘还特别指出，这与抗战初期实行的“平均主义”完全不同，那时每个单位都只是孤立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既不协调，也不区分基本任务和辅助任务。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是最重要的，结果只有在党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125〕

也许是由于大家都理解了，潘对分地、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他们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土地以及农村党建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明显地省略了一个环节。他只顺便提到了分地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即农民成为村庄的政治主人。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控制住地主和特务，防止他们破坏征兵运动。

徐运北写得更明了，他把征兵运动称为“土改的延续运动”，强调在彻底执行土改的地区，会有更多的农民踊跃当兵。这不仅仅是因为地主的财产分到了农民手中。还因为罪大恶极的地主不是遭镇压就是被关押。经过暴力斗争和非暴力斗争的冲击，这些斗争对象再也不能控制乡村了，而共产党确立了领导地位。地主、特务的谣言与破坏行为得到了控制，党的政策得以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在这些地方，农民们更容易懂得参军保田的重要性。〔126〕

尽管党的宣言强调要提供物质利益，但这并不是土改唯一

的任务,和它一样重要的是这一运动所产生的破坏力。另一位作者写道:“土改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乡村的封建地主。在这破坏的过程中,亟需消灭他们的封建统治。如果我们只在政治上进攻地主,而不分他们的地,就绝对不能完成土改任务。经验证明,只有分了地主的土地和粮食,把他变成中农,……他才不可能恢复自己以往在村中的态度。”^[127]

农民并不会自动要求武装保卫新分到的土地,主要的动机也并非只是害怕地主的报复,正如当时西德尼·瑞顿伯格和其他一些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的确,恐惧心理不但没有使农民勇敢起来,反而有可能起了威吓的作用。各种资料都把农民对“变天”或国民党卷土重来的恐惧心理视作实行土改的第一障碍。消除这类恐惧心理的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告诉农民共产党有力量,即使不能消灭地主恶霸,至少也能威慑他们。看到新秩序有能力消除有报复可能的最直接的根子,农民就更有信心把自己的命运和新秩序联系在一起。

1946—1947年国民党进攻的后果

1946—1947年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那些失陷的地区,农民害怕的与干部担心的一切都变成了事实。这些地区正是延安电台所报道的通过土改最成功地动员农民的那些地区。

正如上文所述,抗战期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党的指示都一致号召在受到敌人直接威胁的地区要降低减租的重要性,把阶级摩擦减到最小。这一长期的实践可能是导致干部担忧不可能同时实行土改、游击战和后方支前工作的原因之一(参见本章上一节有关平分土地的部分)。但在1946—1947年间,相对的军事安全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前提条件已被放弃了。这一变化反映了前后两个时期在本质上的一个差别。抗战期间,减租斗争是在

不断壮大的根据地中巩固党的力量的一种手段。而在1946年，所有这些地区事实上都已成了政府大举进攻的目标。随着这些地方相继落入不断推进的国民党军手中，事关阶级斗争的军事安全条件已在突然间不存在了。

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在上述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在某些地方这一斗争至少已进行了两年。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为了反抗侵略者而与阶级敌人重结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总的来说，几乎不可能希望地主等斗争对象再与共产党联合，甚至在斗争中保持中立也不可能。由于共产党已在根据地内部树敌，他们别无选择，只有随着内战的发展而一举剪除它的影响。因此才有了1946—1947年间的深化土改运动，以及毛有关无论战事有多繁忙党的干部都必须根本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的命令。

但共产党的领导人没能区分已开展土改的地区与未开展土改的地区在军事上失去保障的不同之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土改的代价都很大，社会动荡，复仇不止，百姓蒙难。由于战局变幻莫测，也由于没能预料到1946年国民党进攻的规模，土改在前一类地区造成的后果是无法避免的。这里还没提那些在“一手拿枪一手分地”口号下进行土改的不安全地区。

下文涉及两种条件下的土改。第一种记录主要来自非共产党的上海记者对长江以北的苏北形势的报道。第二种叙述主要根据冀鲁豫地区的党内报告以及杰克·贝尔登的见闻。贝尔登在1947年初参观了这一地区。我们先说江苏。

苏 北

1946年初，这一地区有29个县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中央政府派遣约15万部队把共产党从苏北赶走。这次进攻于1946年7月开始，南起长江，西至津浦线。政府军向东进攻，直插把共区一分为二的大运河沿岸各县城。到第二年春，政府军占

领了苏北所有的县城。但是尽管政府军占领了运河沿岸的主要城镇，共产党游击队一直在破坏大运河和铁路线之间的政府交通线，而且运河的大部分地区仍留在共产党手中。

一位作家指出了1946—1947年间共产党在苏北的地位与其抗战期间的不同之处。国民党军队并不比日伪军强大，而共产党军队，无论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在组织、训练和经验上都比以前要强大得多。其次，日本人凭借自己的优势力量不仅占领了城镇和大据点，还占领了邻近地区和小据点。而政府军在农村却无法自由地调动。最后一点，共产党用了很长时间来发展向日军反攻的能力，而在国民党发起进攻后不到一年，新四军就开始收复失地。共产党的新力量，据说来自人民经过多年政治训练而提高了的政治觉悟，来自于保甲制的彻底破坏，来自乡村经选举产生的政权，还来自于土地改革。^[128]

不过，政府取得的胜利使所有的县级政府机关在国民党控制下得以重建，国民党地方官员回到自己的旧辖区，一部分逃亡地主和商人得以回乡恢复过去的生活。政府倡导的重返苏北运动在1947年春达到高潮，持续了约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这么说，地方官员和他们的盟友地主由于没有遵从南京为了指导他们在光复区的行为所发出的命令和规定，而上了共产党的当。

1947年初，上海的一个记者调查组在南通、海门、如皋、东台逗留了九天，他们回来时写的报道已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报道说，城镇一两里外的道路就不安全，共产党已经发起了相当大规模的进攻。他们行动迅速，避敌锋芒，这是由于他们在政治行动上取得了胜利。如果把“政治行动”视作共产党勃勃生机的一个来源，那么也应强调这也是对付国民党弱点的关键。《大公报》集中报道了土地问题，指出这一问题使农村地区出现了巨大

的分裂。在共产党统治下，土地分了富人受到迫害，连一部分中农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中央政府统治下，新收复的地区根本就没有土地政策，许多人对此不满。那篇文章总结说，看来政府与共产党争斗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夺回统治权力，而对其他的一切则毫不关心。〔129〕

一家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说得更明白。《申报》说，由于上上下下都“不健康”，苏北的国民党管理机关不能正常运转。县和村的管理权落在坏人手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要缴纳种种苛捐杂税。乡绅中的腐败分子和其他流氓利用当时的局势剥削和压迫人民。〔130〕苏北发生的一切就是地方官员和还乡地主联手进行有组织的勒索和报复。

政府官员实施的工作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自首忏悔”政策。积极分子和在工会、农会、商会、妇联等各种共产党机构中担任过一官半职的人都被逮捕，强迫忏悔。当时，不难在乡看守所看到七八十个这样的“投降分子”，而在区监狱内就能见到两三百个。这些人一旦被抓，就得写悔过书，再找一连串的保证人，然后上交武器。由于许多人并无武器可供上交，得到自由的代价就是一两黄金。如果拿不出黄金，主管官员就把这些人随意处死。黄金到手后，往往就落进官员的私囊，而不是用来武装自卫队——所谓的“此类罚款”的目的。

复仇事件比比皆是。某夜，泰兴县某村的官员处死了12个自首者。天亮时，村长叫来那些家属，让他们看尸体，并宣布这是共产党干的。而在另一起事件中，如皋县周家村已向政府自首的一百多人逃了出来，解除了地方官员的武装，然后杀死了包括地方官员和地主家属在内的约七十人。

此外，还乡地主还组织了“地方管理促进会”和“收租会”。地主假这些机构之威，在武装卫兵的护卫下，挨家挨户地向自己的

老佃户“算账”。地主本着以眼还眼的精神，开始为他们在中共手中所受的迫害复仇。如果农民不愿面对自己以前的东家算账而逃亡，那么等他回来时往往就会发现自己的住所被掠夺一空。地主还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重新开始收租。一些地主在士兵的护卫下收租，这便是“收租会”。1947年秋欠收，据报道，在部分国统区，地租加上土地税使农民不堪重压，部分农民甚至无法维持生计。〔131〕

南京中央政府为了使人民与中共断绝关系，特地为“绥靖区”制定了土改章程。但农民只能从经验中得知，而且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居然还有这样一个章程。〔132〕

至于共产党方面，他们起初严惩了那些向重返的国民党当局自首的人。但不久以后，共产党人采取了一个更为宽大的做法：鼓励人民“自首但不忏悔，再参加新四军”。

冀鲁豫地区

这一地区的党的报告对国民党越过陇海线北进晋冀鲁豫边区后虽有区别但却类似的局势提供了内部看法。区党委在一份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的5个月总结中透露，共产党在国民党开始进攻时拥有的35个县城，已有24个被政府军占领，在64个安全县或其中的部分地区中，有49个被占或至少部分被占。1947年1月，共产党重新占领了14个县城、22个县，并歼灭、击伤或俘获了8,000敌军，但国民党军队很快又占领了其中的大部分地区。〔133〕

地方党组织中充满着悲观情绪，许多人由此认为党在分区内的根据地实际上已被扫清。11月，分区党委竭力振作已普遍低落的士气，他们宣布民兵与正规军并未受损，并已在边区内消灭了敌军8个旅。由于蒋介石已将80—90%的兵力投入前线作战，他已没有补充兵力了。区党委宣称：“只要我们振作精神，不

断消灭来犯之蒋军，我们就不仅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一定能从防御转入进攻，收复我们所有的失地。”〔134〕

士气低落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国民政府收获甚丰；第二，这些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情况。分区党委写道，最初大家都认为政府军向北不会越过陇海线，但事实却相反。起初，人们认为一两个战役就能打败敌人，但形势却并非如此。共产党军队后退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按计划暂时撤退。但在几个月的等待后，敌人仍占领着这片土地。因此党委在11月决定必须修改计划，准备一场长期的游击战。这就带来了第三个问题。干部们最担忧的是抗日游击战与反蒋游击战的差异。后者是一场阶级战争，所有的地主和斗争对象都是敌人，这就为蒋提供了一个“广大的社会基础”。〔135〕

在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军队进攻下，共产党人采取了退却的原则。主力部队与大多数民兵、党的干部及其家属一起撤退了。例如，有七八千人在1946年8月第三、五分区沦陷之前从那里撤走了。这一生存战略对于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举足轻重，但以这种方式保存主力部队代价惨重。

物质利益、报复与依靠力量的退缩 从理论上讲，作为游击战战术之一的撤退应包括军事、政治机关与老百姓一起撤走，以保存人的生命与粮食储备。但在1946年，人们没有料到国民政府会进入这一地区，广大乡村并未作好突然回到游击战的准备。结果，干部和防御部队走了，手无寸铁的农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分之一的秋收作物落入敌手。

和国民党军队一起回到这些地区的是还乡团，这是一支由地主及其他想在农村恢复自己过去地位的人所领导的武装队伍。在江苏，他们开始算老账，夺回已分给农民的土地和粮食，杀害积极分子，奸污妇女，砸烂村组织，并迅速地在自己的地盘上

建立起国民党地方政权。

据杰克·贝尔登报道,到1947年初,在落到国民党军队手中的安阳县423个村庄中,共有4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到杀害。杀害这些人的方式与处决恶霸地主时一样残忍。活埋是这些地区普遍的惩罚手段,贝尔登听到有许多人就是这样被杀害的。在某个村庄,有位农民协助斗争了一个地主,并拿回了因还不起债而失去的4亩地。国民党军队回来后,他逃走了。为了报复,这个地主枪杀了他的妻子、兄弟和婴孩,又活埋了他的儿子、叔叔、侄儿与一个已出嫁的女儿。贝尔登调查到的最惨的一起报复案发生在一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个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带着15个武装分子回村后,在24户人家中每家杀了几个人。潘复生同志说,第三军分区9个县中有几千农民就是这样惨遭屠杀的。实际上,那个分区被回来的国民党军队杀害了近一万人。用了八九年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在几个月内被摧毁了。[136]

既没有干部的领导,又没有部队的保护,农民除了屈服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复仇的欲望虽强,他们却没有办法付诸实践。他们最怕的“变天”已经成了现实,结果就像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共产党的热情已经所剩无几了。在收复区,回来的共产党军队被农民们痛骂,因为他们丢下农民不管。农民愿意和个别干部私下谈心,倾吐悲愤的心情和复仇的欲望。但由于共产党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已丧失了领导地位并失去了耳目。农民们不愿意重建农会,也不愿组建新的民兵,甚至不肯参加群众大会,他们已不太相信共产党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区党委在1946年11月总结说:“事实证明了的撤退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再采取这种方法。”区党委因而决定要返回失地,在不依靠主力部队的情况下开展独立的游击战争,与农民

“同生共死”。分区和县党委得到指示要组建武工队和游击小组。新的指示是：“县里的不准离开县，区里的不准离开区，也不允许从任何地方后撤。”^[137]当杰克·贝尔登于1947年春季访问这一地区时，他发现只有安阳县刚开始由地方上的民兵开展游击活动，他没有报道其他地方的发展情况。

阶级斗争的强化 1946年11月是共产党撤退的高潮，为了平息对地主力量的恐惧，党宣告说阶级敌人尚未联合起来，参加还乡团的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大多数不相信蒋军能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坚持下来，因此不愿意去冒共产党回来后逃亡或被处死的风险。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中立，或争取使他们“和我们一起斗争”。^[138]当时，在蒋军威胁下的边区许多地方，正如我们所见，仍在正式鼓励和平的土地买卖与捐赠。

但到一月份，区党委的领导人已改变了这一做法。在一个有关边区反攻阶段（当时正在进行）收复区工作的指示中，区党委把复仇、清算和彻底实行土改列为主要任务，并把二分区的经验用作反面教材。二分区的党委集中力量在收复区搞安抚和重建工作，同时宣传要与阶级敌人结成统一战线。但是农民饥饿不堪，士气低落，他们需要那些被抢走的土地和粮食，要求赔偿损失。他们据说不相信有关反蒋统一战线的主意，不愿意参加在此基础上由共产党主持的村组织。“群众对我们失去了希望，因为我们没有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他们，而给他们的都是群众不想要的东西。”下文为党有关如何纠正的指示大要：

1. 支持农民报仇的要求。监禁那些杀害和伤害过农民的人。如果农民要求处决这种人，就杀一些。

2. 为牺牲的村干部、积极分子、农会会员和农民举行追悼仪式，说明他们是“在爱国自卫战中光荣牺牲”的，我们将为他们复仇。

3. 动员农民领回自己的土地和粮食。

4. 由于老的村组织已被敌人破坏,群众仍心存疑虑,因此不要立即重建农会、妇联等组织。可在复仇、清算和土改工作中重建。

指示的结论是农民自然害怕蒋军,但他们最怕的是村中的阶级敌人,“地主、恶霸、特务和坏蛋”。如果这些人受到打击和镇压,农民就会再次起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在收复的村庄中重建一个反蒋统一战线。〔139〕

第二步就是要在包括游击战在内的一切场合放弃统一战线的概念,到1947年5月,区党委已着手这么做了。游击战已不再是军队与军队之间的战争,在广大乡村,它是农民和自己的敌人之间的斗争。分区党委的解释说,我们起先在这一点上糊涂了,但过去的九个月教育了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提供一个和平共处的统一战线是根本不可能的。”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政府把冲突带进乡村,直接支持地方上的封建主义,使之成为一场阶级战争。乡村即使没有落到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手中,也落到了还乡的地主官僚手中,他们立即就着手恢复旧的反革命秩序。〔140〕

这就是党把土改路线(如上文所说)从1946年《五四指示》的“缺乏彻底性”变为1947年10月《土地法》激进的平均主义的前因后果。

阶级斗争和游击战争 在军事上得不到保障的地区把阶级冲突减到最小的路线已遭到破坏,共产党作出反应,命令要同时开展土改和游击战战争。新的论点(事实上它更是信念的表露)是如果游击战为土改服务,那么土改也该为游击战服务。先前能否坚持游击战或保证一个地区不发生游击战是发起阶级斗争的条件,但阶级斗争此刻却突然成了坚持游击战的条件。共产党现在教导:组织游击战的同时要彻底实行土改。我们的目的就

是镇压地主，发动群众。在农民起来向地主斗争的同时，我们要教导农民怎样挖战壕、埋粮食、设地雷、发展情报网以及坚壁清野。只要我们敢于让我们的部队推翻地主，农民就敢分地，保卫自己的土地。

这些地区的基本目标显然就是要控制住地主，这是重建和巩固乡村根据地的最重要的条件。1947年5月召开的游击战会议提醒说一个乡村的军事基础就在于“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控制住地主”这一条件，巩固就是使“农民在任何形势下都能管住地主”。在政府发动进攻期间取得的经验证明，只要巩固了乡村根据地，游击战争就能坚持下去。共产党宣称，我们必须彻底镇压地主及其走狗，不管作为个人还是整体，我们都要在经济、政治和组织上消灭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摧毁他们的反抗能力，确保他们不能也不敢发起第二次复辟，所以从党的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出现对地主的最激烈处理是毫不令人诧异的。

但区党委的领导人从字面上死扣把游击战和土改联系起来的政策，因此甚至在那些游击队“打了就跑”的地区，他们也提倡要重新分配土地。山东的西南角在1947年初有很多这样的地区。政府军两次进攻这一地区，共产党的主力部队也就撤退了两次。地主们回到城镇和乡村，在农民和干部中散布“恐惧、疑虑和慌乱”的气氛。济宁当时完全处于敌后，敌人防卫森严，李成阳（音）在谈到它附近的农村时提出疑问：“这样的地区还能开展土改吗？”“能”，答案是肯定并加以强调的，尽管这只是由一个对在此种情形下分地素无经验的武工队在一天之中完成的。^[141]

使用的方法并不特别讲究。在相对较安全的游击区，这一过程就是在每5个地主中，杀一个，关两个，放两个。得到自由的地主必须作出保证并写下悔罪改过书。^[142]在不太安全的地方，

即使这样的安排也不可能，济宁市的安居区就是一个例子。

安居的“阶级斗争”和游击战争 这个区位于济宁城西南，共有村庄74个，人口6万。政府军布置了几百名士兵，分守三个重要的据点。1947年初，济宁再次落入政府军手中时，安居区已只有“四五个”干部了，协助他们的是三个县干部和几个县级积极分子。安居没有任何自卫部队，只能依靠分区一支20人的武工队，后来以县公安局的10个人为核心组成了济宁市自己的武工队，与前者配合作战。

济宁重陷敌手三个月后，党的报告提到安居区仍在开展游击战，敌人的乡政权受到进攻，地方自卫队业已建成，保甲制被破坏，并再次开始征税。该区的74个村庄中，已有12个重新开始分配土地。

从党的报告来看，干部和武工队员已开始工作，方式很多，包括召开提高觉悟的会议，报告好消息，热情鼓励每个人，坚信胜利必将到来。党内外都召开了小组讨论会，干部们带头表态。他们开展调查，制定了有关组织、情报、宣传和军事工作的发展计划，其基本目标就是要切断敌人的粮食和人力的供应。为此，武工队首先打击保甲制和村公所，这是最迅速最有效地威慑乡长和保长的办法。某位乡长被暗杀后，其他乡长开始组建自卫团，工作队于此时传出口信：“谁参加敌人的组织我们就干掉谁，还要让他的家里人亲手毙了他。”为了证明这类恫吓不是虚言，武工队员绑架了一位乡长的儿子和儿媳，乡长已招募了一支8人小队。结果这位乡长第二天就派人传话，他将解散这支自卫队。

土改的方式也是同样的直截了当。工作队进驻村子后就简单地命令地主交出财产，为了迫使所有地主迅速顺从，他们打击了不少地主。工作队有时还化装成政府军，在分地后的几天里回

到村中考验地主。那些中计的人被杀了,据说这一招对威吓别的地主“十分见效”。

但如果政府军无法阻挡武工队进村,武工队同样也无法阻挡国民党巡逻队进村。济宁武工队在报告中总结说,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进展太快,未能巩固自己的地盘,而且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出于“群众的意愿”。^[143]

但到1947年5月,共产党的总战略已初见成效。敌人停止进攻,弱点越发明显,在占领的大片地区中兵力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区党委指出,虽然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并不强大,但敌军也不像日军那样占领着各个小据点。

与此相反,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已停止退却,并发起了一连串的小规模反攻。共产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已消灭了敌人90个旅,而一旦达到100个旅时,军事上的优势就会转向共产党方面。虽然在河南由于敌人增加了兵力将会出现更大的困难,但共产党已开始山东赢得主动,并在满洲掌握了主动,这是发起全国大反攻的序曲。^[144]

总结:土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

抗战期间,共产党在受到敌人直接威胁的地方对减租和阶级摩擦低调处理;而在1946—1947年间,军事上的相对安全已不再是发动阶级斗争的前提条件。这一变化反映了两个阶段的差别。抗战期间,减租斗争是共产党在不断壮大的根据地中巩固党的力量的一种手段,而到了1946年,几乎所有的根据地都成了国民党进攻的目标,随着各个地区先后落入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手中,实行阶级斗争需要军事保障这一条件顷刻消失了。

低调处理土改并在国民党的进攻下与阶级敌人结成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由于已在根据地内部树敌,共产党别无选择,只

有随着内战的发展完全消灭敌人的影响。于是就有了1946—1947年间的深化土改运动,以及毛于1946年10月对党的干部发出的指示:无论战事有多繁忙,都必须迅速“解决土地问题”。

然而由于在辽阔的战场上被剥夺了必不可少的军事上的保障,共产党的领导人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们没有区分已实行土改的地区与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在军事上失去保障的差异。据一位当时生活在晋冀鲁豫边区如今已成为干部的人说,在游击区试着开展土改的政策是错误的,以后这一政策也受到了批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些得不到共产党军队足够保护的地区,土改后的报复行为使群众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

第二个原因肯定是粮食减产。那时,党的领导人强调战争并不只是一场武器与人的竞赛,同时也是财富的竞赛。在游击区,地主和农民彼此疑惧,对前途忐忑不安,结果土地都抛荒了。区党委把这一现象称作一个巨大的危险,也是一个直接影响在军事上取胜的主要问题。1947年春,这些领导人为游击区抛荒地数目不断增加感到忧虑。〔145〕

此外,这些损失显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但如果共产党人反攻失败、军事形势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持久游击战的话,那么这一论断无疑会改变,就如同土改政策本身的许多特点也会发生变化。与苏北相同,安阳县的土改运动在国民党回来前就已进行,并于1947年春开展了游击战。贝尔登认为,游击战最初是由农民想要保卫土改成果的愿望激发的。如果这种农民地方武装能够像抗战期间那样得到正规的训练和领导的话,那么一场类似的游击战就有可能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围绕着阶级斗争发展起来。

但是1946—1947年间,共产党的主要目的是保存正规军和党组织,以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反攻。所

以,安阳县和安居区在1947年初并无共产党军队,而中央政府却依靠共产党在运动斗争中所树之敌的帮助重建了政权组织。还乡团的报复行为如同清算大会一样,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军事、政治条件固然能提高阶级觉悟,但同时也能使部分地区的农民士气低落,行动消极,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就揭示了这一点。除非干部们回来重建一个最低限度的游击战基础,否则农民们提高了的阶级觉悟就不会发生作用。

武工队和民兵的地位即使在这个阶段也并不稳固,所以下一步工作——对地方上有权势者进行威胁——也只能通过隔离、绑架、暗杀等恐怖主义手段来完成。这一切本来不用把手无寸铁的农民卷进来(一些地方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为了在国民党后方的村庄中发起土改,人们却这样做了。结果因为武工队无法在那些地方常驻以保护土改获益者不受卷土重来的国民党部队的迫害,那些尚未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农民就受到了报复。上文提及的新华社多篇报道中,有关在国民党进攻地区开展土改的实践也莫不如此。

如果国民党没有在1946—1947年间突然侵入共产党在华北和华东的主要根据地,抗战期间学到的经验就可能不会被抛弃。1948年5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承认,要想胜利实行土改,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保护土改不受敌人破坏的能力。毛于此时发表的指示基本上又回到了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评判标准,默认在安全没有得到足够保证的情况下推行土改是错误的。^[146]这便是本章引言所提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即共产党开始向南挺进到那些租佃制远较北方盛行的地区时为何暂停实行土改。土改对于动员农民支持中共可能是十分重要的,但不管在什么地区,只要有某些前提条件未能满足,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党的 1948 年指示重申了这些条件：1. 一个地区必须在军事上得到了保障，完全消灭了敌军，不可能再回到游击战争。2. 必须是基本群众中的多数要求分地。3. 应有足够数量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土改干部领导工作，不允许群众自发进行。这一指示清楚地指出，在尚未稳固的新解放区这三个条件并未完全达到。它强调，临近国统区的地区尚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因而不能进行土改工作。

河南一份地方报纸的社论，说明了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的重要性：

我们有没有在华中的新解放区完成准备工作？显然，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在我们一些新解放区中，大部分农民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总的来讲，农民的政治觉悟尚未提高，革命信念尚不牢固。他们虽然穷，却不明白自己为何贫穷；他们虽然需要土地，却没有坚定地理解土地为何应分到自己手中；他们满腔热情地拥护人民解放军，却尚未下定决心要长期站在解放军一边；他们真的痛恨国民党的统治和蒋匪的压迫，但对推翻蒋的统治、消灭他的基本部队尚抱有许多疑虑。在组织上，这一地区尚未建立真正的贫雇农和中农的农会，尚未大量招募群众干部。[147]

尽管如此，在游击区和新解放区实行土改仍是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不能把在三个前提条件尚未具备地区实行土改会产生许多负效应的结论，误解成对其他地区土改工作的评价。

首先，我们需要指出分地工作未能做到的事情。在分地后的短期内（此处我们只注意这个时期），增产不可能包含在土改成果中。毛在 1934 年提到共产党人首次主要的分地试验时写道：土改往往会导致暂时性的农业减产。这一评论下有一注解解释道，人们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来确定土地所有权问题，彻底建立

新的经济秩序,因此开始时农业免不了要减产。在这一尚不稳定的过渡期,农民“还不能把思想完全放到生产上去”。^[148]考虑到1944—1948年间伴随土改而来的混乱和不稳定局面,共产党的战时经济问题完全不可能是由农业增产解决的。^[149]

但是毛还写道,在1946—1948年间党“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150]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土地和财产的重新分配是和1945—1947年间的军队征兵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分地分财对胜利必定有所贡献。然而,党内的批评也表明,这一过程可能不像新华社所说的那样简单。

那些为保卫自家土地而参军的贫农青年是楷模,他们的形象在各地宣传,用来激励他人。但即便如此,仅有模范的形象不足以消除农民对参军和离开新分得的土地的不情愿态度。此处引用的数字并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自动响应党的号召参军不是出于对新秩序的信奉就是出于对地主报复的恐惧。相反,证据显示对报复的恐惧心理是让农民接受土地必须克服的首要障碍,并且地方干部为在分地后立即要求农民参军而感到难堪。因此,土改的意义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

共产党的确要求“拥护”,也的确如愿以偿,这是对财产分配所提供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的回报。不过,土改斗争还使共产党得以从制度上确保把这种刚开始萌芽的阶级觉悟转变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特殊拥护。在这一点上,土地革命的基本环节就是推翻现存的农村精英阶层。至于这个阶层是否真的封建,是否由每个村庄的地主组成,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这场斗争运动通过斗倒许多斗争对象,摧毁了统治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垄断,这是创建一个新的农村权力机构的必要步骤。

新秩序的建成是土改作为“其他一切工作之母”的真正成

果。在形式多样的控诉运动中，表现最为活跃的农民成为共产党的新成员，并成为乡村的新领导，分得了土地和浮财的人们加入到农会和其他乡村组织中去。正是这些由农民自己掌管的公共机构成为共产党依靠的对象。它们承担了征收粮食税，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在征兵运动中向不愿意参军的农民施加社会压力的任务。

土改的这一结果回答了本章引言中提出的主要问题，这些就是共产党在农村扎下的“根”。只要条件允许，这些根就能保证粮食、人力的稳定供应，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战。

进两步、退一步：巩固与整顿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6 年 11 月参观了晋冀鲁豫边区。她得知边区官员（其中许多是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是无薪金的，只有一天两餐，一年两套夏装和 1/3 套棉袄，以及农民屋里的简陋设施。一天晚上，在与边区政府的一些首脑人物共进晚餐时，安娜说起她的美国朋友很容易原谅国民党官员臭名昭著的腐败，因为他们的工资太低，不贪污就无法维持日常开支。这时在座的人都笑了，其中一位反驳说：“这并不是他们贪污的原因。国民党官员不得不贪污，因为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个既努力工作，又不肯贪污人民的钱，蒋介石就会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抓起来。”^[151]

这个笑话使得人们不容易看清共产党官员在传奇般的紧密团结基础上所努力进行的工作。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就是共产党在 1947—1948 年间的整风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要检查基层党员和工作干部在执行土地政策过程中有无贪污行为。与国民党有关改革和自我革新的反复声明不同的是，整风运动并不是一个保住面子的姿态。这场运动于 1947 年开始，此时土改运动的主要问题仍是反对右倾错误，并正处于最激进的平分财富

阶段。《土地法大纲》制定后不久,根据“群众运动的规律”,重点就转移到解决“左”倾问题上。党的整风运动在这一阶段继续进行,并与巩固土改成果和纠正过火行为的运动齐头并进。同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内开展了一场思想教育运动。〔152〕

右倾问题 正如平分土地一节所示,党的领导人已经把整风运动看作解决1947年上半年若干右倾问题的灵丹妙药。九月的全国土地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土改运动的成果以及迄今为止遇到的困难,为了和前一阶段的结论保持一致,会议把困难都归咎于那些混进党内,尤其是地方一级的“地主、富农分子及坏分子”。他们的错误包括贪污、吹嘘拍马、搞裙带关系、自高自大、谋求个人私利、偷窃公共财物。因此,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被视为妨碍彻底进行土改的两个主要问题。土地会议除了通过《土地法大纲》之外,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在全党开展整党运动,从而把在部分解放区实行的这一运动推向了全国。

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后,各地区也召开会议讨论《土地法》和整党。在此期间,解放区党的各级组织也纷纷召开会议,传达指示、了解情况、培训本地的党员和干部。晋冀鲁豫边区有1,700人在太行山区的冶陶开了85天会。边区土地会议的内容包括检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出身、思想和行为。一批党员因违反党的土地政策受到惩罚,其中至少两人因此而被开除出党。〔153〕

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回到各自家乡,召开农村土地会议,参加者为所有的县级专职政工干部。在山西潞城县,1948年2月整个月都在开土地会议。每个与会干部都要讲清自己的出身,对自己过去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一部分人因为自己的缺点受到了警告和暂时停职的处分,其中还有被开除出党的。大部分人在会议结束时已准备好回去纯洁各村党支部,彻底平分土地。这些经过再教育的县级干部组成了工作队,被派往该县部分具有代

表性的村庄去进行调查和土改。〔154〕

晋察冀边区报纸在1947年11月下旬至12月的一系列社论,说明该边区也进行了类似的运动。10月中旬约有1,000名地区领导开会,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土地法》和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这个边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主要问题就在于开始时未能彻底开展工作,使得许多穷人无法甩掉封建的枷锁。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公布了干部、党员的错误,以便治病救人。为了肃清党员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在对现有党员的调查结束之前不进行新党员登记。所有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其工作都受到了仔细的检查,以鉴定他们是否破坏了土改,尤其是那些家人和朋友中有斗争对象的党员。

1947年一项重要的新措施就是上文提及的把整党运动向村民公开。村中所有党员的姓名要公开,犯过错误的干部和党员要公开承认错误,接受群众的批评。那些私吞本应分给穷人的没收财产的干部和党员,被迫将这些财产还给人民。犯有更严重错误的干部则被开除公职,接受应有的处分。有篇社论甚至宣布应由村民自己选举干部,由贫民团和农会调查村中党员,并向党建议开除坏党员。〔155〕

北岳区党委在召开土地会议时,邀请了非党员的贫雇农参加。同样,阜平县委召开土地会议时,也在各村寻找贫雇农代表参加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与会的农民在开始时都十分犹豫,但后来就踊跃发言。据报道,一些干部在自己的错误、缺点被当众揭露时流泪了。据说边区中央局召开地方党委会议时,彭真同志作报告前亲自听取了非党员农民的意见。

这一由刘少奇提倡的吸收党外群众以纠正党内问题的做法显然获得了成功,因为1957年整党及其十年后斗争刘本人时都使用了这一做法。但在1947年,这套做法并没得到晋察冀边区

党员毫无保留的热情拥护。他们问道，既非党员亦非干部的人怎么可以参加整党会议？但边区的报纸劝告说，我党的原则清楚地规定了我们要保持和群众的密切关系，不能把自己和群众隔离开来。因此当我们平分土地和整党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让贫雇农参加党的会议呢？这家报纸继续写道，当农民讨论《土地法》时，他们谈论的全是村里的事情，你们党员可能会觉得他们离题太远，但实际上，这是对你们的教育。他们告诉你们的都是些在以后贯彻《土地法》时将会很有用的事。你们只有听取了当地群众的意见，才会懂得哪一条适用于当地情形。〔156〕

在晋察冀的各个村中，土地大会或土改和整党会议从理论上分为三个阶段：1. 村党支部全体会议，2. 村全体贫雇农大会，3. 全村大会。过程如下：

干部工作队进村后，召开村党支部大会，向地方上的党员简短地介绍平分土地和纯洁党员队伍的新政策，指示党支部今后应确保由贫农团和农会作出的决定得以推行，并建议解除那些受到农民反对的党员在村中的职务。村中所有不在贫农团手中的武器都要交给上级单位，彻底调查结束后才能发还。

党支部会议后，工作队的干部们就要召开村里全体真正的贫雇农大会。村里原有的村干部和党员都不得参加。会上，由工作队的干部解释新《土地法》的主旨以及实施土地法的方法。根据情况重建或新建的贫农团和农会将成为村中的统治力量。

最后，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向所有的人解释《土地法》和边区政府的公告。重点是解释新的原则——村中一切重要事务在行动前须经过贫农团和农会的讨论和批准。要让每一个村民懂得必须遵守这些团体的决定。

当然，事情总的进展并不如上文所示这般顺利。许多地方“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群众”，取得了胜利，受到祝贺。但许多地

方情况恰恰相反。到12月底时,据报道某些地方在一天内开完了三个会议。据说某县有一个干部单枪匹马,只用了几天时间,在六七个村庄中组建了贫农团和新农会。在另一个县中,党组织宣布这是正常的过程。来自许多不同村庄的报告说明,土改和整党的确是用这些方法进行的。最后,据说在某些地方“坏人”组织了假贫农团(团中有非贫农、雇农和下中农),农会中则混进了仍在进行剥削的中农。〔157〕

边区的报纸警告说,每个人都必须注意这些问题。假贫农团的出现促使我们仔细审查所有的贫农团,一些要解散,一些要重组,坏人要清洗出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责任主要在地方党的领导人身上。据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类型,每一种都能导致运动的失败。对土改十分热心的好同志属于第一种。不合适的计划、准备工作不足和某种程度上的冒进损害了他们的工作。这类领导人基本上不能发动群众,不能使农会进入正常秩序,或是不能准确地划分阶级。第二类同志是个人主义者,基本上只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名誉。这类人把命令强加给农民,向上级递交假报告,损人利己。第三类就是地主富农,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夺权,暗中破坏土改。〔158〕

“左”倾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晋察冀的报纸还列出了一个新问题,并把它摆在了第一位。整党运动开始时,人们认为主要问题是右倾:成分不纯和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之类的工作作风问题。社论对自发热情的批评是土改和整党运动发生大转折的首批迹象之一。1948年1月这一转折已变得极为明显,当时,干部队伍突然更换,“左”倾问题成为注意的焦点。人们仍在批评老的右倾错误,但主要精力已集中到一些新问题上。毛写道:“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159〕

《土地法》颁布后三个月,该法最极端的条款之一,即平分农村土地与财产,就为照顾中农而作了修改。如果中农不同意平分土地,应允许中农保留比贫农平均所得更多的土地。〔160〕

迄今我们仍不清楚为何在这一时期进行修改。要么由于他们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偏向,要么是因为信息闭塞,党的领导人在1947年秋可能尚未完全认识到那些促使1948年1月发生转折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整个1947年都在发展。它们并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1947年《土地法》颁布后出现的过火行为的结果(这是某些作家的看法),因为《土地法》就像《五四指示》那样只是正式确认了一条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的路线。此外,地方上的党的领导人早在三年前就已至少承认了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对中农的侵犯问题。

由于缺乏可证实党内在此时发生争论的资料,我们只能把1948年1月的转折看成是在1946—1947年间土改最激进阶段出现的全部问题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1月,党的领导人似乎仍在摸索一个可以解决农村所有困难的一揽子方案。党中央在制定土改总路线时似乎正处在1945年黎玉警告山东干部时提及的阶段——一个需要正确判断何时该结束一个时期并开始一个新时期的承前启后的阶段。不应太早寻求联盟,但也不允许斗争持续到产生反作用的时候。1947—1948年冬季群众运动的发展摇摆不定,1948年2月22日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两条主要政策路线同时出现的方式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印象。2月22日的指示通过区分顺利完成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地区与未完成的地区,系统化地转变了土改和整党工作的方式。

关于党的土改路线转折的第一个态度明确的发言,是任弼时在1月12日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在1947年圣诞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毛作了一个报告,提

到了许多事情。毛提出必须倾听中农的意见,如果他们反对平分土地的话就向他们让步。他还警告说,在划分阶级成份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中农错划成富农。^[161]但这个议题在党的正式文件,甚至在《五四指示》中早已涉及。毛在报告中重申,党仍应把满足贫农要求作为土改最基本的任务。他还指出,各地虽已执行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但基层的工作作风问题和党的阶级成份不纯问题仍未解决。

尽管如此,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仍具体讨论了土改和整党运动。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毛在三周后的1948年1月18日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为酝酿中的土地政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强调“左”“右”两种倾向在党内同时存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方针必须依据具体情况而定,由此他掩盖了从重视右倾错误到重视左倾错误的突然转折。此时土改中发生右倾的危险被认为主要存在于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的地区。

但是显然他最关心的是“左”倾错误,这反映在他概括出的新路线(这一路线将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实施)的主要特征中。毛把“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称为是错误的,坐江山的应是雇工、贫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他进一步解释了这一问题,依据是一项旨在避免冒进和冒险倾向(尤其是对待中农问题上)的具体政策。对定错成份被当做富农对待的中农,应一律改正,他们的财产应尽可能还给他们。富裕中农的财产不经本人同意不得没收,不得把中农排除在农会和农民委员会之外。

说到如何对待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时,毛认为以前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是正确的,仍应继续。同时,土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分配土地、粮食、牲畜以及地主的农具和富农的多余财产。不应在寻找这些人藏匿的其他财产上耗费不必要的精力。

毛最后谈了两点。这两点虽然符合新的反“左”倾的路线,但都是前一时期整顿工作作风时遗留的政策。第一点明确要求停止乱打乱杀。“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毛看到不这样做党就会脱离人民,陷于孤立。他进一步坚持要按土地法规定的由人民法庭审判嫌疑犯的条款行事,死刑的判决只有在县级或分区一级的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第二,毛强调尚需与犯错误的干部、党员以及混在工人、农民中的“坏分子”作斗争。应当向所有人宣布,群众不但有权批评干部和党员,还能将他们撤职,并建议开除党籍。〔162〕

任弼时1月12日的发言基本上是对毛1月18日指示要点的详细阐释。任指出了困难的实质,这些困难导致党采取了“坚固地团结中农”的新姿态。他说,当我们与日军作战时,中农对我们的工作贡献甚多,在这场与蒋介石的战争中,他们也正这么做。“现在我们的解放军有30—40%是中农。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他还指出,在彻底平分土地的老解放区,大多数人民都已成了中农。合作化工作和经济的发展因而就依赖于这些新、老中农,他们的生产经验再加上他们拥有的农具,使他们成为农村地区一种宝贵的资源。但他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对待,相反,我们却有证据说明在所有的解放区中农的利益都受到了侵犯,结果导致中农疏远了共产党。任批评这一倾向“非常危险”,是“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个事例。

许多地方都把中农错划为富农和地主,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被剥夺了,有的人还挨了打。任引用了山西省(位于晋绥边区)兴县蔡家崖村的事例。这个551户的村庄中,约有50户被错划为富农或地主,这50户中多数为中农,也有几户为贫农。

其次,贫农不仅成为土改运动的领导骨干(这是正确而合适的),往往还包办村中的一切,这就不对了。没有一个中农被选为

农民代表会的代表,也不允许中农参与事关划分成份、分配没收的财产、分派公务、征粮等重要问题的决定。

第三,最重的负担中如公差、征粮往往摊到中农的肩上,他们对被迫承担村中最重的负担,自然颇有怨言。任弼时强调由于土改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如果不想让这一成就在混乱、敌意以及党失去拥护的情况下丧失,如果不想发生完全倒向敌人阵营的事情,那么就必须纠正过火行为。

任还详尽地讨论了今后将要应用的标准。党为进行调查重新发行了1933年有关阶级分析的两个文件,任对文件的主要论点进行了解释,并作了一些修正。^[163]中央委员会的新决定允许把那些收入的25%来自剥削的人划为中农,这个指示说明了党与中农妥协的诚意。1933年,这一数字只定在15%,其他的劝告与命令包括最近阶级成份的变化,中农在农民代表会中的地位,以及公平分摊捐税负担的必要性。

任还解释了保护工商业的必要性,包括那些既剥削生产者又剥削顾客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绝对不能重复以前的错误,例如当共产党军队进驻陕北神木地区高家堡时,连小商贩的也没收了。结果,市场完全崩溃,人们只好偷偷地溜到野外买卖必需品。任警告说,在政府的贸易公司尚未普设商店、合作社也办得不好的情况下,这么做无疑是一种自杀政策。

最后,任和毛一样,用一些篇幅谴责了乱打乱杀和使用肉刑作为惩罚手段的现象,这一切在土改过程中都被广泛报道。但是,任进一步扩大了暴力问题的范围。他批评干部动用武力对待老百姓,就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现在既然群众将参与调查,参与批评地方干部和党员,以前挨过打或受过伤害的农民就有可能还以暴力。他警告说,在审查大会开始前,我们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不能再用暴力,将来任何一边都不得报复。^[164]

新的综合

中央于2月下半月发布了《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1948年2月22日),使两条政策路线正式融合。^[165]这一指示与任的发言以及修改过的1933年关于阶级分析的文件、三篇对土改和整党典型经验的总结一起作为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基本文件传达。^[166]毛本人在一短文中,指示有关三个事例的学习资料要发到每个农村干部手中。他写道,这些事例比党中央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宝贵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167]

土改的巩固

《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正式修订了《土地法》第六款制定的绝对平分土地的原则。此外,这一指示还澄清了从基本满足贫农需要到重点安抚中农的转变所导致的混乱,这是通过区分已基本完成土改地区与未完成地区来达到的。在土改未完成地区,贫农的需要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有了一这基本的划分后,共产党就可以用更为系统化的样式来说明今后土改和整党工作的进程。这一指示概括了老区半老区现存的三种典型情况。

类型一、二 第一种情形,土改较为彻底地开展,中农和新中农已成为农村人口的多数,占50—80%。贫农(包括那些尚未完全分得土改胜利果实的人和被划为贫农的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0—40%。这类地区,应认为土地已平分,任何遗留问题都不可以用如重查和重分那么严厉的方式来解决。即使必需从新富农和富裕中农中匀出土地给贫农,不经田主同意也不应执行。

第二种情形,清算斗争和《五四指示》业已实行,农民已动员

和组织起来,但土地尚未彻底平分。这有许多原因,例如领导不善、党内不纯、官僚主义以及战争情况。在这样的地区,贫农占多数,为农村人口的50—70%。老地主和老富农仍留有超出中农平均水平的财产。除非出于多数村民的要求,否则不宜再搞一次土地重分。但土地和财产要尽可能公平地重新安排。采取这一谨慎做法的原因如指示所说,是因为地主和富农手中的土地往往并不能满足贫农的需要。现在的政策不鼓励从中农手中抽地,除非中农的地是同村贫农所有土地平均数的两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征得中农同意后才能抽走不超过其土地总数1/4的土地。

在组织上,安抚中农的努力可以从贫农团重要性的下降中看出。上文所述的第一类地区尤其如此。那里的新中农已成为统治阶级,贫农团并未撤消,但已成为更具广泛性的农民代表会中的贫农小组。而在第二类地区,贫农团仍具独立的领导作用,并予以维持,但允许新中农参与其工作。但在这类地区分地工作结束后,贫农团也应向农会中的贫农小组转变。

个案研究 为解决以上两类地区中的典型问题,中央建议各地学习陕西绥德县黄家川的经验。黄家川有75户人家,约333人。到1948年初,土改多多少少已顺利完成。就数量而言,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村中已没有无地户。但在41户中农和31户贫农之间仍存在不平等之处。因此,《土地法》颁布后,这个村展开了土改调查,以解决这两个群体间在土地数量和质量上的小差别。这一过程用了21天。前9天用来重新调查和登记土地,这一工作就是五位在土地问题上很有经验的农民仲裁人每天与二三十位农民一起下地调查,特别注意土地的质量、肥瘠程度以及与村庄的距离等问题。

基本调查完成后,又用了7天时间重分土地,把一些农民手

中的多余土地匀给那些最缺土地的贫农。从已降为贫农的三户老地主家中取得了十七垧地(当地一垧约合三亩)。但即使加上公地和合作社地,这点土地仍不够分。这时,中农对此不太热情了。这一现象变得明显后,工作队的干部就挨家挨户地启发中农谈心诉苦。干部们向中农解释党的政策是帮助贫农联合中农,不会强迫他们违心交出土地,以减轻中农的恐惧心理。然后欢迎那些有富裕土地的人们自愿交地。

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17户中农交出了几垧地,但一些有多余土地的家庭又退缩了。工作队的干部牢记毛不准动用武力的教导,组织了持续三天的讨论会,每个人都批评黄维治和黄宪曾自私,这两个中农有多余土地,但都不肯交出。另一个中农黄明亮,同意交出一些土地,但不久又后悔了,农会允许他收回。这时黄家另一成员放弃了土地,又被他拿回了。最后,村中积累约55垧地,多数分给28户贫农和8户中农。此后又用5天时间公布复审和修正,然后就宣布土改彻底地令人满意地结束了。[168]

第三类 第三类情形,土地改革工作或是进行得很糟,或是(例如在一些收复区、边沿区)根本未开展。如果这些地区的安全有保障,就应彻底展开土改,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多余财产。只有当一个中农的多余土地不超过一般农民平均数的十分之一时,才能允许他保有这些土地。但中农的土地只有经他本人同意后才能抽走。村中土地如不够,那么大家庭中人均土地拥有量可少于小家庭。要把土地分给广大贫农群众,但“决不能犯同意绝对平分土地的错误”。[169]

整 党

《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在基层整党这一重要问题上,推荐应广泛采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所使用的方法,这就是要把整党与巩固土改联系起来,包括由农民对党

员及其工作进行公开批评。毛泽东在推荐这三个学习典型时，认为刘少奇是总结平山县整党经验典型事例的作者。〔170〕

整党是必要的，因为乡村中仍有一部分党员利用自己的职权伤害农民，他们的所作所为否定了土改的成果。不过基层整党不仅在乡村开展，也在城镇、工厂、学校、军队等其他组织进行。要想成功地采用这一指定的方法，需要有个前提条件——强有力的上级领导和基层支部中的优秀骨干分子。如果后一条件不存在，党的上级干部就要解散支部，直接动员群众，依靠贫农团、贫农小组和农会开展土改，批评地方上的党员，并最终重组地方支部。

到1947年底，平山县的土改不管多少总算是成功地进行，但这个县也不是没有问题。各种纠纷动乱的迹象层出不穷。部分乡村的农民自动起来向坏干部和坏党员作斗争，干部挨批挨打。而派驻农村的工作队的行为往往使事态恶化，一部分人顽固地把土改和整党割裂开来，还有的人用各种手段阻挠解决地方问题，甚至把农民反对的人调到其他村庄了事。

然而，1947年9月有关土改和整党的决定发表后，人们为执行这些政策做了认真的工作，尤其是在老区的各个县。最初，村党支部关起门来调查阶级出身和工作作风，但不久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地方党支部先向非党贫农、再向中农公开了各种会议。往往有二三十个党员和七八十个非党农民参加一个审查会议。这种方式保证每个地方党员的工作都是在村民的密切监督下完成的。

刘少奇写道，以往基层党组织的秘密性使个别党员得以把党组织与当地人民隔离开来。让党公开接受人民的批评的确是一件需严肃对待的事情，但这种民主整风运动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共产党如果尊重农民，倾听他们的冤情和意见，非

党农民就会更尊重共产党；其次，公开的审查大会的批评精神有效地化解了许多农民想报复曾错误对待他们的人的愿望；第三，一旦共产党宣布愿意严格约束党员，解决重大问题，这就会鼓励农民向党吐露所有的疑虑，从而给党更多的机会了解农民的内心想法，作出合适的反应。

刘总结说这样就能使地方上的党员学会接受批评，在适当的时候纠正自己的错误，更加深入地教育和发动群众。更为重要的是，群众就不会片面地寻找干部、党员的缺点与错误。

过火行为的作用

韩丁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土改和整党工作的事例。他对山西潞城县的观察说明在实践中开展这一工作有多么困难，哪怕党中央已为所有典型问题制定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党中央2月22日指示中有关土改三类地区的区分，潞城所在的晋冀鲁豫边区早在2月上旬已概括地提出，并显然是那个月召开的潞城县土地会议的指导路线。^[171]

韩丁所观察的张庄，属于土改尚未彻底执行的三类村。干部们采用了他们认为合适的贫农路线开始扫清右倾错误。首先是清除党内阶级不纯的现象，处分那些滥用职权的干部和党员，重新调查并尽可能地平分土地和财富。但这一切在不久以后就突然转为批判“左倾冒险主义”。

转折发生在4月，该月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172]这一指示说：①纠正对中农的过火行为，退还他们的财产。②“扫地出门”（没收恶霸地主的一切私有财产）只应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教育措施，应允许这类人保留他们谋生的资产。③废除对人民民主权利的极端限制。④只有人民法庭才有权判处死刑，死刑应执行枪决；今后所有肉刑及体罚都要禁止。⑤所有的工商业，包括地主和富农在城市和农村中拥有的工

商业,都要保护,不能清算、没收和分配。

在潞城县,工作队的干部被迫承担起这一突然转变的大部分责任,承认两个月前他们自己低估了土改的进展。4月份的县土地会议上,村工作队受到批评,说他们过于强调满足贫农的一切要求,忽视了中农的利益,把基层的党员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在每一户都依据党的标准重新划分成份后,对中农的所有非法侵犯都给予了赔偿。〔173〕

潞城县和整个边区同时转向批判“左”倾冒险主义,说明“左”倾的基本责任实际上并不是工作队干部的。以下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结论:此边区的转折比毛把“左”倾过火行为视为中心问题要晚三个多月。有人可能会说党中央在晋冀鲁豫边区体现自己的权威、推行它的路线方针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另一更为可信的解释是,边区领导人要使之符合边区本地的条件和发展群众运动的辩证法,况且这一过程在党中央2月22日指示有关土改三类型的论述中就已说得清清楚楚了。在第三类地区,即土改尚未彻底开展的地区,党中央对基本平分村中土地仍持认可态度。

毛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矫枉必须过正”。〔174〕这是人们所能找到的对“群众运动规律”的最简明概括,它贯穿了1940年代的群众斗争和土改运动的始末。彭真、黎玉甚至中央自己都指明了右倾是运动起始阶段的最大障碍,在开创新的团结稳定局面之前必须用“左”倾路线来对付它。

对党的领导而言,最严重的错误既不是极右也不是极左,而是对何时结束一个阶段开始另一个阶段作出错误的判断。黎玉在1945年告诫山东干部,发展群众运动的关键就是要正确判断这两种倾向与本地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如果过早开始和平联盟,就无法克服地方上的抵触,结果农民就无法站起来,局势就

会变为彻底的失败。1945年山东过火行为的作用就是把减租运动转变为一场真正的反对“封建势力”的群众运动。毛与此同时写了有关发展中的减租激进主义的文章，其中提到这一阶段发生的过火行为都可在以后予以纠正。

试图平分村庄中财富的决定(如《土地法》第一版所制定的)就其绝对意义而言是错误的,但它是土改“左”倾阶段的一部分,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还在2月22日的中央指示中得到了基本的肯定。它规定在尚未开展土改、农民尚未动员起来的地区,只要条件许可就应该彻底(如果不是绝对)平分土地。这类地区的中农允许保留比贫农略多一点的土地,不经主人同意不应收走多余土地,但该指示并未说明——正如华东局在1947年年中所做的那样——绝对不能动中农的土地。在土改已彻底展开、土地已分给村中贫农的地区,要保持最大的努力来安抚中农,把他们吸收到村中的管理组织

中共的主力部队别无选择,日本侵略初期他们只能局限于华北一隅。为了建立一个抵抗侵略者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放弃了旨在动员农民拥护、破坏农村现存权力机构的激烈的没收和分配土地方法。减租作为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使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两难问题——或者去寻求新的把财富从富人手中转入穷人手中的方法,或是不定期地暂停自己革命党的身份,选择前一种方法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因此得以保全了党的本质,同时又增加了自己在华北这一租佃制并不是主要问题的地区取得胜利的机会。

作为寻找均贫富新方法的结果,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到1945年已发展到通过清算老账为华北“基本群众”谋福利的范围。除了分配斗争果实进行物质刺激外,共产党还解决了显然被全体农民视为最直接的苦难——腐败以及对农村中政权和社会地位的强占。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有关诸如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无偿雇工、债务问题时,共产党人找到了即使在地主问题不为村民所关心的地区“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公式,这是共产党在抗战中学到的革命第一课。

第二课事关推行这一公式的过程。因为中共不但发现了摧毁农村经济、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争取农民拥护,创建一个新权力系统的方法。他们学会了怎样把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作为中心工作,即“其他一切工作之母”。正如潘复生所言,抗战初期每个单位都各自为政,互相间既不协调,也不区分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在学会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之前,共产党人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山东,黎玉把斗争运动说成是包括党建和征兵在内的其他一切农村工作的起点。

抗战中学会的重要的第三课是关于成功地发动斗争运动所必需的条件。无论哪个地区要想彻底地贯彻执行党的土地政策,

都必须首先在军事上赶走敌人，粉碎它的政治统治，并创建一个新政权核心。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党的所有指示都强调，在受到敌人直接威胁的地区把阶级磨擦减到最小的重要性，这样的地区只有在满足了一定的政治军事的前提条件后，才能把土地政策及其引发的村内冲突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抗战动员了人力，共产党则为1943年日军开始衰退后在华北大规模地创造这些前提条件提供了领导。

土改计划是共产党在随后的内战阶段的主要革命工作。这一计划在华北的发展，以及从推进这一计划的方法和所需条件中得来的经验，可算是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学会的最重要的革命教训。这些教训记录在1946年的《五四指示》中，它的发表标志着从减租到土改的正式转变。实际上，《五四指示》显示的不是土改的开始，而是在抗战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多种特征的斗争运动的高潮。

成功地实行土改的最基本条件，就是保护土改不受敌人威胁的军事保证。这一点在1946—1947年间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共产党根据地时得到了证实。这一进攻消除了抗战中确定的发动村内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军队不能再自由行动，中央政府在共产党人于斗争运动中所树之敌的帮助下，重建了自己在农村地区的政权机构。

党中央1948年5月25日的指示承认，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土改十分危险，重新确定了抗战期间设立的同样的前提条件。甚至在准备向南推进到租佃制远比华北盛行的南方地区时，共产党人也这么做了。一个地区只有具备在军事上得到保障，多数农民要求分地，手头有足够的干部领导工作这些条件后，才能开始土改。这些条件在“新解放区”——1947年夏以后解放的地区——并未普遍达到，这便是暂时放弃土地改革的直接

原因。中共停止了在这些地区开展土改的尝试，因为成功地实行土改的条件尚未达到。这就是对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当条件许可的时候，土改就能动员和组织“基本群众”创建中共领导下的农村政权新机构。标准答案就是只要改善了农民生活，他们的觉悟就能提高并且愿意行动。“拥护”是共产党所寻求并无疑得到了的东西，这是农民对通过重分财产获得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回报。但其过程却极为复杂。党内的批评说明，斗争运动和分配财产所带来的最初的阶级觉悟，并非像 1946—1947 年间所说的那样直接导致了与国民党作战所必需的各种支援。

在这方面，土地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现存的农村精英阶层。至于这个村庄是否由地主统治则不是问题。主要的考虑是通过土改摧毁当地掌权者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这是建立新秩序的关键步骤。新秩序的建设是土改作为“一切工作之母”的第二个关键任务，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这使党的政策得以深入群众。在具有多种特征的控诉运动中，最积极的农民成为共产党和村领导的新成员，分到土地和财产的人纷纷加入农会和村里其他的组织。这正是共产党赖以依靠的由农民自己掌管的公共组织，农民由此承担起组织军事运输队和对不愿参军者施加社会压力等任务。这也是自由派评论家所说的作为土改的结果共产党在农村扎下的“根”。

从一开始，斗争运动就划分了阶级界线。当共产党寻找转移财富和动员华北农民的新方法时，这是它面临的许多斗争目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1945 年以前，虽然一般强调要取富济贫，但在分配斗争果实时，运动的这一特点便暴露无遗。1945 年后，随着把财产分给贫雇农的运动逐渐深入人心，阶级的划分更为严

格，并写进了最初的《土地法大纲》。这个土地法规定平分农村的财产，表明共产党对“耕者有其田”的解释已超越了消灭租佃关系。由于财富不多而中农无论新旧却为数不少，如果一定要追求财产绝对平等，势必要侵犯中农的利益。党对中农的处理十分矛盾，这一矛盾最终通过含蓄地要求把中农划进拉平的行列而似乎得到解决。

然而1948年初共产党因照顾中农而放弃了绝对的平等，使这一矛盾显然还未能解决。试图使贫农作为一个阶级消失，这在1947年未免太超前了。但尽管存在着疏远中农的危险，人们还是不能在群众运动中立即放弃这一十分重要的目标。因此即使在共产党内战时期土地政策的最后规定中，对中农的态度仍然矛盾重重。在已彻底开展土改的地区，共产党为赢得农民的好感作了最认真的努力。

注 释

[1] 马若蒙：《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13—24页。他在其中概述了两种观点。有关中国自由派作家和左派作家在农业问题上的典型看法，参见《农业中国：选自中国作家的材料》一书。

[2] 《经济周报》，上海，第三卷，第十六期，1946年10月（《中国新闻评论》，1947年1月31日）。

[3] 《美国外交关系》，1946年远东，中国卷，1284—1286页。

[4] 参见注2。

[5] 延安新华社电讯，1946年9月14日。

[6] 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与毛泽东的谈话》，《生活》周刊，1971年4月30日，47页。

[7] 许多学者引用了农业调查局的统计资料。例如，费维恺：

《1912—1949 的中国经济》，34 页；杜威·伯金斯：《1368—1968 中国的农业发展》，91 页；T. H. 沈：《中国的农业资源》，96 页；以及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以下称为《农业史》（北京，1957），第三卷，728—730 页。

[8] 章有义编：《农业史》728—730 页，1931—1936 年间全国农业调查局统计资料。此次调查不包括满洲，覆盖了 22 个省的 1,120 个县。

[9] 马若蒙：《农民经济》，附录 A，表 A—6，303 页。

[10] 同上。

[11] 甘博发现河北定县超过 92% 的家庭拥有一些土地，30% 租佃了一些地，只有 4.8% 是纯佃户。见《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209—211 页。

[12] 根据 1933 年初次发行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官方修订版。1947 年 2 月这两份文件作为地方党委的参考文件而再次发行，1948 年成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群众》，香港，1948 年 6 月 17 日，2—9 页。

[13] 参见《关于决定阶级成分出身问题》，山东胶东区的一份文件。

[14] 这个政府替代了此省战时的共产党政府，它包括战时形成的五个军事行政区（《山东省政府暨山东军区公布其各种条例纲要办法汇编》，第 6 页）。这 5 个区为：胶东（胶东半岛）、渤海（山东北部渤海湾沿岸）、鲁中、鲁南及滨海（从青岛到江苏的沿海地区）。

[15] 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以后引用时写作《报告》）。有关租佃关系的表格附于 91 页。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这次调查表明 261 户出租了 33,000 亩地，但 437 户佃农只租了 11,000 亩。这一明显的不一致并无解释。如果不是差错，就说明那一大片地租给了调查的 12 个村庄以外的农户或所列家庭以外的单位。黎玉在 1945 年 9 月的第二次群众工作大会上作了这一报告。

[16] 同上。

[17] 同上。第四次调查只涉及了胶东半岛上的三个小村庄。185 户贫农中有 91 户即占全部农户 500 户的 18%，租地耕种。租种土地者共有 159 户。第五次调查涉及的范围更小，只有沾化县的 327 户家庭。可以说这是不完全或有选择地编辑的数据，因为调查显示，74 户中农和 226 户贫农

根本没有土地。

[18] 列宁：《农民生活中新经济的发展》，1893年，《选集》，第一卷（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60），13—73页。

[19] 马若蒙：《农民经济》，附录A，表A—5，302页。

[20] 同上。附录A，表A—1，299页。马若蒙发现被调查的9个县中，只有一个村庄的糊口必需地为10亩，其他有9个村庄，这一数字从25亩到75亩不等。而这些村庄实际平均每户拥有5.5亩到28亩不等的地。其中6个村庄的平均数字在10亩以下。

[21] 同上，242页。

[22] 彭真的报告作为党内文件发行，同时公开发行的另一份报告强调了抗战期间的土地政策取得的成就，认为1937—1942年间，调查过约35个村庄都发生了变化。那几年中，地主家庭从总数的2.4%降到1.9%，占有的土地从总数的16%降到10%；富农户数则从约5%升至7.8%，其占有土地则从22%降到19.5%；中农从35.4%变为44.3%，土地从41.6%升为49%。贫雇农从47.5%降到40.9%，土地从19%升到20%。《晋察冀边区实施土地政策的经验》，1945年1月15日，见李庚（音）编：《解放区的土地政策》（以后引用时称作《土地政策》），49页。

[23] 彭真：《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载于《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编》（以后称作《重要文件》），98—101页。九个县为河北的涞源、阜平、曲阳、易县、定县、平山和灵寿，以及山西的盂县和灵丘。

[24]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录》，209页。

[25] 《罗青（音）同志来信》，载于《晋冀鲁豫团结运动的经验》（以后称为《团结运动的经验》），18—20页。

[26] H. A. W. 伍德海德编：《1928年中国年鉴》（天津，天津出版社），1011—1012页。

[27] 《日本——满洲国年鉴》，1939年，788页。

[28] 引用的雇农调查资料见章有义编《农业史》，551页。调查的村庄选自大致对应三个省的东北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区。奉天（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雇农比例分别为13.5%、17.9%和34.4%。无地农户的调查情况源于同一资料，552页。这次调查覆盖了东三省36个县中的37个村

庄。无地户分别为 32.5%、48.9% 以及 63.2%。但我们必须谨慎地指出，本世纪初叶满洲存在许多未开发地区的状况说明了这一地区的土地登记不如中国其他省份来得精确。30 年代早期，未登记的土地实际上可能比登记的土地还多。参见 F. C. 琼斯：《1931 年后的满洲国》，169—170 页。有关东北与其他省份的其他差异可见本章后面《激进的土改：1946—1947》一节。

[29] 孙公都(音)：《二十世纪前半叶满洲经济的发展》，55 页。

[30] 毛泽东：《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毛选》，第四卷，82—83 页，1945 年 12 月 28 日。

[31] 孙中山：《三民主义》，弗兰克·W·普莱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456 页。也可参见史扶邻的《孙中山的早期土地政策》，载于《亚洲研究》，第 16 卷，第 4 期，1957 年 8 月，549—564 页。无论孙的学说中有多少源于西方的成分，“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都属于中国古老的农村改革思想，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王莽时期(公元 9—23 年)。参见王国定《古代土地平均分配体系》，载于孙任以都与约翰·德·弗朗西斯合编《中国社会历史：选集翻译》(华盛顿：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1956)，157—184 页。

[3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选》，第二卷，353 页。

[3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选》，第三卷，298 页；也可参见《重要文件》，第 8 页。

[34] 《新华日报》，重庆，1945 年 10 月 25 日。

[35] 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重要的事情》，《毛选》，第四卷，72 页。

[36] 《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见《主要文件》，1—7 页。这一指示从未广泛发布。1950 年台湾出版的内政部调查处编：《奸匪现状汇编：土改》重印了这一指示；40—45 页。台湾版本与此书概述略有出入，主要在于形式而非内容。除了一些小差异外，措词相同，但各条款编号不同，部分条款的内容亦重作安排。

[37] 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7 年 10 月 16 日，见《重要文件》，27 页。也可见《刘少奇选集》第一卷，41 页。

[38] 《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见《重要文件》，29—37页。

[39]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选》，第三卷，169页。

[40] 晋察冀边区于1937年11月成立，边区政府于1938年1月成立。（詹姆斯·P·哈里森：《走向权力的长征：1921—1972年的中国共产党史》，299页）

[41] 《刘澜涛同志在中共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二月扩大会议上的报告》，《重要文件》，56—61页。

[42] 彭真：43—55页（见注23）。

[43]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执行减租政策的指示》，1943年10月18日，《重要文件》，83—88页。

[44] 《中共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重要文件》，78—81页。这一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31—135页，但省略了列举十大政策的第四部分。此处引用版本所述的十大政策为：与敌斗争；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党风；调查干部；开展时事教育；政府中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其中的多数可见马克·塞尔登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

[45] 这一边区的政府成立于1941年7月（哈里森：《走向权力的长征》，301页）。

[46] 白修德和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为河南国统区灾荒的目击记，166—178页。

[47] 《冀鲁豫区党委减息清债工作指示》，1943年6月8日，见《群运指示汇编》（以后称《指示汇编》），第5页。

[48] 伊莎贝尔与大卫·克鲁克：《十里坪：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革命》，56—59页。

[49] 《罗青同志来信》（见注25）。

[50] 查尔姆斯·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55—56页。

[51] 毛泽东：《毛选》，第三卷，167—168页。

[52] 中共 1942—1944 年整风运动的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是要教育党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中，把斯大林式的组织和纪律方式灌输给一个从 1937 年只有四万党员发展到 1942 年的几十万党员的政党。新入党的人们的动机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是抗日运动的领导，倒不是因为它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关于这场整风运动的论述，可见波德·考普顿的《毛的中国：1942—1944 年的整党文件》。

[53] 《区党委(原冀鲁豫)关于深入检查群众工作的指示》，1943 年 11 月 6 日，见《指示汇编》，8—9 页。

[54] 黄敬：《关于发动群众是目前中心工作问题的发言》，1944 年 4 月 25 日，《指示汇编》，20—26 页。

[55] 《分局给第十二地委的指示信》，1945 年 1 月 18 日，《指示汇编》，30 页。

[56] 同上，30—32 页。

[57] 《冀鲁豫区党委：清查黑地指示》，1943 年 2 月 25 日，《指示汇编》，1—2 页。

[58] 分区：《自信大胆放手的偏向》，1945 年 2 月 8 日，《指示汇编》，32 页。

[59] 《分局关于对中农政策的指示》，1944 年 12 月 28 日，见《指示汇编》，第 28—29 页。

[60] 分局民运部《群运通报：第二号》，1945 年 5 月 7 日，见《指示汇编》，第 37 页。

[61] 参见注 14。

[62] 《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七年来的基本成绩及今后基本任务》，第 1—17 页。鲁中区在日本投降时包括 26 个县，跨泰、鲁、沂、蒙山区。解放区有三百五十万人口，游击区还有一百万人口。日本人的统治已被削减到 1600 个村庄和略多于一百万的人口。

[63] 黎玉：《报告》，42、56 页。

[64] 有干部、地主的问题见黎玉的《报告》，第 7—11 页，以及《土改初期报告(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第 1—6 页。

[65] 《草案》，14—35 页；黎玉：《报告》，39 页。

[66] 黎玉：《报告》，44—48 页；《草案》，第 3 页。

[67] 黎玉：《报告》，12、57—59 页。

[68] 同上，第 12 页。克鲁刻斯（《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革命》，110—113 页），也描述了河南武安县的一次类似会议。

[69] 这组数据的来源为：黎玉：《报告》，12、47 页；《莱东县政府：1946 年上半年民政工作总结》，未发表，1946 年，无页码。莱东县于抗战期间在鲁中地区泰山分区创建。1946 年，该县有 44,838 户，241,435 人，分住在 430 个村庄中，文中数据来自其中 357 个村庄。据黎玉自己说，很难得到统计数字，他自己报告中的数据只能说明“大致情况”。莒南县的数据可能最精确，因为这一地区执行党的土地政策最为彻底。

[70] 黎玉：《报告》，15、60—61、84—85 页。

[71] 同上，第 12 页。

[72] 同上，第 49 页。

[73] 同上，13—14、31—32 页。

[74] 同上，33 页。黎没有引用他所提及的中央指示，他在 9 月的发言与 1945 年 11 月党内指示的调子十分相似。毛在此指示中写道：“……只要它真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发生的任何过火行为以后都可以纠正。”

[75] 引用的话就是那句著名的有关革命与请客吃饭之间的差别的句子。毛的《湖南报告》中的若干章节在此阶段得以广泛重印，并无例外地都包含了这一段话。毛在同一段中写道：“坦白地说，每个村庄都要在短时期内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否则就不可能压制村庄中的反革命活动、或是打倒士绅的力量。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选自《重要文件》，第 19 页。

[76] 黎玉：《报告》，第 32 页。

[77] 同上，33—37 页。

[78] 同上，13—14 页。

[79] 《解放日报》（延安党报）在 1945 年 2 月 9 日和 4 月 4 日强调了这类问题。

[80] 参见注 44。

[81] 对先前的看法见肖作良(音):《中国的土地革命》。1947年《土地法大纲》将在下面讨论。

[82] 李庚(音)《解放区走向“耕者有其田”》,见李庚编《土地政策》,1946年9月10日,第18页。

[83] 《大公报》,上海,1947年2月13日。

[84] 克鲁刻斯的《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革命》和韩丁的《翻身》两书是对晋冀鲁豫边区土改的目击记,对这一过程均有描述。

[85]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1946年4月17日,李庚编《土地政策》,64页。

[86]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明日中国》,90-91页。

[87] 此研究名为《北满的殖民问题及其未来发展》,由满铁株式会社经济部的一名成员执笔。见《中共在东北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与办法》,李庚编《土地政策》,62-63页。

[88] 同上,63-64页。

[89] 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7月23日和26日。

[90] 《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全文》,载于《新华日报》馆编《东北问题》,159页及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8月20日。

[91] 《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李庚编《土地政策》,57-60页。

[92] 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12月24日;新华社北平电讯,1946年12月26日。

[93] 石美(音):《论现阶段的中国土地改革》,载沈志远编《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26页;许涤新:《中共土地政策指示的发展》,同上,19页。

[94] (a)《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1949年7月7日,《工作通讯》,24,第2页。(b)《贯彻关于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1947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以下简称为《1947年》),14页。

[95] 新华社,1946年7月26日;新华社,延安,1946年7月26日。鲁风:《钢铁的队伍:苏北解放区十路起义》,255页。

[96] 可参见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12月11日;悉尼·里特伯为法新社所发电讯,1946年12月5日;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12月24日。

[97] 参见注94。

[98] 程月仲(音);参见第6章,注20。鲁风《钢铁的队伍》,255页。

[99] 克鲁刻斯:《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革命》,127页;韩丁:《翻身》,209页。

[100] 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10月20日。

[101] 区党委:《关于机关部队生产土地归农的指示》,见《1947年》,1—3页。

[102] 以下的讨论主要依据三个文件:(a)《潘复生同志的总结发言》,1947年1月17日冀鲁豫地区党委人民运动大会;(b)参见注94(b);(c)《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1947年3月12日,均见《1947年》,4—7页,8—16页,22,25页。

[103] 这两个具体问题是分区党委两个进一步指示的主题:《在土改中停止拆房实行房子回家的指示》,1947年5月1日;《对处理地主经营其工商业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1949年》,28—30页。

[104] 参见注94(a)。

[105] 《景晓林同志在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工作通讯》,24,第15页。

[106] 同上,第16页。

[107] 《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选》第4卷,164页。

[108] 《中国土地法大纲》,载于沈志远编《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73—75页;韩丁:《翻身》,附录A。

[109] 共产党对来自右、左、中的批评十分敏感。认真回答了他们。事例可见沈志远:《土地改革与发展生产力》,沈编《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第7—11页。

[110] 《三个月来的总结》,1946年10月1日,《选集》,第四卷,第116页。

- [111] 延安,新华社,1946年10月20日。
- [112] 延安,新华社,1946年12月16日。
- [113] 延安,新华社,1946年11月23日。
- [114] 《新闻稿编》,新华社北平分社,1946年11月26日。
- [115] 延安,新华社,1946年9月22日。
- [116] 参见注114。
- [117] 延安,新华社,1947年1月13日、17日。
- [118] 延安,新华社,1946年11月9日。
- [119] 新华社为瑞顿伯格发回法新社的电讯,1946年12月5日。
- [120] 对战时支前任务的这一概述基于山东省政府和省军区在日

- [130] 《申报》，上海，1947年4月11日。
- [131] 乡少：《苏北实地视察录》，《观察》，1948年1月3日，15—16页。
- [132] 程月仲：参见第六章注20。
- [133] 区党委：《冀鲁豫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1947年2月2日，《工作通讯》，32期，37页。
- [134] 区党委：《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1946年11月20日，《工作通讯》，第32期，49页。
- [135] 同上，50页。
- [136]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224页，260—261页。《冀鲁豫五个月来……》，42页（参见注133）及《潘复生同志在地委组织部长……》，38页（见注125）。
- [137] 《关于开展……》，48—52页（见注134）。
- [138] 同上，50页。
- [139] 《区党委关于收复区工作指示》，1947年1月20日，《一九四七年》，19—21页。
- [140] 张玺：《九个月游击战争总结与今后任务》，《工作通讯》，32期，第10页。这是陆逢祥（音）编辑的张玺在冀鲁豫区党委游击战争大会上的报告的大纲，1947年5月30—31日。
- [141] 李成阳：附件，15页（参见注127）。
- [142] 《鲁西游击战中的土改运动》，《工作通讯》，32期，附件第9页。
- [143] 杨培（音）：《济宁武工队》，《工作通讯》，32期，附件，18—23页。
- [144] 张玺：前引文，19页（参见注140）。
- [145] 同上，23页。
- [146] 《中共中央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1948年5月25日，载解放社编：《论新解放区土地政策》，9页；《毛选》，第四卷，254—255页。
- [147] 《豫西日报》社论：《停止新区土改实施减租政策》，1948年8

月 24 日,见《论新解放区土地政策》,12—13 页。共产党军队在 1946 年更名为人民解放军。

[148]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 年 1 月 23 日,《毛选》第一卷,142—145 页。

[149] 这一阶段的生产数据基本上不存在。但生产运动和组织互助组肯定有助于弥补解放区的经济损失。胡素珊在《内战的政治:中国,1945—1949》中概述了这些工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361—370 页。

[160] 任弼时报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见《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和三个典型经验》（以后均称《三个典型》），17—18页。1948年2月22日的指示（以下将讨论）对此作了正式修改，并写进了这部法以后几次修改稿中。见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161]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选》第四卷，165页。

[162]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选》，第四卷，182—186页。

[163] 参见注12。

[164] 任弼时：前引文10—31页，参见注160。

[165]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与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见《三个典型》，1—8页；新华社1948年3月2日的《每日报道》的英译有错漏。在中央指示之前其实晋冀鲁豫边区党委已有一篇与之类似的政策声明，1948年2月6日，刘少奇等：《土改整党典型经验》，32—33页。

[166] 这些文件的其他版本可见刘少奇等：《土改整党典型经验》，也可见《土地改革与整党》。

[167] 毛泽东：《序言》，1948年3月12日，载于《三个典型》，32—33页。毛的评论提到了这三个事例，但这一序言特别介绍了谭政文《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此文最初由新华社陕北分社在1948年3月18—21日发布，重印于此书，34—50页。

[168] 《黄家川是怎样调整土地改革的》，新华社，1948年2月28日，见《三个典型》，57—60页。

[169] 在尚未妥善分地的第三类村庄，毛赞成把山西崞县的经验作为推广的典型。这个县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就是在30个行政村中错划了阶级：43户富农被划成地主，106户中农成了富农，31户中农成了地主，51户其他家庭成了破落地主，见注167。

[170] 刘少奇：《平山整党和发动群众向前看的范例》，最初为新华社1948年2月27日从晋察冀边区发出的无署名报道，见《三个典型》，54—55页。

[171] 见《晋冀鲁豫边区指示》，见注 165。

[172] 《晋冀鲁豫中央局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1948 年 4 月 23 日，见陈伯达等：《关于工商业的政策》，42—45 页。

[173] 韩丁：《翻身》，243—415 页。

[174] 参见注 75。

第八章 重返城市

1949年3月,毛发表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他宣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1927年,中共被迫放弃了其传统的力量基础,在其后的20多年中,主要在农村发展它的力量。随着军事上出乎意料的快速胜利,到1948年,党突然发现它正掌握着越来越多的城镇。在中共已不再以全部精力准备担任工人阶级的领导时,这一时刻却到来了。

在中国总人口中,城市人口不足20%。然而,这20%的人口却囊括了几乎所有维持一个全国性政府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须的知识、技术和行政方面的人才。城市也是国民党势力的主要堡垒。相比之下,共产党被它的对手嘲笑为乡巴佬。外国观察家们一直到1948年还坚持认为,共产党不会想着去占领沿海的大城市,因为党的领导人都能足够聪明地认识到他们缺乏处理城市问题的能力^[2]。

一般来说,毛不会将自己心中的疑虑与不安形之于色。但在1949年3月,他却明确地发出了警告: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学会如何管理城市并战胜城市中的敌人,党就不能巩固它的政治权力,并因此而彻底失败。于是,中共在开始其自身的城市化过程

中，拿出了它在土改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决心。实际上，这一过程至迟在 1945 年已经开始。

据中共自己的统计，到 1948 年年中，共产党已掌握了 586 个城市，此外，“城市”指包括县城以上的各类城市。^[3]大城市多集中在满洲。这其中包括了七个省会城市（括号中是中共接管的时间）：哈尔滨（1946. 4. 28）、北安、呼伦、齐齐哈尔（1946）、佳木斯（1945. 11）、安东（1947. 6. 10）、四平街（1948. 3. 13）；另外的还有牡丹江（1946）、吉林（1948. 3. 9）、辽阳（1948. 2），以及营口（1948. 2。随即丢失，年底前再次夺回）。1948 年年中以前，中共所掌握的城市还包括河北的石家庄（1947. 11）和河南的洛阳（1948. 4. 7）。

哈尔滨是这些城市中最大的一个，人口 76 万^[4]。中共在苏军撤离后占领了这座城市，它成了 1946—1949 年间中共在管理城市问题上取得重要经验的中心。不过，中共遇到的第一个现实的难题却不是哈尔滨，而是张家口。张家口位于北平西北面，属于当时晋察冀边区中的察哈尔省。

在 1945 年 8 月底到 1945 年 10 月初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中共控制着张家口，当时城市中有 15 至 20 万人口。张家口并不是日本投降后中共占领的唯一中型城市，对威海卫和佳木斯等城市的 management 也具备同样的难度。但是，或许是因为张家口有适中的地理位置，中共努力想把它变成第二个首都。尽管有关张家口当时情况的资料都很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概括出一些在 1945—1946 年间中共城市政策制定的现实基础。

张家口的实验

1946年1月以后，记者们时常可以搭乘视察国共停战情况的北平军调部的飞机去张家口。在采访中，中共经常强调他们缺乏管理城市方面的经验，他们常说张家口的情况将帮助他们决定从农村出来的干部是否能在城市中有效地进行工作。^[5]

当时到过张家口的人都对那里发生的变化有很深的印象，几乎所有第一次访问中共占领下的城市的人都如此。乞丐从街上消失了，人力车也大量减少了——像对待妓女一样，新政府鼓励他们另找工作。警察手中的棍棒不见了，再也不会威胁人力车夫和马车夫们的脊背了。从市容方面看，城市管理得很好，街道有人经常清扫，夜晚亮着路灯，建筑物都有人看管，政府所有并经营的公共汽车运行良好。

早期的访问者对中共在处理汉奸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高效率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的中央政府也正式开始接管日占区，但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陷入了困境。中共则避免了类似的问题。他们的方法是，占领张家口以后，立刻将日占时期与日本人紧密合作的约300多人全部抓了起来，并处决了其中12人，包括原市长和秘密警察头目，其他人则经过教育，在三个月后被释放。^[6]

但是，许多干部的行为还有待于改进。1946年3月，张家口已经有两万多名军事和文职干部。^[7]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报纸曾指出，骄傲情绪使得一些干部的工作不尽如人意，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新的革命秩序必须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他们也并不真正重视城市建设这一和平时期的工作。报纸警告说：“每一个指战员都必须保持战争时期养成的高度纪律性，尊重和平城

市的秩序,遵守和平城市的纪律。”^[8]

与在农村打游击战相比,城市建设是一项平淡却更为复杂的工作,尽管这转变非常困难,新的张家口市政府很快就初具规模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张家口能够比较容易地被纳入晋察冀边区原已存在的行政体系中。中共在接管该城市后,很快就建立了一个以宋劭文为首的行政委员会。宋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是党外知识分子。同时,边区原已建立的各类组织都开始了在张家口建立其分支机构的工作。这些组织包括边区总工会,青年团,学联,教师工会和农会。

10月中旬,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一个与国统区同名组织相关的公众咨询机构——作出决定,在察哈尔和热河两省应建立正式政府。当时这两个省几乎全部掌握在中共手中。同时还决定,在10月底之前应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选举新政府并讨论重建方案。^[9]张家口市很快就举行了广泛的选举,推选参加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同时,张家口市还选举了各城区街道组织的领导。通过这些选举,废除了已不再具有群众基础的保甲制度。^[10]工会据说在这次“选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按12月份公布的数字,有112名工人在九个区中的六个区的街道组织中担任了领导。^[11]第二年4月又举行了选举,选出的代表参加了月底举行的张家口市第一届参议会。按一位晋察冀边区党委成员的说法,该市82%的人口参加了这次选举,有90名委员和30名候补委员当选。^[12]

从对张家口人日常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方面来看,更加重要的是党对于工业、商业和劳工的态度,而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共产党在过去20年里的重点一直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在农村,中国共产党再次肯定了土地私有化的原则,但这与原有的

土地所有制并不相同。在乡村一级，地主所拥有的工商企业都被官方认作是农村封建经济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接管后置于合作制的管理之下。这是在管理较好地区的做法。在其他地方，就连那些小商贩也被没收并将他们的财产分配。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文件中都一再指示，不要在城市中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有关报道和随后的一些文件都表明，这段时间里，在地方官员的许可下确实发生了对城市资本的清理。^[13]

除此之外，仅有的能表明共产党试图在张家口采取什么样政策的迹象则截然不同，那就是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关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词语。正如前文所提到过的，这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后一段时间里共产党所推行的总体措施的一部分。大体上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应当建立在公有、私有和合作制企业的基础之上，排除垄断资本，大型商业和工业企业将由国家所有并管理。^[14]总结起来，共产党在1945年的城市经济政策要求废除官僚资本（由国民党官僚所控制的大型垄断性企业），治理通货膨胀，帮助私营工业（通过贷款，采办原材料和产品销售），改善工人生活。^[15]在内战时期中共广为宣传的口号中，也可以反映出这些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互利。”但问题是，这样一个向各方面都作出承诺的政策，如何能够保证在一个被农村运动包围的城市中得以贯彻。

劳 工

根据1946年年中的一份报道，那些当时困扰着上海的罢工、怠工等现象在张家口却已被基本消灭了。^[16]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成绩应当归功于工资增长，工作条件改善，劳动纪律加强以及共产党在张家口的最初几个月中在组织工会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等等。

工会组织

像其他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一样，张家口的大部分工厂和作坊里都早已有了地下党员和干部。日本投降后，这些干部立刻将工人组织起来以防工厂和设备在投降后的时间里遭到破坏。据说张家的第一个工会成立于8月23日，比共产党完全占领这个城市早五天。

在9月中旬张家口临时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工会的组织活动认真开展起来。到12月中旬，张家口第一届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总工会宣布成立。13,933工人分属于80个商业工会(6,325人)和81个厂工会(7,608人)。^[17]按新总工会的规定，任何一个拥有15名以上体力和技术工人的企业都能建立工会，这包括普通工人，技术和熟练工人，店员，学徒以及工厂低级管理人员。^[18]

与组织创建活动同时开展的是“斗争运动”，做法与当时农村的清算斗争类似。根据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领导肖明的说法，工人们经常是不等委员会派遣的官员到来就自发开起了斗争会。在九十月间，针对不同的目标所开的斗争会达到131次。被斗争次数最多的是那些被指责压迫过工人和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人。很明显，因符合这样条件而受到冲击的都是企业主和商人。工人们以农民向地主讨债的同样方式向他们要求更多的补偿。所有斗争会中，除了37个“清算会”和24个“控诉会”外，共有56个斗争会是要求增加工资，10个要求降低租金，还有5个是要求各种福利待遇。肖明认为，斗争运动唤起了工人，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会的组建工作。在张家口工人中涌现了500多新的积极分子。^[19]

这些持续时间很短的斗争运动，大多都成了工会建设进程的一部分。在每一个建立工会的企业中，工人们都选出了委员

会,代表他们与管理者进行劳资谈判。不管是在小组讨论还是在工会的大会上,工人们都被鼓励在工资、工作条件、福利待遇等问题上充分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殴打、辱骂以及各种各样的恐吓,这些过去被管理者用来压制工人在此类问题上表达意见的方法都被严格地禁止。

工资福利

工会组织建立之前,共产党已经遵照其诺言努力改善工人生活了。新政府在它颁布的第一批法规中,规定所有的工资必须翻倍。尽管这个做法导致了通货膨胀,但一个月以后,工资又被提高了25%—30%。到10月份,很多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对工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日本人留下来的分级工资制被废除,在该制度下,工资标准被分为很多级,每级中又分为很多等。1945年10月26日,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了公有制企业工人新的一般工资标准。

新标准下,工资以工人每月应得的小米斤数计算,用现金支付。根据食品、煤炭、布料等基本生活用品的价值指数,工资也逐月上涨。这个标准规定:(1)年轻人、妇女和学徒的工资每月是100到200斤小米;(2)普通工人每月200到280斤;(3)熟练工人每月250到330斤;(4)技术工人每月300到450斤。

重工业和轻工业也有区别。大体上说,轻工企业(如烟厂、榨油厂)中的普通工人、邮递员、清洁工、铁路信号工等,每月收入200到250斤小米,熟练工人每月可收入250到300斤。重工业企业的技术工人收入最高,但每月也不超过450斤。^[20]

10月底,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11月份增加了工资;到12月,工人们又再次要求增加工资以抵消生活费用的上涨。结果是轻工业工人工资增加了10%,重工业工人增加了15%。一份报告表明,由于通货膨胀,到1946年3月,以边区货币计算的小米价

格由每斤 28 元上涨到每斤 65 元。^[21]但是基本工资标准似乎是从 1946 年初就被稳定下来。从 4 月一直到当年秋天共产党被迫撤离张家口的这一段时间内,公有制企业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普通工人每月收入大约是 300 斤小米左右,收入最高的技术工人每月大概是 500 斤。企业管理者享受的是另外的工资标准,每月能收入到 900 斤。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前不久到过该城,她发现当时张家口工人的工资是她到过的中国所有地方中最高的。^[22]

但是按边区行政委员会的说法,10 月份宣布的工资标准只是一个总体上的指导,实际工资应当是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定。事实上,在此指导性标准下,张家口的公有企业,也包括一些私营企业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工资制度。有两个是计件工资制,旨在通过物质刺激提高产量;还有一个则以工人的技术水平作标准。

在累进计件工资制下,工资以个人的产量来计算。一段时间内,工人完成其个人定额后就可以得到固定的基本工资,超额部分可以得到累进的增长工资。奖金制是在产量不能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企业中采用的,在这两种制度下,一组在一定的时间里完成集体定额的个人可以得到规定的基本工资,有超额的情况下,每个个人都可以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以累进的增长比例得到奖金。在产出比较复杂的企业里实行的是分红工资制。在扣除成本、浪费和折旧以后,企业的利润在所有者和雇员之间分配。个人之间分配利润的比例,以他们的技术水平为基础。^[23]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定额标准、基本工资水平、奖金、红利等都是由雇主和雇员一起共同决定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工会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判断他们的工资标准是否定得公平。他们总是毫不犹豫的去利用他们新得到的讨价还价的手段。例如在一

家有 36 个雇员的公私合营的小肥皂厂里,在工资上涨幅度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有一些工人仍在要求工资增长。实际上工人当时的工资已经是日占时期的数倍。工会在审察了工厂的账目后发现,如果工资再上涨,企业就会破产。这个情况在工会大会上被解释以后,工资就没再上涨。〔24〕

很难确定在张家口有多少工人是按照公有企业标准来领取工资的。1946 年 6 月,一家私营茶叶公司的月工资只达到 120 斤到 160 斤小米。〔25〕根据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私营企业内的工资增长根据单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决定。工资应当适当增长,所有者也要有利可图,这与工人自己和整个国家的利益相一致。

代表大会还认为,对于木工、瓦工等工种,很难确定一个全市统一的工资标准,因此建议这些问题由区来解决。同样,张家口商业企业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店员和其他雇工不可能有一个固定工资标准,所以只能在改善工人生活水平的前提下确定指导性的标准。另外,工会干部们还因为不够重视商业企业雇员而受到批评。〔26〕

除提高工资外,还采取了很多其他措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工会在政府鼓励下建立了消费互助社,工人可以通过它来购买燃料、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众多的互助社不仅在市场波动时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也减轻了通货膨胀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冬天来的时候,公有企业的工人还可以得到特别津贴用于购买煤炭。为尽量降低在吃饭方面的花费,工厂鼓励工人自发建立由他们自己管理的伙食小组,厨师的工资由工厂负担。

工人生病或工伤的医疗费用也由其雇佣单位负担。工人在康复期间,工资也要照发。生病时,工人请病假也有工资,并由市里的医院治疗。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政府

建立保健诊所,这样工人在有不很严重的健康问题时也可以得到治疗。〔27〕到9月份为止,城里有了四家公立医院和一些私立医院。穷人还可以在十三个保健诊所中享受免费医疗。〔28〕

新政府还想方设法解决当时困扰中国所有城市的失业问题。除非经过工厂管理委员会讨论(如果有的话)〔29〕和工会的同意,雇主不能开除工人。1945年10月5日,张家口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为失业工人建立了收容所。在头两个月里,该所共接待了1,000多名失业工人,政府的就业部门也在努力为他们寻找新的工作。在张家口很快就出现了从北平和天津等很远的地方赶来寻求帮助的失业者。〔30〕到第二年6月,据说就业部门已为1700多人安置了工作。

另外,约8,000多名苦力、泥水匠、木匠等每到冬天就要失业的工人也受到鼓励去建立互助组织。在纺织、煤炭运输、面粉加工以及其他一些行业中,共成立了12个互助组织,市政府给予了贷款和救济。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难以解决失业这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只要可能,政府就鼓励失业工人离开张家口。大约3500名工人在得到政府发给的回乡费后离开了城市。〔31〕

1945年12月底以前出现了明显的为工人争取待遇的倾向,并且看起来是逐步加强的。比如,有十六家工会向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提议,雇主应当给工人提供服装。政府在10月份关于基本工资标准的规定中,曾专门说到这不是雇主的义务。最后的结果是大会重新肯定了这一政策,规定除了邮局、铁路、电力和电话工人外,由于是战争期间,这个要求不能被保证。在当时的解放区,衣物依然是极端匮乏的。

张家口的住房条件也很紧张,很多基层工会就住房问题提出建议。作为一种回应,大会只是决定建议雇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工人提供宿舍。大会还决定,由于战时困难,工人们将不

再享受传统上的年底双薪或是年终奖。

工作条件和纪律

原则上,成人实行的是每天8小时工作制,年轻人每天工作7小时。但从事与战争直接相关的生产的工人们可以“自愿地”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城市刚解放时,为迅速修复被严重损坏的平绥铁路,铁路工人昼夜工作。与此类似,纺织和服装工人为执行紧急任务,为部队提供数千套制服,同意每天工作10个小时。边区印刷厂的工人和位于张家口附近怀化镇的新华钢铁厂的工人,分别在12月和1946年1月执行过类似的应急方案以提高产量。印刷厂工人的工作时间从每天的8小时增加到11小时,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32]

除采用计件工资制外,工厂还鼓励工人开展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以提高产量和质量。像宣传农村的劳动英雄一样,当地报纸以最大的篇幅报道那些在工厂里保持高产纪录或是连续烧锅炉时间最长的劳动冠军。

很多工人每天还去参加学习。所有的工厂都被鼓励在工会的帮助下建立工人培训班。培训班以政治学习为主,也有一些识字和技术培训的课程。到1945年12月,张家口有50家企业为工人开设了课程,通常是每天一小时,在早上或是晚上进行。工作时间不允许上课。工人们也不像举办这些课程的人所设想的那么热情。在12月的工人大会上,工会代表们解释道,“由于天气寒冷”,一些工人对学习兴趣很低。大会决定应当教育工人们懂得参加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不能用扣工资的办法强迫参加。

新的劳动纪律标准也最终出台。要求工人按时上班,工作积极负责,爱护公共财产,同时还规定了对违反纪律的工人批评和惩罚办法。一家烟厂的一些工人因为私拿工厂产品受到了纪律处罚。开始是小组批评,接着是部分群众参加的会议进行批评并

听取自我检查。最后,第三次召开的是全体群众大会,决定对这种小偷行为进行适当的惩罚。〔33〕

工业和商业

提高产量需要的不仅仅是计件制、劳动竞赛和劳动纪律。1946年1月边区党委发布的《关于1946年生产运动的指示》规定,将提高农业尤其是食品和棉花生产,当作主要任务,工商业是次要任务。工业方面,最主要强调的是棉纺和毛纺。河北省中部和东部的高阳和宝坻要尽快恢复成为该地区的纺织业中心。《指示》还要求恢复其他轻工业,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并要求恢复采矿业。愿意对工业进行投资或管理的私营企业家,以及所有愿意参加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也都受到欢迎。在商业方面的目标是鼓励贸易,重振边区市场。被特别提出以引起重视的是张家口的骡马市场,安国(祁州)的药材市场和以辛集为中心的毛皮贸易。〔34〕

边区的官方生产目标强调农业重于强调工业,强调轻工业重于强调重工业。其首要目的是要达到一定的生产水平以保证基本生活和支援战争。张家口市的工业生产计划体现了这些原则,边区工矿局于1月份召开的“各公司和工厂经理厂长会”上也传达了这些原则。

张家口的生产计划主要包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发展那些在过去四个月中已恢复生产的工厂,并立刻恢复仍处于停顿状态的工厂。在所有日占时期被毁坏或被迫停止生产的工厂中,首先要恢复的是轻工业。1946年1月,几乎所有的轻工业工厂都已恢复生产,重工业则有很大一部分还未恢复。

工业生产计划的第二点是需要在张家口地区大力发展采矿业,包括煤、铅和其他金属矿。最重要的是煤矿的开采。最后,张家口工业应集中于农用工具和轻工机械,如纺织机器的生产。〔35〕

据工矿局局长说,实现张家口这些工业生产目标最主要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得力的管理人才。局长说缺乏足够的生产数据,并批评工厂管理人员不作必要的调查研究。他警告说,我们应当作得更像生意人,应当建立合适的管理制度并学会精确计算生产时间。〔36〕

除了劳工政策中有提高产量的规定外,张家口市促进工业生产的具体措施还包括以下几条:(1)政府除了向公有企业贷款外,还向私营企业贷款。(2)实行低税收。(3)政府对原材料供应和成品销售提供帮助。这些措施构成了1946年8月在整个边区实行的促进工业生产方案的基础。所有生产棉线、毛线、玻璃、电器、钢铁、农具、机械和工业原料的工厂,不论公有、私有或合营,一律享受最优惠的待遇,包括:(1)企业根据其投资规模享受免除全部营业税和所得税二至五年;(2)流动资金短缺时可以向边区银行贷款;(3)政府帮助解决原料和成品运输过程中的困难;(4)帮助边区贸易公司和所有政府企业和合作企业解决原料采购和成品销售中的困难;(5)政府提供救济以帮助补偿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第二类企业包括棉毛纺织品厂家、面粉厂、印刷厂和生产日常必需品的厂家,这些企业获准减免所有营业税和所得税一至四年。除了政府不补偿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外,它们能享受上文提到的所有其他优惠。

生产化妆品、玩具和其他非必需品的厂家属于第三类。这些企业也可享受一至四年的免税,并可以在原料采购和成品销售方面得到帮助。只有酒类和香烟等少数几种产品不享受免税政策。〔37〕

很少有资料表明当时张家口公有和私营企业各自所占的比例。最初的情况可能是政府在很大范围内将企业接管,不仅包括

了公用事业、交通、重工业以及煤矿，也包括了很多轻工企业。资料没有表明这种情况是出于故意要张家口的公有经济成分超过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正式纲领的界限，还是纯粹就是接管敌产的结果。但是，显然是出于对外部资金的需要，边区政府在1946年3月宣布将23家公有厂矿变为私有。这些企业主要分布于张家口和宣化，生产的产品有香烟、火柴、纸张、纺织品、皮货、酒以及机械。曾管理这些厂矿的新华工业公司，三个月之内将它所掌握的这些企业的股票全部卖给了来自共产党和国民党地区的商人和工业家。〔38〕

共产党在张家口的最后一年里，市政府总共向私营企业发放了大约相当于2亿法币的低息贷款。〔39〕另外，共有六家当地的私营银行也重新开业，每家都握有1亿元法币左右的资产。到1946年夏天，它们吸收了436,590,594元法币的存款，发出了总数为207,676,000元法币的低息商业和工业贷款。〔40〕

很多到张家口的人都描述过那里的经济繁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日本人占领而中断的一些老的贸易形式也恢复了。解放这一地区后，共产党立刻废除了边区内的所有贸易限制，甚至不限制食品对边区外的出口。张家口在传统上就是一个重要的货物市场中心，集散察哈尔北部和南部来的毛皮、食品和黄牛。到1946年秋天，张家口的毛皮批发商在原有50个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倍。日占时期许多这样的商人被逼破产，只是依靠政府的贷款才重新开业。此外，约30家从内蒙古运货的运输公司也重新运转，张家口市政府帮助新公司购买骆驼和卡车。

张家口食品市场在1946年春天重新开张。人们用从河北的纺织品中心来的布匹交换从察哈尔北部来的粮食。有报道说，从北平、天津等国民党占领城市来的商人，也在张家口市场上购买粮食。〔41〕整个边区的县城集市、庙会和小市场都重新开张，这不

仅振兴了商品在解放区内的流通,也促进了与国统区的交流。尽管国民党中央政府禁止双方的贸易,但在这些市场中跑货的商人被认为是在加强双方间接商业联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2〕

通货膨胀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很难衡量共产党治理张家口通货膨胀措施的成功。当地的官员声称他们没有依靠印刷厂,他们是通过大规模的借款来支撑的。尽管这样,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张家口就不能不受到国民党占领城市中高通货膨胀的影响。与外界压力相应的是共产党最初的工资政策。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很大的后果,正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作为边区货币基础的小米,价格在共产党管理张家口的前六个月中翻了一番还多。

好在还有一些起相反作用的情况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张家口市民受到影响较小。在第一轮工资上涨后,政府好像已开始采取措施去维持基本工资稳定。边区贸易公司和张家口一家政府的食品公司,将一些主要商品的价格压了下来。另外,大约100个制造者和消费者的合作社也使工人和其他人避开了通货膨胀带来的最坏影响。这些贸易组织还使得商人和投机者难以进行那些使国民党占领城市通货膨胀加剧的操作。〔43〕强调重振工业、商业和运输,也使得在国民党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在这里大有好转。

因此,尽管共产党在张家口没能避免通货膨胀,看起来它却把通货膨胀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但是,对取得这一成绩更重要的却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济战略。这个战略根植于农村地区的非货币经济,根植于一种强调节俭和自给自足的相对保守的经济哲学。

社会改革

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上最具创造性的工作是安置妓女、吸毒者、小偷以及其他各类所谓的封建残余。主要方法是强制与说服相结合,基本上与在延安曾采取过的对付乡村中游手好闲者的方法相同。〔44〕目的是让这些人明白,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他们个人的利益,同时也有益于整个社会。

政府并没有完全禁止妓女的存在,但它从一开始就发动了一场打击卖淫的运动。尽管政府使所有的妓女在个人愿意的情况下都可以无条件的离开妓院,还是有很多人不愿走。政府不得不用“几个月的耐心工作”去启发那些“被多年的压迫所扭曲”的思想。这几个月的耐心工作主要是要求城里所有妓女进行每周一次的体检。在等候检查的时候,女干部们频繁地与她们进行个人或小组谈话。她们对妓女说政府会尽最大努力送她们回家或是帮助她们找到工作。由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嫖客越来越少,生意也越来越清淡,这种说服也就越来越有效。到1946年秋天,日本投降时张家口妓院中的562名妓女已有463人回了家,找到了丈夫,或是被安置了其他工作。〔45〕

吸毒的问题也基本是以同样方式解决的。同时,这场扫除吸鸦片运动也是边区变罌粟地为良田计划的一部分。根据1940年到1945年间的估计,察哈尔和山西北部有13%的人口,约30,000多人吸食鸦片。晋察冀边区的很多城镇都建立了戒鸦片中心。各类组织,包括青年组织、妇联以及当地的报纸都开展运动,宣传吸鸦片的害处。吸鸦片的人被劝说,可能也有被强迫地进了戒烟中心。在那里,他们被编入“互助小组”,这些小组都由那些曾经吸食鸦片但已改掉这一毛病的人来担任领导。中共称这些中心都成功地使吸鸦片的人控制住了鸦片瘾。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后,戒掉了鸦片的人在这个改造计划的第二阶段,被鼓励重新开

始从事农业或其他生产。1946年夏天,张家口政府宣布它的反鸦片运动已经成功地改造了在察哈尔省和山西北部共产党地区里大约1/3的吸鸦片者。[46]

边区同时还开展了监狱改革,包括张家口和其他一些小城镇的监狱。在共产党管辖这一地区的时间里,大约有50多名过去的小偷从监狱获释后找到了“受人尊敬的”工作。在共产党被迫撤离的时候,还正在进行另外一组犯人的改造工作。在宣化,据官方说有150多名犯人因为在改造过程中表现积极而被提前释放。许多犯人入狱时是吸毒者,释放时据说已经戒毒。监狱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尊重犯人的人格,给劳动突出的犯人发奖金和进行表扬,也包括政治学习和在小组会上的自我批评。犯人在获释后找工作时还可以得到帮助。

张家口被改造好的犯人中最有名的是22岁的楚原材(音),别名“小山东”,后来成了市监狱的管理员。他7岁成为孤儿,从行乞发展到偷窃、吸鸦片,14岁时就在大连蹲过监狱。在日占时期来到张家口生活。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他和其他一些有名的惯犯一起被抓了起来,判刑一年。

尽管他不懂政治,也不知道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但当他知道他还可以重新做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积极。他对记者说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从犯人中选出的劳模居然可以和其他地方选出的生产能手一同开会,并同台演讲和接受表彰。他于是决心自己也要当劳模。很快他就被狱友们选为组长。1946年春天,他被提前几个月释放。他申请帮助他寻找新工作,并很快被任命为监狱的管理员。他的成功事迹得到广泛宣传,成为其他犯人学习的典型,证明在新的制度下即便是过去最落后的分子也能重新做人。[47]

中共城市政策的起源 1945—1946

尽管材料很不完整,张家口的经验还是表明了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仍然是由其在农村的工作所决定的。张家口市经济政策的目标只是晋察冀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部分。它强调农业比工业重要,轻工业比重工业重要。目的是在战争状态下保证经济能基本自给自足,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要把张家口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和商业中心的想法是过于早熟了。从另一个方面也再次证明了,共产党低估了国民党军队 1946 年的进攻。共产党在张家口采取的政策,与它在那些它认为不能永远占领的城市中所采取的不同。在那些城市中的政策也是为了要支援战争,却没有要发展工商业的打算。实际上,共产党在这些地方所做的是拆走尽可能多的机器设备,运到安全的地方后把它们用于壮大军队或发展经济。比如我们在第六章曾提到过的东北的那个村庄中,共产党从当地的诊所里搬走了所有的设备,而没有去碰一下属于农民自己的私人财产。

由于共产党接管的城镇越来越多,这种拆运设备的举动最终表明是不明智的做法,但是多年游击战养成的作风不是在顷刻之间就能改掉的。随着共产党保卫胜利的果实的能力不断加强,它不得不在每占领一个城市后就立刻开始发动保护工商业的运动。所有在这方面还保持“游击作风”的干部和军事官员都受到批评。^[48]很快,共产党在所有的地方都沿用了它在张家口采用过的保护财产,鼓励贸易和生产的政策。

但是,共产党后来承认他们在张家口是过于自信了。^[49]这

个说法的确切意思并不明确。但是,除了不该过早产生把张家口建成第二个首都的想法外,新政府想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的目标似乎的确是定得太高了。后来的发展表明,主要的问题是出在

传。另一个广为宣传的是私营工业家王迎古(音)的例子。此人据说是因为在甘肃省与当地的国民党政府两度不和而失去了两家化工厂,最后于1945年秋天逃到了河北南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向他提供低息贷款,帮助他开设一家新工厂,还向他提供了从城镇和乡村“收集”来的零件和设备。

这种希望私人资本能放弃惧怕心理的愿望,被清楚地表达在1946年劳动节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中:

私人资本是解放区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在国内外垄断资本的沉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的成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了战胜这些困难,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劳资双方的相互谅解和协力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合作不仅对国家有益,对劳资双方也都有益。工会一方面要说服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以提高劳动热情……另一方面也要说服工人不向资本家提过高的要求,并做到节约原料,加强纪律和改善组织管理以便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整个工厂的利润。[53]

这个社论表明,工人的合作是吸引私人资本和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延安的广播电台报道80多万华北和华中解放区的工会工人参加五一节的集会,支持经济建设的发展。他们保证与资本家合作,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降低成本以便使厂矿所有者能够获得利润。在延安召开的一次工会大会上,朱德说道,我们的任务是通过与资本家的合作发展生产,让资本家获得利润,也让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54]

1946年劳动节的这些主题,表明了1947年底以前中国共产党自觉采取的劳工政策的方向。同时,为完成生产任务而延长工时,开展劳动竞赛以提高产量,为提高单个工人产量进行物质刺激,为限制工人要求而采取的措施,以及政府对劳动纪律的强调,所有这些措施,或者至少是其萌芽形式,在共产党占领张家

口的那段时间里都存在过。

重返城市：1947—1949

在1947年到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对待一些彼此相关问题的态度趋向于更加保守。这种变化体现在一场纠正过度“左”倾错误的运动中。这场运动与我们上一章提到过的农村土改中的反左运动是同时发生的。第二点也与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关注相联系，产生了向苏联经验学习的新的兴趣。这一点在东北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最后是城市管理最终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不再从属于战争、土地改革、党的建设以及农村的大生产运动。

1948年7月30日，新华社就内战前两年中取得的成绩发表了一个广为传播的社论，社论正式肯定了新开始的对城市工作的重视。社论指出，随着人民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在战争第二年占领了一些重要的城市，这改变了解放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仅次于军事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年中，在新解放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尤其是在新解放的城市中。

在城市中，党的政策要点是：消灭和解散敌对武装力量；逮捕所有在城市解放后继续顽抗的人；没收官僚资本；以及建立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逮捕和没收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界限执行。除此而外，所有私有财产和资本家，无论其企业规模大小，都要受到保护。保护也将包括所有文化、教育和宗教性组织及所有外国人。在可能的情况下，生产性的企业都要保持运转。

城市中的私有财产与农村中半封建制的土地不一样，将不会被在没收后分给穷人。社论说道：“城市中社会改革的任务与

方法与农村的土地改革完全不同。今天城市中反动分子主要限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势力和那些真正的官僚资本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的任务不是要革命，而是要团结它改造它。”^[55]

7月30日社论中所强调的保护城市工商业，避免不必要的分裂，和团结小资产阶级等原则，都反映出了自前一年秋天以来形成的反“左”倾路线。

劳工：反“左”运动

1948年2月7日新华社的另一篇社论谈到了当时在工人方面产生的变化的性质。这个社论标志着1947年底开始的反“左”运动的深化，肯定了其中的做法：

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内仍然有不少党员、干部、工会工作者，甚至是一些担当高级职位的领导干部还是不能弄懂党的工业政策和工会运动路线。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和近视的所谓“工人的利益”，而不能再稍微看得远一点。他们忘记了在1931—1934年间采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和工人运动路线是怎样危害工人阶级和革命政府的。他们对过去十一年中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工业政策和工人运动路线没做任何调查研究。他们顽固地反对党的路线，很多地方领导机关很长时间甚至没有正式讨论和宣传过党中央的路线，使从事劳工运动工作的同志们完全不了解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他们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所有党的地方领导机关必须认真讨论中央的路线、工业政策和工人运动路线，并下决心改正“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和工作方法。^[56]

几个星期后，毛在一个对党内所作的指示中再次阐述了这一路线：

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

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57〕

基本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从1937年开始，这些目标就是要促进劳资合作和劳资互利。1946年劳动节的社论又再次肯定了这些目标：工会必须说服资方改善工人的待遇，也要说服工人不向资本家提过高的要求。然而，这个目标的两个方面可以有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解释。经济上的事往往不能两全，正像在农村要做到把土地分给穷人却不触犯中农的利益那样，在城市中要使工人和资本家双方同时得益也是经常不能两全。因此，像张家口那样想做到两全其美的努力被放弃了。同时，在一些地方曾经采用的侧重满足工人要求的政策也被放弃。到1948年，政策的侧重点已明确地放到了生产和工业发展上来了。

问 题 运动针对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过分重视工人的要求而忽略了他们的责任，另一个问题是增加工人队伍内部斗争和不和的倾向。

针对第一个问题，陈伯达曾写道，在老解放区，企业的生存环境经常被忽视。工资增长和工作条件改善经常将生产成本提得过高，以至于造成产品滞销，工业发展停滞。一些企业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而大量的公有企业为了保证运转不得不向政府要求过多的财政帮助。〔58〕在哈尔滨，私营企业据说是尤其严重地受到了这种极“左”做法的影响。〔59〕

冀中区总工会主席陈宝玉说，在他的地区这个问题至少从1945年开始就已经存在。在当年10月冀中区工人职员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劳工保障法，规定了过高的工资标准、劳动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陈认为，这个法试图满足工人能提出的一切可能的要求，包括提供所有雇员的服装。在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区，这种对工人利益过分强调的做法，在1946年3月和9月的大会上都

一再得到肯定。在这段时间里，工会的工作人员集中全力改善工人生活，实际上忽略了抓生产和劳动纪律。〔60〕

在劳工运动中“错误的斗争方式”的问题上，陈宝玉也指出了这一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出身不是工人阶级的工会干部都被武断地撤离了职位。连熟练工人与徒工和有技术的师傅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关系也被说成是一种剥削。熟练工和非体力劳动者被认为是工人贵族，很多都被禁止加入工会。按陈的描述，困难在于很多工人运动领导和一般干部都不懂得城市工人工作的特点。他们将农村中搞的阶级斗争引到了工厂里来，把工人阶级分成了不同等级，并让他们彼此对立起来。

这个问题在满洲地区表现得非常严重，中共东北局为此专门发布了一个文件批评这种做法。文件中说，体力劳动者受到了过多的重视而其他人都不加区别地受到打击。这两类人之间的对立使得生产合作变得困难，并最终影响了生产。〔61〕

这类问题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按工人的政治积极性而不是能力和经验来确立工资标准。这种做法被作为庸俗片面的“平均主义、群众观点和经济观点”的表现而受到批判。在1948年5月华北解放区工商业会议上，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华北公有制企业工资制度中最严重的错误。〔62〕

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劳工改革试验 哈尔滨市的总工会早在1947年10月就开始在个别工厂纠正这些问题。〔63〕我们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1948年2月7日新华社社论标志这一运动在各边区的推广。社论不仅对于部进行了批评，也明确表达了对工人的要求。为了其自身的长远利益，工人们必须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削，只有这样才能让私人企业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工人们应当认识到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生产是他们的责任，这就像农民的责任是向政府交大量的公粮一样。作为最先进阶

级的成员,工人们应当能自愿为革命作出牺牲,如果必要,就应当每天工作 10 小时,不要提出过分的工资要求,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互利的方针。

根据这些对工人的要求,1948 年春天和夏天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到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这些措施的大部分(或者至少是从贯彻这些措施中取得的经验)都被写进了第六次全国工人大会的决议。与过去所有类似的重大决议相比,这次是第一个通过在一些重要企业试验的基础上作出的。在最初的几个月中,东北地区,尤其是哈尔滨是这些实验重要的中心。这次劳动改革运动包括了采用累进计件工资制,工资基数被定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但也加进了一些抵消通货膨胀影响的做法;改革措施还包括了工作时间的延长、温和的福利待遇和进行生产劳动竞赛。

计件工资 毫无疑问,这些试验中最难于进行的一一很可能也是最不成功的——就是工资制度上的计件奖励制度。张家口市进行这项改革是建立了一套正式的工资标准,根据工作技能和经验划分的工资级别决定工资基数,在此基础上再发给计件工资或者是根据个人或小组的生产效率给予奖金。

这种基于能力、资历和努力相结合的工资制度是苏联劳工政策的最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像苏联那样依赖于计件工资制。^[64]但是在 1942 年解放区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毛曾建议采用这种方式以鼓励劳动积极性和提高产量。^[65]无论这一建议当时的命运如何,六年以后在同样的条件下,东北的一些工厂确实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以引进这一制度。

按照 1948 年大量赞扬性的报道和评论所说,这项工资制度的价值就在于它成功地把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联系起来。它可以使工人在没有管理者驱使的情况下自愿去提高产量和遵守劳动纪律。即便是工人阶级中最“落后”的分子也能懂得

这个“多劳多得”的道理。

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帮助工人克服在日本和国民党压迫下为了生存而养成的工作习惯的一种必要方法。工人们在当时都惯常于偷工厂东西,浪费原料,以及花半个小时上厕所等做法。陈伯达认为,在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下,过多地增加工资既不能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也不能鼓励他们节约和提高产量。无条件地增加工资只能陷入无原则的经济主义,使工人误以为他们天生就拥有特权和特别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工资被限定在最低的可能性上,同样也不能鼓励工人去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如果将工资平均化,给予熟练工人和干部与普通工人一样的工资,他们就会失去生产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累进计件工资制的工资政策。〔66〕

哈尔滨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贯彻战时工资标准临时条例》,开始推行这项政策。这个条例要求实行按件累进工资制和分级奖金制。为保证工人不因通货膨胀而受到物价上涨带来的损失,条例还规定用以实物价值计算的工分来计算工资。〔67〕

很多地方干部和党员不赞同计件工资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或至少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社会里不适合采用这样的制度。他们担心这种工资制度会像过度高工资在工人中制造“经济主义观点”那样,产生类似的不良效果。他们还担心实际收入的差异会造成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和分裂。计件工资制在实际运作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很多人怀疑除了在一小部分产量可以按个人计算的企业以外,这种制度是否真的可行。

缺乏技术知识也使许多干部在负责执行复杂陌生的制度时采取保守态度。在哈尔滨的一些工厂里,管理者和工会干部因缺乏经验和足够的数据,在制定产量标准时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结

果是定出的产量标准大多都很不合适,不是太高就是太低。[68]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哈尔滨的两家主要报纸《哈尔滨日报》和《东北日报》在1948年的上半年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评论,详细介绍成功地采用计件工资制工厂的经验,目的是让所有的工厂都能采用这一制度。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应当视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必要搞一刀切。但是,干部们担心采用报纸上介绍的经验,会使他们面临的复杂任务更加复杂,而不是有所简化。

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一家造船厂。该厂于1946年11月开始采用这种分配制度,到1948年春天,这个制度被落实到所有生产工人的身上。为贯彻这个制度建立了一套在劳资部统一协调下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生产标准部、统计部和生产事务部。在船厂的每一个车间,如木工、锻工和电工车间,都建立了与生产标准部相应的小组,这些小组负责调查和确定产量标准。

产量标准的确定要涉及到劳资部对各车间进行的计划和产品种类的分配。生产计划因此被分割并被分派到各车间中。各车间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要负责具体确定完成各项任务所需的工作时间、技术水平和所需原料等。然后将这些标准上报给生产标准部以及其所属的小组,由他们进行调查、评估和最后确认。在生产材料下发和工作开始之前,工厂要保证工人们能了解这些标准和他们每小时、每月的工作计划。在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骤中,工人们都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

最后,这个工资制度还要求有一个多层次的检查制度:(1)工作小组和车间工人之间的相互检查;(2)车间负责技术人员进行的检查;(3)劳资部技术人员进行检查;(4)负责布置任务的人进行批准,必须由他签字工资才能下发。[69]

劳动竞赛 为了能通过竞赛提高产量,以精神和物质奖

励为基础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运动,争当劳模运动以及争作贡献运动。在苏联,劳动竞赛已经被体制化。对中共来说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农业生产中就被采用了。

可是,在工业生产中,这些竞赛通常是与计件工资制连在一起的,进行这些竞赛还需要有同样复杂的行政机构来保证。实际上,不管是计件工资制还是劳动竞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工厂开始制定生产计划,这是走向经济计划的第一步。有关安东市一家纺织厂进行生产立功运动的报道干脆认为,竞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工人和管理者都学会设定和完成他们的生产计划。〔70〕

像共产党当时进行的其他劳资改革一样,工人们并没有反应出主动的热情。一家机器制造厂在1947年9月开展了争当劳模的竞赛,只有大约10%的工人愿意参加。大多数人或是不感兴趣,或是认为这种做法很可笑。但到了10月底,工人热情开始上涨,到最后,大约70%的人都参加了竞赛。产量逐渐上升及生产任务有时超额完成后,使该厂有可能引进计件制。工厂采用这种做法后,所有超过其生产标准和目标(在产量、质量、生产时间、成本等方面)的工人都得到了累进的工资增长。计算方法是从工人们超过其生产计划的5%就可以多得到其基本工资的10%开始,一直到完成生产任务70%以上就可以多得到100%的工资。〔71〕

工资的基础:工资级别 按照苏联的做法,中国建立了一套按技术水平和工作经历划分的七级工资制以确定工人的基本工资。按照政府为东北的产业工人制定的标准,一级工是每小时11.5元,一直到七级工是每小时36.5元。技术人员和职工部采用另外一套十五级工资制,一级是每月3500元,最高的十五级是每月17,000元。

工人和所做的工种都按七级进行划分。以上面提到过的船厂为例,假设一定数量的铸造工人铸造一个一定数量铁锚的标

的规定是不要高到公布的能满足两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在 1948 年春天物价仍是持续上升,政府因此建立了一套粮食配给制度,向工厂供应低于市场价格的粮食。在前面提到过的机器制造厂里,每个体力工人每月可以买 16 公斤粮食,非体力工人可以买 12 公斤。在这个基本定额以外,每个工人都可以为不能工作的家属买 9 公斤的粮食,这包括 50 岁以上的父母和 16 岁以下的儿童。

但是,工人们总是不愿意让他们能真正拿回家的收入明显地减少。在一个大豆加工厂,工会干部基本上是靠小组讨论中施加压力,以工厂关闭和所有工人失业相威胁。工人们最终不仅接受了降低工资——以供应低价粮食和燃料相补偿——和放弃年终奖金,并且改进了他们的工作习惯。帮助达成总体协议的包括一个由工人自身组成的生产检验委员会和一些为推动劳动竞赛和维持劳动纪律建立的小组。到 1948 年夏天,该厂与前一年秋天相比不仅生产成本下降,产量也提高了 30%。这使工厂可以进行必要的修复,扩充固定资产并增加了 50 名新工人。在这家工厂,计件制和奖金制是在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并产生效果以后才被采用的。[75]

类似的方法在处理吉林八个私营铁厂的问题时也被采用。这些厂主要生产农具,包括锄头、镰刀、斧头等等。当时是由这几家厂所在区的政府组织谈判,先是解释政府的经济和劳工政策,然后作为中间人与劳资双方分别进行讨论。工人们最后同意过高的工资是不公平的;资方代表也同意工人人们的收入应当比公有企业稍高,因为公有企业工人有住房等其他方面的一些好处。最后,工资标准被确定在不超过公有钢铁企业工人 10% 的水平上,月工作时间也由通常的 26 天减为 25 天。另外还确定了工人的工资要用发薪当天的粮食价格进行计算,制定了超产奖金制,

在生产淡季裁减工人和在旺季增加工资等方面的问题上也达成了协议。〔76〕

哈尔滨的一家有轨电车厂碰到的问题不同。这家厂中,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之间几乎不存在工资差距,一些学徒工的工资甚至比熟练技工的工资还高。在5月工人代表大会开过不久,该厂就组织了小组讨论,研究工厂的形势和改革方案。工人们坦率地表达了他们对厂方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算账和调查才使大多数人能够同意,工资水准对于体力工人和熟练技工应当有所不同;学徒工和老师傅的收入应当有明显差距;在确定工资级别时,技术水平和产量应当是比政治观点更重要的因素,等等。〔77〕

这场工资改革运动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些私营业主利用这次运动的反“左”的精神,趁机压榨工人以获取暴利。这样,提醒地方干部进行既反左又反右的两面斗争就显得十分必要。像以前一样,干部们被要求通过“说服、引导和命令”来使资本家们遵守解放区的法律和政策。在私营哈尔滨兴源被服厂(音)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厂开始时是个自给自足的小企业,后来发展成该市最大的一个。厂里工人们开展过劳动竞赛,工厂也得到政府的资助和低价公粮。工厂利润增长了,但企业主却不愿与工人分享,相反甚至还降低了工人饭菜的质量。工人们不断向企业主反映困难,得到的只是永远没有兑现的口头承诺。一些工人辞了职,剩下的在工会领导下开始拆工厂的机器,一些机器被彻底毁坏。工人人们的计划是自己建立一个工厂。这时,企业主最终不得不屈服,并同意以365万元的价格将工厂卖给工人。工人们从政府得到250万元贷款买下了这家厂。

第六次中华全国劳动大会

几个月劳动工资改革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在第六次中华全国

劳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总结,并经过规范化以后在所有解放区推广。这次大会于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国民党占领区的50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名称原定为全边区工人职员代表大会,作为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许多地方召开的基层代表大会的总结。由于大会任务的变化,临开会时修改了名称,目的是为了坚持中国工人运动的传统。中国工人运动于二十年代达到最高潮,前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那时召开。〔79〕

为了能通过更广泛的决议以具体指导在国统区和共产党占领区进行的不同的工人运动,大会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曾在组建工会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现在,在1948年,第六次中华全国劳动大会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通过了一整套新规定,并选举产生了新的执行委员会。〔80〕

大会决议中有关解放区的部分,对管理者和工人两方面都作了规定。对于前者的规定,将在下一节讨论。大会针对工人采取的路线,其精神与党在1948年2月土地改革决定的精神相类似。这个精神大致代表了在过去的“左”倾主义实践和近一段为克服这种错误所做的全面努力之间的一种妥协。很多棘手问题被留待以后解决,很多建议也被定为是实验性的方法。但是,这次大会依然标志着共产党劳工政策最倾向于工人一方的时刻。1945—1947年间最初的做法被抛弃,当时“过分自信”的错误也被彻底纠正。党的劳工政策变得更注重生产,目的是为了取得即将到来的军事上最后全面的胜利。

决 议〔81〕 大会决议的主题就是要为战争和革命胜利作贡献。在工作时间问题上,决议规定每个工作日是8—10小时,在特殊情况下最多也不能超过12小时。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9月份公布的补充文件,所谓特殊情况包括一些

无法立即将工时缩短到 10 小时的小企业,也包括那些不能立即实行三班轮换但又必须 24 小时连续运转的企业。执行委员会鉴于不同企业情况差别很大,没有作出统一规定。执行委员会还认为,解放区的休息日、节日太多,要求企业每年的开工时间应当是 300 天或者更多。〔82〕

在工资问题上,工会决议规定,一个工人的工资应当能保证两口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必须要能保证一个人的吃、穿、住和其他日常需要。工资制度应当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较理想的是采用以计件和工作时间为基础的分级交叉工资制。

实际上,决议更多强调的是分级工资制而不是计件制。很明显是考虑了推行这一制度时遇到的困难。与前一段认为计件制是最好方式的态度截然不同,大会决议规定计件制只有在能促进生产的前提下才能采用。如果缺乏经验或生产过程不适合,则不宜采用计件制。尽管张家口的工会领导曾批判过日本人用分级工资制来分裂工人,全总执委会却发现这种类型的制度“值得深入研究”。〔83〕

大会批评了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诸如为所有的工人,不论是徒工还是熟练工,不管是体力工人和非体力工人都采用固定统一的工资标准,这种错误的做法应当得到纠正。大会还批评了那种在评定工资级别时将工人的家庭背景、政治表现、所抚养人口等条件考虑进来的做法。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工资应当依照他们的能力、教育程度和过去的经历来评定;技工和手艺人按他们的技术和经验评定;体力工人则按照他们的岗位和工龄评定。解放区的各地方政府被要求要为类似的行业建立起统一的工资标准,然后由各工厂决定个人的实际工资。

在新解放区,所有收归公有企业中的个人基本工资水平都

应保持不变,只能视情况发一些生活补贴。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农业工人的工资也要保持在解放前的水平上。这个规定显示了共产党自 1945 年来劳工政策的变化,它不会再像刚占领张家口时那样让所有工人的工资立即增加两倍以上。

十八日由 口西接色江左延转 通化彭彭部不可能避免 六

运动,以便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

1948年8月以后,中共的劳工政策继续沿着第六次劳动大会所确定的方向发展。在可能的地方都建立起了合作制商店,以保证工人和政府职员的需要。其中一家这样的合作社于1949年初在沈阳建立。这家合作社在该市的每个区都有分店,向15,000多名包括中小学教师在内的政府雇员供应日常必需品。^[84]5月份,针对该市纺织和服装厂工人的合作社开始筹建。货源由上年11月沈阳解放后建立起的国营商店提供。与此同时,该市的5万多产业工人的工资开始改为一半是现金,一半是供应券,供应券只能在工人合作社或国营商店使用。^[85]

苏联模式的出现 当时,关于“支援前线”生产运动、模范工人运动以及立功运动等等的报道越来越多。东北地区总工会1949年3月中作出指示,号召所有已恢复正常生产的国有企业开展生产竞赛,取胜的小组和个人将在“五一”节的劳模大会上得到表彰,并给予荣誉称号和奖金。^[86]

这个时期劳工政策方面最广泛宣传的发展就是劳动保险制度在东北的建立。它对工人的意义被认为是与给农民分地一样重大。^[87]这个项目最初在七个主要行业和公有制企业中推行:铁路、采矿、纺织、电力、邮电、军火和军需品,资金来源是雇主每月缴纳的工资总额的3%。这个项目在工人死亡、受伤、生病、年老和怀孕时向他们支付费用和赔偿。企业保险基金的剩余部分可以被用来改善医疗和幼托条件。这个项目还包括一个总保险基金,由东北总工会用于建设和维持工人保健站和残疾人、孤儿等的福利院。^[88]

专为工会干部制定的一套宣传大纲中指出,尽管这个项目不能解决所有工人的困难,但这是政府在战争时期为工人所做的最大努力。另外,这预示了一旦全国解放还将会有更大的改

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一套像苏联劳动保险制度那样完整的制度。这被当作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它解决了工人阶级的所有物质困难。〔89〕

无论这些保险项目的出发点是如何好,也无论它们是怎样精心设计的,最终的结果还取决于贯彻推行的过程。共产党这时最大的困难大概就是缺乏有经验、受过在解放区城市工作必要训练的干部了。〔90〕1947—1948年的整风运动就是党对土改中干部工作不力而作出的反应。但当时的任务还不需要采用大量新技巧才能完成。但在城市中,通常来自于农村、缺乏经验的干部所造成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很快解决这些问题。〔91〕

到1948年底,一项从华北大量派遣干部到东北的计划被中止,同时开始了相反的,由东北向南输送干部的准备工作的,因为接管新解放的城市急需大量干部。为应付这一困难局面,再次开始强调干部的培训和教育。共产党东北局发布指示,要求除少数例外情况,所有县、区级的文职官员都必须是新干部,指示还要求为培养大量新干部去担负不断增加的任务,省、县、市党组织应大规模开办党校、培训班和其他专门学校。〔92〕

具体在劳动部门,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9年2月20日联合发布指示,各城区工会和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工人中培养阶级意识并选拔出一大批无产阶级的干部。指示要求建立工人业余学校、技术培训班、俱乐部、工人图书馆和工人政治学校。到6月时,仅哈尔滨一市就报道说有2,130多名工人参加了各类的培训班。〔93〕大概是因为感觉到太缺乏自身经验,东北地区的党领导这时开始在劳工工作中把苏联看作是一种模式。

有关苏联工会工作的俄语文章被大量翻译过来,作为工人

阶级新干部的参考资料。一册由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提供的书，描述了苏联工会干部是如何工作的，介绍工会是如何为苏联文化上的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工人生活质量改善作出贡献的。该书还强调了在完成生产任务和发展苏维埃经济过程中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重要性。^[94]另外一本小册子介绍了在苏联和其他处于东欧地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工会的作用和成就，它们不仅致力于改善工人福利，还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通过这样的方式，干部们相信中国正开始走上了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道路，工人参加劳动竞赛的人数将持续上升，工作和生活条件将不断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人有免费医疗，孩子们都在幼儿园受到很好的照顾。^[95]

商业、工业和管理

工人们所能有的疑虑，在商人和企业家身上可能会更多。这些疑虑产生于共产主义对于私有企业的总体看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和说法。首先，共产党在解放区禁止许多种非日常生活用品的贸易已经对某些商人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山东菏泽地区商人中间产生的愤恨情绪，尽管共产党尽力地在对当地的商人们表现得“特别礼貌”。^[96]

第二，我们也曾提到过，在1946—1947年间，地主在农村中拥有的工商业财产都被划为封建经济的一部分，并因此被没收，转变为集体性质或政府管理的企业。第三，中央也没能——或至少是没能保证它的基层干部——停止没收地主在城市中的企业。还有，共产党在一开始没能限制城市工人向雇主提出过高的要求，使他们像农村雇农最初时那样，向地主和富农雇主提出过分的要求。尽管所有党的指示中都指明了农村封建经济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别，并要求保护后者，这类行为还是经常发生。^[97]

在农村土改运动中，因为要推动运动发展，中农问题被允许

存在。但城市中企业问题上政策与实践相悖的情况却连这样的解释也找不出。这个问题只能被解释成在政治空前重要的情况下,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产生冲突的暂时现象。否则就只能解释成是政策错误或是地方官员的问题。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的严重缺乏,使最后一种解释变得不可否认。当然,第九章中提到的劳工问题上激进主义方式的长久存在,说明前一种原因也是存在的。

不管原因究竟如何,公布的政策与实际做法之间的矛盾只能加深资本家的疑虑。当然,这种疑虑产生的根源还是党对商人和企业家的理解,正像香港一家自由派杂志的一篇社论所说的那样:

商人和企业家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也有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但是现在,一些政治理论家想把商人和企业家放在人民的对立面。如果有人说他欢迎工商界和人民的合作……那就是说商人和企业家与人民并不一样。这类概念也正在引起商界的反感。[98]

正是意识到这种反感,中共从1947年底开始长期努力以改变这种情况。随着军事力量对比中绝对优势的取得,保护工商业、与私营企业合作等成为了共产党城市政策的基石。

反左运动:与私营企业合作 最早还是在1948年的春节,共产党给天津市内的公司都送上了一份贺年卡。卡上写到:“我们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如果我们在新年里进城,请不要惊慌。我们将很快恢复秩序并欢迎你们做生意。”[99]当时在天津的很多人,尤其是外国人,都觉得这很可笑,虚张声势的农民游击队竟敢用这种语气说话。

到了春天和夏天,党的指示和会议决定等肯定了这一说法的严肃性。这种说法与两个广为宣传的讲话精神也相一致。一

一个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节选,另一个是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的谈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毛强调说,“过度改善工人条件,过高的收入税,在土改中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和其他类似的极“左”政策不允许像1931—1934年间那样再度出现,他把“工商业者”定义为“所有独立的小工商业者以及中小资本家”。^[100]

任弼时的观点还要更进一步。我们在第七章曾提到过他把没收农村小商人财产说成是自杀性的错误。他没有进行城市与农村、资本家与封建企业的划分,而是认为地主和富农的工商业也不应当被没收。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这样说过,但很明显他是认为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都不能这样做。^[101]中共是否从村一级就开始鼓励地主继续发展工商业还搞不清楚,因为至少是从一个边区的情况来看,这时中共政策的变化是非常厉害的。^[102]但在2月27日一份党内的指示中,毛再次强调了城乡区别,像在以前的指示中一样,他说:“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毛没有具体说农村工商业实际上应仍由地主私人控制。^[103]

但是有关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还是制定得非常明确:它们应当得到保护,并且出于整个经济发展的考虑,工人必须放弃他们要立刻得到大量好处的想法。在土改过程发生过的,没收守法地主城市工商业资本的做法与党的政策相违背,不允许再继续发生。允许没收的只能是地主在农村的土地。在城市里,只有真正的战犯、反革命和官僚资本家才能被没收财产。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或其他任何未经授权的人都不能去查封工厂或商店,只有政府才有这个权力。所有被没收的工商企业都将进行集体管理,有政府负责经营或出卖。只要可能,就应让这些企业正常运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瓜分或损害。^[104]

政府还对管理那些业主因“不理解”党的政策而跑到国统区的企业作了规定。政府保证这些逃走的人仍具有他们的财产权，并负责指派人员管理他们的工厂或商店。企业要照常运转，如果资本家跑回来，一切还将归还他们。解放区政府通过广播告诉资本家欢迎他们回来，并保证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105〕

1948年年中召开的华北〔106〕解放区工商业大会，对工商业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决定。大会通过的最重要决定包括公有和私营企业相互的关系，金融政策以及劳资关系等。〔107〕在第一个问题上，国有制企业将集中于重工业、军火、机械制造以及重要产业的原料生产等方面。会议对商业企业的规定较模糊，只提到国有商业的任务是通过稳定重要商品的物价，保证消费和生产供应以服务于生产和战争。还强调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供销体制，以保证所有公私企业都能得到生产必需的原料和设备。

会议确立了一套累进税制，工商税的税率被定在净利润的5%—25%之间。相比而言，1946年在张家口，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都至少是暂时地得到了免税的待遇。新的规定是所有营利性的工商企业，无论公私，都要缴不超过净利润百分之25%的税。只有农村手工作坊、合作社、特定的国营企业，对工商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企业，以及因战争原因遭受严重损失的企业可以享受减免税。总体上看，工业企业的税率比商业要低，而且为鼓励一些重要产业的发展，一些工业企业还可以从特惠税中得到一些好处。

在参军问题上，工商业者可以通过付一笔拥军费以代替服役。这也包括了上前线抬担架，参加支前运输等义务。这些有关他们对国家经济和军事义务的基本原则规定，在1948年9月的华北解放区财政会议上得到再次肯定。〔108〕

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工商业会议所制定的温和政策与不久

之后召开的第六次中华全国劳动大会正式通过的政策相同。

中共总爱引用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的有关数据，来证明其政策的正确性和切实性。经常被引用的是在哈尔滨、牡丹江、安东等城市和其他解放区城市中公有和私营工商企业令人印象深刻的数量增长。^[109]中共工商业政策在1948年3月占领吉林后遇上了最大的挑战。当时吉林市有200,000人口，该市工业发达，包括一些重工业和纺织业，工厂和商店总数达到3,632个。出于各种原因，在共产党占领吉林时，这些企业都停止了运转。

国民党军队刚刚撤走的时候，城郊的农民就跟着进了城，把地主抓了起来，并开始向企业主“算账”，拆毁机器，抢劫商店。这种混乱状态持续了很多天之后，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才开始得到贯彻。

中共命令停止抢劫，并召开全市行政干部大会重申党的政策。在秩序恢复以后，召集工商业人士开了十多个不同的会议，解释党的政策，并请他们发表意见。这些会议据说是“非常有效”地消除了资本家的恐慌。但同时，由于工人要求过高的工资，劳资关系的问题还在不断产生。

工人们大胆行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夺取胜利果实的时候。管理者显然是不敢进行干预。在一家鞋厂里，工人们甚至拆了机器后抬走。最后，政府不得不派出官员和工会干部与工人接触，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市政府还在其他几起劳资冲突中进行了协调和仲裁。

同时，为恢复工商业生产，政府还提供了很多贷款。但大部分贷款都给了一些需优先照顾的企业，如钢铁厂、铁路和供应军需的纺织厂、被服厂和制鞋厂。政府还帮助企业获取焦炭、棉花、原木材等必要的生产原料。4月底的报道说，吉林市92%的工商企业都已重新开门营业和开工生产。^[110]

当然,这些事情还不足以消除企业界的恐慌。安抚运动还在进行,经济学家许涤新的话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典型:

在内地和香港,我们工商业的同胞对解放区的城市社会改革都还存在一些疑虑。这些疑虑可分为三点。第一,他们担心解放军将把农村土地改革引入城市,用在工商业企业身上;第二,他们担心解放以后,工人们会压迫企业主;第三,他们担心一旦新民主主义政府建立,它对私营企业不利。

针对上述每一点,许都重申了党的有关政策。在回答第三点有关保护工商业是不是一个暂时姿态的问题时,许说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疑虑,他尽了最大努力去打消它。他写道,中国面积广大、人口众多而经济落后,所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生产和经济发展起来非常必要。如果我们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政策,剥夺资本家的生存权利,我们将注定要失败。〔111〕

一年后,李立三也写道,我们确实是主张共产主义,但由于我们经济发展水平太低,实现它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他继续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况与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和东欧国家不一样,中国不可能像它们那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者像俄国那样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12〕

香港的《华商报》也作了这样的保证。它把解放区制定的第一个进出口条例在这块英国殖民地公开发表,这就是《山东解放区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还包括了一套有关关税的规定。香港的商人对与共产党控制地区建立贸易联系非常感兴趣,但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和会得到什么。公布第一个条例也没有打消他们的疑虑。为此,《华商报》又在1949年初就当地商人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

该报的通讯员解释说,共产党外贸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要发展农业和工业,要支持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因此,它的外贸政策

是鼓励必需品的进口,反对进口奢侈品和解放区自己能生产的产品。这些原则实际上与一些边区在与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进出口”贸易时所采取的原则相同。公有的贸易机构将控制五大命脉性商品的进出口:大米、棉花、食油、猪鬃和黄金。其他商品的进出口都可由私营公司进行。〔113〕

但是,所有的贸易都必须严格遵循进出口平等的原则。中共对这一点的重视到了极端的程度,因为它想避免国民党政府时出现的贸易不平衡。由于有了这个前提,再加上缺乏外贸经验,中共规定进口商在进口外国货物和原料时必须负责出口同样价值的货物。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极不方便的易货贸易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很快被抛弃,但保持严格贸易平衡的原则还在。

中共从来没有像在贸易和金融领域这样缺乏经验,也没有像这样急于取得商界的支支持去帮助它打破经济上自给的状态。自给自足是作为一种战略在边区经济封锁时发展起来的。在这些方面,共产党总是非常明显的表现出头脑简单。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它安抚私营企业的努力总是不能完全成功。《时代批评》杂志编辑1948年12月的一篇文章,对当时商界的感觉的总结可能是再准确不过了。这篇文章写道:“对资本家来说,新政权大概是不会再像蒋介石那么糟糕了。但我们不要忘记,大多数的中国商人……都在担心将来只会变得更糟糕了。”〔114〕

工业管理:国营企业的挑战 中共急于克服缺乏经验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工业管理。这个问题来得更为严重,因为它急于发展那些在公有制控制下的重要产业。因此,华北解放区工商业大会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形成一个《公有制企业经济纪律草案》。薄一波在大会上就工业管理所做的发言,告诉了我们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争论所在。薄好像是在重复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著名论断。〔115〕他说:“我们经济工作者应当学习管理,要

学习资本家在企业管理中所有的科学和合理的做法；迅速学会管理这项工作是我们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16]

在1948年夏天，让中共领导最感烦恼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很多单位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第二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合理的组织和工作作风。

其中一个浪费的例子发生在一家煤矿，该矿未经采掘工程师事先勘察就开挖了一条新的矿道。矿道开挖花了30多万元。开好后才发现矿脉很薄，开采潜力很小。与此类似，在晋冀鲁豫边区，军队未经征询建筑工程师的意见就建起了好几个空袭掩蔽所，结果掩蔽所全部坍塌，造成了40-50万元的浪费。

这类不合理组织和工作方式的例子还很多。工厂的工资单上经常有过多的非生产性人员；工业干部的选拔不是基于专业能力，而是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家庭背景和资历；生产成本很少计算，营利和亏损的关系也很少有人关心；企业经营的目标经常不是发展生产而是给工人提供帮助和救济。

华北工商业会议明确要克服这些缺点。工业项目未经上级批准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和计划不许开工。另外，还要求所要工业企业要进行合理化管理。^[117]

两个月后召开的第六次中华全国劳动大会也确立了类似的工业管理目标。大会规定了专业化的原则，要求每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都应当制定详细计划，包括从原料投入到成品销售的全过程。大会还要求建立人事管理的详细标准；执行检验制度，以确保产品标准和合理的工作条件；建立严格的个人责任制度，要求每个工人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各自负责。^[118]

个人负责制是苏联工业管理的一个特点，对于更熟悉集体责任制的中国工人来说，这是一项革新。新责任制最早是在1948年满洲铁路的管理中引进的。满洲铁路系统（或称作中国

长春铁路),是1946年苏联红军撤退后俄国人依然存在的少数几个区域之一。^[119]新责任制的实验最早是在牡丹江市铁路员工中进行的。在此实验基础上,东北铁路部门党委决定在全东北铁路工程师中采用这一制度。过去采用的轮班制,是除了苏联以外所有地方的通行做法,没有人对特定的机车专门负责。现在这套制度被废除,代之以责任制,由两三个人负责一辆机车的运转。^[120]

联想薄一波的观点,在工业管理上是采用苏联的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的争论显然仍在继续。针对这一争论,东北铁路党委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管理经验在弄清其优缺点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有用的材料参考。但它最终认为苏联的经验应当作为新中国的基本模式,因为苏联已经对西方的管理经验做过研究,并吸收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121]

无论采用哪一种模式,进行专业化管理都需要经过数月乃至数年的集中努力才能做到。哈尔滨市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东北日报》1948年夏天刊登了一篇评论。评论说,科学的工业管理对我们是一项崭新的任务,尽管在铁路管理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市政府的工业管理还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成本计算、物资分配、产品质量保证等等。进行调查、研究和计划的体制还停留在最初的阶段。^[122]到11月,这家报纸又发表评论,指出在8月份第六次中华全国劳动大会后,东北地区的许多国营企业都向着专业化管理迈出了第一步。但是,还没有一家企业做到了真正、完全的专业化。^[123]

这篇评论还指出,东北的公有制企业对民主管理都不够重视。按第六次中华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工厂里要建立管理委员会,由厂领导、高层技术人员、厂里其他负责人员及普通工人代表组成。厂长是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职能是对企业管理

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如果委员会认为上级主管政府部门的指示不正确,主席有权将委员会决议上报,要求给予另外考虑。

另外,超过 500 人的大工厂还应建立由所有工人包括徒工选举的代表会议。在厂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代表会议的职责是宣传厂里的决定和生产计划,总结经验,收集工人的建议和批评。但在 1948 年,工业民主也像科学管理一样,只能作为一个未来的目标而不可能成为现实。

从农村到城市 1949 年的中国共运

间,限制工人提出的要求,强调劳动纪律,鼓励私人投资等等。

在后面提到的这些做法,预示了到1947—1948年时中共将采取的更果断的政策。这种趋向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形成,当时开始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运动。中共的工商业和劳工政策明确地开始转向以支援战争和进行经济建设为目的,要使产量达到最高。新的政策强调与私人资本进行合作和在公有制企业里推行专业化管理。工资评定中以政治表现为准的做法让位于以技术、资历和贡献为准。解决工人阶级物质生活困难的目标没有被放弃,但也被限制在仅给工人本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尽量减小通货膨胀给工人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些方面。同时,对未来所做的许诺也只是以1949年初东北地区在公有制企业工人中,推行劳动保险制度的试验性做法为象征。

在城市和农村进行的反“左”运动,尽管在时间和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各自的作用上还是有许多差别的。在农村,反“左”运动标志着一场真正群众运动的最后高潮,它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摧毁了当时的乡绅制度,平均了土地所有权。在城市却不是这样。1948年在城市中开始的反“左”运动标志着中共的一个新起点。城市管理从这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而在此之前它还只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延伸。在城市进行反“左”运动是为了至少暂时稳定资本家的剥削地位,使其不至于受到劳工运动过分的冲击。在反“左”运动阶段,工人对党的城市政策有所抵触的表现是激进主义,我们将在第九章对有关全国主要城市解放后几个月内劳工问题的讨论中进行描述。

实际上,李立三在1949年中时也承认过一些工人仍对党的劳资互利政策存在怀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党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而将改善工人生活放在第二位。他们还更尖锐地问道,为什么不像在农村将地主财产分给农民那样将资本家的财产分给他

们。一些工人还问道，既然资本家发财靠的是剥削工人，他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更多的生产，因为这只会使资本家得到更多的利润，也就是进行更大的剥削。

对于第一个问题，李立三的回答是，土地分了以后仍然可以发展生产，而如果将工厂和商店或是机器和货物分给工人，像一些地区做的那样，结果就完全不同了。生产或交易就要停止，工人自己也将失去工作。在城市里分财产既不有利于生产，也不符合工人的利益。

对于工人的后一个问题，李指出，在过去，工人确实遭受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三座大山的剥削。现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败，私人资本的剥削也受到了政府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的限制，最终，这种形式的剥削也将被彻底消灭。剩下的只有中国工业极度落后的状况，而国家资本仍然还很薄弱，不能全部担负起发展工业的任务。所以，不仅有必要利用私人资本，还要动员他们尽可能多地投资于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允许私人资本家营利，这有利于国民经济，也有利于工人阶级。^[124]

城市进行的反“左”运动还预示着重新排列发展重点。在1945—1946年，张家口的经济发展目标反映出中共还完全是以农村为取向，它只是边区大生产计划的一部分。边区当时强调农业重于工业，轻工业重于重工业。到了1949年，中共历史性的任务转变，表明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开始，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和农业。

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教导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占领重要城市并夺取政权，然后革命的力量才会进入农村，领导和组织农民，建立工农联盟。但在中国特定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优秀的学生”毛泽东却创造了一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

这个战略的正确性在于城市中敌人的力量强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弱小。如果中共一直遵循教条留在城市中，它就不可能积聚起足够的力量去击败敌人。

因此，当党的工作重点突然转变的时候，有些人就问道，为什么要转向城市，并通过它来领导农村。回答是，因为革命的力量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占领敌人的城市堡垒了。并且，敌人的城市掌握着中国经济最先进的部分，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25〕

党在农村的基础是取得胜利的必要因素，但没有城市，胜利就不完全。用农村包围城市，但辩证地说，还需要通过城市深入农村，以巩固从农村取得的胜利果实。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平，这不仅标志着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首都，还标志着共产党重新开始以城市为基础。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共希望重新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

为方便那些不能立刻跟上新形势的人，城市领导的职能被详细地列举出来。这意味着城市为农村提供科学的革命精神；意味着起领导作用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所有的城里人；意味着拥有阶级意识、集体主义观念、有组织、有纪律、有科学远见的工人将领导农民，并帮助他们克服落后和保守；意味着工业将领导农业走向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管理，为实现现代化、集体化和最终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技术和物质基础。但是，新的城乡关系并不包括“发展农村手工业使农村城市化”，并“在城里开辟花园使城市农村化”这样“美好却无用”的目标。〔126〕

基于这些原因，工业建设被定为党城市工作的核心——新的中心任务。根据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今后城市工作的基本重点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依次发展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和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诸如建立政

权、党的组织工作、建立工会、组织群众、安全、文化、教育和宣传都将围绕着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毛号召全党尽最大努力学习工业生产技术和方法，学会管理商业和银行。〔127〕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由于缺乏自身的经验，中共日益以苏联为仿效的榜样，尽管认识到两国之间在革命战略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的差别。苏联经验因此成了中国开始发展经济的最早模式，影响到科学的管理和计划、工业管理责任制、工资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竞赛、工会工作以及将重工业作为投资重点的经济战略等各方面。

1948年底东北全面解放以后，党的领导根据新的方针作出了1949年的工作规划。首先，工业建设需要有重点明确的总体经济计划。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就是要迅速恢复重工业生产，尤其是钢铁、机械制造和电力，还要发展与此相关的铁路运输、农业生产、金融和贸易。为制定和实施这样一个计划，党员们被要求加强对行政协调、重点、局部服从全体、后方服务前方等概念的理解。

第二，党要成为建设计划的宣传者，用新经济任务教育干部和群众，批评错误思想，消除疑虑，学习苏联前三十年的经验。党员被要求牢记工人运动、青年工作、组织群众等所有工作都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务。

第三，党必须要更多地注意工人自身，以保证他们有合理的收入，不能因通货膨胀而碰到不该有的困难。但这一工人运动工作不能影响经济建设和生产计划的完成。要准备足够的干部去担负工会和工人中的党的组织工作，去领导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人代表大会，促进企业管理的专业化和民主化。

最后，地方党组织要在农村建立供销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应

是在城市领导农村体制下，城市国营经济与农村小生产之间最好的联系纽带。合作社要向农村供应布、盐、油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担负着收购农产品的任务。〔128〕

但是，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缺乏有城市工作经验和能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的干部。这也是1948年夏天那次会议所批评的“无纪律”和“不合理”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些官方文章也描述了干部们的农村游击意识和在城市中生搬硬套农村工作方法的倾向。上述东北地区的工作规划中说到，党在当地已经在领导和思想方面成功地开始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一直没完成，也没有转变好。有个作者这样评价：

现在我们正从农村转向城市，最大困难是一些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人身上存在的落后、保守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满脑袋是农民意识，不能懂得城市能在革命事业中担负的伟大领导作用……这些人大多数还习惯于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凭他们狭隘的游击经验，他们不能系统地掌握城市工作方法。〔129〕

由于一直过着艰苦、贫穷的农村生活，很多干部在进城后很容易地就腐化了。但主要的困难还是缺乏管理现代城市经济，尤其是工业部门的知识。党员和干部们缺乏进行系统的计划和工作的能力。他们不能掌握城市是个集中和统一的整体的概念。他们的工作是零散的，缺乏协调和缺乏中心的，像他们在农村时一样。在这些问题没解决前，很多工厂的生产都受到了影响。举例来说，由于暂时缺少棉纱，沈阳北关区的一个领导干部就命令关闭一家纺织厂，后来在处理豆腐生产和人力车停车点的问题上，他也采用同样的做法。这样的随心所欲，在农村打仗时可能是取得生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对于城市大工业的长期发展就很难说是有利的了。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沈阳铸铜厂厂长张济新(音)身上。这个

厂年产几千吨铜。这位张同志对生产技术知之甚少，他认为厂里的熔炉工作正常就下令停止了常规的维修检查。结果是两个主要熔炉损坏，全厂停产。事后他也没做任何调查，只是向工业局交了一份简单的报告了事。〔130〕

在西安，共产党接管城市后，管工业的干部因为害怕手工业工人会失去工作，就不让有关的机械化工厂恢复生产。在很多地方，干部们不让妇女进厂干活，而是分给她们大量的棉花，让她们在家里用手工纺线。结果是很多纺纱机因为缺乏棉花而无法满负荷运转。在东北，工会领导甚至不得不专门为收会费发指示。一直在农村工作的干部们似乎不懂得收费的重要性，对于开发票、记账一类知道得就更少了。〔131〕

哈尔滨、吉林、安东等城市的干部也被批评分散了城市政权力量，因为他们把组织和教育工作集中在街道一级。〔132〕解放区的城市最早是通过市、区和街道三级的行政体制来管理的。这种制度于1949年6月22日在天津被作为一种错误的城市管理方式而正式废除。新华社的一篇社论批评说，这种做法是想把农村的政权结构——县、区、村三级政府——搬到城市中来。在农村，经济与人口处于分散状态，不像城市这样集中。城市的工厂、银行、学校和其他组织无法由区或街道政府有效管理。这种分散政权的做法对很多城市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负有责任，它使市政府的政策得不到贯彻。评论指出，因此，城市的决策权应全归市政府，政策也应由市府各部门直接执行。〔133〕

天津市在一个由560名市、区和街道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宣布废除区和街道两级行政单位。市委书记批评他们缺乏纪律，他还感叹区和街道政府工作中的人浮于事。废除这两级行政单位后，它们的所有工作，包括教育、宣传、文化、组织、公共卫生、安全、户口和工商业及合作社的管理，都集中由市政府的各局负

责。[134]

在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决定正式宣布以后,很快又出现了另一类明显的问题。这个决定显然让很多在农村工作的党的领导和一般干部以为农村工作再也不需要了。要指出的是,这时干部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从北方的城市里招募来的青年知识分子。[135]突然之间,每人都想进城去工作,并留在城里。于是,在一些几乎没什么工业也没有其他什么意义的小城镇里,也集中了大量干部,而其周围的一些乡村依旧是土匪、地主残余或是其他坏分子肆意横行。

到林彪率领军队进入华中地区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党的地方领导在城市能领导农村前,农村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改革。在东北和华北,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农村广泛建立了人民政府,为党转向城市创造了条件。在其他地方,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党不能放弃农村的工作。这是林彪在他的《华中局未来工作的报告》中的观点。他认为,这一地区党的工作中心仍然应是农村。他写道:“所有党的组织、宣传、教育和政府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一中心。党的目标不是要留在城里,而是要坚定的面对农村。”[136]

尽管在城市和工业管理领域仍缺乏经验,到了1949年,中共还是开始在处理中国最基本的城市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与南京政府不同,在劳工问题上,中共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发展出了一个相当有效的策略,这个策略的基础是以社会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刺激以提高工人生产率。其内容包括为工人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是所做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共也想利用他们的经验与资本。这一努力一直没能完全成功。尽管如此,在1950年初,高岗还是可以自豪地列举出党在东北第一个完整年份所取得的成绩。

据高岗所述,所有公有制的企业都已制定出了生产计划,所有被列为重点行业的计划都被超额完成——尽管平均起来,这些行业的产量还只是1943年日占时期的1/3。这些重点行业是铁、钢、铜、煤、电力和机械制造。铁路运输的发展计划也被完成。但是,农业和一些轻工业,诸如棉纱、纺织和造纸等,其计划都没有完成。

私营企业也在复苏。高岗列举出1949年6月到12月间,沈阳私营工业企业数量增加了23%,工人人数增加了18%。1948年,在东北共产党占领地区的物价涨了8倍,而1949年的物价总水平只上升了80%。由于物价稳定和建立了工人劳动保险和医疗保健制度,工资的实际价值也上升了。农民的负担也被减轻。1948年,政府要求上交的部分是农业总产量的23%,到194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20%。

高用下面一段话总结了这些成绩的意义:

过去的一年已经证明了我们党不仅善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和革命战争……也能够领导人民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管理好经济建设工作。这项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它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代化和经济建设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全新的、困难的事情。在过去一年里,党的工作中心已经从战争和土地改革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党已经培养并派遣了数千名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些干部已经取得了管理经济和城市的书本知识,现在,他们正在实践中学习。他们现在处于认识新事物的第一个阶段,他们正开始能够做他们过去所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和打仗,现在,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学习并学会经济建设这项新工作。〔137〕

中共1949年城市政策的很多方面,在随后的几年间都被抛弃或修改。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与苏联的决裂。但“城市领导农

吉林 a 173,624 营口 a 180,871
辽阳 a 100,165

[5] 《大公报》，上海，1946年3月7日。

[6] 《繁荣、和平，张家口在共产党占领后》，见《中国周刊》，1946年3月30日，102页；又见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6月16日。

[7] 引自张家口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见《中国周刊》1946年3月30日，102页。

[8] 《晋察冀日报》，张家口，1946年1月14日。

[9] 《天津导报》（亲共报纸），天津，1945年11月8日。

[10] 保甲制：一种中国传统的地方组织和控制制度。国民党开始重新采用，后被日本人加以推行。在日占时期，十家为一“排”，十排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参见弗兰茨·舒曼所著《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369页。

[11] 肖明《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报告》，见《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11页。肖是张家口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

[12] 新华社北平电，1946年4月30日。

[13] 第七章曾对此有过讨论。1946年5月4日上地改革指示（见上一章注释36）的第八条对城乡情况进行了区分。晋冀鲁豫党委的指示（注102,103）中要求在农村要对地主所有的工商业企业进行清算和合作化改造。任弼时（注164）提到过瓜分农村商业资产的自杀性行为的后果。伊萨贝尔和戴维·柯鲁克《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一书中第112-113页，提到过在县城没收了地主所有的工商业资产。克鲁克夫妇在138-143页中，韩丁在《翻身》一书的154-155页中，也提到了土改后在村一级实行合作化管理的企业。下文还将引述有关此问题的其他材料。

[1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选》二卷，353页。

[1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选》三卷，287页。

[16]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6月16日。

[17] 肖明，10页。（见注释11）

[18] 《张家口市总工会章程》第二部分第三条，见《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12页。各企业和工厂的工会根据地区组成区工会。

[19] 肖明,10页。(见注释11)

[20] 《关于张家口宣化国营工厂工人工资的标准》,见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编《晋察冀法令汇编》,129—139页。

[21] 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7日。

[22] 晋察冀边区总工会工人报社所编《晋察冀边区工人五一节纪念画册》;又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明天的中国》,65—66页。

[23]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8月28日。

[24] 斯特朗《明天的中国》,67页。

[25]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6月9日。

[26] 《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议案》,见《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15、19页。

[27] 出处同上,19页。

[28]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9月3日。

[29] 总工会鼓励行政和工会干部在所有公有制工厂里建立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中工人人数要超过管理人员。在私营企业中,应召开会议使工人了解生产和管理的状况。参见注释26。

[30] 肖明,10页。(见注释11)

[31]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6月7日。

[32] 肖明,10页(见注释11);又见《晋察冀边区工人五一纪念画册》(见注释22)。

[33] 新华社1946年6月16日延安电。

[34] 《晋察冀日报》,张家口,1946年1月26日。

[35] 出处同上,1946年1月10日。

[36] 出处同上。

[37] 出处同上,1946年8月5日;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8月11日。

[38]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5月11日;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6月6日。

[39]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9月3日。

[40]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7月22日。

[41]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6月9日和7月30日。

[42] 《解放日报》,北平,1946年5月7日;《晋察冀日报》,张家口,1946年1月9日。

[43]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9月3日。

[44] 这一措施针对的对象被称为流氓,意指无赖、小偷、吸毒者等等。1937年,延安约有500名流氓,到1945年,据称在农村的流氓大部分经过改造变成了劳动者;城市中在随后几年也进行了这样的改造。农村中还有一类人是二流子,意指游手好闲和小偷小摸者等等。对这类人采取的措施则不那么严厉,主要依靠嘲讽、挖苦、道德规劝等社会压力。见李庚(音)《解放区的生产运动》,20—24页。

[45]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9月3日,24日。

[46]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7月19日。

[47]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8月6日和9月12日。

[48] 参见第九章。

[49]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142页。

[50] 《解放日报》,北平,1946年5月15日;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11月10日,斯特朗文。

[51]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5月27日,6月7日。工会干部刘宁一在后来一篇报道中说峰峰和焦作煤矿从国营转为公私合营。见刘宁一《解放区工业政策》,出自陈伯达等《关于工商业的政策》,30页。

[52] 新华社延安电,1946年6月26日。

[53] 同上,1946年4月30日。

[54] 同上,1946年5月3日。

[55] 新华社编《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3,9—10页。

[56] 《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出自东北书店编《职工运动文献》一卷,20页。这是一篇纪念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25周年的社论。

[57]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四卷,203页。

[58] 陈伯达《发展工业的劳动政策与税收政策》，1948年5月1日，出自解放出版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99页。

[59] 《第二届哈尔滨市职工代表大会宣告》，1948年5月13日，出自东北书店编《职工运动参考资料》，10页。

[60] 《冀中区首届工业会议：检讨职工运动的左倾冒险主义》，1948年4月28日，出自陈伯达等编《关于工商业的政策》，16页。

[73] 郭林春《关于工资的民主评价》，《哈尔滨日报》，出自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38页。

[74] 出处同上，36—38页。

[75] 王康，36—38页。（见注释63）

[76] 苏宁（音）《吉林船营区铁厂的工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东北日报》，出自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30—33页。

[77] 王治义和黄吉云（音）《电车厂定工资的问题》，《东北日报》，出处同上，38—40页。

[78] 《正确执行劳资两利方针》，1948年9月21日，出自华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问题》，25—26页；陈伯达，99页（参见注释58）；《合营兴源被服厂》，《东北日报》，出自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1—6页。

[79] 《1949年手册》，甲，26页。李立三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这一传统的重要性，回顾了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的前五次大会。见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编《第六次全国劳人决议》，1—6页。

[80] 《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见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三卷，32—37页；《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名单》，出处同上，45—50页，执行委员会选举了53个常务委员和20个候补委员。又见北平美国领事馆译延安电台电讯，1948年9月5日。

[81] 《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案》，第六次中华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出自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三卷，6—21页；又见毛泽东等著《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69—86页。

[82] 《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案中的问题的说明》，1948年9月，见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三卷，23—24页。

[83] 出处同上，26—27页；又见肖明（参见注释11）。执行委员会建议有各种类别职工的大企业要研究平汉铁路曾采用过的累进工资制。这个制度将普通工人分成二十八个级别；技术工人分成三等，每等又分几级；管理和医务人员分成四等和不同级别；技术人员分成五等和不同级别。

[84]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30日。

[85]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5月31日,6月3日。

[86]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6日;又新华电台,沈阳,1949年6月6、8、20日。

[87] 《东北日报》,1948年12月31日评论,出自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四卷,41页。

[88] 《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1948年12月27日,出自《职工文献》四卷,3—12;《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1949年2月28日,出处同上,13—33页。又见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12日、21日,3月18日、27日、31日。

[89] 《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的总宣传原则》,1949年1月1日,出自《职工文献》四卷39页;《东北日报》1948年12月31日,出处同上,42页。一个有关苏联社会保险30年历史的概要作为补充,被附在劳动保险基本文件后一同下发。见《职工文献》四卷,46—54页,译自1947年11月苏联《工会》杂志。

[90] 《东北日报》1948年11月9日评论,见东北书店编《新的任务与新的力量》,1页。

[91] 见本章注释129—132。

[92] 见注释90。

[93]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6月6日。

[94] 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编《职工参考文献》,124页。

[95]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职工会》。

[96] 参见第六章。

[97] 参见注释13。

[98] 《时代批评》,1948年12月15日,1页。

[99] 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259—260页。

[100] 《毛泽东选集》四卷,168页;又见毛泽东等著《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5页。

[101] 参见第七章注164;又见毛泽东等著《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7—9页。

[102] 中共晋冀鲁豫局 1948 年 4 月发布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规定所有的工商企业——包括地主和富农所有的,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应得到保护,不能清理、没收或是瓜分。参见第七章注 172;又见韩丁《翻身》,404—405 页。

[103]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四卷,203 页。

[104] 可参见陈伯达等编《工商业:1949 年手册》,甲,65—66 页;还可参见第九章中有关军队中的各种命令。

[105]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 年 4 月 21 日。

[106] 1948 年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为华北解放区。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了统一的华北政府。

[107] 会议于 1948 年 5 月 7 日到 6 月 27 日召开,有 320 人参加,包括工会、国营企业管理者、合作制企业代表,还有 36 名私营企业代表。有关会议上的几个主要问题我们参阅了《新工商》,31—32 页,105—112 页;毛泽东等著《新民主主义工商业政策》,55—62 页;《1949 年手册》甲,66—68 页;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 年 8 月 11、15、17 日。

[108] 会议于 1948 年 9 月 3—19 日召开。召集者是戎子和与吴波,华北人民政府财政局的主任和副主任。有包括各行政局局长在内的大约八十人参加。会议决议涉及了烟草和酒税、粮食征购、军工制度、农业累进税修改以及征收工商税等问题。大会还制定了 1949 年华北解放区预算案。参见《华北解放区财政会议讨论农工商业税则》,《新工商》,33—34 页;又见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 年 10 月 14 日。

[109] 《1949 年手册》甲,68—69 页。

[110] 《吉林恢复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几个问题》,《东北日报》,出自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44—48 页。

[111] 许涤新《论城市的社会改革》,1948 年 8 月 9 日,见其所著《中国经济的道路》,307—309 页。

[112] 李立三《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见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13 页。

[113] 华商报资料室编《解放区贸易数字》,36—43 页。山东和华北解放区早期的外贸规定见《新工商》,36—83 页。

[114] 《时代批评》1948年12月5日,1页。

[115] 列宁在提到泰罗制时写道:“建设社会主义所要依靠的正是要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行政体制和资本主义最新的发展成就成功的结合起来。”参见列宁《苏维埃政府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见《列宁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5)27卷,259页。由弗瑞德里克·泰罗发明的泰罗制于二十世纪初扬名于世,是在管理中讲究科学效率,但因此也很少考虑人文因素的典型。

[116] 引自《新工商》,109页。

[117] 出处同上,107—109页。中文中的“合理化”在这里被译为 rationalize,有时也译为 to be more businesslike。

[118] 参见注释 81。

[119] 苏联的存在是根据 1945 年 8 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一系列附件。其中《长春铁路协定》规定中国的东满和南满铁路为中苏共同拥有,又规定这两条铁路(合称长春铁路)的管理者必须是苏联人。参见罗伯特·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219—220页。

[120] 有关中国在五十年代初采用责任制和最后又放弃它的经过,可参见舒曼:《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242—253页。

[121] 《新民主国营企业应学习苏联的经验》,出自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编《第六次全国劳大决议》,58—60页。1946年以后苏联在东北介入的性质和影响还有待于研究。一般接受的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 1946—1947 年间游历中共占领区后所持的观点,认为两党之间并无正式的联系,苏联也没有给中国人提供援助。但是,东北铁路管理中的苏方人员,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建立,以及中共在开始学习苏联劳动管理经验时翻译出版的苏联材料,说明又存在着某种关系。1948年中国长春铁路建立了哈尔滨工学院,进行培养工程技术人材的高等教育。学院设有建筑工程、运输、电子工程、民用工程和经济学等专业。参见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8月16日。

[122] 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49—50页。

[123] 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三卷,3页。

[124] 李立三,9—12页。(参见注释 112)

[125] 杨贵昌《城乡关系问题》，16—18页。

[126] 同上。13, 37—38页。

[127] 《毛泽东选集》四卷, 364—365页;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 1949年3月24日; 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城市政策》, 3—4页。

[128] 《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 4—9页。

[129] 杨贵昌, 35—36页。(参见注释125)

[130] 《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 2—4页。

[131] 东北职工总会《关于工会费的决议》, 1949年1月9日, 出自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编《第六次全国劳大决议》, 55—57页。会员应缴纳月收入的百分之一为会费。

[132] 《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 2页。

[133] 《把我们在城市中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适应城市的特点》, 1949年6月22日, 出自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 47—48页。

[134] 新华社《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布变更区街组织形式》, 1949年6月22日, 出处同上, 49—50页。一个区设一个区办公室, 安排七到八人, 以帮助贯彻市政府决定, 上报地区情况。市公安局的各区分局, 及其所属272个派出所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和进行户籍管理。

[135] 参见第九章。

[136] 杨贵昌, 20—22页。(参见注释125)

[137] 高岗《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6页。这是高岗在第一届全国东北党代会上的报告。

[138] 引自米切尔·弗洛立克《北京大学访问记: 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纽约《时代杂志》, 1971年10月24日, 122页。

第九章 新的开端：共产党取代国民党

本书的研究始于二战后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城市，现在我们对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城市进行评价，因此以此来结束本研究是十分合适的。尽管市民怨声载道，但城市依然是国民政府的最后堡垒。城市的陷落不是因为城市内部民众的普遍起义，而是因为节节胜利的共产党的占领。进城的农民士兵使城里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到处传播着关于他们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传闻。

当年国民党接管城市后不久就引起了市民的憎恨。共产党会遇到怎样的迎接，这要取决于这些农民士兵及随军而来的缺少经验的管理干部的所作所为。由于共产党仅在一年内就占领了中国大陆所有的大城市，因此那些共产党需要其帮助和支持的集团的态度也就十分关键了。对共产党而言，如果出现敌对情绪，它的处境要比四年前国民党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被迎进城后所面临的危险要多得多。

在1945—1946年间，引起公众激烈批评的问题包括：国民政府不愿惩处汉奸；军政官员的受贿和违纪行为；接收初期未能推行合理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以及从内地回来的人对待留在日占区同胞高人一等的态度。

到1949年,共产党不仅充分认识到都市中国的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和它在理论上的挑战性,而且认识到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陷阱。对上述各问题(除第一个问题,因为公众没有类似的惩办战败的国民党官员的要求),共产党都积极地——如果并不总是完全成功地——避免了国民党在1945年所犯的错误。当然,他们取得的每一份成功,并不都是轻易得来的。

法律与秩序

1948年上半年,共产党接收满洲各城市、城镇的活动,说明了他们的干部战士也未能克服曾给国民党带来极大麻烦的弱点。从共产党人自己的报道来看,部队在接收时,尤其在四平街、吉林和鞍山,多次掠夺财产。另外,许多跟随部队接踵而至的保健、卫生、后勤和通讯等单位的人员接收了工商业界的财产,拆走了工厂设备,运走了机器与物资,毁坏了许多设施。一些地方的接收人员甚至撬起了铁轨,使路轨变成废铁,枕木变成柴火。〔1〕

这一切或多或少都在遵循着由来已久的游击战术——“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物资从不能永久占领的地区转移走。这一战术适用于“军用”物资与“敌产”。1948年仍在沿用这一惯例就意味着中央或地方政府拥有或经营的地方公用企业、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主要产业作为“敌方资产”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另外,积极拥护国民党政府的个人所拥有的工商企业或以安置国民党军队、照料伤员等形式与国民党保持联系的人所拥有的产业也未能幸免。〔2〕

战争结束后到来的行政机构只关心本单位的福利,结果破坏了商业,搅乱了物价。城市贫民利用打仗的时机大肆偷盗,农

民进城争夺地主在城市中的财产。接收的部队不但不保护资产，而且还允许民众为所欲为。^[3]共产党军队于1948年上半年在东北所占领的城市中，除了一小部分外，大多数都发生了违反官方政策的事件。^[4]

从官方的评论来看，作战部队的纪律很糟。无论是军队，军队的辅助单位还是后方的地方人员，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党有关保护城市政策的教导，地方与军队仍把占领城市看作是暂时任务。他们还不明白，新形势已经出现了，它赋予城市以新的功能和意义。1948年6月10日中共东北局颁布指示，纠正这一偏差。在后来的岁月中，每支进入中国各城镇的部队，其司令员都要颁布公告，发布类似的命令。

部队纪律

中共东北局指示说，必须集中权力，春季接收吉林等城市时发生的现象，不能再存在下去。攻城部队的最高长官要对占领的初期阶段，包括所有党政单位及地方干部的行为负直接责任。城市实行军管的时间由军事长官视当地局势决定，秩序一旦恢复，责任就由军管会移交给市政府及市委。

攻城战役打响之前，作战部队、后勤单位和军队、地方的所有干部都要学习党有关占领期间的政策及纪律。军队有权没收的只是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并且要立即将这些物资上交给干部，报告上级领导，士兵个人不允许拥有此类物资。特别禁止部队没收其他财产，无论是公共财产还是私人财产。他们还接到命令，要阻止任何其他人这么做，还“绝对禁止”后勤单位接收任何财产。

作战部队有权俘虏武装敌军、其他武装抵抗的人员、军事间谍及主要战犯。其他所有的执法人员，包括地方警察都允许保留原职，并得到命令要像平时一样工作。战斗结束后，除了留下维

持秩序的部队之外,其余部队都要撤到城外。党组织、政府及其他组织不允许其成员买卖资产或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不允许农民为掠夺财产或逮捕嫌疑犯而自行人城。〔5〕

这些命令是共产党在以后的内战中占领政策的基础。它们由进攻的共产党部队进行宣传,也在收复城市之前通过电台广播,随后又出现在街头布告和报纸上。收复济南之前陈毅将军发布的七点临时法,以及1948年9月25日攻克此城当天济南军管会颁布的命令都重申了这一政策。〔6〕类似的条例还有林彪在天津和北平投降前公布的八点临时法,〔7〕以及共产党部队进军南方和西北时毛和朱德于1949年4月25日宣布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约法八章。〔8〕

此外,这支军队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作了调整,以指导农民战士进入中国主要城市时的举止。下文为1949年4月26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及政治部颁布的修正文本:〔9〕

三大纪律

1. 遵守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颁布的一切法律、命令和规定。
2. 遵守城市政策,保护市政府。
3. 保持革命战士的节约传统。

十项注意

1. 未经允许不得开枪。
2. 不占民房和店铺,不扰乱剧院等娱乐场所。
3. 没有任务不外出,外出之前要请假。
4. 不在街上乱驾马车乱骑马。
5. 不在街上吃东西,不在街上手拉手走,不挤进人群。
6. 买卖公平。
7. 保持营房整洁,不随地大小便。
8. 不准算命、赌博和嫖妓。

9. 不贪污腐化。

10. 不在墙上乱涂乱画。

如果1945年国民党政府也颁布了类似的命令,就可以减少许多由接收导致的批评。但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回到上海,回到平津和满洲后,连其接收人员所犯的臭名昭著的过错也不曾纠正。他们在满洲各城市的行为更是无法无天。对比之下,共产党人则为自己所犯的相同错误而内疚,并采取行动予以纠正,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当共产党军队从相对边远的满洲来到天津、北平、南京和上海之时,这些城市目睹的是中国士兵前所未有的表现,他们甚至不会接受同情他们的路人递过来的一支纸烟。

一位并不太同情共产党的中学教师决定离开济南,但他承认无论是接收中还是接收后的城市,纪律都维持得很好。老百姓可以向有关当局报告违纪事件,两个士兵遭处决。作战部队的主力撤到城外以后,部分平民开始打劫,但秩序很快就恢复了。〔10〕

北平一位根本不同情共产党的观察者也谈到了接收人员的良好表现。他写道,大部分政工干部“谦虚坦诚”,武装部队纪律严明,从不恃武力夺取物品,借物必还。因此,老百姓对他们既不怕也不恨。〔11〕

在上海,甚至连反共的外国人士也对此印象深刻。进入上海的士兵与其它地方的一样,不接受食品等礼物,后勤人员肩拉背扛把设备搬进城市,而不是征用平民的车辆。保守的美国报纸《大美晚报》用“模范”一词来描述解放军部队进城时的表现。编辑伦德尔·古德注意到,解放军把国民党人员撤退时征用后又丢弃的汽车物归原主。他写道,这些工作使人联想起四年以前归来的国民党官员拼命争抢日本汽车留作已用的情景。〔12〕

另一件也会使人产生联想的事件,就是解放军的一辆卡车撞

死了同济大学的一位学生。那是6月3日,上海解放恰好一周。以往此类事件尤其是牵涉到美国军用车辆的事件曾招来不少民怨。新政权急于避免人们作出不利的比较,于是判处司机死刑。但最终由于公众同情这个司机(不久前才从国民党军队投奔解放军),他被减刑了。不过这一事例已成为上海所有驻军认真学习的例子。他们重新审核司机,制订更为严格的标准。除非绝对需要,重型汽车一律禁止入城。所有的军车都限速15英里。[13]

另一桩标志着上海已告别旧秩序的事情就是当年夏季在警察中整顿纪律。根据党的政策,警官与警察只要没有严重的反革命活动,愿意留在警察队伍中的都得到了许可,但对于他们从旧政权中带来的种种习气采取了断然措施。8月,几个公安局与派出所(有时还有辖区的居民)开会处理一些具体事例。例如,江湾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在8月5日的会上承认接收了三辆无证自行车车主的贿赂,因此受到了处分。陈鹏飞与李国华的违法情节更为严重。在8月18日卢湾派出所警官及警员大会上,陈承认自己养了情妇,并包庇街头小贩。李承认在值勤时“调戏妇女”。陈被递解到法庭接受审判,李被开除,两人都在群众大会上向公众道歉。[14]

这些事情的发生,使在上海的美国人对共产党接管人员的最初反应是“明显地抱有好感”。[15]中国公众的反应可能也大体相同。

护厂运动

虽然中国的城市并非由于内部的起义才倒向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的地下干部已把人们特别是工人和学生组织起来,拥护接收。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工业、通讯、公用设施和学术机构不受接收期间混乱的破坏。

危险来自各个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还包括国民党撤退时

的破坏，工人自己趁火打劫——他们往往认为这是合理分享共产党的胜利。在沈阳、鞍山、抚顺和本溪，1949年1月和2月在矿工和产业工人中发起了一场“上交机器与物资运动”。沈阳第一机器厂的工人经劝说交出了一千多件藏匿起来的机器与设备。抚顺煤矿管理局与沈阳化工厂的雇员也参加了这场运动。鞍山的工人在三个星期内上交了210,000件，包括该市发电设备的零部件在内的物品。据说，工人的“捐赠”使得恢复此地电力供应的时间至少缩短了一个月。〔16〕

看来，努力保护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是共产党接收政策的一个普遍的标志。1945年张家口组织了护厂队。即使在发生过严重破坏的吉林，至少也有两个企业的工人日夜站岗保护工厂设备和物资。〔17〕当共产党军队向南挺进时，这项运动的准备工作显得更有系统性。这也许是共产党在未解放的天津、北平以及上海有着更为广泛的地下组织的结果，以及共产党的胜利日益促使公众顺应潮流的结果。

在天津，华北最大的华一纸厂的一千名雇员中有300名与解放军并肩保护工厂。当附近在激战时，工人仍留在厂里保护机器、仓库和水的供应。同属于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中央机器厂天津分厂和华北钢铁厂的工人自己组织了队伍，在工厂设施边夜以继日地站岗。天津汽车修配厂和大多数天津公用事业的工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据说，这是电力、电话、电车、水供应和邮政服务何以在共产党军队入城后几乎立即得以恢复的一个原因。〔18〕

上海于1949年5月解放，在此之前近一年的时间里，护厂运动的计划已在暗中酝酿了。在1948年8月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来自上海的一名代表宣布，解放以后上海所有的工厂和仓库将完好无损地移交给人民，公用事业也将尽快恢复。〔19〕淮

海战役(1948. 11. 5--1949. 1. 10)后,准备工作就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一月下旬,共产党着手准备接收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28家单位。叶渚沛是在解放区的资源委员会主席,他通过广播向自己从前的同事发布命令,建议他们留在自己的职位上,并保证他们在解放后仍将得到原来的工作和薪水。他还警告说,不能容忍破坏共产党设备的行为,并概述了接收期的计划。上海的一家报纸于二月初报道,资源委员会的地方机关和所属企业正“逐字”执行叶的命令。雇员们已贮存好食物,准备了职员名单,清理了可能堆放站岗人员物品的仓库,并组织了护厂队。〔20〕

4月,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的党小组传阅了一封署名为朱俊欣的来信,朱以前为该公司的工会领袖,后逃往解放区。来信的复制件分发到各个雇员手上,要求他们在共产党攻克上海的时候保护好公司的设备。党小组还组织了一支护厂队,于5月25日解放军大举入城之时在公司内外进行警戒。〔21〕

为上海工业区供电的上海电力公司的党小组,也组织了纠察队与紧急维修队。纠察队员劝阻了一支国民党部队把枪炮架在该公司一幢大楼楼顶的行为,告诉他们这幢大楼只要受到炮火的直接攻击,就会使临近地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随着解放军的到来,纠察队更名为人民保安队,并接受驻扎在公司内的国民党军队的投降。工人们留在紧靠大钟的岗位上,在新的护卫哨兵警惕的眼睛下开动发电机和其他设备。由于这一努力,电力供应从未停顿,电力公司也未受到损害,直到6月2日国民党空袭炸毁了电厂设施。〔22〕

上海海关的党支部于2月中旬开始为解放作准备。全体雇员成立了委员会,实行雇员普遍注册,贮存了救济物资,并在海港和海关警察中动员了120人成立武装纠察队。30名港警在党

员的直接领导下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攻进海关军火库,夺得583支来复枪,弹药和其他武器。〔23〕

码头工人组织了地下的联合船员工会,成立了纠察队,实行怠工,采取拖延战术,藏匿物资,尽其所能阻挠国民党逃窜。当时上海最大的造船厂江南造船厂的几百名工人警惕地挫败了一起把设备运往台湾的阴谋。起先,他们宣布自己是产业工人,不是搬运工,拒绝把机器拆卸、装箱和装船。随后,国民党士兵被叫来干这项工作,但是力不从心,于是又驱使工人接替士兵的工作。工人们采取各种拖延战术,磨洋工,把一些最贵重的机器零件藏起来,把破损和无关紧要的设备装箱。一些工程师也参与其事,为这一调包计作了贡献。结果,运往台湾的是不足一万吨的最没用的机器和设备。撤退的国民党在几天后进行了报复,他们出动轰炸机,几颗炸弹命中该船厂,造成很大损失。〔24〕

交通大学在1949年1月至5月期间组织起约400学生。许多学生和教授积极反对疏散命令。他们组建了委员会,通过了“学校绝对不动”的决议。教师继续上课,学生在寒假期间仍留在校园里,防止军队占领大学。随着解放日益临近,老师和学生组织了纠察队,防止图书馆、实验设备和其他动产被运走。学生还尽其所能收集有关学校附近国民党防御工事的情报,送给解放军攻城部队。〔25〕

进行准备工作的其他企事业包括联享(音)汽车厂、上海化工厂、英联船厂、日亚钢厂、通用机器制造公司、中国农具公司上海制造厂、上海电机公司、上海公交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和上海邮局。许多工人纠察队都在解放后改为人民保安队,担任了工业区的警戒任务,有时还解除该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武装。〔26〕

根据后来的报告,解放前上海共组织了6万人的纠察队,因此上海的工厂和公用事业未受重大损失。〔27〕这些数字很难证

实,而且工商业也还是出现了些许混乱。但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出,这好像并非因为工厂在最初的接收期遭到了物质破坏。况且保护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维护基本的公共服务行业——已胜利实现了。共产党对其在1949年新占领的城市地区恢复电、水、电话、邮政服务及公共交通的速度之快感到骄傲。

经济与财政

共产党准备工作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贮备粮食和其他基本食品。战斗一结束,他们就把商品尽快运进城市,以有助于稳定物价,供应食品,分发救济。这些物品也被作为报酬,付给帮助清理战争废墟的平民。据报道,顺利完成运输大量粮食和基本食物任务的城市包括石家庄、营口、济南、长春、北平、天津和上海。^[28]

反通货膨胀的措施

国民党遗留给共产党的最棘手的城市问题自然就是通货膨胀。要想消除通货膨胀,事关稳定物价的任何工作都比保证基本食品供应、保证工厂不受损失要复杂得多,虽然这些基本的前提条件可能也十分重要。

商业上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1948年8月国民党币制改革后的金圆券变为人民币。1945年,还都的国民党政府用了好几个月才收回所有沦陷区的伪币。北平于1949年1月22日投降,在1月31日解放军大举入城之前,原有的人员继续维持日常治安与管理。2月3日公布了新的货币兑换率,到2月23日,货币置换已宣告结束,从该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北平流通。兑换率定在10元金圆券兑1元人民币。工人、教师、学生和贫民可以3元金圆券兑1元人民币的优惠率兑换,但由于这一让步举措导致了

投机，共产党在到达上海之前已摒弃不用。共产党1月15日攻占天津，货币置换在2月的第一周已告结束。上海解放两周后，兑换结束，国民党的货币禁用。〔29〕

但是人们对新币的信心似乎并不比旧币多多少。金银、外币市场继续兴旺，价格与工资往往以旧中国的银元计算，而不是新的人民币。投机相当猖獗，实际上人民币上市几天后就开始贬值。六月的第一周，一银元在上海就从660元人民币上升到1,800元，一两黄金从39,000元上升到110,000元人民币。商品价格也随之攀升。〔30〕

据上海人民银行的经理说，这一周零售价的涨幅与解放区上一年全年的涨幅相等。〔31〕新近重组的上海商会天天宣告，不愿储蓄、看重商品、鄙视货币、全副身心地投机和牟取暴利、对生产缺乏兴趣等“无形的罪恶”还“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32〕

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四地的军管会在劝告无效后禁止金、银、外币的流通、交易和折算。共产党虽然禁止了交易，但仍允许人们以在人民银行储蓄的形式持有金银和外币，如有需要可按当日的兑换率以人民币的形式提取储蓄。

一位官员指出，公众一定是以为共产党的规定和法令与国民党的一样，无需认真对待。北平于2月28日宣布禁令，3月2日，军管会开始逮捕无视“劝告”的钱贩子。到3月4日，共逮捕了116名钱贩子，其中多数在按要求登记并答应不再进行银元交易后就被释放了。〔33〕

上海货币置换的步子迈得比北方城市更快，使人民币成为唯一货币的工作多少有点戏剧性的转折。6月10日清晨，解放军部队包围了股票交易大厦——上海金融投机的中心，拘捕了2,113人，其中1,863人经教育后在24小时内就被释放了。余下的250人被拘留，他们违法的性质比较严重。这其中就有上海

滩最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34〕

同时，新政权开始动员公众支持反银运动，要求工人、公用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不再接收或使用银元。6月9日，上海学联召开了有100多所大中学校6400名学生参加的群众大会，动员学生支持这一运动。不久，几百支学生宣传队出现在大街小巷，教育商人和钱贩子，并向行人宣传新的金融规则。〔35〕

这样软硬兼施之后，中共又以保值或单位商品储蓄的形式进行经济刺激，从而给这一运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一方法旨在保护储蓄不受通货膨胀影响，从而根除购金买银的动机。新方法是这样的：人民币储蓄按单位商品折算，每一个单位代表一品脱大米、一尺布、一斤煤和一盎司食用油的市价总值。取款时，按取款之日的这些商品的市价结算，再加上利息。〔36〕随后，政府银行的贷款也以商品单位计算，所有政府雇员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资也用这一方法计算。

鼓励储蓄、吸引购买力的另一方法是发行政府公债。宣传运动始于东北，逐渐南移。由于不久之前才目睹国民党的公债券变为一文不值的纸片，老百姓对这一举措存有戒心是可以理解的。每个城市都成立了认购委员会，并以工商界为主要目标，发起了一场蓬蓬勃勃的宣传运动。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最后一次国债不同，新政权发行的第一次债券被认购一空。〔37〕

每个城市在接收后的几个月内，商人和企业家，尤其是前者，成为一项相当沉重的累进税的对象。这项税无空子可钻，因此很多人提出抗议，但共产党人不为所动，他们认为过去由农民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负担，现在该由城市作贡献了。但农村仍在作出自己的贡献，新解放区要缴纳13%的谷物税，老区则为20%。

最后，为了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避免国民党时代城市消费者的经济困境，新政权努力通过政府控制的渠道确保

必需商品的稳定供应。除了定量配给某些基本用品之外，各市政府还贮存大米、小米、盐、油和煤等必需品。一旦市价出现剧烈波动的迹象，就把贮存的货物投放市场以平抑物价。^[38]这一工作由政府大区贸易组织网络之下的市贸易公司承担，他们也从事日常零售活动，并负责为消费者合作社提供货物。

例如，华北贸易公司于2月最后一周在北平开始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粮食、煤和布。该贸易公司开设了自己的商店，并委托一部分私营商家以规定价格出售国家供应的商品。这些商人被允许继续以市场价出售自己的货物。^[39]但私营商家都表示不满，因此国营贸易公司进一步依靠消费者合作社，把它作为供应政府提供商品的主渠道。虽然报纸屡屡批评这些合作社的服务质量，但其数目却迅速上升了。与过去在老解放区一样，合作社是由各个工厂、作坊、政府雇员组织起来的，不对外人与一般大众开放。^[40]

因而在刚解放后的那段时间里，共产党就已解决或至少努力地解决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领域中几乎所有的问题，而这正是国民党在其接收沦陷区时因漠视而遭来批评的问题。共产党人保护城市经济基础的努力在1949年看起来已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基础服务包括运输、通讯在战争一结束就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了。货币置换的过程已是快得不能再快，新政权还开始着手控制形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各种起因。随着新货币的使用，各种自由兑换形式都已禁止。由于要犯被捕，兑换率制订得相当合理，公众投资有了新的走向，金银、外币的黑市交易得到严格控制。此外，共产党人开始征税，建立了某些基本商品的配给制，并采取步骤保证这类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城市中，以政府控制的价格出售。

这些措施采取之后，经济立刻有了起色，但发展缓慢波动。

共产党统治的头几个月内,物价持续上升,显然涨幅比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个月要小。〔41〕在天津,从1949年1月25日到8月23日,批发价的周平均涨幅为11.38%,工人生活费用的周平均涨幅为9.51%。而国民党在天津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内,从1948年8月24日到1949年1月11日,上述两个数字分别为26.03%和31.2%。〔42〕上海和天津一样,但食品价格在解放后的一个月里飞速上升。上海的大米价格涨了6倍,一个商品储蓄单位的价值从100元人民币上升到7月19日的894元,并于8月1日升到967元。〔43〕

工人的持续骚动

虽然官方强调要复兴工业和贸易,但是已经发生的破坏往往抵消了其他更为直接的减轻通货膨胀的成功努力。天津当局宣布,到1949年2月中旬,这个城市约有90%的企业重新开门了。〔44〕但后来的报道显示了这一状况很难维持下去。

除了产品成本不断上升的因素之外(并且也由于这个因素),新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不断激化的劳工争端也是工商业界的一个主要问题。共产党对这些争端采用了1945年在张家口随后又在满洲各城市中用过的模式。新政权也许不愿意也许无法采取其他措施,只能许可工人增加工资、生活补贴、解雇费和改善待遇的要求,骚动持续了几个月。这就是1949年春天城市中的情况,整整一年后,党的领导人把这种劳工争端批评为“左倾错误”。

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天津办事处在共产党军队入城后不久,建立了一个工人咨询办公室,到2月初,这个办公室已答复了2,000多个咨询,其中许多问题有关工资报酬以及劳资双方发生争执时资方的权利。〔45〕回答的确切内容不得而知,但在以后两个月里,围绕这些及其它相关问题的劳工争端有增无减。3

月新华社宣布,接受工人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后,天津6家私营工厂的产量增加了。^[46]同一周,当地的一家报纸报道,越来越多的企业由于劳工争端和日益上升的劳动成本倒闭了。^[47]这篇报道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千家驹撰写的。他后来还指出,天津的一些企业主为了满足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只好逐渐变卖自己的企业资产。^[48]

北平的劳工争端问题也十分严重。10个区的政府一起召集来自许多企业(包括面粉厂、铁厂、火柴厂、理发店、三轮车与人力车行)的劳工与资方代表,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会。政府代表宣布解决工资争端要依据劳资兼顾的原则。当局还重申了党保护工商业企业的政策,并提醒与会代表,清算斗争在政策中没有一席之地。^[49]

从上海新市长陈毅将军后来的一篇报告来看,上海仅在7月就发生了大约2,000起劳工争端。^[50]工人们采用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前四年里劳工争端时所用的一切手段,包括罢工、怠工、进厂静坐等折磨雇主的形式。《大美晚报》的伦德尔·古德自从被几个雇员反锁在办公室直到他同意增加工资才放出以后,对新的共产党政权就不太热情了。无论雇主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上海工人一律要求增加工资、贷款、端午节奖金和离职费。上海的新政权对此很少干涉,虽然北平和天津已采用了要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

正如第四章所说的,大城市中的劳工骚动,尤其在上海,是内战大部分期间中经济生活的共同特点。我们虽然不清楚这是不是共产党的动机之一,但他们可能是有意识地不在解放每个大城市之后立刻对工人的要求严加约束,以免疏远了一支连国民党都要试图安抚的劳动大军。的确,工人的这些要求与共产党有关国统区劳工运动的主要政策声明以及通过其地下组织鼓励

工人所提的要求是一样的。不经适当的准备和解释就立刻宣布工人必须停止为争取解放理应带来的利益而斗争是不明智的。革命的美妙词语显然鼓励了工人的这一反应。

自然,这一局势也与共产党控制工人要求的能力有关。张家口经验和满洲反“左”倾运动都说明了,要想胜利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有三个基本条件:1. 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确保低价必需商品供应的能力;2. 愿意并能够解释和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积极分子;3. 在劳动大军的主干中扩大党控制下的工会组织。由于多数城市在接收前后遭受经济损失,此阶段干部的严重匮乏,选择新干部时缺乏鉴别,再加上所有的新手接受的训练都很肤浅,因此要想在1949年解放军进城后立即尽善尽美地满足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农村与城市反“左”倾运动的基本差异。在农村,党中央好像是故意把土改运动推进过头,以便摧毁农村士绅阶层,平均地权。这一目标实现后才开始加强反“左”倾运动,以此标志着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的胜利结束。而在城市,党显然别无选择,只有忍耐工人们在刚解放时短期的“过火”行为。由于中国主要城市中劳工运动的相对发达,以及其自身准备的相对不足,因而共产党无法立即加强其保护资本家的生产不受城市无产阶级要求伤害的政策。

信心危机与其他问题

出于多方面原因,上海接收时期的经济混乱比别处更甚。早在1949年2月,《大公报》就报道大部分机器制造厂已关闭;由于缺乏小麦,上海的面粉厂只有10%还在开工;棉布厂、纸厂及各种日用品制造商都在蚀本出售产品,因为劳动力、能源和其它制造成本都在不断上涨。^[51]

5月份共产党军队到来之前,上海的工商业已基本陷入停

滞状态。与天津不一样，上海的新政权无法在解放一个月后宣布说已有90%的企业重新开工了。《大公报》6月21日报道上海的工厂与商店仍有一半多尚未开业。开工的企业大多数只能在有限的基础上运作。机器制造业濒临崩溃的边缘，纺织业的产品成本比售价更高，消费者寥寥无几，飞涨的食品价格加剧了普遍的劳工骚动。

在千家驹看来，上海企业家的困境在许多方面都与他们的天津同业在刚解放时的经历类似。在这两地，基本问题都是原材料匮乏、劳动力成本上涨和销售困难。天津局势相对而言不是那么严重，因为周围农村比城区解放得要早，土改已开展，新币替代了旧币。因而天津被占后，它与邻近农村地区的联系迅速恢复，而这在上海地区是不可能的。^[52]

造成上海那年夏季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6月开始的空袭。国民党军队在前一个月匆匆撤退时未能完成的破坏此时多少算是胜利完成了。它还于6月对上海实施了有效的海上封锁。7月份上海还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台风灾害，台风引起的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与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许多河流一样，长江发生水灾，上海的腹地大片遭淹，更使上海雪上加霜。

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客观环境”。许多问题是由新的经济与金融措施本身引起的，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上海，甚至不局限于华东。共产党人坦率地承认，他们在城市管理的许多方面正在学习和试验。但他们的试验给人留下了一种时断时续的印象，这无助于提高公众对共产党对付时局能力的信心。例如，华北实行了所得税，但不久又取消了。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用了两种兑换率，一种用于普通百姓，另一种用于工人、学生和贫民，但以后又不得不取消。共产党才到北平时，用小米发薪，但发

现不切合实际,不久也放弃了。工人用小米向商人换现金,但后者操纵了小米的价格——这本来是应该估计到的。

国营贸易公司在试图使用私人代理商时遇到了直接的困难,但作为替代的消费者合作社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些征税新规定由于不合理而取消了,虽然这是由于商人叫苦而特地作出的反应。同样地,要求进口商安排同样价值的出口之规定,实际上意味着要进行以货易货的外贸,结果也因无效而被搁置一边。

这些经历再加上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劳工骚动以及对国民党经济管理不善的记忆,显然足以破坏公众对新币和新政权能力的信心。人们对单位商品保值储蓄反应冷淡。^[53]政府的胜利公债也是在广泛“动员”之后才被认购的。上海市长陈毅后来承认“一部分老百姓很悲观,他们认为物价不可能稳定,而且由于封锁和海上通道被堵,贸易与工业也毫无前途可言”。这一席话揭示了1949年夏上海市民的普遍心态。^[54]

六大任务运动

中共对这一悲观看法的处理方式是可以预料的,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在华东,这场运动随着第一届上海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正式开始。这个于8月初召开的会议“集中讨论”上海面临的问题。4月18日至5月7日期间,刘少奇来到天津,标志着天津也进入了类似的阶段。^[55]千家驹到达上海后向公众谈了刘少奇天津之行的意义。千在接受上海记者采访时宣布,刘在天津阐明了党的劳资互利政策。从那以后,私营企业主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不再冷漠,也不再悲观,而是积极进取。^[56]

上海的运动随着“六大任务”计划的公布而有了显著发展。这一计划由中共上海市委提交给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650名代表一致通过。六大任务为:

1. 积极拥护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建和台湾。
2. 疏散人口。目的是要把战争期间拥进上海的难民送回原籍,减轻失业问题的压力。这一条计划还号召把某些工厂迁到内地,靠近被海上封锁卡断的燃料与原材料产地。
3. 重新确定上海工业的生产目标,使之适应经济最迫切的需要与缺乏国外原材料的状况;保护劳资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良好的工会来统一劳动大军。
4. 动员大批党员、干部、工人和学生到上海郊区进行台风后的救灾活动,抢修海堤,并进行土改,尤其是在解放军南进时迅速通过的苏南农村地区。
5. 增强上海与内地之间的联系,鼓励城乡之间的日用品与商品的流动。
6. 提倡节约,压缩公共消费。号召党、政、军、民各单位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抵制浪费。〔57〕

劳工与生产 虽然在大纲正文中没有出现,但是六大任务运动要克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劳工骚动。〔58〕上海军管会在8月19日颁布了两项旨在解决劳工问题、为工商业发展扫清障碍的规定。一项规定涉及停业、雇工与解雇。资方可向市政府申请停业(这在以前是禁止的),可以根据生产需要雇用或解雇工人,也可以开除不满意或不合格的工人和职员。资方的责任是尽快开工;不能因为工人参加工会或政治活动而开除他们;向所有解雇雇员偿付的解职费不得低于一个月工资,但也不高于三个月工资。

第二项规定涉及解决私营企业劳工争端的程序。如果有关各方之间不能达成协议,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市劳动局调解。调解期间,资方不得关闭企业及降低雇员工资或待遇。同样,工人

不得罢工、怠工和有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如果调解失败，劳动局可以成立仲裁委员会，成员包括劳资双方的代表。最后，如果仲裁也失败，这一争端就将移交人民法院，法院的决定具有约束力。〔59〕

资本家被告知无须再为劳工争端担心了，现在是他们回去开工，既为自己也为国家谋福利的时候了。工人们得到劝告，暂时接受资本家的“合理剥削”，因为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可能立即大幅度提高工资与福利。

新的规定和不断壮大的工会组织，终于使上海劳工队伍趋于平静。由于党在工人中开展了组织和教育工作，因此比较容易达成如大通染织厂那样自愿的协议。该厂工资超过基本工资的雇员同意降低工资，帮助厂家度过难关。〔60〕到9月中，据说有许多厂的职员与工人“自动”要求降低工资帮助工厂开展生产。〔61〕三个月后，市政府已能报告自8月以来劳工争端的次数已“稳定下降”。工人们感到自己的地位有了保障，开始主动与资方合作发展生产。〔62〕

9月份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对属下所有部队发出一份指示，由此产生了介绍党的政策的最新颖的一种方式，该指示号召部队发起一场军队与工人之间互相教育的运动。据一篇报道讲，解放军三野的驻军7月间被部署在一些工厂里执勤。驻厂部队与工人之间出现了不少的磨擦。部队不明白为何工人穿得好，得到的东西比社会上许多阶层多，却称为被剥削者。而工人觉得农民战士有点土气，而且因为解放军许多士兵说着上海人难以理解的方言，双方难以攀谈。

根据9月指示，军队与工人间举办了联欢会与讨论会。会上，士兵讲战斗故事，工人讲国民党的压迫。军队干部参观工厂，增强对现代化生产方式的了解，增加对工人的尊重。士兵帮助上

海许多工厂开班,还帮助组织巡逻队,教工人队员如何开枪,执行警卫任务。最后,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组织了十一支工作队,分派他们帮助现有的工会组织和教育工人。据报道,到该年底,这些工作队已帮助发展了11,900名工会会员和4,462名巡逻队员,还带动831名青年工人加入共青团。〔63〕

由于已为解决最棘手的难题打下了基础,上海当局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生产本身。生产的目标是要减轻本地工业对国外原材料的依赖,提供价格可为多数人承受的基本商品,并继续生产某些高质量产品以出口换取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器。上海电力公司彻底改用煤,因为燃油已被封锁。通过利用内地煤矿和重建交通,新当局到1949年秋已能提供足够的煤来满足上海的需要。

纺织工业占了上海所有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它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原棉。如果要立即恢复生产,共产党只能暂时依靠外国进口。1949年间,从美国进口的大量棉花,通过天津和香港转运到沪。〔64〕同时,政府尽可能多地调集了国产原棉,通过恢复的铁路运输运到上海。〔65〕

难民、乞丐与小偷 接收期间似乎并未认真尝试实现已宣布的把工厂迁到内地的目标。疏散难民的工作倒是做了,但几乎没有成功。8月5日,共产党华东局发布了“关于把上海的难民遣返原籍参加生产”的指示。虽然这一指示是特地为上海颁布的,但也号召苏南、浙江的所有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遵照指示精神,为疏散多余人口拟定类似的计划。

至于上海,它要承担起动员难民回乡并安排运输的任务。同时,山东、苏北和皖北的地方政府要接收难民,为他们安排食宿和工作。这些地区的县政府及农会要派代表到上海协助这场动员运动,包括宣传和教育,以减轻因害怕土改而逃离农村的地主

及富农等人的疑虑。党此刻的态度是“既往不咎”，欢迎所有的人回来。对不肯离开上海的人则少发或停发救济金。〔66〕

上海军管会为了疏散在上海的以及途经上海回乡的难民成立了运输中心，解决食物及交通问题。〔67〕据此时的报道，上海有10万名地富难民，和大约17万名“无业游民”。这两类人都被安排及早离开。此外还准备遣返大约65万“贫民”回原籍。〔68〕

但从上海难民救济协会6个工作站进行的调查来看，到9月中旬，上海仍有454,147名难民。9月初，人们还发现，难民又以平均每天100人的规模进城了，其中有些人已是第二次了。这些新来的难民是为了逃避洪水以及洪水在苏北、皖北和鲁中部分地区造成的歉收。这也许是上海当局在遣返运动中难以得到地方政府配合的一个主要原因。〔69〕

潘汉年副市长后来宣布，9至10月间只有7,000名难民离开上海，而进来的新难民却有15万名。〔70〕到12月中旬，难民遣返运动已是一个公认的失败之举。市政府只能集中全力养活难民，而这也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大公报》发表社论说，在街上仍发现冻饿而死的难民是件可耻的事，虽然这在解放前上海冬季的早晨是司空见惯的事。社论提到了老解放区的口号“不让一个人冻死饿死”，号召上海市民也应为救济工作的胜利完成尽力，不要把一切都推给政府。政府正忙于在市郊建立一批救济中心。〔71〕此外还成立了华东生产救济委员会，来解决更为基本的问题，其任务是动员一切物力，支持发展灌溉、生产，并在农村地区进行救济。

冬季难民救济与遣返计划的另一方面是12月初上海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拟定的改造乞丐、小偷和盗窃犯的决议。根据这些决议，公安局开始于12月12日晚在上海街头拘捕上述人员。几天之内包括家属在内的5,000人被拘留，送往保育所、妇女培

训中心和残疾人培训中心。其中 3700 名有工作能力的成人立即接受了改造与培训计划，这与第八章所述张家口的做法基本类似。

最初由于谣传要被送往东北强迫劳动或参加对台湾的战争，被拘留者中时有骚动。但当负责的干部解释说东北重建需要的是专家与技师，而不是不熟练工和流浪汉；解放军不要他们也能解放台湾后，秩序立刻就恢复了。根据计划，要把上海的小偷与乞丐改造成诚实的工人，就像满洲和华北已经做到的那样。〔72〕

压缩行政开支 六大任务中另一个马上就遇到困难的是压缩公共开支。8 月中旬，中共华东局颁布了一个“所有政府机关与部队的重建与经济”五点计划。这一计划适用于南京、上海和杭州，以及这一区域的其他省份和地区。该计划要求所有的政府机构与部队压缩财政支出，清点从国民党政府处接收过来的一切物资与资金，公用事业要自负盈亏，提倡“生产性劳动”。

压缩财政支出要通过以下途径达到：节约用水、电和汽油，反对自我放纵（这已腐蚀了不少进城的农村干部），削减部分雇员的工资，所有政府雇员的大米定量减少二到四盎司（实际上这已抵消了渡江前增加的食品分配定额）。

为了使邮政、电报和铁路这样的公用事业自负盈亏，要求经理们编制和公开收支明细账，使公众对涨价有所准备；要动员工人开展竞赛，减少费用，提高效率；要制定一个制度，据此一个单位的盈利可弥补另一个的亏损；要学会不依靠财政部或银行的补助与贷款进行经营。

但最主要的节约举措就是裁减冗员。南京、杭州、上海取消了从国民党政府接收的一切不必要的单位和机关。冗员中有一技之长者都转到他处，没有一技之长者则发给一个月的解雇费后辞退。那些通过朋友和亲戚关系谋到职位的“绝对没用”的人

则不发解雇费就予以开除。进城的共产党军队与政治机关的部分干部被派到农村最需要人手的地方去。在各省与农村地区，党、政、军、民各部门都要取消或合并多余的办事处或单位，让所有老弱病残和不需要的人员退休或转职。〔73〕

裁减的人数没有公布。但上海市委的一位成员于9月10日说，部分行政单位和公用事业单位“没有依照政府下达的原则”就擅自进行裁员运动，结果，许多公用事业的职员发觉自己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因此他宣布了一个新规定，凡找不到工作的辞退人员应恢复原职。如果不能为他们找到工作的话，对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就应给他们一份能维生的收入。〔74〕新规定执行后，许多辞退人员恢复了原职。这样，新政府精简其从国民党处接收的官僚机构的第一次尝试至少在上海就结束了。市府只能宣布，召回辞退人员的行动显示了它的负责精神以及对他们福利的关心。〔75〕

重新开动印刷机

八九月间，各种报道开始显示物价上涨的势头已趋向和缓。〔76〕9月11日，人民银行发行了面额为500元与1,000元的新钞，而以前的最高面额为100元。据上海的一位副市长曾山说，这次发行新钞的主要原因是新钞流通地区的迅猛扩展。但也有其他原因。秋粮马上就要上市了，由于通货膨胀，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已不能满足需要。政府需要大量的资本购买棉花等原材料和其他商品，以供给城市市场，重建交通需要的投资也迫在眉睫。最后一个原因是，政府既然不得不撤回裁员命令，也就不能压缩其在那一领域的支出。〔77〕

到10月份，物价重现上扬趋势。与国民党时代一样，新钞发行进一步促使公众失去对政府稳定货币能力的信心。新的上扬趋势不只出现在上海，而是全国性的，并延续至10月与11月。

华东财经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在上海宣布，这次物价波动虽然来势凶猛，但只是暂时的。他把这次上涨归咎于钞票发行数量的增加以及促使多发钞票的局势，包括为解放全国而正在进行之中的广泛的军事行动。他还说原材料、能源与设备的短缺导致上海工业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此外，华东新解放区周边的农民对新币仍然不大放心。结果新币只能在那些地方作短暂流通，旋即又流回城市，增加了闲散资金的积累。而在城市中，黑市又有重新抬头的迹象，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势。〔78〕

12月5日召开了第二届上海人民代表大会，试图增强人们的信心。陈毅在开幕式上宣布：

遗憾的是有些人不但没有区别7月的物价上升与10月的上涨之间的差别，而且没有区别人民政府与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差别，也不愿区别我们胜利之后必然会有的暂时困难与国民党在灭亡前夕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困难。

会上发言的人们回顾了新政权自8月第一次大会以来取得的成就，指出政府针对通货膨胀所作的努力使8、9月间物价走势良好。他们强调了7月间物价上涨与10月、11月间的不同之处。新问题替代了第一批问题，第二批问题也会像第一批那样得到解决。7月，国民党刚开始封锁，政府尚未拟定一套计划来克服其最坏的后果；与内地的联系尚未完全恢复；基本商品的库存也很少；工商业仍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些问题都已基本上得到解决，扩大发行钞票所反映的新问题只是暂时的——只要人民与政府携手，就能克服。解放区的扩展不久便要结束，在新的革命秩序之下，税收与财政渠道还会增加；新发行的货币已投资在生产性企业之中；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保证城乡间物资与商品的交换；中苏贸易的发展也将给工业的发展与日用品的采办带来好处。

总而言之,新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面,没有焦虑与悲观的理由。或者,正如毛泽东在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所解释的:“我们有经济困难,我们要告诉人民这些困难在哪里,我们不应向人民隐瞒我们的困难,但我们必须同时向人民保证,我们知道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因为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就有希望。”^[79]

胜利者与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

国民党回来时宽容许多著名汉奸的过去,却在1945—1946年间采取把沦陷区人民贬为汉奸和傀儡的政策。这些政策打击最重的是知识阶层。来自大后方的官员对滞留在沦陷区的同胞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更使这些政策变本加厉。

即使国民党领导人考虑到这一行动的政治代价,他们也可能会对由此而产生的不满置之不理。共产党决计承受不了这种傲慢态度的后果,因而着意努力加以避免。由于知道自己在城市的地位很不稳固,共产党努力把城市中拥护他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联盟。这可能是解放初期所取得的最为成功的政治成果。

士兵与官僚

根据解放军总部发布的命令,一切犯有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官与政府官员都要被逮捕,彻底调查,并依法严惩。战争罪行包括谋杀,抢劫或毁坏人民财产,杀害或伤害战俘,毁坏武器弹药,破坏通讯设备、文件、电报及档案等物,破坏粮食供应,以及破坏公共设施、工厂设备、银行、文化古迹等一切公共财产。^[80]

除了犯有上述罪行的战犯之外,任何人只要愿意,人民政府都欢迎他加入新政权的服务行列。与国民党在1945—1946年间

对待教师学生一样，共产党也对愿参加新政权的人进行了政治再教育，但并不羞辱这种参加和完成改造课程的人。与内战期间一样，国民党的投诚部队都整编成了人民解放军。战俘们有权选择是回家还是参加共产党军队。军官在接受一段时间的改造和训练后，一般也能得到这种选择权。到1948年10月，大约有80万名国民党军士兵以这种方式参加了解放军。〔81〕

1949年1月，傅作义把北平和平交给共产党以后，和议的条例极其宽大，并广为宣传，以使别人也能仿效。不过，共产党把政工干部派到了所有前国民党单位，以确保改组是真正的政治改造，并非只改变了军服的颜色与徽章。干部们负责把解放军的政治制度教给前国民党官兵，在军官与部队之间建立一套新型的指挥关系，并在官兵中普及一种与老百姓关系的新意识。

情愿回家而不参加解放军的军官也得到许可。他们领到三个月工资和回家的路费，在解放区内一路上可以免费食宿。每个回乡的人都领到一纸承认他在和平解放北平中“立功”的文件。解放军还向这些人保证，将来要是他们改变了主意，想参加解放军，还是欢迎的。〔82〕

此政策也适用于政府官员，虽然人们已认识到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是一个极大的挑战。1949年3月，华北政府主席董必武宣布，这是战争结束和生产开始后的三大任务之一。〔83〕因而每个人都要参加政治改造计划。上海改造国民党市府人员的运动始于6月13日，课程一般持续一个月。受训人员先是听取有关概述党的主要原则与政策的发言，然后就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到12月时，已有约5万名上海公务员完成了这种培训。〔84〕

这段时间考虑的主要是个人的专长，而不是政治倾向。不管在哪里，党特别欢迎的总是有技能的人。典型的例子就是1948年8月1日中共东北局颁布的，有关从国民党接收的公用企业

职员待遇问题的指示。只要技术人员尽责工作,哪怕他们“在思想上与共产主义有分歧”也可留用。这一政策也适用于一切高级行政人员,除了那些过去真的压迫过工人的。考虑到公用企业中的许多职员与工人为了保住工作,被迫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该指示强调不能仅仅因为参加了上述组织就歧视他们。〔85〕

学生与知识分子

共产党处理最成功的就是与学生的关系。因此,共产党能够从一个内战期间留在国统区城市的群体中开发出对改革充满精力与热情的资源——而这个群体只要有可能会很可能就不会为中国选择共产党政府。这些学生并不完全令共产党称心,因此解放初期的各项任务完成后,党一直努力约束学生。但即使在当时,新政权也努力避免使自己在道德或意识形态上对学生高人一等。更重要的是,党欢迎学生的贡献,派他们担任执行政策的干部,给他们有威望的重要职位。

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在对待包括青年人在内的知识阶层时就不曾犯过“错误”。正如人们所见,共产党人自己也承认,在对待农村的教师与城市的技术人员时犯了错误。但党反对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冒险主义是1948年反“左”倾运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集中于中国大城市,在解放军开始攻占之前,共产党已彻底清除了残留的冒险主义倾向。

这一温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已在第六章中概述。1948年10月的一篇新华社社论,解释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实际考虑。它指出,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党需要大量能够出任普通干部的政治上进步的人。因此,党决定大量建立短训学校与训练班,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政治培训,然后把他们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去。但连这种短训学校也满足不了政府与公共部门的需要,党因而号召现有的正规中学为完成这些新任务而培

养大量学生。〔86〕

第一阶段：参加革命 北平城郊的燕京大学，950 名学生中有 500 名响应了参加解放北平的第一次号召。北平投诚的前几周，学校附近已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学生就用这段时间准备自己的任务。清华、燕京、北师大与北大共有约 2,300 名学生被动员起来。他们组织了宣传队和文工团，向中学里的弟弟妹妹解释新社会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职责，进行文艺演出招待工厂工人。大学生宣传队在街头巷尾与解放军宣传队合作，向行人发表演说，宣传新政权的纲领与政策。〔87〕

3 月 1 日至 6 日于北平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回想起他们的同学为革命所完成的具体任务，而这些任务他们也能做到。抗战期间，几千名学生离开学校成为栋梁之材。延安的中学生与教师组织了医疗队，随同部队转战几千里。在华东解放区，学生负责运输食物，而在苏北，他们组织了武装小分队。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及佳木斯，学生为解放军组织了输血队，在东北许多工业区，学生走进工厂，组织工人，为他们举办夜校。〔88〕

为革命服务的机会看起来是无限的，北平学生因此积极响应。有几千人参加了北平地区新成立的四个干部培训中心的人学考试。在四所学校中，华北大学的前身是延安时代的抗日大学，它的人学要求最为严格。它接受通过了 5—6 月培训课程考试推荐上来的大中学毕业生。华北军政大学的人学要求也包括 6 个月的培训课程。只有 18—28 岁持有至少初中以上毕业文凭的青年才能报考。这所学校由解放军主管，旨在培养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干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也要人学考试，但它接受包括小学毕业生在内的受过各级教育的申请者。〔89〕

最后，几乎每个申请者都接受了解放军南下服务团的 6 周

训练。自2月26日到3月2日,2,500名学生、技术人员,甚至一些大学教授都报考服务团,盛况空前。〔90〕到3月中旬,3,000多人(基本上是本地高校与中学的学生)通过了考试。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政委罗荣桓与政治部主任陶铸在3月12日为第一批受训学生举行了严肃的开学典礼,这些学生多数来自北平各大学。〔91〕一个月后,胜利加入服务团的2600名学生在中山公园出席了司令员林彪致词的开学典礼。〔92〕南下服务团在天津也举办了一个训练营,报名时与北平一样,盛况空前。〔93〕

这三所大学于2月中开始招收学生。一个月之内,大约有3万名当地学生、政府工作人员、店员与失业青年参加了入学考试,约一半人被录取。各校第一届情况大致如下:华北大学,5,500人;华北军政大学,1,700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8,300人。入学者中60%为学生。〔94〕天津设立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分校以及华北工人干部学校,计划于4月1日招生约2,000名。〔95〕

考虑到当时北平所有的高校学生只有大约2万人,这些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北平的许多高校于3月中旬正式开学。但据一位观察者报道,可能除了理工科各系之外,很多班级已无法正常开课,因为许多学生参加了干部训练班,或是组织起来在北平宣传。〔96〕

随着共产党军队南下,招干浪潮也随之南移。沪宁地区于6月中旬正式开始。当时,华东军政大学已设立了两个培训中心,一个在南京,另一个在苏州,并开始招生,第一期准备在7月开学。〔97〕

在上海,学联从上海各高校、中学召集了1,000名学生代表开会,其中有许多是学生自治会的成员。6月16日召开的这一会议号召与会代表在将要到来的一周内开始动员同学为新的人民政府服务。上海学联主席张渝民宣布要完成以下定额:解放军

南下服务团需要 6,000 到 8,000 名学生,华东军政大学需要 5,000 名,600 名去做商会和工会干部,400 名为人民政府外事处服务,100 名从事上海文化工作。他建议集中从 18 岁以上的学生中招募。他还建议工科、医科、农科和理科学生留在学校完成学习,将来为祖国服务。〔98〕

次日,上海参加服务团的浪潮在服务团团长、中共中央委员张鼎丞的讲话声中开始。他敦促上海的知识青年参加解放军的“南下远征”,把革命推进到全国各地。据张说,服务团的任务是:第一,通过宣传和教育工作,动员群众拥护解放军;第二,军事工作结束后,参加接收工作。〔99〕几天之内,有 1,000 多名学生自愿参加服务团,其中包括 400 名复旦大学学生和 200 名暨南大学学生。〔100〕

上海服务团的志愿者与北平天津的一样,只接受了最基本的培训。在五到六个星期内,他们学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共关于与国民党和谈的八点宣言,解放军在城市中的纪律与注意事项,以及毛的《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随后,他们就与南下的解放军部队一起开拔了。〔101〕9 月间,服务团的 2,500 多名青年知识分子从上海抵达福州。其中一部分分配到别的城镇工作,但多数留在了福州,分到福建省政府下属的金融、经济、教育、文化和公安各机构,也有的分到青年团和当地的人民革命大学。〔102〕

还有一支农村服务队。解放军部队与当地政府组织了约 1 万名干部、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省委领导下的浙江农村服务队。这支服务队于 8 月初成立,他们发动社会改革,组织贫农和佃农进行土改,逐步肃清农村的反革命势力。与此同时,苏南农村服务队也成立了,训练中心设在无锡和苏州。〔103〕

这些匆匆忙忙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中的大部分对党的

原则缺乏“坚定的信仰”，受到一些党员和老干部的公开怀疑。这时，党试图使对普通知识分子的培训不同于对干部的培训。^[104]对后者，干部工作大会、培训计划和整风运动的方法与态度都十分类似，这已在别处详细论述。^[105]对普通知识分子的教育计划起初不包括干部必须经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省。政治课以演讲和讨论为主，涉及时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及中共的政策。南下服务团的六周训练课基本上都是这类课，虽然团中的青年在后来的工作中常常担任了干部的角色。

为了平息由此激起的不安，党的领导说参加服务团与组织工人等一样，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训练。有篇社论评论道，“这样，思想意识上的缺点与行动上的摇摆就能得到医治。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任务因而在改造知识分子中有着深远的意义。”^[106]

自然，这比公开进行改造运动，把他们划为许多人心目中的不稳定分子效果要好得多。社论的作者们也没忘记作一番与国民党的比较，他们强调，在过去，许多想在公共事业单位中谋职的人都被迫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而在1949年，共产党人真诚地宣布，想为人民服务的大中学毕业生前进道路上并无此类障碍。最后，党还实行了一个措施（虽然只是局部和暂时的）以解决知识阶层极其关心的问题，从而赢得各方称赞。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受到战争影响，失业是内战期间学生最大的后顾之忧，那时的大学生纷纷流传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因此下面的话就显得意义十分重大——“今年在新解放区，情况完全不同。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建设工作才刚开始发展，到处都需要人才，需要干部，我们的毕业生有很多服务的机会。”^[107]

第二阶段：回到学校 对于那些不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事业的人，党号召市学联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实暑暑期学校政治学习计划。^[108]对象基本上是普通学生，并非积极分子。一位作家曾

说,过去在新解放区使用的方法总是首先集中最先进分子,因此,这一针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群众性”政治教育的早期尝试被视为一个试验。〔109〕

在北平,参加的学生大约有12,000名。约1万名学生参加了青年暑期学校,其中多数为中學生。另外1,900名参加了大中学生暑期学习队,其中一半是普通大中学生,另一半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这一计划是团员培训班与群众培训班的结合。

据说学生热情高涨,但由于时间实在太短,许多人只掌握了最肤浅的革命知识。学习负担较轻,只集中介绍最重要的问题,例如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历史发展、教育与政治事务的关系以及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此外,还有许多著名革命家如彭真、薄一波和艾思奇等人来给学生上课。他们认为革命斗争故事更适合一般群众,因而都不作长篇理论报告。戏剧、电影、体育与旅游为北平暑期学校计划锦上添花,最后成功地结束。〔110〕

一个夏天的有意义的演说与社会活动当然只是一个开端。1949年下半年与1950年初,共产党发表了许多文章与小册子,支持学联与青年团的干部开展教育学生的活动。学习资料总以一篇肯定知识分子对革命重要性的发言开始,说明党需要他们的才干和支持来建设新社会。知识分子的弱点基本上是从旧社会带来的,是可以克服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学习资料列举和分析了这些弱点:害怕阶级斗争;缺乏实践知识;一贯轻视体力劳动;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极具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守纪律;在逆境中动摇不定;对党及党的工作缺乏足够的了解;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缺乏凝聚力。

这些普遍的弱点给新社会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带来许多问题。例如,他们既忠于自己的地主、富农家庭,又想为党工作建设一个新中国,因而十分矛盾。有人因自己父母所受待遇对党不

满,也有人觉得由于自己的阶级出身,自己在党的眼中总是不够清白。有些人则疑恨交加。由于考虑到知识分子在本地工作可能会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而引起利益冲突,因此不允许青年人在本乡本土工作,结果,上述矛盾就进一步加剧了。东北的条例暂时禁止知识分子干部担任区、村一级的领导职务,结果引发了许多不稳定与不愉快。其他问题则包括由于经济困难或学校设施不好只能辍学,毕业后失业的现象等,当然这些都是从旧社会沿袭下来的问题,虽然新政权已尽了自己的努力,但它不能在所有地方立即予以解决。〔111〕

最后,学校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亟待引起注意。一方面,部分教师太保守,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政治革命一结束,自己就可以回去像从前一样一成不变地授课。数千名教师与教授曾参加了暑期学校,学习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知识。但有关教学方法、教科书与学校课程安排的改革还不能立即开展,这就在进步学生中导致了急躁与不满的情绪。

另一方面,许多学生缺乏自我约束。如果说这一特殊问题引起了多方重视,那是因为在1949年度第一学期这是一个大问题。学校的新领导就像国民党统治下的同行一样,发现自己面临一个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局势。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共产党人——他们在解放后发布的宣言给了学生与老师“参加革命活动的权利与自由”。〔112〕不过,这种在解放之前与解放期间的“热情的学生运动”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允许再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一位评论家指出,学生在解放后最初几个月内积极帮助新政府工作。他们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参加干部学校,奔赴新解放区工作。他们聆听报告,举行讨论会,学习革命理论,进行思想改造。学生运动与解放军的最后的进军相配合,激励了全国人民的

精神,帮助建立了新的革命秩序,并加速了学生自身的发展。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所有新解放的城镇都先经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热火朝天的阶段,并藉此达到了许多目的。但这一阶段结束后,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回去继续自己的学业。〔113〕

但是,那年秋天几乎在每个新解放的城市都有学生不愿正常上课,不肯打开书本,而且不听教师管教。〔114〕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一个班通常应有60名学生,但来上课的往往只有12或13人。而在另一所中学,学生故意在教学时间安排开会。一些学生只上他们认为重要的课,例如政治学习与数理化。他们的态度就是解放了,他们可以主宰自己的教育了。〔115〕青年工作干部很少约束这种无政府行径。相反,学生干部(学校青年团支部、党支部成员、学生会成员)往往忙于开会,很少有时间顾及自己的学习。〔116〕

另一个极端就是有些学生想仿效工人的劳动竞赛,用学习竞赛运动来改革学习方式,教育当局试图使人放弃这一想法,他们指出,生产与学习是两回事,不能认为学生学得越多越快就能学得越好。〔117〕但这时第一学期已快结束,当局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学生群情汹涌,要求取消考试。这至少也得部分归咎于共产党人自己对国民党教育制度的批判,他们批评把考试和成绩作为学习的唯一目的。因此1950年1月,学校领导号召学生会与青年团开展“复习运动”,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准备考试,并解释考试与成绩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下的重要性。〔118〕

总 结

中共在接收时期取得的成就并非不掺一点杂质,也并非得来全不费功夫。它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可与一段人们仍记忆犹新的时期作比较,而此时期恰是国民党开始丧失城市拥护的标志。

说到纪律与秩序,共产党军政人员的表现都很模范——至少从他们出现在满洲较偏僻的城市起是这样的。开始时,共产党军队也犯了不少国民党犯过的错误,但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领导人在造成太大破坏之前已采取行动纠正了错误。1949年时,连那些与共产党绝对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也只能赞扬进入中国最大城市的官兵们的一举一动。这种严明的纪律再加上护厂运动,似乎也保证了中国城市经济基础免遭接收时期许多有形危险的破坏。

国民党遗留给中共的经济问题是不太容易解决的。在刚解放的那段时间里,共产党人的确在着手(或想要)解决经济、金融或货币政策方面的几乎所有问题,而国民党因在接收期间漠视这些问题而广遭批评。虽然在共产党统治的头一年中,通货膨胀率没有达到国民党治下的最高点,但是共产党用了好几个月才使稳定市场的努力显示作用。与4年前的国民党一样,共产党接收期间的特点也是经济混乱、货币不稳并影响公众对新政权的信心。

国民党方面的麻烦主要来自其愚笨的政策与行动,以及内战期间持续不断的经济决策错误。而中共的困难则主要是国民党遗留的大量问题,其次才是它自己的行动以及经验的缺乏。但与中共接收最初几个月似乎到处爆发的劳工争端一样,这一切已足以引起工商界的恐慌与不安了。

但新政府逐步行之有效地控制了基本商品,进而又紧缩开支,省下食物与衣物,使城市安然度过1949-1950年之交那个难熬的冬天。因此,新政府就能够把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最坏影响降到最小。春季到来之时,已有迹象显示通货膨胀行将平息。在共产党执政的头一年里,货币缓慢但持续地走向稳定,生产开始复兴,这一切都说明共产党已有克服中国经济困难的手

段及运用这一手段的能力。

从政治上来说,接收时期最成功的工作就是把城市中各种拥护力量组织成一个最广泛的联盟。共产党把这一工作做到了国民党军队官兵、政府机构成员与知识阶层之中。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在转折时期从一个不太可能的渠道——一直到最后才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阶层——得到了帮助。共产党不但没有斥责他们为投机分子,而且欢迎他们的合作,一起参加国家的日常管理,重建经济,扩充正乘胜进军的解放军队伍。

学生群体至少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共产党从他们那里开发出进行改造的力量与热情。党暂时宽容了他们的“弱点”以及缺乏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派他们担任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给他们相对显赫的重要地位。共产党人从而得到了数以千计迫切需要的积极分子,来充实自己的工作队伍。同时,新成员得到了在职训练,在政治再教育课程中有效地了解了新秩序的目标与其他情况。

1945年,国民党先是公开声称知识阶层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日本人统治下已被腐蚀,从而疏远了这部分人。随后,由于一心与共产党作战,国民党领导人在与知识阶层打交道时又采取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态度,结果自己舍弃了残存的一点支持。相形之下,共产党人并不要求人们立即全部认同,结果反而因自己的善意而大获其利,如愿以偿地动员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一个他们中的多数人原先绝不会选择的事业中去。

注 释:

[1] 《保护国家的财产》,《东北日报》社论,重印于华北新华书店编辑《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以后称为《关于城市》),27-29页。

[2] 《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中共东北局 1948 年 6 月 10 日颁布，来源同上，第 2 页。

[3] 参见第八章有关吉林局势的文献，注 110。

[4] 营口可能是个例外。二月下旬，有位观察者赞扬了共产党在收复中的表现，他特别提到了部队纪律：他们坚决拒绝了哪怕是极为细小的礼物。明朗（音译）：《记共军控制下的营口》，《时代批评》，1948 年 8 月 15 日。后来营口落到政府军手中，但中共在年底之前又重新收复了这座城市。

[5] 参见注 2。

[6] 《关于城市》，第 6—9 页。

[7] 同上，第 45—46 页。

[8] 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第 39—41 页。

[9]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北京，1949 年 4 月 26 日。

[10] 《中国建设》，1948 年 12 月 5 日，引用于德克·波德的《北平日记》，第 87 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认为顺利接收济南的一个原因是充分的准备。在发起总攻击之前三个月，这座城市的未来管理者就在附近的某镇学习党的城市政策，组建市政府及各个部门，制定章程，任命干部，讨论工作，并让那些未到过该城的人熟悉城市布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占领中国》，248—49 页。

[11] 《新闻报》，上海，1949 年 4 月 4 日。

[12] 转引自林恩与亚摩斯·兰德曼合著《红色中国简介》，108—9 页。

[13] 《解放日报》，上海，1949 年 6 月 6 日。

[14] 《解放日报》，上海，1949 年 8 月 22 日。

[15] 兰德曼：《红色中国》，109 页，引用美国驻沪总领事约翰·卡波特的话。

[16]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 年 2 月 20、24 日。

[17]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8 年 4 月 21 日。

[18]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 年 1 月 24、25、30

日与2月2日。

[19]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8年8月15日。

[20] 《立报》,上海,1949年2月3日。叶渚沛原为全国资源委员会重庆炼铜厂厂长。日本投降后不久,他取道伦敦和莫斯科来到解放区。

[21] 参见第四章,注58。

[22] 参见第四章,注13。

[23] 参见第四章,注51。

[24] 上海总工会秘书处编:《解放后上海工运资料》,4-6页。

[25] 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在斗争里壮大》,86-100页。以及章回编:《上海近百年史话》,211-13页。

[26] 章回编:《上海近百年》,212-22页。以及《解放后上海》,1-15页(参见注24)。

[27] 《解放后上海》,第12页。

[28]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关于石家庄——1947年11月26日;济南——1948年10月14、15、16、21日以及11月19日;长春——1948年10月20、22、25日;北平——1949年2月3、4、11日;天津——1949年2月8日。也可见明朗,23页(参见注4)。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249、255页,兰德曼:《红色中国》,60页。

[29]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1月26日、2月19日。波德:《北平日记》,116页,兰德曼:《红色中国》,53页。

[30]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6月11日。

[31]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6月10日。

[32] 《商报》,上海,1949年6月15日。

[33]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2日及7日。

[34]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2、13日。

[35]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6月10、11日。

[36] 天津2月下旬引进单位商品储蓄,北平于4月1日开始。北平的单位商品依照面粉、玉米粉和棉布的市价来定。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6日;以及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

10日;《商报》,上海,1949年6月10日;波德:《北平日记》,149页。

[37]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兰德曼:《红色中国》,58--59页。

[38]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8、13、14日;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2日。

[39]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5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

[40] 到4月的第一个星期,北平约30个大企业已建立了自己的消费者合作社,共有成员68,300人。一个月后,据报道这样的合作社已有71个。4月底,天津有224个合作社,成员达356,000人(这个城市的人口还不足两百万)。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8年4月8日;波德:《北平日记》,179页。

[41]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十八个月通货膨胀的程度可用中国货币对1美元的兑换率表示:

1948年1月	179,000元法币
1948年8月	12,000,000元法币
1948年8月	4元金圆券
1949年5月	23,000,000金圆券

参见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第314、317、319页。

[42] 波德:《北平日记》,276页(附录:天津的物价波动)。这些数据来源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统计。也可见《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50年)。生活在北平的波德教授认为,如果北平能得到可比数据,可能结果也是类似的。普遍上涨势头的冲击十分严重,虽然偶尔也会回落,例如天津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所发生的情况。解放后的第一个月粮价急剧上涨,天津军管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市场投放了大量粮食。面粉暂时从每袋1400元人民币降到了1100元,玉米粉每斤从12元降到9.5元。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2、9日。

[43] 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

[44]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2日。

[45]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2月28日。

[46]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8日。

[47] 《进步日报》,天津,1949年3月13日,引自肯尼思·黎伯思尔:《毛刘对抗? 1946—1949年的工商业政策》,《中国周刊》,第47号(1971年7—9月),511页。《进步日报》是《大公报》天津版解放后与所有报纸一样改组时起的名。

[48] 《新闻日报》,上海,1949年8月4日。

[49]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1日。

[50] 陈毅:《在上海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1949年12月5日,载于12月14日上海所有报纸。

[51] 上海《大公报》,1949年2月27日。

[52] 参见上文注48。

[53]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4日。

[54] 参见注50。

[55] 黎伯思尔,512—17页(参见注47)。刘此时的两篇发言发表于文革期间。参见刘《五个材料》。由于无法得到当时的出版物,我们就不能证实红卫兵出版物的完整性。

[56] 见上文注48。

[57]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7月27日和8月7日。

[58] 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8日。

[59] 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9日。

[60] 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9日。

[61]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9月11日。

[62] 潘汉年副市长1949年12月5日在第二届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解放日报》,上海,12月5日。

[63] 《解放日报》,上海,1950年1月31日。

[64] 兰德曼:《红色中国》,61—67页。

[65] 参见上文注48。

[66]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8月5日。

[67] 《新闻日报》，上海，1949年8月18日。

[68] 《新闻日报》，上海，1949年8月8、13日。也可见副市长的报告，参见注62。

[69] 上海《大公报》，1949年9月19日。

[70] 参见注62。

[71] 上海《大公报》，1949年12月16日。

[72] 上海《大公报》，1949年12月16、24日；《解放日报》，1950年1月5日。

[73]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8月17日。

[74] 《新闻日报》，上海，1949年9月12日。

[75] 上海《大公报》，1949年12月16日；副市长报告，见注62。

[76] 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CPR)；《解放日报》，上海11月17日。

[77] 选自曾副市长在9月12日两千名“模范工人”大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由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召开，讨论新发行的钞票问题。《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9月13日。

[78]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11月17日。

[79] 引自陈毅开幕式上的发言，参见注50。

[80] 《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载于河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10—11页。

[81] 毛泽东(1948年10月10日)，《毛选》第四卷，271页。

[82]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2月20日与3月1日。

[83]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6日。

[84]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1日与20日；潘副市长报告，参见注62。

[85]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8年8月17日。同时该指示又说，虽然要给国民党员与三青团员分配工作，但暂时“不要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参见第8章，注61。也可参见《新工商政策》，179页。

[86] 《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的重大政治任务》，1948年10月14日，

载于《知识分子与教育问题》，18页。

[87]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2月13日；拉尔夫与南茜·兰普伍德，《中国革命全过程》，38—54页。

[88] 《解放区学运报告简要》，载于《中国学生大团结》，17—18页。这是李秀诚(音)在第十四届全中国学生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89]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2月27日；及《新闻报》，上海，1949年4月4日。

[90]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9日。

[91]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4日。

[92]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4月10日。

[93]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8、21日。

[94]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8日。

[95] 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27日。

[96] 《新闻报》，上海，1949年4月4日。德克·波德(《北平日记》，130页)报道，当清华大学于3月初重新开课时，2,482名学生中只有1,804名回校。他认为缺席的大多数跟随解放军南下了。北平大学生的总数可见第三章，注22。

[97]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6月13日。

[98]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6月17日。

[99]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9日。

[100]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20日。

[101]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7月19日。

[102] 《解放日报》，上海，1949年10月25日。

[103] 《解放日报》与《大公报》，上海，1949年8月16日。

[104] 参见第六章，注68和注69。

[105] 关于整风与工作大会，可见韩丁：《翻身》，319—416页。有关华北大学的干部培训课程，参见罗伯特·J·利夫顿：《思想改造与集体主义心理》，253—73页。

[106]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24日。

[107] 《毕业以后》，《中国青年》，第9期，重印于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以后写为《学生运动》），第52页。在天津，据估计大约有1,000名失业与失学的青年在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联合报名处申请参加入学考试（北平美国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2月22日）。

[108] 《暑假快到了》，《中国青年》，第9期；《关于暑期学习》，同上，第14期。两文皆重印于《学生运动》，54—57页。

[109] 于立群：《北京市暑期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学生运动》，72页。

[110] 同上，71—75页。

[111] 可参见下列事例：(a)冯文彬：《与工农群众结合为工农群众服务》，在1949年3月2日第十四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重印于《全国学生大团结》，5—10页；(b)成仿吾：《关于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新华日报》资料室编：《论知识分子：学习丛书》，6—10页；(c)薛暮桥：《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同上，18—22页；(d)陈毅：《关于知识分子参加解放区学习与工作问题》，同上，28—32页。

[112] 上海《大公报》，1949年7月22日。

[113] 蒋南翔：《论开展学校中的新民主主义学习》，见青年出版社编《学生运动》，第20页。

[114] 《在学校开学前的几句话》，《中国青年》，第17期。重印于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编《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1—2页。

[115] 《应纠正学习上散漫现象》，《中国青年》，第8期，见青年出版社编《学生运动》，44—45页。

[116] 《开会不要太多》，《中国青年》，第8期，见《学生运动》，46页。

[117] 《学习竞赛不宜提倡》，《中国青年》，第32期，见《学生运动》，63—64页。

[118] 《要不要考试》，《中国青年》，第31期，见青年出版社编《学生运动》，48页；《解放日报》，上海，1950年1月4、13日。

第十章 内战的政治

从国民党失去支持、民众转向共产党这一事实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政策和实践而言，这是共产党的胜利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人们当时的看法——是国民党自身的崩溃？是共产党人真正赢得了统治的权力？或者他们只是意外地得益于国民党的错误和日本人的暴行？

到1948年底，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一个阶层不曾尝到过国民党统治的恶果。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抢米风潮，台湾起义，学生示威以及知识界持续不断的批评，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人民普遍的不满。中国民众要求社会公正，要求清除腐败，要求经济保障，要求一个不再压制人民的政府，要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并要求结束国民党当局对农村的忽视和剥削。所有的人，包括国民党人自身，似乎都明白问题出在何处，但是人们要求变革的呼声实际上却并没有影响政府的所作所为。

城 市

在城市里，对国民党普遍地不抱幻想始于1945—1946年间

它回到沦陷区之时。早在二次大战结束时，“无能”与“腐败”两词就已成为大后方概括国民党统治弱点的标准缩略语。1945年8月以后，华东、华北及东北等沦陷区的人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再次解释了这两个词语。由于这个政府在八年抗战中已成为民族存亡的象征，它的无能和腐败就可能使得这些地区人民的幻灭感显得尤为强烈，他们对于重新归来的国民党的热情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迅速冷却了。

为接收而设立的机构在管理上混乱不堪，无法解决接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由于缺乏适当的制度约束，这个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无论是军方还是地方上的接收大员，都为了一己私利而竞相挪用日伪占据或拥有的资产，腐败确实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此外，接收政策不是制定不善就是执行不当。内地的萧条，光复区工业的停顿，使大批工人失业，而失业期间又得不到足够的救济以度过难关。那些在战时仍在内地坚持为国生产的企业家，由于预期的政府赔款不能兑现而濒临破产的边缘。在伪币兑换法币的过程中，官方公布的兑换率引起伪币贬值，使江浙一带的企业家和商人深受其害。政府的教育复兴政策把学生和教师贬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追随者，而许多真正勾结傀儡政权的人却能用金钱向接收大员们买来尊严，这使师生们群起反对。

尽管如此，这段接收时期并没有使国民党的统治权受到根本的挑战。人们并不想更换政府，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执政政府的改革而已。问题就在于接收期间招来广泛批评的多数症结从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结果，原本可在日本投降后很快得以解决的混乱和管理不善等问题，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城市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起源。

经济上持续不断的管理失误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政府

在经济领域中犯了许多错误,通货膨胀政策不过是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例子而已。依赖大量印刷钞票所引起的最危险的后果,可能就是这一政策使政府深信,总能制订出一个相对而言无痛苦的措施来解决金融问题。虽然大后方的经济依靠通货膨胀政策度过了抗战,但事实最终证明,走这条路的风险比紧缩开支和自力更生更大,虽然在当时看来走后一条路困难重重。除非政府肯大刀阔斧地改变自己的奢侈生活方式,否则通货膨胀的政策一旦实行就不会停止。但是政府从未实行紧缩开支和自力更生的政策,因为它意识不到实施这些严厉措施的必要性。相反,政府的领导人宁愿像当初抗日那样筹措资金向共产党开战。其结果就是这个政权既无力也不愿改善城市经济,最终导致了城市经济的衰退。

二战结束时,工人阶级一下子摆脱了长达八年的日本人统治以及在此之前的十年国民党统治,得到了自由,通货膨胀恰好在此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争端问题。在通货膨胀猖獗之处,政府已无法维持战前对工人的统治。日本投降后的头六个月里,工人毫不理会官方有关解决劳工争端的法令,结果政府只能默许工人的要求,使工资随着生活费用的增长而自动同步增长。

这一决定不仅造成了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而且危及国民党和工商界之间的长期联盟。实际上,政府虽然使工人阶层暂时安定下来,但却引起了企业主的不满,他们认为对劳工的让步造成生产成本的飞涨。但高工资只是问题中的一部分。由于政府尚须对问题的其他方面负责,而这些问题不是由通货膨胀本身引起就是由政府试图压缩通货膨胀的不当措施引起,它因此无法打赢这一仗。工商界的不满在1948年8月的改革时达到顶峰,上海商会和上海市工业会开始公开谴责官方的政策。

同时,工商界和老百姓用各种方式表明了他们对政府缺乏

信心。政府发行公债时,商界和金融界并不响应。公众不肯把自己的积蓄存入银行,而是另觅去处。在1947--1948年实行紧急状态改革计划期间,商人不再向实行价格管制的城市供货。企业主忙于囤积居奇,做投机生意,这比正常做生意、进行生产赚得多,但使得失业人数重新回升。政府对经济处理不善使人们失去了对其执政能力的信心,这是由政府的大多数措施无法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引起的。反过来,它又使政府更难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无法劝说(也不愿强制)人们服从改革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被认为是反共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常认为国民党失去中产阶层的拥护是它为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实际上不再对政府抱有信心的中国人并不像人们有时猜测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城市中等工薪阶层。二战开始后,中产阶级就沦为一个新的被压迫阶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内战结束。这一阶层主要包括教授和教师、中下级军官和政府公务员,他们承受了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沉重负担。但直到国民党在战场上一败涂地为止,这个阶层其实从未抛弃过它。而在此后要再继续支持国民党,就只有背井离乡了。

学术界的贫困自然成为学生反战运动的主题之一。教授们自己也在1947年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运动,提出增加工资、工资与生活费用的增长相挂钩等要求。为了筹措资金打内战,政府大量印制钞票,导致经济衰退,这为反战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理由,同时又大大削弱了知识阶层对政府的支持。但是知识分子对内战的反感与工人运动并不一样,后者直接由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混乱引起,前者却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本质,以及整个民族为保留这个政府所必须作出的牺牲的复杂评价。知识分子本身的贫困不过是他们评价政府时较为突出的一个因素而已。他们反对内战,是因为他们觉得以内战为代价保留现有

的国民党政权，付出牺牲实在太大了。

这种看法在当时是有民意根据的。直到1948年年中，人们还普遍认为内战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因为国共双方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讨论战争的代价时，人们总是谈到通货膨胀，它彻底搅乱了城市经济，并造成农村进一步贫困化。政府固然把滥印钞票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它另外还征收土地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行征购谷物，回收谷物贷款。上述负担再加地方杂税，征兵、苛捐和军队纪律不严、粮饷不足所带来的破坏，就使得农民不堪重负。日益军事化的政府和民众对政治的日益冷漠，最后都作为战争的直接后果而受到了谴责。政府在坚持内战的同时，疏于实行使它能民众接受的改革，这恰好证实了人们对它的谴责——国民党政府并不是一个为百姓着想的政府，相反，为了追求一己私利它不惜牺牲整个民族的利益，而且它甚至也无法有效地达到自己的这一目的。

然而在大多数批评家眼中国民党还是能挽救自己的，他们也正是这样恳求国民党的。尽管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误给工商界带来了莫大的损失，事实上工商界可能害怕共产党的统治会比国民党更糟。政府和反战的学生之间虽然存在着公开冲突，但即使在1948年底，多数学生仍愿意让国民党参加联合政府。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目标十分明确，虽然他们提出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建立有共产党人参与的联合政府，他们并不想毁灭国民党，只是想促其改革。直到1948年4月，储安平仍在请求国民党改变工作作风，做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他和其他民主人士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经过考虑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出现他们所企盼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可能性虽然有限，但仍比在共产党统治下要大。

虽然通货膨胀影响到知识阶层的物质利益，但他们并没有

因此就背弃国民党。然而出于种种原因，他们拒绝支持在军事上消灭共产党这一目标，尽管国民党认为这事关它的存亡。国民党因此陷入了自己一手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它要想留住所剩无几的支持，就只有听取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并且（或者）寻求与共产党和解。当所有的阶层都把改革看作与政府合作的前提时，这个政府却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除了从不兑现的口头承诺外——而得到民众无条件的拥护。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声明和法令即使不被工人、学生、教师、工人、企业家和金融家公开拒绝，也被置之一边。社会的各个阶层，出于不同的原因，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政府和共产党的战争采取了不支持、不合作的态度。这完全是国民党咎由自取，是它在政治上长期顽固不化，在经济上频频失误，又不理睬人民随之而来的要求改革呼声的代价。

此外，人们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失望也促使许多人在1949年时决定留在大陆。为一个像国民党那样失去人心的政党而背井离乡，作出的牺牲实在过大了。愿意留在大陆的人员包括中国多数受过最好训练的头脑：全体学生、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多数公务员以及国民党军队中成千上万的士兵。这些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是决定他们留下不走的另一个原因。

1949年留在大陆的人中，许多人都有明显的“疑惑、恐惧和顾虑”，知识界和工商界的情况莫不如此。学生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了多数人倾向于组建联合政府，而拥护共产党执政的学生甚至比拥护国民党继续实行一党专制的还要少。年长者只有在发现通往自由的道路行不通后，才转向有保留地支持共产党的立场。尽管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智地作出接受共产党的决定，但并无迹象显示他们明确拥护新政权，或是他们愿意作出的妥协是根本性的和永久性的。他们接受了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政

策中提出的许多目标,但显然不同意共产党有关一党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纲领。

不过,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保留只是部分的。他们要求更多的是共产党统治的形式,而不是总体上受到推崇的中共现行方针政策的实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待共产党的这种矛盾态度,根源在于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国民党未能解决的问题。

首先,共产党能够取信于民。1949年时,这一优点使共产党获益匪浅。国民党惯于说一套做一套,惯于颁布改革措施却又从不执行。共产党与国民党截然相反,享有从不食言的美名。他们切实执行各种方针政策,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共产党人宣布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人怀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但共产党还宣布这个理想尚需许多年才能实现,因此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人都有一席之地,都被社会所需要,无论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还是工人农民。既然共产党这么说了,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就都乐于相信。

其次,就管理的完善性、政治能力和解决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问题的能力而言,到1949年底,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瞩目的。中国共产党虽然缺乏管理城市和工业的经验,但它已开始向着克服中国最基本的城市问题的方向胜利前进了。1949年3月,毛泽东进入北平时,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的直接经验还仅仅局限于张家口、哈尔滨和满洲一些中等大小的城市,时间也不足四年,但他们出色地发挥了这些经验。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考虑城市问题时多次克服了理想主义的冲动,这种冲动是许多新执政的左派政党的特点。

张家口等地的共产党人凭着最初的热情,试图根据新民主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城市的所有问题,他们对工人和资方都许了

诺,但不久就发现不能完全兑现。到1947年底,随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运动的开展,对理想主义冲动的否定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此时,党对工商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方针已明确转向了扩大生产、为取得全面胜利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新的路线强调与私人资本的合作、国有企业的合理化管理,以及忽略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主义的差异而尽量争取他们的必要性。他们不再根据生活需要和政治标准给人酬劳,而是依照技术、资历和成果进行分配。解决工人阶级在物质上的困难这一理想并未放弃,只是暂时推迟了,而在当前则着眼于提供基本保障,把通货膨胀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影响下降到最小。同时,对群众未来美好生活的承诺则体现在为国营企业的工人设立的试验性的劳动保险计划,此计划早在1949年就已在满洲试行了。

1948年发起的反“左”运动为1949年胜利收复城市奠定了基础。与四年前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城市后的所作所为相比,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一言一行实在值得人们注意。到1949年共产党进入中心大城市时,共产党人,无论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干部,个个都是模范人物。这些金钱收买不了的干部和战士自觉地保护城市财产,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城市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工商业机构都受到了保护,尽可能保持了原样。

在政治上,收复时期做得最成功的就是创建了城市各拥护力量组成的广泛的联盟,团结的对象已扩大到国民党军队官兵、政府机关办事员以及知识阶层。在转折时期共产党人就是用这种办法,从那些直到最后一刻还和国民党站在一边的群体中,获得了所需的帮助。共产党欢迎这些人员来合作,以共同维持对国家的日常管理,重建经济,扩充乘胜进军中的人民解放军,而不是斥责他们为投机分子。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在他们对待新解放城市中的学生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学生并不十分赞成共产

主义，共产党仍然宽容地起用了大批学生，安排在相对显赫的职位上，让他们承担起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的重任。

但尽管如此，共产党并未取得完全胜利。在解放后的短暂岁月里，共产党试图在各个领域展开包括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工作，而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因忽略这些工作遭到批评。尽管在共产党人统治的头一年里，通货膨胀比国民党统治时下降了许多，但稳定经济的政策却在好几个月后才发挥出明显的作用。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造成的，但与新政权自身的行为及缺乏经验也不无关系。在这段时间里，经济混乱和货币不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新政权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

农 村

共产党人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由形势决定的。正是在农村，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在考虑都市经济的混乱状况时，总是惯于强调农业基础导致的农村整个经济根本性的稳定和停滞的特点。^[1]稳定和停滞这两个概念高度概括了国民党与农村的关系。无论中央政府采取行动与否，它都只是为了维持中国农村的现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它飞往台湾为止，但为时已晚了。

在国民党军队1946-1947年间收复的原共产党边区的地区里，这一政策的破产表露得十分明显。国民党在这部分地区的天然盟友是那些意欲复辟的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和其他“斗争对象”。与回乡地主联盟的地方官员有计划地进行勒索和报复，这一运动的标志是“自首”计划、还乡团的各种活动、“管理促进

会”以及收租委员会。共产党军队的主力、民兵及党组织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前已远走高飞。手无寸铁的农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地主等清算老账时，成千上万的人们遭到了杀戮。

绥靖区的改革措施是由南京中央政府颁布的，但是除了那些政府表面上要限制其利益的人之外，在农村没有人愿意贯彻执行。在国民党未受到挑战之前，农村停滞的状况的确是其力量的一个来源，但此现状所蕴含的不平等也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提供了一个动力的基础。

共产党取胜的方法是在抗战中形成的。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利益，共产党人放弃了激进的没收土地的政策，寻求均贫富的新办法。这一转变在华北尤为显著。租佃制在华北并非是占支配地位的问题，贫农多半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共产党人经过多年探索，在1945年之前扩展了农村土地政策，通过“清算”等战术来涵盖了所有问题，给华北的基本群众带来了利益。除了重新分配清算斗争中剥夺来的财富，给农民以物质刺激以外，共产党人还采取措施清除广大农民最直接的不满——乡村中的腐败、独揽政权和横行霸道。

在解决上述以及其他一切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无偿劳动、债务等相关联的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成功的模式——“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即使在那些村民并不把地主看成是一个问题的地方也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找到了破坏农村原有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方式，而且找到了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方法。

他们学会的第二课，就是怎样使与统治阶级的斗争成为“其他一切工作之母”。抗战初期，主要任务与次要任务之间并无协调与区别。在党从整体上认识到“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成为其他一切农村工作，包括党建与征兵工作的起点之前，它的工作

收效甚微。

从抗战中得来的第三条重要经验涉及到成功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各个地区在彻底贯彻执行党的土地政策之前，必须在军事上驱逐敌人，在政治上粉碎敌人统治，并建立一个新政权核心。党的所有指示都强调，在受敌人威胁的地方把阶级摩擦减小到最小程度的重要性。一个地区只有在满足了军事和政治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才能把土地政策及其引发的村内斗争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抗战动员了群众，中国共产党则为在1943年后日本人逐渐退却的华北大规模实现这些前提条件提供了必需的领导。

在随后的内战中，共产党人进行的最主要的革命工作就是土地改革。人们必须把华北土改的发展以及从土改的工作方式和条件中取得的经验，视作共产党人从抗战中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经验。这些经验写进了1946年5月4日的党的指示，它是党从减租减息正式转向土改的标志。《五四指示》所说的土改运动，就是从抗战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具有多种特色的斗争运动。

土改与实行土改的必要条件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土改是发动农民参加反蒋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武装斗争则是为了保障土改的顺利进行^[2]。1946·1947年间，国民党军队突然向广大解放区发起了进攻，这更证明了军事能力是保证土改顺利进行的最基本条件。这一进攻使共产党挑起乡村内部阶级摩擦（如抗战期间所做的那样）的前提条件荡然无存。共产党军队不能再自由作战了。中央政府在那些共产党人在斗争运动中所树之敌的帮助下，重新在农村地区建立起它的政权机构。

党中央在1948年5月重新确认了它在抗战期间确定的前提条件，承认在上述情形下开展土改的危险性。只有满足以下条件的地区才能进行土改：军事上有保障，多数农民要求分地，有

足够数量的干部去领导这项工作。由于上述条件一般未能在1947年夏以后解放的地区(即新解放区)得以实现,中共只能代之以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

但只要条件许可,土改就能动员和组织“基本群众”加入由中共领导的农村新政权。对此现象的标准解释就是土地等财富的再分配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他们的觉悟随之提高,愿意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共产党人当然也想从财产再分配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所提供的实际利益中得到“拥护”这一回报,他们无疑已如愿以偿了。但这一过程并非如此简单和直截了当。分到土地的农民都想留在家中耕种,对当兵的传统偏见也并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克服的。党内的批评指出,通过斗争运动和财产再分配初步形成的阶级觉悟,并没有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已使共产党直接得到与国民党作战所必需的拥护。

土地革命在这方面的基本作用就是推翻现存的农村精英,不管他们是不是地主。土改摧毁了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这是建设新秩序的必要步骤。而这个秩序的建设,又使土改的第二个主要环节成为其他一切工作的起点。在形式多样化的诉苦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积极的农民成了新党员,加入到村领导组织。得到土地等财产的人参加了农会等乡村组织。共产党人因而得以依靠这一农民自己掌管的公共组织履行征收谷物税、组织军事运输队等职责,并向不情愿参军的人施加社会压力。

从一开始,斗争运动就划分了阶级界线,这是它所要实现的许多目标带来的必然结果。1945年以前,虽然一般强调要劫富济贫,但在分配斗争果实时运动的这一特点便表露无遗。1945年后,随着把财产直接分给华北乡村人数众多(如果不是绝对多数)的贫雇农手中的运动逐渐深入人心,阶级的划分更为严格,并写进了1947年10月的《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号召平分农

村土地与财产。但是华北财富不多，而中农，无论新旧，却为数不少，如果一定要追求财产绝对平等，势必要侵犯中农的利益。党对中农的处理十分矛盾，这一矛盾最终通过含蓄地要求把中农划进拉平的行列而似乎得到解决。

然而1948年初共产党因照顾占军队官兵30%—40%的中农而放弃了绝对的平等，使这一矛盾显然还未能解决。试图使“贫农”作为一个阶级消失，这在1947年未免太超前了。尽管存在着疏远中农的危险，人们还是不能在群众运动中立即放弃这一十分重要的目标。针对已彻底开展土改的地区，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土地政策的最后规定中，为赢得中农的好感作了最认真的努力。

不管其中有何矛盾之处，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土改在农村扎下的“根”。当1946—1947年间国民党军队进犯共产党根据地时，他们能做的一切不过是试图拔出这些根，重新建立旧政权组织。自由派评论家意识到中共力量的来源，又看到国民党无法与之抗衡，他们的无助感因而日益增长。

因而从政治上说，中共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失败也是名副其实的。在城市里，两者都受到知识阶层和资本家对共产党在某些方面会比国民党更糟的疑惧的考验。而在农村，统治阶级的离心离德已根本无法和土改中动员组织起来的基本群众的力量相抗衡。就双方解决那些使公众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的问题的能力而言，中共有一份良好的纪录。共产党人并非恰好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方从国民党溃败中渔利。1949年时，他们并没有赢得对在大陆建立共产党一党统治毫无保留的支持，但他们取得的成就已为民众转而忠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想要深究到底是哪一个关键因素使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斗

争的胜利,未免有点类似盲人摸象——无论就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式政党的力量、社会经济条件、国民党的无能而言,还是就已得到的以及没给的外援数目而言,这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有助于共产党在其政治生涯中认识自我。而共产党自己能取得特殊成就,主要是在于它的灵活与耐心,这两个优点使得共产党能够一步一步地、一个命令接一个命令地将其夺取政权的斗争适应中国的环境。这是共产党从考验、错误中艰难地学来的才能,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管日本的侵略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胜利起了多大的作用,日本人在1937年时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样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在它的城市根基于1927年被破坏后,积累了十年开展游击战和农民革命的经验,并以此很好地武装了自己,从而利用日本人提供的这一机会,建立了广大的农村根据地,在二战结束时,成为中国国内最具活力的政治势力。

国民党政府却恰恰相反,基本上没有利用日本人侵略提供的同样机会。尽管国内和国际上都认为它是自由中国的象征,但1945年之前它在壮大国内政治力量和争取公众支持这两方面上所获甚微。它虽然支持了沦陷区的游击战和地下组织,但却没有把它们发展为广泛的抵抗运动。国民党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军事根据地和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在撤退到重庆后的岁月里,他们不思建设,却纵容了自身政治体制中的种种陋习,从而导致了二战结束后他们在接收中国城市时的不光彩行为。这是国民党无法应付日本侵略所带来的挑战的最集中表现。虽然有人认为日本的侵略使共产党人的胜利成为可能,因为这阻止了蒋介石的军队在1936—1937年间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但这实际上却承认了国民党没有能力在以后几年中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人竞争。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真正信奉革命理想的共产主义者，所以他们在实行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以后，仍然继续寻求均贫富的新办法，华北社会经济的现实不但没有使他们泄气，反而使他们在实践中去扩大“剥削”的定义，把一些对北方农民有意义的问题也包括进去。

中共领导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仅此一个因素还不足以使他们在1927年首次败给国民党后，又成功地使共产党发动了以农村为根据地的运动，并在1934年江西的第二次失败后又于华北发起了一场土地革命。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很好地适应自己的环境，这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可以从1942—1944年中共的整风运动中找到它在这一点上获得成功的线索。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之时，全国只有4万名共产党员，到1942年党发动整风运动的时候，党员已发展到几十万。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被吸收入党。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各自独立而又偏远的广大敌后根据地，把抗日斗争发展成统一的革命运动。整风的目的是要灌输有关思想行为的准则，使他们在缺乏常规的行政协调和控制手段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开始学习。整风围绕着两个主题：纠正党内错误的必要性，纠正党在处理与中国社会关系时所犯错误的必要性。在第一个方面，整风运动要加强党内纪律性和服从性——一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

但是毛泽东最关心的却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这个主题在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时他作的两个发言中占了主导地位。他强调了使马列主义适应中国环境以及在党的各级工作中实施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他批评了机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却不能用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当前中国问题的学风，还批评了把马列主义当作现成的灵丹妙药的教条主义。毛认为马列主义只

是理论工具,只有通过实际调查,了解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生活状况后才能发挥作用。他还批评了党内与外界自我隔离的倾向。在没有和党外群众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实现党的革命目标。最后,他批评了口语和书面语言中的党八股,要求上至司令员下至党的宣传员学会用人民能懂的语言与人民交谈^[3]。

着重关注夺权斗争的当前环境,是共产党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工具和组织模式,但40年代那套适应本地条件、满足本地需要的全面计划,正是在思想和行动的每一级——下至村庄工作的细节,上至中央委员会制定的政策——细致地运用这些理论的结果。这样,中共就将自己的利益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一致起来,从而创造了一个能够满足它自己对粮食和人力的需求并且拥护反蒋斗争的群众基础。

注 释

[1] 据司徒雷登大使所言,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76页。

[2] 莫汉(音):《人民解放军与土地改革》,《群众》,香港,第42期,1947年11月13日,第18页。

[3]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与《反对党八股》,见B.考普顿:《毛的中国:1942—1944年党的整风文件》,9—53页。

附录一

文献注释

《大公报》(1902—1948)

《大公报》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它与国民党政学系之间的关系却是众所周知的。在共产党人接管上海前四五个月,国民党在这座城市中的统治已开始分崩离析。这时,许多小册子与号外(其中许多相当左倾)面世了。由于上海的多数报纸已遭查封,或是内容锐减,美国领事馆的译员已没有多少事可干,于是他们在《中国报刊回顾》中也翻译了上述出版物的内容。尽管这些出版物的总体倾向是批评性的,但它们对《大公报》的看法好像还是基本准确的。下文对《大公报》历史的概述源自对这些出版物和文后所列各种书报的比较和综合。

1902年,满族人英敛之创建《大公报》,在北平、天津两地发行,是一家受人尊敬的报纸。早年,该报因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而声名鹊起。辛亥革命后,英把该报出售给王郅隆。皖系首脑、1912—1926年间北京北洋军阀的主要人物段祺瑞是那几年《大公报》的主要支持者。据说,孙中山也资助过《大公报》,因为该报不时为其呐喊,就像它为与段联盟的各个军阀呐喊一样。但此时《大公报》反映的基本是其主要支持人的立场,并不革命。胡霖(胡政之)是该报1916—1925年间的总编辑,他也是《国闻周报》的创建者与出版者。显然《国闻周报》也由段支持,与《大公报》往来密切。

政学系与该报关系的最初起因就是该派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政学系的一个源头是欧事研究会,这一个团体约于1915年在美国成立,创始人黄兴将军和一群国民党员,他们是在黄与孙中山就对日政策及《二十一条》问题上产生分歧后离开中国的,当该会成员回到华南时,他们把自己

的组织更名为政学会,积极投身孙中山广东政府的政治活动和在广东举行的国会会议。据钱端升之言,当时热衷于与北洋政府重修旧好的政学会会员使得多次国会会议中止,正是他们的举动使得孙中山开始蔑视其从前的追随者和党派政治甚至议会政治本身。

不管怎样,政学系愿意与北方的军阀合作,特别是与段祺瑞及其皖系联合。这一联合使该派系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极右派。但随着段祺瑞在20年代垮台,政学系也暂时偃旗息鼓。该派系的一个领导人吴鼎昌在1912—1920年间的北京各军阀政府里,担任过重要的经济与财政方面的职务。此时,显然是由于段倒台的原因,他也离开了政界,成为盐业银行的董事长,并于1923年成为华北四家主要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这四家银行是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以及中南银行。

吴鼎昌认为,发行报纸可以重振政学系雄风。他从周作民(金城银行的创建者、总经理兼董事长)处得到资本,得以组成一个新公司,买下了段祺瑞支持的《大公报》与《国闻》报业。

重组后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在天津出版发行,该报很快就在经济和新闻上获得成功。早在1932年,它就取得了几倍于最初投资的利润。该报被称为北四行的文化企业,周作民为其中举足轻重的财政家,吴鼎昌为其社长,前编辑胡霖成为经理,而社论作者张季鸾(张炽章)成为总编辑。40年代《大公报》闻名遐迩的主笔王芸生,1926年时尚为天津某小报的记者,他在与张季鸾就社评而进行的一系列争论中给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张的青睐。后者提携这个年轻报人为《大公报》工作。王在30年代后期其恩师退休后接任总编辑。

在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期间,该报声名远播,成为国内发表新闻与社评的最可靠的一个论坛。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报宣称的“不党”——该报名称表明“公正”——是无可怀疑的。《大公报》重组后不久便开始批评蒋介石,但随着蒋成功地结束北伐并且(据说)成功地说动张季鸾,这一切就逐渐改变了。

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后,该报支持蒋介石关于中国尚未作好对日开战准备的立场,因而受到主张立即反击的人的痛恨。直到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战役并最终在1937年对日作战之后,《大公报》才改变立场,成为坚定

的主战派，并与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到重庆。1941年，《大公报》得到了国际认可，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嘉奖，表彰其对新闻事业的贡献。

抗战期间，该报被认为不仅支持抗日而且拥戴委员长本人，后一点部分是出于总编辑与蒋本人之间的私谊。但不管怎么说，《大公报》的社评方针好像反映了银行家、商人、政学系政客这三者的利益。因而，虽然该报在总体上持自由派立场并不时批评中国时局，但它避而不批评蒋介石。同时，在揭露有关腐败等丑闻时，它从不点卷人其中的政学系要员之名。

到了40年代，在国民党内部互相竞争的三个主要派系中，政学系是最倾向自由主义但最不具影响力的一个。另两派是黄埔系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CC系的力量在于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部。政学系成员因为没有多少机会控制党中央的组织权，便忙于在各省政府中寻找立足之地，并从事金融与商务活动。由于他们中的多数在美国或日本接受教育，理解有效管理的价值，因而外国观察家认为，他们无论在能力还是经验上都比另两个更传统更保守的派系优越。政学系因而被视为比其两个对手更务实、“对西方的民主精神更宽容”。但它在经济观点上还是保守的，这反映了其成员在商业上广泛的利益。

到40年代后期，《大公报》的政策制定机构是以胡霖为总经理的总管理处，曹谷冰与金诚夫为其副手，王芸生为总编，孔昭恺与张琴南为其副手。但制定社评政策的责任则众望所归地落在了王芸生头上。该报董事会由主要股东组成，他们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吴蕴初、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徐国懋、金城银行襄理和胡霖的女婿王毅灵以及胡霖、王芸生、费彝民、曹谷冰、金诚夫和李子宽等该报职员。

自从王芸生负责《大公报》社评部之后，据说比其前任从该报的政治、经济支持者手中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据说王比他在董事会中的多数同仁更具“学究”气，不肯向政治利益妥协。但在内战期间，该报还是为政府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摇唇鼓舌，结果招致日益反对蒋介石政府的自由派团体愤恨。

1947年，该报编辑部成员之间的分歧已十分明显。当王芸生外出，副总经理曹谷冰在临时负责社评部期间，撰写了好几篇右倾社评，在学生运

动问题上与政府走的是同一条路。该报的三个地方版的编辑方针也不一致。例如,天津版公开支持1947年学生抗议活动(参见本书第三章),而香港版(二战结束后直到1948年方恢复发行)比其他两个版都要左倾。

国民政府与该报主要人员之间的分歧在1948年下半年已无可挽回。王芸生不理睬中央政府的警告,并不停止对总统之子蒋经国在上海指导的紧急状态经济改革计划的攻击。此后不久,王离开上海,12月来到香港,并于1月份动身前往共产党地区。吴鼎昌于1948年末辞了《大公报》董事长与总统府秘书长一职。费彝民是今日《大公报》硕果仅存的香港版的出版者,也是1949年《大公报》正式划归共产党管理后的主要人员。

参阅书目:

冯明定(音):《〈大公报〉变迁》,《当代新闻系列》(手册),上海,第1卷,1948年12月4日。

《前线日报》上海,1948年12月28日。

《启示月报》(自由派——左派),上海第1卷,1949年1月1日。

《每周新闻》(与国民党分子有联系),上海,第3期,1949年1月7日。

钟家期(音):《〈大公报〉研究》,《全方位》(独立),上海,第5期,1949年1月30日。

《国民党内的派别之争》,《新希望周刊》(与国民党军方有联系),上海,第6卷,1949年3月21日。

储安平:《论〈文汇〉、〈新民〉、〈联合晚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观察》,1947年3月31日,第5—7页。

王绥:《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观察》,1947年6月21日,第20页。

钱端升:《中国政府与政治》,72、85—86、129—131页。

哈里森·福尔曼:《变化中的中国》,第291页。

本文对《大公报》报史中几个重点的阐述与霍华德·波曼编《中华民国人物词典》中的传记性记叙尤其是有关张季鸾和吴鼎昌的不一样。

有关《观察》订阅者的数据

《观察》的发展纪录可从编辑们每一期的报告中看出来。下文有关《观察》订阅者的数据源于每期的刊物中发出的调查问卷,都是从上述报告中摘选下来的。但没有关于整个发行量的数据。据报道订阅数在总发行量的15—20%之间摆动。

《观察》订阅者的职业分布

	卷1	卷2	卷3	卷4
总订阅数	2,709	4,973	6,732	16,086
职业	百分比			
学生	23	19	23.4	26
公务员	22	21	16.9	13
工商、银行界	22	25	22.3	17
军队	6	3	4.6	4
其他(包括律师、医生、教师等)	4	3	—	—
未答复者	23	29	32.8	40

《观察》订阅者地域分类表(百分比)

	卷1	卷2	卷3	卷4
华中	18	18	18.8	18
华北	10.5	10	8.3	6
西北	10	13	13.6	7
华南	5.5	8	13.4	13
东北	可忽略			
四川	17	12.5	12	11
江浙	12	12	12.3	14
云贵	6	5	4.2	3
上海	8.5	7.5	7.9	12
南京	7.5	6	5.5	9
平津	5	6	—	6

这些数据选自《观察》下列各期：卷1，第24期，1947年2月8日，3—9页；卷2，第1期，1947年3月1日，第27页；卷2，第24期，1947年8月9日，第3—8页；卷3，第24期，1948年2月7日，第3—8页；卷4，第1期，1948年2月28日，23页；卷4，第23—24期，1948年8月7日，3—8页。

附录二

参考文献举要

一、报纸、期刊及电台广播

《解放日报》，延安，1945—1946年。

《群众》，上海，1946年3月—1947年3月；香港，1947年4月—1949年10月。

国外广播情报分局远东部：《每日报道》，1947年2月—1949年12月。

《观察》，上海，1946年9月—1948年12月。

《北平时事日报》，北平，1946—1948年。

《上海每周评论》，上海，1946—1948年。

《上海每周评论——每月报告》，上海，1946—1947年。

《时代批评》，香港，1947年6月—1948年12月。

* 美国总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中国广东：《中国报刊回顾》，1946年4月1日—1948年7月7日。

美国总领事馆（及美国战时情报处），中国重庆：《中国报刊回顾》，1945年1月3日—1946年10月21日。

美国领事馆，中国昆明：《中国报刊回顾》，1945年9月14日—1948年7月18日。

美国总领事馆，中国沈阳：《中国报刊回顾》，1947年6月6日—1948年7月26日。

美国大使馆，中国南京：《中国报刊回顾》，1946年5月1日—1948年8月6日。

美国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中国北平：《中国报刊回顾》，北平和天津。

1946年1月2日—1948年7月27日。

美国领事馆,中国北平,《共产党新华电台广播稿翻译》,1947年11月20日—1949年7月10日。

美国总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中国上海,《中国报刊回顾》,1945年9月17日—1950年2月15—16日。

美国总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中国天津,《天津中文报刊回顾》,1945年11月8日—1948年7月19日。

美国新闻处,中国上海,《给你信息:延安广播》,1946年1月30日—1947年1月19日。

*美国领事馆有关中国报刊的翻译件可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缩微胶卷上查及。

二、著作、小册子、文章:中文部分

凡标*号者均选自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缩微胶卷。

阿哲(音)《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简史》,香港:大盛出版社,无出版日期。

《张家口全市工人首次代表大会》,张家口:张市工人首次代表大会,1945年12月25日。

张恨水:《五子登科》,香港:南国出版社,1958年。

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

张兹闾:《胜利后接收的经验》,《传记文学》,台北,1967年3月,47—50页。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北京:三联,1957年。

陈雷:《向炮口要饭吃》。上海,1947年。

陈伯达等《关于工商业的政策》,香港:中国出版社,1948年5月。

陈伯达等《论群众路线》,香港:无出版社,1949年。

陈少校:《金陵残照记》,香港致诚出版社,1963—1972年,5卷。

《晨报》出版社编《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香港:晨报出版社,1948年12月。

*《冀南行署第一次财联会报告与总结》,无地点:冀南行署,1946年1月。

《将革命进行到底》,无地点:冀东新华书店,1949年。

- 解放社编《将革命进行到底》，上海：解放社，1949年。
- * 解放社编《论新解放区土地政策》，无地点：新华书店，1949年。
- * 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无地点：新华书店，1949年。
- 《知识分子与教育问题》，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
- 晋察冀新华书店编《土地改革与整党》，无地点：晋察冀新华书店，1948年。
- 《晋察冀日报》社编《全体农民起来平分土地》，无地点：晋察冀新华书店，1948年1月。
-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法令汇编》，无地点：无出版社，1946年。
- 晋察冀边区总工会工人报社编《晋察冀边区工人五一纪念画册》，张家口：晋察冀边区总工会工人报社，1946年4月。
-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编《简易合理负担执行办法》，无地点：晋察鲁豫边区，冀鲁豫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5年。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一厅编《减租减息疑问解答》，无地点：华北新华书店，无日期。
- * 《晋冀鲁豫原居(音)自觉团结运动的经验》，无地点：无出版社，1947(?)。
- 秦义弘(音)：《中共土改与中国土地问题》，香港紫玉(音)出版社，1950年10月。
- 晋绥边区生产委员会编：《新解放区的群众生产》，无地点：晋绥边区生产委员会，1946年2月。
- 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北京：青年出版社，1950年2月。
- 《青年生活》，辽宁，1948年12月。
-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1964年，5卷。
- * 《群运指示汇编》，无地点：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1945年9月。
-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编：《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土地法大纲》,无地点: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2月。

中共人名录编纂委员会编:《中共人名录》,台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67年。

《中国学生大团结》,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6月。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香港:晨报社图书馆,无日期。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马少春主编《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59年,5卷。

方乐天:《东北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匪情专题研究丛书:共匪土地政策及研究》,台湾:阳明山,1957年10月。

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编:《职工参考文献》,哈尔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1948年。

新华日报馆编:《东北问题》,无地点:新华日报馆,1946年12月。

新华日报资料室编:《论知识分子:学习丛书》,无锡: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12月。

新华社编:《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香港:晨报社图书部,1948年8月。

《新工商政策》,香港:红棉出版社,1949年3月。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职工会》,杨惠林(译),无地点:知识书店,1949年8月。

许涤新:《中国经济的道路》,香港:新中国书局,1949年。

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胡华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

胡林(音):《一二一的回忆》,香港:海魂,1949年。

华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无地点: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

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华北学生运动小史》,无地点,无出

版社,1948年。

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编:《第六次全国劳大决议》,无地点,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6月。

华商报资料室编:《解放区贸易须知》,香港:华商报社,1949年3月。

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在斗争里壮大》,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8月。

华东人民出版社编:《东北建立宣传岗的经验》,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

黄震遐编:《中共军人史》,香港:当代历史研究会,1968年。

*《1947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献》,无地点:冀鲁豫区党委,1947年6月。

《1947年手册》,香港:华商报社,1947年1月。

《1948年手册》,香港:华商报社,1948年1月。

《1949年手册》,香港:华商报社,1949年1月。

《1950年人民年鉴》,香港:大公书局,1950年1月。

《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大连:大连东北书店,1949年6月。

高岗:《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沿》,北京:新华时事丛刊社,1950年3月。

柯蓝与赵自:《不死的王孝和》,北京:工人出版社,1955年。

*《关于决定阶级成份出身问题》,无地点:胶东军区城市部组织部,1946年8月。

《共匪土地政策重要文献总编》,无地点,无出版社,无日期。

《工人手册》,香港:大公书局,1950年。

《工人的新天地》,香港:工人文化社,1948年7月。

*《工作通讯》,第24期,无地点:中共渤海区党委,1947年7月。

*《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专号》,无地点:冀鲁豫区党委民运部,1947年6月。

*“莱东县政府:1946年上半年民政工作总结”,未出版之报告,1946年。

李先良:《抗战回忆录》,青岛:干昆(音)出版社,1948年。

李庚(音):《解放区的生产运动》,香港:中国出版社,1947年7月。

- 李庚(音)编:《解放区的土地政策与实施》,香港:中国出版社,1947年2月。
- 李天民:《中共与农民》,香港:育联(音)出版社,1958年。
- 李杜与王立(音)主编:《东北的黑暗与光明》,无地点:历史资料供应社,无日期。
- 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人民英烈》,无地点: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1946年。
- * 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无地点:中共胶东区党委,1946年2月。
- 梁漱溟与周新民:《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南京:中国民主同盟总部,1946年。
- 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集二》,上海:劳动出版社,1951年8月。
- 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8月。
- 刘少奇等:《土改整党典型经验》,香港:中国出版社,1948年4月。
- 刘少奇:《五个材料》,红卫兵出版物,1967年。
- * 《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七年来的基本总结及今后基本任务》,无地点:鲁中行政公署,1945年7月。
- 鲁风:《钢铁的队伍:苏北解放区实录集一》,香港:扬子出版社,1947年。
- 《论新解放区土地政策》,无地点: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
-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
- 毛泽东等:《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
- 内政部调查局:《奸匪现状汇编:土改》,台北:内政部调查局,1950年。
- 《把祖国推向独立自主解放》,上海:圣约翰大学,1948年。
-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编:《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
- 上海总工会秘书处编:《解放后上海工运资料》,上海:劳动出版社,1950年。
- * 《山东省政府暨山东军区公布之各种条例、纲要、办法汇编》,无地点:胶

东区行政公署,1945年。

- *《山东省胶东区整理土地等级呈报登记执行办法》,无地点,无出版社,1946年。
- *《山东省胶东区三十五年度征粮办法》,无地点,无出版社,1946年(?)。
- 沈志远等:《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香港:新中出版社,1948年3月。
- *《宋任穷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党校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无地点:晋冀鲁豫军区城市部,1947年12月。
-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编:《共匪学运工作的剖示》,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1961年。
- 《大革命以来上海工人阶级为争取统一团结而斗争》,上海:劳动出版社,1951年7月。
- *《大店查减斗争总结》,无地点:中共山东分局,1944年10月。
- 唐人:《金陵春梦》,香港:文中出版社,1955年,4卷。
- *《土地政策重要文献汇集》,无地点: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1946年。
-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和三个典型经验》,齐齐哈尔:东北书店,1948年4月。
- *《土地改革与整党》,无地点:晋察冀新华书店,1948年。
- *《土地总结报告(草案)》,无地点:无出版社,1944年(?)。
- 东北书店编:《职工运动参考资料》,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8月。
- 东北书店编:《职工运动文献》,卷1,哈尔滨:东北书店,无日期。
- 东北书店编:《职工运动文献》,卷3、4,哈尔滨:东北书店,1949年。
- 东北书店编:《新的任务与新的力量》,无地点:东北书店,1948年。
- 统一出版社编:《日本投降后的中国共产党》,无地点:统一出版社,1947年12月。
-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3卷。
- 王浩:《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七十年代》,香港,1973年1月,54—59页。
- 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上海:上沙(音)出版社,1951年。
- 《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香港:晨报社,1948年。

杨叶编：《中国学生运动的故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
杨贵尚（音）：《城乡关系问题》，香港：中原出版社，1949年。
杨冰安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3月。
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上海：成华（音），1946年。

三、著作、小册子、论文：英文部分

Acheson, Dea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艾奇逊：《参与创世：我在国务院的岁月》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9.

《农业中国：中国作者文献选编》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Prepared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美亚文件：中国灾难之探索》，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整理。

The American Assemb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1966.

美国议会：《美国与日本》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

汉纳·艾伦特：《论革命》

Band, Claire and William. *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

克莱尔·班德和威廉姆·班德：《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度过的两年》

Barnett, A Doak.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Praeger, 1963.

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

Belden, Jack. *China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Happer, 1949.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Bernstein, Thomas Paul.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Collec-

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Russia: a Comparison.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70.

托马斯·保罗·伯恩斯坦:《中国与俄国农业集体化中的领导与动员:一项比较》,博士论文。

Bertram, James M. *Crisis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 London: Macmillan Co., 1937. 詹姆斯·M. 伯特伦:《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史话》

……, *Unconquered: Journal of a Year's Adventures among the Fighting Peasants of North China.* New York: John Day, 1939.

……:《不可征服:与战斗中的华北农民共度一年历险记》

Bianco, Lucien.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毕仰高:《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

Bodde, Derk, *Peking Diary: 1948—1949, a Year of Revolution.* Greenwich, Conn.: Fawcett, 1967.

德克·波德:《北京日记:1948—1949年,革命的一年》

Bondurant, Joan V. *Conquest of Violence: the Gandhian Philosophy of Conflic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琼·V. 邦都瑞德:《战胜暴力:冲突的甘地哲学》

Boorman, Howard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71. 4 vols.

霍华德·L. 波曼编:《中华民国人名词典》,4卷。

Boyle, 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toration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约翰·亨特·博伊尔:《通敌内幕》

Brandt, Conrad,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

Brugger, William. *Democrac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48—19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威廉·布鲁格:《中国工业企业中的民主和组织 1948—1953》

Buck, John L.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约翰·布克:《中国的土地利用》

Carlson, Evans Fordyce. *The Chinese Army; 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伊万斯·福迭斯·卡尔森:《中国军队的组织与军事效率》

……, *Twin Stars of China*. New York: Dodd, Mead, 1940.

……:《中国的双星》

Chang, Carsun.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 1952.

张君勱:《中国的第三势力》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张仲礼:《中国乡绅:他们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作用之研究》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Cambridge: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58.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在 1939 至 1950 年的经验》

Chao Kuo-chun. *Agrarian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59*.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0.

赵国群(音):《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1921—1959 年》

Chassin, Lionel M.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1945—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莱昂内尔·M. 切森:《共产党征服中国: 1945—1949 年的内战史》

Ch'en Han-seng. "Agrarian Reform in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February 25, 1948, pp. 41—43.

陈翰笙:《中国的土地改革》,《远东概览》, 1948 年 2 月 25 日。

Ch'en, Jerome.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陈志让:《毛与中国革命》

Ch'en Po-ta. *Critique of "China's Destiny."*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陈伯达:《“中国之命运”之批判》

……. *A Study of Land Rent in Pre-liberation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中国解放前地租之研究》

Chesneaux, Jea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让·谢诺:《1919—1927年的中国劳工运动》

……. *Peasant Revolt in China, 1840-1949*.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1840—1949年的中国农民暴动》

Chi Wen-shun. "Liang Shu-ming and Chinese Communism," *China Quarterly* 41 (January March, 1970): 64-82.

纪文顺:《梁漱溟与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季刊》41期。

Chiang Chung-che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up at Seven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7.

蒋中正(介石):《苏俄在中国》

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y and Chinese Economic Theory*,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by Philip Jaffe.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7.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及中国经济理论》,菲力浦·贾菲评注。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The China Handbook, 1937-1945, revised with 1946 supplement. Compil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47.

《中国手册,1937—1945年》,1946年增补修订版。

The China Handbook, 1950. New York: Rockport Press, 1950

《中国手册,1950年》

The China White Paper (originally issued as *U. 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 vols.

《中国白皮书》(最初发表时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2卷。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 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国防部1945年7月报告》

Chou Eric. *A Man Must Choos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埃立克·周:《人必须选择》

Chou Li-po. *The Hurricane* [Pao-feng tsou-yu].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5.

周立波:《暴风骤雨》

Chou Shun-hsin.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7—19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

Clubb, O. Edmund.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

Compton, Boyd.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19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博伊德·康普顿:《毛的中国:整风文件1942—1944》

Crook, Isabel and David.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9.

伊莎贝尔·柯鲁克和戴维·柯鲁克:《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革命》

Donnithorne, Audrey. *China's Economic Syste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7.

奥德雷·多尼索恩:《中国的经济制度》

Eckstein, Harry. *Division and Cohesion in Democrac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哈利·艾克斯坦:《民主的划分与结合》

Epstein, Israel. *Notes on Labor Problems in Nationalist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劳工问题评论》

……, *The People's War*.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9.

……:《人民战争》

……,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7.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Fairbank, John 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Fang Fu-an. *Chinese Labour: an Economic and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 Labour Conditions and Labour Movements in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1.

方福安:《中国劳工:中国劳工条件与劳工运动经济统计概论》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Essay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费孝通:《中国的士绅:城乡关系论文集》

……,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9.

……:《江村经济》

……and Chang Chih-i.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8.

……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

Feis, Herbert. *The China Tangle*. New York; Atheneum, 1965.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

Feuerwerker, Albert. *The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1,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

费维恺:《中国的经济,1912—1949》

Forman, Harrison, *Blunder in Asia*. New York: Didier, 1950.

哈里森·福尔曼:《亚洲的错误》

…….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Crown, 1948.

…….:《变化中的中国》

…….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Holt, 1945.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Gamble, Sidney D. *North China V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甘博:《华北村庄:1933年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

…….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4.

…….:《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

George, Alexander L.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n Action; the Korean War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亚历山大·L. 乔治:《行动中的中共军队:朝鲜战争及其后果》

Gillin, Donald G. "Review Article: '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February, 1964): 269—89.

唐纳德·吉林:《述评:中国共产主义史中的‘农民民族主义’》,《亚洲研究》23,(1964,2):269—89。

…….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军阀:阎锡山在山西 1911—1949》

Gittings, John,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New York: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67.

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

Grieder, Jerome B.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杰罗姆·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917—1939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

Griggs, Thurston. *Americans in China: Some Chinese Views*. Washington, D. C.; Foundation for Foreign Affairs, 1948.

瑟斯顿·格雷格斯:《美国人在中国:中国的观点》

Goldman, Merle.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文人异议》

Han Suyin. *Birdless Summer*. New York: G. P. Putnam and sons, 1968.

韩素音:《无鸟的夏天》

Harrison, James Pinckney.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72*. New York: Praeger, 1972.

詹姆斯·平尼克·哈里森:《通向权力的长征:1921—1972年的中国共产党史》

Hinton, William.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韩丁:《翻身》

Ho Kan-chih.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

Hofheinz, Roy Jr.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1945," in A. Doak Barnett,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小罗伊·霍夫里兹:《中国共产党胜利的生态环境:1923—1945年农村影响的方式》,载鲍大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

Howe, Christopher, *Wage Patterns and Wage Policy in Modern China, 1919-19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克里斯托夫·豪：《1919-1972年中国工资模式与工资政策》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与帝国控制》

Hsiao Tso-liang. *The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 1930-1934: a Study of Docu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肖祚良：《1930-1934年中国的土地革命：一项文献研究》

Hughes, T. J., and Luard, D. E. 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 1949-19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T. J. 休斯和 D. E. T. 卢德：《1949-1960年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

Ilchman, Warren F., and Uphoff, Norman Thom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an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华伦·F. 伊尔奇曼和诺曼·托马斯·厄普夫：《变化的政治经济》

Iscas, Harold Robert.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

Israel, John.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约翰·伊斯雷尔：《1927-1937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

The Japan-Manchoukuo Year Book, 1940. Tokyo, 1940.

《日本满洲国年鉴, 1940》

Johnson, Chalmers A. "An Intellectual Weed in the Socialist Garden: the Case of Ch'ien Tuan-sheng," *China Quarterly* 6 (April-June, 1961): 29-52.

查尔默斯·约翰逊：《社会主义花园里的一棵知识分子小草：钱端升事件》，《中国季刊》第6期。

.....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

Johnston Committee, "The Report Prepared by the Johnston Committee and Submitted to U. S. Secretary of the Army Kenneth Roy, May 19, 1948—Text of the 'Summary of the Report'," in *Contemporary Japan: a Review of East Asiatic Affairs* 17 (April—June, 1948): 211—214.

约翰斯顿委员会：“由约翰斯顿委员会准备并提交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伊尔的报告，1948年5月19日……‘报告概要文本’”，载《当代日本：东亚事务概览》第17期。

Jones, F. C. *Manchuria Since 1931*.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

F. C. 琼斯：《1931年后的满洲》

Kerr, George H. *Formosa Betrayed*.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6.

乔治·H. 克尔：《被出卖的福摩萨》

Kim, Ilpyong J.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金日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

King, Frank H. H.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8.

弗兰克·H. H. 金：《现代中国经济简史》

Klein, Donald W., and Clark, Anne B.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唐纳德·W. 克莱恩和安妮·B. 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

Klein, Sidney. *The Pattern of Land Tenure Reform in East Asia After World War II*. New York; Bookman, 1958.

西德尼·克莱恩：《二战后东亚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模式》

Kracke, E. A. Jr.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E. A. 小克莱克:《宋朝早期文官制度:960-1067》
- Kuo, Warren.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68-1971. 4 vols.
- 郭华伦:《中共史论》,4卷。
- Landman, Lynn and Amos. *Profile of Red Chin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1.
- 林恩·兰德曼和艾莫斯·兰德曼:《红色中国简介》
- Lang, Olga. *Pa Chin and His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奥尔加·朗:《巴金及其作品》
- Lapwood, Ralph and Nancy.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Spalding and Levy, 1954.
- 拉尔夫·莱普伍德和南茜·莱普伍德:《经历中国革命》
- Lattimore, Eleanor H. *Labor Unions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 埃利诺·拉铁摩尔:《远东的工会》
- Lattimore, Owen.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 欧文·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
- Lee, Frank C. "Land Redistribu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acific Affairs* 21 (March, 1948): 20-32.
- 弗兰克·C·李:《共产党中国的土地再分配》,《太平洋事务》21期。
- Li Tsung-jen. "The Reminiscences of General Li Tsung-jen," manuscript,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李宗仁:《李宗仁将军回忆录》,手稿,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史项目。
- Lieberthal, Kenneth. "Mao Versus Liu? Policy Towards Industry and Commerce: 1946-1949," *China Quarterly* 47 (July-September, 1971): 494-520.

肯尼思·利伯索尔：《毛刘对抗？1946—1949年的工商政策》，《中国季刊》47期。

Lifton, Robert Jay.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学》

Lipset, Seymour Martin, ed. *Student Politics*. A special issue of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June, 1966.

西摩·马丁·利普赛特编：《学生政治》，《比较教育评论》专辑。

Liu, F. 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1924—1949)》

Liu Shao-ch'i. *Collected Works*.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8—1969. 3 vols.

《刘少奇选集》，三卷。

Loh, Pichon P. Y., ed. *The Kuomintang Debacle of 1949: Conquest or Collapse?* Boston: D. C. Heath, 1965.

皮奇·P. Y. 洛编：《国民党1949年垮台：征服还是崩溃？》

Loh, Robert. *Businessmen in China*. Hong Kong: China Viewpoints, 1960.

罗伯特·洛：《中国的商人》

……, as told to Humphrey Evans. *Escape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2.

……口述，汉弗莱·伊万斯笔录：《逃离红色中国》

Lowi, Theodore J. *The End of Liberalism: Ideology,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Autho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西奥多·J. 洛易：《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政治和公共权威的危机》

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1965. 4 vols.

《毛泽东选集》，四卷。

Melby, John F. *The Mandate of Heave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8.

约翰·F·梅尔比:《受命于天》

Mendel, Douglas.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道格拉斯·门德尔:《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

Moore, Barrington,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1967.

小巴林顿·摩尔:《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形成之中的君主与农民》

Myers, Ramon H.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马若蒙:《中国的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

North, Robert C.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罗伯特·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

Ojha, Ellen F. "Fluctu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Agrarian Policy, 1946—1950," *Harvard Papers on China*, Vol. 22B, December, 1969, PP. 20—48.

艾伦·F·奥吉哈:《1946—1950年中国共产党农业政策的波动》,哈佛中国论丛,卷22B。

The Orient Year Book, 1942. Tokyo: The Asia Statistics Co., 1942.

《1942年东方年鉴》

Parsons, James Bunyan. *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sc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0.

詹姆斯·班扬·帕森斯:《晚明农民起义》

Payne, Robert. *China Awake*. New York: Didd, Mead, 1947.

詹伯特·佩恩:《觉醒的中国》

....., *Chungking Di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45.

.....:《重庆日记》

Peck, Graham. *Two Kinds of Ti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格雷汉姆·派克:《两种时代》

Peng Ming-min. *A Taste of Freedom: Memoirs of a Formosan Independence Leade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

彭明敏:《自由的体验:一个台独领袖的回忆录》

Perkins, Dwight 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德怀特·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的农业发展》

....., *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共产党中国的市场控制与计划》

Price, Jane Lois. "Chinese Communist Land Reform and Peasant Mobilization, 1947-1948," Master's essa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70.

简·路易斯·普赖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与农民动员, 1947-1948》,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论文。

Price, R. F.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0.

R. F. 普赖斯:《共产党中国的教育》

Pulleyblank, Edwin G.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爱德温·G·普列勃兰克:《安禄山反叛的背景》

Rickett, Allyn and Adele. *Prisoners of Liberation*. New York: Anchor, 1973.

艾林·雷克特和阿黛尔·雷克特:《解放的囚犯》

Schiffrin, Harold Z.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Sun Yat — sen's Early Land Policy;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Equalization of Land Right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 (August, 1957): 549—564.

……:《孙中山早期土地政策:‘平均地权’的起源与意义》,《亚洲研究》16期。

Schram, Stuart. *Mao Tse — tung*.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66.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3.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Schuman, Julian. *Assignment China*. New York; Whittier Books, 1956.

朱利安·舒曼《派往中国》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弗兰兹·舒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

Selden, Mark.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马克·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

Service, John S. *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 S — China Relation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1.

谢伟思:《美亚文件: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Correspondents. Through Four Provinces. Shanghai, 1937.

上海《大美晚报》记者:《穿越四省》

Shen, T. H. *Agricultural Resources of China*. Ithaca; Cornell, 1951.

沈宗瀚:《中国的农业资源》

……. *The Sino — 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Twenty Years of Cooperatio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1970.

………;《中美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合作发展农业二十年》

Sheridan, James E.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詹姆斯·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生平》

Smedley, Agnes.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3.

史沫特莱:《中国战歌》

………, *China Fights Back*.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38.

………;《中国在回击》

Snow, Edgar.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Life Magazine*, April 30, 1971.

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生活杂志》。

………,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8.

………;《红星照耀中国》

Stein, Gunther.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London; Pilot Press, 1945.

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

Strong, Anna Louise. *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1949.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占领中国》

………, *Tomorrow's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 1948.

………;《明日中国》

Stuart, John Leighton. *50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

Sun, Kungtu C.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远东中国卷。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远东中国卷。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

Van Aduard, E. J. Lewe. *Japan: from Surrender to Peace*. The Hague : Martinus Nijholt, 1953.

E. J. 刘易·范·阿杜阿德:《日本:从投降到和平》

Van Slyke, Lyman P.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范力沛:《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

Wales, Nym.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Freeport, N. Y. : Bood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0.

尼姆·威尔斯:《中国劳工运动》

Wang, Y. C.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 — 1949*. Chapel Hill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 "Tu Yueh - sheng: a Tentative Political Biograph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May, 1967) PP. 433—55.

………:《试论杜月笙政治生涯》,《亚洲研究》26期。

Wedemeyer, 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 Holt, 1958.

艾尔伯特·C·魏德迈:《魏德迈报告!》

White, Theodore H.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1961.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的惊雷》

Whitson, William, with Huang Chen — hsia.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71*.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威廉姆·威特森及黄震霞:《中国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 1927—1971》

Wong, John. *L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Agriculture*. New York: Praeger, 1973.

约翰·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农业体制的改造》

Yang, C. K. *A Chinese Village Under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59.

杨庆堃:《早期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中国的一个村庄》

Yang, Martin C.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杨懋春:《中国的一个村庄:岱头(音)》

Yang Shang — kuci. *The Red Kiangsi — Kwangtung Border Reg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杨尚奎:《赣粤红色边区》

Young, Arthur N.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 — 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

Yu, George T. *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Kuomintang, 1912 — 1924*. Beker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于子桥:《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1912—1924年的国民党》

译校者后记

站在世纪的终点处,回首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时,40年代后期的那几年,无论从权力的转移,各种政治力量的兴衰,还是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来看,无疑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并对这之后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的关键时期。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此为界标一分为二: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这一时期,我们的史学历史教科书一般称之为解放战争时期。正如这一名称所暗示的那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尽管国共双方的角逐最终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但这一段历史的丰富内容远非军事上的战争所能包容,或许可以说,它留给相隔半个世纪的我们这一代思考并从中获取教益的主要不是在军事方面。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开始拓宽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范围,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在我们把胡素珊教授(Suzanne Pepper)的著作《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史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相信能对我们的史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记得是在80年代中期,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已故的著名民国史专家李宗一教授就称它是民国史领域中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确实,胡素珊教授在本书中,以宽广的视野,详尽的史料,严谨的史笔,系统地叙述和剖析了1945—1949年间国共两党的政

策、政治表现和对知识分子、工人及农民的态度，以及这些阶级和阶层对国共两党政策、政治表现的反应和他们本身态度的演变。

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不管它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如何——是作为一个对日作战取得胜利的政府体面地回到它8年前退出的首都的。此时，它控制着中央政权，拥有400万军队，四分之三的国土和3亿以上的人口，并被国统区的大多数人视为一个合法政府。而它的主要政治对手共产党尽管在抗战中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毕竟还只拥有120万军队，四分之一的国土和1亿多人口。然而，短短的四年时间，国共两党的力量不仅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国民党还在这场政治、军事的全面较量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在战场上。当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党的战略大决战在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场上打响时，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输给了共产党，它的失败已无可挽回，军事上的战争只是加速了它垮台的进程。那么，在军事上失败之前，国民党是怎样会在政治上先输给共产党的呢？这其中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它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启示？

除了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之外，当时被称作“中间势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十分引人注目。40年代后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对政治参与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中，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共双方是怎样评判的？他们又是怎样作出自己最后的政治抉择的呢？胡素珊教授在深入研究后为我们提供了她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时这也为我们把这些问题的探讨引向更深一步创造了条件。

在着手将本书译为中文时,胡素珊教授同意授权我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并欣然应诺撰写中文版序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分身无术,直到胡素珊教授授权两年后,我才依靠我的同事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我要在这里向胡素珊教授表示歉意。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对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否则此项工作可能还要拖延时日。在此,向潘平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翻译工作的分工如下:王海良译第1—4章;金燕译第5、8章;胡礼忠、许立冰译第6、9、10章,许立冰译第7章;金光耀译中文版序言附录。全书由金光耀校阅定稿。

限于译校者的学识,加上原著引用的许多文献不易查找,有些引文和地名、人名难以一一考订,翻译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指正。

金光耀

1996年春节前夕于复旦园

又及,值本书付排之际,又蒙张静如先生赐写了长篇译序,给予嘉誉。它不仅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在此,我们谨向张静如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着手将本书译为中文时,胡素珊教授同意授权我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并欣然应诺撰写中文版序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分身无术,直到胡素珊教授授权两年后,我才依靠我的同事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我要在这里向胡素珊教授表示歉意。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对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否则此项工作可能还要延宕时日。在此,向潘平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翻译工作的分工如下:王海良译第1—4章;金燕译第5、8章;胡礼忠、许立冰译第6、9、10章,许立冰译第7章;金光耀译中文版序言附录。全书由金光耀校阅定稿。

限于译校者的学识,加上原著引用的许多文献不易查找,有些引文和地名、人名难以一一考订,翻译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指正。

金光耀

1996年春节前夕于复旦园

又及,值本书付排之际,又蒙张静如先生赐写了长篇译序,给予嘉誉。它不仅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在此,我们谨向张静如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